# 民國叢書

第五編

·62·

歷史·地理類

# 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

薛農山著

上海書店

# 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

上

薛農山著

# 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

下

薛農山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發行

實價一元陸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



著者 薛農山

發行者 棄中興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刷者 民光印刷公司
上海新閘路甄慶里

總發行所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無線電報掛號七七二二

分發行所 各省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 自序

近幾年來，「農民運動」的聲浪，幾幾乎震聾了一般人們的耳鼓，但是關於農民運動之歷史分析的創著，簡直可以說是和「鳳毛鱗角」一般的很少見到！

「中國是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大家都是異口同聲的說着；根據這種論調，那麼，農民問題當然是中國革命問題中重要部份之一了。中國的農民戰爭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牠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怎樣？當中又經過了一些什麼階段？爲什麼古代的農民戰爭與近代的農民運動有質量的差異？在農民運動中又有些什麼急於要解決的問題？農民運動的前途怎樣？

這些都是目前一般人們所急於要瞭解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之具體的答覆，誠然是目前必要的工作，然而這一工作的完成，需要我們巨大的努力，因爲有許多當前的困難，主要的是各地農村生活狀況的調查，非實際參加農民鬥爭是難於解決的。

這本書不過是一個嘗試的開始，當然談不上什麼收穫。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的浪濤，將

著者捲入於農民運動的漩渦之中，因此，對於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有個很簡單而模糊的概念，這在一年以前，即企圖將個人對於農民運動的經驗與認識，具體的彙集起來，加以有系統的整理，以供社會人們的討論與參考；可是因爲生活的不安，以致屢寫屢輟，直到現在才完成這種企圖。

但是著者認識的淺薄以及文字技術的粗劣；所以相信缺點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因觀點錯誤而引起讀者諸君嚴肅的指示與正確的批評，著者除了熱烈的歡迎與誠懇的接受而外，并且還十二萬分的希望！

末了，我還要說及的，就是我寫這本東西的時候，關於材料的搜集，的確是承很多的朋友如石凡張吉珊諸君的帮助，尤其是神州國光社同人主要的是王禮錫先生的幫助，特在此地向他們致革命的敬禮！

翟山，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於上海。

本書據神州國光社1935年版影印

# 例言

一、這本書的寫成，遠在「九一八」事變以前，當時以生活的動盪，在材料的搜集方面，固然是罣一漏萬，即全書的結構與觀點，以今視昔，著者本身對牠也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

二、因着時間的推移與空間的變化，這本書在許多地方或會引起讀者諸君的誤會，假使要刻舟求劍，舉過去而衡量現在，著者恕不負責。

三、爲補充本書的不足，著者現擬着手寫一本有系統的「中國農業經濟史」，預備從史前文化，經濟地理，河流文明及金石甲骨中去追溯原始的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以迄晚近農村經濟崩潰的剖析；一方面就鋤頭考古的所得，研究中國文化的發端，一方面本科學的概念，檢視農村經濟崩潰的程度，期以三年，與世相見。但是，處在這個暴風雨時代的前夕，將來客觀的環境，如果不能允許我埋頭於故紙堆中與紙筆爲伍。那麼，恐怕今天簽發的支票將要無從兌現了。

農山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於上海黃浦江邊

# 目次

# 目次

# 第一章 導論

## 第一節 商業資本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農村經濟之劇烈的破壞和農民鬥爭之繼續不斷的向前發展，這是一般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但是，對於這些現象之歷史原因的把握，却有許多不同的觀點；不是說這是封建經濟統治之必然的產品，便是說由於地主豪紳之過分的剝削。其實，這種答案之淺薄，不僅是毫無邏輯和缺乏生氣，甚之，還沒有窺着問題的項背！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衰頹與夫農民鬥爭的爆發，比任何一個國家都早，遠在耶穌基督紀元以前，在中國已經產生過廣大的農民暴動了；當然，每一次的事變都有牠的綜錯而複雜的客觀的因素，而商業資本之早熟實是一個主要的經濟的原因。

商業資本在中國歷史上早熟的痕跡是異常的顯明，在商朝牠已經是開始形成，如貨幣制度之草創，而周朝則更迅速的完成牠的進展，其表現於貨幣方面的如『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這時候的商業資本牠已經起了媒介的作用；因此，管子亦說：『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

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管子的觀點，很明白的說出貨幣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這種商業資本在農村經濟中的作用，第一，因爲貨幣關係的發展，破壞了自然經濟的體系；第二，市場的形成，使生產品離開了物物交換的狀態而走向商品經濟的領域；第三，無情的摧毀了封建社會的紐帶，使土地也變成了商品——即是說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在封建社會內部所誕生的商業資本，牠雖然侵蝕了農村經濟的後方，使廣大農民的生活陷於窮困，然而就其在歷史發展的順序上估量，幷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換言之，牠完全與歷史發展的階段相適應。馬克斯曾經說過：「商業以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變成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爲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的作用。」（資本論三卷一部二十頁）

但是，牠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之內雖然是起進步的作用，彷彿和資本主義在整個社會進程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實際上當然不及資本主義之廣泛和深刻——著者），而一方面，却又產生新的矛盾；使廣大的農民破產和窮困，使社會的裂痕更加擴張，使階級對抗的形勢更加明顯，換句話說，他是推動農民鬥爭的動力。很多的人們，尤其是許多從事於農民運動的專家，他們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爲農民戰

爭的爆發，不一定受商業資本發展的規律所限制，在所謂純粹的封建社會內面同樣的可以爆發廣大的農民戰爭。這種觀點之錯誤，一方面固然由於他們沒有看清楚問題的實質而妄下斷語，而對於經濟的變動以及由此變動所引起的政治和社會的變革之缺乏了解，實是主要的原因。我們勇敢的承認，在封建社會內部必然不可避免的會發生反抗諸侯與領主之奴隸的或者是農奴的騷擾，但此種騷擾的範圍是偏於一隅而異常狹小，根本就不是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因為在封建社會的體系之內，生產關係的紐帶還是非常的薄弱，而交換的方式還是陷於「以物易物，以有易無」的狀態；關於這種情形馬克斯的女婿——拉發格曾加以這樣的說明：「古代貴族與家庭，正同中世紀的諸侯一樣，是使人在他們的土地與作坊裏，生產生活品，衣服，武器等等……一句話，幾乎是他們所需要的全部。交換則只把他們消費後的剩餘，在一年內的某個時期舉行。」（見中文本劉鳴初譯經濟決定論二七四頁）

社會處在這樣情況之下，農村中的關係，依然是「老死不相往來」，為什麼會產生廣大的農民戰爭呢？這豈不是奇蹟嗎？當然，人們否認古代社會內所發生的奴隸和農奴的騷擾，同樣的也是為事實所駁擊的錯誤的觀點。至於商業資本為什麼擴奪了封建的自然經濟的王位？為什麼與近世資本主義社會有不可分離的有機的聯系？為什麼與封建剝削有大不相同的內容？所有這些問題，馬克斯在很久以前已給了我們具體的答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期（即在中古時代的西歐）是商業支配工業，在近世社

會中是工業支配商業。商業對於他實行營業的諸社會間自然有多少反響；他使生產愈加屈伏於交換價值之下，並且，使享樂與生活的維持，愈加依倚販賣而不依倚生產物的直接使用。因此，商業使舊來的諸種關係解體了。他使貨幣的流通增加，他不獨是僅僅捻住生產的剩餘，並且，次第蠶食生產自身，使全體生產部門都附屬在他的下面。」（資本論三卷一部二十二頁）

很顯然的，中國的商業資本在春秋戰國以來，在農村中間，已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已經取得了對鄉村的統治。牠將牠的觸鬚伸張到農村經濟的五臟六腑，在最初，牠以貨幣的威權和高利貸方式去和農民見面，地主對於農民的征收租稅企圖以貨幣來代替穀產的繳納，更幫助了牠的發展。農民們爲的是需要貨幣，不得不受商人的控制；同時，政府亦需要農民以貨幣繳納賦稅，於是更加使農民投入商人和高利貸資本的羅網！地主的封建的剝削已經令農民不能忍受，再加上兇殘無厭的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壓榨，祇有逼得農民走上暴動的道路。中國歷史上許多次朝代的更迭——農民戰爭，商業資本曾給以很大的影響！

牠爲的要在農村中間盡量的開拓和發展其前途起見，在古代曾經贊成農民的解放戰爭，因爲地主的剝削是有礙於他的發展；但是，牠并不是澈底的解放農民，這一點在土　問題上表示得非常清楚，牠始終是擁護土地私有制度。一般的講來，商業資本在農村中間的威權，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到

近代因帝國主義經濟的侵入，牠的獨立的作用已經喪失，附屬在資本主義系統之下，成了資本主義在農村經濟中間的代理人。並且，牠自附屬於資本主義以後，其對於農村經濟破壞的程度，比以前更加兇殘，遠在一八四七年已經有人說過：『有產階級得了權勢，那封建的，家長的，田園生活的種種關係，便到處被它消滅了。結合人和他的「生來的長上」的封建線索，也被它盡情剪斷了。人和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胆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現金主義，再也找不出什麼別的聯結關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國際工人同盟宣言）

誠然，中國農村中的『封建的，家長的，田園生活的種種關係』，到處都爲資本主義消滅了！甚至，牠還在農村中間起了分化的作用，使農村階級簡單化呢！

現在，我們可以綜結起來說，商業資本在農村中間的地位，自帝國主義的侵入以來，牠失掉獨立的立場而附屬在資本主義之下，爲帝國主義作農村中間的代理人。牠過去在農村中間對於封建的自然經濟曾盡了長期腐蝕的作用，刺激了農民戰爭的興起，然而，農民戰爭之失敗，與牠也有深切的聯系；當農民暴動的開始，首要的任務便是反對商業資本，因此，逼得牠不得不參加反農民革命的末座。最近，牠的作用除了爲資本主義開闢道路以外，另外一點，便是牠本身變成地主（卽投資於土地方面）以及介紹地主走向蛻化於資本主義的道路。

## 第二節　中國歷史發展的途徑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

我們中國人之缺乏歷史智識幾幾乎成爲社會上普通的現象。其實，如果就歷史而研究歷史，當然會和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的「目迷五色」而找不着出路。其實，中國的歷史書籍雖然是浩如烟海，但絕對不會是解釋無從的，祗看人們從什麼地方去把握啊？

我們深信中國歷史上存在過原始共產制度的以及血族和氏族共產制度的社會，因爲這是從經濟觀點去分析社會演進所必然得着的結論。繼承氏族共產社會的當然是封建制度，這時期也就是「國家」的或者說是「政權」的形成。

中國國家的序幕從什麼時候開展呢？答覆這一個關於考古的問題，人們便有許多不同的見解：從夏禹治水說起，接着便是堯舜啦，神農軒轅啦，伏犧啦，天皇，地皇，泰皇啦，盤古啦，中國歷史上不知堆積了多少神話！本來，關於堯舜的有無？我們姑且不論，僅就夏禹說起，他也不見得能夠代表中國社會開幕的象徵；如果就他的所謂「治水」的事件而論，這未免沾有奇怪妄誕的嫌疑。生產方式的原始，交通關係的梗塞，不僅不能使他處理那泛濫的洪水，甚至僅僅巡視一次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據最近的可靠的材料，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認爲在商朝才是中國社會序幕的開展，就生產技術和地質學的發現，這答案是比較合乎科學的規律。

不過，事實絕不像郭沫若先生所解釋的那樣簡單，以爲商朝還是「原始共產制」的社會，還是「沒有階級的政權」！實際上商朝那麗大的軍事組織和相當發展的農業，已給郭先生以正面的答覆：商朝的經濟結構不成問題的是封建經濟。周朝爲什麼取得商朝的統治？這似乎有解答的必要：考周民族發源於陝西，自然的環境對於這一民族有很大的幫助，而肥沃的土地，灌漑的河流，在客觀上使其農業經濟的上昇，發展到「深耕」的程度；而商朝的農業經濟雖有相當的發展，但此種發展仍處於「廣耕」的狀態；農業經濟發展到高度的周民族，來代替商民族的統治，在一般社會鬥爭中實是很自然的現象。周朝統治的初期，社會仍然是封建的外形與實質，如對於同姓的分封，土地依然是「采邑」的形式，並且，還規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由封建的經濟形態所反映於政治方面的如「周初八百國」，這才表示十足的建封社會的氣焰。

自此以後，封建社會的母體逐漸開始衰弱，其衰弱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她懷孕了商業資本的胎兒；到春秋戰國的時候，經濟的上昇，把八百多個小國竟連結成七個大國，最後，秦國的生產力突飛猛進的向上，於是便造成了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基礎。秦朝的統一，在一般社會中顯示的：不僅沒有如郭沫

若先生所期望的什麼『集封建之大成』，牠表示中國的商業資本第一次走上統治的地位；在這種『質』『量』轉變的局面之下，封建經濟已受着這政府嚴厲的鎮壓，而土地之成爲商品——土地自由買賣的擴大，更將一般農民都引誘到商人和高利貸資本的羅網。在農民反對商業資本和爭取土地的解放戰爭中，又形成了漢朝的農民政府——由農民暴動中所產生的政府，但是在商業資本佔優勢的社會中，農民在經濟上沒有獨立的前途，加之，缺乏先進階級的領導，農民政權便形成內部的轉變而過渡到另一個階級，並且，還和農民的利益對立起來。王莽的變法，主要的是受着農民暴動的威脅，企圖在農村中間遏制商業資本的發展，可是，經濟之向前發展好比奔流似的是再也不回！結果，爲要求土地的定期的農民戰爭又重新爆發了，而漢朝的統治也從此解體。魏蜀吳三國的鼎立以至於晉的統一，這一時期可算是地主豪紳以及商業高利貸資本因瓜分農民革命的果實而引起的分贓戰爭；晉朝最初牠在經濟上企圖復古，換一句話說，牠企圖以農業經濟爲統治社會的基礎，且因黃河流域自然環境之關係，水深土厚的確宜於農業經濟的開拓。然而自東晉渡江以來，經濟發展的路線又有一新的變革，商業資本又重新活躍起來，牠跟着移民的發展而走到窮鄉僻壤；那時的商人如王愷和石崇們的力量，居然可以左右政局。

南北朝的劃分，在經濟上很顯然的形成兩個集團：南朝代表商業資本，北朝代表封建殘留；當然，

這並不是說南朝沒有封建遺骸的痕跡，同樣的，在北朝也有一部份商業資本的成份。這裏，關於隋朝之統一南北朝，許多的朋友曾經提出這樣的責難，說：「隋承北朝篤實之風，棄南朝浮華之習」，彷彿在經濟上這是個難於解答的問題；其實，有兩件事實已經答覆了這樣的責難：隋煬帝的開闢運河與隋朝的國際貿易的發展，關於隋朝之代表那一個階級？我想在這兩件事實當中一定會求得個明白的概念。

隋朝既然代表了商業資本，而運河的開闢，主要的爲的溝通南北的商業，同時，國際貿易的發展，如所謂『陳百戲於端門』，實際上是開了一次招待國際商人的展覽會。然而農民的膏血與商業資本發展交流，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又從這社會母體中產生了！在農民大革命的過程中，那班聰明的貴族都想乘火打刼來掠取未來的革命果實，而李世民因爲得着農民革命背叛者以及外族——突厥的幫助，竟獨吞農民革命的果實。唐朝商業資本的發展，更達到驚人的程度，開闢了三處大規模的國際貿易港（卽廣州，揚州，泉州），每年由國際貿易所得的關稅，竟爲當時政府公共收入的大宗；商業資本的發展，並未解決農村中間的矛盾，反之，使農民更快的失掉土地，使農村中間的鬥爭緊張到異乎尋常的程度，而黃巢的暴動，於是便在農村經濟劇烈破產的時期舉行了。唐朝的統治階級一方面雖然鎮壓了黃巢的暴動，而牠自己也從此開始解體了！宋代雖然繼承五代的混亂而趨於穩定，並積極的發展國際貿易，企圖在國際貿易港的收入下面建立堅固的政權（指南宋），可是外族的侵入，特特別是遼金元的

侵入，使牠無法抵抗；最後，蒙古的商人以遊牧民牧的資格又搶得了統治中國人民的寶座！

元朝是中國商業資本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時代，所有全亞洲的財富幾幾乎完全集中在蒙古人的手裏；當時的國際貿易之驚人的程度，就是歐洲商業資本最發展的國家——意大利——的代表馬可普羅也爲之瞠目咋舌！這位意大利商人——馬可普羅在他的遊記中間對於中國國際港的繁盛以及商品種類之多和流通之速，曾認爲中國是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但是，因爲自然條件之限制及缺乏蒸汽機的發明，這種發展仍然不能過渡到工業資本的階段，換言之，這時期的客觀條件尙未形成中國的產業革命。在沒有出路的社會內面，固然談不上土地問題的解決，而殘酷的剝削勢必又要引起農民的叛亂！我們看元朝政府的顚覆，被壓迫的農民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線，他們用『鋤頭鐮刀』的力量，切斷了蒙古民族統治中國的線索。然而勝利並不是屬於農民，狡猾的朱元璋，在所謂民族革命的旗幟之下，掩蔽了農民的利益！他把民族的利益放在農民階級的利益之上，實際上不曾要農民們爲地主商人白充一次苦力。當然，在明朝統治的初期，那農民大革命的恐怖，的確是統治階級精神上的創傷；牠爲的要摩撫農民暴動的創傷起見，於是不得不作一些暫時的無恥的欺騙，可是對於農民暴動的最中心的問題——土地問題，仍是置諸高閣。

其實，這個問題是農民暴動的關鍵，牠——土地是束縛農民的鐐銬。明朝的農民以及千百萬的勞

苦羣衆，他們爲求得自己的解放，曾聯合了手工業者爆發了一次最偉大的農民戰爭。這一次的戰爭，彷彿和霹靂一樣，幾幾乎震碎了統治階級的心弦；爲了要鎮壓那所謂『殺人不眨眼』的『流寇』起見，他們不惜出賣了民族的利益而與滿洲人勾結，歷史上有名的張獻忠和李自成領導的暴動；便在滿洲貴族與中國的地主官僚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刀槍之下葬送了！

滿清的政權，極乎明顯的，牠是代表滿洲貴族與中國地主商人的利益；同時，國際資本主義在這個時候也開始輸入中國，並且以大炮作先導：『在英國炮火之前，滿洲皇帝的權威，掃地無靈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全然打破了；封鎖未開與所謂文明世界未曾接觸的孤立，驟被侵入了；東西交通的開發，從此以後，在加利佛尼亞州及澳洲的黃金引誘之下，很快的進行。同時這個帝國的銀錢，——他的生命膏血——開始流出於大英帝國的東印度了。』（馬克斯）

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已經造成了中國的革命』，因此，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國』的革命，帶着極利銳的兩層性；他不僅反對滿清皇室，甚至，這個帶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牠還企圖從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下面解放出來。但是，白種人特別是英，法，美三國，對於中國少年的太平天國，認爲牠是妨礙國際資本主義的侵掠，而加以瘋狂似的摧殘，以致使這個少年的太平革命夭折。但是，反帝國主義的任務仍然擺在中國民衆的面前，義和團的暴動便是企圖解決這個任務的嘗試。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舊中國復興的象徵，四萬萬落後的亞洲人民已經走上政治鬥爭的舞台。；佔全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他們已經從酣睡的狀態當中抬起頭來準備走向光明的道路了。可是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之下，牠（帝國主義）以大借款幫助中國德謨克拉西的仇人——袁世凱。因此，又壓平了中國的革命！烏里亞諾夫說：「在亞洲還能從事歷史進化事業的資產階級，他的主要代表或社會基礎祇是農民。和這種農民並立的，還有自由資產階級，他的活動家如袁世凱一流人物，是慣於變節的，昨天他們畏懼專制皇帝，使俯伏奴顏的表示服從，後來看看見革命力量起來，覺得革命德謨克拉西快要勝利，便棄了專制皇帝，明天又要背叛了德謨克拉西爲與守舊的或新的「立憲」君主派結合以實行其陰謀。」（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粹派）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支流。牠的興起，好似大海中的浪濤一般，有一日千里的趨勢！這個革命牠不僅要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並且還要徹底的動搖舊社會的一切制度，雖然，在半途發生了變化，不過我們在這些事變中間已經看見未來的遠景。

中國社會之歷史發展的路線，換句話說：也就是農民鬥爭的路線，不過，近代的農民鬪爭如果缺乏之先進的革命階級及革命政黨的領導，那麼，仍然要走一次錯誤的「循環路」！

## 第三節　帝國主義給與農村經濟的影響

「有產階級既急激的改良了生產手段，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的利器，於是把一切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盡數牽入文明隊裏。它那價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炮，中國城壁爲他所摧毀；極端排外的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爲它所降伏。世界各國因爲要免得滅亡，都被迫得採用資本家生產方法，即將所謂文明的輸入到它們的社會，使自己也成了有產階級。要之，有產階級按照了自己的模型，造成了世界。有產階級已使鄉村屈伏於都市支配之下，它已建設許多都市，又將都市增加了比農村更多的人口，因之使多數人民脫離了樸素的田舍生活。它既使鄉村屈伏於都市，又同樣使野蠻和半開化的國民屈伏於文明國民，農業國民屈服於資本國民，東洋屈伏於西洋！」（國際工人同盟宣言）

帝國主義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遠在一八四七年已經爲握社會科學最高權威的卡爾·馬克斯道破了。誠然，中國的萬里長城被那價廉物美的商品的炮彈所摧毀，而整個的社會亦復融化於國際資本資主義經濟系統之中；很多的人們，企圖把中國資本（即民族資本）和國際資本（即帝國主義）簡單的對立起來，這種觀點不僅爲理論所嘲諷，并且還受事實的抨擊。在分析帝國主義給於農村經濟以若何影響的過程中，我們首先便遇到兩個蒙蔽事實的敵人：即認爲帝國主義侵入以前

的中國社會，是所謂純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是揚棄了商品的經濟而需要自然經濟；中國自牠侵入以後，社會的結構不僅沒有改變，甚至牠——帝國主義還在妥協和維護中國的封建制度，與封建制度互相勾結，因此，在農村中間造成了長期的中世紀的剝削，並障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另外一個從左邊來的敵人則說：自帝國主義侵略以後，所有的一切的封建關係，彷彿和秋風吹落葉一般似的已經一掃而空，就有一些殘留的成份，都爲資本主義的洪濤洗刷得乾乾淨淨！

這兩種不正確的觀點，同樣的都是有害於我們對於帝國主義具體的分析，同樣的都是沒有抓着問題的中心。

帝國主義依據於砲艦的掩護，在造成商品的形式之下，在中國開拓了大規模的交通網：建設了鐵路和輪船，那巨大的工業資本經過了這些交通利器的介紹，便和那窮鄉僻壤的農民見面，遠處在太平洋彼岸的煤油大王以及歐洲工業資本的領袖，此刻也和素不相識的朋友——中國農民握手言歡了！在此種情況之下，帝國主義的作用不僅不是很簡單的把中國變成他的市場，甚至把中國的農村經濟也牽入於世界商品流通的漩渦之中。我們從海關統計的材料當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大量的輸出，在每隔十年牠的輸出額總有兩倍以上的增加；自從農村受國際市場監督以來，而農村工業化的現象是異常的普遍：在北方以滿洲爲代表，黑龍江流域一帶，大荳的輸出佔出口總值百分之八十，

黃荳等粮產，已成爲國際貿易重要的商品。在沿海一帶墾植公司的林立，棉花的種植把稻田和鹽池的範圍排擠到異常狹小的程度；在黃河流域我們可以看到的，煙草的密佈幾幾乎有代替高粱以及麥類的趨勢；而長江流域不用說「絲」和『茶』是有大規模的發展，沿京滬滬杭兩條鐵路附近，桑園彷彿遮蔽了農田；珠江流域特別是以廣東爲代表，這個地方的農民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誠然是有點像『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情形！同時，農村的副產——養鷄業，牠在對外貿易中亦佔有很大的作用：『中國鷄之生產物（包括鷄毛，羽，鷄蛋，蛋白，蛋黃——著者）的輸出；一九二三年爲二九．二百萬兩；一九二四年爲三一．百萬兩；一九二五年爲三三、四百萬兩；一九二六年爲四〇．三百萬兩。』（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四六〇頁）最近，養鷄業更比以前發展，僅就鷄蛋一項對菲列濱輸出而論，其總値每年竟達『非幣二百五十萬元』。（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九日申報）

於此，我們深切的相信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影響彷彿和細菌對於人體的影響一樣，牠的發展是異乎尋常的迅速，祗有澈底的採用猛烈的革命的注射劑，才能消滅這一毒害人類的細菌！

## 第四節　農民鬥爭與土地問題

根據農民鬥爭之史的發展的路線觀察，我們有權利可以說土地問題是農民鬥爭的關鍵；歷史上每

次的農民暴動其主要的原因厥惟農民失掉了土地，土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地主和商人他們依據於「土地所有權」（卽土地資本）對使用土地的農民，加以極殘酷的剝削，其兇殘與無恥可以說是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當然，這種有目共覩的社會的矛盾，勢所必然的會引起在表面上站在被壓迫階級與壓迫階級之中間面實際上仍是代表壓迫階級的政府所注意，而把這一問題置入議事日程。例如在春秋戰國的時候，那所謂儒家的孟子曾提出過一種反動的什麼「井田」制度以作土地問題的對策；其實，凡是受過新興科學洗禮的人們，誰都會了解所謂「井田」制度是和上帝一樣的同是奇蹟，就當時畝的面積的狹小和生產技術的落後與夫政治組織紐帶的鬆懈，的確是不能形成什麼「百畝之田」和「八口之家」的「井田」制度，這完全是所謂儒家的幻想。中國的孔子之徒——士大夫們之唯一的技倆便是」託古改制，而「井田」制度也就是託古中的一斷插話。王莽的「王田」，南北朝及唐初的「均田」制度，王安石的「方田均稅」，很多很多的關於土地問題的答案，都沒有打通中國歷史上土地問題的道路。

土地對於農民，好像枷鎖一樣的束縛了農民。

近來因為農民運動的發展，逼得那班溫情主義者不得不採取改良的政綱企圖在農村中間建立起理想的樂園，但是改良的藥方，終於不能治療這一歷史上根深蒂固的痼疾。

依據於上面這些關於土地問題之歷史的敍述，必然的會迫得我們每一個研究農民問題的人們自問：目前的中國究竟是需要土地革命抑或是土地改良？

# 第二章　中國古代農民戰爭的意義與教訓

## 第一節　中國社會的轉形期

### (一)中國社會之史的演進

中國社會史發展的形式，一般的講來，和西歐各國同樣的屬於一個社會進化的範疇；如由原始共產社會推演到血族共產社會的階段，循此階段繼續的演進，經過氏族共產社會而踏進封建社會的大門。當然，這祇不過是指過去社會發展之一般的趨勢，至於那些『東方式』的民族的特點，仍然是含有牠的內在的特殊的意義；並且在某些重要問題上，還引起一般人們的爭執。

中國以家起源的問題，便是人們對於中國社會發展史爭論的中心。很多的人們——特別是歷史學家，都想企圖根據他們的認識來參加這一理論的戰爭；在這裏關於含有神祕性的論調，我們在這裏不屑多所列論，祇舉出那表面上帶有科學而罩的觀點來加以分析。例如德國的歷史學家馬克士·韋伯爾

他肯定的說中國國家的起源由於「治水」，而中國的熊得山也異口同聲的喊叫「治水」是中國國家的起源！在所謂東西洋學者企圖決定這一歷史爭論的時候，而蘇聯的赤色教授——馬札亞爾又復手舞馬克斯「亞洲式生產方式」的盾牌（實際上他已經是修正了馬克斯的意見）衝進戰場來發揮他自己的觀點；他說：「中國的官僚制度（卽國家的起源——著者）不僅是在和游牧人鬥爭的場合上產生，而且也在和水的鬥爭；並且也不僅在和水（洪水）爭鬥，如拉狄克之了解韋伯爾——而且是爲着求水的取得（灌漑）。」（見馬札亞爾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中譯本六十九頁，神州國光社出版）這理論的實質，與韋伯爾熊得山的觀點并沒有原則上的區別，不過是說法不同罷了。

而拉狄克他關于中國國家起源的分析，便和他們有很大的不同；他很是無情的駁斥了「治水」的觀點。他認爲這種觀點不能算清歷史上賬目，反之，祇有模糊歷史的階級性：從來歷史上沒有超階級的政權，因此，他的結論是：「中國是在和游牧人鬥爭中產生」。他這理論的正確，誠然是抓住了東方國家的鑰匙。

很顯然的，中國民族的誕生，并不是出於「一元」的系統，如：商出於玄鳥，周出於姜嫄，任宿須句出於太皡，鄒出於少皡，陳出於顓頊，六蓼出於臯陶庭堅，楚夔出於祝融鬻熊（恐是一人），據此，他們是各自有祖，何嘗有「一元」的痕跡呢？可見在上古的時代，中國的民族是異常的複雜，其

中當然要有一種民族，牠能夠發明生產工具，幷依據於生產工具的發明，使農業經濟有了新的發展。這種發展其勢必影響到其他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甚至，游牧民族牠不懂得農業的生產，也往往的侵犯到經濟發展較高的民族，如赴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帶從事牧畜等等。彼此都爲着種族的利益，不可避免的要舉行很劇烈的鬥爭！在鬥爭以前，這些種族的內部，彼此勢必至於都要推舉一個戰爭的指揮者，指揮軍事的行動，這是我們可以推想得到的。當然，這鬥爭的結果，農業經濟發展較高的民族，勢所必然的是佔着優越的地位；那些游牧民族在經濟上沒有相當的供給，特別是食料的缺乏，是要遭受很殘酷的失敗！勝利的民族，牠們一方面擁有龐大的軍事組織，另一方面又得着大批的俘虜——奴隸，在這兩個條件之下，推動了牠們的領袖走上支配的地位，建立了表面上彷彿是處理事務而實際是統治人民的政權，而形成了中國的國家。

中國社會的序幕究竟從什麼時期開始的呢？

歷史上所謂『三皇五帝堯舜』的故事，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最可靠的材料詩經的曠原中，並沒有牠們的涉跡；在東周初年（詩經是東周初年的東西）祇有一個禹是被人們公認爲歷史上第一個支配者；如『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商頌長發）『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閟宮）到了東周的末年，才有所謂堯舜的發現（堯舜的故事從什麼時代發生？這

是很難判斷的！就我們現在的材料所知道的：左傳是戰國時的著作，尚書中的堯典，皐陶謨也靠不住，論語是比較的可靠，因此，論語中數稱堯舜，我們才斷定牠為東周末年所發現。）到了戰國時因為秦文公夢黃蛇的關係，經過方士們的鼓吹，馬上又建立了一個想像中的人物——黃帝。從此以後，人們把許行所假託的神農立在黃帝之上，接着更從易繫辭中找着了庖犧，而把牠放在神農之前；到了秦始皇的時候，李斯們又創造了一種歷史理論的體系，說什麼『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迨至漢朝，問題更是越說越遠，因為他們在經濟上和苗族溝通的關係，把關於苗族始祖傳說的影響接受過來，又承認所謂『盤古』為開天闢地的元勳！

這種情形，誠然如汲黯所說：『譬如積薪，後來居上』啊！

實際上，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禹並不是中國社會序幕開展的時代，因為禹是神話。很顯然的，詩經上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禹簡直是上天派下來的神，並不是處理了九年『水災』(？)和『三過家門不入』的偉大人物！這是過去統治階級欺騙民衆的神話。因為照當時的生產技術與交通梗塞的形勢來講，禹非但不能治理那氾濫的洪水，就是假以九十年的時間要他親自去巡視一次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麼，禹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據顧頡剛說是從九鼎上來的。他認為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

物，幷根據『說文，禹「蟲也，從内，象形。」内，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顧先生這種判斷，誠然是合理的分析。並且，禹如果是存在的話，商對於牠的敷土的恩澤應當是感謝尙且不遑，爲什麼又要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而要殺戮牠的子孫呢？可見歷史上並沒有禹這樣的一個始祖，同時夏與禹也沒有什麼血統上的關係。

中國社會的開幕，就我們現在所有的材料，祇能夠判斷牠從商代開始！據詩經長發說：『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又說：『相土裂之，海外有截。』很明顯的，商代已經建立了鞏固的政權！

我們爲結束歷史上這些爭論問題，因此，不能不答覆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幾個成問題的觀點：

（A）郭先生認爲中國有過長時期的超階級的政權，並且說『西周以前』是『原始共產制度』的『氏族社會』（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十三頁）！而他的主要論證之觀點是：『堯皇帝的兩個女兒同時嫁給舜皇帝，舜皇帝和他的兄弟——象，却又公妻這兩位姊妹。孟子上有象說的話，要「二嫂使治朕棲」；楚辭的天問篇上竟直說是「眩弟並淫」。所以舜與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與象的公妻。她們或是他們正是互爲「彭那魯亞」。』（見同上書第十六頁）可是，郭先生這種巧妙

的說辭，並沒有找着問題的本質，反之，祗有頭脚顛倒暴露自己的矛盾罷了！

我們假使承認中國史上有堯舜的話，那麼，問題就不能一次決定了西周以前是無階級的原始共產社會；假使認爲楚辭上的「昆弟並淫」便判斷其爲公妻社會的象徵，同樣的也是自欺自欺人之談！就楚辭的本身來說：牠是描寫某一地方的風俗作品，並不是研究中國歷史的文獻，並且楚辭一書是否後人的假託以及秦漢以前是否有屈原其人！目前尚成爲爭論未決的問題?!（參考胡適文存第二集）

退一步講，我們把這些一時不解決的關於考古學上的爭論，保留到以後重行討論；茲就唯物史觀的ABC來說，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什麼超階級的國家！

恩格斯說：「國家絕不是從社會外加於社會的一個強力，也絕不是如黑智兒所肯定的是「道德思想之實質」，「理性之外形和實質」，他是社會發展到了某個階段時的產物；牠是社會到了本身有不可解決的矛盾，和不可調和的衝突而又無法擺脫時之體現。而且爲使這種矛盾，使這些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段不致互相破滅，爲使社會不致破壞於沒出息的鬥爭當中，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實際則用以緩和衝突，而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之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須了。這個由社會產生而超出於社會之上且逐漸與社會脫離的一種力量，便是「國家」。」（見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德文第六版一一七至一一八頁）

恩格斯這一段關於國家政權的意義及其歷史任務的分析，的確給我們研究國家問題以許多基本的觀念。并且，還把郭先生那種超階級的國家觀，打得粉粉碎碎！因此，任憑郭沫若先生怎樣的帶着唯物史觀的面罩，但是這面罩就是不爲恩格斯從他的臉上取下來，也是不能掩蓋他曲解歷史的原形！

（B）郭先生說：『中國歷史是從商代才開幕，商代的農業是以牧畜爲本位，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共產社會，』（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十二頁）關於這一問題似乎有討論的必要，因爲郭先生既不否認歷史上堯舜和蚩尤們的存在，爲什麼又說那時不是中國的歷史？如果說從地質學的發現來證明那時的生產工具是『金石並用的時代』，但是一九二八年於殷墟中掘出來的『鐵』爲什麼就令郭先生感覺得『一聲霹靂』而要加以遲疑呢？『鐵』的掘發當然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牠能夠解決人們對於中國古史上的重要爭論；可惜得很，這掘出來的『鐵』，據郭先生說恐怕牠是在地層的浮面（？），在我們未有新的材料來繼續證明殷墟中的『鐵』爲可靠外，因此，對於這個問題祇好擱着不談！

不過，商代的社會是否爲原始共產制度的社會？牠的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否以『牧畜爲本位』？這都是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如果受着新興料學洗禮的人們：誰都知道歷史上絕不會有超階級的政權！那麼，商代的社會就其龐大的軍事組織來說；也絕不是什麼原始共產制度的社會！至少牠已經離開了氏族共產制度而走進封建的初期。我們看了『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和『邦畿千里』的這些象徵歷史

的話，更爲商代社會離開了氏族共產社會範圍的旁證。如果商代的經濟眞是以牧畜爲本位的經濟，那麽，牠也絕對不能維持着這樣一個『邦畿千里』的政權！並且就地理而論，商民族建立統治的地方——河南，牠處在黃河流域，有豐富的水源，有肥沃的土地，這些自然環境都是有利於農業經濟的發展。其實，這些簡單的事實，是會逼得郭先生承認商代也有農業的發展，可是，那種「超階級」的學說終於遮住了他的眼睛！

這一類屬於考古的問題，當然還值得我們繼續的研究與探討；然而對於原始共產制度最後階段——農業共產體經濟發展的形態，在歷史的和經濟的意義上，仍需要我們作一番比較簡明的申述。不幸得很，像這類的材料在中國歷史上實是稀少，因此，我們引用盧森堡的話，來指明牠與國家形成的聯系。

盧森堡說：「集約的耕作，在當時農業技術的階段上，只能由更集約的小經營來達到。以同一的受分地，依各個農家，更加長期利用的這件事，是成爲細心處理分配地的前提條件。尤其是土地的施肥，成了不常分解的原因；在德俄二國，都是如出一轍，無論在何處，都是一樣可以看得出在「瑪克」公會的生活中，改分的期間，漸漸變爲延長的特徵，這就是到處由分配地的所有遲早變爲世襲所有的結果。由公有向私有的移動，與勞動的集約，可以同一步調整理，我們由此可以研究以下的事

實：卽森林與牧場經濟無論在什麽地方，都是附帶長期的共用地；及之，集約的經營的農業，那是最初開闢了到共有地分割的路。接着就開闢了到世襲所有的路。」（見經濟學入門）

我們根據她的分析，農業經濟的發展，是破壞了原始共產社會的均衡，並且，在這發展的過程中，還開闢了未來的不平等的道路！本來，在中國從原始共產社會過渡到國家政權形成的這一過程中，歷史材料的搜集，其困難已如上述，而這段話的徵引，大可爲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借鏡。

於此，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結論：國家政權的形成，使社會發產很大的裂痕，而階級對壘的戲劇亦從此展開於歷史舞台！

## （二）中國封建社會形成的內容與特質

封建制度，牠是歷史車輪向前發展所必經的階段，牠是整個社會進化的一個過程；形成這一歷史過程，當然，有許多很複雜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而絕對不是突如其來的變化：就是說，這時期農業經濟的上昇，催促了剩餘生產品的出現，推動了那班上層份子——特別是諸侯領主離開了直接生產的領域，而憑藉其身分特別是宗法血統的關係，榨取廣大下層的農奴。

同時，封建社會之經濟的紐帶是異常的薄弱，因爲剛纔離開了那「物物交換」的狀態，一時不能

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經濟中心，所以在封建社會初期形成的時候，除掉了農業經濟而外其他的經濟成份是很少表現其作用！

拉發格說：『封建的財產，並與封建財產相適應的社會組織，是爲家族集產主義，更正確的說來，乃是從血族集產主義到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一個橋梁。』（見財產進化史）這分析誠然是找着封建社會形成的中心。不過，民族間彼此互相掠奪的戰爭，也是促成封建社會的建立與削弱的一個政治上的酵母。

歐洲方面，關於這彼此互相掠奪的戰爭的事實，在希臘英雄歌中有一段很好的描寫：

英雄歌：

我有長槍和利劍，
並且還有盾，
把我的胸膛做戰壘，
爲的要發財！
我用這些東西耕，
我用這些東西穫，

我用這些東西製造甜蜜蜜的葡萄酒，
我用這些東西使奴隸們——
叫我做領主！
並且還要使那些不敢荷槍帶盾的人們——
跪在我的面前如跪在主人面前一樣，
我還要使他們叫我做大酋長！

（見蔡和森著社會進化史）

我們從這一段描寫當中，封建社會的政治內容，是可以想像的。不過在中國是有一點和西歐不同：這不同點特別顯著的就是宗教。

支配着歐洲整個世紀人類精神生活的宗教，在整個的西洋史上是佔了不少的篇幅，在封建社會中起了不少的作用，然而牠（指宗教）在中國純封建社會裏起的作用是很少，設若和歐洲比較起來，那麼，眞是滄海之一滴！

現在，我們用物觀的顯微鏡，對於中國純封建社會加以詳細的檢查：

（1）生產方式：我們檢查封建社會的首要任務，應當側重在對於該時期生產方式的觀察；因此，

對於古代中國的農業生產技術，的確有指明之必要。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見文獻通考）

很顯然的，這種生產技術，已經帶着深耕的性質，比氏族共產社會的生產技術進步，不過，這種方式還是指着封建初期而言，當然，牠在發展過程中，還會繼續的進步。

（2）剝削關係：封建社會的剝削，其對象是廣大的奴隸和農奴，而其最初的方式亦是強制的掠奪自然物；可是農業經濟的上昇，使生產離開了物物交換的狀態，更加刺激了統治階級奢侈程度的增加；於是在整個農業經濟的體系之內，逐漸的產生了剩餘的勞動，而加重對於農奴的剝削。最顯明的，如殷代的剝削，歷史曾有這樣一段插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亦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史記卷三第五頁）從這段插話的反面，可以看到的，是那班奴隸及農奴被剝削的痛苦。

迨至周代，剝削的關係更加發展，甚至還有類似土地法的頒佈：「載師，掌任地之法。凡任地，

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見文獻通考田賦門）這土地上的剝削近輕而遠重的原因，據鄭康成說：「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廛無穀，園少利也。」我想，這話是當相的近理。到魯宣公的時候，其剝削關係越發苛刻；不僅征取什麼「什一之稅」，還要更進一步來稅畝。據穀梁傳載：「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於此，我們姑無論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而其實對於農民之剝削則異曲同工也。

（3）土地分配的形態：在封建社會中，所謂諸侯，領主這一封建階層，他們是不參加生產，並且還對參加生產的那些奴隸和農奴加以無情之壓榨。現在我們除了敍述封建統治的剝削而外，再來進一步的審查，當時奴隸和農奴的生活——特別是土地分配的情形。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

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此係周代之授田制度。我們如按大司徒及遂人之說，則田肥者少授，田瘠者多授。如按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要之其授田則一。不過，一以人口爲標準，一以土地肥瘠爲標準。然而據食貨志所說：「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再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也。若山林藪澤，宗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授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上，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則又不免與上說稍有出入，究竟誰是誰非呢？據我們的觀察，以食貨志的敍述較爲可靠也。

(4)土地所有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見詩經)這一古代的歌謠，常爲孟子所引用，牠的主要的意思，係指當時土地所有權之屬於國家。本來當時的所謂國家與君主，并沒有什麼嚴格的區別，而「天子」的名稱亦卽是國家與君主的混合體。關於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的這一類史蹟，我們還可以找着很多的材料；如「初服於公田」(見夏小丘)一語，卽係表明所謂夏代以前土地制度的轉變，亦卽是開始由氏族共產社會轉變到封建初期的描寫。并且，土地關係發展到這

一階段，已經有個明確的決定，如：「田里不鬻」（見曲禮）。便是對於土地所有權有一肯定的概念，即規定土地所有權之屬於國家。

雖然，土地關係還是繼續的轉變。

所謂天子常常把牠「所有」的土地，根據自己的喜怒，用封建的形式——「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見詩經閟宮文）——轉移於諸侯之手，而諸侯亦以此土地贈之於自己的走狗——公卿大夫。這種詳細的情形是：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見孟子卷五萬章篇）

諸如此例之「采地」和「食邑」的事實，在中國封建史上的確是數見的不鮮的事情呀！

(5)階級意識的劃分：在封建社會中，階級對壘的形勢雖不若資本主義社會之簡單和明晰，然而因生產關係和政治結構的聯繫，根本是不能消滅這階級意識的存在，甚至只有使牠逐漸離開模糊的狀態。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見論語第二卷里仁篇）很顯然的，「富貴」與「貧賤」這兩個名辭在封建社會中不僅是不能混合，並且還是很森嚴的對立着。由這個對立，甚至還影響到統治階級內部的所謂「身分」問題，而加以嚴格的區別；如周時魯大夫季孫氏以大夫之資格而用天子的禮樂，引起孔老夫子大發雷霆，他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見論語卷二八佾篇）由此可窺測到當時階級與階級界限的森嚴了。孔老二的門徒——子貢，他是個商人，他很知道當時階級對抗的危險，所以時常發表他「折衷主義」的理論；如他在孔子面前提出什麼「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見同上書卷一學而篇）的話去問孔子，實際上這類階級調和的意見，並沒有阻礙被壓迫階級意識的發展。

所以，像孔老二及其門徒，這班封建階級意識非常濃厚的人們，時常受着羣衆的咒罵：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

丘」。曰：「是魯國之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者？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見同上書卷九微子篇）

我們以這一段歷史上封建階級的自己供狀當中，已經發現了羣衆意識是怎樣的與封建階級的不同了。

代表被壓迫階級意識的材料，在詩經上則更有如下的記載：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見詩經代檀）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見同上碩鼠）

被壓迫羣衆之對統治階級的責難，的確使統治者無可反駁。誠然，階級意識對壘的發展，不得不

使統治階級有這樣的感覺：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以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見國語周語記召公語）

現在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內容和特質，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總結：中國封建社會，牠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中間，社會組織的形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另一方面，奴隸農奴與領主諸侯的鬪爭以及領主諸侯之間相互的鬪爭，亦是構成這時期政治活動的內容；其經濟成份，農業經濟（自然經濟）是佔主要的支配地位，大部份的生產品生產目的仍然是為滿足一己的需要，而並不是商品的形式。特別是土地所有權操之於君主諸侯以及士大夫之手，而不能自由買賣，亦即是說，土地關係上也沒有商品的形態。同時，宗教的作用，其支配政治的成份是非常之少，如和歐洲衡比，的確是有天淵的不同！但這並不是說「神權」和「迷信」在古代沒有一點歷史的影響，如「神道設教」以及歷史上許多神話的傳說，都是這些影響的表現；不過，因為中國社會組織的複雜，所以和西歐的宗教是有很大的差異。

## （三）商業資本的抬頭與自然經濟的沒落

中國的商業資本並不是偶然形成的，牠經過長期的封建社會——特別是自然經濟的孕育，而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了某一適當的階段，始從牠的母體——封建社會——中誕生出來。這個母體——封建社會——自誕生此胎兒以後，已經不復像過去那樣的康健，而逐漸的開始衰頹；當然，這種衰頹過程的長短，還是要靠當時的生產力來決定的。現在，我們首先來檢閱中國的商業資本吧：構成商業資本的主要條件，是生產品離開了物物交換的狀態，而代之以貨幣流通的形式，也可以說貨幣關係的發展是商業資本形成的主要動力！關於貨幣發展的歷史形態是這樣：「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管子曰：『……夫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

四；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是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以上統見馬端臨著文獻通考錢幣門）

以上這一些關聯於貨幣關係發展形態的歷史的敍述，可以使我們從中找着許多基本的概念；這卽是說貨幣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已經起過了作用，起過了媒介的作用，如「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這些話是媒介作用很好的證明。迨至周時，則更有明白的決定，所謂「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賈買之」，又爲貨幣流通之旁證。但這些不過是指明中國貨幣關係之早期存在，而

尙未涉及中國商業資本之具體的事實。現在我們再來看歷史對於商業資本是怎樣的描寫啊！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較大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 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兄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大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之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災，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越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居高者，安歸乎？傷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刦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兼并，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歸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魚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虎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竭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云：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

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陵蜀江漢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井市，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至若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身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富，貧者之資也。食賈三之，廉賈五之，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此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封素哉耶？非也？」（見史記貨殖列傳）

司馬遷這一段關於商業資本的冗長的敍述，我們所可把握的是：第一，各地方的經濟已帶有類似「分工」和「部門」化的色彩，如「山西饒材竹……」「山東多魚鹽……」「江南出柟梓……」「龍門碣石多馬牛……」。第二，許多的貴族官僚都被吸引到市場來，寧願冒着「市儈」的名義而從事於市場上的商業戰爭；如范蠡「之陶爲朱公，……以陶爲天下之中心，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遂至巨萬」。第三，指明一般社會的人們，爲市場所吸引而怎樣的「唯利是圖」？如「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刦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兼併，……不避法禁……皆爲財用耳」。第四，指出都市繁華和娼妓制度的發達；如「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第五，在商業資本發展的過程中，統治階級的社會組織和行政系統，已經是篡亂不堪；如「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總括的說，這些現象都是瓦解封建社會的象徵；所謂「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顯然是商業資本在封建社會中抬頭，及活動的寫照。

此外，關於商業資本抬頭的事實以及手工工業崛起的情形，我們還可以檢出一些材料：

『司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敍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度量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爲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見周官）

在周代爲商賈之事，專門設一種『司市之官』，其商業繁盛之程度，可見一斑！並且這種所謂『司市之官』的性質，不僅在於處理一般的商業上事務，甚至還含有一種有計劃的帶教育性的內容。

在商業繁盛的條件下面，手工工業也有相當的發展；據考工紀所載：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

這種手工工業分工的程度，就中世紀的歐洲，亦無如斯之發展！並且，據劉師培說：『周代之工，必諳數學，如百工審曲面執（曲句股也，面平方也，執立方也），及磬氏之度句股，匠人之度日景是也，即車人梓人之製物，必度其廣與崇方，非深於數學者能之乎？』（見史地學報第三卷一期周代教育研究一文）此種推論，似乎近理，更可爲周代手工業發展之旁證。

因此，關於蘇秦所說『臨淄七萬戶，車轂繫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見齊

策），這一點，於市場繁盛的描寫，我想他決不會是主觀的形容與想像，而是一定的客觀事實的反映商業資本抬頭的另一方面，很顯然是表示自然經濟的凋殘：其分崩離析的情形，在周代已異常明顯。現在，我們可以審查牠——自然經濟崩壞的情形及其影響於統治階級的政治組織。詩經載：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彼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爗爗震電，不甯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正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子，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小旻）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母，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甫田）以上見詩經。

從這些詩句中間，我們可以找着很多自然經濟凋殘的象徵；例如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

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這段話，豈不是充分的暴露了農村組織的變化嗎？並且，這種變化的迅速，使這些被壓迫羣衆彷彿和觸電一般似的感覺得震驚！在這情況下的被壓迫的勞苦羣衆，祇有艱難困苦的去與命運掙扎；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便是牠的眞實的意義！在與命運奮鬬的過程中間，偶爾得着溫飽便喜不自勝；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實是一個最好的例。其自然經濟的崩壞情形，在當時是非常劇烈，而我們所徵引，不過是其一端而已。由經濟結構的凋殘，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引起牠的上層建築物——政治組織的混亂和崩潰；其反映到政治形態上面的，如周初八百餘國，殆至春秋戰國時所存者不過七國，而過去其他的小國，悉爲七國所吞併；當然，吞併並不是「和平轉變」的名辭，牠是含有很殘酷的流血的戰爭的內容。

關於流血戰爭破壞自然經濟的情形，據詩經的紀載是：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狄來無棄！」（陟岵）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見小雅采薇）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見唐風鴇羽）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見小雅何草不黃）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其及矣！』（見王風中谷有蓷）

『有惡爰爰，雉離於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見兔爰）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憤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見苕之華）

長期的戰爭，不僅在政治組織上，會使那些小諸候的統治趨於沒落，並且還催殘了自然經濟的後方；我們在這些徵引的詩句中間，充分的看出那班被壓迫的農民因受戰爭的災禍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當然，在戰爭爆發的前夜，統治者何嘗不以『弔民伐罪』的口號去欺騙羣衆，可是這種欺騙的宣傳當然是不能解決問題！因經濟的矛盾而聯系到政治上的鬥爭，這完全是歷史發展很自然的現象，而亦為統治階級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不過，我們看到的，這一時期的統治階級及其御用的學者，他們都幻想解決這些矛盾的問題，因此，他們之間都是互相『鈎心鬥角』而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從另面去爭取農民羣衆。

統治級級爭取羣衆方式，至戰國時已經知道從經濟方面着手；因為羣衆在整個的混戰期間，受着戰爭的影響，使農村經濟破壞不堪，聯帶又影響則農民生活的痛苦。當時農民們因征役的苛繁和壓迫

的加緊，時常寧願拋棄國家而到比較安靜的國度去；這點，特別是在那些農奴逃避中表現得利害：如『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見論語卷七子路篇）其實樊遲因爲他農奴逃跑了，向孔子請假回去種田，這本是人情之常，而孔老二偏不相諒，竟大發牢騷，說他自己『不如老農』，幷責備樊遲是個『小人』！像孔老二這種不正確的觀念，在現在中國思想界還有相當的影響；即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把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分開，因此，使一般人們都到書中去求『黃金屋』和『顏如玉』了！總之，在這段歷史插話當中，關於農奴逃跑的情形，我們可以推論想得到的。同時我們在孔老二的說話中，關於農奴逃跑的事實我們還可以找着一點痕跡：如『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見論語卷二里仁篇），在孔老二的意思，要想以倫理的觀念去遏止農奴的逃跑，殊知這一個倫理的空殼決不能代替很實際的經濟的要求。

繼孔子而後的，便是孟子。孟子他是企圖解決這些矛盾的一個。他在和梁惠王對策中，他曾說：『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梁惠王聽了他這一段

話，不禁打動了他內心深處，所以他便要孟子告訴他達到此目的策略，而說「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善於雄辯的政客——孟子，認為梁惠王可以支配，因此，便滔滔不絕的發表他的對策，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見孟子梁惠王）

孟子他以為解決當時的矛盾，一方面要行「仁義」，另一方面要解決那些農奴問題，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不過，這種論調祇可一時市儈人心，而決不能醫療統治階級的「大欲」！

歷史進化的車輪，推翻了孟子的幻想，而封建社會的上層亦日漸削弱，特別是鬪閥的破產和一般

平民的抬頭；如飯牛的甯戚和賣作奴隸的百里奚，這一斑人，過去是爲封建閥閱所不齒，這時期都爬到社會的上層——做了很大的官。在平民闖進政治舞台的時候，封建社會不僅消蝕了他的內容，就是外觀也迴非昔比，經濟中心都建築在幾個商業和手工業業的領袖手中；如猗頓之以鹽鹽起家，郭縱之以冶鐵稱富，烏氏倮爲牧畜首領，寡婦清之僱工穴礦；他們雖是平民出身，可是他們的生活實與王者埒富！他若鄭國人——弦高犧牲少數商品，居然能紓國難，而鄭子產也說其國君與商人世有盟誓。政治舞台上既是這樣的五光十色，怎不使那班封建階級的閥閱們感慨流涕而訴之於詩呢？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見詩經小雅）

以落後階級的意識和閥閱的眼光而從消極方面去咀咒政治，其不爲歷史所克服者，「未之有也」！這裏，緊接着便在封建社會開始崩潰的廢墟上誕生了一位偉大的時代產兒。

現在，我們再來敘述這時代的一位偉大的產兒——商鞅吧。

商鞅的變法一般的講來並不是離開客觀環境的幻想，却却相反，他的意識完全是當時經濟發展的反映！他在歷史上的偉大和不和磨消的地方，不僅在於堅持他的主張從理論上戰勝了當時的反動勢力——孔子老子和墨子，幷且還開闢了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使秦國強大起來以至於造成秦始皇統一的

客觀基礎而推動歷史前進。關於商鞅的生平，史記曾有一段簡單的記載：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策。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我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咸陽，秦徙都之；幷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必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行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師傅，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

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狥秦國。」（見史記卷五秦本記第五，及第十頁）

我們看了這段歷史，商鞅的生平及其對秦國經濟上政治上的幫助，可以概括的明瞭；總之，這一變法之客觀的進步意義，任何人都是不能否認的。所以連杜氏通典也說：『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寡人廣，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莫敵！』可見歷史的事實，是不容人們的抹煞！不過，關於商鞅變法的學說及其中心主張，在這裏的確要有比較詳細介紹和指明的必要，否則，對於這變法便是機械的形式的了解。第一，商君以辯證法的立場來說明他的變法的觀點：如『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見商君書更法篇述商君語）這一觀點的確立，不成問題的是針對着歷史的進化；但是他也知道一般人們特別是守舊的人們的心理是『畏難苟安』而不肯前進，所以很堅決的說：『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見定法篇）祗有相當的採取政治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他在和秦孝公討論推行新法時，曾決定如下的辦法：

『公（秦孝公——著者）問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爲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法令之謂卽是法律講的是什麼的意思

——著者），以爲天下正。……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各皆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按此句當有訛脫）。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見定分篇）

雖然，這還沒有涉及到問題的中心。關於發展農業經濟和爭取羣衆之「富國強兵」的政策，據商君書說：『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名當名（此三句有譌字——著者），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則草必墾矣！』（見墾令篇）這種理論，誠然是帶了很濃厚的重農主義的色彩，驟然觀之，未免與秦之富國強兵之商業資本的前途有所抵觸，實際上，這個複雜而必須解决的問題，列甯在俄國問題上他已經先我們而解决了。他說：『因爲要測定資本主義的影響，首先就要努力去區別農業的自然經濟和商業經濟，所謂自然經濟，如一般所知，不是以市場爲目的的生產，而是以經營者家族的消費爲目的的生產；這種生產在農業方面，雖有較大的作用，但是牠漸漸的把牠的地位讓給商業的農業。』列甯這種分析是非常確當的，商君所認爲發展的農業是商業資本的前途，換句話說，是商業的農業！其原因由於秦處西陲，開化較晚，天然產物，雖甚豐富，但地廣人稀，主觀上不足發展商業的

農業，於是一方面吸引鄰國的破產的農奴來參加生產，造成農業的大量的發展，另一方面，藉此以統治別國而發展自己的前途。所以說：『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財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此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已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者，……後之三世，無知軍事。……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敵戰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見來民篇）這些議論，更可為商鞅發展商業農業之另一證明。

（註）商君書有人疑為概是後人所假託，如胡適之即是一個（見中國哲學史大綱二百六十三頁）。我以為這書不見得全部假託，當中有很多是商鞅自己所發表過的意見，不過免不了被後人滲雜一些不倫不類的東西，所以對於該書的態度，應該辨其異同，求其是非，決不能全部棄之而掉頭不顧！並且滲雜的時間，依著者推想大概仍在戰國，最晚也不過秦朝吧！

自然經濟沒落的情形及其原因，我們已經有了很長的敘述，在此可以相當的告一結束了。然而這時期的封建階級為要挽救他們那頻於沒落的命運，不特不積極的反動起來！此種封建階級對於商業資本的反動的事實，從老子孔子孟子的學說中間，我們可以找着很充分的證據：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

老子因受商業資本萌芽的刺激，感覺得社會的混亂，完全由於牠——商業資本的作祟，所以不禁聯想到過去原始的無階級的共產社會的美滿，而主張「還淳返樸」，提出「烏托邦」的意見於人民之前；并且，他爲要保證他的意見能夠在羣衆中發展，不得不竭力的攻擊當時的統治階級。因此，他便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這些話的作用，是鞏固了他在羣衆中的影響。孔子嗅着老子這些祕密，況且他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比老子更加惡劣（也卽是說商業資本的影響，比前更加廣泛）；所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普遍現象，使他異常的痛心！但是，對於這些現象的由來，他比較老子是更加認識得深刻；他認爲這些原因完全由於經濟的分配不均，如其所說什麼：「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見論語季氏篇）實際上，這些話是針對着已在發展的商業資本而發的，他企圖以這樣的論調去博取羣衆的歡心！可是在當時均產主義是不可能的。迨至孟子他反對商業資本的態度比老孔更加明顯，更加堅決；如「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見孟子卷二公孫丑章）他一方面無情的詛咒商業資本，而別一方面又迴想所謂『井田』制度的恢復，所以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不過，中國思想界很多的人們——特別是胡適之和梁任公這班前輩，他們都把老孔這類的議論，當作異常劇烈的革命主張（見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五十頁及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十三——四頁），甚之，最落後的國家主義派也捧孟子爲民權革命家（見正義進化與奮鬬）。其實，這類『不正確的理論，遠在一八四七年以前，已被唯物論的大斧作了類似的糾正』：

那些貴族因想得世間的同情，於是只好在面子上裝出忘記了自家利害的樣子，專替被掠奪的勞動階級向資本家聲罪致討。由是他們對於那新主人翁唱了些譏諷的歌，發了些將來必然破裂的預言，藉以替他們自己復仇。封建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起來的：一半是悲哀，一半是譏諷，一半是過去的反響，一半是將來的威嚇；雖然有時用痛快銳利的批評，刺擊資本家的心胸，但因全然缺乏了解近世史前進的能力，結果，總不免稽滑。那班貴族要想人民再歸附他們，就用救濟無產者這名義做軍旗。但人民和他們常常接近，便看出他們裏面還穿着封建的武裝，都呵呵大笑的散去了。（共產黨宣言）

馬克斯這種精密的分析，壓倒了唯心派的胡說；不過讚揚孔老的胡調哲學，在中國還有相當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的實際作用是最後的掙扎！牠的地位在不久的將來會被羣衆所摟奪。

其次，我們更要說明的，便是商業資本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並確定此種關係，來解决中國目前一般人們關於商業資本爭論的問題。

「商業以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變成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爲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的作用。商業對於舊生產方法所加的解體作用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這首先是以這種生產方法的堅固的程度及其內部的構造如何爲轉移的。這種解體的進程究竟歸結到何處，就是，那一種新的生產方法起來代替舊的生產方法，這不是以商業爲轉移的，但是以舊的生產方法自身的性質爲轉移的。」（資本論三卷一部二十頁）此種商業資本之進步的意義，是不可磨滅的的事情呀。至於這種發展，很顯然的，與資本主義的社會有密切的不可分離的聯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期（即在中古時代的西歐）是商業支配工業；在近世社會中是工業支配商業。商業對於他實行營業的諸社會間自然有多少反響；他使生產愈加屈伏於交換價值之下，並且使享樂與生活的維持，愈加倚賴賣而不依倚生產物的直接使用。因此，商業使舊來的諸種關係解

體了。他使貨幣的流通增加。他不獨是僅僅擔任生產的剩餘，並且，次第奪食生產自身，使全體生產部門都附屬在他的下面。然這種解體的作用大部份是以生產社會的性質如何爲轉移的。」（同上）

不過，這裏有個問題是必須解釋的，就是商業資本的發展，完全按照某一國家之特定的產業發達的狀況爲轉移，因此，他所發現的形式，往往是不甚一致。如「古羅馬在後來的共和時代中，商業資本的發達高於古代世界中以前的狀況，但却沒有何種產業的發達與之並進；然在確靈慈及歐洲和小亞細亞其他希臘城市中一種顯著的產業發達伴着商業的發達而興起。在他方面，在和城市發達及其條件恰恰相反之處；在居無定所的遊牧民族中常有商業的精神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同上）馬克斯認爲：從封建的生產方法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推移，有三種方法：第一，商人直接變爲工業家；在由商業變成工業的地方是如此的，特別在奢侈品工業中是如此的，此等奢侈品工業由外國商人從外國輸入原料與勞動者，如十五世紀從君士坦丁堡輸入意大利是。第二，商人使手工業小主人變成他的居間人，他或者又直接從獨立生產者購買生產物，他在形式上是聽這種獨立生產者獨立行動，並且使後者的生產方法仍舊不化。第三，工業家變成商人，並且爲着商業從事大規模的生產。（資本論）馬克斯這種確當的分析，的確給我們研究商業資本以最有力的武器，特別是答覆了人們關於中國商業資本自秦以後長期停滯的責難。

## (四)秦始皇在歷史上代表的是些甚麼？

歷史的變革，從來沒有過所謂偶然的現象，牠每一次的蛻變，都是有很深刻的內在的原因；由生產關係所決定的社會紐帶，牠是聯系這種變革的中軸。因此，關於秦始皇吞併六國而形成君主專政的統治，同樣的，我們要從多方面——特別是經濟方面去解決這一素來為人們所爭論的問題。過去一切歷史上的封建支配的關係，發展到戰國時代，已經是老態龍鍾而失却了支配的作用，商業資本此刻就攫奪了牠的王位；秦始皇之闖進政治舞台，在很久以前，商鞅已經為他築下了很堅固的經濟基礎，他不過是承繼了這份遺產而擴大其前途。這轉變不僅反映了過去各階級間的矛盾，牠還無情的破壞了一切封建的關係，而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當然，這國家不是代表廣大被壓迫的農民，恰恰相反，而是建築在代表商業資產階級和貴族的經濟基礎上面，牠是倚靠商業資本與貴族來反對割據的諸侯。舊的「采邑」制度，是束縛商業發展的工具，所以反映於政權形式上，就是廢除了這些羈絆採取郡縣的方式，不成問題的，這在行政上是有進步的意義。當時行政區域的廣大，超出中國以前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其廣袤有如下表：

郡名　現在所在地

| | |
|---|---|
| 內史 | 陝西中部 |
| 山川 | 河南黃河兩岸各地 |
| 河東 | 山西西南部 |
| 上黨 | 山西東南部 |
| 太原 | 山西北部 |
| 代 | 山西東北部 |
| 雁門 | 山西西北部 |
| 雲中 | 察哈爾西南部 |
| 九原 | 綏遠中部 |
| 上郡 | 陝西北部 |
| 北地 | 甘肅東北部 |
| 隴西 | 甘肅東南部 |
| 潁川 | 河南中部南部 |
| 南陽 | 河南西南部湖北北部 |

碭　河南東部山東西南部江蘇西部安徽北部

邯鄲　河南北部及直隸西南之一部

上谷　直隸西南中部

鉅鹿　直隸西南部

漁陽　京兆

右北平　直隸東北部熱河南部

遼西　熱河東南部奉天西南部

東　直隸南部山東西北部

齊　山東南部及東北部

薛　山東南部及江蘇東北部

瑯琊　山東東南部

泗水　江蘇北部安徽東北部

漢中　陝西南部湖北西北部

巴　四川東部

蜀　四川中部

九江　江蘇安徽北部一帶及江西境內之地

鄣郡　江蘇西南部安徽東南部浙江西北部

會稽　江蘇東南部及浙江東部南部各地

南郡　湖北東部南部

長沙　湖南東半部及廣東一部

黔中　湖南西半部

閩中　福建全境

南海　廣東全境除西南部外皆是

桂林　廣西全境

象郡　廣東西南部及安南北部

綜觀上表所列行政區域，其幅員之大，誠爲過去一般天子們所夢想不及！其經濟的發達，祗就「賦鹽鐵之利」已「二十倍於古」（文獻通考）他若「徙十二萬戶於咸陽」（史記）也可以窺着秦始皇所代表階級背景的祕密。關於秦始皇的政策——尤其是「焚書坑儒」的政策從來歷史上的毀譽幷

無定論，我們覺得要確定這些毀譽如何，那麼對此種政策必須加以檢討：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易也。今陛下創大業，建不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守舊博士淳于越——著者）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幷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時，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諸侯（侯字當作儒字——著者）幷作，語皆道古以害今，實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幷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者，以吏爲師。」（見史記秦始皇本記及李斯列傳）

秦始皇爲什麼竟如此的大胆，居然幹得出這樣毀經滅典的勾當呢？就我們目前一般的觀察，這種政策的確定，完全有牠的現實的政治意義；一方面要打擊那些落後的所謂儒家的思想，而另方面，更企圖以這種手段來維持牠的統治。

至於『坑儒』這總要算是一件最殘酷的事情吧？不！以秦始皇的統治者立場來看，這也是必須的。歷史告訴我們關於坑儒的事實是：

『候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併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能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遂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有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使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謠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從邊。』（見史記秦始皇本記）

同時，史記儒林列傳也說：『秦之季世坑術士』！我們看着這歷史的記載，很顯然的，秦始皇當時所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一班求仙方望星氣的術士。這批『爲謠言以亂黔首』的方士，就是多坑

殺數百人也值不得什麼悼惜！不過，我們認為與反動思想做鬥爭，如果簡單的採取肉體懲罰辦法，仍然是皮相之談而不能達到很圓滿的目的。但是現在的焚書坑儒的現象，已經成為司空見慣了！這一點又何足驚訝呢？其他如築長城（實際上長城遠在始皇以前已經存在，始皇不過加以修葺和聯系——著者）營宮室，這也不過是為維持政權與繁榮市場的舉動，是一種代表商業的資本的國家主義的建設。

對於秦始皇的毀譽，已經成為批評的焦點，現在我們可以舉出郭沫若的批評以及對於這批評的答覆：「秦統一天下以後，在名目上雖然是廢封建而為郡縣，其實中國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都是很巍然的存在着的。我們不要為文字所拘泥了。周室在古時雖號稱封建，但事實上在周官有「鄉」「遂」「縣」「鄙」之分，并不是全無郡縣。秦以後雖然號稱為郡縣制……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我們到了現在假使要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在秦時就崩潰了話，那簡直是不可救藥的錯誤！」又說「秦始皇不愧是中國社會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動！」

依照郭先生的說法，中國的封建社會不僅在秦時沒有崩潰，并且秦始皇還是「封建制的元動」？我們不知道郭先生根據什麼來判斷秦始皇是代表封建？恐怕是根據他的腦海吧？須知腦經是靠不住的：「唯物史觀認為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二種原素決定當時社會中財富的分配，因此，更決定構成此社會之階級及其中各層的形成。所以如果我們要尋求

即決定某種社會變化或某種社會革命之原因時，則不應到人類的頭腦中到人對於永久眞理和永久正義的最高智識中去尋求，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去尋求；總而言之，那不應到所研究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求，而應到這個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求。」（恩格斯——反杜林）郭先生說：中國古代社會的變革，是「由王而伯」，所以「一直到最近百年，中國儘管在更換朝代」，但是「社會的組織依然是舊態依然」！這是很顯然的，把歷史進化的一個階段——商業資本的階段抹煞了！不過事實總是事實，那些想抹煞實事的人們，同樣的，也是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

## 第二節　秦漢的農民戰爭

### （一）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農民戰爭

秦始皇的統治，雖然能夠戰勝封建諸侯，但牠終敵不過被壓迫農民的「鋤頭鐮刀」！這並不是秦二世的「低能」，而是由於經濟矛盾在當時之無法解決；因爲秦代雖從政治上屈伏了過去的封建諸侯，但同時又造出大羣失掉土地而離開生產過程的農民，換句話說：秦代是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如「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羣，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圈是我

加的——著者）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見史記秦本紀第六）從這段片的材料中間，很充分的看出了當時因商業資本的發展已使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而造成土地集中的現象，所謂『始皇帝死而地分』，很顯然的，這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對始皇的咀咒；他們不認識土地集中之過程的加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的趨勢，而單純的指斥為秦始皇之主觀的罪惡，然又不敢公開的反抗，因爲『偶語棄市』的淫威是籠罩了一切。所以祇好諉之於熒惑的力量藉以擴大要求土地的宣傳；這種極原始的農民意識，如果就現在觀察未免令人失笑，要之，在鬥爭最初階段中，這是免不了的幼稚行爲。因此，任憑統治階級怎樣的採取『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的手段，終不能挽救未來的厄運。

中國歷史上排山倒海似的農民大暴動，便在土地集中的條件下面產生了。換句話說：農民暴動是土地集中之必然的產品！因此，以陳勝爲領導的中國第一次的農民大暴動便開展於歷史舞台！

關於這位偉大的農民暴動的領導者——陳勝，歷史曾授他以光榮的聖圈：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夏陽人也，字叔。陳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至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陳勝吳廣乃謀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

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王。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幷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應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狥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

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見史記陳涉世家）

這次暴動的領袖——陳勝，他的英勇的神精與堅決的意志，的確是值得我們的紀念；他的英勇的神精與堅決的意識是從他那飢寒交迫的環境中煆煉出來的，因爲他的出身是一個失掉土地的破產的傭耕的雇農，這更顯示出這次暴動的特殊意義。雖然，在暴動以前，缺乏發動羣衆的工作，沒有在廣大的被壓迫農民中間建立起政治威信，而以『篝火』『狐鳴』的行動來代替階級的鼓動，未免含有神祕的意義。然這足是表示原始的農民意識，并且是極其濃厚的農民意識。但是從另一方面他們也感覺『王候將相，寧有種乎？』的眞理，并把這法寶去做號召羣衆的軍旗。不過，這次暴動一開始就帶了很多不徹底的成份，如掛出扶蘇和項燕的招牌，把自己的眞正面目隱藏起來，并且隱藏在這種過時的外衣中間；迨至後來，這個由暴動而創造的政權，漸漸與參加暴動者分離，那些過去參加暴動的羣衆，都被認爲『客冕無知，顓妄言輕威』？而排斥於暴動政權之外，很自然的，在商業資本發展的過程中，由農民暴動而建立政權是必然的會腐化蛻變爲另一種東西！

在農民暴動的過程中間，時常有一些新的事實去刺激那些被壓迫的農民羣衆，要他們從麻醉狀態當中抬起頭來，陳涉不過是一個先導。農民從麻醉狀態當中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握起他們粗暴的拳頭來奪回自己的天下；所以『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這現象在當時誠然是

普遍得很。

從階級爭鬥的決鬥場中，農民暴動幾幾乎普遍了全國：『元年，七月，戍卒陳勝吳廣等反故荊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循起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武臣自立爲楚王，魏咎自立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起兵會稽郡。』（史記二世本紀）中國歷史家往往說『陳涉爲難』便『豪傑蠭起』！便推翻了秦朝的統治！實際上，那些野心家和日漸衰弱的閥閱——項梁項籍等人，往往『乘火打劫』來掠取農民革命的果實；他們之所以參加反統治階級的戰線，一半是發洩怨憤而爲自己復仇，一半是爲鬥爭所威脅，而企圖攫取未來的寶座，再慢慢來鎮壓和肅清這批造反的叛徒！

因此，這次鬥爭的結果，不但爲難的陳勝吳廣消蝕了他們的踪跡，就是那代表封建頑逆的項籍亦受淘汰；所謂亭長出身的小市民的劉邦竟全部的攫取了農民革命果實而走上政治舞台！此種轉變，并不是由於劉邦之生而『隆準』『龍顏』，反之，完全由階級關係來決定其命運；當劉邦備受封建頑逆——項羽威脅的時候，卽嗅着經濟背景的秘密，他寧願犧牲由戰爭中所得來的一切的利益，忍受一切的侮辱，而走到秦始皇吞併六國之起點的地方。結果，他在這地方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了。當他發展的時候，也就結束了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農民暴動。

劉邦之所以能夠戰勝一切的：一方面固然是他欺騙羣衆手腕的高妙；另一方面，他又依靠了廣大的被壓迫的農民羣衆以『鋤頭鐮刀』去和統治階級肉搏，爲他建築了很堅固的基礎。但這位歷史上的投機家——劉邦，他并不是農民眞正的朋友；最初那些被壓迫的農民以粗暴的拳頭扶他上馬，迨他手拉着繮繩高坐馬鞍之上的時候，便對着羣衆猛踢一脚以做囘報的敬禮！如他在奪取政權以後，便趾高氣昂的說：『威加海內兮歸故鄉！』這是公開的與羣衆分離的歌唱！

漢朝的統治形式，在總的路線方面，仍是和秦代一樣的同是束縛和壓迫農民的工具；不過，有些地方，統治者亦有『覆車當戒』之感！如『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獻通考）。因爲這種政策可以緩和羣衆的鬥爭情緒，可以蒙蔽羣衆的階級意識，換句話說，這政策并不是爲的羣衆利益，恰恰相反，而是爲的安定自己的統治。漢文帝時，國內沒有戰爭，國民經濟比較發展，而執行此種政策更爲堅決，如『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年，除民之田租。』（文獻通考）同時還有一位政治家——鼂錯，他認爲單純的從政治上去解決農民問題，其收效是比較遲緩，因此，他的中心意思是要從經濟方面去處理統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所以他和漢文帝說：『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水旱，而畜積未及，何也？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

地著則離鄉輕家，不能禁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同上）這位政治家以爲獎勵生產祇有提高農產品的價格，而另一方面則以官爵的名義去博取富人的財富以充行政經費，殊不知俗諺說「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切財富都是生產者自己所創造，所謂富人，也不過是剝削剩餘價値者之一種名稱而已。

鼂錯既然解決不了經濟的矛盾，而土地集中的危機又復一天天的加深，到漢武帝的時候，這危機已經暴發成爲社會的裂痕，甚至令守舊大臣董仲舒都看不下去而提出限田的主張，他說：「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然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幷兼之路！」（同上）可是這種「限田」的主張，敵不過事實的一擊，牠便烟消雲散了！

## (二)王莽變法

土地集中過程的加速，使農民破產的速度和牠成爲正比例似的前進，無論鼂錯怎樣的提倡貴粟，無論董仲舒怎樣的提倡「限田」，但其結果仍不能彌縫這一社會的裂痕：王莽抓住了這一裂痕，在階級內部起了一次很劇烈的鬥爭，幷在鬥爭過程中很順利的完成了他的「宮庭政變」。王莽自「宮庭政變」以後，即企圖以政治的力量來彌縫社會的裂痕，因此，就決定了歷史上有名的所謂「王莽變法」。很多的人們——尤其是現在許多革命青年關於王莽變法動機的分析，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道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企圖；我們要知道「宮庭政變」的發生，絕對不是革命的結果，恰恰相反，而是少數官僚貴族的陰謀勾當。歷史上每次的革命都是階級鬥爭，是被壓迫階級拿着長槍大刀去對付壓迫階級的流血行動，是廣大羣衆以暴力去推翻統治階級政權的表現；而「宮庭政變」不僅與革命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至多也不過是階級內部矛盾之最劇烈的表演！牠的基本路線是摒棄暴力而採取溫和的手腕，其最終的目的仍是在維持舊的政權。這兩者中間的區別是異常的明顯，不僅僅距離着一道「鴻溝」，而是隔着很窵遠的「萬里長城」；這種區別，誠然是階級的「分水嶺」呀！那些幼稚的人們，認爲王莽的土地政策就是「社會主義」的實施，這不但近於武斷，而且也未免滑稽！須知王莽他幷不是社會主義者，他不過是

僅狡猾而具有陰謀的政治家；這位政治家的特長不僅僅限於具有「謙恭下士」的虛僞手腕，而主要的他還認識解決土地問題是當前的任務。其實解決土地問題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任務，而社會主義的革命也決不是單純的去處理土地問題！本來，「社會主義」這一名辭的內容，有很多不同的解釋，這裏用不着什麼爭論，不過，王莽變法的實質一方面雖宣佈「土地國有」而別一方面仍然維繫社會的「私有」制度特別是「生產工具」的私有，這種現象與革命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其意義截然不同。

這次變法的動機，很顯然的，因爲商業資本的流波激蕩了自然經濟，使農民們陷於窮困和破產的深淵；這一大羣破產的農民他們是社會上一種偉大的力量，他們曾推翻過極專制的秦代統治，他們曾經爲劉邦做過苦力而擁他走上政治舞台！狡猾的王莽一方面是受着這種潛伏着的力量的威脅，所以他想拿着這個問題來欺騙羣衆！因此，他的解決土地問題并不是爲謀農民的解放，而是企圖維持和鞏固他自己的政權。

關於這變法的內容，最好可以參看他的詔令：

「秦爲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而貪鄙生，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㽬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文獻通考）

王莽在變法令中說得非常的堅決，可是在商業資本佔統治作用的社會內面，就是鋼鐵般的意志，也會被這經濟的火爐銷熔得乾乾淨淨！何況在工業資本尙未形成的社會中，如果不按照經濟發展的趨勢而強迫的執行土地國有的政策，這誠然不僅是一種超時代的冒險的嘗試，並且，還是烏托邦的幻想！結果，這轟轟烈烈的「王田制」的運動，祇好爲當時經濟條件尙未具備的絞繩所絞殺！

在施行王田制的過程中間，統治階級所獲得的成績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道」，處在這種情勢之下的王莽，就是再要堅持自己的主張也不可能！所以祇好再下詔說：「食諸王田及私屬皆得買賣」而撤回變法的意見，無恥的屈伏在商業資本的面前！

本來，這種由上而下的改良運動——土地國有的運動，牠本身就包含了許多矛盾，并且這些矛盾亦爲統治階級所無法解決，故其前途祇有失敗！自王莽撤回變法的命令以後，過去的貴族統治又重行抬頭，那班地主階級經過此次的事變，更兇殘的在農民身上發洩他們階級的積憤，而土地集中的現象更是繼續的發展，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已經埋伏了未來的農民暴動的種子。

## (三)赤眉暴動

新莽變法的失敗，那土地國有運動的企圖，已經爲事實推翻得乾乾淨淨，并且使牠的發動者很可

悔的跪在商業資本的面前，而委曲求全的懺悔自己的錯誤。政治上既有這樣一種的轉變，當然，這轉變的影響很快的會傳播到一般社會生活中間，尤其是農村中間；因爲王莽在經濟上既找不着新的出路，仍然投到商業資本的懷中而加緊對農民的剝削，如『設六筦（鹽一酒二鐵三名山大澤四均賒貸五銅冶六）之令，用富賈督之，復下詔每一筦申明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蝗旱相仍；富者不能自別，貧者無以自存。於是并起爲盜賊，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荊州飢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見御批通鑑輯覽第二十卷四十四頁）這些情形，都是加速了土地集中的過程，在客觀上是把大批的農民，趕出了生產領域以外，使他們過着飢寒凍餓的生活。這客觀的政治的經濟的矛盾之繼續的發展，是推動農民走向革命怒潮的基本條件！從此，又產生一次翻天覆地的農民戰爭！

『赤眉』的暴動便是這時代農民戰爭的主要骨幹！

當王莽統治的時候，誠然是外患頻仍，如『匈奴寇邊益甚，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使民奴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以秩爲差。』（見同上）另一方面又是內憂不已，如『臨淮瓜田儀依阻會稽長州，琅雅呂母聚黨數千人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而『天災』『飢民』又復相偕而至，如『秋霜殺菽，關東大飢』『關東人相食』

「流民數十萬入關」。新莽的統治對於這些情形，的確是倉皇失措而無法應付！當然，參加內亂的井不僅是淸一色被壓迫的農民，甚至那些封建的餘孽也借此復仇。新莽他在主觀上是企圖尅伏這些困難；於此，第一步他便想拉攏封建餘留來緩和對自己的鬥爭，如『授諸侯茅土於明堂』，可是「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著第四色之土，用慰喜封者。」（見同上）第二步，便是從行政上沒收官吏的財產以供給軍需，去鼓勵士兵們屠殺羣衆的情緒；如『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吏以不得俸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增產致富者，收其家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見同上）但是，這兩種的方式，都不能解决當前的困難，於是便異想天開的玩一套欺騙羣衆的滑稽魔術：如『莽見盜賊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紀歷，六歲一改之，書布天下，自言當如黃帝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人皆笑之。』（見同上）

關於所謂『赤眉』的起源，當中曾有一段農民暴動史上的趣話：先是瑯琊人樊崇他在山東的莒縣領導農民暴動起來；最初參加莒縣的農民暴動也不過百餘人，在暴動中羣衆看到樊崇非常地勇敢，於是爭相歸附，一歲之間，吸收一萬餘人；而他的同鄉——農民羣衆的領袖——逢安以及東海人徐宣謝祿等都領導大批農民羣衆前來參加，在靑州徐州一帶，形成了割據的局面，其聲勢之雄壯與浩大，幾幾乎震碎了統治階級的肝胆！當時王莽曾派遣王匡廉丹統率大批軍隊前來進攻這一農民暴動，企圖以

軍事力量來挽救統治階級垂危的生命；樊崇恐怕參加暴動的羣衆與統治階級的軍隊混合起來而發生互相殘殺的慘劇，於是皆以赤色塗眉，以資識別；自此以後，中國歷史上又平添一段所謂「赤眉」的插話。

與「赤眉」同時崛起的，尚有很多原始的農民的祕密組織，而這些組織有的是自動的起來，有的是受「赤眉」暴動的影響，其內容固然複雜，而名稱也極不一致；如什麼銅馬，大銅，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等。要之，這些組織的名稱，或是以山川土地爲名，或是以軍容强盛爲號；每個組織都有一個特定的領袖來統率，不過，大部份在總的行動方面是受赤眉的指導，其羣衆約百餘萬人；故一舉一動，都影響整個的社會。甚至，在暴動的初期，卽注意於軍事紀律，尤其是注意於農民的生命的保障與安全；如「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見同上）因此，一般被壓迫的農民羣衆都說：「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尙可，更始殺我！」（見同上）在整個的農民暴動的過程中，新莽的統治是被這班所謂叛徒用暴力推翻了！但代替新莽統治的幷不是個强有力的政權，恰恰相反，而是羣雄割據分崩離析的局面：如劉縯劉秀的復興帝室，暴動的農民領袖各據一方；甚至還從斜刺裏殺出一枝農民隊伍。

⑷ 這隊伍便是王郎的暴動！

王郎的出身是邯鄲縣的一個破落戶的智識份子，他操着卜卦的生涯，時常往來於農村中間和那些

被壓迫的農民接近，甚至，他還倚靠他的職業技術——卜卦的地位，向農民羣衆們經常的作一些帶有神祕性的鼓動與宣傳。他感覺得自己是個破落戶的子弟，一時不能在羣衆中建立很大的威信，便披着貴族的外衣——冒充成帝的兒子——子輿——來吹噓自己。他的策略的中心，不是提出暴動的綱領於被壓迫的農民之前，而是一味的拉攏所謂趙國大豪(？)李育來做暴動的骨幹。雖然，他們也曾以農民暴動的方式奪取了邯鄲，並且在暴動以後建立過臨時的部份的政權，立王郎爲天子。這暴動所得到的回聲，如廣陽王子接在薊中的倒戈而趨走劉秀，未曾不是聲勢雄壯鬨動一時！可是沒有很好的戰術與策略，缺乏與各地農民鬥爭的聯系，所以，雖掩有二十餘縣，終敵不過那班役辟的人們瘋狂似的摧殘，在暴動過程中，被壓迫的農民的膏血不知流了多少，據官場的報告，大將以下被斬首的有三萬餘人！

以這樣廣大的農民革命，本來可以推翻舊的統治階級而建立一種新的革命的政權；可是這些參加革命的農民，在暴動過程中，他們不僅缺乏堅強的組織性，如在行動上是南轅北轍，并且，在政治觀念上亦是同床異夢！因此，有的是爲統治階級所壓平，還有一部份爲貴族們所收買，極積的參加「復辟」的工作而在革命的內部起分化作用，所剩下來祇有樊崇。本來樊崇在當時所處的環境誠然是孤軍獨戰，與光武的統治作過長期的鬪爭，并在軍事上獲得相當的進展；如掩有洛陽，河南，穎川諸郡，與新的統治階級光武交分庭禮形成了對峙的局面！但是長時期的遊擊戰爭，雖獲得軍事上的進展，然

終不能拯救參加暴動的羣衆那已經疲乏了的魂靈；如『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見同上）所以想攻取經濟比較發展的區域——長安稍事休息。這種保守的傾向，就是導引地主商業資產階級意識於暴動隊伍中間的媒介，使暴動隊伍的上層逐漸動搖；如『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弟陽乃說樊崇等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爲諸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乃於軍中求城陽景王章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遂共立爲天子。』（見御批通鑑輯覽二十一卷第四十八頁）據漢書所說當時的盆子年齡很小，祇有十五歲，不過是一個『披髮跣足』的小兒；他看見很多的人們向他稱臣下拜，嚇得他倉皇無措，幾至於啼哭！

但是，任憑怎樣的『師出有名』，宗室的偶像總不能變更階級的對比，樊崇把他當着『救世金丹』，實際上，他仍是不能充飢的畫餅罷了！

在遊擊戰爭的過程中，農村經濟已經是破碎不堪，使一般社會的物質生活都降低到水平線下；因爲過去那參加生產的農民，一半是拿着『鋤頭鐮刀』去對付他們的敵人，一半是在過着流亡的生活。因此，『赤眉』最後的失敗，也就是在大饑饉的年頭，參加暴動的羣衆，經常的忍飢挨餓度着那擋刀擋冒矢石的生活，如他們曾兩度的佔領長安，都因爲饜受粮食恐慌而退却；故這遭一歷史上有名的長

時間暴動，終不免在蛹底爲新興的統治階級所撲滅！

## (四)黃巾的暴動

光武撈取了『赤眉』暴動的果實而走上政治舞台，幷且結束了這一農民暴動而鞏固自己的政權。當然，這個政權一開始是要做一些敷衍農民的事情；如『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文獻通考)，企圖要那些破產的農民與『不毛之地』發生經濟上的聯系，以削減在大革命的時代——『赤眉』暴動的時代所遺留的恐怖。不過，這些欺騙的手段，是不能解決農民鬭爭的根本問題！而祇是一時的和緩能了。因此，到桓帝的時候，農民與地主商業資本之間的階級矛盾又逐漸緊張起來！如『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見文獻通考)，超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而加緊的剝削農民。迨至漢靈帝統治的中平二年，剝削農民的方式，更加苛刻；如『稅天下田，畝十錢，名修宮錢』(同見上)！並且，賣官鬻爵，擴大地主和商業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威權，把賣官鬻爵的担負轉嫁到農民的身上。這許多經濟的原因，的確是促成黃巾暴動的導火線。關於這一點，當時統治階級的臣僚——中常侍呂強，他爲忠於主人起見，所以很坦率的上疏說：『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尙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

輒有導引之財，調廣民困，貴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害！」（見後漢書）呂強雖有這樣的諍論，但空言終不能刺擊統治階級的心胸。

革命的風暴，展開了「黃巾」暴動的軍旗。黃巾暴動的領導者——張角，他的出身是鉅鹿縣的一個所謂道人；因此，他對於農民暴動的方法，是含有很濃厚的原始的神祕的宗教的成份，如自稱「太平道」和以符水治病等等。但這並不能削弱牠革命的意義，因當時經濟發展的遲緩，落後的意識會反映於一般社會中間而起牠的作用；加之符水治病是吸引農民和鼓動羣衆的方式之一種，就是在現社會的農村中間也往往有這種現象的發生，如「大刀會」「紅槍會」等農民組織便是最顯明的例子。張角他很懂得農民羣衆的心理：并鑑於過去農民戰爭的失敗，所以他不主張速成；從艱難困苦的環境當中努力於自己的事業，十餘年間，竟號召農民至數十萬人之多！如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的人民，大部份都與張角有組織關係。在暴動的前夜，他很注意於暴動中的組織工作，他感覺得這是過去一切農民暴動失敗的共同原因；他認為如果沒有很好的組織，就是暴動起來也不過是一鬨而來一鬨而散似的很容易的爲統治階級所消滅；所以他對於暴動軍隊的組織，係採取很有秩序的軍事部勒，置三十六方（註：方猶如現在的三十六路指揮）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都產生一個領導者——元帥。舍此以外，他更注意於宣傳工作，縱然是迷信的宣傳；但并不因此而減低牠的宣傳的意

義。當時的宣傳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幷且把這種口號用白土寫在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的門前，下面皆註「甲子」二字，彷彿和現在的在野政黨在牆壁上以及電燈桿上所寫的「打倒……」「擁護……」「推翻……」「建立……」一類標語的意思相近，不過時空與組織的內容不同罷了。

當時大方馬元義等，集合荊陽農民羣衆數萬人，積極的准備暴動，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爲總暴動的日期，內外俱起，企圖推翻統治階級而建立暴動的政權。可是張角的弟子——唐周，他非但不忠實於革命而爲暴動嚴守祕密，甚至更進一步的積極的反動，把這次暴動所有的計劃與祕密，很詳盡的報告於統治階級，以致變生倉卒，在暴動尚未開始，便爲統治階級所破獲，而馬元義等首先爲統治階級所捕殺，做了暴動的殉難者。張角見事機已洩，卽刻調動諸方，一時俱起，皆着黃巾以爲標幟；幷推張角爲天公將軍，張寶爲地公將軍，張梁爲人公將軍；暴動未及一月，其影響已遍於全國，各地農民紛紛的響應這次的暴動，往往殺掉壓迫他們的官吏，爲加入暴動的敬禮！

暴動影響的擴大，使統治階級最上層的皇帝也在牠面前發抖！爲要討論消滅這所謂下賤人民的造反，特召集了一次羣臣會議來決定應付的方針；本來因爲所謂黨禁的鬥爭，的確使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非常尖銳，但爲的是要對付農民的暴動，首先便要來緩和內部的鬥爭；這一點，在其羣臣會議

上面表現得特別明顯：『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中常侍呂強亦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赦宥，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見後漢書）這會議的總結，就是擴大階級內部的『德謨克拉西』，用全階級的力量來對付暴動的農民！

統治階級內部的『德謨克拉西』的擴大，引進了三位農民暴動的屠夫——孫堅，曹操，劉備。這三人同時都做了黃巾暴動的儈子手！

關於孫堅屠殺暴動農民的事實很多，如『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餘人，與儁幷力奮擊，所向無前。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入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見陳壽三國志吳志卷一第一頁）便是一個顯然的例。

其次，便要說到曹操的抬頭與發展；『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很顯然的，他的發跡是由於征討黃巾，幷且，這次農民革命更給他們以充分發展的機會；如『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若不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註：太祖卽曹操）領兗州牧，遂進互擊黃巾於張壽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三國志魏志第一卷第三頁）他如劉備亦復從黃巾暴動中發跡起來。如『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三國志蜀志卷二第一頁）

這三位投機家，他們掠取了黃巾暴動的果實，使這次暴動仍遭受悲慘的失敗；並且，自結束這農民革命以後，他們代替了舊的統治階級鼎足而三似的統治了廣大的農民。雖然，農民革命還要繼續的重演啊！

## 第三節　隋代的農民戰爭

### （一）南北朝經濟形態的追述

曹操，劉備，孫權這幾位歷史上的暴發戶，他們都是乘農民革命最激烈的時候才抬起頭來；這抬頭的動機很顯明是看到自己的階級瀕於危亡，不得不乘火打刼來掠取革命的果實，以便繼續的統治農

民。當然，他們在反革命勝利的第二天，因爲地理的及經濟的許多原因，又暴發了他們內部的矛盾；幷且，爲着獨吞革命果實起見，彼此之間又重新爆發了一種反革命的戰爭，形成了鼎足而三的割據的局面。因此，我們可以說：三國的時代是一種反革命混戰的時代；不過，一方面他們雖舉行內部的反革命的戰爭，而別一方而却時時刻刻的注意到從經濟上去發展自己的前途及改善農民的生活以和緩農民革命的情緒。如曹操在戰勝黃巾以後，馬上即舉行屯田的工作；募百姓屯田於許都，一年之間得穀百餘萬斛，幷招撫關中的流民，給他們以很多的牛犂，勸農民耕種積粟，甚至命令劉馥賈逵這班臣僚，積極的治理屯田水利。而代表劉備的諸葛亮也努力於勸農講武的工作，且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於斜谷口，以吐出蜀地大量的農產品於市場，而溝通農村經濟。他若孫權亦於黃龍元年命令四方郡守開墾荒田。迨自晉武統一以來，階級內部的敵人已經打倒，而那廣大的被壓迫的農民，亦復是暫時的俯首帖耳任統治階級的宰割！

這時侯也就是統治階級與高彩烈的時候！

爲的是企圖永久的屈伏農民，不得不變更土地佔有的形式，因此，晉武帝便頒佈「戶調」的法令，以確實土地關係：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

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斗，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這種土地關係的轉變，是含有很濃厚的公有性質。

東晉以後，南北朝對時；南朝宋，齊，梁，陳皆襲東晉之餘業，其一般經濟是有上昇的趨勢；如「宋孝文帝大明初，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餘，鄮，鄞三縣，墾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田疇，方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文獻通考）很明顯的，這段事實，不僅暴露了，「戶調」的弱點，即是說：「戶調」的法令，並沒有很完善的解決了農民的問題，反之，要經濟的發展，也祇有使貧困的農民把勞動力消費於土地方面。及至梁武帝他更加鼓勵農民的生產，曾下詔說：「食乃民天，農爲治本，垂之千載，貽諸百王。莫不敬受民時，躬耕帝藉，是以稼穡爲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册；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多難薦臻，干戈不戢，我則未暇，廣田之令無聞於郡國，載師之職有陋於官方；今元惡殄殲，海內方一，其大庇黔首，庶拯横流，一廛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鳥鹵無遺，國富刑輕，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所在蠲免。」（梁書本記卷五第九頁）又詔：「……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

書，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即依格優復，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卹。」（同上書）誰都知道，統治階級在牠的根本立場上，是人民的朋友，而這些現象，不過，是企圖發展自己的前途。當然，商業資本在梁代也有很大的作用，如國家經營河東鹽池而引起御史甄琛激烈的反對，他說：「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這句話是商業資本發展的一個很好的證例。

至於北朝元，魏，周，齊，承十七國之大亂，所謂中原文明，就是魏晉遺風。并且，當時的土地關係，因為地主們的侵奪，又復發生變化；即是說土地時常集中到大地主的手裏。因此，均田制度乃應運而生，而李安世便是均田制度的首倡者。他上孝文帝疏說：「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制，致治之本，井稅之興，由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士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改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晉魏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遠，鄉老所惑，郡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據，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役，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

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耕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文獻通考）

孝文帝便根據他的意見於是乎乃下均田之詔：「富強者兼併山澤，貧弱者絕望於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身，或因飢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爲斷，勸課農商，興富民之本。」（見同上）此種土地制度變更的內容，即在調劑貧富而側重土地分配問題；據太和九年所制定的均田法是：

諸男夫十五以上，授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授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二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分田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八還。分諸桑田，皆爲代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把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疾者，

各受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制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倍，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從倍之田，放爲此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所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如坐律。

（見文獻通考）

現在我們可以把均田法的要點，綜結如下：

（一）男子十五歲以上能賦貢調，則人受露田四十畝（卽普通耕地），婦人則受男子之半——二十畝。

（二）老而免課及身沒還田；按魏書孝文帝紀詔文：還田以生死爲斷，然食貨志所記，實際雖身未

死但既老免課則所受田還公，若夫寡婦守老者，雖免課而仍受婦田者，例外也。惟搁於此疑問宋劉恕已論及之；通鑑問疑載道原答司馬君實之語曰：「詔書言其略，故云還受以生死爲斷，本老言其詳，故有還不還之別也。」此說頗近理。

(三)奴隸亦與良民同給露田，有牛者一頭，別授三十畝，但以四牛爲限。

(四)露田之外，別有桑田，是爲代業，終身不還公；惟桑田已有定額以上者，則儘置之，其不足定額者，如法給授，又定額以上而有餘者，得賣其所餘，而不足定額者，亦得買其所不足 但僅符定額者不得售賣。

(五)田之還受於年之正月行之，願於授田之際，有先貧者後富者之規定。

(六)構新居者，爲充居室，計每三口給地一畝，奴婢則五口給地一步。

(七)遠流死謫無子孫者及絕戶者，其墟宅桑榆則盡爲公田供授受。

要之，後魏的土地制度，大概如此。

至於北齊及後周的土地制度，在原則上，大部份是與後魏相同，但給田之額稍有異別耳。茲揭北齊河清三年的田制如下：

(一)男子達十八歲則受田，同時並使之輸租調，年至六十六則還田，同時亦免租調。

(二)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受半額——四十畝。

(三)奴隸亦與良民同給田，但因所有者之身分其數有限制；親王限以三百人，其以下之階級有等差，八家及庶人限以六十人。

(四)牛一頭給田六十畝，但以四頭爲限。

(五)每丁於露田八十畝外，別給桑田二十畝爲永業田，不在還受之列；但土地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之法(其時官及百姓之墾田亦有爲永業田之規定)。

統治階級這種均田制的目的，是在調和貧與富之間的對抗形勢，實際上，貧富的對抗仍然存在，而貧苦的農民並沒有受着均田制的利益；所以這均田制度對於農民的關係，不過在歷史上留一個強烈的影響和憑吊的痕跡罷了。如北齊文宣帝天保年間宋士良上書請以『富家牛田先給貧民』，因爲當時的豪富多有牛田，佔地甚廣，實際上貧苦的農民往往得不着土地。故通典曾說：『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者連畛亘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於此可見地主豪紳壓迫農民的一斑。又說：『河渚山澤有司耕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所謂均田制度，此時僅剩一個空殼！並且，這時候土地還可以自由買賣；如『露田雖有不聽買賣，亦有重責貧戶，因王課不濟，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

課，比年額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暫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總其賣沽田園故也。』（見通典）

總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在歷史上是有轉變的意義，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不過，這轉變的趨勢並不是土地革命的前途，而是改良的嘗試。

同時，南北朝的經濟成份，亦有很大的不同；南朝的剝削形式的中心，不一定限於地租；所謂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象犀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需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隋書食貨志）這誠然是側重商資本業的描寫。人們說宋齊梁陳一般社會的生活是：『人競商販，不為田業』，並非是無的放矢之談。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南朝的經濟成份是商業資本佔着優越的地位；同時，北朝也並不是純封建的社會，不過就經濟的衡比來估量，牠所包含的商業資本的成份是比較的微弱！

（二）隋代的商業資本

隋文帝統一南北朝以後，在歷史上卽開始了一個新的建設時期，這時期的工作，一方面是治南北朝經濟於一爐，並爲商業資本開闢了一條繼續向前發展的道路，別一方面商業資本之繼續的發展，客觀上又造了成了一次帶有全國性的農民暴動。

現在，我們先來檢討關聯於商業資本發展的一些基本問題：第一，隋代統一南北朝之後，便建設大規模的交通網，以溝通南北的經濟；因爲自晉魏以至六朝，爲中國分裂最久的時代，就當時的形勢而論，其道路梗塞運輸維艱的程度，我們是可以推測的。且自永嘉南渡以後，所謂衣冠文物，麕集於揚子江流域一帶，實際上，這裏也就是當時的經濟中心。隋朝建都關洛，爲的是要發展和鞏固他的政治影響，不得不變更當時全國的交通；故於開皇四年下詔說：「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不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泝沂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勤殷，然不有暫勞，安得永

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見隋書食貨志第六頁）這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建設交通。

迨至煬帝大業元年，又復進行第二次的大規模的開河；如『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隋書帝紀第三卷第三頁）大業四年又復繼續作第三次的開河，如『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河」，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見同上書第五頁）此外更開『江南河』『廣刊溝』積極的建設南北的交通，加速商業資本流通的過程。這種交通網的建設，是商業資本發展有力的帮助，誰個否認了這開河的意義，他就不會了解隋代政權階級的性。

第二，關於隋代商業資本發展直接的描寫，隋書食貨志有以下的紀載：『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見隋書第二十四卷第七頁）但是，這僅僅限於都市的繁榮，至於一般商業資本之發展，我們可以從隋代所舉行的一種類似商業展覽會中充分的表現出來：『庚午（大業）六年正月，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諸蕃入豐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幃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邀入飽酬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威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如？」市人慚不能答！』（見

（王鋼綱合編第十八卷三十六頁）這不僅是歷史上一段滑稽的插話，誠然是忠實的表示當時的經濟形態。在這種所謂『酒食例不取直』的展覽會未開以前，煬隋帝已經着手尋找國外的市場；他『以西域多諸寶物』特任黃門侍郎——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唯恐一時不能很快的建立中國和其他亞洲小國相互間的商業上的關係，特『啖之以利，勸令入朝！』幷且，深恐他的臣僚得罪了這班外國的顧客，於是通令臣僚對於這批外國顧客要妥爲保護；關於這種情形，歷史說『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迎送，靡費以萬萬計！』（隋書第二十四卷第八頁）很顯然的，隋煬帝他是個富於理想的人，爲甚麼要犧牲大批的金錢去招待那些小國的商人呢？問題當然沒有這樣的簡單吧！他固然是要吸收這些國家奢侈品，而另一方面之借此吐出國內的大量生產於國際市場。也是一個主要關鍵。幷且，他爲防範異族侵入起見，曾『與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楡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不僅在國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從建築史上看也是很偉大的勞績。

很多的人們論說隋煬帝這些政策的不當，特別是開闢運河彷彿是窮極奢侈的事情，須知道隋煬帝的一切政策，是走的秦始皇的道路，我們看這許多政策裏面，包含着很多進步建設的成份，例如開闢運河，並不是爲的視察南朝金粉，恰恰相反，而是溝通南北的經濟。當然，運河的開闢，在某種條件之下與農村經濟是有相當的帮助，可是農民們却因此更加遭受高利貸商業資本的統治。但是從相反的

方面，交通是商人的命脈，當時的商業資產階級，在生產技術上是百尺竿頭再也不能前進一步，他們這時候祇有靠經濟的流通，來維持自己的存在，所以揚州一班商人對「龍舟」的歡迎，實際就是擁護自己階級的利益啊！

## (三)農民戰爭

隋代的商業資本雖有很大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並沒有推動統治階級去解決土地問題，恰恰相反，牠祇有使農民捲入商品經濟的漩渦而更加破產；并且，因爲戰爭的關係，徵調大批農民去冒矢石擋刀槍，離開了農村生產，故其影響，不僅使農村生產量降低，甚之，能使整個農村經濟的毀滅！這種經濟的矛盾，也就是農民暴動的酵母。同時，那些橫征暴斂的削剝以及嚴刑峻法的壓迫，都是助長農民鬥爭的情緒，使他們離開麻痺的狀態而活動起來！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上的罪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作一最後的戰爭。

舊世界打他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在隋煬帝統治之下的農民，彷彿是聽着現在的這種聲歌似的，他們爲着本身的利益，爲求得自己的解放，所以，統治階的一切威權——屠殺和恐怖都從他們腦海中排除得乾乾淨淨。農民暴動烈焰，終於燎燒了隋煬的天下。

關於當時各地農民暴動的情形，據隋書所載如下：

（一）杜彥冰王潤等陷平原郡。

（二）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刼掠。

（三）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刼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

（四）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爲羣盜。

（五）濟陰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萬。

（六）北海人郭方預聚徒爲盜，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

（七）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寇掠城邑。

（八）餘杭人朱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

(九)吳人謝變晉陵人管崇擁衆十餘萬，自稱將軍，寇江左。

(十)陳瑱等衆三萬，攻陷信安郡。

(十一)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舉兵爲盜，衆數萬。

(十二)梁慧尙率衆四萬陷蒼梧郡。

(十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

(十四)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

(十五)齊人孟讓王薄等率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

(十六)清河賊張金稱衆數萬。

(十七)渤海賊帥格謙衆十萬，自號燕王。

(十六)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十萬。

(十九)扶風人唐弼舉兵反，衆十萬，推李弘爲天子，自稱唐王。

(二十)彭城賊張大彪衆數萬，保懸薄山爲盜。

(二十一)宋世謨陷琅琊郡。

(二十二)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大世六月。

(二十三)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二萬，陷建安郡。

(二十四)司馬長安破長平郡。

(二十五)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第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

(二十六)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

(二十七)賊帥楊仲緒率衆萬餘攻北平。

(二十八)上谷人王須拔自稱漫天王，衆十餘萬，國號燕。

(二十九)賊帥魏子兒自稱歷山飛，衆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

(三十)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爲盜，衆至二萬。

(三十一)彭城人魏騏驎聚衆萬餘爲盜；寇魯郡。

(三十二)賊帥劉明月聚衆十餘萬，寇陳汝間。

(三十三)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

(三十四)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絳郡賊敬盤陀紫保昌等，經年不尅。

(三十五)譙郡人朱粲擁衆數十萬，寇荆襄，潛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爲所陷。

(三十六)鴈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丘，衆至數萬，轉攻旁縣。

（三十七）東海賊盧公暹率衆萬餘，保於蒼山。

（三十八）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爲盜。

（三十九）高源通守洗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

（四十）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

（四十一）東海人杜伏威起兵，衆萬餘。

（四十二）楊州沈覓敵等作亂，衆至數萬。

（四十三）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

（四十四）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

（四十五）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盧陵郡。

（四十六）渤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洛間之長壽，自稱長樂王。

（四十七）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

（四十八）弘化人劉企成聚衆萬餘人爲盜。

（四十九）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

（五十）王子英破上谷郡。

（五十一）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

（五十二）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振，羣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

（五十三）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

（五十四）賊帥李通德衆十萬寇廬江。

（五十五）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

（五十六）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梁王建元安樂八月。

（五十七）太原梁世洛聚衆萬餘人，寇掠城邑。（隋書卷四帝紀）

這種或大或小的農民暴動，統計有五十七處，普遍於全國，參加暴動的農民不下數千百萬人！統治階級在當時對於這空前的農民大暴動，誠然是手忙脚亂而在牠前面發抖！關於這暴動的原因，他們也感覺不是偶然的一旦的發爆，而是由於沒有解決土地問題，所以牠下詔說：「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經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居人放逸，田疇無伍，郛郭不修，遂使遊惰實繁，寇數未息！……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強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姦宄，萑符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爲事條，務令得所。」（見同上書第五頁）

隋代的統治，雖然在農民大暴動中覆了，可是勝利的仍然不是屬於農民，并且他們仍和以前一

樣，依舊是受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的統治。

農民大革命的果實究竟被什麼人掠取了呢？

## (四)地主商業資產階級掠取了農民革命的果實

在隋代末年農民暴動的範圍誠然是普遍了全國，不過這些領導暴動的領袖，往往有些是非貧農的出身，如果是有的話，那麼，也祇是竇建德。關於這位代表貧農的革命領袖的出身及其在整個農民革命過程中的作用，歷史曾有這樣的敍述：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爲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材力絕人，少重然許，許俠節；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建德乃自縻，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由是益知名，爲里長。犯法亡，會赦歸，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贈予皆讓不受。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飢，羣盜起，乃謀曰：「往文皇帝時，天下盛強，發百萬衆伐遼東，猶爲所敗！今水潦爲災，民力困敝，主上不是恤，而親駕臨遼；且往歲西征，

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大丈夫不死，當建功於世，渠爲亡命虜乎？我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亂阻奧，可以逃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敓，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鷄爲盜，安祖號摸羊公。時鄃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蓨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鄃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閭，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卽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衆亦盛，至萬人，猶保高鷄泊。然傾身接物，其執苦與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仍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亦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略幽州，戰死，其下魏刀兒號歷山飛，壁深澤，衆十萬；建德以計取之，幷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見唐書第八十五卷第五頁竇建德傳）

誠然，農民暴動在隋末有五十七處之多，我們之所以舉出竇建德來代表農民暴動，一方面固然因他曾建立過規模較大的革命政權，而另一方面他那刻苦耐勞的精神以及代表貧農無產者利益而奮鬬的事實亦比較其他農民暴動的領袖顯明而積極。在統治階級因農民暴動而瀕於崩潰的時候，企圖掠取成

熱的農民革命的果實的人們，的確是比比皆是。

楊玄感就是第一個企圖掠取農民革命果實的人物。

楊玄感他是貴族的出身，在農民暴動的過程中，他看到自己的階級已瀕於危險，如果不以「宮庭政變」的方式來轉變羣衆的視線，那麼，這個壓榨人民的統治機關很快的會被農民們用鋤頭鐮刀把牠捶碎。因此，他在農民暴動的初期，即企圖作冒險的嘗試；如「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綱紀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愼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見隋書第七十卷第一頁，楊玄感傳）及至農民暴動幹得轟轟烈烈的時候，他看到有機可乘，因此，馬上便舊事重題，在「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的當兒，揭起了反對隋煬帝的軍旗；他於倒戈的過程中間，那班壓迫的農民，眞的認爲他會解決人民的痛苦，所以紛紛的來參加這一種「宮庭政變」式的暴動；如「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瀍洛父老，競致牛酒。」（見同上）聰明的楊玄感，他看到羣衆並沒有識破他自己虛僞的面目，於是乎便很莊重的裝着解除民衆痛苦的模樣！「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見同上）。實際上這很明顯的是模糊

羣衆階級意識的把戲！

並且，我們從他給樊子蓋的書信中間，就可以充分的看出所謂「爲天下解倒懸之急」的祕密是欺騙人民的鬼話，而其所要的仍然是那些「取而代之」的老把戲；他寫信給樊子蓋說：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治，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歷，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躭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塡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仇，民庶相趍，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文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泫，言無所具。」（見同上書第一頁至第二頁）這封信對煬帝統治崩潰的分析雖然有比較確當的地方，可是，他的結論卻離開了羣衆而針對着自己。

因此，這一次的「宮庭政變」式的暴動，固然，一方面因楊玄感之離開了羣衆，而在戰略上犯了妥協猶豫的錯誤亦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並沒有完成，故其結果使被壓農民的鮮血，却又白流了不少，據史書所說，大將以下被斬首的有三萬餘人！

當然，這種「宮庭政變」式的暴動的失敗，並不是旣從此就取消了地主商業資產階級掠取農民革命果實的企圖，恰恰相反，牠更是開闢了未來的地主商業資產階級掠取農民革命果實的道路；並且，這一次的事變留給他們許多的經驗與教訓，而使他們從容不迫的展開階級鬬爭的陣容，以完成在歷史轉變關頭他們所負的階級的任務。

李淵和李世民便是這個任務的澈底的完成者。

他們對於農民的暴動，感覺得牠有很深刻的社會的原因，是當時社會上一種偉大的力量；這個力量如果任其繼續的發展下去，那麼，不僅會使隋朝的統治顚覆，甚至，他們這班官僚地主的統治亦復會被農民們推翻得乾乾淨淨；因此，所以他們在農民革命浪潮高漲的時期，爲未來的命運所威嚇，逼得他們採取兩面進攻的策略來繼續維持地主商業資產階級對農民的統治。如：

「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見聽；高祖留守太原，領晉陽宮監，而所善客裴寂爲副

歐。世民陰與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酒酣從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爲宮人奉公，事發當誅爲此耳。」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陽不許，欲執世民送官，已而許之曰：「吾愛汝豈忍告汝耶?!」……」（見唐書高祖本紀第一頁）

本來李淵在最初他是不願意走這條冒險的途經，因爲他年事已高，腦海中充滿保守的意識，輕舉妄動是老年人最討厭的一件事情；但是，李世民却比他有更深刻的見解，他認爲祗有抓住歷史的事變，才可以發展自己的前途。所以他很堅決的在他父親的面前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說「……「今主上無道，百姓窮困，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盜寇，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舉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女矣！」……」（見袁王綱鑑合編第十八卷等三十九頁）

這種鐵一般的掠取農民革命果實的事實，是不容人們否認的；然這一次，農民革命的果實爲什麼居然竟會被李世民所掠取而創造了唐代的統治呢？這的確需要我們作詳細的解釋；就階級對比的關係而論，主要的原因是暴動的隊伍內部沒有很好的團結；當時農民暴動的範圍雖然是普遍了全國，可是

牠的弱點不僅由於彼此相聯系，甚至還是互相吞併。在互相吞併的過程中間，很多農民領袖感覺得沒有前途，因此不得不背叛羣衆的利益而投降到李世民的懷中，就是那些倔強的所謂「瓦崗諸盜」，看見環境與自己不利，也祇好拋棄鬥爭的生活爲新的統治階級的收買與屈伏！

其次，李淵的勾結外族——突厥，也是他佔據寶座和鎭壓農民暴動一個很重要的客觀原因；他感覺得如果沒有外族給他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帮助，那麽，對暴動的農民之懲罰仍成問題。所以，他允許突厥經濟上政治上種種特殊的利益，以應付當前的困難；可是突厥要他稱帝，認爲祇有李淵稱帝才可以保障這些特殊的利益。關於這種祕密勾結的情形，史書紀載得異常明顯；如「李淵遣使如突厥，與之相結，突厥欲淵爲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裴寂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旗改易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所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見同上書第十八卷第四十六頁）又突厥於「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見同上書第十八卷第四十三頁）

這兩種主觀客觀的原因，已經是決定了當時農民暴動的命運，不過，李世民更善於利用環境，所以能夠很順利的用反革命的方式結束了這一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暴動。

## 第四節　唐代農民戰爭

### (一)唐代一般的經濟形態

唐代自代替隋朝統治農民以後，其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商業資本的發展，竟超過隋代的紀錄；這種商業資本發展的趨勢，是異常明顯，一方面是有很完整的國內市場，而另一方又有大規模的國際貿易。現在我們首先來檢討關於當時幾個主要的產業部門的發展，從這些發展中間，可以充分的看出了這時期國民經濟的活躍。唐代主要的生產可以分作如下三種：

(一)鹽　鹽在日常生活中間所起的作用，比較一般生產品要佔重要的地位，在隋朝這個產業還沒有爲統治階級所重視，可是到了唐代開元元年的時候，統治階級已經注意到牠在一般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檢校鹽課，依式收稅。』但是這還不過是開始，到了肅宗乾元年間，又重新改變鹽法，於山海井竈的區域，添置『鹽院』，吸收大批脫離生產的農民，要他們從事製鹽的工作，這很顯然的是國家壟斷了的生產。他們爲的是提高鹽的生產量起見，把那些從事製鹽工作的游民，編入於所謂『亭戶』（釋名云：『亭，停也，人所停集。』而風俗通則說：『十里一亭，亭留也，古者鄉有鄉亭，市有市

亭、鹽民所集之處，謂之鹽亭。」今淮南盧東謂之亭場，停戶者即業鹽之戶，彷彿現在的鹽丁。——著者註）之列，而免掉這些「亭戶」的徭役。並且還提高鹽的價格，以前每斗鹽價僅僅十錢，此時竟漲至十倍，每一斗鹽可得一百一十錢的代價。及至代宗朝的時代，又產生一位長於理財的政治家——劉晏；他在鹽務行政方面，更有一些新的改革，他認爲「官多則民擾」，所以廢除了「鹽院」制度，僅於產鹽區域置一處理鹽務的官吏，收鹽戶所製之鹽，再轉售於商人；甚至，爲獎勵這些商人起見，取消了各地的稅收，任憑鹽商們自由的去銷售商品；當劉晏開始治理鹽稅的時候，每年國家經常的收入不過四十萬緡，但到大歷末年每年鹽稅的收入竟超過十五倍以上，而達六百餘萬緡，就整個公共財政收入而論，鹽稅之收入居然占其半數。迨至憲宗時代，以李巽爲權緡使，又變更了鹽務行政的系統，將鹽利的收入劃歸度支（即如現在之財政部——著者），最初一年的收入即有六百六十五萬緡，達到劉晏末年的成績，以後收入的衡比，竟超出劉晏時代三倍以上。

很明顯的，鹽稅的收入爲唐代統治階級公共收入唯一的大宗，於此，可見鹽業在唐代一般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二）酒　酒雖爲帶有麻醉性的飲料，但是在一般經濟生活中，牠也起相當的作用；唐代關於酒的生產，曾有兩個系統：第一個系統，釀酒事業由政府所壟斷；如德宗建定之年，制定禁止私人酤酒的

條件，由政府置店經營酤酒的事業。第二個系統，就是由私人釀造，政府徵取相當的額稅，並且為鼓勵這些私人釀酒事業起見，凡是釀酒商人，一概免掉他們複雜的差役。不過在武宗會昌年間，關於酒的生產這兩位系統曾經被同時採用，這採用的原因是根據各地情形不同而決定。據太和中年的統計，酒稅的收入，每年有一百五十六萬餘緡！因此酒在唐代經濟中的重要，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一件事實。

(三) 茶　在唐朝以前，茶在經濟生活中還沒有起普遍的作用，所以唐以前並沒有什麼茶稅的名稱；到了德宗建中元年，因為採取了趙贊的建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其一，這時候茶在一般生產品當中才占了一個位置。以後，茶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始逐漸推廣，迨至貞元九年，茶的生產更有大量的發展，幾幾乎成為一般社會所必需的商品，祇就當時統治階級徵收茶稅(每年經常收入有四十萬緡——著者)之鉅大，就也可以推測到茶在當時經濟地位的重要。

穆宗統治的時代，因為宮中要建築百尺的高樓，需要大宗的建築費，擬增加茶稅百分之五十，為建築這百尺高樓的基金；但是，這一個動議卻引起茶商們的代表——左拾遺——李珏劇烈的抗議；他上疏以為增加茶稅有三不可，他說：『榷茶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一不可；茗飲人之所資，重賦稅則監必增，貧弱益困，二不可；山澤之饒，其出不貲，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踴則市者希，三不可。』實質上，這三不可的原因，完全是代表茶商們的論調。大中初年，茶在市場上的銷路

更加盛旺，因此，在產茶區域的農民們，往往把他們的生產品——茶，私自直接的賣給那些消費者，而避免茶商們中間的剝削；此種舉動引起了茶商們很大的恐慌，於是便經過統治階級的手派遣了很多的官吏於出茶的山口，以保護茶商的利益。當然，這些官吏為忠於他的間接的主人起見，便特別的關心，凡是正式茶商的貨物，一概給以顯明的證據——帖子；執有此種證據的貨物——茶，聽其銷售於各地，如果那些產茶的農民缺乏這種證據，而企圖直接將茶售於消費者，一經統治階級所發覺，那些，便認為私販，馬上就加以嚴重的處罰——如私鹽條例一般的處罰。

以上這三種主要的生產，為唐代統治階級經濟的中心，其國內市場一般發展的形態，由此可以窺測其內容的一斑。

至於唐代的國際貿易，那更是超出以前一切的紀錄；因為有很多國際貿易的海口來證明唐代國際貿易規模的宏大：

第一個國際貿易港便是廣州。

本來關於廣州在唐代為國際貿易港這一事實，截至現在，尚未為一般所重視；在外國學者中間最初發見和解釋確當的當推日本石橋博士（見明治三十四年九月史學雜誌五十頁——五十一頁），因為廣州（亦稱廣府）在當時波斯及其他的國家都稱之為「坎富」（坎富的名稱，最初見於索來萌氏的紀

錄，易逢柯達貝氏的地理書中，也有坎富的名稱；不過歷來學者對於坎富的位置，有很多不同的解釋；如勒諾兌氏最初譯述下紀索來萌氏關於印度及中國之紀錄，即說坎富爲廣州（番禺縣），其後得金氏亦採用此說；至克拉普洛特氏時，始將坎富認爲與馬可波羅氏所稱之干浦爲同一地方。即假認干浦爲杭州（干浦與杭州相近，故以杭州擬之），自克拉普洛特氏以後，有賴諾德氏，優爾氏，利希陀芬氏，日本那珂博士以及最近之科第耳氏都主張坎富爲杭州。但是石橋博士，坪井博士（史學研究法第二百一十四頁——二一五頁），伯希和氏以及籐田博士等則主張坎富爲廣州；因根據新舊唐書及當時之紀錄，則有唐一代，廣州的確爲中國南部之唯一國際市場。並且，澉浦（即杭州），在唐時並不甚重要，此說較爲可靠。——著者註），實際上，「坎富」即係廣府之譯音。當時廣州國際貿易的情形，是非常的繁盛，可是在某一時期因地方官吏的貪橫，使這個國際市場趨於相當的衰弱；誠然，牠過去繁盛的痕跡，現在還留在我們的面前：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泊，歲至終四五。……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見新唐書第一百三十一卷李勉傳）一年中間，使已趨衰弱的廣州市場之入港海舶，增加到千倍以上，其繁盛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第二個國際貿易港是現在安南的交州。

易逢柯逵貝氏的地理書中，曾經列舉過西歷九世紀的初期，中國於阿剌伯商人通商有四個很大的貿易港口，而交州是其中的一個；不過他因爲譯音的不同，而稱交州爲『勞京』，後來斯普棱革爾關於『勞京』的位置，更加有個明確的擬定，他說現在法領的河內，即是過去唐代的交州，或其附近的地方。這種關於『勞京』位置妥當的診斷，在研究歷史學的人們中間，並沒有表示什麼原則上不同的意見，但在『勞京』名稱的解釋方面，日本石橋博士更有一些新的補充：他說『勞京』或即是『龍編』諸音之輾轉的訛譯（見明治三十四年九月史學雜誌三七——三八頁），據史書所載龍編縣在交州東南四十五里（見元和郡縣志第三十八卷），約當十二英里；牠臨松科伊大河而傍近大海，誠然是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的港口。我們看唐沈佺期詩題中，有『度安（指安南）海，入龍編。』的描寫（見石印本全唐詩卷四），而陸龜蒙的詩句中，復說及『路入龍編海舶遙』（見同上卷廿三）的事情；並且，唐將高駢在回雲南牒（全唐文卷八百〇二）敍述平定安南之事蹟當中更說：『比者親征海裔，克復龍編。』同時，在陸宣公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中：有『有嶺南節使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陸宣公奏議卷十八）查此事在唐德宗貞元八年（西歷七九二年），由此可見交州國外貿易的發展。唐李肇也說：『南海舶外國船也，每至安南廣州。』（見唐國史補逮津祕書本卷下）

這雖然是一些另星斷片的材料，關於交州國際貿易港貿易的情形缺乏具體的說明，但是龍編在當

時爲海舶輻輳和萬商雲集的地方，這是我們可以把握得到的，並且是毫無疑義的事實！

至於福建的泉州，在唐代亦是第三個國際貿易港。

歐洲的歷史學者——夏德及洛克喜爾二氏，他們認爲在西歷九世紀間，或者是更以前的時代，阿剌伯商人已來泉州通商。但是，這兩位歷史學家並沒有舉出可資我們直接參考的證據，因此，祇好把他倆的言論當作研究唐史的參考意見。

明朝人何喬遠在他的閩書卷七當中，曾經說回教傳來中國的歷史：『摩罕穆德聖人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西歷六一八——六二六年）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傳教泉州，卒葬此山（即在泉州東南郊外之靈山）。』這雖屬於敍述回教傳教的歷史，不過，可以從這裏間接的證明泉州在當時已有很多伊斯蘭教徒與中國通商的事實。唐會要說：『唐末天佑元年（西歷九〇四年）三佛齊國使者——蒲河粟曾來福建』（見唐會要卷百），而文苑英華亦載有『乾甯三年（西歷八九六年）授王潮威武軍節度使（福州節度使）』制，並說：『閩越之間，島夷斯雜。』（見文苑英華第四百五十七卷）在五代史中又復述及閩王王審知（王潮之弟）施政文中有『招來海上蠻夷商賈』之句，足見唐自中世以來，福建——尤其是泉州已成爲國際貿易很重要的港口。明朝陳懋仁也說，『唐設泉州……參軍事四人，掌出使導贊。』（見泉南雜誌（學海類編本上卷））很顯然的，這時

候的泉州已經爲普遍出入海外的門戶了。

在當時成爲第四個國際貿易的市場便是揚州。關於揚州成爲國際市場之最初的證據，實見於新唐書幾個私人列傳中間；如：『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渡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基；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見新唐書第一百四十一卷一——二頁鄧景山傳)又：『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爲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降於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將其兵，詔拜鴻臚卿，襲敬釭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貲產，發屋剔窌，殺商胡波斯數千人……』(見同上書第一百四十四卷第二頁田神功傳)

按此事係在肅宗上元元年(西歷七百六十年)，則我們可以充分的了解在當時以經商爲目的伊斯蘭教徒，已經於很早以前即集於揚州經商了。

並且，在文宗太和八年(西歷八三四年)又曾經頒佈過關聯於揚州成爲國際貿易市場的上諭：

「南海番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達於殊俗。況朕方寶勤儉，豈愛遐琛！深慮遠人未安，率稅猶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蕃客當然指大食及波斯等處之胡商——著者），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脚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爲交易，不得加重率稅。」（見全唐文卷七十五）

這一個上諭是非常明顯的不僅證實了揚州在唐代爲很大的國際貿易的市場，並且，我們還可以看得出當時的統治階級對於國際貿易的態度；牠爲的使國內生產品能夠有大量的輸出，以及在國際貿易過程中間想獲重要的地位，所以儘量的減輕商品入口的稅率，以保證這些市場不致趨於衰弱，那些「接以仁恩」，「思有矜恤，以示綏懷」的話，實際的作用不過是自己吹噓自己罷了！

這些外國的商人，他們在揚州經商，並不是流動的性質——海上貿易，甚至還有設有固定的規模宏大的商店；如「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見明謝肇淛著五雜俎卷十二）

除掉這些商業資本有長足的發展而外，在唐代關於重工業——五金工業亦有相當的進展；如關於銀，銅，鐵，錫的鑛坑，已經開採的有一百六十八所，而伊陽五重山的銀錫鑛坑，在當時鑛坑中間，規模亦較其他鑛坑爲廣大，因此，引起了統治者的垂涎；那戶部侍郞——韓洄，曾向皇帝建議，說：「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以後，關於鑛坑開採的所有權，都屬於龐大的國家機關。據官場的報

告，關於鑛坑每年生產的統計：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六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一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見胡鈞著中國財政史第一百六十一頁）；很顯然的，這些鑛坑的生產，未必僅如此數，因爲在官場統計中間，並未有把那班官僚們所中飽的數目列入啊！

同時，在唐代因爲海上貿易的發展，還有機器發明的事實；如『唐王臯爲洪州觀察使，多思巧，嘗爲戰艦，挾以二輪令蹈之，翔風(？)破浪，其疾如掛帆席。』（見册府元龜卷九百〇八）又『營運心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踏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見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李臯傳）而新唐書卷八十又復載同樣的事實：『教爲戰艦，挾二船踏之，鼓水疾進，駛於陣馬。』查王臯之名，未見於新舊唐書，而唐太宗有子，曹王——明之玄孫，有名李臯者，太宗之五世孫也（見新唐書卷七十六之宗室世系表）。他在德宗時代，曾爲江西節度使，而江西節度使，本爲洪州觀察使，在建中四年（七八三年）所改稱（見新唐書卷六十八方鎮表）；故册府龜元稱他爲王臯，想係他襲曹王之爵而誤傳，但這個發明機器的事實，當然是不能因人名誤傳而成問題的。我們知道這種機器並不是如現在一般輪船所具備的蒸汽器一樣，而是一種很簡單的推進機；然這推進機的發明，並不是某一個天才在主觀所能做到的事情，而是生產力發展到某一特定階段時的體現，所以在海上貿易發展的時代，便有一種與生產力適應的東西——推進機的發明。

，由此，我們可以從唐代一般經濟生活當中找着幾個重要的事實：第一，商業資本在唐代是普遍的發展，並且牠——商業資本在一般的經濟成份中間是佔着優越的地位；第二，國際貿易發展達到很廣泛的程度，並因經濟上有高度的發展，所以還直接間接的統治很多經濟落後的民族；第三，工業已經脫離了原始的狀態而萌芽向上昇漲，致有關聯於適應國際市場之簡單的推進機的發明。現在我們可以把唐代的國際交通的國家彙列如下，以供研究唐代國際關係的參考：

| 國名 | 現在的地方 |
|---|---|
| 日本 | 日本 |
| 高麗 | 朝鮮半島北部吉林東南部奉天東部 |
| 新羅 | 朝鮮半島東南部 |
| 百濟 | 朝鮮半島西南部 |
| 靺鞨 | 黑龍江及吉林東境 |
| 渤海 | 吉林奉天二省及東海濱省南境 |
| 奚 | 熱河南部 |
| 契丹 | 熱河中部奉天西南部 |

| | |
|---|---|
| 霫 | 熱河北部 |
| 室韋 | 黑龍江西南部外蒙古北部 |
| 蒙兀 | 外蒙古東北部 |
| 東突厥 | 內外蒙古 |
| 西突厥 | 阿爾泰山以西至俄屬中亞細亞 |
| 回紇 | 外蒙古 |
| 鐵勒 | 外蒙古 |
| 流鬼 | 西伯利亞勘察加半島 |
| 黠戛斯 | 西伯利亞中部 |
| 骨利幹 | 西伯利亞偏北部 |
| 高昌 | 新疆土魯番縣 |
| 龜茲 | 新疆庫車縣 |
| 黨項 | 甘肅西南邊外 |
| 吐谷渾 | 青海 |

| 焉耆 | 新疆焉耆縣 |
| --- | --- |
| 疏勒 | 新疆疏勒縣 |
| 于闐 | 新疆于闐縣 |
| 印度 | 印度 |
| 罽賓 | 印度克什米爾 |
| 吐蕃 | 西藏 |
| 康國 | 俄屬中亞細亞中部 |
| 波斯 | 波斯 |
| 大食 | 阿拉伯半島 |
| 拂菻 | 東羅馬 |
| 甘棠 | 裏海之南 |
| 朱俱波 | 葱嶺之北 |
| 尼婆羅 | 尼泊爾國 |
| 石國 | 俄屬中亞細亞北部 |

| | |
|---|---|
| 南詔 | 雲南 |
| 林邑 | 安南中部 |
| 驃國 | 緬甸 |
| 眞臘 | 安南南部 |
| 東謝蠻 | 貴州西部 |
| 南平獠 | 四川東南部 |
| 婆利 | 婆羅洲 |

雖然，這個表在表面上好像是有點瑣碎，然而對於唐代國際貿易的發展以及唐代統治版圖的擴大，的確可以許多的暗示。

## (二)唐代的土地制度

現在我們再來敍述土地制度吧！因爲這個問題與唐代的農民戰爭有密切的聯系，所以，我們將這個問題應作比較詳細的研究。

關於唐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可以分作兩個時期；前一個時期是租庸調的時期；後一個時期是兩稅

制度的時期。不過，在租庸調制度未頒佈以前，那時唐代的統治還在開始建立的時期——即武德二年，因爲要緩和農民鬥爭的情緒和在農民羣衆中間散佈一些欺騙的影響起見，曾經頒佈過這樣一種租稅政策：『每丁出租二石，絹二疋，棉三兩；出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但這只是臨時欺騙農民的策略，以後客觀的形勢給統治階級以穩定的機會，此種制度馬上又爲統治階級所取消！

唐書食貨志對於唐代前一時期的土地制度——租庸調制度有如下的紀錄：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少者爲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幷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彼鄉，縣有餘以給彼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棉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

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見唐書卷五十一食貨志第一頁）

但是，在某些地方，仍有特殊的情形，如嶺南諸州則稅米。據文獻通考載：『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住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蝗蟲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見文獻通考卷二第二頁田賦考）

并且，統治階級爲使租庸調的制度普遍的施行起見，所以首先就要戶籍明確和簿計詳贍，否則，這個制度的施行會遇到許多的障礙；故當時有兩種辦法輔助牠的施行。

第一種辦法就是『戶籍』：『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十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

第二種的辦法便是『計賬』：『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需，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衆知之。』

可是祖庸調的制度，並沒有解決農民與地主的矛盾，因爲雖在這種制度下面，而土地還是可以自由的買賣，並且，自武后統治以來，牠已漸漸的暴露了無法彌縫的矛盾？如『代宗寶應元年，租庸使

——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責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爲羣盜（袁晁曾在浙東因此而領導農民暴動，攻陷了很多的地方，參加這次暴動的羣衆，近二十萬人，經二年之久，始爲李光弼戡平——著者註），縣不能制。」（見同上書第九頁）因此，關於租庸調的制度遂不復爲統治階級所採用；到了代宗大曆元年，更『詔天下田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爲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畝稅六升，荒田畝稅二斗五升。』並且，於『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稅畝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見唐書食貨志卷五十一第三頁）

自是以後，以畝定稅，並以貨幣納稅，不問丁戶，而租庸調之制度實際上已掃蕩無餘！

至於後一時期的兩稅制度，是開始於德宗建中元年；那時德宗的臣僚——楊炎，創造了所謂兩稅制度，其法是：『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

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役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加斂，以枉法論。」（見文獻通考田賦考第三卷第九頁）

這種制度，誠然是針對着當時的土地問題；牠有五個特點：（一）稅制簡單，如果和租庸調的制度比較起來，的確是免除了戶籍不實和計賬虛浮的積弊，並且，還把那些租庸雜役一概廢免，這對於農民是有相當的利益。（二）合於租稅以財產多寡爲徵收標準的原則，摒棄了以人爲單位的徵稅方式；因此，貧困農民直接負担租稅義務很輕，甚至如『鰥寡惸獨不濟者』還一概免掉他們直接的担負。（三）合於租稅普及的原則，決定商人亦須納稅三十分之一；本來，在唐初按丁授田，商人於租庸調以外，無特別負担直接租稅的義務，這不僅失之公平，且亦與租稅以普遍爲原則的標準對立。（四）以貨幣納稅，是適合於商業資本社會進化的齒輪；在唐初，租以粟；調以綾，絹絁；庸以絹？而兩稅制度則於徵米而外，其餘概以貨幣計算。（五）因出量入以爲租稅的標準，是切合於十八世紀以來新的財政學理，在中國古代財政史上，就一般慣例而論，均以量入而出爲原則，而楊炎却把這個原則倒轉過來，的確爲中國財政史上放一異彩！

當然，一種進步的事業，往往遭受了許多意外的阻礙而引起落後人們的反動，因此，楊炎的土地

政策在決定的時候，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當時反對楊炎土地政策最烈的首推守舊的宰相——陸贄，他上疏給他的主人——皇帝，竭力的發揮他瘋狂似的論調；他說：

『國家賦役之制，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役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際，海內板蕩，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爲之便，兵與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姦，敺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以示月平，至京與歷相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肥瘠產物多少爲二等州；下等者

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見陸宣公奏議集）

反對的無理，我們是可以作這樣的肯定。在陸贄的觀念當中，認爲土地政策的實施，不能把人民與土地分開，殊不知受田制度已經爲商業資本尤其是貨幣交流的影響所束縛，而沒有存在的可能！

## (三)農民生活之詩人的描寫

我們在上面所敍述的，不過是指明唐代農民所處的客觀的經濟環境，至於唐代農民之直接的生活狀況，現在，再來作一番必須的考察吧。在唐朝農民生活中間，起最大的摧殘作用的，有下列幾個毒似蛇蝎的制度：

(一)貢獻　這是搜括農民血汗之祕密的名辭。唐朝中葉以後，統治者的首領——皇帝，往往有許多出人意外的宣索，逼迫那班臣僚們從農民身上敲骨吸髓而作「無名」的進奉；祇就唐代宗的生日而言，臣僚們的貢獻竟達數千萬緡之鉅！敬宗時代，這種進奉更是變本加厲，除掉詔勅經常的貢獻以外，復詔諸道上脂盝妝具盤條繚綾千匹。貢獻制度的弊害，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是：上層的皇帝既有不法的誅求，而下層的臣僚，當然，不成問題的除掉進奉之外，會有大批的截留。

(二)捉錢　隨着商業資本發展而發展的剝削制度，在唐朝是非常的複雜，捉錢制度，是這些複雜

制度現象中的一環。在貞觀初年，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這公廨田的收入，供給各個官僚機關的公私費用；最後，因為用度不足，在京的官僚除掉受皇帝的賜俸而外，沒有其他正當的收入。於是，這些京司的官僚便異想天開的把公廨的五萬本錢（是這些官僚的賜俸——著者），交於那班市儈手裏，要他們每月納息錢四千。這一批市儈——捉錢者，政府給他們以特別的保障，免掉他們的徭役，甚之，就是有罪府縣也不敢懲治；從此以後，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以此為經常的職業，此制度主要的弊竇，是在於捉錢者倚賴政府的勢力而狐假虎威去剝削農民，所動甯願不請本錢而白納利息，官僚機關也是利用這個制度去剝削民衆（所徵收的利息常超過本錢十倍——著者），因此，農民在官僚與市儈互相勾結的局面之下，已經是彈動不得了！

（三）借錢　借錢的制度，彷彿和現在的所謂國債相類似，在唐朝這個制度也是農民的死敵！這制度並不是唐朝所獨創，遠在南朝宋文帝時，因魏人南侵，軍旅大起，——就決定在富人和僧尼身上借貸大批的金錢（如富民家資滿五十萬，僧滿二十萬者，徵借四分之一即還——著者註）。

在唐肅宗當治的時期，曾派遣御史——鄭叔清等，向江淮蜀漢富裕的商人借貸，就他們所有的資產，十收其二，謂之率貸，這是唐代最初向人民的借錢。以後德宗討河朔及李希烈，因為庫空如洗的關係，又繼續了國債政策；以他的寵臣——趙贊管理度支，頒佈借錢的命令，約以罷兵為償還的時

期。當時對於這借錢工作的執行，的確是雷厲風行，派遣了大批的爪牙往農村中間直接搜刮，農民彷彿和遭逃盜刼的一樣；甚至在貧苦農民中間，搜刼的時候，他們的所有，往往全部（本來他們財產是很少的）都被官吏所掠奪，逼得他們必須的生活都難於維持，因此，有許多破產失業以及意志薄弱的農民，時常發生同羣結伴自殺的現象。但是，借錢工作的另一方面，對於都市的豪富，却有很大的讓步，綜京師豪富田宅奴婢的估計，僅僅得着八十萬緡。本來國債的性質，絕對沒有直接強迫搜取的成份，很顯然的，這是直接掠奪農民的行動，與國債的義意誠有天上人間的距離！並且，所謂「罷兵乃償」，更無確定的時期，究竟以後履行了償還的義務與否？歷史並沒有明確的答覆我們。

（四）僦匱納質錢　這個制度的內容，主要的是保護高利貸資本的利益，其次，便是於農民銷售農產品的時候，徵收他們很高度的所得稅。關於保護高利貸資本的部份，如農民以物向高利貸者——典當商人質錢，迨至贖物的時候，於母錢之外別還子錢（即利息），在應還的子錢當中，政府叩取其一。如果農民們以粟麥到市場上銷售，同樣的，也要在他們所得的代價當中徵收四分之一的所得稅；這制度在當時曾引起農民竭力的反抗，在反抗的過程中間，長安城曾爲之罷市！

（五）稅間架　間架稅彷彿類似現在的房屋稅，其制度以屋二架爲間；上間稅錢二千，中間稅錢一千，下間稅錢五百。在徵收稅錢的時候，官吏執筆握算侵入農民的住宅，計其間架之數，即責令農民

們繳付應繳的數目，或有房屋很多而無其他資產的人們，出錢當至數百緡之鉅。並且，還規定很嚴厲的賞罰細則；如果農民們敢匿一間卽受杖刑六十，告發者給賞錢五萬。

（六）算除陌　最初算商賈緡錢，於諸道津會設置官吏，檢閱商人經常的收入，錢每緡算二十。以後更將算的範圍擴大而採取除陌的制度。凡公私給與和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如果這些買賣和給與摒棄掉貨幣的方式，而採取物物交換的話，那麼，還是就貿易者約錢爲率以抽取固定的算錢；都市的牙行，各給以政府規定的印紙，人民如有買賣，隨日署記，到明天由政府合計抽算。如有貿易而不用市牙，凡隱百錢者，卽罰款二千，杖刑六十；告發者，賞錢十千。

關於這些制度爲害之烈，我們從下面所引證一段事實當中，看得清清白白：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詔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李希烈暴動），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冀得厚賜遺其家，旣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乎？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見中國財政史講義一百六十八頁）

在唐朝我們很明顯的看出這些束縛和剝削人民的制度，好比緊箍一般似的繼續不斷的向農民頭上箍來；並且，除掉這些直接剝削以外，戰爭也是擾亂農村秩序和破壞農村經濟的惡魔！

杜子美他生在這個時代，他的詩完全是農民生活之最具體的反映，他把強征暴斂，苛捐雜稅，拉夫封差以及戰爭給人類精神上的創傷都做了有力的描寫，所以後人讀他的詩，往往把自己都溶化在他的詩中。茲錄數篇如下：

A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一篇詩雖然是單純的描寫在戰爭時期農民的生活，可是，拉夫竟拉到老年婦人的頭上，與現在戰爭區域有很多相類似的地方，祇就這一點講，過去統治階級自己所宣傳的什麼「仁義道德」，不待旁人去揭破，他自己就把牠撕得乾乾淨淨！

B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行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返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值秦兵奈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收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唐代的農民們既然過着這樣艱難困苦顛沛流連的生活，他們是不是如綿羊一般的屈伏了呢？不！祇有統治階級是這樣的想，而被壓迫的農民們是絕對不會屈伏的。我們看：歷史已經到了轉變的關頭，一切的矛盾已經公開的暴露，社會各階級都在準備着自己，而農民們同樣的也舉起了粗暴的拳頭，繼續他們過去在歷史變革期中所未完成的任務。

### (四)黃巢暴動

每一次的農民暴動，都是歷史變革的動力，牠是受當時經濟的政治的因素所決定，絕不是什麼從

天而降的東西；不過，牠的發展的趨勢並不是完全的一致，在歷史上表現的往往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暴動的農民推翻了舊的統治，同時又建立一種新的政權——農民政權；但是此種農民政權——小資產階級的政權，在生產力未有進入更高階段——資本主義的社會，缺乏先進階級的領導，必然的會接受商業資本的影響而將農民革命的實質腐化，蛻變為另一種社會成份的代表機關。第二種方式是交戰的兩個階級同時並倒，那種由市民蛻變的力量，受着大批農民的掩護而跨進政治舞台！但是，這事實在中國歷史上沒有見過，就世界農民革命史觀察，也祗有法蘭西的大革命把牠表演得如火如荼。第三種方式是農民與統治階級激戰的時候，統治階級的左翼，為的是拯救自己階級和模糊農民鬥爭的觀念起見，於是在他們的內部舉行了一些改良式的鬥爭，並乘機掠取農民革命的果實，把廣大的農民暴動鎮壓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數見不解的事情啊！

黃巢暴動究竟是走那條道路呢？

以黃巢為領導中心的農民暴動，在乾符元年（卽西歷八百七十四年）才爆發成為廣大的農民戰爭；最初發動這次暴動的，要推濮州人王仙芝。關於養成這位暴動領袖的客觀環境，據史書紀載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遇盜賊，官軍多敗！……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

壇。」（見御批通鑑輯覽卷六十二四十九頁）在這材料中間，除了發覺了這位歷史家對於歷史敍述之不忠實，把歷史進化的意義和土地問題之宗爲統治階級所解決，因此，關係到農民爲求得土地及徹底解放而暴動的眞相完全抹煞而外，還可以看出在王仙芝暴動以前，已經有部份的農民騷動，不過，此種農民騷動進展到王仙芝揭起暴動的旗幟以後，已經改變了他的內容，那些很小的伏流都匯合起來而成爲泛濫舊社會的洪水。

當然，統治階級對於這洪水的泛濫，事先已經看到一些象徵：『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代木，雇妻鬻子，祇可供所由（即督催之吏卒——著者）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見同上）可是，他要消滅這革命的象徵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是統治階級自動的沒收地主官僚的土地，並把這些土地分給貧苦的農民，但這是統治階級自己所不願意的舉動。另有方面，祇有殺盡千百萬貧苦農民，才可以把這個問題作了所謂痛快的解決。

農民革命的火焰，燃燒出一朵奇葩！

從農民大革命的環境當中，煅煉出一位傑出的領袖——黃巢。這位領袖的出身是非常的奇特，他

是個富於貲財之鹽商的子弟；他不僅有很好的軍事技術，還有相當的智識基礎與煽動天才，他和王仙芝在暴動以前就有了私人間的友誼的聯絡，及至王仙芝公開的向統治階級樹起了革命大旗以後，他便拋棄了自己的階級立場，而認爲這種行動才是唯一的眞理。因此，他也顧不得那些落後人們的毀罵，以八個基本幹部（連他自己——著者）去號召羣衆，居然於很短時間號召了數千農民；這種情形，誠然是『登高一呼，四方響應』啊！

暴動給統治階級以巨大的打擊，使那班官僚地主在鋤頭鐮刀的面前發抖！如宋威在奉命討伐農民而與暴動農民接觸的時候，他和曾元裕說：『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黃巢傳）統治階級最上層的皇帝，也知道這種情形，但他以爲暴動的農民不過是想求得『一官半職』，彷彿沒有什麼經濟的及社會的背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分析農民暴動，很自然的會得出了農民暴動的對策——上層農民領袖的收買，以企圖消滅千百萬貧苦農民解放的鬥爭：

『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詣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詬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卽不受命……』（見同上書）

很英勇的黃巢，他以堅強的被壓迫階級農民的意識，克服了千鈞一髮似的統治階級收買的危機，他站在羣衆利益的立場上，不惜與『患難與共』的老友決裂，把感情抛到九霄雲外，這誠然是革命家光明磊落的行爲。及至王仙芝在黃梅因軍事上的失敗而爲敵人所乘，竟犧牲自己的生命！統治階級以爲農民失掉了領袖，暴動可以從此消沉下去，殊不知廣大的下層羣衆，早以接受了黃巢的影響；關於領袖的選擇，當然是以衆望所歸的黃巢最爲適當，所以如尙讓這一類的人便推黃巢爲衝天大將軍。那班河南和山南的民衆，聽說黃巢正式的做了暴動的領袖，都爭先恐後的來參加解放自己的戰爭，在非常短促的時間，號召了十餘萬農民，的確爲王仙芝領導期間所不及。雖然，因軍事上的失敗，特別是高駢裴璩對於暴動的組織以很大的打擊，逼得黃巢在策略上不得有所變更，即是說放棄了進攻的陣容，而採取暫時防禦的策略，如表面上與統治言和等等；可是這個時期是非常的短促，客觀形勢給暴動隊伍以便利，馬上又踰江西，攻破虔吉，饒信等州，並開七百里的山道直趨福建；他以爲福建是南中國經濟中心之一，企圖抓住這個經濟中心的區域再繼續向外發展，掩有整個的南中國而與統治階級形成對抗的局面。

黃巢從這認識出發，所以很積極的攻取安南和廣州；當時右僕射——于琮，見到這問題的嚴重，曾向皇帝作這樣的建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見同上）黃巢以義軍的資格，

取得了這些地方以後，立即向人民申訴統治階級的罪惡；他指斥統治階級慘無人道的壓迫羣衆，指斥政治組織的卑鄙貪污，換句話說，把統治階級所有的罪惡都向羣衆公開的揭發，使民衆對於革命的同情。但是，因爲南方的氣候，尤其是安南和廣州的氣候，不適宜於暴動羣衆的生活，而遭受空前未有之瘟疫的災禍；瘟疫的傳染是異常的可怖，差不多所有的暴動隊伍十分之四都在此種自然災害當中犧牲了生命！

黃巢以爲與暴動羣衆不相宜的地方，是不可久留的，因爲假使繼續的留戀，那麼，病魔會把這批久經煅煉的英勇的革命羣衆，悉數置之死地，因此，祇好回過頭來奪取統治階級的基礎。同時，統治階級的內部更是非常的動搖，如劉巨容在和黃巢作戰的過程中，深深的感覺得：『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見同上書第二頁）這種現象，客觀上與黃巢的北返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他能夠很順利的從采石渡江，長趨直入攻陷了東都！當時暴動的軍隊的確是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如『巢陷東都，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見御批通鑑輯覽卷六十三第二頁），這一點事實已經答覆了人們對於暴動隊伍之造謠！暴動的隊伍經過了潼關以後，很順利的佔領了長安，使統治階級最上層的皇帝倉惶出走！

從此，社會上便起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

那所謂「賊骨頭」的黃巢，現在居然拿到了政權，幷有數千宮女迎拜而稱他爲黃王，怎不令士大夫們氣死；在遺老遺少和士大夫們悲痛聲中，又稱『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更令士大夫們怒髮衝冠！並且，這個政權，牠對於民衆的敵人——官僚採取很嚴厲的態度，嘗以極刑去處治他們，這種不妥協的精神縱然是他後來失敗的原因之一，然奮鬥的精神光輝更從此處流露於民衆之前了。

可是，這個政權是非常的短命，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鄭畋，積極的向牠進攻，各地雖有農民鬥爭，不幸缺乏總的聯系，而使他不能穩定。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軍士釋兵入茅舍，掠金帛妓妾……」（見同上書）這一紀錄，除掉暴露地主階級之瘋狂似的進攻農民而外，更揭破他們那種所謂弔民伐罪的原形。

最後，李克用調來大批沙陀軍隊，在軍事技術上屈伏了黃巢，如以有訓練的騎兵攻擊密集的暴動隊伍，使長安再度的落到舊官僚手中。暴動既然失掉了根據地，游擊生活是很難找到出路！

在長時期的農民游擊戰爭中間，使農民們感覺到沒有前途而逐漸的離開戰線，回復到以前飢寒交迫的生活！下層羣衆既有這種趨勢，很迅速的會反映到暴動隊伍的上層；因此，如朱溫們首先向統治階級投降，企圖保證未來的地位，而黃巢多年的戰友——尚讓，亦復對革命背叛，並且，統治階級還

經過他的手結束了這次廣大的農民革命！

綜自動暴以來，延長了十一年之久；但是不確定的農民階級的革命，經過這次事變，愈加證明牠如果缺乏領導是沒有單獨的前途啊！

## 第五節　宋代農民鬥爭與王安石變法

### （一）一般的經濟形態

凡是相信歷史進化的人們，都應該承認中國社會自殷周以來是繼續不斷的向前發展；當然，這發展的途徑在表面上並不是一定是這種或那種的突變的直線形式，而往往是走的紆迴曲折的道路。在黃巢暴動失敗以後，統治階級雖然對農民施行了很慘酷的懲罰，可是，這懲罰並沒有解決了社會本身的矛盾，反之，只有使牠們（統治者）內部的矛盾格外緊張起來。如五代的大混亂，延長了五十餘年，在那分贓的悲慘的戰爭中間，不知流了多少農民的膏血！

於這種狀況之下，社會的生產力之向上的發展，必然的要遭受很大的障礙，同時，上層的建築物——政治組織也會有一番更替。於是乎宋朝就在這樣的環境當中產生出來！這個統治建立的初期，不

成問題的要來整頓經濟而發展自己的前途，并在形式上還帶着與民更始的面具，以欺騙廣大的民衆。

不過，宋代的經濟形態究竟是那種成份佔着優越的地位呢？這是值得我們詳細的探討：這裏我們首先要指出牠幾個主要的生產，其次，在一些經濟的重要的材料上面，從複雜的經濟成份中間來找其比較明確的結論。

第一個重要的產業是鹽：宋朝鹽制，最初是非常複雜，很多的地方沿用五代的方式，如所謂「蠶鹽」（即於育蠶時期，以鹽俵散給農民，限期納稅的意思——著者），即是一個顯明的例。以後才確定官賣與通商兩種同時存在的方式；通商的內容，即是任憑商人們自由的運鹽於各地去銷售，不過要納相當的稅額，每一斤徵稅一錢；此法多行於京西，陝西，河北等地。而官賣則係由政府經營專賣，一般人們稱之爲官鹽；在淮，浙，京東，南廣諸地，這種制度是普遍的施行。仁宗末年，又變行鈔法，令商人以錢購買鹽鈔，持鈔赴產鹽區域領鹽，任其運售於各地；此法最風行於陝西，商人們以錢四貫八百買一票，可以請鹽至二百斤。最後，蔡京又變更了此種制度，改爲長引短引的辦法，凡鄰近於產鹽區域的地方，准許商人們赴場輸鹽，運於附近州縣售賣，並給他們以短引，期限一季；那些距離產鹽區域窵遠的商人，則給他們以長引，期限一年，現在所謂鹽引的制度，實發源於宋代。當時的鹽稅是政府收入的大宗。

第二個比較重要的產業便是茶：關於茶法，在宋朝比鹽法尤爲重要，凡是官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處死刑！太平興國二年，曾下詔說：『凡是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四年又下詔『鬻僞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統治階級爲什麼這樣的注意於茶的管理，因爲每年茶稅的收入竟達二百八十餘萬二千九百餘貫；從這個收入的統計數目中間，茶爲宋代重要產業之一，我想人們不會有異議吧？

宋朝除掉鹽和茶有長足的發展而外，更有很簡單的機械的發明；在南宋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年），岳飛征伐洞庭湖中湖匪的時候，這批所謂『天生的賤骨』——湖匪，曾使用輪船，如『以輪激水，其行如飛！』（見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岳飛傳）又『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見南宋末吳自牧著夢梁錄卷十二杭州西湖之車船）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看整個宋朝國際貿易的情形：在北宋初期關於國際貿易已經開闢了三個規模宏大的貿易港口；這三港口全部開闢的時期，則在眞宗咸平二年（西歷九九九年）。這三個港口位置是：廣州，泉州，杭州。

廣州是當時第一個國際貿易港，如『崇寧初（西歷一一〇二年），三路（廣南東，福建，兩浙）各置提舉市舶司，三方唯廣最盛。』（見朱彧著萍洲可談卷二）同時，關於廣州外國貿易的統計，清朝

人梁廷枏著粵海關志卷三，其所引用的北宋畢仲衍之中書備對亦有如下的說明：「漢按備對所言，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內明州卽（泉州）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廣州所收者則有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雖三處置司，實祇廣州最盛也。」

泉州是第二個國際貿易港。「元祐三年，……置密州板橋（山東省膠縣）市舶司，而前一年增置市舶司於泉州。」見宋史卷百八十六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而馬端臨亦說：「熙寧中始變市舶法，泉人賈海外者，往復必使東詣廣，否則沒其貨！海道歸遠，竊還家者過半歲，抵罪者衆。太守陳偁奏疏願市舶於泉，不報，哲宗卽位之二年，始詔泉置市舶。」（見文獻通考六十二職官考十六提舉市舶條）很明顯的，泉州在宋朝的國際貿易港地位上是非常的重要，在元祐以前，牠已成爲重要的通商口岸，如『太平興國（西歷九七九年），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番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於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見宋會要）並且，這時候泉州不僅成爲通商口岸，還有很多外國商人居留於此：「雍熙間（西歷九八四——九八七年），有僧囉護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國人。番商以其胡僧，競持金繒珍寶以施。僧一不有，買隙地，建佛刹於泉之城南，今寶林院是也。」（見趙汝适著諸蕃志上天竺國條）。由此，我們更可以推測當時番商之僑居泉州，當然不在少數。

其次，關於南宋時代泉州市場的繁盛，更超過北宋的紀錄；『福建（泉州）廣南（廣州）皆有市

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惟兩浙冗蠹可罷』（宋史卷百六十七職官志七提舉常平茶馬市舶職條）。同時，吳自牧也說：『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見夢粱錄（知不足齋叢書本）卷十二）。觀此，泉州之為國際貿易的重要港口，這是件白日經天的事實！

杭州是第三個國際貿易港。關於杭州之成為國際貿易港的事實，就我們現在的材料，還不能搜集更充分的論證；不過，從一些零星斷片的紀載中間，看出牠過去發展的痕跡能了。張闡之說：『兩浙，閩，廣三市舶司，歲抽及和買約可得二百萬緡。』（見李心傳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三）這材料是說明杭州為國際貿易港口之有力的明證，並且，耐得翁也說：『自高宗皇帝駐蹕於杭，而杭山明水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即汴京）其過十倍矣。……况中興行都（即杭州）東南之盛，為今日四方之標準。』（見耐得翁著都城紀勝序言）所謂『民物康阜』，『東南之盛』，『四方之標準』，異常顯然的，是描寫杭州市場的繁盛。

宋代既然有三個大規模的國際貿易港，那麼，統治階級究竟採取何種態度以處置這複雜的國際貿易呢？因為此種政策的決定，在國際貿易史上有嚴重的意義，這是值得我們的注視。

宋朝對於國際貿易是採取獎勵的政策。

從獎勵政策之總的路線出發，對於國際商人的待遇，便演出很多複雜的方式；如『遣內侍八人，

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番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牛，真珠，龍腦。每綱齎空名詔書二道，於所至處賜之。」（見宋會要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年）條）我們看這是第一次獎勵國際通商的辦法，所謂『招勾進奉』，『齎空名詔書』等文句，更十足的證明牠遣使的目的是在吸引外國的商人。第二種的方式，便是以名位去籠絡那班外國商人；「紹興六年（一一三六年），和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見宋史卷百八十五食貨志香條）所以，如大食（即阿拉伯）蕃商——蒲囉辛及蕃舶綱首蔡景芳等，均根據上述的褒獎命令，做了所謂承信郎（從九品）的官職。第三種方式卽是每年十月外國商船歸國的時候，中國官吏爲之設宴送別，即所謂犒設：「歲十月，提舉市舶司大犒設蕃商而遣之。」（見周去非著嶺外代答（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三）。又「每年於十月內，倣例支破官錢三百貫文，排辦筵宴。係本司（卽市舶司）提舉官同守臣犒設諸國蕃商等。」（見宋會要紹興十四年（一一四四年）條）而萍洲可談卷二亦曰：「嘗因犒設，蕃人大集。」

在獎勵政策的總路線之下，國際貿易的收入，的確是統治階級經濟上的大宗來源之一，據宋史卷二百六十八張遜傳紀載，認爲自太平興國元年創設榷易署以來，第一個年頭政府卽收入三十萬緡之利益，未幾更增至五十萬緡云。而李心傳亦說：「自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至紹興四年（一一三四

年）前後凡七年間，泉州市舶司之利得達九十八萬緡。」「紹興末期，廣州，泉州市舶司，由抽分及和買所得之利益，每年達二百萬緡。」（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函海本）甲集卷十五）同時王應麟對於這類數目字也有相當的答案，他說：「海船歲入，犀象，珠寶，香藥之類，皇祐中（西歷一〇四九——一〇五三年）五十三萬有餘；治平中（西歷一〇六四——一〇六七）增十萬；南宋中興歲入二百萬緡。」（見玉海卷一百八十六）於此，足徵宋代由國際貿易所收入的利益是逐年增加；所以，明朝人朱健說：「渡江之初（西歷一一二九年），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紹興末（一一六二年），合鹽，茶，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見古今治平略卷三）

國際貿易的收入，對於南宋統治有很大的幫助，如果缺乏了這巨大的收入，那麼，南宋的統治，是不能支持那樣很長的時間。另一方面在海上貿易有長足發展的宋代，航海術又有很大的發明，如「高麗圖經」及夢梁錄所載，不僅有設備完美規模宏大之中國商船，並且還有航海借鏡的「指南針」（即「羅盤針」）的發明；這發明並不是偶然的現象；牠完全與生產關係相適應；這時期中國商船時常到波斯灣及印度一帶，因此，勢所必然的，這班航海商人要積極的闡明磁石指極性。一般人們認為中國的羅盤針係傳自地中海或阿剌伯海，但是並沒有充分的根據！

關於宋代一般經濟的形態，我們根據上面一些材料，可以從這些敍述當中，找着相當的結論：就

是說，宋代的經濟並沒有倒轉車輪囘向復古的道路，而是紆迴曲折的向前發展，牠在某些地方，與唐朝的經濟有很多類似之點，但是，絕對不是和唐朝一模一樣，那些『中國歷史數千年來一成不變』說的先生們，企圖抓住表面上某種類似的事實，而貿然的反對歷史的進化，實際的結果祇是徒勞無功！當然，宋代經濟的本身，並沒有發展到了產業革命的程度，牠在經濟上最高領導的成份仍然是商業資本。不過，這商業資本的內含，與前一個時期就有很大的不同，牠那大規模的國際市場，牠那設備完美的海上商船，實為前一時期所不及，因此，這種經濟發展的波浪及於以後的影響是非常之大，換句話說，牠已經為元朝登峯造極的商業資本開闢了一條很順利的道路。

### (二)土地制度的鳥瞰

宋代的土地制度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公田制度的形式；該制度的內容包括官田，莊田，屯田，營田四種，換句話說，這些土地是屬於政府所佔有。政府佔有這些土地的原因，是五季變亂的結果；當五季混亂的過程中間，長期的戰爭不僅使農民破產和逃亡，同時，就是那些所謂『閥閱』的地主，也顛覆了不少；過去的貴族，現在變作平民，過去度着養尊處優的甜蜜生活的人們，現在也要飽嘗艱難困苦的滋味。宋朝既然繼續五季而統治人民，那麼，對於這批失掉了原主的大塊土地，當然要為政府

所沒收。政府對於這批由沒收所得來的土地，是直接租與貧民，要農民繳納相當的租稅；在統治階級的意思，以爲這是一舉兩得的辦法，既不會使土地荒蕪，把農村生產量提高，而同時又安插了一大羣失掉土地的貧農，殊不知事實上，貧農們所得到的利益與統治階級的利益恰恰成爲反比例，在這種制度之下不知絞盡了多少貧農的膏血！所謂『私租額重納輕，官租額重納重，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座爲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浸之道。』公田制度榨壓貧農的內容，以這簡單的幾句話當中，已經赤裸裸的道破了牠的原形。

與公田制度同時存在的還有『民田』制度的形式。所謂民田即是人民私有的土地，照例要向政府繳納大批的地租；此種土地面積的數量究竟有多少？因爲現在還沒有可發的統計材料供我們參考（當然，宋朝的統計以及會計方式已比較以前精確——著者），不過，就宋代所開墾的土地數字當中，大概的情形是可以看出一些；如『開寶末年，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墾田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墾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而『治平中四百四十餘萬頃』（見馬端臨文獻通考田賦考）。墾田數目之逐年的增加，在牠的反而完全顯示出大批的土地集中到地主官僚的手中。並且，有一件事實我們就可以了解所謂民田之集中到地主官僚手裏這一現象之普遍化；如淳化四年皇帝

的詔書說：『戶口之數，悉載於版圖，軍國所資，咸出於租調；近年賦稅減耗，簿書糾紛，州縣之吏非其人，土地之宜不盡出，小民因以多辟，下吏緣而爲姦，乃有匿比舍而稱逃亡，挾他名而冒耕墾，征役不均於苦樂，收斂未適於輕重，宜示詢求，以究情僞。』（見前揭書）地主官僚們在農村中間的確是『乘火打刼』來掠奪農民的土地。

土地集中的現象既然是普遍的發展，那麼，對於土地問題的爭論，必然會排到一般政治家議事日程當中：

陳靖便首先發表他對於土地問題的意見。他說：『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地理夐遠，雖加勸督，未能遽獲其利；在者彊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三二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一二，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逃亡既衆，則賦稅歲減，而國用不充，斂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至矣。……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嘗奉使四方，深見民田之利害，汙萊極目，膏腴坐廢，立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稅調，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損益；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

亡逐，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玆浮蕩，絕意歸耕！……則望備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墾，未計賦稅，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俾咸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戀家懷土，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以司農新坿之名籍，令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量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餱粮，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折估，納之於倉，以成數開白戶部。」（見同上書）

陳靖這觀點在當時是比較嚴重，值得人們深刻的注意，牠除掉包涵『耕者有其田』的成份而外，還提出很多具體的辦法，如招致大批的貧農來耕墾荒閑無主之土地，以提高農業經濟的上昇，使牠與正在發展的商業資本相適應，而另一方又顧慮到貧苦農民之缺乏生產工具和維持生活的食料，所以復主張由政府貸款給那些勞苦農民，在秋收的時期，依照市場價格以生產品折還於政府。此意見雖經採納，但是當時的政府因缺乏大批的金錢，同時，更顧慮到水旱天災的到來，使政府的貸款遭受意外的損失，因此，對於陳靖的主張祇好置諸高閣。

地主豪紳他們是『幸災樂禍』，在陳靖的主張未見諸實行以後，那土地集中的過程是更加迅速，

而成爲社會上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譬如守舊的政治家——蘇老泉，他看到此種現象都惴惴不安，而力竭聲嘶的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周之時用井田（本來井田制度在中國歷史發生過沒有？現在是值得的研究，依我個人的意見，這井田制度是儒家的假託，在本書導論裏面已經說了，希讀者諸君參看——著者），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苔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屬役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而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尤且不可，而況強富之民，輸租與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這完全是代表地主的思想——著者）！……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詭辯哲學——著者），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一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即董仲舒）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以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見同上書）

蘇洵『限田』的主張，他的出發點完全是根據『緬懷往昔』，他絲毫不了解社會進化之必然性，

他把脊背朝着歷史的發展，認爲限田就可以解決土地問題的矛盾。殊不知他的理論不僅與事實背道而馳，甚至，有些地方自己還和自己矛盾。他這種復古的反動的土地問題的對策，在商業資本比較發展的社會裏面，不但統治階級不能採納他的意見，就是在羣衆中間同樣的得不着什麽回聲！

但是，土地問題是否永遠的擱着而不能解決呢？不！飢寒交迫的農民們將自動的起來企圖解決這些問題。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無情的摒棄了咬文嚼字之懦怯行爲，很坦率的採取「暴力」來解放自己。

警鐘響了！叛亂的農民又在準備着演流血的慘劇！

### (三)一段農民暴動的插話

土地關係隨着商業資本的發展而更容易集中到地主豪紳手裏，這是不容置喙的事實，反之農民們的生活也就日趨於低下的狀況連必需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了。因此，暴動是貧苦農民唯一的出路。促長這次暴動的客觀因素，便是統治階級的苛捐雜稅，把廣大的中農和佃農都帶到暴動的隊伍中來；當時苛捐雜稅的名目很多，如「宅稅」「地稅」「丁口稅」以及「土產稅」即「牛革」「盬鹽」「食鹽」之類，都抽很重的賦稅。最後，又有所謂「支移折變」之法，更是鯨吞農民膏血的制度；什麽是「支

移」呢？統治階級由歲賦所徵收的物產，輸納本有一定的地方，而以有餘補不足，不特不移此輸彼，移近輸遠，在最初本係通融便利的辦法，可是它的實在的內容是賓弊繁興，那班徵收賦稅的官吏，往往借口於支移而創立『脚錢的名目，每斗須輸錢數十，對於貧苦的農民尤肆行壓迫，這班被壓迫的農民，時常賣棹耕牛土地而猶不能饜官僚爪牙們的大慾。至於『折變』的名稱，更是剝削農民血汗的最可怖的象徵，本來政府徵收農民所繳納的賦稅是有一定的慣例，譬如繳納米穀，但是因一時所需，政府要農民改納麥菽或其同類的東西，便根據彼此之價格多少以定折算之標準；但問題幷不是這樣的簡單，官僚們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循環增加，務使農民們遭受很大的損失，所謂『苛政猛於虎！』這話是有苦的眞理啊！

被壓迫的農民們，從悲慘而嚴肅的空氣當中，已經揭起了暴動的大旗：

『青神（即周縣今屬眉州）民王小波作亂，神，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趨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傳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幷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神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病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死，其黨李順，擁衆寇掠，州縣多陷！四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射中之，玘

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衆至數十萬。』（見御批綱鑑輯覽第七十三卷第四十一頁）

暴動既然開始，農民與官僚地主豪紳的衝突，當然是達到短兵相接的程度，就他們懲罰反動縣令齊元振的行動來觀察，如『剖腹實之以錢』這一事實，很充分的表現農民革命情緒的怒焰了。這一羣向爲人們所賤視的被壓迫的農民，他們也曾以粗暴的拳頭奪過了成都，也曾建立過臨時政權，這政權是以李順爲中心的領導。

暴動是失敗了！悲慘的歷史戲劇又重演了一次！

當農民建立了臨時革命政權以後，雖然也曾以二十萬羣衆去圍攻梓州，但缺乏與各地農民鬬爭的聯系，所以結果終爲統治階級的走狗——農民暴動的劊子手——王繼恩所消滅。不過暴動雖然是失敗，而他們所提出來的政治上如『吾病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的這一非常有意義的口號。牠的確是染遍了鮮紅的農民要求的顏色，是當時社會各階級矛盾最顯明的反映。

農民們對於暴動雖感覺得失望，而統治階級又以很慘酷的方式結束了農民暴動——戰敗了農民，但是經濟上的矛盾並沒有解決，政府與人民間，仇恨祇是一天一天的加深，不過在新的農民革命失敗以後，人民鬬爭情緒是異常的消沉，要馬上再來一次革命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羣衆的鮮血並不是白流的，他多少都會給社會一些影響，至於影響的程度如何，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王安石就是受影響最深刻的一個。

### (四)王安石的變法

中國歷史上的改良運動者很多，而王安石也是其中的一個。不過，過去那些改良運動者的政治主張多半偏向於空想，就是說沒有現實的精神；而王安石則力矯前非，掃除過去一切空談政治家的積習。而積極的提出自己的具體主張。他不像王莽那樣的懦弱，遭受些微的挫折馬上就修改或者是放棄自己的意見，他是不拘小節，不畏譏諷，他在主觀上既然感覺自己的主張正確，那麼，他就以很堅強的意志勇往直前，與那些反對派做理論上的鬭爭。

現在我們首先分析王安石的變法究竟是受那一種因素所影響？其次我們再敍述他的變法的綱領。

他的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就是變法的導火線，換句話說，在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已經勇敢的擂起了變法的警鐘！這篇文章的內容究竟是寫了些什麼？的確值得我們詳細檢查的必要：他首先說：「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

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很明顯的，此時社會的上層築物並不是絕對的穩定，雖然，他在不久以前還是鎮壓了農民的暴動。但是王安石的見解畢竟比當時一般的臣僚高超一等，因此他只認為這是形式上的解決；我們看他說：『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王安石為什麼要變法？在這一段話當中，很直率的為的是要消滅農民戰爭。同時，他又埋怨那班在朝的臣僚不去注意這些重大的問題，而祇是『尸位素飧』：『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并且，他還責備皇帝說：『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最後，他認過去一切的變亂以及目前統治有動搖危險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很本去解決一般人民的要求，所以他認為唯一當前的任務便是要變更社會上層築物的某些部份——特別是與國民經濟有密切聯系的法制：『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

以征誅。……』他深深的感覺得變法的困難與障礙之不易克服，所以他主張用政治力量來擁護變法的實施。但是，他唯恐人們攻擊他的變法主張之標新立異，所以，他在皇帝面前，對於他自己的理論特罩上一件古代的外衣；如什麼：『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以上統見王臨川集）實際上，這些話都是他爲自己開脫『標新立異』罪名的步驟。

英勇而雄辯的政治家的王安石，在理論決鬬的場中終於戰勝了一切的反對派而確定了變法之思想上的基礎。

現在，我們把王安石對於變法之具體的實施的意見，加以一番的搜列，以做我們研究王安石變法的提綱：

A經濟系統的變更：

王安石他是個飽經世故而邁進的政治家，他認爲社會上的一切的混亂以及農民的騷擾，這些都是根據於經濟的原因，就是說：國民經濟的系統如果混亂，而社會上各階級對抗的形勢亦復因經濟系統的混亂愈加嚴重與顯明。因此，第一點，他對於粮食市場的價格曾提出相當調劑的辦法，即所謂『均輸法』也。什麼是均輸法呢？條例司（即變法的參謀部——著者）言：「諸上貢，歲有常數，年豐可

以多致而不能鬻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部有半價之鬻，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荊，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共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而民財不匱！』（御批綱鑑輯覽卷七十六第二十八頁）第二，便是國家對於市場的管理。如『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欠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同上書第三十五頁）

除掉這些組織的有計劃的調劑和監督市場而外，在整理和改革經濟系統的過程中，王安石他是首先又注意到農村經濟組織的改變；於變法的意見才爲皇帝採納以後，他馬上就派遣很多官吏去視察全國農田水利與賦役的實際狀況；如『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這完全表示王安石的變法並不是憑藉於主觀的想像，並且，恰恰與此相反，他是側重在實際調查，根據調查所得的材料再加以有系統的整理，然後，才確定處理問題的方向。

他根據從事調查的臣僚們實地的報告，認為在『治標』方面應當取消和防止高利貸資本之殘酷的剝削農民，基於這一認識，故立即訂出代替私人高利貸資本之『青苗法』。本來『青苗法』的起源，由於陝西轉運使——李參，因該地戍兵很多而糧儲不足，所以要人民自己測度未來的麥粟的盈餘，先貸以相當的金錢，俟穀熟還官，政府在農民繳還貸款的時候，抽以適當的貸息，號為『青苗錢』。而王安石便根據此遺跡條例司援例實行並普遍此種制度：『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年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幷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出納有以赴時趨事，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前揭書卷七六）

但是，王安石仍感覺得這幷不是澈底的醫療了農村經濟，如果澈底的醫療農村經濟，祇有整頓水利——即是開浚河道與夫變更許多小塊耕地為『方田』。所以他一方面開浚綿延數百里之漳河，使沿河流的農民土地得着很好的灌溉，可以提高農村生產量之上昇；而另一方面，則雷厲風行似的重訂『方田均稅』的制度，以提高國家對於土地稅的收入及確定耕地之畝的面積，而預防地主仍使佔貧苦

農民之土地和轉嫁土地稅於他們的身上。所謂「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方田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以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同前揭書）

總之，王安石對於經濟系統的變革，在當時的環境當中，是含有進步的意義。

B從政治上預防和鎮壓農民的暴動：

農村經濟的改善，在某種程度之下，統治階級可以用弛緩和農民鬥爭的情緒，但這並不是說：因爲經濟上的改善，統治者對農民就放棄統治的形式。恰恰相反，統治者還是要更進的從政治上去統治農民；所以王安石在提出了農村經濟改善的意見和具體辦法以後，又更進一步的從政治上立下一道緊箍——「保甲法」——向農民頭上擲來。他說：

「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

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矢，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不干已，又非敕律所聽到，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人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者，權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同前揭書）

我們從這個「保甲」制度的內容中間，充分的看出王安石變法之是何居心？不僅在軍事方面糾正了募兵制度并給農民們以軍事智識的訓練，而主要的還是側重在如何糾正和預防農民們的叛亂。所謂「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及「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人雖不知情，科失覺罪」等語，其預防農民叛亂的動機是異常的明顯。

可是農民的叛亂並不是「保甲」制度所能克服，祇有澈底的沒收地主的土地并把這些土地分給農民，才是醫療叛亂火焰的聖水。這一點是王安石所不了解并且是不願意了解的。

但是，後人往往拾取王安石的牙慧，如對於處理曾經發生過農民叛亂的地方的政治，每每採取王

安石的「保甲」制度以極殘酷的手段去懲罰農民。其實，「保甲」制度是擁護土地私有制度的大旗，是維持農村中所謂「秩序」的利器；然而一些與他同僚而落後的人們，對王安石的變法因屬不去參加與擁護，甚至，還是極積的反對呢？

（五）變法運動中的反對派

凡是一種進步的主張，必然的會引起落後人們之竭力的反對，王安石在他提出變法的意見以後，却也遭逢同樣的命運。第一個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便是呂誨。他在王安石登台的第一天，即向皇帝提出這樣的抗疏：

「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說其才辯，久而倚毘，亂由是生。臣究安石本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文言飾非，罔上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

可是這個抗疏，祇是指斥王安石個人的行動，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政治意見，所以皇帝便認他們爭的是個人問題而置諸不理。但反對變法運動的人們，並不因此而鬆懈他們的工作，而反對變法的文件還繼續不斷和雪片似的飛來；如范純仁向皇帝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他此種反對的理論已經比呂誨較勝一籌而找着政治的線索；可是皇帝帶着責問的態度問他，什麼叫做『不見之怨？』他便支吾其詞而重複杜牧的話，說人們對於安石的變法是敢怒而不敢言！』當然，這是不能成爲充分的理由。

那些王安石的反對派，感覺得過去和王安石爭論之無原則的錯誤，於是便轉變鬥爭的方向，而漸漸的涉及到事實問題。因此，劉琦和錢顗便共同上疏斥責王安石在某些政治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安石執政以來，未逾數月，操管商（卽管子和商鞅——著者）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三司利權，開局設官以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更張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前揭書）本來，在這個所謂『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的問題的爭論上，反對派的立場我們相當的可以看到一些：先是有婦人名阿雲，許嫁於某一男子，因爲嫌她的丈夫容貌醜陋，使她時常的感覺得『彩鳳隨鴉』的痛苦！由痛苦而生憤恨，並且在憤恨之際卽發生殘殺的動機。最後，同她的丈夫寢於田舍，便懷刀向其猛斫，結果，并沒有殺死她的丈夫，而僅僅的砍斷他一個指頭。她在家庭慘劇發生以後：立卽向政府去自首；王安石對於此案認爲殺傷自首依律可以從減，而司馬光，富弼，文彥博們則認爲這是謀殺，非嚴懲不可！其實，在這點上卽可看出

一方面如（王安石）之尊重個性，別一方面（司馬光富弼文彥博）則過分的側重於倫理。

在理論決鬥的場裏，蘇轍對於「青苗法」又來發表他的意見，他說：「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能逾限，如此，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繁矣。……」（見前揭書）他爲什麼反對「青苗法」呢？很顯然的是由於受地主高利貸資本意識之決定。理論鬥爭的陣容既然展開，而司馬光也不顧一切公開的在皇帝面前逞其辭鋒和他的敵人（變法派）作戰；他說：「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至今猶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

這是司馬光反駁變法的意見。

可是呂惠卿對於司馬光的意見又加以反駁：「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君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也。」但司馬光對於呂惠卿的話又作如下的解釋和反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同時，他又說明「青苗法」的弊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恐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太宗平河東，立

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

這一場爭論，並沒有動搖皇帝變法的信心，換句話說，仍是王安石的勝利。

青苗法是動搖地主和高利貸資本在農村剝削農民的基礎，當然，它的施行一定會遭接二連三的反對；如韓琦說：『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幷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列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

關於反對變法的理論，在當時完全爲王安石所駁倒，甚至於說，在羣衆中大部份擁護變法的意見，那些落後人們處在這種情況之下，誠然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想。可是，這時候來了一位技術人材的鄭俠，它對於攻擊變法運動可算是一枝生力軍。他把因年歲飢荒而逃亡的農民生活，加以有力的描寫，繪成一幅包括農民飧風宿露賣兒鬻女的「流民圖」，它並且指斥農民流亡的原因是由於王安石的變法。這一幅圖畫勝過那班所謂知名之士的洋洋數千言的奏疏，使皇帝有深刻的感動，使皇帝『寢不能寐』的要修改變法的主張；據說這幅圖畫很有藝術的價值，那繪聲繪色的表情，的確能給

一般人們以非常刺激的暗示。

## (六)王安石變法的新評價

王安石變法雖然經過長時期的實施，并且還獲得相當的效果，但其結果在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不能保證其必然的勝利，因爲澈底的實行王安石變法的主張，是會起到反對統治者自己本階級的利益。同時，地主高利貸資本之對於變法的仇視和多方面的進攻，也是使它不能繼續的澈底的施行；所以當神宗皇帝逝世以後，那班守舊人們遂利用此種機會把過去王安石一切變法的主張都推翻得乾乾淨淨，而歷史上有名的王安石的變法運動亦從此壽終正寢了！

不過，關於王安石變法的評價，是人言人殊，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適當的批評；很多人們都是這樣的說：王安石的變法，是『標新立奇』和『好勝矜奇』並沒有含着什麼嚴重的政治意味，而他一切的主張都是『功利』出發，掠奪人民的財富，這不是政治家的行爲；他一方而追述古人，而一方又『謬解經典』，所以他的變法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同樣，那班向『左』跳的朋友，雖極端反對此種見解，但是自己的理論又陷入於不可原恕的幼稚的錯誤；他們認爲王安石的變法計劃就是社會主義的實施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世界革命運動史上

並沒有從上而下的『社會主義』的運動，如果眞有此種運動，也決不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的運動。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商業高利貸資本和農民暴動的交流中逼迫出來的；他一方企圖遏止高利貸資本之狂瀾，而一方又去改善農村經濟組織以及從政治上去防止和鎭壓農民的叛亂，實是『一箭雙鵰』的政策。

這種政策充分的暴露了商業資產階級左翼智識份子的幻想，顯示了異常濃厚的改良主義的色彩，他的眞正的作用，並沒有革命的酵母，僅僅是暫時帶一些刺激性而麻醉羣衆的意識！但是，欺騙羣衆之改良的面具，一直到十九世紀才最後受科學的社會主義宣告牠的死刑！我們從王安石變法運動的失敗當中，堅決的相信：中國現在的改良主義要想求到他和平的發展，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一切留戀於改良運動的人們！快點回頭吧！因爲在這條路上已經豎起了一塊很大的警告牌，上面寫着四個大字：『此路不通』！

## 第六節　元代農民戰爭

### (一)登峯造極的商業資本

『元代統治的時候，亦卽是中國經濟發展最高的時候！』

拉狄克在他所著中國革命運動史中關於元代經濟分析的結論，曾經是這樣的肯定。

蒙古民族乘着宋朝統治衰弱的時候，以遊牧民族的資格一方面代替宋朝的統治，另一方面又以種種的方式——極端的反動和相當的改良欺騙——屈伏了農民。在表面上，這一統治的民族——蒙古民族，牠們是過慣了遊牧的生活，牠們入主中華彷彿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其實，問題不是這樣的簡單，因爲祗要能夠征服人民，統治階級是不擇任何的手段；所以，當蒙古人入主中國的時候，牠爲的要適應於中國正在發展的商業資本；因此，便不惜與中國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互相提攜，以鞏固這一開始建立的政權。當時，經濟發展的根本路線，就是市場範圍的擴大，蒙古民族佈滿了整個的亞洲；所有中國一切手工作坊以及農產品——特別是絲和茶，都是經過蒙古人的手而推銷到中國國境以外，換一句話說，全亞洲的財富都集中在蒙古人的手裏。

這種經濟發展的觸鬚，首先便表示於國際貿易；

『自世祖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麤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廻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

（(一)元史卷九十四食貨志第十頁）

這是首先敍述元朝自入關以來卽注意於南中國之海上貿易。但是，經過戰爭以後，宋代統治的崩壞，南中國海上貿易的市場，不免受着相當的影響，因此，統治階級便積極努力於海外貿易的恢復：

「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忙古䚟領之。立市舶三於慶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廻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見前揭書）可是，事隔一年，才更明白的規定與南海諸國互市交通的計劃：「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八月，詔行中書省唆都，蒲壽庚等曰：「諸蕃國列居東南島砦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見元史卷十世祖本紀）並且，推定唆都全權負責處理國際貿易的任務：「帝（世祖）以江南旣定，將有事於海外。陞（唆都）左丞，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同前書卷一百二十九唆都傳）

同時，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還發明一種海關稅則——卽「雙抽」「單抽」的制度，所謂「雙抽」者卽是徵收外國商品以相當的稅額，「單抽」則係指中國商品出口而言。因爲國際貿易的收入，是當時公共收入的大宗，所以統治者——皇帝亦逐漸採取集中的政策，以預防臣僚們的壟斷。如：「（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設市舶都轉運使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番爲賈。犯者罪

之，仍藉其家產之半！』（元史卷九十四食貨志）並且，還規定『金銀銅鐵』以及『男女人口』不准私販入番。

關於當時最大的國際貿易港，仍然要推泉州爲第一；甚之，從泉州市場的繁盛和重要，我們就可以推測到元代經濟發展到商業資本最高峯的程度，並不是騙人的誑語。如元史卷二百十外夷傳爪哇條云：『至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同書馬八兒條也說：『海外諸番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自其國約十萬里。』很明顯的，有元一代，泉州爲與南海諸國交通互市的主要門戶，我想這樣說法不會引起人們的反對吧?!

有一位意大利的商人——馬可普羅在他的遊記上面說得好：『凡印度之貿易船，來泉州入港者極衆，且輸入香料及其他高價之物品；中國南方商人多來集於此，凡由外國輸入中國之大宗寶石真珠及其他貨物，均籍彼等之手，分布於南中國一帶。余敢斷言：如供給耶穌教各種貨物之亞歷山大里亞及其他諸港，僅可駛入胡椒船一艘，而泉州之港，則雖百艘或百艘以上之胡椒船，亦可駛入之也。此港誠可稱爲世界最大貿易港之一焉。』（見馬可普羅記行二百三十四頁——三十五頁）同時，易逢巴圖塔更說：『泉州誠世界最大港之一。或逕稱爲世界唯之最大港亦無不可也。余曾目睹有大帆船百艘，幅輳其地，至於其他小船，則更不可勝數矣！』（見易逢巴圖塔記行第四百二十二頁）

馬可普羅不但很忠實的敍述泉州之國際貿易的繁盛，并且他還說明當時中國一般的經濟發展的情形。他說：「一切的人民到處都願意接受這種紙幣，因為他們不論到那裏，無論購買什麼東西商品，珍珠，寶石，金銀等——都可以拿紙幣付價。紙幣可以購買一切的東西，牠也可以支付一切。」元朝經濟的發展，使這位遊歷的意大利人——馬可普羅異常的驚訝，因為他數不清中國商業的都市，他不知道商品流通量與商業的種類。他在描寫山東兗州府的城市說：「這裏的商人都是富有的！他們貿易的繁盛，他們的絲織品真多極了！這裏有十一個城市，都是富有美麗的與進款浩大的，他們儲藏着計算不清的絲織品。」

本來事實就是這樣，並不是馬可普羅誇人其辭啊！

商業資本牠本身雖有很高度的發展，可是這個發展因為缺乏「蒸汽機」的發明，是不能夠渡到產業革命的階段；同時，生產技術又沒有積極的改革，所以，這個歷史的過程——商業資本——此時也駐足不前而停滯起來！

但另一方社會勞動力之無限制浪廢，社會上的財富都為統治階級耗廢於享樂的奢侈生活之中，而不能創造重複生產的價值，因此，必然的要引起這個社會本身內在的矛盾——經濟危機！

## (二)經濟的危機

有些人以爲元朝經濟的危機主要的是暴露於它的財政政策，即是說國家壟斷了一切的財富（王桐齡——中國史）。其實，這種說法，不僅是含混模糊，並且是充滿了矛盾的精神；因爲經濟危機是一回事，國家壟斷財富又是一回事；政府對於一切財富的壟斷這並不是表示牠在經濟上發生了什麼嚴重的危機，而經濟的危機也不一定由於國家對於財政的壟斷？

什麼是元朝經濟危機之具體的表徵呢？

我們所見到的首先是貨幣制度的混亂和紙幣價格的低落。關於貨幣制度混亂的情形，據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所載是異常的明顯：在元世祖中統元年，始明白規定交鈔制度，以絲爲本位，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一切商品的價格，都依絲爲比例；即是說某種商品的數量若干，等於絲鈔若干。在同年十月又造所謂『中統元寶』鈔的輔幣，以流通於各地；於至元十二年更添造『釐鈔』，即是說此種『釐鈔』乃爲輔幣之輔幣。至元二十四年更改造『至元鈔』，至至大二年又以『至大銀鈔』來代替過去一切的幣制。統治者爲什麼要時常變更幣制呢？據左司都事——武祺的意見以爲：『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

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僞鈔滋多。」（元史卷九十七食貨志第二頁）同時吏部上書偰哲篤更補充他的意見：「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而錢爲子。」（同上）由此，我們看出統治者變更幣制的原因係根據於「僞鈔滋多，不與轉撥致民間流轉者少」的兩個條件，但是呂思誠對於他們的主張又加以反駁：「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爲子，是終爲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爲父而以銅爲過房兒子者乎?!」「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至元鈔非僞，人爲僞耳，交鈔若出，亦有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反滋之耳?!」（見同上）

可是這樣的反對，並未能使皇帝同情他的意見，空留一場爭論的痕跡而已。貨幣制度既然是如此的混亂，那麼，在社會上所得的結果我們是可以推測的。如因紙幣混亂的影響使紙幣的價格不能保持均衡，而人民亦時常有紙幣價格「一落千丈」的感想以致不敢接受，而引起物價的高昂，一般社會人民生活費的指數，竟超出經常數十倍以上。況且，以後因軍需的供給和賞賜與犒勞在在都需要大批的款項，故每日加工印造這些不兌現的紙幣，以流佈於一般社會中間，最後的結果，市場上對於這些不

兌現的紙幣加以堅決的拒絕，甯願以物貨相貿易，無論票面數額多寡，人們都以爲是不值一顧而視若廢紙。

## (三)土地與農民

經濟的危機當然會給農村經濟以很大的影響，但農民們認爲與他們有休戚相關生死存亡的仍然是爲土地問題。蒙古人他們是過慣了遊牧民族的生活，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和土地問題，彷彿是不會注意的；其實，這種推想是沒有根據的。當蒙古民族入關的時候，牠們見到中原有很肥沃的土地，物產是異常的豐富，如果不適應這種經濟發展的階段，固然是不能在羣衆身上搾取更多的膏血，就是自己的統治也是很難於長期的穩定。所以元朝統治者入關的時候，看到中都田野久荒而兵後無牛可耕，馬上即在盧溝橋抽回大批的軍牛以分給農民；要他們即時耕種，不要任肥沃的田園趨於自然的荒蕪。在元世祖的時候，他特別的注意於農村經濟，曾經屢次的頒佈妨害農村經濟的禁令：如禁止諸道的戍兵以及豪富之家之毫無限制的放縱畜牧，以免侵犯桑棗及禾嫁的田園；同時，更嚴戒蒙古軍人不要以中原民田爲牧地，如果違抗這個禁令，就要加以嚴重的處罰。幷且，他另一方面更勸諭僧道，以及尹囉勒昆達實密人從事於農田的耕種，甚至在至元七年，還頒佈一種所謂『農桑』制度：

「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年高曉農事者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一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姓名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病災者多，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教之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及蒔，蓮，藕，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給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見元史卷九十食貨志第二——三頁）

除此而外，更排斥於農民田地中進行芻牧的工作，認爲秋耕與土地施肥是提高農村生產量的唯一的辦法。他爲見好（實際是欺騙）於農民起見，還做了以下一些改良工作：

『（至元）十三年十二月詔：「凡軍將校及宋官吏有以勢力奪民田廬產業者，各還本主；無主則以給附近之無生產者」。』

『（至正）十五年八月詔諭：「凡軍民官毋得占據民產」。』

『十七年十二月勅：「擅據江南逃亡民田者，有罪」！』

『十九年四月勅：「罷阿哈馬特佔據民田給還其主」！』

二十二年勅：「權貴所占田土，量給各戶」！』（以上統見續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第五頁）

雖然，像這樣表面上彷彿代表農民利益的話曾五合三中的頒佈過不止幾次，可是，結果僅僅是紙上空談，終敵不過貴族官僚以及地主高利貸資本之頑強的反抗。所謂行臺待御史——程文海，他首先把官吏剝削農民的事情向皇帝申述：『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尙書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同前揭書）但是，他關於貴族官僚以及地主高利貸資本之剝削農民的土地的程度，未免言之不詳，於是乎更有所謂『東平布衣』的趙天麟，他上皇帝一篇文章——名叫太平金鏡策，更詳盡的敍述和分析農村中貴族官僚地主豪紳之強佔

農民土地的程度及其佔有的原因，同時，並提出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對策。他說：

『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枉爲，靡所不至。貧家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於死亡，荊楚之域，至有傭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家兼倂故也。方今之務，莫如復井田，尙恐驟然騷動天下，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幾百頃；巨族官民之家，限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爲主，凡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第一年免租稅，次年減半，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制有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以下俱以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恆產，官足養廉！如是行之五十年後，井田可復興矣！』（見續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第六頁）

他在敍述農民土地被官僚地主強佔的這一點，固然是很忠實的描寫，可以刺擊貴族豪紳的心胸，但是，他的結論則又掉過頭去迴想那渺茫無稽的所謂『井田』的制度，未免離題太遠吧?!誠然，死灰未嘗不可復燃，可惜中國歷史上並沒有這樣一種所謂『井田』制度的餘燼啊！

文不對題，無怪乎統治者對此意見之未予採納，而另闢途逕轉其他的念頭：『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由多隱腴田，若行檢覈法，當益田畝累萬計」。』此種『檢覈法』，很顯然的是地主豪紳分肥的計劃，在未執行此種計劃以先，無豪紳地主的代言人——吳元珪首先就要激烈的反對。他說：『江南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但有所謂平章的張律，又給吳元珪的意見以迎頭痛擊：『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拆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衛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均從實自首，庶幾歲入無隱，差徭亦均。』這議論在表面上彷彿是堂堂之鼓振振之旗，所以皇帝便根據他的意見做成如下的結論：『限民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佔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田主及管幹田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畝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爲查勘致有漏脫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見同上書）像這樣的解決土地問題，實際上祇是與地主貴族官僚高利貸資本分肥，並未給農民以絲毫利益。

因此，在元朝的土地政策下面並沒有解放農民，反之，農民要求得本身之澈底的解放，祇有堅決的爲獲得土地而鬥爭！

舊的土地制度，等於套在農民身上的枷鎖！

## （四）農民身上的幾重鐐銬

土地問題固然是農民身上主要的枷鎖，但是，除掉這個枷鎖而外，更有其他的許多的鐐銬。

第一，種族上的壓迫，使戰勝民族——蒙古民族與戰敗民族——漢族——彼此互相仇視的程度達到空前的狀態，換句話說，蒙古民族對漢人的摧殘是無所不用其極！如牠乘戰勝的餘威，不僅剝削了一般人民參加政權的資格（當然，少數上層的漢人，因爲做牠的走狗，做牠更活潑更熟悉的欺騙民衆的工具，不成問題的牠會給這類人披上一重所謂『官』的外衣——著者），如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元年（一九七年）四月條云：『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甚至，還把當時所有的民族，區分爲四個階層；A蒙古人；B『色目』人（包括西藏及歐洲各民族份子）；C漢人（包括契丹，女眞及黃河流域人）；D南人（卽宋人）。凡是負稍爲重要責任的官吏，都是以蒙古人充當，而漢人彷彿是這個舞台上的配角而已！此種情形，明朝人葉子奇他說得非常詳盡：『（元朝）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爲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爲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見草木子卷三上克漢篇）并且，就是這卑小的小官

與他同僚的蒙古人，都沒有什麼平等可言；所謂『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這并不是故意刻薄的描寫。當蒙古人，色目人勢力全盛的時候，他們紛紛的移居到南中國富庶之區，如『今回回皆以中原爲家，江南尤多。』（見元朝人周密著：癸辛雜識續集）因此，鄭所南也說：『（韃人視）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江南。』（見心史大義略敍）最後，江南的財富幾爲蒙古人搜括殆盡，所以韓山童暴動的討元檄中，也曾抓住這個問題去鼓動農民：『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草木子卷三上克漢篇）

本來，戰勝民族之壓迫戰敗的民族，在世界史上是經常的現象，并不是什麼希罕的事情；如蒙古民族之表現比任何戰勝民族爲複雜，的確是一個奇蹟。牠壓迫戰敗的民族，並不僅僅限於上述的數點，更進一步的去防止這些戰敗民族的叛亂；如世祖至元三年曾頒佈過沒收漢人，南人，高麗人的軍器和馬匹，甚而至於服裝的顏色與日常生活所需用的器皿與夫民間乘坐輿馬都有一定的限制。最後，民族間的仇視竟達到駭人聞聽的程度！如順帝五年十二月，丞相伯顏竟有這樣的建議：『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元史卷三十九順帝本紀第五頁）這個建議雖然經皇帝給他以否決，但是一般漢人已經是『唇亡齒寒』而人人自危了，尤其是當時一般宋朝的遺民，更爲憤慨，曾唱出『復國』的詩歌：『縱遇聖明始堯舜，畢竟不是眞父母，千言萬語只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

這些歌謠，在表面上彷彿是不會動搖統治階級的社會，可是，牠在一般社會中間已經煽起了民族革命的火焰！

第二，宗教的壓迫——即喇嘛的壓迫，也是當時農民頭上的一道緊箍。喇嘛在社會上之所以成爲一種壓迫農民勢力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係由於統治階級——蒙古人之迷信宗教，而另一方面喇嘛們又授統治者以男女性交關係的秘密；如授順帝以『延徹爾』（舊作『演揲兒』華言『大快樂』即房中運氣之術）法以及所謂『善祕密法』（亦名雙修法），在喇嘛的指導之下，統治階級不知強姦了多少青年婦女！由此，喇嘛更得着統治階級的寵暱。這寵暱喇嘛的具體事實，便是以詔令來保他們的安全：『自今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我們從這兩句話當中，關於喇嘛在社會上的特權是可想而知了！這些喇嘛們往往掛着金字圓符，往來於西藏和中國之間，每到一個地方，不僅是那班慣於逢迎的地方官吏殷勤的在着照料他們，給他們以很精緻的館舍居住，甚而至於他們還擅入民家作那些尋花問柳的勾當；驅逐農民家中的男子，成羣結隊去強姦婦女，以宣洩他們的獸慾！

最討厭的，莫過於那時所謂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眞珈），他是任意的戕殺農民，他爲的要解決性慾問題竹擄過大批美麗的青年婦女，同時，更掠刼了人民很多的財富與寶物。中國的地主豪紳以及高利貸資本對於這位魔王不惜卑躬屈膝的與他勾結，共同的去強佔農民的土地。

其次，還有一些數說不淸的苛捐雜稅，據食貨志所載共有三十二種，農民處在這種環境之下，誠然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被壓迫的農民們，在當時如果要求得自己澈底的解放，祇有摧碎統治階後架在他們身上的架鎖和解除這一些附帶的鐐銬！并且，當時的客觀環境已經爲他們埋伏了這個可能。

樸列哈諾夫說：「突變是漸變的前提，而漸變必然會走到突變！」

警鐘響了！現在已經是突變的時期了！

鬬爭的序幕展開了，各階級都在奏着交響樂，歷史又要預演一幕悲喜劇！！

(五)上層築物的崩潰

歷史上凡是一種革命運動，牠的醞釀，生長和爆發，都要經過一個特定的過程，卽是說，產生這個運動必然有牠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因素，絕對不是什麽突如其來的行動。因此，關於元朝統治的顚覆，在很久以前的一般社會生活中間已經埋藏了這個顚覆的前提，換句話說，如廣大的被壓迫的農民羣衆因不堪蒙古人鐵蹄蹂躪之下的生活，已經準備厮殺，統治階級自身因經濟的危機，所以發展其統治的前途也是異常的困難，在這兩個條件之下，農民們揭起「鋤頭鐮刀」來反對站在他們脊背上面

跳舞的蒙古人，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啊！

『順帝三年正月，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石昆山，鍾大明率衆從之，僞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元史卷三十九順帝本紀第三頁）

這是農民暴動的一個號炮！

這個號炮發出去，在羣衆中經過五年之久才得着巨大的囘聲：台州方國珍的暴動！方國珍他以販鹽浮海爲業，因爲政府指其通寇，遂入海糾合羣衆與統治階級對抗，當時他曾經戰敗了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並生擒這一壓迫農民暴動的罪魁！暴動的第二天，牠就使統治階級異常的驚訝：如監察御史——張禎言：『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閫師敢於玩寇，若不鎮舉，恐有唐末藩鎭噬臍之禍。』（御批通鑑輯覽卷九十八第二十九頁）可是，這農民暴動又因種種關係竟使暴動如缺乏與其他各地農民的聯系，一時不能求得很大的發展，而令農民暴動的伏流又延長了三年之久，一直到順帝十一年才匯合而成爲一個軒然大波！這個年頭，災荒迭見，水旱頻仍，統治者仍聚集二十萬山東飢民來開黃河故道，要他們做無報酬的勞動，這也是暴動擴大的一個原因！

被壓迫的農民們，果係如綿羊一般的馴伏嗎？不！他們已經拿着『鋤頭鐮刀』反上皇帝的『金鑾殿』，甚之，他們自己還要創造一個『金鑾殿』呢！而韓山童就是這次反上『金鑾殿』的領導者。按

韓山童他是欒城（河北欒城縣）人，自他祖父以來，即從事於『白蓮會』——祕密結社的組織，後來因其有燒香惑衆的嫌疑，爲政府處罰謫徙於永平。迨至韓山童達到成人的年齡，他目覩元朝統治的腐敗與農民羣衆的疾苦，而感覺得要解决這些問題，只有推翻統治階級。他根據這感覺，於是便倡言天下大亂，那所謂『彌勒佛已經下降』的謠傳，竟在河南及江淮一帶落後的農民中間起了很大的影響；這些農民認爲自己的痛苦祇有上天——菩薩知道，彷彿菩薩是救苦救難的主宰，牠必然會指示被壓迫者一條光明的道路。這時期韓山童的黨人——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更進一步的向農民宣傳；他們說韓山童是宋徽宗的第八世孫，應當爲中國的主人，在暴動的過程中，於是乎他們便糾合農民屠宰烏牛白馬做盟告天地的儀式，預約以紅巾爲號來共同的推翻統治階級，可惜事機不密，竟爲統治者覺察，在未發動以先，韓山童已被統治者處以極刑。但是羣衆已經起來，他們的行動并不因領袖犧牲而中止，反之恰如狂風暴雨一般似的向統治階級逼來，以十餘萬農民之雄壯的聲勢，連克名城！最後，他們竟建立臨時的政權：『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大淸宮材建宮闕 遵道等各遣子入侍 』（元史卷四十四順帝本紀第二頁）

與劉福通同時并起的，還有蕭縣人李二（號芝蔴李）以及羅田人徐壽輝，他們都以燒香的方式來領導農民鬬爭，而當時的聲勢亦復與劉福通不相仲伯；因爲徐州及蘄水黃州一帶，都給他們所佔有。最奇怪的，這些暴動的軍隊都以「紅巾」爲號，因此，社會上一般人們都稱他們爲「紅軍」（這個紅軍并不是現在中國農村中間正在發生的所謂「紅軍」，讀者諸君希不要誤會——著者）。從整個農民暴動的營陣裏，更產生了好幾枝新的隊伍：如郭子興在濠州糾合農民羣衆與統治階級對壘，泰州張士誠以爲人賤視的鹽販的資格進據高郵；并且，在這些隊伍裏面還煅煉出一位未來的統治者——朱元璋。

這位未來的統治者——朱元璋的身世，是非常的值得我們注意，因爲在他過去的身世當中，就可以確定他於跨進政治舞台以後，對於農民生活的改良。當他十七歲的時候，那一年正值大饑疫的年頭，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哥哥都在饑疫當中犧牲了生命，家庭的變故使得他孤苦無依！在這種環境之下，曾逼得他祗有到皇覺寺去，「摩頂受戒」，否則，便不能遊食四方來維持其生活。後來他看到當時社會外形漸漸失去了過去統治的作用，歷史已經替牠嵌上了死滅的象徵。適值郭子興與所領導的農民暴動於這時佔據了濠州，於是他便效班定遠的故事而投筆從戎，以戰袍來代替「袈裟」，脫離了「清磬木魚」的寂寞工作，而積極的參加農民戰爭之火與血的生活。以後，他和郭子興因政見不同，遂分開戰線與徐達湯和等獨樹一幟。

當時暴動的隊伍是非常的複雜，而暴動的地域也是非的廣泛，玆將此種情形列如下表：

| 暴動的領袖 | 暴動佔據的區域 | 名稱 |
| --- | --- | --- |
| 朱光卿 | 廣東增城 | 大金 |
| 方國珍 | 浙江溫台慶元三郡 | |
| 韓林兒 | 淮北 | |
| 劉福通 | 河南 | 宋帝 |
| 李二 | 徐州 | |
| 趙均用 | 初據徐州後據濠州 | |
| 徐壽輝 | 湖北，江西 | 天完帝 |
| 陳友諒 | 湖北，江西，安徽 | 漢帝 |
| 郭子興 | 濠州 | |
| 朱元璋 | 安徽，江蘇，浙江 | 吳王 |
| 張士誠 | 江蘇北部，南部，浙江西部 | 吳王 |
| 明玉珍 | 四川 | 夏帝 |

在整個的反統治階級農民戰爭過程中，這些領袖不成問題的都是一些『英雄』式的領導。因此，內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張士誠之吞併了遺民復國的韓林兒，陳友諒之刼掠徐壽輝等等事實，充分的反映了農民戰爭的特殊性。像這樣的紛崩離析的結果，祇有讓朱元璋獨吞革命的果實。

爲什麼朱元璋能夠獨吞元朝農民革命的果實；這不是一個奇蹟嗎？其實，我們如果詳細的考查其動因，那麼，這實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第一點，當其他許多農民隊伍，因爲長時期的游擊戰爭累得他們精神上非常的疲乏，而朱元璋恰乘人們疲乏之餘方才崛起，尤其是他的參加作戰的農民羣衆，與生產關係脫離未久，所以，他這枝隊伍幷未消蝕了革命的鋒芒！第二點，他在政治上能夠樹起民族革命的旗幟，幷拿這旗幟來號召廣大的農民。如他於吳元年（一三六七年）諭北中國檄說：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見皇明通紀卷二）

第三點，他所代表的經濟基礎，是比較一般人們堅固；如建都金陵，即是抓住了當時經濟中心的表示，不僅因金陵是東南財富之區的喉嚨，同時，在這裏他還可以找到新的靠山——發展到高度的高利貸商業資本，以做其建設政權的起點；因此他很順利的屈伏和消滅了過去的同盟者與友軍。

雖然，朱元璋政權形成的根本路線，是依靠農民暴動的浪濤，廣大的被壓迫的農民用鋤頭和鐮刀替他殺開一條到政權的血路，使他毫無阻礙的走上政治舞台！但是，他建立政權的第二天，因爲階級利益的衝突，就與被壓迫的農民隔離了，幷且，還變成另一階級壓迫農民的工具。

## 第七節　明朝的農民戰爭

### (一)摩撫農民暴動的創傷

朱元璋他乘着農民大革命的浪濤奪得了統治人民的寶座，這幷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們在上面已經指明過他有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他在經濟上抓住了東南財富之區的喉嚨——金陵，依據這個區域及其經濟基礎來反對其他的一切；第二，他在政治上掛起了民族革命的招牌，比較一般人們更容易發展其暴動的影響；第三，對農民暴動的同盟者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這些都是他獨吞農民革命果實的原因。

但是，他在羣衆的面前幷未公開的暴露這些祕密，甚之，還把事實的眞相隱瞞起來，將自己裝成一種吊民伐罪的神聖模樣；他說：「元政潰擾，干戈蜂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士吾

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民！」（明史卷一太祖本紀）并且，他爲市儈民心起見，更相當的給農民以減輕苛捐雜稅的機會：「東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憫之，且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煩勞久矣！今比戶空虛，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將何以堪！其賜太平田租二年，應天，鎮口，甯國，廣德各一年。」（見同上）他也深深的感覺得如果不擴大對農民改良的影響與範圍，那麼，過去農民暴動恐怖的象徵，始終是精神上的創傷；爲摩撫這些創傷起見，不得不在一切政策的決定上允分的給農民以改良的機會，以麻痺他們的意識。故於洪武五年五月下詔說：「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爲人奴隸者，復其民；凍餒者，里中富室假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毋失所；鄉黨論齒相見，拜揖毋違禮；婚姻毋論財；喪事稱家有無，毋惑陰陽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復業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爲限；僧道齋醮，雜男女，恣飲食，有司嚴治之；閩粵豪家，毋閹人子爲火者，犯者抵罪！」（見明史卷二太祖本紀）在這詔令中間，很顯然的關於改良農民生活已逐漸趨向於具體化，就是說，朱元璋的政策已經與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接觸。

他除掉在這一方面直接的對農民作一些改良工作如復奴隸爲平民，要地主高利貸資本貸款對於凍餒的平民使他們脫離飢寒交迫的狀態，很嚴厲打擊所謂閩粵豪家而外，更企圖以政治力量去遏制國際貿易；他以爲國際貿易港口的開闢與擴大，間接的就是農民膏血的外流，所以他對於外國商人企圖恢

復通商關係的時候，曾加以嚴厲的拒絕：如『占城，三佛齊，暹邏，爪哇，眞臘入貢，高麗使五至，以嗣王（？）未立却之！』又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占城，爪哇，暹邏，日本，安南，高麗入貢，高麗貢黃金百斤，白金萬兩，以不如約却之！』（以上統見明史卷二太祖本紀）他在拒絕和外國貿易的第三個年頭——即洪武十五年，有廣平府吏——王允道請開磁州鐵冶以發展當時的手工工業和增加國家的收入，而朱元璋認爲這個建設同樣的是妨障他的改良農民生活的實施；因此，他的回答說：『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未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而民業已定，無益於國，且重擾民!!』結果，給王允道以嚴重的處罰——『杖之，流嶺南！』（明史卷三太祖本紀）

自從堅決的處罰了王允道以後，再也沒有一個人在朱元璋發表反對改良農民生活的意見，而朱元璋的主張，也是一帆風順似的貫澈下去；如他於洪武十九年六月復繼續的下詔：『有司存問年高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同上書）最後，他又變更農村組織的系統：『戶部編民，百戶爲里；婚姻死喪疾病患難，里中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耕秋穫，通力合作，以教民睦！』（同上書）他以爲這樣的變更了農村組織，便可以使農民生活安定，而自己的統治亦可長治久安！

同時，他更積極的注意於農村經濟的整理，更認爲灌溉是農村經濟之骨幹，所以經常的派員修理

黃河，運河，淮河，洳河，衞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乾河，膠萊河的水利，以發展中國的農村經濟。

可是，他在另外一方面爲要在思想上鎮壓農民暴動，又復承認蒙古人的統治爲合理。他說：「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流離相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毋肆焚掠妄殺，元人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赦！」同時，他又想羅致那班爲農民暴動所嚇跑的士大夫——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代表，於是乎又下所謂求賢之詔：「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岩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見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矛盾的圈，終於套住了統治階級的手足。換句話說，統治階級之左手拉農民右手拉地主的勾當，畢竟是不能同時舉行，如果能夠同時舉行的話，那麼，歷史上眞會有如郭沫若先生所說的超階級的政權了！這些矛盾之具體表現的地方，首先便是土地問題。

## （二）明朝的土地制度

土地的佔有在明朝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官田」；在官田的內部包括很多種類：1舊有的官田；這種官田是從宋元以來遺留下來的，於官田中佔很大的數量。2還官田；即是前一時代貴族豪紳的莊園，因為牠的主人隨朝代而沒落，其土地即付還於公家，而一般人們對於這類的土地便稱為還官田。3沒官田：所謂沒官田者，即人民犯罪後由政府所沒收的土地。4絕斷入官田：這類土地，因為牠的主人戶口斷絕，沒有繼承的人以從事耕種，最後為政府所沒收。5學田：此類土地據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說：「天下郡縣並建學校，帝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凡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以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以後，對於此種學田更加以明確的決定：「詔為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見續文獻通考卷六田賦考）6皇莊及皇族勳舊賜田。7牧馬草場地。8城壖苜蓿地。9園陵墳地。10公占隙地。

在各種官田佔有的形式中間，最重要的莫如皇莊及皇族勳舊賜田；當朱元璋統治的時候，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的莊田多者百頃，至少亦七八十頃，其賜親王莊田嘗有千頃之多！以後，到神宗時代，

每一莊所佔有土地的面積，有達兩萬頃之多，尤其是在福王分封的時候，搜刮河南，山東，湖廣的土地以爲皇莊的事實，僅就他一個人而論，竟達四萬頃之多！皇莊之佔侵農民的土地，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不僅是農民對於此制度之怨聲載道，就是政府的內部也是議論紛紜。反對此種制度的首先是刑部郎中——彭韶，他向憲宗皇帝說：『眞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卽爲恆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同時，李森亦繼彭韶以後來發表他的意見：『先朝勅皇親強佔軍民田者，罪無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宏奏絕權貴，請乞，亦旣俯從，乃外戚周彧，求武強武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淸地三百餘頃，詔皆許之，何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甸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尙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請，實豪奪而已！』（見同上書）

這班貴族，不僅掠奪農民現有的熟田，就是黃河淤塞的土地，他們也思染指；如河南吏部侍郎——原傑說：『黃河遷決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就淤墾種，今姦徒指爲閑場屯地，獻王府邀賞，王府輒據而有之。請自今獻者謫戍，幷罪受獻者。』可是這種申請，統治階級對之等於春風過耳，牠幷沒有遏制貴族們侵佔農田的潮流。因此，在孝宗弘治二年，戶部上書——李敏，他便很詳細的調查了貴族

官僚之佔據農民田地的面積：畿內皇莊有五，其他一萬二千八百餘頃；管莊官校，召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斂財物，稍與分辯，輒被誣奏，民心傷痛入骨！」李敏說五個皇莊，侵佔農民土地已經達一萬二千八百餘頃，我們看這個統計的數目大概不至於誇大失實吧！

關於莊田制度之來源及其剝削農民之具體的情形，最好我們可以參看夏言的奏疏：

「各官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曹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佔過軍民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佔過民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年間侵佔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惟增寶抵縣王甫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衞草場；弘治間祇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八年十月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深兒溝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婆婆營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以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眞定府甯晉縣則有舖頭村皇莊，大劉莊皇莊，在降平縣則有大灰窰皇莊，在新河縣則有偃江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皇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所設也。又安東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淸縣則有灰燭口皇莊，五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

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七年則立武淸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一處，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衞河兩岸皇莊，靑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騆馬澗皇莊，淸苑縣閻莊社皇莊，九年則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討之旗校，有跟隨之名色，每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姦用事，朝廷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之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架搭橋樑，擅立關隘，出給票帖，私刻關防；凡民間撑駕舟車，牧放牛馬，采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近土地，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址，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頭莊，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掊克，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尙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十之八九矣！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今覩勅旨，猶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蓋謂今四海九州之賦貢，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非所以奉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非以奉重闈慈闈四宮乎?!祖宗以來，宮闈一切供用，自有成規，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畝之業，辱宮壼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

之利，其何以示天下以訓後世也哉？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姦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之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曰皇鹽；即此三言，足以傳笑天下，遺譏後世！仰惟陛下一切掃除，敕該部大臣查照臣等勘報文册，將在京附郭大興縣等地方各宮田莊，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改爲各宮親蠶廠公桑園名額，今有司種植桑根，以備宮中蠶事，其餘一應莊田盡弛以利民，或勘歸田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仍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則一洗四朝之積弊，永垂百代之體矣！」（續文獻通考卷六田賦考）

這奏疏，的確是比較詳盡的說明皇莊之來源及其佔據農田之額數與夫對農民剝削的真相，但是他不敢說出「土地歸農民」的話來，而結論僅僅是「勘歸戶部，造入版籍。」這樣當然是不能解決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所以，以後到了天啓六年對於貴族的賞賜莊田，更是有加無已！僅就魏宗賢一八而論，政府賜給他的地每次都有千頃之鉅！

綜觀上面關於皇莊田地的一材料，那麽，我們有權利可以說這制度是農民的死敵！（在明朝所謂官田，除上述十類而外，還包括了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軍民商屯田；這些土地，通常都謂之官田。——著者）

第二種形式便是民田。

明朝的初期，因爲經過元季廣大的農民暴動以後，關於農民土地佔有的形式，誠然是面目模糊而不可復識；洪武初年，政府曾派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去調查浙西的田畝，以便從這些土地上面去徵收賦稅，以後，復命戶部覈實天下的土地；可是兩浙的一般地主豪紳，因爲要避免徭役，往往以土地寄於他戶（此種行爲，俗稱鐵脚詭寄——著者），至洪武二十年，才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而定出區粮的制度；每區設粮長四人，一方面度量田畝的方圓，另一方面又記錄田主的姓名以及田畝之丈尺，彙編成册，第因爲其册形狀如魚鱗，所以卽稱爲「魚鱗圖册」。當時調查民田本有兩種表册，除了魚鱗册而外，還有所謂「黃册」，牠以紀載戶口賦役爲單位，牠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目，也可以說是魚鱗册的附册。而魚鱗册是以田土爲單位，如土地性質之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等各種性質，靡不詳載無遺。最初，這個政府，因爲在戰爭以後，田園荒蕪，所以關於民田是計民授田，要農民們努力去耕種和墾屯，甚至，政府還給以相當的農具及耕牛，并且，時常向農民做一些免租和免稅的鼓勵。以後凡民田以近郭爲上地，迤遠爲中地下地；其規定畝的面積，以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一百畝爲頃。

在這許多土地制度中間，還有一種「里社」制度；這制度雖是元朝的遺蹟，可是當時在河北諸州

縣仍是很普遍的存在：土著的農民，以社分里甲，移民屯墾的地方，以屯分里甲；凡是社民都有優先權去佔領田畝，所以社畝很廣，而屯民新佔的田畝則甚狹小，因此，以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但是，民田仍大部份操之於地主豪紳之手；據明史食貨志說：『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湘，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能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這論調誠然是針對着當時的實際情形！

其次，關於屯田，我們在這裏也要約略的說及，因爲牠實關聯於農民政府與政府的未來的鬥爭。查屯田制本係統治階級供給士兵餉糈的一種制度，在魏代曹孟德已經倡導於先，而朱元璋則集其大成於後；然朱元璋除掉軍屯而外更有民屯，換句話說，這就是他自詡爲寓兵於農的得策。此種制度確立的經濟原因，完全由於明朝政府調劑土地佔有的動機；牠將戶口繁殖之區的農民，移向荒僻的地方，一方面固然讓出許多土地於無地及土地很少的農民，而另一方面復可冀此調集大批的農去開闢那荒蕪的土地，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可是此種制度又發生牠內在的矛盾，即是說，政府的官僚要來直接掠奪這個地方，把一大羣勤苦的農民，趕出生產領域之外，使他們過着飢寒凍餓的生活。張獻忠李自成暴動的基礎是那裏來的呢？還不是很久以前的統治階級已經替他們安排好了的經濟矛盾嗎？

最後，與土地問題有密切聯系的賦役制度——即剝削農民的形態，我們也必須加以說明，否則，

對於未來的農民暴動的內容更使我們無從了解。明朝的政府，雖說是在農民暴動中產生出來，可是這個政府對於農民的剝削，並沒有澈底的廢除，反之，仍是繼續過去的方式。牠在土地問題上，認爲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換言之，就是每個農民都必需爲政府作無報酬的勞動，同時，還要經常的每年向政府繳納一定的租稅。故明朝的租稅制度是分兩期繳納，即是說有「夏稅」與「秋糧」：夏稅是以每年八月爲期，而秋糧之繳納也是無過於明年二月。並且，其徵收夏稅秋糧的形式，除掉繳納農產品如米，麥，絹，麥收，絲棉，荒絲，稅絲，棉花，苧布，土苧，米穀，棗子而外，更須交納錢鈔；這更顯示出商業資本在社會生活中所佔有的作用！當時交納租稅的標準，官田每畝五升三合，而民田則須交八升五合五勺。有所謂廣西布政使周幹者，他在巡視蘇常嘉湖諸府以後，關於農民之苦於賦稅的情形，曾有如下的談話：「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輒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乎？取盡則民必凍餒，欲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甯，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同時，顧鼎臣也向政府條陳錢糧在農村中間的積弊；他說：

「察理田糧舊額，請責州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等倣洪武正統間魚鱗風旗之式，編造圖册，細列元

額，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坍荒，成熟，步口數目，官為覆勘，分別界址，履畝檢踏丈量，具開墾改正豁除之數，刊刻成書，收貯官庫，給散里中，永為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立為定規，取每歲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幷處補暫徵，帶徵，停徵等件數目，會計已定，張榜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姦欺，而小民免賠累科擾之患！……催徵歲辦錢糧，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攙雜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扑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為空！弱者為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於箠楚囹圄者，幾數百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同上書）

他們雖然都是痛陳時弊，可是統治者對於他們的意見幷沒有表示首肯，說得確切的，大有認為是「事尚可行，容緩辦理」的神情。但賦稅制度之不良，在當時差不多成為白日經天的事實，因此，徐俊民便繼續顧鼎臣之後來發表他的主張：「今之田賦，有受地於官，歲供租稅者，謂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溝塍淹沒者，謂之坍江，有流移亡絕田棄糧存者，謂之事故。官田貧民佃種，畝入租三斗或五六斗

或一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十石或百餘者有之；夫民田之價，十倍官田，貧民旣不能置，而官田糧重，每病取盈，以坍江事故虛糧，又令攤納，追呼敲扑，歲無甯日，而姦富猾胥，方且詭寄那移，并輕分重，此小民疾苦，閭閻凋瘁，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請定均糧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官民田爲一，定上中下三則起科以均糧；富人不得過千畝，聽以百畝自給，其羨者則加輸邊稅，如此，則多寡有節，輕重適宜，貧富相安，公私俱足。」（見同上書）此種主張，實是企圖遏制當時正在發展的土地集中的趨勢，然結果統治者竟以各地民俗不同以作答覆的理由。

末了，關於租稅問題統治者因受各方的責難，爲應付這些責難和轉變羣衆的視線起見，於是，曾頒佈了一種所謂「一條鞭」的制度；這制度的眞實內容，據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所載爲：「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很顯明的，這種方式已經含有適應一般社會生活以及經濟發展的新的內容，把剝削農民的規模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切力役之征都代替以徵收貨幣的形式，而開後世賦稅折銀徵收的門戶。貨幣的作用，在社會的比重上一天天的增高其地位，而農民們的生活也是一天天的受着牠的控制而趨於劇烈破產的過程；當然，其他的剝削制度很多，不過，土地問題是一個主要的形式！

## (三)暴動的前夜

農民暴動之受一定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條件所決定，這是我們在上面屢次說及的；明朝的農民暴動，其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基於農民之不能忍受舊的土地制度之束縛，而積極的要求脫離牠的覊絆，換句話說，就是農民企圖完成土地革命的歷史的偉大任務。但是，在這暴動的前夜，關於一般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生活，需要我們加以詳細的說明，否則，如果抹煞了這些客觀的基礎，那麼，暴動的眞正面貌會因此而失掉牠的顯明性。

第一，經濟發展的階段，已經恢復到到元朝興盛的狀態。當然，在最初——特別是洪武初年的時期，他因爲與農民分離未久，在決定對農民政策的意識上，因爲受了農民暴動的威嚇，所以，關於經濟的發展，有一種遏制商業資本及手工業發展的企圖；異常顯明的，是朱元璋拒絕了外國商人對於國際貿易恢復的請求，以及嚴厲的懲罰呈請開礦的廣平府吏——王允道，并且，他還堅決的說：『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明史卷八十一食貨志）但是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進化，並不是某一個人所能遏止，何況商業高利貸資本之有力的要求呢?!所以，朱元璋很快的在社會生活的逼迫之下，不得不低下了他的強項，而恢復對於國際的貿易。國際貿易恢

復之表示於一般社會生活中間的，首先便是『市舶司』與『茶馬司』，這些帶國際貿易性的機關的建立；市舶司仍和前代一樣的處理海上的國際貿易，不過，以後把範圍擴大起來；并規定一般的通商口岸如太倉，上海，黃渡，甯波，泉州，廣州等處，以招徠外國的商人；建築很精緻的房屋以爲外國商人的館舍，如福建之『來遠館』，浙江之『安遠館』，廣東之『懷遠館』，這些都是海上外國商人的宿舍。其時，來中國海上貿易的國家很多，如日本，安南，朝鮮，琉球，呂宋，合貓里，美洛居，沙瑤吶嗶嘽，鷄籠，婆羅，麻葉甕，古麻剌朗，馮嘉施蘭，文郎馬神，占城，賓童龍，眞臘，暹邏，爪哇，蘇門答臘，和蘭，三佛齊，意大利，羅馬，錫蘭島等處，綜計不下四十餘國，其繁盛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並且，因爭奪中國的市場，曾引起日本和中國的戰爭；其戰爭的遠因，先是嘉靖二年，有日本商人的代表——宗設，宋素卿，彼此分道入貢，互爭通商的權利，而市舶中官——賴恩，因爲收受宋素卿的賄賂，便取消宗設在中國貿易的資格，而宗設便借此機會大掠甯波。自此以後，日本商人便自由貿易於中國沿海各地，同時那班貴族官僚更與外國商人互相勾結，把外國商人的貨物全部的購買下來，轉運各地銷售，以獲取更豐厚的利潤；但是，他們倚賴政治上的特權，曾企圖吞沒日本商人的貨款，因此，遂爆發了中日的海上戰爭。日本派來很多的軍艦向中國沿海各地進攻，其動機一半是爲過

去復仇，一半是乘此機會載來大批的商品向中國沿海各地兜售。

甚至，在這一個時期，因國際貿易發展的關係，東西文化也開始接觸，意大利人利瑪竇等來中國傳教，竭力介紹歐洲文化於中國；思想界之受其影響者，如上海（徐家匯）人徐光啓以及李之藻輩努力翻譯其學說，特別是天文學最受政府所歡迎。而明朝政府爲發展其在國際貿易上，威望以及調查各國商業情形，曾派出很多國際貿易調查的專使，尤其是鄭和之赴各國調查，曾經費了好多冗險，參觀了很多的國家；茲爲便於了解明朝之國際貿易的發展，特列鄭和出使各國的參考圖表如下：

| 次數 | 首途時 | 迴航時 | 西歷 | 所歷地 |
|---|---|---|---|---|
| 1 | 永樂三年六月 | 永樂五年九月 | 一四〇五——七年 | 占城三佛齊 |
| 2 | 永樂六年九月 | 永樂九年六月 | 一四〇八——一一年 | 印度錫蘭島 |
| 3 | 永樂十年十一月 | 永樂十三年七月 | 一四一二——一五年 | 蘇門答臘加滿剌等十九國 |
| 4 | 永樂十四年冬 | 永樂十七年七月 | 一四一六——一九年 | |
| 5 | 永樂十九年春 | 永樂二十年八月 | 一四二一——二二年 | |
| 6 | 永樂二十二年正月 |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 一四二二——年 | |

7　宣德五年六月　宣德八年七月　一四三〇——三三年　忽魯謨斯等十七國

至於『茶馬司』的範圍則限於中國西部及北部的亞洲小國。最初僅僅是以茶易馬，以後，始及於一般商品的貿易，關於輸出與輸入的對比，因爲沒有精確的統計，不能下肯定的斷語，不過，從『經營互市，往來不絕』的字句中間，可以看出牠的發展的形態。

第二，經濟有上昇的趨勢，特別是手工工業有長足的發展。這種手工工業發展的具體情形，首先便是開壙：在天順四年第一次派了很多的官吏大舉穴礦，如羅永赴浙江，羅珪赴雲南，馮讓赴福建，何能赴四川，一年之中，採礦銀十八萬三千餘兩，而成化中年又開湖廣金礦以及武陵等十二縣的礦坑，這一年因開礦的關係曾調集了五十五萬的農民去參加無報酬的勞動。在世宗的初年又復派遣大批的開礦專使，去考察礦脈；而戶部上書——方鈍因爲受了商人們的賄賂曾向皇帝作這樣的建議：『請分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一體搜訪，以稱天地降祥之意。』（明史卷八十一食貨志）自此以後，關於採礦的情形，幾等於到處皆礦無地不開，而開礦問題更成爲農村中的重要問題；如明史卷八十一食貨志所說：『姦人假開礦之名，乘勢橫索民財，凌轢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時中官多橫暴，而陳奉尤甚；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爲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依照這種情形，農民們不僅沒有享受開礦的利益，甚至還使

農村生產量降低，結果，使大批的勞動力白流！

那廣大的離開農業生產而去參加手工業勞動的農民，處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要找他們的出路；於是乎從經濟的矛盾出發不可避免的要引導到政治的焦點。感覺敏銳的河南巡按——姚思仁，他看到這個問題是未來事變的徵兆之一，便發表他對於此問題的意見而想挽回既倒的狂瀾：『開礦之弊，大可慮者有八：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催民糧缺，飢餓噪呼，四也；礦洞遍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鬭死；及今不止，集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存亡矣！』（見同上）

可是，此種最後掙扎的意見，並不能挽回統治階級在羣衆中已經墮落的威信，而事變的發展仍然按照牠的路線進行；當然，在事變進行的過程中間，還有很多綜錯複雜的現象，不過，上述的諸種原因，是暴動前夜的主要象徵！

（四）流寇騷擾呢抑是農民革命呢？

土地集中與高利貸資本的發展，是農民暴動的前提。我們根據上面的敘述和分析，異常明顯的可

以預測農民革命的大風暴之必然不可避免的到來。這一農民大革命風暴到來的信號，最初是表現於天啓二年；在這一年頭就發生範圍廣大的所謂『白蓮教』的農民暴動，被壓迫的農民對於自己生活痛苦的原因，於是便認『白蓮教』爲救苦救難的菩薩的體現。領導『白蓮教』運動的領袖爲山東人徐鴻儒以及武邑人于宏志，他們以燒香和禮拜菩薩的方法來做農民暴動的綱領；當然，這個運動在最初還能吸引大批的窮苦農民，可是，因爲缺乏積極的鬬爭生活的內容，所以很迅速的差不多不上一個年頭便爲統治階級鎮壓得土崩瓦解，第一個農民革命的浪花過去了！

接着，便湧出了翻天覆地排山倒海似的農民大革命的浪濤!!

暴動開始於崇禎元年，陝西便是這個革命的策源地。當時，陝西的環境是非常的複雜：一方面有廣大的三邊飢軍，即過去從事屯田的戍兵，另一方面又有數十百萬饑民以及數十萬失業驛卒和礦工，這些廣大的被壓迫階級是埋藏在社會內部的瓦斯，而統治階級於此時復投以苛捐雜稅——所謂新餉，均輸，間架——的砲彈，使牠更快的爆發成爲偉大的農民戰爭。但是，暴動的開始他的內部的組織是異常的複雜，首先是延綏的兵變，其次，這些變兵與農民結成密切的聯系，而此暴動的隊伍密佈於陝西及其他各處；如所謂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州賊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安塞高迎祥，米脂李自成，王大梁，王子順，苗美，清水木瓜，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

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延安張獻忠，王自用，老洄洄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閻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上天龍，蝎子塊，過天星，混世魔王，姬關鎖，翻山動，掌世王，顯神通，金牛星，劉宗敏等，當時號稱爲十三家，十八寨，三十六營，參加暴動的農民羣衆，不下數十百萬人。最後，因客觀形勢所威脅，把此種零星的農民隊伍，集中起來，形成了兩個中心的領導——李自成與張獻忠。

李自成他的出身是非常的寒微，他在童稚的時候卽出賣他的勞動力，在米脂一家姓艾的大地主家裏作牧羊的傭工，及至達到成丁的年齡，感覺得牧羊實在是不能夠維持一家的生活，於是乎便去充銀川驛站的夫役！一般人們因爲他善於騎射鬬很，便目之爲無賴，幷因此，曾一度爲米脂知縣——宴子賓將他逮捕，準備處以死刑，結果，爲他越獄逃脫！在暴動的初期，因他的舅父高迎祥稱爲闖王，他與張獻忠等便號爲闖將，以後高迎祥犧牲於暴動，而闖王的位置便落到他的肩上。崇禎十一年，他和張獻忠關於暴動進行的策略上，意見不能夠一致，遂各帥羣衆而分開陣線；因此，張獻忠曾一度變節去投降統治階級。而李自成也因長期戰爭與屢次受挫而異常消極，這時候有藍田的手工業工人——劉宗敏給他很大的帮助，於是乎把瀕於失敗的農民暴動又中興起來，當然，這幷不是由於劉宗敏主觀力量所能致此，而是『河南大旱斛穀萬錢』的客觀原因所推動。李自成在河南暴動的過程中，他所表現

的精神，完全是被壓迫的農民意識的反映；他把從地主豪紳手中所奪來的財物，悉數贈給飢餓的農民，因此，李自成在農民羣衆中間的信仰的確是口碑載道：『迎闖王，不納粮』的歌謠，幾幾乎是家曉戶諭。那以前掠奪農民最多的福王，曾被暴動農民加以極殘酷的報復，如『酌福王之血雜鹿醢嘗之』，名之曰福祿酒，可見失掉土地的農民他心中對於統治者是怎樣的怨恨！

同時，這暴動的軍事組織也是有條不紊，如『分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先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鬃大纛銀浮圖；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黃，纛隨其色。五營以序直晝夜，次第休息。巡徼嚴密，逃者謂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爲兵，精兵一人主芻，掌械執爨者十人。』（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傳）在李自成軍隊中間，主要的作戰隊伍爲馬隊，因爲這是衝鋒陷陣的利器：『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籍其蹄，剖人腹爲馬槽以飼馬；馬見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則出較騎射曰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崇岡峻坂，騰馬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蹶所壅閼，水爲不流。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返顧，後者殺之，久戰不勝，馬兵佯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刺如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見同上）暴動的農民，除了軍事有健全的織組而外，關於一般的軍事紀律也是格外森嚴；如勸說士兵們身上『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並

且：「諸營較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次之，幣帛又次之，珠玉爲下。」見同上書）於此，可見暴動的紀律森嚴，並不是如士大夫們所宣傳的什麼「殺人放火」和「姦盜邪淫」。並且，這位領導暴動的領袖——李自成他個人的生活是非常儉樸，不僅不好酒色，甚至還與士卒同甘苦，他極端的鄙視腐化了的農民領袖，爲建立羣衆對於暴動的信仰以及顧及整個農民革命前途起見，他不惜以嚴厲的手段來懲罰這些腐化的農民革命的叛徒：如「羅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女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嗤鄙之！……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之；晨以三十騎斬汝才於帳中。」反之，我們再看那班所謂王者之師的「官兵」紀律呢？他們不但沒有絲毫的改良事實給農民以安慰，甚之，還乘此機會去屠殺農民，如「官兵沿途擄掠，所得婦女，號爲官眷。」這種現象，誠然是「恣行搶刼，慘暴過賊！」（見明季稗史續編第二卷三十一頁）討伐叛亂農民的左良玉，他的軍隊比一般軍隊更加腐化：「其部下皆子女玉帛充盈，所謂數萬者，婦女老稚，居其過半！……飽掠客商，焚刧百姓，居然一叛賊矣！」（見同上書）爲什麼士大夫們對於這些現象視若無覩而對於農民革命便加以瘋狂似的仇視呢？一則曰「闖賊」，再則曰「流寇」，其實，我們從李自成的暴動的宣言中間，便可充分的答覆了士大夫們惡意的宣傳：

「上帝鑒觀，實爲求莫，下民歸民，祗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粤知往代，爰知得失之

由，鑑往知今，每知治忽之故；茲爾明朝，久居太甯，浸弛綱紀：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佐之脂膏殆盡。肆昊天聿窮乎人愛，致逃民爰苦於祲災！朕起布衣，日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於恆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志；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嘉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幾茲百百，勉保乃辟，抑商孫之厚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猶，臣誼靡忒。惟今詔令，允佈腹心，君其念哉！罔怨恫於宗宗，勿阽危於臣庶，臣其愼哉！當孝忠於君父，賡詒穀於家聲！永昌元年，謹詔！（見清代通史上卷）

同時，他還對於這個詔書的內容，加以以下的補充；如說：『公侯皆食肉，紈袴則倚爲腹心，宦官悉齡糠，犬豚則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思，徵斂重重，民有偕亡之痛！』（明季稗史續編第一卷第八頁）農民暴動，不但在軍事組織上予統治者以巨大的創傷，并在政治上揭起了代表被壓迫平民革命的旗幟，更是致統治階級於死命。在這情况之下，統治階級爲的要緩和羣衆革命情以及轉變他們的視線起見，因此，不得不承認暴動的原因由於他們政治組織的缺點，所以，在鬥爭尖銳的當兒，崇禎皇帝曾頒佈了所謂『罪己』的詔書；他說：『朕爲民父，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子，不得而撫

裸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貽耻宗社，負疚黔黎，罪在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陷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稅粟，居送行齎，加賦急無藝之徵，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縣磬，田盡汙萊，望煙屋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師旅頻仍，疫癘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用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終夜以思，跼蹐無地！用是大告天下，痛加剏艾，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人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用兵徵餉，原非得已，各撫按官，亟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撫字；倘有擅加耗羨，朦混私徵，又濫罰淫刑，致民不堪命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盡豁逋賦，仍加安插賑濟，毋致失所！至於文武罪廢，才果堪用，著吏兵部確核推舉；若草澤豪傑之士，有能恢復一部一色者，與分官世襲，即陷歿脅從之流，有能反正來歸者，准與赦罪立功，有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見明季稗史續編第一卷第十頁）

像這樣的婉轉而狡猾的申訴，企圖在羣衆面前博得相當的好感，可是，這種帶脂粉性的假面具的官論，羣衆已經將他看成一錢不值的東西。在農民革命的過程中，那班代表地主高利貸資本的士大夫們，當然是極端的仇視這一運動，而時時刻刻的都企圖設法消滅農民的革命，因爲革命對他們好似芒

刺在背，使其感覺坐臥不安；於是乎這班士大夫們除了在思想上散佈一些毒害革命的煙霧而外，更積極的從組織上組織鄉勇（即現在的民團——著者）來破壞農民革命，因此，李自成之大批的鏟除士劣，這完全為的是保障革命的前途，並不是什麼希罕的事情！如果對於士劣之反動不加以嚴厲的處置，那麼在客觀上等於削弱了自己。革命的進展，誠然有「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的形勢，攻陷了北平，並沒有絲毫的阻礙；人民對於農軍是成群結隊的歡迎，他們在重重壓迫之下，對於暴動的態度，眞是若「大旱之望雲霓啊」！如梁兆陽在農軍佔領北平的第二天，他便向李自成說：「先帝……失德，只因剛愎自用，致使君臣之誼，否隔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起！……我皇上（指李自成——著者）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恆岱，抵燕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可謂神武不殺，比隆堯舜，苦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千載之知遇。」（明季稗史續編第二卷第十四頁）而一班羣衆，尤其是貧苦人民對於這位暴動的領袖曾三次勸進，並且說他「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那些士大夫對於革命的造謠與破壞，縱然用盡了卑鄙齷齪的手段，可是歷史的事實是不容人們抹煞啊！本來，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是中國歷史家分析事變的千篇一律的論調，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歷史觀。我們從這一農民革命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所有眞實的材料在在都顯示農民革命的光輝和反駁士大夫們誣牠為「流寇」的胡說！

## (五)地主豪紳對農民革命的反動

大革命的進展，階級鬥爭的緊張，一切落後的人們特別是地主官僚以及高利貸資本對於這一革命的感覺，簡直是痛哭流涕而如喪考妣！認爲這個革命政權之一舉一動都與他們有休戚相關，於是乎在悲痛之餘，對於革命便作積極的反動，企圖從農民手中奪回其反革命的天下。

吳三桂便是反革命的第一個渠魁。

先是農民革命進展至於北平，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爲民衆所逮捕，本來羣衆要處他以極刑，但自成因吳三桂屯兵山海關，如果不能吸引其來降，那麼，他就會變成反革命的主要的軍事力量；因此，他要吳襄作書致於他的兒子，想借血統的倫理的關係，來減輕革命政權的困難。吳襄致書三桂說：『汝以君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眞累戰功歷深資也！今汝徒飾軍容，怯懦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既無批吭擣虛之謀，復乏刑格勢嚴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幸存！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屠戮，身名俱喪，臣子均虧，不大可痛哉？！』（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六平西王吳三桂傳）

但是，階級的意識終於克服了倫理的觀念。吳三桂非但不能接受他父親的勸告，甚之，還責備他父親不應該與革命政權妥協，他答覆他的父親的信說：『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於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寧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即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吾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萬雉，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失墮，使兒捲甲赴闕，事已後期，可怨可恨！側聞聖主晏駕，臣民僇辱，不勝眦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絕，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明季稗史續編第一卷第十三頁）

這封信對於農民革命不曾留下了挑戰的手套。當然，吳三桂他自己也感覺得軍事力量薄弱，不能夠戰勝革命，於是乎便報定了『寧贈異族，勿與家奴』的決心，致書與多爾袞要與滿洲政府結成反革命的聯盟。他致書於多爾袞說：

『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蟁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敢未通名，人臣之義，諒王亦知之！今我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三

海，欲思堅守東陲而固京師也。不意流賊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衆，何能成事？奈京師人心不固，姦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稱仁累德，謳思未泯，各省宗室爲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兵，羽檄交馳，山左江恩，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原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貴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貴朝應惻然念之；且亂臣賊子，亦非貴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取威定霸，大功也；義兵一至，皆爲所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帥所部，全力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庭，示大義於中國，則我國之報貴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土以酬，決不食言。本應上書貴朝皇帝，但未悉禮制，不敢輕瀆聖聽，乞王轉奏。」

（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

爲的是要應付共同的敵人，不僅可以放棄民族間的深仇宿恨，甚之，就是屈膝在滿洲人的面前亦所不惜，滿洲人過去本來是磨拳擦掌時時刻刻的企圖侵略中國，現在居然有這樣一個很好的嚮導的人物，的確是『誠難再得之時也！』何況躲在仁義的旗幟之下而進行『一箭射雙鵰』呢？所以他立刻便

給吳三桂以圓滿的答覆：

「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明國君臣，不計國家喪亂，軍民死亡，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三次進兵攻略，蓋示意於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帝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嘉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爲敵，今亦勿因前故，尚復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用之爲相，以成霸業，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公，一則國仇得復，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矣。」（見同上書）

同時，在中國的南部，那班官僚地主豪紳因爲受着革命的威嚇，也不約而同的起來向農民進攻，與吳三桂多爾袞們形成聯合的戰線。不過，向革命攻進是需要大批金錢，如果缺乏了經濟，他們在社會上會失掉作用；基於這個理由，官僚和地主們不特不廣募討伐農民的公債。他募債的宣言首說消滅暴動的必要，次言輸款之正當，茲爲便於參考起見，特附錄如下：

「擄虜末殄，寇燄旋熾，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知漢天子

自有神靈；兵執無常，豈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保四方之衆，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宦游，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賤若金張，或子虛之貲起，或輓輅之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望爲里雄，合行共抒壯謀，各國義旅，仗不需於武庫，糗無藉於郇廚，飛附天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遂得有白頭，魂類立殲，普天大酺，此則萬代所由瞻仰，亦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及戎，必饑且先助餉，多或抑小國之賦，少則割千八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卽非長物，亦曹洪之馬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壟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雖陽翟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如蕭輸介在，極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稱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値佳緣，毋忘善誘。嘗以濟川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乏王臣，挨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尙有崇韜，出塞本傲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玆何日，敢曰無從?!不惟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算。姑賊之巧于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旣入樊籠，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老弱之受工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執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此中金穴，何止一

家，無數牙籤，不勝其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乏，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哀哉?!欲圖穩，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即是一家，破巢必無完卵，何不思之又重思之哉?!法（即史可法——著者）等智不足以効謀，憤何辭以即死，實切執殳之原，輒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膠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回指之旂，封章飭達於北辰，奮筆敢馳於南史，是爲過計，亦見癡衷，見起君親，約臨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搥心泣血之至。」（明季稗史續編第二卷）

在全國反革命勢力聯合包圍的中間，這一個農民革命的政權牠的一切的政策，又是鋒銳異常，對于官僚豪紳地主高利貸資本，不但沒有給以絲毫的情面而加以保留；甚之，還連根斬絕！同時，在這一時期歷史上並未出現一個最前進的最革命的階級，來做農民的領導；因此，牠是陷於困難的狀態；『前無進路，後有追兵。』這個革命的政權要想起獨立的作用，即是說在這個農民基礎上面長期的統治下去，誠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反革命的形勢逐漸緊張，地主官僚以及高利貸資本他們已經準備好了一條反革命的絞繩，企圖絞殺這誕生未久的革命的嬰兒。

## (十六)農民的失敗與滿清統治的完成

滿洲政府得着吳三桂的投降，以龐大的軍事組織，以養精蓄銳的士兵，以傾國來犯的力量，以中國官僚地主的從旁資助，這些都是客觀上農民政府必然倒台的因素，反之，在主觀方面既缺乏先進階級的領導，而內部的意見亦復龐雜而分歧，如張獻忠之進據四川，不受這農民政府的指導，而拱衛北平的軍隊也是腐化異常，一般士兵羣衆生活雖然相當的改善，而廣大的農民所迫切需要的如土地問題却擱置不題。當然，革命的初期，社會本身經過巨大的破壞之後，并不是短期卽可恢復這個社會的健康。并且，士兵在戰爭的勝利以後，以爲從此所向無敵，對於滿清的軍隊，便存輕傲的心理。

在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生活中間，都決定了農民政府之必然的死亡；因此，山海關一敗，馬上就會令這個農民政府退出北平，而實現了多爾袞一箭雙雕的政策來完成滿清政府的統治。

滿清政府之所以能夠取得統治中國的資格，并不是一件偶然的和簡單的事情，在某些地方他固然是借重於軍事力量，而政治上的影響却是主要的關鍵。佔領北平的第二天，卽在羣衆面前發展其欺騙的影響，例如他申討農民暴動的檄文說：

「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者，鄰國之義；洪維爾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鼎

我仇國，永世宥民，代有哲王，迄乎末造，吏偷民窳，羣盜滿野。然大行崇禎皇帝，秉恭謙之心，宏仁孝之義，德高執替，維日不甯；蠢玆逆賊李自成，狗盜之雄，鴟張獸視，忘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惡，蹀血京師，逼殞帝后，焚燒宮寢，流毒縉紳，以金銀爲營窟，視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無光！大清皇帝義切同舟，用伸吊伐；六師方震，衆蟻忽奔，斬馘擄遺，川盈谷量，遊魂西遁，指日擒夷；予因息馬燕京，撫玆黎庶，爲爾大行皇帝縞素三日，喪祭盡哀，謚曰：「思宗皇帝」，陵曰：「思陵」，梓宮聿新，寢園增固，凡諸后妃，各以禮葬，諸松柏勿採勿樵，惟爾率土之臣民，所欲請致於大行皇帝者，我大清無不曲體斯忱，有崇靡缺，宗藩之失職流離者，爲爾存恤，士紳之忠義死難者，爲爾表揚，輕徭薄賦，用賢使能，苟濟生民，惟力是視，深痛爾明朝燼息無遺，孰孤難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請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爲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之間，諸勳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銜恩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舊異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與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聖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我朝，永懷繼絕之恩，共敦睦鄰之誼，其有量力不敵，北面歸誠者，當各搜勁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屬，用以自効，無不開懷延納，樂共功名，來歸之下，蠲復二年，與民休息。凡諸恩典，俱俟後詔舉行，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

懦弱，實肆跋扈之本謀，或陽坿本朝，陰行草竊之姦宄，此皆民之蟊賊，國之寇仇，予定三秦，卽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無遺種，嗚呼！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眷，佈告天下，咸使聞知！」（明季稗史續編第二卷）

多爾袞一再的在羣衆面前誇耀其統治爲合理，幷爲迎合低能的民衆心理起見，盡量的發揮其欺騙羣衆的理論。如爲明朝帝后發喪，鼓勵投降的走狗，保護明朝忠室，追悼爲農民們殺掉的貪官汚吏，錄用地主官僚，幷且爲市儈農民心理起見，減輕與豁免田賦，這種種的行動，對於地主官僚豪紳高利貸資本的利益，可算是保護不遺餘力。因此，一般豪紳貴族對牠是「歌功頌德」而感謝不遑！

其實，滿洲政府是異常的聰明，他懲於元朝在中國的一切措施，如果不給中國人以些微的改良，那麽，這統治立刻就會動搖，所謂「殷鑑不遠，覆車當戒」也。

但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終於把猙獰的面孔暴露出來，凡是讀過揚州屠城記人們，都應該對於慘無人道的屠殺大聲疾呼的反對，以揭破歷史上統治階的虛僞的面具。我們看農民暴動也沒有這樣的慘酷吧?!

然而，人們對於李自成和張獻忠輩所領導的農民革命，都呼之爲「流寇」，這是什麽原因呢？很顯明的，階級利益障礙了他們的眼睛！

所謂『流寇』，所謂『盜賊』，他們眞是『天生賤骨』和『解釋無從的怪物』嗎？我想，凡是受過新與科學洗禮的人們，都不應該對此問題加以武斷的定論，而必須去追求產生他們的物質的客觀環境，換句話說，他們是某一特定階段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結晶。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除掉澈底的變革社會制度和經濟的組織而外，就是用肉體消滅的方法去殺盡中國數萬萬貧苦的農民。不僅在中國，就是在任何一個國家，牠們歷史篇幅上都有農民的血漬！

在滿清政府打敗了革命以後，牠祇會使農民暫時的屈伏，而不能澈底的消滅；因此，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之下，農民革命的浪濤還會繼續的到來，不過，牠是愈演愈烈，比前一時期的內容要廣泛得知幾倍。如果，我們要帶上科學的望遠鏡，那麼，就可以看見這個必然不可避免的會到來的農民革命的遠景！

## 第八節　古代農民戰爭的總結與精神

### (一)商業資本是毀壞農村自然經濟的動力

生產技術的進步，生產量的提高，不僅使古代的原始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彼此之間發生了有

機的聯系，甚之，她還造成剩餘生產品的出現，使這社會本身分裂成許多的階層。在純封建社會的母胎內，爲適應經濟關係而發展的商業資本，牠——商業資本實際上已經成爲社會本身的內在的矛盾，就是說，牠在生產品交換的過程中，已經起了媒介的作用；牠在農村自然經濟的體系之內，既然發生了作用以後，那麼，他的影響決不會如一般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第一，他的發展的觸鬚首先及于物物交換的狀態，而對于物物交換的現像加以排斥；第二，在排斥物物交換的方式以後，牠在經濟上取得了統治地位；第三，依據于貨幣經濟的形式在一般社會生活中間發生了人剝削人的高利貸的資本；第四，貨幣經濟作用的擴大以及高利貸資本之深入農村，使土地也成了商品——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在這許多複雜的條件下面，反映于一般政治形態的，如奴隸之解放，農奴反地主的鬥爭，最後，便形成農民爲要求土地而鬥爭。

異常明顯的中國第一次農民戰爭：牠的暴發什麼不在秦代以前而適逢其會的發生於秦朝末年呢？這幷不是偶然的無從解釋的現象；凡是受過新與科學洗禮的人們，對於秦始皇之代表商業資本的事實，都不會加以懷疑和否認，當然，中國在秦以前已有商業資本之發展，不過，至秦朝始形成一種偉大的和經濟的力量。伴着商業資本發展而發展的土地集中的現現，在秦朝誠然是達到驚人的程度，廣大的農民因爲牠的影響之深入農村，使農民們與土地分離而度着飢寒凍餓的生活！一般農民睜眼看着

土地爲別人奪去是自己生活痛苦的泉源，於是乎處在飢寒交逼的狀况之下，不得不堅決去作要求土地而鬥爭！

譬如在秦始皇的末年，土地集中的過程是非常的迅速，那班失掉土地的農民們，他們不認識這是社會發展必然的現象，而責備這只是秦始皇統治的結果；因此，農民們便竭力咀咒秦始皇之速死，以爲如果秦始皇眞夠死了，那麼，關於土地的佔有將會重新分配。他們在所謂「殞石」上面曾鐫着以下幾個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就現在看來，這種行動彷彿是帶着很濃厚的原始的滑稽性質，但是，在那時的確是反映了廣大農民的要求。在此種事件發生未久，接着歷史舞台上便出現了中國第一次的農民暴動！領導這次有名的中國第一次的農民戰爭的領袖，他的出身是異常寒微的所謂「傭耕於隴上」的雇農。他們曾經利用了「鋤頭鐮刀」去戰敗了銅牆鐵壁似的貴族和商業資本的統治。但是，封建殘餘與所謂「小市民」的成份都乘時崛起，企圖掠取農民革命的果實；結果，那所謂「亭長」出身的劉邦，他能夠揚棄農民的立場而代表地主與商業資本的利益，完成了這一歷史的事變。

在漢朝雖然是主觀上企圖復古，幷在思想方面傳播復古的影響，如漢武帝之尊崇儒術，董仲舒之罷黜百家；但是歷史進化的車輪幷未如某些個人的願望而停滯，仍然是繼續向前發展；最顯著的是王莽變法的失敗，土地仍是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裏。赤眉與黃巾的暴動，牠的形成的主要條件仍然是基於

農民們之乏缺土地，并且，爲土地的獲得而爭鬥。迨至南北朝——特別是南朝商業的繁盛，使人們駭異，所謂南朝金粉，其實，即是商業資本繁盛的反面，而隋煬帝更依據這個基礎開闢運河以溝通南北的經濟，因此，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又重演了一次；唐朝和宋朝更將經濟的範圍擴大到國際貿易，而「均田」制度同樣的受市場的影響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元朝關於商業資本的發展，在中國可算是登峯造極的時代，全亞洲的財富，差不多完全集中在蒙古人的手裏，使農村經濟破碎不堪；然而，農民的鬥爭也因此而展開大規模的戰線；至明朝即所謂「流寇」之亂的農民暴動，亦是貴族官僚地主和高利貸資本重重剝削的結果。總之，商業資本的發展，牠的作用是能夠破壞農村自然經濟的「處女膜」，使農民受高利貸資本之統治，雖然，牠是不能澈底的掃蕩農村自然經濟，那些封建殘留之最後解體，必須要經過最後的一次大革命。

商業資本之最初的發展，固然是農民戰爭的推動力，但是，牠在某種的特定的條件之下，同樣對於農民革命也盡了劊子手的作用。

## (二)必然腐化的農民政權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度的農民政府，這一點也是中國歷史的特色；在世界上以農民來統治國家

（卽由農民暴動的力量建立的國家）彷彿是一個奇蹟，其實，這個政權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已經發生了內部的轉變，離開了農民利益的立場，而變成另一階級統治農民的工具。這一轉變的原因，并不是單純的由於一部份上層的農民領袖對於革命之背叛，在商業資本佔主要經濟形式的社會裏，這政權實在是無法來保障農民的利益，貨幣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魔力是神通廣大，誠然是和古代希臘人所說：「得有最堅固的城牆，也擋不住載滿黃金的驢子」一樣！漢朝的劉邦和明朝的朱元璋，他倆都是依靠農民的力量而取得政權，但是，在取得政權的第二天，他們對於農民的利益便握手告別，當農民起來反抗他們的時候，那長槍大刀同樣的也會加到農民的頭上！

## （三）中國歷史的眞面目

「過去社會（指氏族共產社會以後——農註）的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古代我們可以看到貴族，武士，平民，與奴隸，在中世紀我們可以看到諸侯，臣僕，行會老板，學徒與農奴；并且，在這些中間，我們還可以分出不同的層次。」「……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東和僱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斷的互相仇視，敵對，明爭，暗鬥；這種鬥爭每一次不是達到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便是達到參加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馬克斯和恩格斯——共產黨

宣言）

遠在一八四七年以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始祖——馬克斯和恩格斯已經爲我們指出關於歷史分析的途徑，我們拿着一個唯物的武器，才能走出這紛亂而復雜的中國的歷史的「迷宮」。過去那些建築「迷宮」的匠徒，他們把中國歷史裝製成爲帝王的家譜和英雄的紀錄，他們把一切上層築物——政治結構的經濟基礎，如生產方式和生產品交換的形態皆加以揚棄，而僅僅說是某些個人的表演。例如中國歷史上繼續不斷所爆發的農民戰爭，這當然有牠的內在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因素，如凱勒斯克勞茨所說「一切社會現象都染有一定的階級彩色，而整個社會於某一定時期，在其每一次運動，乃是各種互相影響的階級傾向所構成的合力。」（凱勒斯克勞茨——經濟的唯物論是什麼）而那些製造迷宮的匠徒們，偏說參加暴動的農民是擾亂秩序的叛賊，是毒害人類的「流寇」！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的說，一部中國古代的歷史，每一個字都是農民鮮血寫成的，也可以說，中國歷史是一部農民暴動的歷史。

「不識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

一般人們都說中國是個「以農立國」的國家，我想凡是看不淸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作用的人們，他們的眼睛上都生了「白盲」！

烏里亞諾夫說：『農民敗北了！但是，他們將無數次的奮起起來吧！他們決不會因最初的敗北而意氣沮喪！』

中國的事變，完全證明了他的分析的正確。



# 第三章　清代的土地制度與初期的農民暴動

## 第一節　土地佔有的形態

滿清統治的完成，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經說過：以李自成和張獻忠所領導的農民暴動，替牠開闢了一條統治中國的道路，而豪紳地主與高利貸資本對於農民革命的反動，以及以吳三桂代表這個力量與牠結成鞏固的反革命的同盟以後，更澈底的取得統治中國的地位。這一個政權在牠開始建立的時候，因為懲於過去蒙古人——即元朝政府在中國的失敗，所以在決定一切政策方面不得不相當的帶一些欺騙的色素，以緩和民族間的惡感；可是，欺騙的面罩很容易會被事實先生扯碎：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便是牠自己扯碎面帕的初步。

在鎮壓了農民革命以後，那民族間的矛盾以及階級內部的糾紛又重新爆發，所謂清初的三藩之亂，便是這些矛盾之具體的表現；但是結果使民族的聯盟變成漢族的屈伏，而這一個政權也竭力保護地主豪紳以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利益。在這一種轉變的局面之下，滿清的政府似乎會有一個長期的穩

定吧？其實，千百萬勞苦的農民所視爲生死存亡的土地問題，在滿清政府的議事日程當中，並沒有牠的位置。

滿清的土地制度，內容極爲複雜；凡地之開墾者爲田，而有時田亦曰地。其土地類別很多，如民田，更名田，屯田，竈地，旗地，莊田，恩賞地，牧地，監地，公田，學田，賑田，蘆田等等，綜其大要，可分爲以下四類：

A民田：

民田範圍，異常廣袤，其包括成份如：

1民賦田，係普通民田，可以自由買賣轉移。

2更名田，亦名更名地，爲明朝藩屬之領土，至清代而改爲民田者。

3農桑地，適宜於農桑之地，因氣候及土宜之別。

4蒿草籽粒地，係指劣等旱田，如磽确之地。

5蘆課地，即沮洳生葦之地。

6歸併衛所地，即明末清初爲衛所管轄之地，其後改爲民田者。

7河淤地，如各種河沿淤積之地。

8 退圈地，即已圈給於旗丁而以後又退還人民之地。

9 竈地，即製鹽之土地。

10 山蕩樮灘地，山坡水灘沙漲之地。

11 草地，刈草之地。

12 田塘，即蓄水之地。

13 官折田園地，係明代職官沒入之田以及廢寺所有之田，準折穀價，改爲民田者。

14 熟田，即普通種植穀物之土地。

15 泥溝車池地。

16 土司田，即苗族土司所轄地。

17 番地，番人所有，計戶納粮。

18 回地，回族所有地。

19 苗田，苗族所有地。

20 猺田，猺族所有地。

21 狼田，狼族所有地。

22獞田，獞族所有地。

B官莊：

此種土地爲清兵入關時所有王室八旗圈占之地，大別之可分四種：

1皇室莊田，爲清室所有之地，直轄於內務府，故爲內務府一種官莊。

2宗室莊田，此種土地係賜於王公貝勒子以及將軍者。

3八旗莊田，八旗有京營與駐防之別，京營環衛京師，而八旗莊田，即分給於京營屯駐之八旗人民，此種土地皆定爲世業，而不屬於州縣管理。

4駐防莊田，駐防有在畿輔盛京以及各省者，故或區爲三類，要之，皆爲旗產，與八旗莊田同一性質。

C官田：

此種土地完全爲公共性質，其最重要者如：

1牧地，始於順治初年，以供馬糧之用，凡荒田使壯丁開墾之。而以開墾之餘地爲牧場，其後牧場之地質，漸適於耕種，乃許開墾者爲田地，以溝爲界。同時，開墾地須依一定稅率，納稅於官。

2學田，以該土地的面地收入，專充貧苦人民的教育費用。

3籍田，卽皇帝親耕之地，如先農壇，卽籍田也。

4祭田，以賜所謂聖賢之後裔，使充祭祀之費用也。

D屯田：

該項土地本屬於政府，而兵卒商人屯墾之者；其制興於明朝，其內容蓋欲減少兵糧之支出，故對於防守之兵，給以月粮，使開墾荒地，以助軍實，因拾取寓兵於農之遺睡也。清撤屯軍，以屯田歸州縣管轄，惟漕運尙存，故各省尤留運丁，使之耕作屯田；及漕運改由海過，運丁遂以耕種爲業，日久與農民無異，此屯田沿革之大概。及新疆劃入滿清的版圖以後，而西北的屯墾事業遂爲統治階級所重視，並且在政府的指導之下發展起來；如以地方爲標準，可區分爲四種：

1直隸屯田。

2新疆屯田。

3西路屯田。

4北路屯田。

以上四類的土地，爲滿清政府土地制度之基本的形式。並且，對於畝的面積滿清政府亦曾有個明確的決定，如丈地以五尺爲弓，二百四十弓爲畝，百畝爲頃。

同時，關於滿清歷朝的土地面積，也可以說是一天天的增加，一天天的擴大；其原因很明顯的是由於統治階級在主觀上企圖擴大土地稅的收入，而另一方面去強迫農民開闢荒茗的土地，我們從下列統計中間得着一個簡明的概念：

滿清歷朝土地面積表

| 年別 | 總數 |
|---|---|
| 順治十八年 | 田地小蕩畦地[illegible]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頃四十畝 |
| 康熙二四年 | 田地共六百零七萬八千四百三十頃零一畝 |
| 雍正二年 | 共六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一十四頃二十七畝 |
| 乾隆三一年 | 共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五十畝 |
| 嘉慶十七年 | 共七百九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 |
| 光緒十三年 | 共九百十一萬九千七百六十六頃 |

當然，這些數目字是官僚政府的統計，是不甚可靠；不過，我們對於滿清政府歷朝的土地面積及其增加的趨勢可以得着比較簡明的概念。

土地面積雖然是逐年增加，但是農民們的土地卻一天天的喪失，僅就所謂官莊和官田的面積看來，就會使我們驚訝！茲將這些所謂官莊和官田佔有土地的形態，列如下表：

1 宗室莊田面積表：

| 旗別 | 整莊 | 半莊 | 園 | 莊 | 整園 | 半園 | 合計 |
|---|---|---|---|---|---|---|---|
| 鑲黃旗宗室 | 四所 | 一所 | 一所 | 所 | 所 | 所 | 三六頃，六〇畝 |
| 正黃旗宗室 | 五所 | 一二所 | 三所 | 四所 | | | 一六〇，五六畝 |
| 正白旗宗室 | 四所 | | 二所 | 一所 | | | 三六，〇〇畝 |
| 正紅旗宗室 | 一四五所 | 三所 | 四所 | | 五〇所 | 一〇所 | 一二四四，一六畝 |
| 鑲白旗宗室 | 一七六所 | 五所 | 二〇所 | 八所 | 八所 | | 一七一七，一四畝 |
| 鑲紅旗宗室 | 二七九所 | 二三所 | | 五所 | 一一一所 | 二所 | 二六三〇，〇一畝 |
| 正藍旗宗室 | 五四四所 | 一五一所 | 七三所 | 二二所 | 〇三所 | 一九所 | 一五三一三，二四畝 |
| 鑲藍旗宗室 | 二三一所 | 六三所 | 三所 | 九所 | 一〇二所 | 二所 | 二二五四，七四畝 |

2 旗職授地表：

| 職別 | 授田數目 | 附記 |
|---|---|---|
| 王 | 大莊四二〇畝至七二〇畝半莊二一〇—三六〇畝 | 親王園十所郡王園十所係順治七年定 |
| 貝勒 | 大莊四二〇畝至七二〇畝半莊二一〇—三六〇畝 | 園四所 |
| 貝子 | 大莊四二〇畝至七二〇畝半莊二一〇—三六〇畝 | 園三所 |
| 公 | 大莊四二〇畝至七二〇畝半莊二一〇—三六〇畝 | 園三所 |
| 內務府總管 | 園四八畝 | |
| 親王府管領 | 園三六畝 | |
| 郡王以下府管領 | 園三〇畝 | |
| 王以下各府所屬丁壯 | 地三六畝 | 停止口糧 |
| 副都統以上官 | 園一八〇畝地六〇畝 | |
| 參領以下官 | 地六〇畝 | 係給二名壯丁每名三十畝 |
| 本家公侯伯 | 園各三〇〇畝 | 以下係順治五年酌定 |
| 子 | 園二四〇畝 | |

| | | |
|---|---|---|
| 男 | 園一八〇畝 | |
| 都統上書輕車都尉 | 園一八〇畝 | |
| 副都統侍郎騎都尉 | 園六〇畝 | |
| 一等護尉侍尉參領 | 園四二畝 | |
| 二等侍尉護尉 | 園三〇畝 | |
| 三等侍尉護尉雲騎尉 | 園二四畝 | |
| 督府布按總兵 | 園三六畝 | |
| 道員副將參將 | 園二四畝 | |
| 府州縣遊守等官 | 園一八畝 | |
| 新來壯丁 | 地三〇畝 | |
| 公主 | 園三六〇畝 | 以下順治七年定 |
| 郡主 | 園一八〇畝 | |
| 縣主郡君縣君 | 園一五〇畝 | |

| | | |
|---|---|---|
| 輔國將軍 | 地一八〇畝 | |
| 鎮國將軍 | 地二四〇畝 | |
| 奉國將軍 | 地一二〇畝 | |
| 奉恩將軍 | 地六〇畝 | • |
| 佐領 | 地三〇畝 | 康熙二年定 |
| 領催 | 地一八畝 | |
| 守衛陵寢宮內大臣 | 園九〇畝 | 總管副管有差 |

3八旗莊田表：

| 旗名 | 軍名 | 初次之給地 | 二次之給地 | 三次之給地 | 合計 |
|---|---|---|---|---|---|
| 鑲黃旗 | 滿洲 | 一・一六三頃・六〇畝 | 二五三八頃・九〇畝 | 一三二三頃・一〇畝 | 頃　畝 |
| 鑲黃旗 | 蒙古 | 一七九四・三〇 | 一七〇〇・一〇 | 四二三・九〇 | |
| 鑲黃旗 | 漢軍 | 三〇〇〇・四〇 | 一一八八・三〇 | 一〇五三・〇〇 | |
| | | | | | 二・〇六三三・〇四 |

| 旗 | | | | | |
|---|---|---|---|---|---|
| 正黃旗 | 滿洲 | 四四〇六・四〇 | 九一七四・九〇 | 一八七三・八〇 | |
| 正黃旗 | 蒙古 | 七五六・九〇 | 一一三七・一〇 | 一八八四・六〇 | |
| 正黃旗 | 漢軍 | 一二七四・二五 | 一八七八・七八 | 一一六七・一五 | |
| | | | | | 二・三五四三・八五 |
| 正白旗 | 滿洲 | 五七二七・三〇 | 三三三六・九〇 | 四三五四・一〇 | |
| 正白旗 | 蒙古 | 一二九三・七五 | 一三四七・五五 | 一〇九四・八五 | |
| 正白旗 | 漢軍 | 八六七・六〇 | 一四六五・二〇 | 一四三九・七〇 | |
| | | | | | 二・〇七九六・四八 |
| 正紅旗 | 滿洲 | 二一二九・八八 | 二一二九・八八 | 二一二〇・七〇 | |
| 正紅旗 | 蒙古 | 三五・六八 | 九六五・六〇 | 五五五・三〇 | |
| 正紅旗 | 漢軍 | 二七八・一〇 | 六四〇・八〇 | 三七〇・二〇 | |
| | | | | | 三二〇七・八〇 |
| 鑲白旗 | 滿洲 | 六二六八・五〇 | 二六七四・二〇 | 二三九〇・二〇 | |

| 旗 | 族 | | | | |
|---|---|---|---|---|---|
| 鑲白旗 | 蒙古 | 一〇一四・三〇 | 一八六一・九〇 | 九五六・一〇 | |
| 鑲白旗 | 漢軍 | 六〇九・〇〇 | 三〇三・三〇 | 四六八・八〇 | |
| | | | | | 一・六四四四・三〇 |
| 鑲紅旗 | 滿洲 | 一二〇〇・七〇 | 五七八七・一五 | 二六一三・二八 | |
| 鑲紅旗 | 蒙古 | 三五・四〇 | 三四五・五 | 六四三・二〇 | |
| 鑲紅旗 | 漢軍 | 三〇七・八〇 | 六三〇・〇〇 | 五九三・七〇 | |
| | | | | | 一・三〇五三・七〇 |
| 正藍旗 | 滿洲 | 六一九八・七五 | 三九九二・七〇 | 二〇七九・四〇 | |
| 正藍旗 | 蒙古 | 一二〇三・〇〇 | 七二三・九〇 | 七二一・六〇 | |
| 正藍旗 | 漢軍 | 八八三・九五 | 七三三・九〇 | 四一〇・四〇 | |
| | | | | | 一・七二三六・六〇 |
| 鑲藍旗 | 滿洲 | 六五一二・八〇 | 二三四〇・九〇 | 四六〇・四〇 | |
| 鑲藍旗 | 蒙古 | 一五四八・三〇 | 二四〇・七八 | 三三二・三〇 | |

| 鑲藍旗漢軍 | 九五八·七〇 | 四八三·六〇 | 四五三·六〇 | 一·四二〇一·二八 |
|---|---|---|---|---|

4 駐防莊田表：

| 所在地 | 面積 |
|---|---|
| 盛京、興京內原遼陽界內之兩黃旗及內務府三旗所屬壯丁地 | 一八〇四步，二七九〇頃畝 |
| 盛京興京遼陽鐵嶺秀岩界內禮部六邑官所屬壯丁地 | 五〇〇〇，九九三 |
| 盛京界內之製造庫匠役人等之地 | 二二，二二〇 |
| 盛京界內盛京工部倉官莊之地 | 三二二四，一一〇 |
| 盛京界內盛京禮部莊頭壯丁地 | 四七，〇九，五 |
| 盛京界內盛京兵部站丁地 | 六二，七四　八 |
| 盛京界內盛京工部莊頭壯丁之地 | 七六，五六　三 |
| 盛京界內八旗所屬王公大臣及官員閒散兵丁地 | 一七八二，二二·五 |
| 撫順內左翼四旗所屬王公大臣之地 | 一七〇二，五〇，[illegible] |

| | |
|---|---|
| 開原界內八旗莊屯地 | 五三三，六四，〇 |
| 遼陽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 | 八八八，五五，〇 |
| 鐵嶺界內左翼四旗莊屯地 | 八六七五，四四，二 |
| 法庫邊門莊屯地 | 六七八，五五，〇 |
| 威遠邊門莊屯地 | 二二八，八七，〇 |
| 英額邊門莊屯地 | 一二六，七二，二 |
| 鳳凰城八旗巴爾呼地 | 一九四八，六四，〇 |
| 鳳凰城正黃旗屯地 | 六〇一〇，九，〇 |
| 唐河邊門分種地 | 二四，三四，〇 |
| 四台門屯地 | 六一，五九，〇 |
| 復州界八旗分種地 | 一七二九，四〇，〇 |
| 熊岳城界內八旗蒙古滿巴爾呼官軍莊屯地 | 二八八三，三九，〇 |
| 金州界內八旗滿蒙古漢軍官員兵丁地 | 三三四一，〇四，〇 |

| | |
|---|---|
| 水師營地 | 二六，一八，〇 |
| 山海關界官員兵丁寡婦閒散人等之地 | 一〇三，五七，七 |
| 正白正紅鑲紅三旗下閒散人等之地 | 三，六七，〇 |
| 秀岩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 | 二一二，〇二，七 |
| 蓋州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 | 四六，三八，〇 |
| 牛莊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 | 二九二三，〇〇，〇 |
| 廣寧城所屬巨流河白旗堡之界內八旗官員閒散人等之地 | 一五一九四，九八，二 |
| 錦州界內王公宗室額駙馬之地 | 二七一七，〇七，八 |
| 錦州界內八旗兵丁閒散人等之地 | 一〇五七，五〇，四 |
| 義州界內八旗莊屯地 | 五四七一，二五，〇 |
| 清河邊門總屯地 | 五三四，二三，〇 |
| 九關台門總屯地 | 二三二，一八，〇 |
| 吉林烏拉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 | 二七三四，九四，〇 |

| | |
|---|---|
| 寧古塔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 | 二九三六，三〇，〇 |
| 王戰春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 | 五三三，六四，〇 |
| 三姓地方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 | 六六〇，六〇，〇 |
| 伯都納界官員兵丁開墾地 | 一一三四，一〇，〇 |
| 阿勒楚喀界官員兵丁開墾地 | 二九四，四八，〇 |

5 牧地面積表：

| 旗別 | 所在地 | 面積 |
|---|---|---|
| 鑲黃旗 | 武清縣寶坻縣 | 東西七〇里南北九〇里 |
| 正白旗 | 天津 | 西北至東北四二里西南至東北六五里 |
| 正紅旗 | 璣山(1)蘆溝橋(2) | (1)一五頃(2)二七頃六〇畝 |
| 鑲白旗 | 通州 | 二四頃八〇畝 |
| 鑲紅旗 | 順義縣天竺馬房村 | 三五頃二八畝 |
| 正藍旗 | 豐台王爾莊 | 東西三〇里南北五〇里 |

| 鑲藍旗 | 落草橋（1）廟房（2） | （1）一〇里（2）一八里 |
|---|---|---|
| 揚種木牧場 | 錦州廣寧縣屬彰武台邊門外 | 東西一九〇里南北二五〇里 |
| 御馬廠 | 獨石口之東北搏羅城 | 東西一三〇里南北一九七里 |
| 元部牧廠 | 張家口之西北察喜爾圖察罕城 | 東西四六里南北六五里 |
| 太僕寺左翼牧廠 | 張家口之東北喀喇呢 | 東西一三〇里南北五〇里 |
| 太僕寺右翼牧廠 | 張家口之西北齊齊爾罕河 | 東西一五〇里南北六五里 |
| 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牧廠 | 張家口之西北諾穆罕搏囉山 | 東西一三〇里南北二五〇里 |

我們看了上面一些統計，關於「官莊」和「公田」的面積的廣袤，真會令我們咋舌！很顯然的，此種土地占有的形式，是一種集中的形式，這些數目字不過表示土地集中在貴族和官僚的手裏罷了。當然，還有一部份土地是集中在高利貸商業資本和地主的手裏，然而，這些數目的多少，是沒有精確的統計。但是，土地的自由買賣的過程因着商業資本的發展而加速，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關於這土地買賣——即土地所有權讓渡的方式，在清朝有兩種不同的形式：即是說有「永久」的和「暫時」的區別。所謂永久的讓渡，即是出賣的意思，而暫時的讓渡，則係指典與租而言，性質完

全不同；茲錄其土地買賣的形式——契券形式如下：

A賣契書式：

立杜絕賣房地文契契人○○○今因乏用，願將自置（或祖遺）房地一所段共若干間畝坐落在○
○地方憑中說合出賣於
○○○名下永遠為業言明時值○平銀若干兩整其銀即於筆下交足並無短少亦無拖借折準
等情自賣之後任憑置主管業倘有親鄰爭競有賣主一面承當恐後無憑立此賣契永遠存照

四至東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原賣老契幾紙並交新主收存（或原賣老契日後尋出作為廢紙）

立賣契人○○○押
中　　人○○○押
保　　人○○○押
經　　紀○○○押

年　　月　　日

B典契書式：

立典契人○○○今因正用不足情願將自置房屋（或田地）坐落○○○地方○房○○間牕門俱全煩中說合出典於○○○名下言明典價○○銀若干兩（或錢若千千文）自此典後以○年爲限年滿之日照價回贖倘年限不滿須給某姓按年包租自典之後倘有族人爭競違礙者有業主一面承管恐後無憑立此存照

立典契人○○○押

中　人○○○押

年　月　日

C租契書式：

立租地基人○○○今有自置（或祖遺）坐落○○○地方水旱地一段計○畝○分四至地○姓憑中說合情願租與○○○名下造房營業言明租價每年交租地價銀○○兩永無漲落按年（或四季）交納如租價不納卽將地退回其房或拆或賣認租主自便惟租價不欠業主不得索退此係三面言明兩相情願各無返悔俟後如有地鄰或本族子姪出頭爭競違礙情事由地主一面承管不與租主相干恐

後無憑立此租契存照

立租地基人〇〇〇押
中　人〇〇〇押
地　保〇〇〇押

年　月　日

此三種契約形式的存在極乎明顯的表示了農民爲商業高利貸資本之束縛而陷於破產失地的悲慘的命運之中，換句話說，在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貧苦的農民們，縱然極艱苦的與命運奮鬥，終不能擺脫商業資本的羈絆！

同時，那騎在農民身上與土地結成不解之緣的賦役制度，也是使農民們陷於破產和窮困的一種動力！在滿清統治階級之下有三件最利害的剝削農民的法寶，這三件法寶也可以說是滿清政府毒螫農民的利器。

第一件法寶名字叫作「火耗」：本來，在明朝已經形成了這個所謂「火耗」的制度，而滿清政府繼續明代統治以來，不但沒有從農民身上除去了這種鐐銬，甚之，還繼續的擴大牠對於農民壓榨的作用；先是一些官僚臣僕們，以爲農民交納來的膏血——銀子，由本色變成折銀，解部的規則有一定的

成色，鑄鎔的時候，當然免不了許多的耗折；可是對於這些耗折他們不僅不認這是自己的損失，並把這種損失加到農民的頭上，而滿清皇帝，復認為這種剝削是公共收入中的一種正額而加以批准，從此以後，便為那些「狐假虎威」的臣僚們，開闢了一條剝削農民的新途徑；他們往往遇着一些所謂公事，便加派私徵去搜刮農民身上的血汗，以飽自己的私囊，但是却肩着一面所謂「火耗」的大旗，企圖用這面旗幟以掩蔽牠那兇殘的面貌，其實，這個旗幟的本身就是殘酷剝削的象徵：

第二件法寶叫做什麼「平餘」：按所謂「平餘」的制度，最初並不是普遍的存在；牠的起源祇是四川地方政府一種特殊的剝削。並且也祇是四川一省施行而已。在乾隆的初年，四川的巡撫——碩色，他為充實自己的錢囊起見，便不惜採取一種敲骨吸髓的所謂「平餘」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在奏章中說：「川省恆例相沿，火耗羨餘外，百兩提解六錢，名曰「平餘」！」

任何一隻貓子都是喜歡吃魚腥的。即所謂「皇帝」之貪得無厭的情形，彷彿和貓子吃腥魚一樣的，凡是能夠使牠收入增加的計劃，縱然是極殘忍的，牠總是笑逐顏開的採納；

因此，皇帝是毫無問題的批准了這個建議！

從此以後，在各省的農村中間，於賦稅的正額之外，又平添了一種所謂「平餘」的制度；「苛政猛於虎」！我們相信這種制度對農民的毒害，等於猛虎生翼，牠不知吞盡了多少農民的膏血！

剝削農民的第三件法寶叫做『漕折』。

『漕折』這個名稱彷彿是新鮮而特別，如果我們詳細的去考察這個制度的內容，那麼，牠眞夠集殘酷，苛刻，卑鄙和齷齪的大成，設與以上兩種制度衡比。誠然是有霄壤之別，其毒辣的程度比上兩種高出不知幾百倍！

這制度的形成是在嘉慶道光之間，當時的各省漕糧多收折色，每担漕糧折銀或錢若干，這是因爲政府之需要貨幣，從反面觀察，也就表示農民受商業資本統治之深刻。如各省的『漕折』並不一律，每一石漕糧折錢自十數千至三四十千不等，要之，隨臣僚們的意智而決定，故其所折之錢，往往超過了當時的漕糧價格數倍以上。這些一切的剝削的具體的徵收的方法，可以分作如下四種：

1分限：據大清會典載分限之法，謂『州縣按全書所編賦額，分爲夏秋兩限，及期榜諭，俾約戶週知其數，二月開徵，四月輸半，五月停徵，八月續徵，十一月完徵。若物土異宜，四月未能輸半者，督府察所屬農事女紅，收成早晚，以定徵輸之期。』按此即所謂『上忙』和『下忙』也。夏限謂之上忙，秋限謂之下忙，至於時期則各省不同：有以二月至七月爲上忙，八月至十二月爲下忙者，如江蘇，陝西，四川等省，有以七月至八月爲上忙，十二月至一月爲下忙，如廣東等省，亦有九月至十二月爲上忙，一月至三月爲下忙，如雲南貴州等省，但大部份皆依政府定例，即以二月至五月爲上

忙，八月至十二月爲下忙也。

2輸催：輸催之法，係以滾單記糧戶之姓名，田畝，賦稅銀米之定額，分發於各地方之圖保，使其催促農民繳納，其性質等於一種通知書。

3印票：印票用三聯單之法，名曰聯票，票面寫明納戶所完賦額，編號鈐印，分而爲三；一附簿，一留縣，一給納戶，比限查截，以備檢對之用，給納戶者，即爲收款之憑證，其格式如下：

票根

某州縣爲徵收地丁錢糧事今據　　郡　　里

甲花戶完納

康熙　年分　月　限銀錢　已經

收明入櫃給照合存票根以候查對須至票根者

康熙　年　月　日收吏

正堂押　　里字號

合同三聯根劵

**納戶執照**

某州縣為徵收地丁錢糧事今據　　郡　　里
甲　花戶完納
康熙　年分　月　日　限　銀錢照數
自封眼同入櫃合給票照
康熙　年　月　日　櫃吏
縣押　　里字號

合同三聯糧份

**比限查截**

某州縣為徵收地丁錢糧事今據　　郡　　里
甲　花戶完納
康熙　年分　月　日　銀錢已經收明合
給票查截候比須至票者
康熙　年　月　日　櫃吏
縣押　　里字號

4親輸：此種方式，係置銀錢櫃於縣署門前，聽農民們自己封銀親自投納，以戶部規定的權衡，平準繳銀的輕重；關於零碎數目，准許農民以錢代替，其決定每十錢當銀一分。

關於有清一代土地佔有的形勢以及統治階級依據於土地關係對於農民的剝削，上面已經作了比較簡明的說明，這裏可暫時作一結束。至於整個滿清政府的經濟結構如何？這似乎是需要我們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 第二節　大清帝國的經濟結構

大清帝國這架統治人民的機器，牠的構成當然是非常複雜，可是牠的主要的成份是什麼？換句話說，這個政權究竟是代表那一個階級呢？關於這一問題，實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牠與有清代的農民暴動有密切聯系，如果忽視了這一問題的探討，那麼，對於農民暴動的真實原因的確是很難把握。

滿清經濟發展的路線，仍是將歷史向前推進；我們祇就商業來說，關於商業資本的發展，在滿清曾有長足的進步，主要的如關稅的收入，幾乎成爲當時財政的基本柱石。查滿清的關稅，即現在所謂常關稅，其名稱有「正稅」、「商稅」、「船料稅」三種：正稅的性質，即係按出產地方就地徵收，彷彿和現在的落地稅相類似；而「商稅」則按物價定額徵收，此二種稅則，均爲貨物稅——即商品稅。

至於船料稅則按船之梁頭太小爲徵稅之標準，而以船舶爲課稅的容體。我們爲要檢查滿淸的經濟成份以某種經濟站在領導的地位，那麽，關於各省關稅的收入以及商品之進出口的統計，特別是一八五〇年以前的——即太平天國以前的經濟統計，是需要我們的注視。玆將這一時期滿淸各省的重要關津以及這些關津收入的總額，分別列如下表：

A乾隆朝各省關稅表：

| 省別 | 關別（尚有分關繁多不具列） | 徵收總額 |
| --- | --- | --- |
| 京師 | 崇文門，左翼，右翼，通州， | 一三，四八一五 |
| 直隸 | 天津，張家口，山海關，龍泉關，紫荊關，獨石口，古北口 | 一四，三六八八 |
| 盛京 | 奉天關，湖納湖河，輝發莫欽，白都納，中江關， | 二，四一一九 |
| 山東 | 臨淸關，東海關， | 四，三二〇五 |
| 山西 | 殺虎口，歸化城， | 一，六九一九(?) |
| 江蘇 | 江海關，揚由關，滸墅關，淮安關，廟灣口，西新河 | 一二二，九七二一 |
| 安徽 | 鳳陽關，蕪湖關， | 六〇，四七四五 |

| | | |
|---|---|---|
| 江西 | 九江關，贛關， | 四四，四九一六 |
| 福建 | 閩海關， | 三三，七八一三 |
| 浙江 | 浙海關，北新關， | 三〇，四二一六 |
| 湖北 | 武昌關，荆關， | 九，五五八四 |
| 湖南 | 辰關， | 一，六四二二 |
| 四川 | 夔關，打箭鑪， | 一八，二七八九 |
| 廣東 | 粵海關，太平關，北海關， | 六五，二四八五 |
| 廣西 | 梧關，潯關， | 一〇，八八一九 |
| 合計 | | 四三二，四九七七 |

B道光時代的各省關稅表：（據石渠餘紀塡錄）

| 戶部二十四關 | 定額 | 道光二一年實徵 | 二五年實徵 | 二九年實徵 | 留支歲出 |
|---|---|---|---|---|---|
| 崇文門 | | 一〇•二一七五兩 | 三二•三一六六 | 三三•三七九 | 三•五一〇三•二五兩 |
| 左翼 | | 一•〇〇〇〇 | 一•二一〇八 | 一•〇六三三 | 八六三三•六一 |

| | | | | | |
|---|---|---|---|---|---|
| 右實 | | 一•〇〇〇〇 | 一•一二〇〇 | 一•〇三八一 | 八六六二•七〇 |
| 坐糧廳 | | 一•二三三九 | 一•二三八七 | 二•二四一九 | 八九一四•〇九 |
| 淮安關 | | 三三•八六七九 | 三五•五七六〇 | 一四•六九一六 | 一四•六九一六•九一 |
| 滸墅關 | | 四四•一一五一 | 二七•二五四〇 | 三四•〇二八〇 | 三四•〇二八八•四九 |
| 揚州關 | | 一六•三七九〇 | 一六•三八〇八 | 一一•四八五三 | 一一•八四五三•六三 |
| 蕪湖關 | | 三三•九九一九 | 二七•二九四七 | 二七•四三三九 | 二四•三〇四三•五三 |
| 西新關 | | 七•四三七六 | 四•二六一二 | 四•一八九二 | 僅數撥支 |
| 鳳陽關 | | 一〇•七一五九 | 一〇•七一九九 | 一〇•六三〇三 | 僅數撥支 |
| 江海關 | | 六•五九八〇 | 五•七〇四一 | 七•二九九七 | 僅數撥支 |
| 天津關 | | 六•八[illegible]五六 | 八•三六一八 | 五•三五四七 | 四•四八九七•五七 |
| 臨清關 | | 四•八三七六 | 五•九七三九 | 八•五四四一 | 六•八三九七•一八 |
| 九江關 | 五三•九三八一 | 五六•二九三二 | 四五•一七四〇 | 五七•九〇一三 | 僅數撥解 |
| 贛關 | 八•五四七〇 | 九•三〇四八 | 九•三一八四 | 九•三七七一 | 八五三一四•八七四 |

| | | | | |
|---|---|---|---|---|
| 北新關 | 一八·八〇五三 | 一八·八五六六 | 一八·八五三五 | 一八·八四九八 | 一五·八九五五·九三九 |
| 浙海關 | 七·九九〇八 | 如額 | 七·八〇一八 | 如額 | 僅徵撥支 |
| 閩海關 | 一八·六五四九 | 一九·九四六五 | 一八·五九五五 | 一九·三〇二二 | 一八·六〇二二·八〇八 |
| 太平關 | 一二·八一七五 | 一三·五二四五 | 一三·五二五三 | 一一·八六四三 | 一·五〇六三·一六四 |
| 粵海關 | 八九·九〇六四 | 八六·四二三三 | 二三六·二一六四 | 一四三·九七六六 | 八〇·七七六八·六二 |
| 山海關 | 一一·一二二九 | 六·一七六〇 | 六·一七〇三 | 六·二六九五 | 四·一四九四·一三七 |
| 張家口 | 六·〇九六一 | 二·〇〇〇四 | 六·一七〇二 | 六·二六九五 | 二·〇〇〇〇 |
| 殺虎口 | 三·二三三三 | 一·六九一九 | 六·一七〇二 | 六·二六九五 | 一一八八·三 |
| 歸化城 | 一·六六〇〇 又錢九〇〇〇串 | 二·三五六六 | 二·三四一八 | 二·二七四九 | 六〇五〇·三三 |
| 共計 | 三九八·九三三五兩 又錢九〇〇〇串 | 三九一·五一〇六 | 五三三·八八九七 | 四四〇·一五〇八 | 三三二·五三六一 |

C道光時代工部五關收入表：（註）

| 關名 | 定額 | 道光二一年實徵 | 二五年實徵 | 二九年實徵 |
|---|---|---|---|---|
| 黑龍江 | 一一·二六〇七 | 九·五七四〇 | 一〇·〇九〇〇 | 一三·〇三九七 |

| | | | | | |
|---|---|---|---|---|---|
| 蕪湖關 | 一三·六八五三 | 一〇·一〇三一 | 一一·七一九六 | 一一·七〇八一 |
| 宿遷關 | 五·六六八四 | 五·九四二六 | 二·六九三四 | 二·七六四八 |
| 臨清甎版閘 | 八三七二 | 六一五五 | 七二七一 | 七四五三 |
| 南新關 | 四·九四六九 | 三·〇二四七 | 七二七一 | 七四五三 |
| 共計 | 三六·三九八五 | 二九·二五八九 | 二七·二五四八 | 三〇·三三六六 |

註：據大清會典載「凡天下之關津，戶部掌之；其隸於工部者，專稅竹木，若商旅輻輳之地，因地制度。」

我們根據上面的一些數目字，極乎明顯看出了清代初期商業的發展，尤其是在江蘇，廣東，浙江，福建以及江西等省，那關稅的收入超過以前一切的紀錄；這表數目字的反面，充分的表示了農村之倚賴城市和農民破產，如因國際貿易的發展以及歐洲資本主義的侵入，其結果農民的膏血又不斷的外流。

歐洲資本主義侵入之具體的形態，在經濟生活中首先表現出來的便是入口貨的增加；茲據英美兩國政府對外貿易的報告，在一八五〇年以前，鴉片與棉花的輸入是不斷的擴大其數量，茲將這時期輸入的商品的國家以及商品的名稱列表如下：

| 商品的名稱 | 一八二九年 | | 一八三四年 | |
|---|---|---|---|---|
| | 英 | 美 | 英 | 美 |
| 棉花　担 | 七四三八五 | — | 四四〇二〇五 | — |
| 鴉片　箱 | 一一〇〇四 | 一二五六担 | 一七一一二 | 三八〇担 |
| 棉布　包 | 三五二八〇 | — | 四八三六九 | |
| 棉紗　担 | 六三〇 | | 三八四八六美金 | |
| 細呢　包 | 二五一九 | 五二〇〇 | 五七七二包　五九九八一五碼 | 一〇一八九 |
| 檀　担 | 九七一八 | 一八二〇六 | 三二三〇 | 五六〇〇 |
| 水銀　担 | 五五 | 六三七四 | | 一〇一五四 |
| 珍珠　美金 | 二〇六七〇〇 | | 二五一一六〇 | |
| 烏木　担 | 六三七八 | | | |
| 鐵　担 | 四〇一 | 九四〇七 | 七九七四 | 七〇六一 |

| 品名 | 單位 | | | | |
|---|---|---|---|---|---|
| 魚 | 担 | 四二五五 | | 一四七二 | |
| 鉛 | 担 | 一一九三 | 一三一一九 | 一九五〇 | 二九三五六 |
| 銅 | 担 | | 三二三七 | | 九七八九 |
| 錫 | 担 | 五七三七 | 七〇〇 | 五七六二 | |
| 皮毛 | 隻 | | 七五六〇三 | 三三三六一美金 | 二八〇〇〇 |
| Komrot包（布的名稱） | | 六〇〇 | 三九〇〇 | 五三〇五 | 一九一二 |
| 米 | 担 | | | 六二三三六 | |

我們綜括上面各種統計的材料，牠已經反駁了人們估量大清帝國爲所謂「封建社會」的錯誤；當然，這時期封建殘餘的成份幷不能說牠沒有，不過，在經濟上牠實是一種附屬的作用罷了。滿清政府很顯然的在經濟上牠幷不是單純的代表滿洲貴族的利益，是更深一層的與中國地主和商業資本結婚。

要解釋這兩問題，我們不願再從經濟材料方面，作煩瑣的徵引，僅舉幾件與滿清政權有關聯的事實加以補充吧！

第一，從雍正皇帝的口中對於商人——主要的是鹽商們生活的形容，便可以做我們測驗該社會內容的一般標誌，如他在雍正元年的諭旨裏曾經這樣的說過：「……節儉之風，貴行於閭里，奢靡之習，莫甚於商人；朕聞各省鹽商，衣物屋宇，窮極華麗，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妓樂，恆舞酣歌，宴會嬉遊，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爲沙泥！甚至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於仕宦。……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處鹽商皆然，而淮揚尤甚！……』

當然，這種議論實有牠的客觀的事實，絕不會是過分的形容啊！

當時的商人生活的豪奢，與現在的銀行資本家以及交易所大王們的奢侈生活，縱然有時間空間的不同，而其享樂則一也。上面我們引的雍正的諭旨，不過是形容當時商人的生活，至於這個政府和商人們的關係，在乾隆時代，政府幾幾乎完全蹲伏在商人——鹽商的錢囊面前；當時鹽稅的收入，已經成爲政府收入的大宗，每年有五百餘萬兩之庫銀的鹽稅，如果與滿清最初入關時候鹽稅衡比，那麼，乾隆時代已增加了十倍以上了。

這種鹽稅收入增加的現象，并不是偶然而致，而是滿清政府赤裸裸的擁抱着鹽商的結果；如乾隆時代對於鹽商有所謂「投効」和「帑息」的規定，實際上，此種規定，等於賣淫婦人勾引顧客的柔媚的秋波。

商人與政府既然結成不解之緣，牠們彼此的關係，當然是異常的親密，從那所謂「召對賜宴」和「頒給殊典」的八個字當中，充分的流露了滿清政府與商人「度蜜月」的情況。因此，我們從一觀點出發去分析乾隆的屢次南巡是為的什麼？便不難得着結論了。

但是，地主階級與封建殘餘他們對於此種現象不禁是醋海興波，這班人以曾國藩和胡林翼爲代表，在釐金(註)問題上，他們曾流露了那忍耐不住的「醋勁」；他們怨憤的說：「嘗謂軍餉無出，與其專加農人之担負，莫若令商人分担之！……」（見胡鈞著：中國財政史三五六頁）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是無的放矢嗎？

由此，關於滿清的經濟的結構，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結論：即是說：這個政府是滿洲貴族和中國商業資本互相提攜的結果！

(註)所謂「釐金」者，就是標明百分之一的稅率的意思，這個制度是防害商業的發展的。

## 第三節　初期的農民暴動

經濟的矛盾，加深了事變的發展！在清代的初期，統治階級雖然鎮壓了「三藩」的復辟運動，可是牠並未解決那所謂「民生國本」的土地問題。所以，這個政權在相對的穩定之下又開始動搖，換句

話說，這種穩定是建築在慢性的事變上面。

臺灣的農民暴動，就是這個慢性事變的開展。

考「臺灣」在明朝的末年，仍係個很散漫的部落，而不是什麼集中的或者是統一的地方政府；不過僅以鷄籠山一地著名而已。關於這個地方的位置和風俗，明史曾有如下的紀載：「因其在澎湖島之東北，故號曰北港，或稱東番，距泉州甚近；地多深山大澤，聚落星散，未有君長，有十五社，每社多者千人，少者五六百人，亦無徭賦，以子女多者為雄，聽其號令。雖居海中，畏海殊甚！不善操舟，老死不與鄰國往來！永樂之時，鄭和偏歷東西洋，無不獻琛恐後，獨東番遠避不至，和惡之，每家遺一銅鈴，使懸頸際，蓋以狗國擬之也。其後人反以為貴，富者綴鈴數個曰：「此祖宗之所遺也」！俗尚勇，暇則習走，日可數百里，不讓奔馬，足皮厚數分，履荊棘如平野，男女推結，裸逐為常……！」在明朝因為國際貿易的發展，這個地方幾乎成為倭寇的世界，并且因此時常引起國際間的交涉，特別是與日本的交涉。

此種情形，歷史紀載得非常顯明；如「嘉靖之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此，其黨林道乾從之；已而又恐為官兵追擊，揚帆直抵浡泥，攘其邊城以居，號道乾港，而鷄籠遭倭焚掠，國遂殘破。初居海濱，既遭倭難，避居山後，至萬歷末，紅毛（即現在的荷蘭——著者）番泊舟於此，因事

耕墾，且設闤闠，稱曰臺灣！」（明史）觀此，則臺灣當其開闢之初，已成爲荷蘭人的殖民地了。當然，這種雛形的殖民地，并未排斥中國人種的移動，因此，有很多的商人與流民紛紛的向這一濱海的地帶——臺灣移動；這些移民，不僅來自南中國，甚之，就是距離很遠的山西商人，亦曾開墾臺北平野。因此，東瀛記事曾評論說：「臺灣者，雄視東海，橫亙千餘里，土地膏腴，家多殷實，民氣易動難靜，土性鬆脆，民族浮囂，草間求活之徒，無藉可歸之氓，趨之若鶩，無妻子之戀，無田宅之安，聚即爲羣，動輒滋事。」云云。

在中外商人共公投資的條件之下，臺灣已經成爲各國的殖民地了，這種殖民地的象徵，首先是日本人因爲濱海接壤的關係，時常虎視耽耽，而荷蘭人的東航，西班牙人對於臺灣的渴望，更是其欲逐逐；因此，僅僅一個臺灣問題，已造成了各國商人鈎心鬬角的衝突。但這複雜的衝突，至一六六一年始經鄭成功加以武力的解決了。以後，因滿清政府對於臺灣的垂涎，用種種方式如勾結荷蘭軍艦與收買臺灣的上層份子，終於攘奪了鄭成功的基業而將臺灣劃入於滿清的版圖之內。

大清帝國既然得着這樣一塊肥美的土地，爲的要使這個地方羣衆之屈伏於牠的鐵蹄之下起見，不得不加緊其對於人民的壓迫，以作鎮壓羣衆反抗的示威，因此，臺灣剛被大清帝國劃入版圖以後，而這個地方羣衆的一切自由，立刻就被宣判死刑；那所謂臺灣知府——王珍，在這種路線之下，不僅限

於殘酷的摧殘農民的自由結會，并且還幫助中外商人對於森林利益的壟斷，把砍伐山木的農民成千成百的屠殺，以被壓迫農民之鮮血和頭顱，去博取商業資本家的歡心。

然而臺灣的農民，他們對於統治者的高壓政策并不發生絲毫的畏懼心理，反之，只有更積極的來和他們的敵人作戰！而那農民出身的黃殿與朱一貴，便是這次作戰隊伍的領導者；他們在政治上的旗幟主要的是「反清復明」，并以朱一貴這明代後裔的招牌去號召。

中國歷史上每一次農民暴動的爆發，在最初都是「一呼百和」，所以這一次的反抗鬬爭一開始就給統治者以嚴厲的打擊，於七月之內就佔領了全臺灣，聲勢的雄壯，的確令統治階級發抖！但是，臺灣是新開闢的地方，加之暴動的組織之非常複雜，內部的意見之極不一致；如廣東人和福建人以狹隘的地方觀念出發而互爭雄長，在客觀上使統治階級充分的準備，故其結果，一次的劇烈戰爭便瓦解了這個農民暴動。

第一個革命的浪花過去了，接着第二次農民鬬爭的浪濤又緊逼而來！

這次鬥爭的浪濤與前一時期不同，因牠含有一種原始組織性質，此種農民原始的組織——所謂「天地會」的組織，當中曾蘊蓄着一斷奇怪的故事。

傳說「天地會」（或稱「三合會」）之最初的形成，是在福建福州府浦田縣九連山（也有人稱九

龍山——著者〕，這個地方這山中有名叫「少林寺」的寺院，便是天地會的發源地；這寺院的和尚他們在誦經之暇，更從事於技擊的練習，因此，在武藝方面頗獲得社會的贊譽。康熙時代（或曰乾隆時）有名叫西魯國的國王，引兵來犯，滿清軍官雖屢次征討，但是都殺得大敗而回！因此，皇帝曾懸重賞，不論貴賤男女僧道，如果能夠戰敗西魯國，便給他升官晉爵；少林寺的僧徒當中有鄭君達其人，曾偕和尚一百二十八名，大敗西魯國的軍隊，幷因此將少林寺武藝超羣的聲譽傳播得遐邇咸知。後有陳文耀與張進秋者便因忌成恨而在皇帝面前建議，以為如果這些和尚造反，國家將窮於應付；結果，皇帝接受了他們的建議，要他們以火藥去焚炸這個寺院。曾有馬儀福者，因引誘鄭君達之妻郭秀英及其妹鄭玉蘭而為僧衆所不容，驅逐於九連山之外；因此，他懷恨在心，便為官軍的先導，焚毀了少林寺，絞殺了鄭君達，而郭秀英與鄭玉蘭則因官兵所逼投「三合河」而死！所剩存的僧徒僅有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五人，則遠走天涯，企圖一雪少林寺之恥；其時適有朱竹洪其人，自言係明朝崇禎皇帝的嫡孫，在反統治者這一點上，與以上五位僧徒情投意合，遂決定共同担起「反清復明」的任務。當時他們曾經過很多的磨折，幷因此紛紛的隱遁於江河山澤之間，在羣衆中作猛烈的反清復明的宣傳。這種「天地會」會員主要的證名，便是一首很通俗的詩句：

「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此事傳於衆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註）

（註）這一段材料，主要的是參考商務印書館版中國祕密社會史一三頁——二二頁

當然，關於形成「天地會」的這種傳說，我們是不能加以全部的接受，不過，我們從這些傳說中間是可以把握此種組織發展的過程。很顯然的，在農村經濟急劇破產的地方，農民受着經濟發展的激蕩和地主官僚的壓迫，他們在無路可走的時候，不得不幻想一個冥冥中的主宰——神來拯救自己，在此種情況之下，那失意的官僚便利用這個力量來達到復辟的目的，天地會組織的最初形成，我想一定是關於這種公式。試看他們的口號：「反清復明」就可以解答了！

而林爽文便揭起「天地會」這面農民暴動的大旗！

林爽文他是天地會重要分子之一，并曾經在臺灣各縣的農村中間作過很長時期的煽動工作，而官僚與地主的貪橫，客觀上更是促成他們組織發展的動力；如果就組織的數量而論，牠的確達到驚人的廣泛的程度。可是這一原始的農民組織，在牠各種準備尙未充分以前，不幸得很，其內容竟爲統治階級所發覺，故於乾隆五十一年的時候，臺灣的總兵柴大紀與孫景燧等便企圖以武力來消滅農民的反抗運動。其實，革命的火焰已在每個臺灣農民的心中燃燒着，這種武力的壓迫，對於農民的反抗運動不啻火上加油！

在林爽文領導之下的農民暴動，竟於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開爆發了！當時暴動的隊伍

是採取突擊的戰略，將鎮壓農民反抗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許多統治階級的走卒，都抱頭鼠竄而逃、全臺灣三分之二已落到農軍的手裏；參加這次反抗運動的農民，竟達十餘萬之多！但是，局部的農民暴動如果缺乏與各地農民鬥爭的聯系，如果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如果不取得政治經濟的中心區域，其失敗的命運歷史是不乏先例。這次暴動雖然支持了半年之久，雖然過着艱苦鬥爭的生活，然而終爲統治階級殘酷的鎮壓了！統治階級縱然用很大的力量鎮壓了臺灣農民的反抗運動，但是就整個中國範圍來說，農民鬥爭總是此起彼伏的爆發！

「白蓮教」的暴動，就是緊接着臺灣農民反抗運動的革命潮流。

所謂「白蓮教」的名稱，係起源於元代的末年，欒城人韓山童便是創造這個祕密組織的首領；他們的工作方式是以燒香的名目去接近農民羣衆，在和農民們見面以後，即進一步的作帶煽動性的宣傳，不是說「天下馬上就要大亂」，便是說「彌勒佛已經降生」。在河南及江淮一帶，接受此種宣傳的農民很多，於是乎他想依據這個廣泛的農民革命的基礎，來做政治鬥爭的營陣。因此，他的黨徒如杜遵道羅文素等便向羣衆解釋，說什麼韓山童實係宋徽宗的第八世孫，而應當作中國的主人；他們曾刑烏牛白馬以誓告天地，并以紅巾爲暴動的信號準備奪取元朝的政權；第事機不密，這所謂宋徽宗的八世嫡孫的韓山童，爲政府所捕殺，而元朝大規模的農民暴動亦從此時演於歷史舞台！以後劉福通便

推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爲「宋帝」，肩着這塊招牌去號召各地的農民，當時，白蓮教暴動的軍隊因其以紅巾爲號的關係，一般人們都說牠是「紅軍」！然而復辟的幌子，終敵不過朱元璋的欺騙政策，所以白蓮教的勢力與張士誠陳友諒們同時都爲朱元璋所打倒。

在明朝的末年，事隔二百年以後，這個運動又復死灰復燃，在天啓五年白蓮教的運動乃重行復活，當然，其復活的主要原因是統治階級沒有解決農民問題。

以後有薊州人王森，他又努力於白蓮教之復活運動，其組織的內容，分設大小頭目及會主的名稱，而王森則自稱爲「聞香教主」，以總理白蓮教的一切事務。當時組織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了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等許多省份，其潛勢力的雄厚，使統治人民的皇帝聞而胆寒！但是這位白蓮教中興運動的首領——王森，因遭統治階級的妬視，於暴動尚未爆發以前便爲他們所逮捕。

然而，這個運動是有社會的基礎，所以并未有「人存政舉人亡政熄」的現象，他的兒子——王好賢繼承乃父的事業，與鉅野人徐鴻儒，武邑人于宏老等依舊作反對明朝政府的宣傳，在天啓二年的時候，這種潛伏的運動便公開爆發，以徐鴻儒爲首領曾攻克了許多縣城，當時徐鴻儒自稱爲「中興福烈帝」，而參加這次鬥爭的農民。竟有二百萬人之多！但是因爲糧食的缺乏，復受政府軍隊長期的包

團，各地農民鬥爭又沒有親密的聯系，所以這反抗運動在李自成張獻忠們暴動以前，便爲政府殘酷的鎮壓了。

滿清的初期，對於農民各種祕密結社尤以白蓮教的取締，是異常的注視，但是白蓮教的反抗運動仍不絕如縷的爆發；當乾隆統治第四十年的時候，安徽人劉松，對於此種反抗運動又復『老調重彈』；他恢復這種運動的方式，仍然是以祈禱天地和符咒治病爲名，幷派遣其敎徒於中國西部各省，而從事白蓮教的活動；然事機不密，此種行動復爲統治階級所發覺，當劉松在河南鹿縣進行反抗運動的時期，便爲政府的走卒所逮捕，幷被放逐於甘肅爲苦力。在滿清政府的意思，以爲『渠魁就逮』，這種反抗運動彷彿會從此消滅，而政府的統治，亦可長治久安；殊不知這種認識是敵不住事實的一擊，我們看羣衆革命的火焰已經是燒得烽火連天了。

在劉松被捕以後，白蓮教的運動經過了劉松的門徒——劉之協和宋之淸的整理，更重新開展了牠的陣容，於四川，陝西，湖北等省，吸收很多新的幹部，遂又與政府作猛烈的鬥爭；這次鬥爭的範圍，當然比以前廣泛，而鬥爭的口號，又有一新的變更。鬥爭的領導者——劉之協宋之淸們，感覺得所謂『教匪』的名稱，是異常的刺耳和不雅，於是乎便掛起民族革命的大旗！乃詐稱同教王姓的兒子——王發生爲朱元璋的嫡裔，企圖利用這青年幼童作政治上的招牌。但是在鷹犬密佈的滿清社會裏

面，此種運動還處在地下已經遭受統治階級的破壞；雖然，劉之協因逃走得免於難，惟緝捕甚嚴，往往因此而牽累到許多無辜農民之犧牲生命，例如於荆州宜昌等處，統治者曾挨戶搜查，幷且，他們的走卒為邀功起見，往往將無關的農民加以株連，乘機敲詐，如果不遂所欲，那麼，被逮捕的羣衆立刻就會有生命的危險！

於此種全國恐怖的局面之下，被壓迫的農民，皆是人人自危，為求得保障自己的安全起見，不得不和統治階級再作猛烈的鬥爭。這種反抗運動首先便爆發於恐怖中心區域的湖北，被壓迫的農民們都異口同聲的喊出了「官逼民反」的口號，且以此種口號去調動「湖北和四川兩省的農民，當時有二十萬衆的農民在此種口號之下拿着鋤頭和鐮刀與政府的軍隊作殊死戰；而政府的軍隊亦時常為農軍解除其武裝。領導這次農民暴動人物，除了劉之協以外，還有姚之富及一位被壓迫婦女的先覺者——王女士，她們在每次的行動中間都表示其特殊的作用，而以暴動的方式佔領的地方亦復很多，如荆州，宜昌，襄陽，鄖陽，施南五府，均劃入白蓮教暴動的範圍。其時中心目的是在奪取漢陽，因此，他們曾調動數十萬農民去實現這預定的目的，可是受自然地理的限制，如長江天險之隔，縱然是犧牲了近十萬的農民，也不能實現其迫切的企圖；尤其是在江陵十五里名叫龍山的地方一次殘酷的肉搏以後，把整個的暴動隊伍劃分為兩大部份，一部份向河南推進，一部份則趨四川。

四川省的農民過去已經受白蓮教的洗禮，在思想上是同意於其他各地的農民解放運動，而現在由農民所組織的白蓮教軍隊，又復光臨於四川，在內外互相策應與互相影響的條件之下，四川省的農民勢所必然要抬起頭來以發洩歷來所受的積憤；在鬥爭的過程中，很快的煅煉出三位農民領袖，徐天德與王三槐冷天祿。當時的暴動不僅是集合了農民，并且還與那班潰散的兵士和素爲士大夫們所不恥的所謂「無賴悍民」的「嘓匪」形成一條反抗滿清政府的聯合戰線；暴動的隊伍雖然闖進了四川，但是他們的總目標還是注視在奪取大清帝國的政權，因此，他們並不以四川自守，而農民隊伍經過一番補充和訓練之後，又復整裝向外發展。

在這時期，四川的農軍亟圖與他們過去分手的戰友匯合，於是在行動上總是彼此互相策應。故其所採取的戰略，與政府軍隊實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以數百人爲一組，忽分忽合，忽南忽北」。像這樣的戰略，固然是含有很濃厚的游擊戰略的意味，而其主要的作用仍然是在於牽制政府的軍隊。最後，暴動的隊伍又重新匯合起來，使湖北與四川的農民隊伍又復打成一片，并經過一度的會議，遂又重新決定再奪漢陽的總方針，但是此種預定的計劃始終是沒有實現！當然，統治階級之對於白蓮教暴動的發展，認爲實是異常危險的致命創傷，爲醫療這破爛的傷痕起見，不能不積極的去求消滅農民暴動的對策！

## 第四節　統治階級關於消滅農民暴動的對策

白蓮教的反抗運動最初爆發的時候，滿清政府已經是異常的注視，當劉松被逮以後，劉之協們領導這運動使牠脫離潛伏的狀態而變成公開的鬥爭時，統治階級的上層領袖——嘉慶皇帝曾嚴厲的責備那些討伐農民暴動不力的臣僚，如在他的詔書中說：

「去歲邪教起長陽，未幾及襄鄖，未幾及巴東歸州，未幾四川達州繼起；至襄陽一賊，始則由湖北擾河南，繼由河南入陝西，若不即行掃蕩，非但老師縻餉，且多一日蹂躪，即多一日疾苦！各將軍大臣身在行間，何忍貿然區劃？若謂事權不一，則以襄陽一路責惠齡，達州一路責宜綿，長陽一路責額勒登保福寧；若言軍餉不敷，已先後調禁旅及鄰省兵數萬，且撥解軍餉，及部帑不下二千餘萬！昔明季流寇橫行，皆由閹宦朋黨，文恬武嬉，橫征暴斂，厲民釀患；今則綱紀肅清，勤求民隱，每遇水旱，不惜多方賑卹，且普免天下錢糧五次，普免漕糧三次，蠲免積逋不下一萬萬！此次邪匪誘煽，不過烏合亂民，若不指日蕆清，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其令宜綿，惠齡，額勒登保等，各奏用兵方略，及剋期何日平賊，幷賊氛所及州縣若干？難民若干？瘡痍輕重？共十分之幾？善籌安卹以聞」。

（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

嘉慶皇帝這個詔令，他完全把農民暴動的眞面目抹煞了！在他的意思，以爲大淸帝國是個「勤求民隱」的政府，且時常普免天下的賦稅錢粮，他以爲農民對於政府應該感謝之不遑，爲什麼他們會變成邪匪而向政府樹起反叛旗幟呢？這不是個奇蹟嗎？其實，所謂普免天下的錢糧和漕銀，并不是就會使農民們得着利益，恰恰相反，這是地主和富裕農民們所竭力歡迎的事情；那大羣失掉土地的農民，與普免漕糧是漠不相關，故其詔令主要的意義是要臣僚們貢獻消滅農民暴動的策略，至於那些，「猪殯輕重」與「善籌安卹」的辭句，完全是裝飾門面之欺人的鬼話！

俗語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乖巧的孩子——明亮與德楞泰，爲的要在整個統治階級面前表示其「赤胆忠心」起見，便不惜發表其摧殘農民革命的陰謀；在他倆呈於皇帝的奏章中說：

「臣等自楚入陝，所經村莊，皆已焚毀，蓋藏皆已搜刼，男婦皆已虜掠；目不忍見！已擾者固宜安卹，未擾者尤宜隄防；查各州縣在城之民，有城池之保障，是以賊匪皆不及攻城，其村落市鎮，僅持一二隘口，鄉勇或逃不及防，或間道失守，倉皇逃避，不但衣糧盡爲賊有，且儲備之火藥器械，反亦藉寇而資盜，而各賊所至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乘騎；更換有逼脅之人，爲之鄉導負運。是以自用兵以來，所殺無慮千萬，而賊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爲急，村市已破焚掠者，若荊州襄陽有急，則房竹安康已難兼顧；爲今之計，欲困賊必須衞民，莫若飭近賊州縣，

於大鎮守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溝，其餘因地制宜，二十餘村爲一堡，或數十村爲一堡，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勞，匪所至，野無可掠，夜無可棲，敗無可脅，加以大兵乘壓其後，殺一賊即少一賊，滅一路即清一路，近日襄陽紳士——梁有穀等，築堡團守，賊屢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東各屬，多有險峻山寨，祇須令鄉民移守其中，一一如守堡之法，於以禦賊安民，必可定期撲滅！』（見同上書）

這種策略，眞是代表地主富農以及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防禦暴動農民最利害的武器，地主商業資產階級獲得像這樣一種消滅農民暴動的毒辣的武器以後，對他們的感激不僅是『綏綉平原』，并且還要『馨香禱祝』呢！

『嘉慶皇帝自獲得這樣的奏報以後，并根據各地的報告及參加自己的意見，遂決定了消滅農民暴動的總方針。在這具體的消滅農民暴動的總方針內面，包含了徵調農民與組織鄉勇（鄉勇即是現在農村中間地主富農的軍事組織，如保衞團，自衞團，挨戶團等頭——著者）的成份，并提出准於自首的辦法以分化暴動農民的內部。我們看嘉慶九年的詔諭是這樣的說：

『治流賊如治水，水之奔潰，必隄以防之，故辦賊無出勦堵二端，不堵其出路，則勦無所施，不杜其脅脅，則多勦無益；以川陝楚情形而論，川民自結寨守禦以來，賊艱掠食，日勦日減，即潰竄數

隊，每隊亦止千百，未嘗有新增之賊，何以一入陝界，每隊輒七八千？良由川東川北，寨堅民奮，遇賊逼近，則各寨民百十成羣，乘夜刼營使賊不得休息，故小賊祇出沒邊界，不敢深入。漢中興安居民散處，雖亦修堡，只知自顧，而任賊寨前奔逸，或賊攻他寨，卽不相援應，是以川東川北各賊，每思竄往他境，自後以剿捕責成領兵將帥，而團練守禦，則責成督撫，務期衆志成城，人自爲戰，限期半載，修築告竣？」（見同上書）

在這個消滅暴動農民的總方針頒佈以後，統治者幷爲補充這計劃起見，關於民團的組織及其任務還特別的單獨頒發一個詔令：「……至鄉勇原爲保護鄉里而設，若僅募他鄉游民，無田廬家室之戀，旣去其鄉，安望其勇！目前在多報開銷，事後則易聚難散，何如省此養疲兵募散勇之資，以團練本地之鄉勇，實爲事半功倍；如果劉淸尹英圖孔繼榦林嵐維昂等之寇不能犯，又如鄖西鄉勇之擊禦齊姚劇賊，使官兵得以成功，何至民爲賊掠，兵爲賊疲？總之，他省未練之新兵，不如本地之鄉勇，而本省隔屬招募之鄉勇，又不如本鄉守堡之團勇，自後各縣練勇，各寨守堡，不許調往軍營，致村莊反招荼毒；其鄉勇固守卡寨，以堵爲剿，及州縣實心倡率者，與軍功同賞！」（同上書）

統治階級旣然採取這樣毒辣的策略去對付農民暴動，加之地主和商人更澈底的更實際的更活潑的去執行這個路線，其對於暴動農民之不良的影響，當然是非常的深刻；而農民本身又經過長期的游擊

戰爭，情緒非常的疲乏，在這期間，又沒有誕生那個領導他們的強有力的階級，故在各方面已經表現了這個暴動失敗的徵兆！同時，有很多勇敢的農民領袖如姚之富冷天祿王三槐以及那位革命的王女士，都犧牲殆盡，而馬蹄崗一戰，劉之協又為官軍所逮捕，而這延長數年之久轟動一時的白蓮教暴動便從此瓦解冰消了！當然，農民革命的失敗，絕不是如一般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單純，彷彿和快刀斬蔴的一般，從此以後就不會有其他的問題發生；其實，革命的餘波仍然在着繼續的動盪呢。

## 第五節　滿淸政府的供狀與農民革命失敗的餘波

以白蓮教所領導的反抗大淸帝國的農民暴動，經過統治階級殘酷的屠殺以後而失敗了！但是雖然失敗，而其影響却是異常的光榮；中國一班士大夫們，對於這次暴動的認識，都是異常的模糊，不是說暴動的農民為『教匪』，便說農民暴動是『流寇』！剿匪滅寇當然是中國士大夫們天然的任務，如果放棄了這任務，那麼，他們便不能存在。至於談到形成農民暴動的具體原因，他們便『王顧左右而言他』了，因為這是他們最可憎的忌諱。

然而皇帝畢竟是高人一等，說到確切些他是會耍一套欺騙的魔術，他為的催眠羣衆的意識起見，不得不說出一些形成農民暴動之似是而非的原因，最顯明的便是嘉慶皇帝在壓平白蓮教所領導的農民

暴動以後頒佈的詔令，實際上這詔令也就是他對於農民暴動之似是而非的供狀啊！如他說：

『……國家深仁厚澤百餘年，百姓生長太平，若非迫於萬不得已，焉肯不顧身家，挺而走險；總緣親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變至此！然州縣之所以剝削，不盡自肥己囊，大半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之所以勒索，不盡安心貪黷，無非交結和珅。今大憝已除，綱紀肅清，下情無不上達，各省官吏，自當大法小廉，滌除積習，民間無所擾累，亦可各遂其生。惟是教匪脅迫良民，及遇官兵，又驅爲前行，以膺鋒鏑，甚之，剪髮刺面，以防其逃遁，小民進退皆死，朕日夜痛之！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其宣諭各路賊中被脅之人，有能縛獻賊首者，不惟赦罪，並可邀恩，否則臨陣投出，或自行逃散，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百姓困極思勞，勞久思息，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清代通史）

我們看統治階級的首領——嘉慶皇帝，他也不忌諱此次農民暴動的原因；他認爲『百姓生長太平，若非迫於不得已，焉肯不顧身家，挺而走險』？誠然，這暴動是從政府壓迫中產生的，但他說及產生的原因時，則以爲『親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變至此』！不錯！這也是產生農民反抗運動原因之一，然而他的結論與其所敍述的原因則不相同了！他說：『州縣之所以剝削，不盡自肥己囊，大半趨奉上司，而督府大吏之所以勒索，不盡安心貪黷，無非交結和珅』，很顯然的，農

民暴動，是整個階級對抗的戲劇，那嘉慶皇帝把此種責任完全推倒和坤一人身上，彷彿和坤已經剷除，從此以後再也不會重演這類戲劇，其實，這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任憑統治階級要什麼轉變羣衆視線的魔術，然而事實先生告訴我們說這是統治階級的鬼話！

因此在白蓮教暴動壓平以後，而革命失敗的餘波仍在繼續的動盪；關於統治階級分析農民暴動的胡說，我想，在以下的兩次事變中間一定會給他們以正面的答覆。

於整個農民反抗運動失敗以後，牠的餘波，會有兩次劇烈的動盪：其表示於社會生活中間的，首先便是寧陝新兵——鄉勇的譁變，其次，就是『天理教』的禁門暴動。

關於鄉勇問題，誠然是壓平農民暴動以後的社會矛盾之一；在確定鄉勇辦法的時期，統治階級的皇帝，一再的提出以當地農民充當鄉勇爲原則，如所謂『鄉勇原爲保護鄉里而設，若僅募他鄉游勇，無田廬家室之戀，既去其鄉，安望其勇?!』又說『團練本地之鄉勇，實事半功倍！』然而事與願違；農村中大多數貧苦的農民，都加入游擊隊伍，僅僅依賴少數地主富農之子弟，對於農民暴動的消滅是很難奏效，於是乎地主官僚不得不憑藉農村中游民無產階級——即所謂『游兵散勇』的力量，去對付暴動的農民；雖然是事先感覺得這批所謂『游兵散勇』之『易聚難散』，但是俗語說：『火燒眉毛顧眼前』，何況這是未來的隱憂，而并不是當前的危險呢！爲的要懲罰農民暴動，不能不招募大批的鄉

勇，在招募鄉勇的過程中，地主官僚們異口同聲的向游民無產階級宣傳：如果肅清叛亂的農民以後，你們不僅可以獲得敵人的財富，并且還有『陞官晉爵』的機會；但是這種話是不兌現的支票，在壓平農民反抗運動的第二天，統治階級就宣佈過去的允諾爲無效！

關於這種情形，最好我們可以參看嚴如熤先生爲鄉勇問題，寫的那篇帶尖刻性諷刺的文章吧；如鄉兵行的前篇說：

『紅旗悠悠上城頭，繞城畫角雲慘愁，羽檄星馳募鄉勇，大旗小旗森戟矛。鄉中豪俠子，亡命身未死；乘時得入驃騎營，誓取功名如折矢；夜宿沙場干斗鳴，酒酣高唱氣驕橫，黃巾十萬勢洶湧，來壓軍門雲不動，排弩架炮守壘營，將軍有令須持重！豈無中黃賁育士？軍令森嚴凜相奉。鄉兵憤火怒出鼻，大呼陷陣萬夫辟，頃刻驅狠若驅羊，諸軍鼓譟踵相繼。爬岩翻箐無處尋，岩縣削瓜箐屯雲，憑高負險侮我軍，仰視墮帽徒怒嗔；將軍下令懸重賞，孰擒賊首千銀兩，幾輩貪賞不顧生，前者頂靡後者上，籐繩累縛獻軍門，一軍歡喜得好仗，椎牛饗士軍筵設，夜奏甘泉月三捷，幾番開庫賞鄉兵，謝恩叩頭頭有血，還來就地作博場，俄頃千金如沃雪，日前班師撤歸里，中有一人泣不止，千年百戰播槐槍，兩手依舊空男子，悔要銀錢不要官，那有功名誇閭里？』

又後篇說：

「大紅旗，小紅旗，大小黃旗共迷離，七星蜈蚣稱健兒，五月十日道路塞。居人慄慄行人悚，聽說前途撤鄉勇，鄉勇十八九頑劣，中有一人獨悲咽！哀哀細從招募說：憶昔苗疆歲乙卯，烏巢河畔隨征討，鑾槍亂射百無虛，伙伴都死一身保，聽說妖氛起荊襄，達州劇賊尤猖狂，慚無顏面回故里，報名再吃鄉兵糧。夔府作軍探，湖北又河南，最後隨營過嶢關，輾轉黑河大巴山，老林百日無完衣，時見踵決血流腓，一餉二十錢，甜米斗二千，披得包穀作晚餐，青棡樹濕燒不然。昨到興安城，糧船如魚鱗，又見守營卒，個個衣履新，殺賊要鄉勇，受賞偏說冊無名；十年欲補新兵糧額少，賞金多被領旗抽，區區微勞誰見收？功不收，亦無愁，依然無面回鄉里，甘心老向南北死！」（見清代通史三卷）

嚴先生這一段關於鄉勇生活的描寫，的確是維妙維肖，如其所說：『殺賊要鄉勇，受賞偏說冊無名，賞金多被領旗抽，區區微勞誰見收？』這種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神情，怎不使鄉勇在悲痛之餘而思反抗呢！加之，統治階級於凱歌剛奏的時候，便以全力來對付鄉勇，將各營隨征的鄉勇繳械，僅僅以銀二兩五錢作遣散回籍的報酬；那一大羣鄉勇處在這種情況之下，迴顧過去的生活與瞻念未來的前途，當然是憤火中燒而掉轉槍頭向統治階級斲殺！他們以陳達順陳正倫爲先導，聯合左右二營的兵士譁變起來，殺掉了他們的壓迫者——副將游擊，澈底的破壞所謂『秩序』與『和平』，焚燒了壓迫人民的黑暗機關——監獄，將所有的囚徒悉數釋放，在寧陝城中公開的揭起反抗的大旗。

可是，結果因爲士兵內部的分化，如蒲大芳之拍賣羣衆的利益，以及統治階級的將領——楊芳之欺騙的宣傳，很快的就結束了這次鄉勇的事變。

至於天理教的禁門暴動，則係清代初期農民失敗的最後一次餘波；這次事變緊接着寧陜兵變以後，牠的形成的主要動機，可說是農民的土地革命的要求。所謂「天理教」的產生，係導源於白蓮教，牠也可以說是白蓮教運動的一個支流，其主要的領導者，爲直隸大與縣林清與河南滑縣李文成，此種組織形成的經濟基礎，的確是廣大的破產農民，他們是站在奪回自己土地的口號之下而團結起來。

據蘭簃外史靖逆記載：「……入教者，俱輸以錢，曰「種福錢」，又曰「根基錢」，事成，償得十倍：「凡輸百錢者　得地一頃」，愚民惑之，遠近踵之！……」可見這組織的形成與發展，充分的顯示出農民要求土地的熱烈！就其祕密發展的程度而論，在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農村中間佈滿了他們的信徒；在過去，他們有兩句隱語，叫做什麽『二八中秋，黃花落地』！但其時適值嘉慶十八年（即西歷一千八百十三年）閏八月，因此，他們便牽強附會的把這兩句隱語與嘉慶十八年閏二月聯系起來，并解釋成爲奪取政權的暗示，而開始組織暴動。其暴動的計劃是以精壯的農軍，裝成商人模樣，潛伏於北京城內，另一方面，又以宮中的太監劉金，劉得才，楊進忠、劉進喜們爲內應；總方針雖然

是確定了，而是實際的指揮卻分作兩路，由李文成和林清分別担任，

但是，李文成在事先沒有注意於暴動的祕密，因此，在未發動以先，李文成這一路已經遭滑縣官吏——劉斌所破獲，幷逮李文成下獄 其教徒以為事機急迫，當然不能按照預定的步驟做去，不得已攻陷了滑縣，從牢獄中救出了他們的領袖。而直隸的長垣，東明，山東的曹州，定陶等處的農民，亦紛紛起來響應他們；同時，林清這一路亦規劃進攻京師。以二百人分兩隊入東西華門，幷以白帕為號，乘統治階級戒備鬆懈 已衝進了隆宗門；但是人數很少，勢力異常的孤單，卒為嘉慶皇帝的兒子——綿甯以新式武器所擊退。加之，在暴動時正值大雨傾盆，那參加暴動的農民多因雨阻而潰散，結果，將暴動的隊伍擊退北京以外，總指揮的林清，亦為統治階級所誘殺！

在暴動以前，統治階級對於農民的反抗，亦加以注意，嘉慶十三年仁宗上諭中說：『……江南，安徽，河南，山東毗連各州縣，多有無賴棍徒，抽刀聚衆，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敎諸名，橫行鄉曲，欺壓良善。旣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辦，以靖閭閻，不可養癰貽患！』（中國祕密社會史第七頁） 當然，這次事變起來，統治階級是要竭全力來對付，故其對於滑縣李文成的叛亂，便派遣很多軍隊去包圍，暴動的領袖——李文成，感覺得沒有勝利的可能，於是乎便縱火自殺，最慷慨的是李文成的夫人，很多人勸她投降政府軍官，以享受物質的幸福，而她則說：『城亡與亡』，揮刀

巷戰去與統治階級拚命而殺死了許多有名的軍官，這位爲羣衆利益而奮鬥的女士，竟亦以自殺結束了她的生命！

清代初期的農民暴動，以這次事變作牠的總結，而大規模的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亦將緊接此次事變而表現於歷史舞台了！

# 第四章　太平天國

## 第一節　大革命的前夜

從淸代初期的農民暴動失敗的基礎上，又生長了一次偉大的革命——太平天國。這次革命是過去一切慢性事變的總和，是未來的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先驅，牠的形成正值十九世紀中國複雜的時代，有許多異常複雜的經濟的政治的原因是牠形成的酵母；不過，太平天國革命的眞正面目到現在還未爲羣衆所認識，如什麽「長毛賊」啊！什麽「髮匪」啊！「粵匪」啊！此種名稱幾乎是家曉戶喩；當然，這是由於士大夫們根據「尊王衞道」的成見所反宣傳的結果；致將眞理埋沒於泥坑之中！

事實並不是這樣的簡單。當時包藏在這社會內部的矛盾已緊張到異乎尋常的程度，而太平天國的誕生，便是此種矛盾之反映於一般社會生活中間的最具體的表現；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爲什麽在十九世紀的中葉（西歷一八五〇年）——道咸之間爆發呢？這一點似乎逼得我們有去說明十九世紀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必要了。

國際資本主義之侵入中國，主要的是爲吐出其過剩的生產品於中國市場。當時輸入中國的商品，最重要的便是棉織品與鴉片；大清帝國在最初對於國際資本主義之叩關來犯，很顯然的是採取消極的抵制態度，如在乾隆時代，英國曾要求與中國正式通商，而乾隆皇帝的答覆，則說：「……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輔奏，皆更張定制，不便准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洋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甄器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所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日日有資，並霑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洋，於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歸國。……」（十朝東華錄）

然而，國際資本主義的砲艦，終於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像這樣傲慢不恭夜郎自大的大清帝國，在帝國主義的砲艦之前，已經是威靈掃地了！因此，自一八四〇年鴉爭以後，中國已經屈伏在帝國主義的面前；這次戰爭的結果，中國蒙受巨大的損失，那不平等條約的絞繩，繼續不斷的束縛着整個的中國。其最主要的如江甯條約中的幾點：

(1)中國賠償英國軍費及煙價銀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兩；

(2)中國以香港全島割讓給英國；

(3)中國開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處爲通商口岸，准英國派領事居住；

(4)英商貨物照例納進口稅，准由中國商人販運內地各處。所過關稅，不得重加課稅（海關主權的喪失）

自江甯條約締結以來，帝國主義者鑒於中國的屈伏，所以又繼續不斷的向中國進攻；不僅英國於一八四三年又強迫要求中國訂立虎門條約，而美法兩國亦援例要求與中國訂立修好條約；甚至，比利時，荷蘭，德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都紛紛的派遣領事踵英法美等國的成規，來廣東一帶各自管理該國的商務。

在帝國主義共同侵略的情況之下，首當其衝的便是農村經濟，帝國主義那巨大的商品經濟的力量，更迅速的破壞了中國農村的後方，使農民生活更快的破產；牠將那價廉物美的商品，排擠了農村家庭手工業，使農民的血汗——金錢，因帝國主義的吸收而大量的外流。在兩廣及揚子江流域一帶，是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基礎，然而革命的爆發亦以此爲策源地。所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爆發於兩廣，帝國主義的侵略，誠然是第一個主要的原因。

也可以說帝國主義經濟的侵入，引起中國農村經濟空前的破產，牠是大革命前夜的第一幅圖畫。

大革命的第二幅圖畫，便是大清帝國國內的經濟恐慌。當時這種恐慌的主要現象，是表示於「銀貴銅賤」方面，銀的價格因鴉片賠款的付出和帝國主義的吸收而日漸上漲，使普通支付流通的銅幣，其價格則日益下降。銀貴銅賤的影響及於社會是非常的深刻，逼得那統治階級的皇帝不得不去加以干涉和處理；如道光二十六年十月的上諭說：

「前因各省議覆銀錢兼用章程，或請分別款項按成搭放，或稱諸多窒礙，請照舊章；歷經批令依議辦理，並交軍機大臣會同該議奏。茲據奏稱福建省前奏未盡事宜，請飭從長計議，江蘇各省亦令一律查辦，並山西巡撫請禁空票之處，亦應令其自行妥辦各等語，均已依議行矣！惟是銀貴病民，所關匪細，必應力求通變，前降諭旨甚明，乃各該督撫之已經議覆者，率皆無可通變，即所請按成搭放之處，為數亦屬無幾，於銀貴錢賤殊未足以資補救！其尤甚者，河工人員但知用銀甚便，總以搭錢為難，即謂歲修工程及預購楷料土方等項，責令以錢搭放，恐致貽誤要公，此外俸廉盤費書吏倉役並雜交等款，何難量予搭放，仍着各該河督，按照前項名目，悉心覈議，每年實可用錢若干？分晰奏覆。毋得固執成見，仍以窒礙難行一奏了事；其未經奏到之河南、陝西、雲南等省，亦著各該督撫通盤籌畫，總期銀錢兼用於收放幷權之中，作推行盡利之計，以濟民生而裕國用，是為至要！」（東華錄

道光第五十四卷第九頁）

道光皇帝的上諭，異常明顯的企圖解決銀貴銅賤的問題，他的解決方法，第一步便是搭用銅錢，可是這仍不能救濟大清帝國之銀的缺乏，於是滿清政府便採取第二種辦法，即企圖增加銀的產量，派遣許多的大員，紛紛的到四川，雲南，廣西，廣東一帶，去開採銀鑛，希望從鑛銀增加中間，以解決這迫在眉睫的經濟危機！然而開鑛的結果，因爲經手的臣僚中飽了所得的鑛銀，滿清政府固然沒有解決此種難題，而新的矛盾又復產生，即是說農民因受鑛官的蹂躪，離開了農村生產的過程。雖然，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曾有上諭說及預防開採銀鑛的弊端，如：

『自古足國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國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萬民之用，惟經理得宜，方可推行無弊！即如開鑛一事，前朝屢行，而官吏因緣爲姦，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我朝雲南四川，貴州，廣西等處，向有銀廠，每歲抽收課銀，歷年以來，照常輸納，並無絲毫擾累於民！可見官爲經理，不如任民自爲開採，是亦藏富於民之一道。因思雲南等省，除見在開採外，尚多可採之處；着寶興，桂良，吳其濬，賀長齡，周之琦體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場，民間情願開採者，准照見開，各廠一律辦理，斷不可假手吏胥，致有侵蝕滋擾阻撓諸弊！該督撫等必能體養朕意，妥爲籌辦，固不可畏難苟安，亦不得抑勒從事，總期於民生國計兩有裨益，方爲妥善，各省情形不同，不准彼此

觀望！」（見同上書四十九卷第二九十頁）

但是，這種話僅僅是不值錢的支票。

無論是國家管理鑛山，或者是地主與商人自行開採，但其對於鑛區農民之殘酷的剝削，則是毫無二致；不僅無裨於「民生」，更未有益於「國計」。太平天國革命之爆發於西南，特別是廣西，與開採銀壙實有密切的聯系呢！

大革命前夕的第三幅圖畫，便是道光末葉十年中所發生的繼續不斷的水旱天災。這種災害在太平天國過去的十年中，不是這裏的黃河泛濫，便是那裏的山洪暴發，不是這裏的旱蝗頻仍，便是那裏的魑魅迭見。整個的農村經濟為這種自然的災害摧殘至嚴重的破產，而廣大的農民們復在這破產的環境中度着飢寒凍餓的生活；雖然，統治階級在主觀上是企圖給這些破產的農民們一些安慰，如道光二十二年的上諭說：「江蘇浙江沿海州縣，轉徙流離，耕耘失業，轉瞬將屆刈穫之期，該農民輸將無力，何堪更事催 ！若待該督撫奏報，誠恐輾轉需時，恩澤未能速逮。所有江浙兩省……州縣，除定海，鄞縣，鎮海三廳縣外，本年錢糧業經有旨豁免外，其各……州縣本年錢糧精米均着寬恩悉予豁免！至鄰近州縣……亦恐有妨農業，並着該督撫等分別查明，請旨酌減，以昭體恤！……」（同上書卷四十第六十五頁）

其實，此種安慰僅僅是口惠而無實際，并且，那些督撫及其下層的臣僚們，往往借此中飽；我們看統治階級關於此事的供狀吧！他說：「……各州縣歷年墊完民欠，懇恩豁免！……國家蠲免錢糧，總期實惠及民，果屬民欠，雖鉅萬不惜蠲除，如係官虧，即絲毫不容混免！官墊民欠，久為錮弊，此項若邀豁免，將來州縣任意侵挪，毫無忌憚，且書役包攬，以完作欠，種種弊端，必致日甚一日！……」(同上書五十四卷第八頁)於此，可見統治階級對於農民的安慰，是欺人的誑語了。關於此種漕米錢糧的繳納，地主豪紳簡直是一文不名，而把他們所有的担負，完全轉嫁到農民的肩上；這種轉嫁的事實，是表現於納糧時所謂「大戶小戶」的名稱上面。例如統治階級自己也承認牠是不良的現象，而企圖以命令加以取締：「……向來完糧，紳富謂之大戶，庶民謂之小戶，以大戶之短交，取償於小戶；因而刁劣紳衿，挾制官吏，索取白規，大戶包攬小戶，小戶附託大戶，又有包戶之名，所致畸輕畸重，衆怨沸騰，紛紛滋事！……是幫船多取一分於官，州縣即多取一分於民，種種弊端，關係匪輕！若不及早整頓，貽患何所底止？……所有前項大戶小戶包戶各名目，概行禁絕，一律均收。不准旗丁額外多索幫貲，儻敢違抗不遵，或州縣中竟有浮收入已情事，……從重治罪！……」(同上)

至於大革命前夕的第四幅圖畫，便是土地集中過程的加速。自鴉片戰爭以後的土地關係，已經發生了相當的變化，這變化的方向，是針對着帝國主義需要中國農產品——即工業的原料；在這一有

力的推動之下，動員了中國大批的商業資產階級，使他們把過剩的資本移動一部份投入於農業方面——購買土地。在土、商品化猛烈發展的條件之下，造成了土地集中和大批土地佔有的形式；加之連年的水旱天災，農民們為求得目前最底限度生活的保障，逼得他們不能不賣掉所有的土地；這現象當然是更有利於地主商人對於土地的集中。

當時，土地集中的過程，是異常的迅速，其範圍之廣大，的確令人驚奇；甚至，當時的皇帝對於土地集中的現象也感覺到異常的危險而出來干涉，以預防發生劇烈的和不幸的結果。在一七八三年至一七八五年的三年中間，河南慘遭空前的旱災，而其鄰省——山西省——的富商地主，他們不但未肩起賑救的義務，甚而至於還乘火打刼利用賤價收買破產農民的土地；所以一七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朝廷曾下諭阻止，其中并有述及：『晉人有以賤價收買吾甚多豫民之田地，而不知豫民恃此以養其身家！……』的言論。同時，河南副總督亦說：『晉人以富自居，見豫民之受刼，出賤價以購其地，如是使巨量之豫地，落於晉人之手，……竊甚感不悅！……』

整個的滿清政府因此事而聯想到明末農民大暴動的可怖，所以他們想以命令去恐嚇山西的地主和商人，并希望他們將此次買的土地交還於前主，以減輕農民暴動的威脅；從這段事情中間我們很可以出河南農民之貧困和怨恨的程度，尤其是當時的統治者，在農民羣衆的怨恨和鞭撻之下，使他們不得

不以行政上的手段去阻窒土地集中的進程。

除此而外，那統治階級慘酷的壓迫，以及無情的剝削和民族間的仇視，實是構成大革命前夜的第五幅畫圖。

首先我們看大清帝國對於民衆的剝削的程度而論罷。據大清帝國的臣僚——洪吉亮在他所謂征「邪教」疏中間，非常顯明的說農民的叛亂是由於滿清政府的罪惡；他說：

「今日州縣之惡，百十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既不能消弭化導於前，及事有萌蘗，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逼至於爲賊不止。……蓋今日州縣之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恤之項，中飽於有司，皆聲言塡補虧空，是上恩不逮下，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府縣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府，甚至督府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顚踣於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皆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

洪吉亮的意思，認爲如果糾正這個三點，那麽，不僅政治可以走上軌道，彷彿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也就從此消滅！這種說法，祗能用以去欺騙那昏庸無知的皇帝，然而說及對於解決農民暴動，那眞是

等於癡人說夢一般的滑稽！固然，這三點統治階級眞是無法避免其重演，假定就是完全掃除了此三種弊端，也是不能遏制農民革命的浪濤！我們須明白的了解，每次農民大革命的礁點，都是集中在土地問題的解決，如果捨本逐末將嚴重的土地問題不去加以徹底的解決，那麼，要說什麼消滅農民暴動，簡直是一幕滑稽劇！不過，關於這點，不僅是統治階級不能了解，而且他們也不願意了解。

繼洪吉亮以後描寫滿清政府官僚醜態的，便是章學誠。他很坦白的將滿清政府官僚的內幕及其隱處公開的揭佈出來：……

「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訖於嘉慶三年而往，和坤用事，幾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則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者，俄而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以數計矣！俄以數十萬計，百萬計矣！一時不能猝辦，由藩庫代支，州縣徐剋民財歸款。貪墨大吏，胸臆習爲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餽餉，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則不與博其一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則今之盈千百萬所以乾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縣，向以狼籍著者，詢于舊治可知；而姦胥鉅魁，如東南戶曹，西北兵驛，盈千累萬，助虐肥家，亦必而知；督撫兩司向以貪墨聞者，詢於廷臣可知；聖主神明洞鑒，亦必有知其概者，此輩蠹國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釀，今之虧空，皆其所開，其罪浮於川陝教匪，駢誅未足蔽辜！」（章學誠上執政論時務書）

像這樣對於人民之壓搾，其殘酷的程度可算是無以復加了。并且，此種壓搾形勢繼續發展，就是那未來的太平天國的劊子手——劉蓉，也不能緘默不言；如他在致某官吏的書中，曾經這樣的說：

『今天下之吏亦衆矣，未聞有以安民爲事者，而賦斂之橫，刑罰之濫，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國家牧民之吏，其始取之也，以記誦詞章，而不必有德行道義之實。其職之也，以科條律令，而不必有慈祥仁愛之施。其課之也，以穀刑名，而不必有撫字教化之效。是固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况夫課目之外，又雜以捐納之途，使驅之使責償於民，而肆其貪婪之志也。法律之外，加以條例之煩，是借之使挾以爲姦，而制其死生之命也。考成之外，又責以苞苴之私。是教之使斂怨於下，而快其谿壑之欲也。是以才者既盡其所爲，又不顧斯民之疾苦；不才者又茫然不省。一聽滑胥之所欲爲，而因以便其私計。又有甚者，府胥吏從之屬，不名一藝而坐食於州縣之間者以千計，而名家之中，不耕織而享鮮者以萬計焉！鄉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與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民之黠者，既巧爲規避，而非法律所得制；富者又得以納賄幸免，雖羅網禁而不刑。是以法之所及，止於愚魯貧民，而豪猾者流，日寢饋於法禁之中，而常逍遙於法網之外。……今天下避遠之邑，綠林深密之地，盜賊羣聚郎據焉。……夫國家治盜之法亦嚴矣，然而令行而禁不止，此其弊二：一則縱盜以爲利，一則諱盜以爲功。……』

以所列數點，誠然是大革命前夜的幾幅畫圖。在這幾幅畫圖當中，關於未來的大革命的象徵是異常的明顯，牠已預示這個社會將演一幕歷史的悲劇！不過究竟誰是演劇的主人翁？這是值得我們深刻的注意。

## 第二節　革命的動力

在大革命爆發以前，一切與革命運動有關聯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條件，均已成熟，不過是埋藏在這社會內部罷了。當太平天國未曾出現於歷史舞台的時候，整個的農村中間，已經有許多零碎的騷擾和鬥爭，為牠開闢一條走向歷史舞台的道路；這些零碎的騷動，具體的說來，可以分成三點：

第一，反苛捐雜稅的鬥爭——特別是抗租抗糧的鬥爭，在農村中間普遍的發展；且其牠發展的程度是時常走到與統治階級武裝衝突的頂點。如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在湖南這種抗糧運動曾有廣大的發展：

「……耒陽縣痞棍聚衆抗糧滋事親往查辦；……據稱耒陽縣西鄉……抗不完糧，并設局斂費，阻截糧戶，經該縣獲犯訊究，胆敢糾衆撲城，并拒傷弁兵胡俊等，見尚退匿城外未散等語。匪徒抗粮滋事，糾合至千餘人之多，並敢持械攻城，拒傷官兵，實屬罪大惡極，必應迅速剿辦淨絕根株！……

妥速掩捕，尅期竣事，勿使蔓延，其爲首之楊大鵬等及著名匪犯，務須按名捕獲，盡法嚴懲，毋任一名漏網！……』（十朝東華錄道光卷四十九）

同時，浙江方面亦復有抗粮運動。廣大的農民，他們是極不滿意於統治階級的粮糟制度，因此，自動的起來與統治階級對抗。如：『浙江奉化縣匪徒張名淵等於該縣考試時，聚衆阻鬧，挾制完粮……經該道等前往彈壓，輒敢拒抗官兵，形同叛逆，實屬目無法紀！……該縣山海交錯，難保該匪徒等不勾結他處賊匪，附和成羣，藉圖搶擄；自當厚集兵力，趕緊撲滅！——務將首要張名淵等悉數擒獲，毋許一名漏網。……』（同上書）

我們從湖南和浙江的農民抗粮鬥爭當中，充分的看出了被壓迫農民反抗的勇氣，他們把生命置之度外，抱着犧牲的精神去和統治階級拼命！滿清政府雖然以極殘酷的手腕逮捕了他們的領袖，斬斷了他們形式上的聯系，然而這不但沒有解決了農民對於政府的反抗，結果，祗會使農民反抗運動轉變爲另一種形式！在另一種形式之上，牠益會普遍的發展起來！

第二，農民秘密組織之廣大的發展。過去歷史上的農民反抗鬥爭，不是爲他們上層領袖所出賣，便是爲統治階級恐怖手段所鎮壓，他們是始終沒有得着一個澈底的解放；然農民們在統治階級殘酷鎮壓以後，是不是從此就緘默不言任憑統治階級的宰割呢？事實告訴我們這是統治者的幻想。滿清政府

在打敗了『白蓮教』運動——農民的反抗運動以後，便宣傳從此以往在滿清政府統治之下將再不會爆發什麼農民的反抗鬥爭；但這僅僅是牠主觀上的願望，而實際上農民的反抗運動彷彿和穿山甲打洞似的一刻也不會停止牠的進行。不過，農民們在屢次失敗的教訓當中，感覺得如果缺乏組織——即團結，其結果是很難戰勝統治階級的；他們的組織在社會生產力尙未高度發展的時候，當然還帶着很多迷信的氣味，這正是表示農民反抗運動的特色。

農民反抗運動的秘密組織，最大的便是『三合會』。

考三合會的起源，在康熙十三年已經有他的雛形，而過去的臺灣暴動亦是他們所領導；在嘉慶三十二年的時候，牠在數量上已有廣大的發展，曾與政府的軍隊在梅嶺對抗，武裝衝突的結果，農民遭受了很大的失敗；自此以後，他們在南中國一帶，時常與政府衝突。他們不僅借此去團結農民羣衆，並且還以這組織力量和地方政府作經濟的政治的鬥爭；因此，那些下級的臣僚，對於這一農民羣衆的組織是非常的畏懼，不得不把這些情形，上聞於他們的皇帝。

滿清政府處理此事是不成問題的按照例行公事的手續，要各省對此嚴加取締，以免顚覆了他們的政權。故與道光二十五年的上諭中，說及：『……廣州府屬盜刼日滋，商民受害！……據稱廣州府一帶土匪刼掠爲生，結黨聚會，數萬餘人，其著名積匪，如香山，新會，順德等處，姓名皆歷歷可數。

上年查拿之『臥龍』『三合』等會匪，搜捕未淨，嗣後復有新安，新寧各縣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鄉引人入會，千百成羣，肆行無忌！又香山下沙地面，近來匪類漸多，地方文武，不肯實力查拿，以致農民不安耕作。又順德香山交界之處，及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新會，三水等處，皆有盜賊巢穴，出沒無常！……並有香山司巡檢——魯鳳林被盜擄去，剃鬚勒贖！……務使盜賊肅清，農商安清！』(同上書)

觀此，則南中國一帶的三合會的組織其聲勢之壯大，眞使滿清的羣狗在牠的面前發抖！甚至，這組織在當時還發展到南洋羣島一帶，以取得海外的聯絡和新式軍火的供給。

第三，太平天國的前哨戰、滿清政府既然嚴厲的取締農民的秘密結社，但農民反抗亦復隨着統治者壓迫的程度而邁進；雖然，這種反抗的範圍，還是屬於大革命前哨的接觸性質。於道光二十七年，這前哨戰的陣容已經展開，如『……湖南新寧縣與廣西全州交界地方猺匪糾黨焚搶，抗拒官兵，疊次攻擊，擒獲匪犯多名，並將廣西結會滋事首犯李世得檢斃，惟新甯匪首雷再浩與民人李輝等，竄匿深山，負嵎自固！……』(同上書)至道光二十八年時，牠的範圍又比以前廣大：『湖南新寧縣地方，匪徒聚衆滋事，擁進縣城，戕害知縣，寄居該縣之前署縣家屬，同時被害。打毀衙署監獄，實屬罪大惡極，殊堪髮指，該處界連廣西，前年猺匪雷再浩勾結李輝等結會搶掠，即在新寧縣地方；經湖南廣西

兩省會拿勦辦，此次復敢進城戕官　必其餘孽復萌！……」

迨及道光三十年，農民的反抗運動已經普遍了全國，統治階級在恐怖之餘，還想作最後的掙扎：「……邪教盜賊，在在皆有，而避藏之巧，蔓延之多，惟交界處為最；所歷舉從前查辦教匪會匪各案，以漏網餘匪，支流蔓延，近又結黨成羣，如江蘇盛行「吃俸」名目，而淮安一帶尤甚！直隸盛行「在理」名目，而天津靜海等處尤甚！在官人役，亦多習教之人，妄言禍福，煽惑鄉愚！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又如直隸滄州一帶回匪與山東滕縣，嶧縣，蘭山縣等處教匪，以盜賊為生業，竟至父子習傳，師徒授受。近來廣西貴州均有大夥刧奪拒捕之案，直隸山東均有刧奪公東齎本摺差之案，迭經降旨嚴飭密拿，而地方文武　視若具文！……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陝西，四川，江西　廣東，湖南，廣西各水陸交界之區，盜賊公行，此拏彼竄！……」(同上書)

天平天國，就是上面這些部份鬥爭的總和。

牠的動力，既不是地主，更不是商人，我們根據上述三點，可以看出參加革命的階級成份，十分之八九是那破產的貧苦農民。這些貧苦農民，他們受生活的逼迫與飢寒的驅使，祗有流入於佈滿全國的所謂匪類中去；那班藏在山谷間流落的農民和很多留在鄉間的貧農都包括在內，並由這些羣衆組成了太平革命軍。並有很多關於所謂匪隊與太平軍關係的作品，致到那些俗稱亡命之徒的土匪與革命軍

聯合的事實。

在太平軍第一次勝利佔領佔了廣西的商業城市——龍州以後，有很多對於舊社會不滿意的，流亡的，飢餓的，貧窮的人民，都紛紛的加入到太平革命的隊伍。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因爲領導這次革命的首領——洪秀全，他就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出身。據史書記載，凡太平軍所到的地方，他們對於有錢的富人，則令其交出自己的財產，對於勞苦羣衆，便要他們加入太平軍；假使有錢的富人不願供給他們，則沒收其財產，而對於貧民，從無強迫徵兵的佈告。很顯然的，這次革命對於生產階級是取保護的態度，而幷不執行什麼必須從軍的制度；縱然是在某種情勢之下，他們對於一切城市的居民，採取了勞動義務的行動，但是，仍將富商大賈包括於內而沒有什麼客氣——倖免的。至於對於政府的倉庫和富商——尤其是典當的庫房，是無情的沒收；但是，對農民却以現錢購買他們的生產品，幷且還付很高的代價；這裏完全表現出太平天國革命的農民的階級性，尤其是貧苦農民的意識。

另一方面，農民中的富裕者——富農，因鬪爭的尖銳，他們在整個的農民中間，是起了相當的分化，祇有很少的一部份是追附於革命之後；假使我們把太平軍中整個的軍隊統計一下，則我們可以知道大多數是從貧農和窮人集合而成的；強迫的勞動則有一部份在軍事搜查和運輸方面採用過，然其軍隊的主要部份我們在上面說過，牠都是從貧窮的民衆自願的，或者是附和而集成的。中國的歷史家，

關於這兩個鬬爭的階段的營壘所下的公平斷語是：『廣西廣東二省遭了飢荒（在一八四八年——四九年），因此，開始發生匪患；人民為自衞起見，也組織了義勇隊，……差不多各義勇隊都擁有私產，在這個時代，隨洪秀全都是貧民！……』（白話全國史第四卷第二十四張）并因這樣的階級對立，使義勇隊與洪秀全及其附隨者之間的關係如同仇敵一樣。

貧農從自己的隊伍中間，產生出了一個最有能力的，猛勇的領袖——忠王——李秀成，他後來成為太平天國的軍事首領。在他的自傳內，說他自己是從貧窮的家庭出身的：『我家之清貧，促成我離家之主因，我家無可恃之物，生活艱難殊甚！自八歲至十歲曾入塾求學，但此後我被迫於生活，不得不治農以助我之父母；迨至我年二十，始知洪秀全有創設新教之計劃。……』（曾登載於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之華北報，見中國近世史。）

革命的第二種動力，就是工人。

關於工人和僕役參加革命的問題，很可惜的，我們沒有充分的材料來證明，因有清一代對於思想上的禁錮以及文字獄的幾與，不僅顛倒了是非，并且還淆亂了黑白，這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情。例如康熙年間的莊氏史案，南山舊案，以及雍乾間查嗣庭，呂留良，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庭等都是以文字賈禍，乾隆三十九年的開四庫館，下詔求書，凡是有觸忌諱的，悉被焚毀，前後燔毀二十四次，五百

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這不僅是中國近代文化的厄運，甚至還是研究中國歷史一個鉅大的損失呢！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有翔實紀載太平天國革命的書籍，統治階級一定會加以嚴厲的摧殘！

雖然，根據革命的性質，我們可以無庸疑惑的工人們是勇敢的積極的來參加革命；太平革命軍的領袖之一——楊秀清，他就是一個工人。據說楊秀清他是廣東人，他幼年的時候，在廣東以燒炭為生，其生性是異常的豪放，不拘拘於小節，因此，一般士大夫們都稱他為無賴！然而，他是一個極聰明的人物，他具有很好的才幹，在作戰期間，能籌劃出很好的戰術與策略；佔領南京以後，於某些策略問題上，竟與洪秀全有不同的意見，因此，便和洪秀全的關係破裂，最後他復為「天王」一派人們所刺死！

此外，參加革命的還有一部份海盜，這些海盜，都是農村中間破產的農民。他們有很好的軍事技術以及最新式的武裝，因此，他們參加太平天國的革命，的確是一個有力的幫助，比較以前的農民暴動而論，更有牠的新的特殊的軍事意義。海盜的首領——羅大綱，他的行動是完全與洪秀全一致，以後，他曾被推為太平革命軍事領袖之一；他在軍事上有許多很深刻的見解，很可惜的，這一革命運動發展到了奠都金陵以後，如果採取羅大綱的意見，那麼，就是失敗也不致於這樣的悲慘！

當然，在整個革命運動的進程中，那些投機取巧的人們，特別是地主階級的變節者以及士大夫隊伍裏面的叛徒，如韋昌輝和石達開，不過在成份上講，像他們這些成份，在太平天國的隊伍裏，實在是少數的少數！太平天國革命的動力，既然是這批素爲人們賤視的勞苦人民，牠的一切的政治戰術當然會和過去的一切農民暴動不同了！這些不同點在什麽地方？的確是有研究的必要啊。

##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政治戰術

太平天國在廣西金田村揭起反抗滿清政府大旗的當兒，統治階級彷彿認爲他們不過是一些零星的教匪，沒有什麽多大的作爲；因此，一則說他們『蕞爾小邑』，小醜跳梁』，再則說他們是：『釜底游魂，不難殲滅』！當然統治階級這樣的樂觀，并不是無因的，因爲牠擁有六十一萬八千餘人的常備軍，必然是要有所恃而不恐啊！其實這班腦滿腸肥的軍隊，經統治階級奢侈生活所宣染，早巳墮落到腐化的深坑，那裏還有戰鬭的餘力呢?!我們看太平軍自金田首義以來，而湖南，而湖北，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沿長江流域而江西，而安徽，而建都南京；再渡江北伐，掩揚州，攻臨淮，克鳳陽，而開封，而歸德，而山西，而直隸，而達天津附近之靜海，曾幾何時，已肅清滿清反動統治的半壁！如果沒有正確的，適當的，階級的政治戰術，縱然是軍事上的勝利也不會達到如此程度的。什麽是太

平天國的政治戰術呢？歸納起來說，可以分作如下兩點：

（A）國際主義：太平天國的革命，很顯然的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幟。基督教——宗教與這次革命發生聯系的時候，遠在牠的爆發以前，牠隨着帝國主義的商品與炮艦政策而俱來；廣東是歷史上有名的國際貿易港，而基督教思想的浸入，亦以此處爲最先。最初，有廣東人朱九濤受過基督教的洗禮，而廣東花縣的洪秀全與馮雲山等亦附和其教義。迨朱九濤逝世以後，發展中國基督教的責任便落到洪秀全的肩上。他們的組織稱耶和華爲天父，說耶穌是耶和華的長子，稱爲天兄，而洪秀全則自居耶和華的次子而稱爲天弟，其餘的師徒關係，男性的則互稱兄弟，屬於婦女的則以姊妹稱呼。牠的思想的立場曾排斥佛老，說這些都是邪教，這種一神教的主張，已經比較以前中國的多神教有進一步的意義；何況他們更提出一些迫切的農民的要求以號召廣大的勞苦羣衆呢？

很多的近視朋友說太平天國彷彿是中國歷史上的宗教革命，這種話恐怕沒有充分的根據吧？因爲發動農民鬭爭的，并不是什麼基督教的未來的『天國』，而是理想的國際共產主義，他們將國際的共產主義滲於於基督教的宣傳之中，并加以東方式的發揮；如其在原道醒世訓一文中說：

『夫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皇上帝天父凡間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國是皇上帝主宰理化，遠而番國亦然；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

彊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併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姦邪謀閉而不興，竊盜賊亂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爲大同！」而今尙可望哉！然而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生矣！惟願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謀之鬼門，循上上帝之眞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砥柱，相與挽己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幾何乖漓澆薄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爲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何陵奪鬬殺之世，不一變而爲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苦怯之世也!?」（引自世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第一百三十頁）

這一篇文章，很顯然的看出了所謂『上帝會』的理想，牠是要實現東方式的共產主義；因此，關於基督教義的成份是異常之少，而對於未來的革命前途則指示出很多的幽光。這次革命幷未有忽視農民目前的需要，反之，爲擁護貧苦農民現實的切身的利益，而提出積極的澈底的土地革命的主張於廣大的貧苦農民的面前；如其在土地問題的戰略上則說：『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

我們承認，這裏有許多解釋是帶着很濃厚的唯心論的色彩，但是這一點幷不能抹煞了此次革命農

民對於共產主義的熱烈的要求。

（B）民族革命：在滿洲人的統治之下，漢族除掉那些上層份子與牠成立妥協以外，廣大的平民受着這政府一種意外的壓迫——民族間不平等的壓迫，因之，反抗滿清政府的民族意識亦潛滋暗長，有時候甚至有組織的去和牠鬥爭。太平天國牠爲吸引廣大的革命羣衆起見，爲吸引爲民族利益而奮鬥的激進份子起見，曾掛出了漢族——民族革命的招牌。這民族意識具體代表的文件，首先要推奉天討胡檄一文：

『眞天命太平天國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秀清），右弼正軍師西王蕭（朝貴），爲奉天討胡檄佈告四方：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爲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尙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眞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目爲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反足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

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汚，决東海之波濤，洗不盡彌天罪孽！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帶，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而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汚，百萬紅顏，悉與妖胡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語，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言，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亂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使是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欲使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汚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是欲我中國之人貧困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雄豪傑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復興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謀中國者，無所不用極，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苻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弟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惡，乘吳三桂之招引，竊佔中國，惡極窮兇。予細查滿清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

中國之無人，盜據中夏。冠座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犂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淩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艴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皇上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一以安九省！特招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妥懽於應昌，復興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有斬其首級來投者，又或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蝥孤以先登，戒防風以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僞拒眞，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於高

天乎？予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爲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佈告天下，咸使聞知。」（見同上書一三一——三四頁）

陳琳的檄文，可以愈曹操的頭風，我相信太平天國的討胡檄，同樣的會驚碎統治階級的狗胆！牠歷舉滿清政府壓迫漢族的事實，同時，牠又指示人們反抗的途經，牠完全以苦的流血的經驗與材料來充實其檄文的內容。

因此，從這兩個總路線之下出發，牠的確是集合了廣大的羣衆；牠爲什麼能支持十五年之久呢？道，須全靠牠經濟的和政治的建設。

## 第四節　太平天國政治經濟的建設

太平天國的偉大，當然在牠的各種措施上表現出來，而首先表示牠那空前的政治經濟的建設。在整個的建設工作當中，特別是土地制度之澈底的變革，是值得我們嚴重的注意！

第一，太平天國的土地制度，係採取一種特殊的軍制形式，其每軍的組織形態則有如下的規定：

「凡設軍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次設軍帥所統五師帥，次設師帥所統五旅帥，共二十五旅帥；次設二十五旅帥各所統五卒長，共一百二十五卒長；次設一百二十五卒長各所統四兩司

馬，共五百兩司馬；次設五百兩司馬各所統五伍長，共二千五百伍長；次設二千五百伍長各所統四伍卒，共一萬伍卒。通一軍人數，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添多一百零五家，另設一卒長；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設一旅帥；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另設一師帥，共添多一萬三千五百十六家，另設一軍帥，未設軍帥前，其師帥以下官，仍歸舊軍帥統屬。既設軍帥，則割歸本軍帥統屬。」這軍制組織的構成，我們爲簡明起見，可以列如下表：

軍帥
(13156家)
師帥　師帥　師帥　師帥　師帥
(2631家)
旅帥　旅帥　旅帥　旅帥　旅帥
(526家)
卒長　卒長　卒長　卒長　卒長
(105家)
兩司馬　兩司馬　兩司馬　兩司馬
(26家)
伍長　伍長　伍長　伍長　伍長
(5家)

軍制的系統雖然是如此，然而牠的內部組織還有極詳細分工：

「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帥旅帥兼攝。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凡一軍一切生死黜涉等事，軍帥詳監軍，監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軍師遵

行。功勳等臣，世食天祿！其後來歸臣者，每年每家設一人爲伍卒，有警則首領統治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爲農，耕田奉尙。」

觀此，則太平天國的革命，已經澈底的變更了農村的組織，卽參加生產的農民與革命政權的聯系是非常的密切，過去人們說『寓兵於農』制度，中國歷史上祗有太平天國才澈底的實行了牠。

關於土地分配的情形，在當時是採取斷然的手段，無情的沒收了豪紳地主的土地，並把牠加以公平的分配，也可以說牠是澈底的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如依照太平天國的規定，則：『凡男婦每人戶十六歲以尙，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一半，如十六歲以尙分尙尙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尙尙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尙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下下田一畝五分。』這一革命對於土地分配的原則，並將所有的土地區爲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爲尙尙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爲尙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爲尙下田，可出九百斤者爲中尙田，可出八百斤者爲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爲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爲下尙田，可出五百斤者爲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爲下下田。尙尙田一畝，當尙中田一畝一分，當尙下田一畝二分。當中尙田一畝三分五釐，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釐，當下尙田二畝，當下中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

醜田，好醜各一半。共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

像這樣土地分配的原則，在當時是多麼公平啊：貧苦農民之所以，太平天國拚命，實際上就是擁護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這個土地問題的解決，無怪乎要氣死中國的地主官僚！

第二，當時的經濟政策，亦是非常的適當，在最初，牠差不多染遍了共產主義的色彩：「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耕煖也。」同時，牠對於農村經濟復特別的注意，在最初期爲的是要救護革命的政權，於是乎便採取軍事共產主義，如「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織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鷄、二母彘，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鷄，犬各物及銀錢亦然。」

但是，到了第二個階段，軍事共產主義的思想，已經不能從市場影響之下解放出來，換句話說，這個時期的生產力還沒有適應共產主義的階段，如果再繼續這種超時代的冒險政策，其結果對於革命的建設會有很大的危險！於是乎這個革命政府——太平天國，便馬上回過頭來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因爲當時的革命，在生產的破壞與飢荒的恐嚇之下，祇有這條道路才是光明的前途。

既然從軍事共產主義轉變到國家資本主義，關於農村經濟以及商業的整理，實是必要的任務；對

於生產者的獎厲政策亦復異常的重視，如『凡二十五家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從獎勵的事實中間，我們就可以看到太平天國農業經濟上昇的趨勢。其次，太平天國的商業亦有大規模的進展，國家依照商人財富的多寡，來規定比例稅額。因此，商業的發展在太平天國時已很快的完成了，我們從以下幾個最主要的輸出商品出口數目字來證明它：

在一八五〇年——五一年，即太平天國開始發動的一年，中國輸出的茶，組成五七六百萬磅；在一八六〇——六一年，即在太平軍佔領了產茶區域以後，輸出的茶，等於八七二百萬磅，在第二年關與茶的輸出，竟達到一〇七四百萬磅。及在太平天國最後的一年，即一八六四——六五年，茶的輸出量已增加到一二一二百萬磅。舍茶而外，就是絲的輸出，也是逐年的增加，在一八五〇年——五一年，牠的輸出不過是二四〇〇〇捆，在一八五九年——六〇年，太平軍佔領產絲區域以後，絲的輸出額已有六九〇〇〇捆；迨至一八六二年時候，其輸出額竟增加至七三〇〇〇捆。可是在太平天國夭亡的一年，絲的輸出量驟降至四一〇〇〇捆，而使正在發展的中國經濟，忽又中途停滯不前。

至於政治上的建設，那更是開中國過去一切革命史上的新紀元。例如他們的官吏都是從人民中間選舉出來的，沒有什麼卑鄙的賄賂和陰謀的篡奪，他們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一直到現在，還是萬丈光芒而永垂不朽！其最重要的地方如：

「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則例其行蹟，註其姓名，並自己保舉姓名於卒長；卒長細核其人於本百家中；果實，則詳其人并舉姓名與旅帥；旅帥細核其人於本五家中，果實，則尙其人并保舉姓名於師帥，師帥實核其人於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實，則尙其人并保舉姓名於軍帥，軍帥總核其人於本軍中，果實，則尙其人并保舉姓名於監軍；監軍詳總制，總制次詳將軍，侍尉，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啓天王；天王降旨調選天下各軍所舉爲某旗，或師帥，或旅帥，或卒長，兩司馬，伍長。凡濫保舉人者，黜爲農！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爲農！當陞貶年，各省首領各保陞奏貶其統屬：卒長細核其所統屬兩司馬及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其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至若其人無可保陞，并無可奏貶者，則姑置其人不保不奏也。旅帥細核其所統屬卒長及各兩司馬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詳其人并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師帥。師帥細核其所統屬旅帥以下官，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并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軍帥將師帥以下官所保奏陞貶姓名，并自己所保奏陞貶某官姓名，詳於監軍。監軍並細核其所統軍帥，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姓名

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並細核其所統監軍，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奏陞貶姓名，一同舉於將軍，侍衛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將各命欽總制及各監軍及各各軍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各姓名，直啓天王主斷。」

政治組織既然有這樣的民主精神，那種官僚化的傾向不成問題的是會一掃而空！我們看這革命的政府對於官僚化的防範是怎樣的嚴密呵，如：「天王乃降旨主斷，超陞各欽命總制所保陞各監軍，其或陞爲欽命總制，或陞爲侍尉；謫遣各欽命總制所奏貶各監軍，或貶爲軍帥，或貶爲師帥；超陞各監軍所保陞各軍帥，或陞爲監軍，或陞爲侍尉；譴謫各監軍所奏貶各軍帥，或貶爲師帥，或貶爲旅帥卒長；超陞各軍帥所保陞各官，或陞尙一等，或陞尙二等，或陞軍帥；譴責各軍帥所奏貶各官，或貶爲下一等，或貶爲下二等，或貶爲農。天王降旨，軍帥旨丞相，丞相宣檢點，指揮，將軍，侍尉，總制；總制次宣監軍，監軍宣各官，一體遵行。監軍以下官，俱是在尙保陞，奏貶在下。惟欽命總制一官，天王准其所統各監軍保陞奏貶。欽命總制，天朝內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尉諸官，王天亦准其上下不時保奏陞貶，以剔上下相蒙之弊！至內外諸官，若有大功大勳，及大奸不法等事，天王准其上下不時保陞奏貶，不必拘陞貶之年。但凡在尙保陞奏貶在上，誣，則黜爲農！至凡在下保陞奏貶在尙，誣，則加罪！凡保陞奏貶賢惡蹟，總要有憑據，方爲實也。」

至於談到太平天國的司法行政，那更是有條不亂，他們在某些行動上彷彿是天王集權，而其實的確是「民主集權」。如它的司法和行政制度是：「各家有爭訟，兩造赴兩司馬，兩司馬聽其曲直，不息，則兩司馬挈赴兩卒長，卒長聽其曲直；不息，則卒長尙其事於旅帥師帥典執法及軍帥，軍帥會同典執法判斷之，旣成獄辭，軍帥又必尙其事於監軍，監軍次詳總制，將軍，侍尉，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命軍師，丞相，檢點，典執法等，直啓天王主斷；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軍師遵旨處決。凡天下官民，總遵守十款天條，及遵命令，盡忠報國者，則爲忠；由卑陞至高，世其官。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爲姦，由高貶至卑，黜爲農民！能遵條命及力農者，爲賢爲良，或舉或賞；民或違條命及惰農者，則爲惡爲頑，或誅或罰！」

像這樣的賞罰分明，陞貶得當的行政系統，求之現在，亦屬不能多得。復次，他們的農村合作運動，亦是獨開生面，與那些借合作名義以欺騙農民的政府，實有霄壤之別呢！如其所說：「兩司馬存其錢穀數於薄，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喜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以伍卒爲之，農隙治事。」

其他，如對於教育工作，亦是異常的注視，在一般農村中間是：「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及眞命詔旨書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至於在軍隊中則更注意於政治教育的執行：「凡內外諸官及民，每禮拜日聽講聖經，虔誠祭奠禮拜，頌贊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其所統屬兩司馬禮拜堂講聖書，教化民，兼察其遵條命與違條命及勤惰。如一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至其兩司馬禮拜堂，第二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又別至某兩司馬禮拜堂，以次第輪，週而復始。旅帥卒長亦然。」

綜結起來說，以上各點，便是太平天國革命建設的模型，那些士大夫們的造謠與中傷，誣衊和汚辱，都不足以障蔽其光芒：——「有田同耕，有飯同吃」。牠可以說把私有制度揚棄到九霄雲外了！而土地之徹底的瓜分，更是中國農民革命史上大書特書的一筆；凡是太平革命勢力所及之處，到現在我們還不多見什麼佔有五萬畝以上的大地主啊！而關於男女的平等，他們提倡得最力，在經濟和政治的地位上，女子與男子可以說是完全平等。

（註）凡是這一節有「 」標記而未加（ ）括弧者，都係著者從世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三五頁至一四一頁天朝田畝制度一文轉引的。

## 第五節　反革命的聯盟與太平太國的天亡

太平天國政治經濟的建設，既然如此的偉大，爲什麼又會被統治階級撲滅呢？這問題的答覆，實有說及反革命聯盟的必要。當時站在革命方面的，除掉被壓迫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而外，那最前進的革命的階級還沒有形成；而反動的營壘裏，上至國際帝國主義，下及地主階級，中間還包括了商人和高利貸資本，貴族與官僚，他們對於革命的反動，已經結成了一個鞏固的同盟。

這一反革命聯盟結成以後，經過滿清政府的手，耍出了許許多多摧殘革命的魔術：第一，牠獎勵地主創辦屠殺農民的機關——「民團」，并企圖以「一官半爵」的手段去分化和收買農民的上層，如：

「逆匪負固金陵分竄揚鎮豫皖，疊陷城池，狡譎兇殘，神人共憤；方其初竄浦口，不過一二千人，……乃沿途裹脅，擄掠貲財，焚燒房舍，滁鳳蒙亳之間，被其蹂躪。……惟該逆挺而走險，飄忽靡常，所過地方居民人等，或因猝不及防，紛紛遷徙，轉遭荼毒，是避害而實以罹害，何如自相保衛，奮勉圖功乎？本年正月特降旨諭令各省，仿行嘉慶年間堅壁清野之法，旋諭中外大員，各舉所知，襄辦團練。……當此逆氛未靖，必有忠義勇敢之士，奮跡草茅，建奇功而膺懋賞者，如從前楊遇春楊芳等，均起自鄉里，致爵通侯；比年廣西湖南等省紳民團練勦賊，無不立予恩施，即如帮辦軍務之湖北

臬司江忠源，亦以居鄉勇團練屢著勞績，超擢監司，可見練勇之中，人材輩出。凡爾士民，同茲觀感；至北地民風，素稱驍勇，安徽河南山東江南交界地方，不乏奇傑之材，能爲民禦災捍患者，其有自備資斧，募勇投効軍營，殺賊立功者，統兵大臣卽覈明該士民等募勇名數，立卽奏請優獎，或給官職，或給翎支勇號，以爲急公嚮義者勸，其在本籍團練，保衛鄉閭，一遇賊匪竄至，卽行合力殲擒，則禦捍之功亦與効力行間同其賞賚，地方官吏仍不得擅行徵調，致令遷地弗良，如此實力奉行，以兵衛民，卽使民自衛，俾賊進無所掠，退無所據，散其黨與，殲厥渠魁，烏合之寇，不足平也！至從前被脅之徒，或以驕橫，結怨里黨，或以桀驁，誤蹈刑章，若能勦賊自效，卽可立荷恩施，如張國樑之洊擢都司，張鳳山等之給賞頂帶，明徵俱在，卽或先被賊誘自拔來歸，但能改過自新，亦可同邀恩典！……」（十朝東華錄咸豐卷二十三第十二頁）

至於牠的第二套魔術，便是編練地主階級的軍隊。關於此種軍隊編練的全權，完全責之於曾國藩和李鴻章二人處理：『……至各鄉團練，原因保衛身家，如果得公正紳民，立法盡善，不特鄉里平日賴以安輯，一旦有事，幷可協助官兵，剿除匪類，卽如長沙城外賊匪竄逸之時，白箬舖一帶鄉勇民團俱能殺賊！著該督撫等……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體察地方情形，應如何設法團練以資保衛之處，悉心妥籌辦理。』（同上書卷十九第一頁）當時地主階級新練的軍隊，在兩湖一帶有所謂『湘軍』，在江

蘇，浙江，安徽一帶又有所謂「淮軍」。這些軍隊，都是新練的勁旅，并有帝國主義的新式軍械作他們的後盾。

第三，帝國主義對於太平天國之直接的摧殘，是這次大革命夭亡的主要原因。當時江蘇的上海，已經形成了中國經濟的中心，因爲內地受軍事的影響，各重要商業城市均有金融停滯之感，而上海則商賈輻輳，關稅的收入，幾十倍於往昔，很多豪紳地主都依洋人爲護符，視租界等於安樂窩。蘇松太道——吳煦，復跪在帝國主義的面前，要求英國的軍官華爾者，編練「長勝軍」，當然，英國是痛惡中國人民的革命，對於反動政府之鎮壓人民的反抗，他也是願意幫忙。以後，李鴻章之來上海，拚命的集中金錢，將所有的稅收機關都拿在手裏，每月的稅款的收入，竟有五六十萬金之多；他以這些大批的金錢去租用帝國主義的軍艦和去購買新式的槍砲，復敦請法國人白齊文和英國人戈登爲「淮軍」高級的軍事指揮。因此，兵精械銳的反革命的軍隊，不僅攻下了蘇州，並且，還切斷了南京和杭州之間的聯絡；最後，統治階級以全力來摧殘革命，那偉大的太平天國受着主觀的和客觀的環境的限制，也就從此失亡！

太平天國，很顯然的，是帝國主義與中國統治階級結婚的第一個產兒，也可以說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幅；牠的偉大，不僅是建立了政權，不僅是支持了十數年之久，而是在牠推翻了商業資本

和封建殘餘的賄賂法庭，取消了中世紀的笞刑，取消了普遍全國的中世紀的奴役制度的殘骸，解放了婦女，使她們在生產關係上及土地享用上與男子一律平等，實行了澈底的土地革命，把所有的土地（連豪紳地主的在內）都收歸國有，並企圖消滅人和人之間的剝削，而建立了一個全民的德謨克拉西的國家。所有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國過去革命史上所罕見的行動；然而這個少年的太平天國——土地共產公社，牠的滅亡，除掉了當時的生產關係——（生產技術的落後和普羅塔利亞特正在形成）阻窒牠而外，帝國主義的摧殘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帝國主義者感覺得這個少年的太平天國——土地共產公社的存在，將要澈底的動搖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的特權，牠們站在侵略殖民地利益的立場上，不得不和中國一切的剝削階級聯盟，以這樣一個很大的力量，所以這一歷史上偉大的產兒——太平天國竟在牠們的面前活活的絞殺！

「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這是中國人之分析歷史的直覺的觀念，他們根據這個觀點出發，即所謂「粵賊」與「髮匪」實是很自然的邏輯！然而是非當有定評，公理自在人間，那暫時的雲霧，終不能掩蔽照遍全球的太陽！我們看社會科學的始祖——卡爾・馬克斯是怎樣的評論太平天國罷！

## 第六節　馬克斯論太平天國

偉大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始祖——卡爾・馬克斯，他不僅在歐洲與國際資本主義作思想上的肉搏戰，并且很早以前已經注意到國際帝國主義侵入中國而引起中國的革命，以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聯系了。帝國主義侵入後的中國初期革命——太平天國的革命，在當時曾引起馬克斯熱烈的同情和精確的分析；牠在中國革命與歐洲的一篇論文中，首先便說明中國革命對於世界革命的影響：

「兩極相遇，是不是那樣一個普遍的原則，我們且不必論，但這個原則的顯明的表現，是可以從中國革命之將影響於所謂文明世界的結果上看出來的。說歐洲人民的未來暴動與其爲共和自由及政府經濟的未來運動，其關係於現在所經歷於此之天朝帝國者，將遠勝於現存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亦且遠勝於俄羅斯的威脅，以及從而發生的全歐戰爭的可能性，這似乎是奇妄的推論；但是並沒有什麽奇妄，只需詳細考察這件事實，就可以明瞭了。」

這些預言，完全爲後來的事變——一九一四——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證實，證實了牠不是奇妄之談。他對於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之客觀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原因，曾加以有力的說明：『不管什麽是牠的社會原因，不管什麽是牠的宗教，朝代，民族的形式，總之，牠產生了慢性的變亂，過去存在於中國的已有十年，現在匯合起來，成爲一個可驚的革命。牠的爆發的機會，毫無問題的是那強制輸入名爲「鴉片」的麻醉毒物於中國之英國大炮所賜與的，在英國炮火之前，滿洲皇帝的權威，掃地

無餘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完全打破了；封鎖的門戶及未曾與所謂文明世界接觸的孤立，驟然被侵入了；東西交通的開發，從此以後，在加利佛尼亞州與澳洲的黃金引誘之下，很快的進行。同時這個帝國的金錢，——牠的生命膏血——開始流入於大英帝國的東印度了。」

「一八三〇年以前，中外貿易的差額，中國方面還站在有利的地位。銀貨不斷的由印度，大不列顛，北美合衆國輸入於中國。一八三三年以後，尤其是一八四〇年以後，則銀貨由中國到印度的輸出，幾乎耗竭了這個天朝上國。於是中國皇帝嚴令禁止鴉片貿易，但是所得到的答覆，是對於牠的法度給以更強力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經濟結果以外，有關於鴉片祕密買賣的賄賂風行，完全腐化了中國南方各省的國家官吏的綱紀。假如把皇帝看成全國的父親，皇帝的臣僕就看成對於各該屬縣邑的維持親屬關係者。但此維繫國家全局之唯一的道德的綱紀的父權，逐漸為默許鴉片密運因而自飽私囊之官吏腐敗所蝕毀了。這種情形，在發生變亂的南方各省，數見不鮮，鴉片遂適如其分的獲得宰制中國的主權，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僕，也已喪失其所有主權了。這似乎是歷史在牠把中國全民族從其傳統的昏聵中拯救出以前，使他們沉醉一回似的。英國棉織物的輸入，從前幾乎沒有，英國毛織物的輸入，也只有少許。至一八三三年以後，二者之輸入於中國，是很快的增加，此時為東印度公司轉移對華貿易獨佔為私人商業的時期。至於此等物品之大規模的輸入中國，乃在一八四〇年以後，此時為

其他各國，尤其是我們自己的國家（美國）、各在中國獲得一份貿易的時期。這外國機製品的輸入，其影響於本地的產業，猶之乎牠從前影響於小亞細亞，波斯，印度一樣。在外國競爭之下，中國國內的許多紡織者，都遭遇很大的犧牲，而社會生活，也隨着外貨侵入的程度，呈出不安的景象。」

「一八四〇年的不幸戰爭（鴉片戰爭）以後，賠款必須付給英國，那鉅額的，不生產的，消費的鴉片，隨着鴉片貿易而生的貴金屬的流出，外國競爭對本地製造品的不利的影響，公共行政情形的腐敗，產生了兩件事：更加重賦稅，又增設新稅。這樣，在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由北京所簽出來的皇帝上諭裏面，我們可以知道有頒給武昌，漢陽等處以及南方各省督撫的上諭，命令他們減輕或延緩人民的納稅，尤其是無論如何不准有逾額的苛取。上諭上說：假如不這樣，則「貧若人民，將何以堪？」又說：「則當舉國艱發之時，如此，則吾民或能免於苛吏誅求之禍矣。」這樣的辭令和這樣的寬假，我們猶憶在一八四八年時從奧地利聽見過，那是日爾曼的中國。」

「所有這些匯合起來，從中國的財政，道德，產業及政治構造而躍動的崩潰之動因，在一八四〇年的英國火炮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這個炮火，打落了滿清皇帝的威靈，強迫這天朝上國來與遠鄙之邦相接觸。老大中國所要保持的原狀是完全孤立，必須依着英國的媒介，才強制的終結了這個孤立。分解是必然隨之而起的，猶如謹臧在封固的棺材中的木乃伊一樣，不論何時，一經與空氣接觸，

就要立即分解的。現在英國已經造成了中國的革命，問題是那中國革命如何的遲早要反響及於英國，經英國以及於歐洲，這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依照馬克斯的分析，則太平天國的革命，其主要的原因是受帝國主義侵入的刺激，換句話說，這個革命完全反映了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爲什麼這次革命影響及於全歐洲呢？馬克斯他是從經濟的變動上去說明這點，他說：「一八五〇年以後，讀者常被喚起注意及於英國製造品之不平行的發展。在那最可驚的繁榮中間，不難適近於產業危機的那顯明徵兆。雖然有加里佛尼亞州同澳州，雖然有未曾前聞的浩大的移民出境，假如無任何特殊的事變，在一個相當時期，遲早總有一天，市場的擴張不能與英國製造品的擴張一致。這種矛盾，必然要造成一個新危機，其確定殆與過去所曾經歷者完全相同。但是假如大市場之一，忽然縮變狹小，那危機之到來，還要因之而加速。目前中國的變亂，完全有及於英國的這個影響，開闢新市場或擴大舊市場之必要，是英國減低茶稅的主要原因之一，期於以增加茶的輸入，來謀對華增加製造品的輸出。現在每年由英國輸出中國的價值，在一八三四年，東印度公司享有的貿易獨佔權廢制以前，總額只六〇〇，〇〇〇磅，一八三六年達一，三二六，三八八磅，一八四四年增至二，三九四，八二七鎊，至一八五二年，則約達於三，〇〇〇，〇〇〇磅了。至於由中國輸入於英國的茶的總量，在一七九三年，尚不出一六，一六七，三三一兩；但在一八

四五年，則達於五〇，七一四，六五七兩；一八四六年，則達於五七，五八四，五六一兩；現在（一八五一——一八五二）已超過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兩以上了。上季的茶的收穫額，超過前年（一八五〇）不下二，〇〇〇，〇〇〇兩，已經爲上海的輸出表所明示了。這個超過，可以由兩個理由來說：一方面是一八五一年終的市場狀況，較爲低落，剩餘下來的多量的過剩物品，移入於一八五二年的輸出；另一方面是那變更茶輸入的立法的近頃的報告，傳到了中國，使所有的有利的茶，都以極貴的價錢，上了預備市場。但是關於來季的收穫，則情形大異了。這可以從倫敦某大茶莊的通信中，摘錄下列的語句來證明：「在上海，危機已達於極點。金價漲了百分之二十五，銀貨的缺乏，至於使商船對於中國應付的出港船鈔，一點也不能夠付出。因此，阿爾可克對於這應交付中國官吏的船鈔，同意於以東印度公司的票據或其他認可的担保品爲質。設若着眼於商業的最近的將來，則金貨之缺乏，乃爲最不利的景象之一。因此種空虛，適值於金貨使用的最需要的時會，以致影響於深入內地的絲茶購買者的購買，蓋此等購買，須以正在騰漲的金銀塊爲付價，而那些絲茶生產者遂得以盡其操縱的能事。歷年此季，開始收買新茶，習以爲常；可是現時除去保障人身與財產的方法而外，什麼也談不到。一切交易都已停頓，……設若在四五月中不能應用那些保護茶葉的方法，則這包含一切良種在內的紅茶，綠茶之早期的收穫，將同爲在復活節尚未成熟的小麥一樣的損耗。」現在保護茶稅的方法，

不一定是英，美，法等國的艦隊駐在中國海中可以給與的。可是因爲他們的干涉，這却很容易產生一種糾紛的情形，如像切斷產茶內地與輸茶海港間的一切交易；如此，則於現在的收穫，是可以預期一個價格的騰起的(投機已經在倫敦開始了)。對於這次季的收穫，也可以同樣的確定是一個大缺乏。而且，中國人也同革命震動的時期中的一切民族一樣，雖然準備將他們手中那一切笨重的物品，賣與外國人，而又如東方人在大變動的恐怖中所作的那樣，要把所得的置之埋藏。故於絲茶的取償，除硬貨的貨幣外，其他多不願收受，於是乎英國可以預期牠的主要消費品之一的價格的騰漲，金銀貨幣流出，出售牠的絲毛織品的一個重要市場的縮小，即是那威脅商業社會沉靜精神的事物的樂天咀咒家的「經濟家派」，也不能不作如下的語句了：「我們不要自信覓得一個爲我們輸出品去到的中國市場，其廣大一如往昔。我們對於中國的輸出貿易，將遭蒙損害，滿切斯特及格蘭斯哥的生產，將有一個減少的要求，這是可能的。」……」

因此，馬克斯更說明因由此種矛盾而產生的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聯系以及帝國主義幫助滿洲政府去消滅中國的革命：

「在這種情形之下，因爲普通商業範圍的大部分，已爲英國的商業所盪盡，我們很可以穩妥的卜知中國革命將擲其火星於現在的產業制度積載過多的地雷上，而引起長期準備的總危機的爆發。緊接

這個廣布於海外的總危機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中國送來騷亂於兩方世界，而兩方列強方面由英，法，美的戰艦載着所謂「秩序」到上海與南京去。這是一個偉壯的奇觀。這些將要援助那種動搖的滿洲帝統的秩序的販客的列強，忘記了對於外人的仇視，並驅逐外人出此帝國，從前只是中國之地理的，人種的，位置的單純結果，而自滿洲韃靼征服此邦以後，纔成爲政治制度了嗎？在十七紀末，那互相競爭與中國通商歐洲各國的紛爭軋轢，給了滿洲所行的排外政策一個很大的助力，是明顯無疑的事實。此外這個新朝，因恐外人將左袒那被征服於韃靼的中國人民上半世紀間在大多數華人間存在的不平，而促其採行排外政策也更烈。根據這些顧慮，當時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許與華人交通；外人只准經由一個離北京及產業地方很遠的都市的廣州，與英人通商，而外人的通商，又只限於與行商的交易。行商是政府特許公開的從事外國貿易的商人，爲的是使其餘的人民得以避免與那可憎的遠人的接觸；無論如何，西方各國的政府對於中國的干涉，此時只能使中國的革命更加猛烈，更加延長商業的停滯而已。……」

最後馬克斯更說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環和世界革命之必然不可避免的到來，以作他論太平天國革命的總結：

「自從十八世紀以後，在歐洲的激烈的革命，沒有不先朕兆以商業，財政之危機者。證之於一七

八九年革命及一八四八年革命，此理殆全符合。這是實在的，不僅我們每天看見那些統治階級的權力者與其人民間，國家與社會間，各階級間，其矛盾之尖銳的徵兆，日益加甚，便是各強國家間現存的矛盾，亦似乎將要達到圖窮匕見的程度，最後談判的機運，亦且若隱若現了。在歐洲各國的都城中，每日都有關於普遍大戰的飛書相告，一到次日，此等消息又復消滅了，似乎又有半星期的和平的保證了。雖然，我們的確知道，歐洲列強間的衝突可以達到無論如何的極度，外交界的情形，可以顯出無論如何的危迫，由於此國彼國的多少狂熱的黨派，可以企圖無論如何的運動，可是那些王公的忿怒與人民的憤慨，都一樣的被繁榮的呼吸銷沉下去了。戰爭與革命，都一樣的不能令歐洲爭鬨起來，除非牠是一個普遍的商業，財產之危機的結果。這個危機的信號，與尋常一樣，必要發自英國，牠是世界市場中歐洲產業的代表。注意政治的關係，是不必需的，就以英國工廠有未曾前聞的擴張，英國的公開政黨全然瓦解，法國的全部國家機關，變成了廣大的詐騙投機買賣的商行，奧地利的財政瀕於破產，到處都是招人民仇恨的層層壘壘的錯誤，反動列強間的利益衝突和那曾經一度顯露於世的征服世界的俄羅斯的迷夢，這等等事實看來，在這樣一個時候，那個危機，必然產生。」

我們從馬克斯這篇文章中間，很顯然的可以看出中國之未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並且，牠還指示這個運動的途徑，即是說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 系起來，這是中國革命之標本的模型，凡是中國革

命的戰士，應該加以深切的注意和了解。

# 第五章　義和團

## 第一節　義和團的形成

帝國主義既然積極的帮助了滿清政府消滅了太平天國的革命以後，於是乘滿清政府的昏瞶，更加緊的剝削中國，使整個中國民族屈伏在他的鐵蹄之下，任憑他們的宰割；可是中國的民衆幷不是懦弱的馴羊，幷且，其反抗的程度是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成正比例的發展。

「義和團」的運動，便是中國初期反帝國主義運動發展的最高形式。

關於義和團的運動，無論帝國主義者怎樣的罵牠爲野蠻，或者稱牠爲「東方」的「黃禍」；無論中國的士大夫們怎樣的咀咒其爲「拳匪」，或者攻訐牠爲「叛逆」與「暴徒」；但是牠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反帝國主義的價值，幷不因受了革命敵人的一切咒罵而降低，反之，中國和全世界千百萬勞苦羣衆却授牠以光榮的聖圈！一切的義和團運動的敵人：從國際帝國主義者以及至於中國的豪紳官僚，他們都是異口同聲的向這運動狂吠，說義和團是人類的公敵；其實，他們把義和團形成的眞實的原因隱

藏起來而不肯加以說明，因爲如果說出了這些原因，那麼他們所得到的結論就會反對自己。

什麼是義和團形成的原因呢？

在十九世紀的末年，國際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的政策，已經是很露骨的表示出來了；尤其是中日戰後（一八九四——九五年），帝國主義者之殘酷的剝削中國，眞有一日千里之趨勢；在帝國主義之猛烈的經濟的軍事的侵略之下，更加造成了廣大農民羣衆生活的破產和痛苦。像這樣的滿淸政府的統治，與所謂『洋鬼子』的侵略和剝削，的確都是促成義和團的農民暴動的動因。義和團的發源地——中國北部，是一大平原，在這個平原上居住的大部份人口是農民；其農村經濟狀況主要的是缺乏土地！如當時的山東農村經濟是異常的凋殘，就土地面積與戶口的衡比而論，平均每家約佔三十畝的土地，可是這種統計是連地主的土地計算在內，假使牠們分別開來，那麼，當際上每人所得的土地祇有一畝至四畝的程度；然這不過是指中小農家而言，至於那些廣大的貧農，是早已失掉了土地。在此種情况之下，農民們感覺土地的缺乏，不僅是普遍的現象，而其勢亦復不可終日！至於地主們的兇殘剝削，地方政府的強征暴斂，高利貸者的重利盤剝，使農民的担負更加繁重，彷彿有千斤的石頭壓在他們的身上一樣，眞是彈動不得啊！

許多的歷史家告訴我們說：『山東北部，田不肥沃，地價昂貴，粮食不足，須向他省採辦！……』

我們從這些歷史家的說話當中，很可以看出山東的地瘠民貧，農村生產的降低，糧食缺乏等等。所以有許多的農民除了耕種自己的土地而外，還要到城市中去充當苦力，或者作手工業的工人；因為祇有依靠這些副收入，方才能夠維持其簡單的生活。甚至，還有很多的農民沒有地方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兩手空空過着那流蕩的飢寒交迫的生活。

山東的商業資本是很發達的。在商業資本發達的反面，便是農村經濟的破產，因此，山東的農民生活狀況是特別的窮困。據許多調查山東經濟情況的人們的報告，說：「北京以及直隸省之東南兩邊，一切店舖，糧食舖以及當舖，都在山東人手裏。山東河南北部的抵押店（即當舖），也是在山東人的手裏。……」所有這些報告，更確切的證明了商業高利貸資本統治山東的經濟。加之連年的水旱天災，如黃河渤海的水勢時常泛濫，使農民的生活狀況愈趨於低下；而另一方面如城市手工業者和工人（他們中間主要部份的人是在手工作坊和礦山裏做工的）的生活情形，亦未見得優於農民，甚至比農民的生活還要痛苦，如其從早到晚的不見天日的工作時間，低賤的工資，使他們更做了資本家的奴隸！中國東北部的許多煤礦，自被帝國主義開採後，那新式的大規模的重工業的機器，將中國內部的許多的舊式的採煤的工業破壞了。

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京津鐵路築成以後，把白河一帶從天津通州的大批的帆船生意都搶去了；這

一交通的利器——資本主義的功臣——鐵路的敷設，事實上是打碎了北方水運工人的飯碗，使許多水運工人從此以後都因無處出售勞動力而失業。並且，除了水運工人因此失業而外，鐵路更將從天津通州運貨到北京的陸運工人徹到失業悲慘的境地，而使他們叫苦連天！至於電報的創辦，復使那傳達緊急消息的驛站走卒成爲博物館裏的古董而不復需要了。

除了上面所講的因國際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而影響到羣衆的經濟生活外，再加上中日戰爭的失敗，諸大的鉅額的賠款的担負，又要加到每個中國人的身上——特別是農民的身上來了。當時賠款的總額，共達二萬萬兩，其償還方式則分爲八期：第一期爲五千萬兩，於定約後六個月內應行償還；第二期的數目仍如上額，於定約十二個月償清；第三期的償款則爲一千六百萬兩有奇，於定約後兩年內償還；第四期的償款數目同上，惟於定約後三年內交清；第五，六，七，八各期的數目與以上一律，不過須於定約後四，五，六，七年分期償清。

滿清政府於償還日本賠款的時候，因無現金支付，不得不向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借款；因此，由於「甲午」之役所發生的外債，竟達六萬四千萬元之鉅：茲將因中日戰爭及其失敗賠款的借款數目列如下表：

| 款名 | 額數 | 借款年 | 年息 | 折扣 | 期限 |
| --- | --- | --- | --- | --- | --- |
| 匯豐銀款 | 一千萬兩 | 緒〇年 | 七釐 | 九八 | 二〇年 |
| 匯豐金款 | 三百萬磅 | 光緒一 | 六釐 | 九八 | 二〇年 |
| 俄法洋款 | 四萬萬佛郎 | 光緒二一年 | 四釐 | 八四〇八分一 | 三六年 |
| 克薩磅款 | 一百萬磅 | 光緒二一年 | 六釐 | 九五五 | 二〇年 |
| 瑞記洋款 | 一百萬磅 | 光緒二一年 | 六釐 | 九六 | 二〇年 |
| 英德洋款 | 一千六百萬磅 | 光緒二二年 | 五釐 | 九四 | 二六年 |
| 續借 | | | | | |
| 續借洋款 | 一千六百萬磅 | 光緒二四年 | 四釐 | 五八三 | 四五年 |

我們看了上面這些數目字的外債、關於義和團之反抗帝國主義運動的爆發，是不難了解的。

同時，那高唱「西歐文明」的「和平」的傳教師，就是帝國主義派遣到中國來的爪牙。一切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牠固然是人類精神上的鴉片，而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牧師，其實際的作用，的確是等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棉花。有一個近代的作家，在他的義和團事件的紀載中，曾很忠實的描寫這班

教士們在中國的行動：『密佈在中國各地的天主教和耶穌教的教士們，袋子裏藏着大批的金錢，一開始便收買中國人民中間的無賴份子，這些份子並不是因爲了信仰耶穌教和天主教而受洗禮，實是爲了要獲得教士們的賞款以謀其苟安的生活；而教士們亦祇以洗禮者人數之增加，而不問其質量的優劣如何。他們又不問所採取的方法是否正當，祇是濫支一切，來者無拒，對於這般新收的信徒，總是寬洪大量的臨時的或經常的發給金錢，而這些信徒也慢慢的學會了教會內的各種規矩，實際上對於基督教義，還是莫明其妙！這班信徒看見了教士，都裝做很有禮貌的樣子，一出教堂門，他們馬上便改頭換面，祇要飽己私囊，便無所不爲了！……甚至有許多犯罪之徒，爲要護得教堂之有力的袒護，以避地方政府的刑罰，所以也就進教了。有時還可得外國公使館的幫助，深藏於公使館中；因爲地方政府的命令不能及於公使館之門，如此便得以免刑。教會的此種行動，在中國社會上勞動民衆看來，何等的可恨，眞是信仰墮地了！同時，這教的人，在道德行動上是異常的低賤和卑下，所以社會上一般人們不僅不信仰他們的宣傳，並且還仇視他們。……這樣一來，社會上漸漸形成一種輿論：「好人不進基督教！」……』（見羅得克夫著義和團記）

因此，反基督教的運動——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一八九一年已經發生了，那殺「洋人」的事情，一年之中，曾有十九之多，一八九二年，又有兩次殺「洋人」的案件，到了一八九三年，這一運

動已經是蔓延了整個的中國。

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的經濟恐慌，便是義和團運動爆發的直接因素。這幾年中間，中國的北部，遭到非常劇烈的旱災，連年的飢荒，使農民們以樹皮草根和觀音土來代替食料，因此，那飢餓怨恨之聲，普遍了整個的中國農村；米價昂貴，超過尋常數倍，這種恐慌，眞爲空前未有的現象。當時不僅在江蘇發生了普遍的搶米風潮，同樣的在安徽也發生掠取官鹽和強奪鹽棧的舉動；於一八八九年又復遭受了很利害的水患，這水患的結果，不僅使人畜淹斃，并且使廬舍蕩然，而避難的人民，差不多是觸目皆是，所以民衆的騷動，也是愈趨愈熾，大有不可遏止之勢！關於這一次水患之影響於農村經濟，據調查統計所得：淹沒了一千五百基羅米突的土地，淹死了十六萬五千的人口。

中國北部的農民羣衆，除了因上述的諸種原因而發生可憎的怨恨外，帝國主義在北方的侵略與剝削更使他們切齒痛恨而發生敵愾同仇的感想！例如在中東路建築的時期中（即一八九八——九九年），曾發生兩次嚴重的騷動，將沙俄政府所設丈量中東鐵路及其沿鐵路兩面附屬土地面積的『土地局』都攻毀了，把築路的技術人員——如工程師一類的東西概行加以驅逐，當時所發生廣大的反基督教的運動，便是這一些事變的總和。

然而，結果竟引起歐洲人以武力來對付中國，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在山東膠州地方，殺死了兩個

德國教士（據拉狄克說是德國當局以金錢賄買中國人作此種舉動，以便有所藉口——著者），接着又發生許多新的衝突；而德國政府的威廉皇帝，竟乘此千載難逢的機會，在保護僑民的旗幟掩蔽之下，以武力將膠州灣佔領了：屠殺成千成萬的農民，焚毀了無數的農村！在這樣一種新的轉變和新的環境之下，中國北部的農民，為挽救迫在眉睫的災難，不得不開始組織各種農民的原始的組織以對抗外來的敵人，而有名的義和團的運動，亦從此呱呱墮地了！

## 第二節　義和團的組織

在義和團（亦稱「義和拳」）運動公開的爆發以前，這一種組織於中國北方已經是很普遍的發展了。據羅惇融說：「義和拳起嘉慶時，民間私相傳習，其時禁令嚴切，犯者凌遲死，燕齊之間，猶有祕傳其術者。光緒庚子，毓賢為山東巡撫，民間傳習義和拳，以扶清滅洋為幟。時各省多鬧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亦憤，聞滅洋說，爭鼓吹之；義和拳自山東蔓延於直隸，聚衆稱義和團。……」（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第五一七頁）不過，關於義和團的組織內容，這種說法未免是略而不詳，因為在義和團的總的名稱之下，還包括了許多不同的小組織：

（一）在禮教——即所謂「禮門」。加入這種組織的須遵守他們的教條，即是說要有：「正心修

身，克己復禮」的觀點；牠的目的主要的在誓不吸食從外國運來的鴉片及飲酒等等，其所崇拜的神則爲什麼「觀音老母」。自言熔所謂「儒佛道」三教於一爐，即是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習儒教之禮，在北方一帶，聲勢甚爲雄壯。

(二)保國會。這個團體主要的任務是保淸滅洋，構成這一組織的份子，還有大批的安淸幫徒。

(三)殺鬼會。他們認爲外國人完全是「洋鬼子」；「洋鬼子」現在來擾亂中國，我們是必須加以殺戮。

(四)沙鍋照。沙鍋照者，「人挾一鍋，遇拳民戰時，析薪淅米，炊飯饗之，沙鍋僅如巨鉢，自言飯百人不盡。此團皆乞丐，沿門索米濟軍，無敢拒者！……」(同上書第五三七頁)

(五)紅燈照。據說參加這一組織者，皆十餘齡之女童，「衣紅袴，挽雙丫髻；年事稍長之姑娘，則盤高髻，左手持紅燈，右手持紅巾，及朱色摺疊扇，扇股皆朱髹。」這個組織的創造者，傳聞始於一年邁孀婦，設壇授法，集合閨女數十人，環侍受法，受法期間，則規定爲四十九天，術成以後，稱爲「大師姐」而轉教他人。其術據云：持扇自扇，漸起漸高，能夠上及雲際，然後持燈下擲，由其從女拾燬壇內，而所謂「大師姐」則獨立空中，漸化爲明星，較晨星大，有光晶晶，或上或下，或遠或近，或攢聚如聯珠，或迤邐如魚貫也。當時天津一帶的人民，便將此種傳說附會而爲目覩，因此，有

許多神經過敏之徒，終夜升屋瞭望，據參加這組織的姑娘們自翊：能於空中焚西人的房屋，并能呼風助火，可以作澈底的焚毀！而天津的低級心理的民衆，關於此種傳說却不加以思索，便深信牠是事實，由此，每至夜晚，家家都是紅燈高懸以迎『紅燈照』的仙姑。

（六）大刀會。這組織是義和團的正統，與過去的義和拳一體相承，其導源遠溯於『八卦教』，山東的堂邑縣便是牠的發祥地。不過，牠還有許多支派，如『乾字拳』與『坎字拳』之區別：乾字拳的資格之老遠駕於坎字拳之上，而坎字拳不過是後起之秀；當時在滄州靜海一帶的爲坎字拳之勢力，以白溝河之張德成爲領袖，號爲『天下第一壇』；在景州，深州，冀州，淶水，定興，固安一帶的則爲乾字拳之勢力範圍，以曹福田爲統率之領袖。據說坎字拳傳自清代初期農民暴動的領袖林清，而乾字拳則爲所謂『離卦教』郜文生所遺傳；其他又有所謂『震字拳』與『坤字拳』等名稱，但是在農村中間是很少影響的。

這些組織中間，如『保國會』『殺鬼會』和『　刀會』皆以積極的滅洋爲急務，他們在政綱方面大體是很相同；但是他們對於策略和禮節方面，則有很大的區別。例如從大刀會裏面分出來的義和團，爲要戰勝洋人，所以除了號召自己的弟兄們通常的做筋肉煅煉外，還特別加上了一些從古代所謂『道教』所遺留下來的各種神祕的『精神操練』。

關於此種精神操練，儀式是異常的龐雜，我們從他的祀神當中便可以看出來：如唐僧，孫悟空，猪八戒，沙僧，黃飛虎，黃三太，關雲長，觀音老母，濟顛和尙，玉皇大帝，二郎神，財神，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姜太公，諸葛亮，黎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兄弟，九天玄女等等，完全根據於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榜西遊記種種流行小說的傳說，怪誕無稽，幷無定式！其練術復有『渾功』與『淸功』之別，渾功百日便可成就，而淸功則非四百日不能完成；據其宣傳渾功能避槍砲，淸功能白天飛昇。甚之，其詞咒亦復很多，內皆虛無飄渺之談，茲錄數則如下：

（一）『左靑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五將，後請黑煞神！』

（二）『請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

（三）『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

（四）『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猪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公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以上統見中國近百年史

羅惇融拳變餘聞一文)

這些符咒，就在奇形怪狀的肉體運動的時候念唱出來，在落後的農村中間，却有深刻的印像；并且，他們更造出許多的傳說，不是說：『天津鐵路，一被童男童女接觸，即變成灰燼！』便是說：『海乾神師已令海口起沙，橫亘百里，將使外國的兵輪不能進口。』行施這些神祕的法術，不僅限於童男童女，而且還有成年的義和團，他們相信，一個人如果經各種的肉體運動及默念符咒的結果，就可以獲得各種超出自然的能力；他們除掉了以童男童女來宣傳自己的觀點外，還發出很多的傳單，這些傳單在宣傳義和團的思想上，的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這些傳單中間，牠首先打破中國人畏懼『洋槍洋炮』的觀念，而說什麼：『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台，鐵盔鐵甲鐵壁寨，閉住炮火不能來！』並且，在一九〇〇年五月開始的時候，北京各街道上張貼的傳單眞是不計其數，其中有更進一步的解釋消滅洋人的必要：認爲『洋鬼子』給我們以旱災，以及將毒藥投入井中，使我們沒有水喝。傳單中又說：『今後天已憤怒耶穌的教義，因爲他是侮辱神靈，毀滅聖經(孔子和孟子的書籍——著者)及不尊崇佛教，天已不再降雨，而要派遣八百萬天兵，準備來消滅洋人！在微雨之後，經過不久時間，便要開始戰爭，那時人民或不免於窮困，但佛教與義和團能保護國家及使人民獲得安寧。』

在傳單上還附帶的號召人民，一見傳單，便要抄寫六本散給旁人，就可以免一家的災殃，若能抄

十本散給別人，就可以解除一宅的貧困。若看到這些傳單和告示而不告訴別人，他一家就要被砍頭！假使大家不同心協力的來消滅洋人，那麼，天將會給人民以懲罰而不降大雨啊！

至於抵抗毒水和消極的撲滅洋人的方法，義和團又有一個明白的規定要人民執行；首先教人們以抵抗毒水的方法：用七個酸李，樹皮及少許茅草，放在盛水的缸內，然後可飲，這個簡便的藥方可以解除洋人的毒，如果有人飲了沒有消毒的水，那麼，他們通通都要發生瘟病，而人民死者百分之九十九，均因患了這個毛病。其次，便是殺「洋鬼子」的辦法，這種辦法，誠然是個滑稽：要人民每家供清水一盌，饅首五枚，青銅錢數枚，每家置一秫楷，用紅紙貼在秫楷上面，供奉五日，然後拿這個秫楷以揮擊敵人，而洋人就此便會身首異處了！

這一組織——義和團的組織之發生於山東，很早的就成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總指揮部了。牠基本的戰鬥員是千百萬被壓迫的貧苦的農民，我們看義和團的一切的行動，完全是農民意識的反映；雖然，在這次運動當中，還包括了不少的其他的社會階層，一方面有城市的流氓無產階級，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另一方面又破落戶的智識份子，僧侶和廟觀中的道士。而參加「殺鬼會」的人們，不但有本地的巫士，並且還有販賣洋貨的商人；不過，這一組織上的領導權還是在農民的手裏。此次反帝國主義運動雖帶着很濃厚的盲目的排外性，牠究竟達到什麼程度，這也是我們必須了解的。

## 第三節　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展開

義和團運動一開始，就表示了牠的偉大的力量，牠的偉大點，是在於能夠不顧一切的去和帝國主義拚命，因此，毫無疑義的要引起統治階級的驚訝與恐慌。最初在山東和靜海一帶，地方政府對於這種運動曾加以嚴厲的取締，可是這運動有牠的客觀的社會基礎，其爆發彷彿和浪濤一樣，而使地方政府難以抵禦；因此，統治階級在驚訝之餘，便想轉變羣衆的視線，要他們單純的排外，並且還想將這個運動的領導權抓在自己的手裏。

統治階級——主要的是慈禧太后爲什麼驟然的決定此種帶嚴重性的幫助義和團的策略呢？這決不是偶然的無因的舉動，也可以說是滿清政府內部矛盾緊張的暴露；當然，帝國主義的壓迫，使這個政府的上層常常的感覺得自己失掉了體面，借此報復亦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因爲慈禧太后於戊戌政變的時候，曾經通緝變法的首領——康有爲，而英國人對於滿清政府的通知，不惟沒有遵行，並且反暗通款曲對康有爲加以庇護，由此，慈禧便對外國人深致不滿；同時載漪陰謀廢立，以載漪的兒子——溥儁爲大阿哥，要各國公使入朝覲賀，然而復遭各國公使的拒絕，此爲慈禧太后不滿意於外人之第二點；況因廢立問題，又引起東南人士的反對，一般智識階級——特別是士大夫們羣情鼓噪，以經元善

為首連名上書，簽名者竟達數千人之多；慈禧太后接着這個奏章以後，以為臣民何得干與國家大事，便下令逮捕其首要——經元善，其時經元善避走澳門，滿清政府屢次要求引渡，而列強的外國人，對於滿清政府雪片飛來似的要求引渡的文件，却置之不理，使寡居的西太后更覺難堪！此為滿清政府不滿意於外人的第三點。

綜結此三點原因，便更加促成了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以排外的決心；當時關於利用義和團的問題，曾引起御前會議中間的激烈的辯論：有一派人是反對和帝國主義開戰，這派人物以吏部侍郎——許景澄為代表，許景澄首先發言說：『中國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款而止；惟攻殺外國使臣，必召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禦之？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生靈於何地？』而袁昶亦力言『拳匪不可恃，外釁必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王文韶說：『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盡兵單，今偏與各國啓釁，衆寡強弱，顯然不侔，將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同時，光緒皇帝也站在反對戰爭一方面，他以為『人心不足恃，徒滋亂耳！士大夫喜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爭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偏啓釁，必無倖全……我國積弱至此，兵不足戰，用亂民以僥倖求勝，庸足恃乎？……亂民皆烏合耳，各國兵利，亂民豈足當之？奈何以民命為兒戲？……』

（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羅惇融庚子國變記）

反對戰爭派所持之理由，在當時是根據事實，正確的估量了帝國主義的力量，勇敢的說出了自己畏懼羣衆的缺點，但是這些理由終於不能動搖慈禧太后成見很深的頭腦，因而那主戰的論調，在這次御前會議上大逞其詞鋒；首先是倉場侍郎——長萃發表關於義和團英勇目覩的經過，他說：「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而載漪亦乘機進言：」義民據忠憤以衞國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國恥，乃目爲亂民而誅之，人心失，將不可以爲國。」

成見很深的西太后，她當然是左袒主戰份子，因此，在這次會議席上她無情的打擊了那些反對戰爭的人們，她說這些人都是『替夷人進言』，都是中國國家的公敵，她爲的要加光緒皇帝的罪名起見，便唆使義和團指其爲中國耶穌教主，故後來的義和團揚言要得一龍（光緒）二虎（李鴻章及慶親王奕劻）頭，絕對不會是無因之談。

滿清政府既然決定了幇助義和團的運動，而義和團遂變爲公開的政治的戰鬭的組織，牠借着中央政府政治力量的掩護，遂益獲得組織上龐大的發展。當時義和團的運動，不僅僅限於山東一省，就是在其他各省，亦復獲得充分的發展，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的序幕，亦從此展開了。如陝西羣衆之進攻英人和日人的時候，那銀行，關稅管理局，三個英國公司，以及日本領事館均遭當地民衆的襲擊，幾乎是焚毀殆盡！一千九百年五月二十八日，焚毀了京保（保定）鐵路線上的兩個車站

和兩座橋梁，聰明的外國人，都逃赴天津，留下來的一些不重要的外人和『洋奴』都被圍在自己的屋子內。同時，在豐台羣衆又燒毀了鐵路的製造廠；與這些運動互相策應的，還有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尤其是在福州，雲南與保定，那撲滅『洋人』的空氣，緊張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其聲勢之雄壯與洶湧，眞令帝國主義者胆寒！

但是，在北京的宣傳，已經獲得很大的效果和相當的基礎，所以這一運動還是竭力的趨向北方；當時，這個運動的發展，眞有一日千里之趨勢。第一次義和團便殺死了日本領事館書記杉山彬，最後，更殺死德國公使——克林德，並且還燒毀了許多的教堂；在殺死克林德以後，許多的守舊臣僚——如徐相崇綺等，皆以爲夷酋就誅，中國不難從此強盛，而滿清政府亦看到這種運動發展的危險性，將要危害到他自己的統治，便以慈禧太后爲代表，而向羣衆送『反對洋人』的秋波，企圖躲避羣衆的鞭撻。因此，牠便下詔說：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

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衞使館，加䘏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爲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砲台，歸彼看管，否則以武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依憑，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而衞社稷。彼尙謀詐，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貲，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存，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見同上書)

我們看了這個詔書，很顯明的，統治階級對於義和團是採取曖昧的態度，她因爲看到數十萬人之

不期而集，便相信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而衛社稷了。義和團在她的褒獎之下，許多的落後的臣僚都來投機，如知府曾廉，編修王文龍等曾獻三策：「攻交民巷，殺盡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衛壁輿櫬何異。」而御史徐焜復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而另外一位御史名叫陳嘉言者，他的議論則更爲滑稽，他自己說是接得關壯繆的帛書，云夷人不久即可自滅！其他如蕭榮爵等一般官吏，皆說「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像這樣不值錢的恭維的話不知說了多少次，關於滿清官僚一般思想發展在農民水平線之下，於此，我們可以確信無疑了。

但是，這個運動馬上又會使他們不安，因爲牠的發展的階段又有一些新的轉變了。

## 第四節　鬥爭的轉變

義和團的運動，一開始牠就表示了「兩重性」的特點，就是說這一個運動在最初牠的一舉一動，已令統治者感覺得不安，因爲牠有從反對歐洲人侵略轉變到反對滿清政府壓迫的危險。滿清臣僚們最初看到這點的，要以李鴻章和袁世凱最爲深刻，因他們時常與各國的公使往來，他們的腦神經和意識，多多少少的受過西歐新新資產階級科學的洗禮，所以，他們了解義和團不僅是迷信幷且其結果會反對

政府，而另一方復有因此召致帝主義瓜分中國的可能。當滿清政府還在徘徊歧路以電報和他們磋商的時候，李鴻章便毅然的說：『此亂命也，粵不奉詔』。滿清政府本來要他們殺滅洋人，其如此嚴強態度的囘電，真令人以難堪！

李鴻章不僅消極的以『粵不奉詔』的復電方式爲限，他看到事變發展的嚴重，於是乎更積極的聯合江蘇督撫劉坤一，湖北督撫張之洞，四川督撫奎俊，福建督撫許應騤，福州將軍善聯，以及李秉衡，鹿傳霖，王子春，于蔭霖，俞廉三，德壽和山東巡撫袁世凱等共同發表奏章有：『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釁不可開』……等語。而袁世凱復單獨上疏說：『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迨至包圍公使館的第五天，慈禧太后和朝臣們就與義和團的搶刼及挑釁的行動發生了衝突，我們看六月二十四號的詔令是怎樣的說：

『昨日在東單牌樓路及長安街附近之商店與房屋，都受武裝盜賊方面之搶刼。……』同樣的，在六月二十八號的政府告示上，又表示出對於義和團的不滿：『管理京都中央城市的御史，報告發給人民米粮的必需，他申言在最近幾天，愛國的義和團，燒毀了很多的房屋，幷殺死了許多的中國的教徒；現在市場秩序非常混亂，紊亂的結果，不僅人民的貧苦階級失去了一切養生的資料，就是許多中等階級，也感覺得非常貧困的痛苦。……』同時，在七月一日的指令上，已經表示出政府在設法反對

義和團了；指令上說：「義和團的團員，在開始的時候，本表現了所有的忠義與勇敢，他們以此目標，做他們的格言；我們很期望他們長此爲祖國効勞，反對外來仇敵的侵略。但近日以來，在北京近郊發生了許多搶刧的命案，造出很多的罪惡，據各方面的調查，犯這些案件的都是義和團的團員；假使再放縱下去，不加嚴禁，以糾正這些事件，除了外部的困難而外，又加上內部的紊亂及國家的困難，其前途將不堪設想。」

這種轉變的危機，在統治階級看來是異常的可怖，故當時許景澄與袁昶等曾向慈禧太后慨切陳詞：

「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驚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之髮匪，負嵎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里，莫不知其爲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匪而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查拳亂之始，非有鎗砲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於

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扶清滅洋」四字，試問作何解說？謂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效力驅馳以答覆載之德，斯可矣！謂若以國家多事，時局艱難，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安，曰扶之先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愼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爲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氣概。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爲橫挑邊釁，以天下爲兒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抑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爲封疆大員，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衆千百人，持義和團三字之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長官，聚衆滋事之棍徒，爲地方之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卽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妄欺君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砲台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炮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　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吾軍

隨處截堵，義和團民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毀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避難來京之人，僉謂擊沉洋船，焚毀洋房，實無其事；而吾軍及拳匪被洋兵轟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有謂二十八日洋人攻擊大沽砲台，係裕祿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於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盡淨，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效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拔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束身自愛，仰酬厚恩；乃庇匪為姦，形同寇賊，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亦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歷任封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比，乃竟憒憒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在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為吾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錮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匪阿奸，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啓秀，謬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趙舒翹，居心狡猾，工於逢迎！當拳匪入京師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等，垂詢剿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前，面斥為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致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願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枉，趙舒翹明知其妄，語其隨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示

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命。既解散矣，何以拳匪如毛，不勝獮薙？似此任意枉奏，朝廷盍一詰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誠無邪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月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斯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安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而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為釀禍之樞紐，非若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朝臣僉為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家三百年宗社，將任妄謬諸臣，輕信拳匪，為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勦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勦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嘗敢持械焚刼，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為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盛，無賴之聚愈衆。使毓賢去歲能力勦，該匪斷不致蔓延至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眞防堵，該匪亦不至闌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尚不敢大肆其搶掠殺戮之慘，推源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啓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輕為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之縱匪肇

實，皆謬妄諸臣所爲，并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憤痛惶迫之至。』（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第五百五十九頁——六四頁）

當然，慈禧太后對於這個奏疏，因顧全自己的體面起見是未加以採納，不過，在另一方面她又部份的向非戰派人們投降，而要嚴厲的對付義和團了。在最後七月六日的指令上，我們從她那堅決的態度與嚴重的詞句中間，便可以很明白的看出來；她說：迭接御史的報告，在京都所發生的搶案，層出不窮，深爲痛恨，因此，特命令各官吏，會同義和團的軍事長官，立出訓令，告誡部屬，對於搶劫案犯，應即逮捕，并當地正法！

這些堅決的反對義和團的告示，牠的實際的內容，并不是因爲了義和團之搶劫一部份的居民，而是看到義和團鬥爭之轉變；當時義和團在北京，不受滿淸政府官吏的束縛，其一切行動好像是處在主人翁的地位。他們不僅是侵犯了『達官貴人』們的安甯，甚之，在皇太后的面前，他們也要試一試身手。在六月五號的晚上，義和團的隊伍，突然衝進了皇宮，責備皇帝，說光緒皇帝是『外國人的朋友』（關於此種行動，也有慈禧太后的陰謀，主要的是向光緒示威），并要求處死那班外交官吏，認爲所有的外交官吏都是『洋鬼子』的信徒。他們在宮庭裏面喧鬧不休，其來勢之洶湧，大有不達目的不

止之趨勢，因此，逼得慈禧太后親自去接見他們。慈禧太后對他們是慰勉有加，并向他們說上了許多的好話，然後才叫退去！

迴想慈禧太后和她僚屬的關係，是異常的嚴格，她接受僚屬們的報告和對下級有所命令，都是隔着一重珠簾，這種行動便叫做什麼「垂簾聽政」。以前有許多奉詔來的太醫爲光緒醫病，都是俯伏的跪着而不敢有所仰視，因此關於皇帝的症狀全憑西太后的一紙書面來說明；可是現在，這班「村夫俗子」與「地痞流氓」居然對於那「徐娘半老」的慈禧太后，雖然不能「一親芳澤」，但是他們已經是「秀色飽飡」了！

所有這些事件湊合起來，實在是攸關士大夫們的顏面而令他們不能忍受，難怪過去和現在的中國士大夫們要罵義和團運動爲「拳匪」了。

然而事變的發展，是一天緊張似一天，說也奇怪，事變是測驗各階級的標誌，也可以說牠是各階級的分水嶺；滿清政府過去向外國宣戰的「宇宙觀」，現在已經爲事實所抨擊，即帝國主義的砲聲之由遠而近，把所有過去滿清政府想像中的十萬神兵，打得個落花流水，甚之連蹤跡全無了！那東交民巷一帶陳屍纍纍，都是義和團的份子，因此，在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很快的嚇退了統治階級而使她脫離戰線，七月十日慈禧太后下令停止包圍公使館的軍事行動，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情，用不着什麼驚

詐！

不過，這時期瓜分中國的警告已經由傳聞而見諸事實，那八國聯軍已紛紛的向北京進攻了；但是帝國主義之『文明』的面帕是不是會自行扯碎？以及整個帝國主義內部在瓜分中國的過程中究竟有無衝突呢？

## 第五節　八國聯軍與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

馬克斯在很早以前就告訴我們說：『所謂這些耶穌教民族，對於一切被他們變爲奴隸的異教徒及異民族的野蠻行爲與無恥的殘酷，較之歷史上任何時代，任何民族，卽最野蠻不文明最無情無恥的民族，所做的慘不忍聞的事情，都要超過之。』（資本論）此種議論我們從表而上看去，彷彿是馬克斯的過火之談，其實，這些話因爲受義和團事變的測驗，已經成爲苦的眞理了。

當義和團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開始的時候，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界都異口同聲的大聲疾呼這是東方的『黃禍』，這是中國人之反對文化和文明，這是中國企圖破壞全世界人類幸福與和平的嚴重事變。非加以痛創不可！但是，這些蹲伏在錢囊面前之記者先生們，對於歐洲資本主義之宰割中國與刧掠中國的事實，却一字不提。爲什麼呢？很顯然的，在義和團事變以前，中國與歐洲的經濟聯系，

還是相當的薄弱，資本主義之與羣衆的接觸，因交通的梗塞（那時的鐵路建築還在萌芽期），其現象幷不是普遍的發展。義和團的運動爆發了，教徒遭戮，公使被戕，因此，引起了全世界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覬覦，在討伐「黃禍」的旗幟之下，所有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暫時的合作起來，將炮口向着中國，全世界資產階級國家佔領中國之慾望，現在已經是達於沸點了！

其實，義和團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問題，牠有牠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原因，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當然不是這樣的簡單；現在，我再引用從帝國主義嘴裏說出來的話，以答覆一切中外反對義和團的宣傳。俄皇尼古拉第二在其自己親自批的訓令駐巴黎公使的電稿上說：「我完全贊成，可是對法國還有一個急切的問題，就是關於教士們。我以爲這些先生——就是罪惡之本；他們與商人狠狽爲奸以致激起中國人對歐洲人的嫉視。無論如何說法，都應該設法限制他們；藉那耶穌的聖名，以剝削中國的民衆。」（見拉狄克著中國革命運動史第一八九——九〇頁）沙皇都知道這次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是在中國的教士們與商人狠狽爲奸所促成的，爲什麼歐洲的一般小資產階級羣衆，却打起保護耶穌聖教的旗幟，以擁護歐洲文明的口號來屠殺中國人民呢？既然說耶穌教是世界的宗教，爲什麼民族的觀念又是這樣的濃厚呢？我想耶穌有知，一定會排斥這些不肖的門徒吧!?

同時，德國聯軍統帥——義和團運動的劊子手——瓦德西，他比俄皇更加聰明，因爲他實際到中

國與事實接觸，事實教訓了他關於義和團運動的觀察，不得不作如下的說明：

「余對於教會問題之研究，曾經不遺餘力，據余所信：……中國排外運動之所以發生，乃係由於華人漸漸自覺，外來新文化實與中國國情不適之故。鐵路建築，將使職工階級謀生之道減少。——我們於此，最易聯想到昔時歐洲方面，亦曾流行之相類思想。——更加以築路之時，漠視墳墓，以致有傷居民信仰情感。（瓦氏原註：在中國方面，巨大墳園，如我們公共墓地者，極爲罕見。乃係無數單墳，散在田野。因修築鐵路地基之故，未曾嘗嘗加以重視。）此外了解鐵路有益於國之明白人士，爲數甚少，因而建築鐵路，尤易引起不良反動。近年以來，瓜分中國之事，爲世界各國報紙最喜討論之題目，復使中國上流階級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最後，更以歐洲商人時常力謀損害華人以圖自利，此種閱歷又安能使華人永抱樂觀！至於一二牧師，作事毫無忌憚，以及許多牧師，爲人不知自愛，此固吾人不必加以否認疑惑者。余以後尚將再爲提及此事。此次中國仇外運動之所以對付牧師最爲激烈者，實以牧師在一切外僑中，最易被人捉獲。所有牧師大都結爲小羣，散居中國全部；換言之，實係毫無防禦之力。反之，歐洲商人，只在少數通商口岸，如廣東，上海，天津，烟台，牛莊之類，羣居租界之中，常在列強保護之下；而且租界居民自身，亦嘗有自衛之設備。至於中國內地方面，只有少數歐洲商人，彼輩雖亦設有支店，但多爲華人所忽視。……關於英美教會事業，余實不能詳細批評，但

余確深信，彼等因互不相容之故，常作相反行動，每與事實有損；蓋我們對於中國人，實不能責以辨別，究竟誰個牧師所傳，係屬眞理學說。復次，美國方面，常有一種巨大錯誤，——是否一切教會皆係如此，余實未能深知。——卽所委任之牧師，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稱，職務方面亦未經訓練。此輩嘗以服務教會爲純粹麵包問題，凡認爲可以賺錢的事業，無不兼營幷進。此所以牧師地位因之而低降，幷使教會仇敵得以從事鼓動。余個人卽曾親遇此類牧師，彼等常以商人資格前來戰時醫院及軍隊營舍之中售賣物件。此外余更熟知許多牧師，兼作他項營業（譬如買賣土地投機事業），實與所任職務全不相稱。（見王光祈譯瓦德西拳亂筆記一一五——一八頁）

我們徵引了俄皇尼古拉第二以及德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上面所述的兩段話，可見得義和團的運動幷不是什麼簡單的『拳匪』的騷擾了，而是耶穌教民族侵略的反響。

可是，義和團的事件，竟引起了德國很大的影響，因爲在公使當中竟打死了德國公使克林德；德皇威廉第二便借題發揮，想於遠東方面從先進的列強中間佔一個地位，因爲他過去在中國是一無所得，現在藉着這個大好的機會，不妨多得到一些。根據這個觀念出發，威廉第二便自任爲征伐黃禍的首領，向其他歐洲各國要求一致行動，組織八國聯軍，幷提議以德國伯爵——瓦德西爲聯軍統帥，企圖利用撲滅「黃禍」的口號，搶得整個帝國主義在遠東方面的領導權。但是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

德國之飃然自大的神情，是深致不滿，所以「黃禍」未滅，資本主義列強當中已經起了裂痕！

據拉狄克說：「沙皇時代的俄國，佔着最好的地位，他佔得滿洲，他不願意列強佔得像他這樣的多。他怕在中國發生了更大的共管，那麽，英國人會要佔領揚子江流域，因此，俄皇對於這個問題，便取觀望的態度。當作有人告訴他，俄國公使也在危險中，他洒一滴照例的眼淚，可是他不馬上派大部的隊伍到中國；因爲他知道西伯利亞的鐵路，還沒有完全修好，但是在中國戰事擴大了，英國可以從海道運印度的兵，那麽，英國仍比俄國要利害些，因爲俄國進兵困難。英國爲着自己方面，馬上向德國要求：英國承認瓦德西當元帥，可是要承認揚子江流域爲英國勢力範圍。於是開始協商，這就是以後英國條約，成爲當時最重要的政治條約之一。因爲德國承認中國最富庶最繁盛的區域，算英國的特殊利益。」(中國革命運動史一九一頁)

俄國在最初，對於列強瓜分中國之事，是異常的吃醋，因爲他在中國比較其他列強實在是多得些。所以俄國公使於義和團運動爆發之時，曾上書警告中國政府，說：「他國將借亂事圖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親睦，二百餘年，義當告。」(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五一九頁)現在形勢既然不同，不妨吃一盃順便之酒，結果，德，英，俄，法，美，意，奥，日本諸國的遠征隊——即所謂「八國聯軍」便在天津登陸了。攻陷了大沽口砲台，以日本軍隊爲先鋒打進了北京，把東交民巷的使館的圍也解了，

而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亦復倉皇出走，北京一帶是陷於混亂的無政府的狀態，人民的門前家家都寫着：『大日本順民』而請求保護。

可是這些西方耶穌基督的代表——八國聯軍，他們自稱爲有『文化的』與『文明的』國家軍隊，是怎樣的在着教訓我們野蠻的中國人呢？

這種所謂『八聯國軍』在北京的行動，完全出於一般人們想像之外，帝國主義者牠自己扯碎了蒙在臉上的所謂『文明』的面帕，那兇殘的僞善的面孔已經很清楚的被人們看穿了；所有的慘不忍聞的事情，如最下流的搶掠，在這個強盜軍隊的組織中，各國官佐都曾加入；那刼掠殖民地國家的特點，便是帝國主義所謂『文明』與『文化』的最高標誌。

關於這些強盜軍隊刼掠中國的情形，我們可以舉出很多的事實，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文明歷史上永遠洗不去的特點！有一位俄國住北京的財政的代表——浦克郎洛夫，他在一千九百年八月十七日將帝國主義的強盜軍隊——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時之情形報告於彼得堡的財政總長說：『全體軍士約有四萬。其中四千俄軍，九千日本軍，四千英國軍，還有美國的，法國的。軍隊炸城之後，便佔了皇宮，現在差不多沒有事了；但是中國人還非常的反對，非常憤恨外兵，因爲軍隊壓迫中國人民，搶掠中立的，和平的民衆，並且搶掠得更利害些。其中以日本軍隊爲尤甚，他們自居爲北京的主人翁，分

配步嗆，佔領國庫，雖是其中的錢不多，而日本完全收歸已有。皇太后，皇帝以及滿朝文武，不知道從北京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中國革命運動史一九二頁——九三頁）

但是同時沙皇所得的消息，不僅僅限於日本軍隊之刼掠，那漂亮的俄國軍隊也同樣的做了沒有紀律的事情。因此，在一千九百年十月四日俄國陸軍總長——枯魯帕提金致俄軍總指揮李烈威支電中說：『英國消息的電報，說我們在北京的軍隊，把宮中所有的東西，一律搬出來了，皇帝很生氣，告訴我這個消息。』李烈威支將軍囘答這個電報說：『宮中的東西，什麼也沒有搬出來，英國人亂罵俄國軍隊，說搶了宮中，已非一次了，這不過是英國人罵我們的新花樣；我素常尊重同盟者，不肯攻擊英國人，現在我負責說：我親自在英國軍官那裏看見，他們搶的各種新絲貨像山一樣，直堆到天花板那樣高，其他各種的絲貨的衣服，皮貨，地毯以及各種各樣宮廷的東西，都是像山一樣。每一個英國兵都有裝各樣皮貨的箱子，馬上都運到印度。遲了的以及不能運到印度的東西材料等，在北京英國公使館裏拍賣，一天一天的，一直賣了三星期。拍賣的時候，向各同盟者，都發有廣告這樣的拍賣東西，各國及我們的軍官兵士等，都買得有。俄國軍隊，什麼也沒有得，也不能得。就是我們的兵士拾着銀錠，也是奉命交出的。……』（同上書）像這樣的俄國人報告日本人搶掠，英國人說俄國軍隊搶刼，俄國軍官又向英國反脣相譏，形容英國搶了多少多少的東西，彼此互相推諉，實際上帝國主義搶刼殖民

地的行動，眞是不相上下，俗語說：『到處楊梅一樣花』啊！

至於德國，他是厚着臉皮，對於自己的搶刼殖民地的事實，不但不加以隱瞞，甚之還公開的表示出來，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登載了許多兵士的來信，這些信中的內容都涉及到搶刼中國之事實；因此，引起了威廉・李卜克內西於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國會當中激烈的演說，指斥德國對於中國事變的政策爲強盜政策。譬如德國的軍隊，在義和團的事變中，把北京的天文台儀器都搬走了，直到一九一九年才歸還中國；其他各國，當然不用說是滿載而歸，歐洲的圖書館中充滿了中國古代的珍籍，至於歐洲各國的博物院內面，不知陳列了許多中國的宮廷器具，以及其他有價值的手書證據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者於一九〇〇年在中國擄掠而去的勝利品。

帝國主義的的軍隊除了搶刼以外，那強姦婦女的罪惡的行爲，更是他們的特長；關於此事，就是那強盜的聯軍統帥——瓦德西也是公開的承認：『昨日蔭昌將軍曾受李鴻章及慶親王之囑，特來余處相告，謂近來獲得美國將軍書面允許往遊禁城之人，屢欲侵入住有婦女之院宇，蓋此種院宇至今受人敬重，未加侵犯故也。所有其中婦女，恐懼達於極點，羣謂：倘若再有此種情事發生，决定自戕其生命云云。余因此事，特往訪美國將軍；彼立卽贊成余之提議，出示嚴禁，並貼在住有婦女之處，而且因欲使人特別注意之故，特聲明此事曾得余之同意云云。最可惜者，吾人在此，對於此種毫無紀律之

人，有時竟非加以嚴重干涉不可；此類人無論何國國籍均有。至於婦女每見敵人將近，輒先閉死其子女，隨即自戕其生命之事，實已屢次發生，至可驚歎！』（見瓦德西拳亂筆記一四〇頁）

至於那帝國主義高唱入雲的『瓜分中國』的論調，是不是會從義和團運動壓平後而實現呢？這種『瓜分中國』的論調，不過是帝國主義者主觀上的幻想，其實，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經過此次事變以後，已越發緊張起來！我們看這種綜錯複雜的國際矛盾，首先便表示於俄德利益的衝突，在瓦德西向德皇威廉第二的報告中，特別將這個問題提出來：『皇上陛下，余與俄國皇子……之談話，不敢遺漏弗報。該皇子云：「此次對於中國開戰，我們甚感不便。我們希望西伯利亞鐵路之建築，不爲所阻；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滿洲將如已熟之果實，落在我們手中。中國方面之情形，因北京之佔領，誠然大爲變遷；但其前途如何，尚不可以預測。現在第一步決定，先將砲兵兩旅停止動員。使我們最爲憂慮者，厥爲日本。我們相信日本預備派遣兩萬軍隊，前赴高麗南部，我們亦將因此在高麗北部，集合西伯利亞第三軍團。我們自己決無併吞高麗之心；但對於日本之佔據該地，則萬不能忍，現在我們對於此次戰事費用，再加上一部份鐵路建築被阻所受之間接損失，其數業已達二萬萬之鉅，頗使我們大受影響。尤其令我們懷疑者，究竟中國是否具有此項能力，賠償參戰各國費用？關於吾皇之意見，余未完全得知，但有一事可以見告者，即余辭闕之時，吾皇曾謂余之指揮職務，至多四個月內可以完竣

有所獲得。蓋余對各軍官曾有訓令對待一切外國軍官，均宜特別周到；但一談及政治問題，則應設法避免。……」（見同上書十六——七頁）

云云。」在余船上，皇子曾設法與余之各軍官閒談，故意牽入政治問題。但該皇子却未能因此僥倖，

我們從瓦德西的報告中間，很顯然的，不僅是看出了德俄二國的衝突，同時，更可以看出俄羅斯與日本之明爭暗鬥。因此，瓦德西便很着急的要和議之早日實現，以便期望的目的早日達到，『……今日以和議條件見示，該條件明日即將交與中國和議大臣。余覺該條件十分不備，重要問題如賠款總額之類，均未加以確定。如斯作品，覺須兩月功夫之久，此眞足以充分表現（聯軍各國）之一種散漫分裂情形也。大凡同盟聯合，均帶幾分弱點；蓋三人團結，已屬困難，今乃更欲十八同在一帽之下，（安能辦到）。華人方面，固深知之甚確，倘若彼等（指華人而言）即或堅持不讓，而聯軍亦復不能超出直隸以外大用其兵。在事實上，聯合各國——余想德國亦包括在內——亦眞已領教夠了，直願快快結局，愈早愈妙。」（同上書）

最後，我們還可以徵引瓦德西的一篇奏議，在此奏議中間，他自己說出列強間彼此的矛盾以及中國未來的前途。我們爲有系統的總結此段序述起見，茲特引錄如下：

『關於近年以來，時常討論「瓜分中國」一事，若以該國現刻武備之虛弱，財源之衰竭，政象之

紛亂而論，實爲一個千載難得之實行瓜分時機。現在所欲問者，則是各國對此問題究取何種態度？俄國方面，因佔領滿洲之故，在最近期間，當可心滿意足。假如現在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英國取得長江流域一部份，德國佔據山東，則中國方面實無力加以阻止。因此，我們對此問題，必須十分注意，倘若一旦列強對於瓜分之事，果有妥協之望。但余對於此事，却認爲絕對不能實現，英國極不願意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日本方面對於德國之據有山東，則認爲危險萬分。各國方面對於英人之壟斷長江，認爲勢難坐視；至於美國方面，早已決定，反對一切瓜分之舉。俄國方面若能聽其獨佔滿洲，毫不加以阻援，則該國對於他國之實行瓜分中國，當可袖手旁觀；蓋彼固深信，各國對於此事，彼此之間必將發生無限糾葛，故也。因此之故，急欲促現瓜分一事，實係毫無益處之舉。據余在此所能推斷者，則幾乎所有列強，皆欲藉建設鐵路開採礦山之事，在華直接生利以自肥。其結果則各種間接利益，亦將漸漸隨之而生。譬如中國重大未闢之財源，勢將由此日益發現。中國人民之幸福，益將由此益增。對於各國之商業，更將從此闢一廣大活動區域。因此之故，預料各國前此參加之鐵路事業，不久即將從新着手。此項鐵路事業，在亂事以前，即已有一部份實行開工建築，一部份業經計劃妥貼。最近，余所新悉者，只有俄國對華策略一事。俄國最初用盡方法，謀得山海關北京間之鐵路；彼曾先將彼之天津租界，大爲擴充，直與東站地址相接，妥爲之備。假如爭有山海關天津北京

間鐵路之舉，係英國方面獲得最後勝利，則俄國勢將另自新築一條山海關至北京之鐵路。此外俄國尙欲再築一條北京至張家口之鐵路，幷擬將來再爲引長，直穿過蒙古。……至於北京，保定，正定(？)間之鐵路，其延長路線係擬直達漢口；該路直到現在，係由法比公司所建築；惟俄國方面，現刻竭力設法收買該路股票，以便由此獲得該路之權，幷得循此軌線，以達各國商業利益焦點之長江。在其他方面，則英國擬由緬甸出發，法國擬由(安南)東京出發，各建鐵路，以達該處。據余觀察，俄國之意，係欲使中國永在衰弱狀態之中，常受俄國覊絆支配。因此之故，若謂俄國之使中國經濟發達，其意係在助強中國，實爲最不合理之談。——但在他方面，余實未敢遽信，中國現在已到甘受俄國而不辭之衰弱地步；所以余料，假如俄國永遠據有滿洲，其勢將使中國皇室，取消北京首都資格，另建國都於他處，實屬極爲可能之事。中國文化在四百年之前，常有若干方面，比較歐洲爲優。但自彼時以後，遂成停頓不進之象；尤其對於火車輪船所引起之世界鉅大變遷，未能加以理會。而且，數世紀以來，未有外敵嚴重壓迫，以致養成一種不能戰爭之民族。所有上流階級，對於世界情形，毫無所知，直是驕傲自大，盲目反對白人。至於官吏人員，則爲腐敗之氣所充塞，毫無精神之可言；其在皇室方面，則又似乎不能再行產出振作有爲之人物。但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能忘去者，即中國領土之內，除開西北兩面之(蒙藏)屬國不計外，共有人口四萬萬，均係屬於一個種族；幷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

分裂，更有「神明華冑」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復不能忘去者，卽吾人對於中國羣衆，不能視爲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尙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認爲中國下層階級，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無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爲健全。倘若中國方面將來能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爲其領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國貢獻於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則余相信中國前途，尙有無窮希望。吾人若一觀察日本維新之迅速與成功，則此處實值得吾人加以特別注意。——至於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尙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彼等之敗，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於幷火器而無之。倘若中國一旦強盛，則受其影響者，實以俄國爲最。俄國將於距其中央政府甚遠之數千基羅米突遙長界上，行見一個含有危險甚或勢均力敵之對手產生。若此種觀察不錯，則無論爲德國或英國利益計，皆宜以此之故，扶助中國，使其經濟發展，國力增強；而吾人商業關係，當然亦將隨之而進步。至於併吞土地一事，與其謂爲促進商業，則毋甯謂爲阻礙商業。蓋余之意，以爲德國若以膠州爲根據，實能享用山東利源；而且由此更將能獲得一個較大活動區域，假如鐵路建築，不僅濟南一段，而以直達南京爲其終點。假如現在俄國果眞努力，以助中國發達，則該國之政策，可以爲完全錯誤。近來有一中國老人，曾宣言曰：「我們自四百年以來，皆在睡夢之中；但

其間我們深覺安適無已！你們白人，必欲促我們醒覺，則將來終有一日，你們對於此舉，深爲扼腕之時云云。」關於德國在山東方面併吞較大土地一事，尙有一種困難，卽華人置諸德國官吏管理之下是也。就該地大抵貧乏之居民中，欲得多數稅收，可謂希望甚少；其中尤爲重要者，則該地距德太爲遙遠。假如中國人復欲奪回山東，則德國方面——除開列強特爲德國而設之各種困難不計外——對於此種戰事，非至財政破產不可。』（同上書）

瓦德西很淸楚的，很明白的說出了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很嚴重的，很鎭靜的批評瓜分中國之不可能：他以爲應當摒棄武力轉換一種經濟的方式以束縛中國，於此，才可免掉許多的危險。這種政策爲後來的中國——東方式——的殖民地資產階級形成開闢了一條很寬廣的道路，不過，從這一次事變當中，中國整個民族利益損失達到了什麼程度？以及怎樣的去反對帝國主義？事變是給我們一個很可寶貴的教訓！

## 第六節　義和團的失敗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演習

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滿淸政府殘酷剝削所造成的義和團的運動，牠在爆發不久和開始轉變的過程中，卽爲帝國主義壓平了；致其將待展開的陣容，使我們無從得覩。不過就當時的階級衡比來說，

這一運動之不能戰勝帝國主義的列強，這是不成問題的事情，全世界新興資產階級的炮口都向牠瞄準，使安慰義和團的精神工具——符咒無靈！因此，義和團的運動便從此陷於血海。

帝國主義以武力來征服中國，這一次確是達到空前未有的成績，因為在這次事變中，帝國主義不僅鎮壓了與他們誓不兩立的義和團運動，甚之還經過滿清政府的手搜括了中國整個民族那可驚數目的賠款，并獲得列強在中國充分發展的機會。當八國聯軍進抵北京的時候，曾經提出極苛刻的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最大恥辱的議和大綱，該大綱草案雖然是很簡單的十二條，然而每一條都和緊箍一樣的束縛着中國全民族的利益；例如該大綱說：

『（一）德國公使克林德被害，派親王充專使謝罪，立碑於遇害地；

（二）懲辦罪魁，由各公使指出，被害城鎮，五年內不得考試；

（三）日本書記被戕，須向日本謝罪；

（四）各國墳墓發掘之處，立碑雪恥；

（五）於二年內禁止軍火入口；

（六）賠償各國人民損失；

（七）駐兵衛使館，中國人不得居界內；

(八)毀大沽砲台；

(九)京師至海道，擇要屯西兵；

(十)人民肇亂，罪其長官，不得借端開脫；

(十一)改通商條約；

(十二)改總署及覲見禮節。」(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第五百七十二頁)

但是，這樣一個議和大綱草案，帝國主義還是深致不滿，因此，在牠們共同決議之下，又加以具體的毒辣的補充，始成立如下和約：

「(一)派醇親王載澧，赴德允謝罪使，克林德牌坊已鳩工；

(二)懲辦罪魁，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斬監候，加恩貸死，戍新疆，永不釋回；莊親王載勛，尚書趙舒翹，左都御史英年，均賜死；尚書剛毅，大學士李秉衡，身死奪官；巡撫毓賢，尚書啓秀，侍郎徐承煜，均正法；提督董福祥革職；被害之尚書徐用儀，立山，侍郎許景澄，閣學聯元，太常卿袁昶，均復官，昭雪；

(三)派侍郎那桐赴日謝罪；

(四)被掘墳塋，撥帑立碑；

(五)禁軍火入口二年；

(六)償款四百五十兆兩，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還淸，賠款由上海辦理，以關稅鹽政作保；

(七)劃崇文門大街以西，正陽門城垛，歸使館管理，留兵保護；

(八)大沽砲台剷平；

(九)諸國駐防之處，爲黃村，廊房，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

(十)有違約事，罪其長官；

(十一)北河改善河道，各國派員與修，歲撥帑六萬兩；黃浦河道，各國派員與修，歲費四十六萬兩，一半由中國支付，中國派員會修；

(十二)改總署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同上書)

此種條約簽定後，雖然是形式上帝國主義將北京交還與中國，可是，實際上東交民巷的領事團已經做了中國的主人；而庚子賠款之巨大，中國人民又幾乎不能負担。

我們再看一看帝國主義的強盜們是怎樣的分贓？關於庚子賠款及國際帝國主義分贓的數目，有如下表：

| 國名 | 關平銀兩 | 金磅數 |
| --- | --- | --- |
| 俄國 | 一三〇、三七一、一二〇 | 一九 五五五、六六八·〇〇 |
| 德國 | 九〇、〇七〇、五一五 | 一三 五二〇 五七七·二五 |
| 法國 | 七〇、八七八、二四〇 | 一〇、六三一、七三六·〇〇 |
| 英國（葡萄牙附） | 五〇、七一二、七九五 | 七、六〇六、九一九·二五 |
| 日本 | 三四、七九三、一〇〇 | 五、二一八、九六五·〇〇 |
| 美國 | 三二、九三九、〇五五 | 四、九四〇、八五八·二五 |
| 意國 | 二六、六一七、〇〇五 | 三、九九二、五五〇·七五 |
| 比國 | 八四、四八四、三四五 | 一、二七三、六五一·七五 |
| 奧國 | 四、〇〇三、九二〇 | 六〇〇、五八八·〇〇 |
| 荷蘭 | 七八二、一〇〇 | 一一七、三一五·〇〇 |
| 西班牙 | 一三五、三一五 | 二〇、二九七·〇〇 |
| 瑞典那威等 | 二二二、四九〇 | 三一、八七三·五〇 |

| 合計 |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 六七 五〇、〇〇〇・〇〇 |
| --- | --- | --- |

廣大的農民反帝國主義運動——義和團的運動的失敗，使中國民族蒙受這樣巨大的損失，我想一定會使人們扼腕歎息，甚至於使士大夫們搥胸頓足如喪考妣一般似的泣歎。其實，問題是要倚靠力量來解決，並不是牛衣之泣所能奏效，義和團運動雖然失敗，中國民族雖然遭受帝國主義空前未有的蹂躪；但是，患難中才能結識知交，失敗一定會給我們許多的教訓，總括的說一句，在義和團事變中間已經立下了反帝國主義的總方針——特別是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總方針。因為這次事變教訓我們義和團的運動——中國初期反帝國主義運動，牠一開始的時候，就帶着「兩重性」的鋒銳特質，一方面固然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另一方面同樣的要反對國內的統治階級；但是聰明的慈禧太后於這運動一開始的時候，便引導牠走向維護舊制度方面，然而事變的發展，實在是令統治階級難於統馭，而要侵犯到舊社會的安寧！因此，逼得統治階級很快的脫離了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她情願犧牲羣衆的利益擁抱着帝國主義去跳舞。

事變是很明顯的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先進的革命階級的誕生與領導，則反帝國主義的任務，使農民們無法完成，此種農民不能完成反帝國主義任務的主要原因，由於他們的生活習慣與思想方式之不

能針對着社會的進化，甚至於恰恰相反，把那原始的落後的意識帶進作戰的隊伍中來。同樣的，與國際無產階級及其勞苦羣衆之親密的結合，以及取得經常的聯繫，亦復成爲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中之主要點，祇有與全世界先進國家勞苦羣衆攜手并進的反帝國主義，才能保證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之徹底的勝利！

那些爲時代拋棄到博物館裏面去的人們——特別是國家主義派及其徒屬，現在他們在中國也是高喊什麼「外抗強權」，雖然因爲孫傳芳的倒台，影響到他們的喉嚨喑啞，但是，他們盲目的排外却與義和團異曲同工，如什麼「尊孔」啊！「保存國粹」啊！「太極拳」啊！「達摩劍」啊！所有這些眞是五光十色，鬧得烏煙瘴氣！試問所謂中國的「國粹」能夠壓倒世界文化而獨立嗎？「太極拳」與「達摩劍」能夠戰勝飛機砲艦嗎？這不用說是一種幻想，並且是可憐的幻想！

他們在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客觀上是拾取義和團的殘餘（利用落後農民的心理如國家觀念及狹隘思想）而津津有味的咀嚼，彷彿和吃新鮮檸檬一樣的自得，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檸檬，而是那爲風吹雨灑之久經曝棄的糞渣！

極乎顯明的，凡是受過新與科學洗禮的人們，都應當承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環，牠要走向世界大同之路，那麼，中國革命便要融化於世界革命之中。

自義和團事變以來，極乎明顯的，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又復形成了東方的殖民地式的工業革命，接着這假資本主義——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以後，更誕生中國的第一次革命！

拉狄克說得對：『這次農民運動，絕不是暴徒土匪的運動，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後中國革命的先兆。雖是他們被滿洲政府利用了，可是，他還是表示舊中國崩壞的一個伏流的波浪！』（見中國革命運動史一九八頁）

因此，我們看義和團的運動，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東西，他雖然是失敗，遭受了帝國主義無情的痛創，然其結果却有很大的影響；即是說他為中國第一次的革命開闢了一條很順利的道路，使後來的革命者更容易踏着他的遺跡勇敢向前！並且，他不僅影響於國內各階級，甚之，影響到世界舞台，主要的如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所以列甯抓住這個問題竭力的反對沙皇，並向中國和全世界千百萬勞苦羣衆褒揚義和團之反帝國主義的英勇，極力的抨斥沙皇政策之不當，他將民族問題附屬於全世界革命的兩大營壘之中，其理論的內容，的確有介紹之必要。

## 第七節　烏里雅諾夫論義和團

在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各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中國又得着一種新的保護——庚子條約的保護，越

發肆無忌憚；故其對於整個中國民族的壓迫便無所不用其極了。然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分贓舉動，不僅引起了列強內部之間的衝突，並且還引起了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的觸端便首先伸張到俄國，因為沙俄政府要想在中國獲得更大的利益，不得不從事於大規模的軍事準備，尤其是將巨大的軍事用費轉嫁到人民的身上。

因此，列甯對於這個問題曾以極強硬的鬥爭態度反對沙皇，而另一方面却又表示與中國人民的友好，對於義和團運動致革命的敬意，而流露無限的同情！他曾經發表了一篇關於義和團有名的論文，標題為中國的戰爭，在這篇文章中間，他無情的指摘了俄皇的醜態以及那些征伐「黃禍」的隊伍在中國的罪惡，另一方面，他又說明了義和團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同時還說明了殖民地的政策的內容及其給與中國人民的影響，更指出俄國及全世界勞苦羣衆之未來的前途。例如他首先就指斥俄國在這次戰爭中的所做的罪惡，他說：

「俄國與中國戰爭已告終止。在許多軍事區域發布動員令所費計數百萬盧布，派遣數萬軍隊開赴中國，屢開戰釁，屢獲勝利；此種勝利，不僅是戰勝敵人之常備軍，并且戰勝大部份義勇隊，尤其是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淹沉於海，并擊斃婦孺，至於強刼皇宮與商舖，那更是意中之事。而俄皇政府和仰承鼻息的報紙均大聲疾呼的慶祝勝利，俄羅斯仁慈軍隊的新戰功，歐羅巴文化降服了野蠻的中

國，俄羅斯在遠東文化之使命得到新的成功，歡忭正是達於沸點啊！然而在這種歌功頌德的慶祝聲中，曾不曾聽到覺悟工人的聲響，這覺悟工人乃是代表數百萬的工人羣衆；因爲現在政府之所謂新勝利，其担負是完全直接歸於數百萬工人羣衆身上，既從工人羣衆中徵兵調赴遠道，幷尙須徵收重稅以彌補數百萬的戰費，我們試探究這個問題，社會主義者對於這次戰爭應表示怎麼樣的態度？戰爭究竟爲誰的利益而戰？俄羅斯政府所抱之政策究竟有怎麼樣眞正的意義。」

列甯很顯然的，他不僅要去說明由義和團所引起的瓜分中國的戰爭，幷且還要說明社會主義者對於這次戰爭究竟要採取什麼態度？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在批評沙俄政府之強盜政策之餘便提出自己的意見：

「俄皇政府倡言俄國並非是與中國開戰，祗是爲征服中國的橫暴，肅清中國的反叛，及輔助中國正式政府以恢復國家的安甯而已；固然，雖無正式的宣告戰爭，但是實際上軍事行動又與開戰有何區別？我們試想中國人爲什麼反對歐洲人？英人法人俄人日要肅清中國的叛亂究竟從何產生？主戰者倡言黃種仇敵白種，中國人嫉視歐洲文化，誠然不錯，中國人是嫉視歐洲人，然而究竟爲什麼嫉視歐洲人？中國並不是嫉視歐洲民族，蓋彼此間幷未有何種衝突，其所嫉視者乃歐洲的資本家和代表歐洲資產階級的政府，此輩誇美昌明的文化，到中國肆意誑騙和盜竊虐待，此輩貪欲無厭的歐洲人在中國，

豈有不使他們嫉視嗎？對中國開戰、乃爲奪取權利，爲要自由販賣鴉片藉以昏迷中國人民，利用基督教的假面具，藉達到盜竊政策之實；這又豈有不使他們嫉視嗎？……」

「殖民地的政策，就是盜竊政策，凡是資本主義發達愈快的國家，他便很快的侵入到殖民地在那些工業落後彷彿族長政治制度的國家中消售工業生產品以擢取利潤；資產階級的政府爲了少數資本家的貪殘卽開無理的戰爭，驅軍隊於近赤道的反常氣候中以致疾病，從人民身上擢取數萬萬款項投向殖民地作爲開拓經濟，使土人不得不起暴動，使土人因飢餓而致死；試想印度土人反抗英國之暴動及現在英國的對巴魯的戰爭等，印度人之飢死者更不知幾何！現在歐洲資本家貪慾殘暴之手伸向中國去，俄皇政府不曾參與前列而倘欲竭力表示並非野心，試問奪取中國的旅順口和建設滿洲鐵道由俄國軍隊保護，這也可說是無野心麼？歐洲各國政府繼續拚命掠奪中國的領土（錯了！錯了！是租界！），所以風聞中國將遭瓜分之禍，其實揭破文飾之歌，歐洲各國政府早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而俄國政府又站在他們的前列），祇是非公開的瓜分，而是暗中如偷兒一般，彷彿是偷兒竊屍體，而這個假的屍體忽然要起反抗，則就立刻如對待野獸般的攻擊；燒毀村落，淹沉平民於黑龍江，槍斃和殘殺手無寸鐵的平民及其家屬；此種基督教的勳功偉烈，同時倘大聲疾呼的打倒野蠻的中國人，莫非野蠻的中國人還想舉手打擊歐洲文明人麼!?……」

「俄皇政府在中國實行這樣的狂妄政策有怎麼的意義呢？此種政策對於誰有利益？這就是爲了少數大資本家與中國通商的利益計，一般工廠主，以生產品運輸到亞細亞，少數大包作者因承辦製造緊急軍需品以賺得無數金錢，亦均有利益（現在有幾個軍需工廠製造軍需品，其生產率達到最高率，工人不足則又招募臨時包工）。還有一部份朝廷貴族高等文武官趁着冒險投機政策以冀得功升級而遺留聲譽給子孫，故俄皇政府毅然決然犧牲全國人民的利益於少數資本家與官僚，由此可知專治制度沙皇的政府，時常跪在大資本家和朝廷貴族之前以處理國政，蓋此種政府均由於奴隸性的官僚組織而成。

俄國的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者對於中國的勝利有怎樣的利益呢？是驅勞動者赴戰場，一方面增加國稅幷募公債以彌補戰費，結果就是數千家庭的破產，一方資本家的實力伸張就得壓迫工人，而工人生活狀況，更一天比一天困難。至於農民每年亡者更多，在西伯利亞發生飢荒，這均是與中國戰爭之現實的效果，而將來尚不知伊於胡底呵！俄國奴隸成性的一切報紙雜誌，如不得政府官僚之許可任何消息都不得登載，故對於此次戰爭人民担負幾何，我們不能知道確實的統計，但是戰費必在數百萬盧布之數可無疑義；有人謂政府共支戰費一萬五千盧布，有未頒佈之諭旨在案，現在戰費每三四天需戰費百盧布云。政府用錙銖必較的方法截斷了供給飢餓農民的救濟費，縮減了普通教育費並竭力榨取國有工廠工人和郵務職員等等的血汗，直如富農壓迫貧農一樣，將所創剝的以之彌補戰費，財政總長——波

采宣佈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國庫剩餘二萬五千萬盧布，至今已空無所有，故政府不得已發行公債勞幷增加國稅，因財政的竭蹶而縮減必要的政費，停止建設鐵路；由此觀察政府或將蹶於破產，但是不顧及於此而抱侵略的政策，此種侵略的政策，不但需巨大的經費，幷且將來還能惹起更凶險的戰爭，蓋此次聯合攻擊中國之列強因分贓不均而彼此已有爭端，誰又能知道他們的爭端將達於如何程度哩！」

最後，列甯更坦白的攻擊沙皇之以民族的觀點來抹煞階級的觀點，企圖避免羣衆的鞭撻，他說：「沙皇政府對於中國之政策，不但是犧牲人民利益而已，尤其是蠱惑人民的政治覺悟，蓋凡是以武力擁護的政府，必然是壓倒人民的不滿意，因此，祇有將人民對政府不滿意的傾向移轉目光到其他對象，故運用一種政策，如煽惑大俄羅斯對於猶太民族之仇視是；而下流報紙竭力嗾使人民反對猶太人，難道猶太工人不是如俄國工人同樣的受資本家的壓迫與警察式的政府虐待麼？而在現在報紙上又極力鼓吹反對中國人，宣傳黃種人的野蠻，黃種人對文化的仇視，俄羅斯爲要教訓他們計，軍隊何等的勇敢與他們對戰等等，這是何等的堂皇！……中國人民自身亦如俄國人民同樣受着痛苦和危害，亞細亞式的政府，從饑寒的農民中逼迫着輸稅，對於人民之傾向自由則以武力壓制之；另一個危害則是資本家的壓迫，這個資本家的壓迫亦漸輸入中國。」

對於這一切的關於俄國內部的重要問題，列甯更提出如下的解決方法：

「現在俄羅斯工人階級逐漸由黑暗中露出頭角來了，但是人民羣衆仍然蟄伏於黑暗的政治裏，故有覺悟之工人應竭力反對蠱惑民族間之嫉視，幷須反對那般遮掩工人羣衆目光的眞正仇敵者，這是他們的任務，沙皇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是萬惡的政策，將更使人民破產，還更消惑人民，還更壓迫人民；沙皇政府不但使俄國人民奴隸化，幷且派遣軍隊赴其他民族鎭壓他們的反抗使之奴隸化（如一八四九年俄國軍隊干涉匈牙利的革命運動）。沙皇政府不但是輔助俄國資本家壓迫本國工人，綑綁工人手足不但彼此聯合共同防禦，並且爲少數財主和貴族的利益計，派遣軍隊到其他民族去。勞動人民羣衆若要解脫這個戰爭的枷鎖，祇有一個方法：「召集國民代表大會」。此國民的代表大會，卽能斬斷政府的橫暴，使他不僅在朝廷羣狗的利益上。」（列甯全集第六卷十六頁——二十頁）



# 第六章　帝國主義的深入與中國殖民地式產業革命的形成

## 第一節　產業革命思想的先驅——康有爲變法

自義和團事變以後，帝國主義者很明顯的看到那武力的瓜分政策不僅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甚至使內部的矛盾亦復趨於緊張的狀態，這些帝國主義者內部矛盾之具體的表現，如英德的衝突，日俄的衝突，以及後來的美國與其他國家因「勢力範圍」的衝突，彼此都是互相鈎心鬭角，誠然是二十世紀初期帝國主義史上的奇形怪狀的一頁。

可是，義和團事變的經驗教訓了他們；如果要想在中國獲得更豐富的利益，那麼帝國主義的列強對於殖民地的策略便要有所改變，當然，這一個改變的意義與傾向是在不妨礙帝國主義列強利益的條件之下進行的，換句話說，全世界資產階級各自經過他們政府的路線，伸其殘暴的，貪得無厭的手來掠取中國人民的血汗——金錢。

什麼是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中國）新的策略呢？綜結起來說，使帝國主義共同的向中國投資，

建設鐵道，發掘中國未曾開發的財富（如鑛藏一類的東西），大批的運輸機製的工業品到中國來，另一方面又以賤價吸收中國農產品的工業原料，依據這些情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在客觀上最初期他算是盡了推動的作用。

本來，在中日戰爭的前後，滿清政府對於帝國主義之扣關來犯已經是深深的感覺不滿，因此，有一部份『階級自保』的人們，企圖採取『日本式』的道路——模倣『明治維新』的變法。當然，此種變法的動機，完全限於階級自保，說得恰切些，是一種改良的烏託邦的幻想。不過，這種理想縱然如俄國『十月黨』一樣的，沒有即時實現的可能，然就其在中國全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意義而論，此種變法的理論，實是中國殖民地式的產業革命思想上的先驅。

康有爲便是變法運動的理論的和實際的領導者。

康有爲他生長於南中國最大的國際貿易港之一——廣東的南海縣，他是一個中人之家的子弟，他自幼感覺卽異常敏銳，對於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是深惡痛絕。他這種意識很顯然的是代表南中國商人的心理；然而人微言輕，下情以上達爲難。他當時對於滿清政府雖有許多重要的政治意見，但是無由發表，會有光緒皇帝的先生——翁同龢對他青眼相加，於是乎經過翁同龢的介紹和鼓吹，因而與光緒皇帝見面，自此次『一登龍門』以後，康有爲的身價便十倍於往昔了！

青年的光緒皇帝，在主觀上，他們確是企圖「勤求民隱」，以便對於腐敗的滿清政府有所改革，康有為於此種鼓勵之下，於是便積極的申述他的觀點；他首先就從國際形勢以及中國在國際地位的現狀說起，他認為俄國當時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他說俄國有蠶食鯨吞內外蒙古及新疆的危險，一旦這些地方為他佔領，那麼，決不是從搏俎之間所能收回，而是和「肥豕臑羊，已入虎口，而牧者乃哀詞揖讓，望其吐之，不其傎乎?!」同時，他更去估量英國，他說英國是個商業家，他是恐怖戰爭，何況英國對華的貿易占了百分之八十，幾幾乎做了中國商業的主人，他指出英國之不願意戰爭的原因（註：這是一八八七年的意見）：地理的和政治上的條件是束縛了這個大英帝國。

但是，他同時補充的說，如果俄國與中國開戰，那麼，英國與日本不但不會幫助中國反對俄國，甚至還要與俄國結成鞏固的同盟，將中國放在十字架上而共同的宰割呢！至於怎樣才能將中國拯救出來？在康有為的意思，以為祇有模倣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始能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羈絆；故他於日本明治政變記考敍中說：

「臣聞國無大小，民無衆寡，能修其政則強，不修其政則弱。……俄本蕞爾，自大彼得起，發憤變法，而霸北球；德大非特獵起自小普，能勝俄，奧，法而成強大，威廉第一能用俾士麥治國，今乃霸全歐；薩謫尼侯國，有賢相嘉富與其主伊曼奴核，起而勝帝國之奧，意遂以立。若夫日本，地域比

我四川，人民僅我十之一，而赫然變法，遂殲吾大國之師，割我遼台，償二萬萬！若夫印度突厥，豈非古有名萬里大國者？然今則夷爲奴屬，或割爲病夫，聽諸歐蹂躪焉！……况今者四海棣通，列強互競，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器，日出曹奏，歐人乃挾其汽船鐵路貫穿大地，囊括宇合，觸之者靡，逆之者碎，採而用之，則與化同……拒之則弱削，日本稱小國，更新變用之則驟強，此其明效大驗，公理正則，無可遁逃者矣！……若以我廣土衆民，十倍於日，皇上乾綱獨攬，號令如雷，無封建之強侯，更無大將軍之霸主，片紙渙汗，督撫貫行，四海無虞，民罔異志。就今歲入，已逾萬萬，若括陋規，必可得倍，若正經界，更得倍蓰，若善銀行之用，則不可思議也！若因日本譯書之成業，政法之成蹟而妙用之，與我同文，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政之次第，鑒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規，悉發現于我神州矣！夫凡有興作，必有失弊，幾經前車之覆，乃得後軌之遵；今我有日本爲鄉導之卒，爲測水之竿，爲探險之隊，爲嘗藥之神農，爲識途之老馬，我盡收其利，而去其害，何樂如之!?譬如作室，歐美製型，日本爲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歐美覓種灌溉，日本耡艾，而我食之也。雖國勢不同，民俗少異，有不可盡用者，則斟酌補苴，彌縫救正，亦何難焉!?……臣曾上書言日本變法已強，將窺遼東；先謀高麗，大臣不信，猥以疎賤，九門深遠，格不上達：及東事之興，舉國人皆輕

日本之小，實然興戎，遂致敗辱，則不案鄰國，誤輕小邦之所由也。嚮使二十年前，臣書局書成，或十年前長吏聽臣言譯之，或六年前，大臣信臣言而入告，皇上亟變法而預妨，有一於此，其在前乎？則國民必瞭而不驕，其在後乎？則中國已強而無患！乃皆不獲，遂致喪師辱國，割地賠欵，以至於此也！臣不能不歎息痛恨也!!!……誠以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詳，視前車之覆，至險可鑑，若採法其成效，治強又至易也。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法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衆民，近採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臣荷皇上非常之知，敢爲中國自強之計，未有過此。皇上若採臣言，中國之治強，可計日而待也！……」

（康南海文鈔第一卷二十二頁——二四頁）

康有爲是異常堅決的企圖走日本式的道路，因此，他更具體的提出一些變法的綱領；這種綱領式的變法的意見，其最重要的有如下各點：

（一）召集國會以確定君主立憲的政體：當時康有爲以爲君主專政不僅不適合世界潮流，甚之，還要引起國內人民的反抗，因此，他企圖將特謨克拉西的要求披上一重封建外套，即是說，以孔子的學說來掩蓋他變法的鋒芒。我們看他說：「中國政教之原，皆出孔子之經義，孔子作春秋以定名分，君不日全權，而民不爲無權，但稱其名而限其分，人人皆以名分所應得者，而行之保之；君不奪民分，

民不失身家之分，則上下自安，身安而國家治矣。憲法之義，即春秋名分之義也！……今大地各國，皆已改行立憲，苟不改者，則身弒國亡，如俄及波斯；今事汲汲，而法大革命之事可證矣。此其成效得失，天下咸知，……或疑於民智未開，資格未至耳，夫中國之大，四萬萬之衆，學校之盛，當講求新學之殷，通於中外之彥，殆不可數計，而謂區區數百議員，竟無此資格之人才，此不獨厚誣中國，有貶人才，亦無此理矣！……若一開國會，則人民有選舉之權，即有担任稅務之責，司農無事仰屋而憂，而經武營邊，舉行新政，自強至易；夫不開國會之害如彼，立開國會之利如此，然則何事遲疑徘徊而不立行耶!?……」(見同上書第四卷十三頁)

很顯然的，要求召集國會的策略，是康有爲變法運動的總路線，根據這這個總路線出發，於是乎他更積極的提出許多問題來充實國會的內容。

(二)遷都江南：揚子江流域一帶經濟的發展，竟誘惑了康有爲先生，使他拋棄了那落後的北地燕麗，進一步的來歡迎南朝金粉。他認爲：「王者都畿，爲民所止，吸力愈大，文明更繁，英之倫敦，法之巴黎，萬國動觀，亦旣觀止，然各都之吸集民衆，實視得地與否；德之柏林，當道光十年，人民僅六萬，至今僅數十年，人數遂過三百餘萬，爲大都會第三矣，以得地而便工商故也。俄大彼得之大變法也，遷都於臨海之聖彼得堡，大便工商運業而國強；日本之復王政也，亦遷都近於海之江戶而強

盛；西班牙馬得理京，憑連岡而無水，不便工商走集，故昔雖霸有南美，而京邑蕞爾陋小，爲人所輕視，則宅京之失地利故也；西班牙之篩非故回京，近海廣陸，易集工商，班人不知遷都之，則繁榮難滋，蓋建都之時，或因拒敵控險致然，遂永爲後世之累矣！我燕京之能久建千年，實因金，遼，元，明便控於遼漠之故，蓋據亂世憑險之都，非昇平世阜民之地也。且飛沙積雪，盛暑祁寒，其地其時，皆與人民不便！……且今中國之人民及生產力，皆在長江流域爲多，而萬國競爭之通衢，皆注於太平洋海爲盛。……以我幅員之廣，人民之衆，財力之富，當爲大地霸國，則宅京圖大，必當顧視全球，內之當思收長江萬里之精華，外之當爭太平洋海之權利。……竊謂內憑蘇州，以握江南之勝地，外臨上海，以控太平洋之通衢，北夾江陰，以收長江之利賴，南襟太湖，以吸水澤之秀氣，周方縱橫約二百餘里，規爲新都。每三里闢馬車之坦途，每三十里闢一電車鐵軌之通道，凡大學，公園，博物院一切建設，皆擇勝地，而虎丘無錫，皆置行宮，……計不三年，繁盛已不可思議！……」(同上書)此種繁榮市政的主張，在現在一定有很多人們的同情，可是在當時一般落後的臣僚對此主張都是冷嘲熱諷而不願加以考慮啊！

(三)要求中央集權：康有爲認爲督撫制度的存在，會助長地方割據的傾向，他說：「督撫各自爲政，無論兵餉大權之倒持也。」他並且還列舉許多的事實去說明此種制度的不當，最後，他更勇敢的

要求「裁督撫而以州府爲行政區長」。當然，康有爲之所以提出中央集權的意見，完全是針對着滿清政府之腐敗的政治系統，而企圖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

（四）鞏固邊防：在變法運動中認爲比較重要的問題，當然邊防也是當今急務，因爲帝國主義已竭全力向這些荒僻的地方發展。關於邊防之具體方案，根據康有爲的意見，所謂邊防者，即對遼，蒙，囘，藏而言，處理遼蒙囘藏問題，政府應當添設這四部大臣，并且要求多派官吏到這些地方去經營；主要點是從教育着手，在思想上去領導這民些族。他以爲「國勢久弱，諸邊遼闊，強鄰窺伺久矣！慢藏海盜，狡焉思啓」。他從地理方面去說明這許多地方的重要，并且還以煽動的辭句來警告那些醉生夢死的人們：

「習於輕羅羽扇，豈知大雪已飛，慣於山國席眠，豈知虎熊環至！以列強之界在比鄰，日相窺伺，試問尙得以百年前之小番跳梁，遠荒無人者比之乎!? 近年東遼幾變爲俄人之疆，西藏幾屬於英人之土，亦旣動魄驚心，談虎色變矣！乃若法窺滇桂之境，俄擾蒙囘之邊，邊吏飛電，警報日聞！……」

（五）編練海軍：在提出編練海軍制度以前，他首先對於國防的趨 有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他認爲現在的中國與以前的中國逈不相同，因爲那過去的閉關自守的自治，已經是不復存在了；從前都是「經營滇北，鎭撫內地，精練騎射，足以自雄」！可是，現在這些東西在國防上已成爲不重要了，主

要的原因，是由於國防間的交通都以海運爲中心；歐洲人的海軍可遠涉數萬里的重洋，而中國對於海軍則寂寞無聞！因此康有爲認爲假使中國缺乏海軍，彷彿和魚一樣的失掉了翅，和鳥一樣的失掉了翼，和人一樣的失掉了手足，任憑人家束縛而已。他還舉出許多國家爲例，如英國之所以能夠侵略印度者，完全依靠着海軍；日本之所以能夠戰勝中國者，海軍實是日本主要的力量。他還形容中國因無海軍而遭受帝國主義者的蹂躪：「各國公使入外部而恃強要索，不得輒拍案慢罵曰：「吾將調兵艦來」，吾大臣卽畏而俯首聽命，甘割地失權者，以彼有海軍故也。……」他的海軍計劃，是「擇南北之港塢，定營製之艦數，增造船廠，多開學堂，多魚雷以便守衛，增快艦以便敏速。……」在海軍計劃以後，接着他又提出徵兵制度。

(六)軍國民主義：在帝國主義的嚴重軍事的壓迫之下，逼得一部份富於國家觀念的人們發憤圖強，康有爲便代表這一部份人的傾向。他以中國的積弱與募兵制度有密切的聯繫，因爲在募兵制度之下，很多的人們迴避了執干戈以衞社稷的工作；他一方面固然從歷史上說明中國徵兵制度的優點，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舉出德國和其他國家民族之尙武精神。他描寫德國的青年之尙武鬥很，說凡是一個學生他的面部如果沒有刀痕，那麼，人家就會以非壯士相笑了！因此，他的結論認爲如果中國實行徵兵制度而全國皆兵的話，經過數年的訓諫，卽可成立數千萬的軍隊。這時候康有爲便自豪起來：「天下

莫強，誰敢侮余！」

（七）創設工兵廠：「富於兵備，則爲世雄，寡於兵備，則爲人弱！」康有爲關於兵備的問題，很早他就有這樣的意見，所謂兵備，當然是包括船廠，鎗砲廠，以及一切軍用品的工廠，因爲這是與軍國民主義有關聯的設施；聰明的康有爲，他首先便引用中國歷史上管子的言論，如什麼「器械不精，以卒與敵！」以煽動皇帝，最後，他更就德法戰爭的事實來說明設置兵工廠的必要。他舉出德國之所以稱霸歐洲完全爲克虜伯砲一物而致。

（八）經濟的建設：據拉狄克說，「康有爲說，爲增加人民的幸福，必要實行四種策略：幫助農業，挽救手工業，扶助商業，周濟貧民。關於農業問題，意大利，法國的政府方面特別幫助養蠶業，在錫蘭島獎勵種茶葉，以與中國茶葉競爭。中國政府亦應作同樣的幫助絲茶商業。歐洲扶助手工業而得機器，電氣，鐵路，軍備等的發展，各國爲手工業及農業創造專門的學校，中國各省，亦應做傚行之。我們的對外貿易因而沒有幫助，雖然，我們國家很富，而不能去遠方與外國貿易品競爭，應當創設商業學校，扶助紡織商業公司，取消釐金。中國大使，應當研究外國情形，中國應創辦重工業，中國因人民過剩及缺乏工業以致國民間有大批貧民；皇帝更不知道有多少貧民，爲救濟這些貧民，應當獎勵向新疆，蒙古，及滿洲等處殖民。政府應扶助在彼處組織殖民地，爲達到這目的，必要建築鐵

路，應當扶助人民的工業及手工業，應當創辦為失業工人及在業工人的教育學校，應當顧慮貧民及孤子，為達到這些目的，應當改良教育制度；取消中國舊式的考試制度，應當設立專門學校，扶助國民智識的發展；國民的智識就是表示國家的力量，中國人每百人僅有二十人識字者。」（中國革命運動史一六五——一六六頁）

我們看了上面康有為一些綱領式的變法意見，的確相信這些意見完全是資產階級改良式的政綱；他的中心點幾乎全部份是為着中國未來的資產階級着想，然而康有為自身並不是個資產階級。我們要說明這一點，因為這是關於康有為變法的基本概念；康有為他是代表中國整個官僚中進步份子，他是滿清統治階級的一個左翼，不過，他在某些地方特別是受着了帝國主義者的影響，因此，他腦袋裏裝進了一些模倣的資產階級意識的成份。

康有為的主張，經過了屢次事變的測驗，在當時愈加證明其正確，因此他的意見竟在羣衆中起了影響，特別是那些青年的智識份子，擁護他的意見。當然，那班落後的臣僚以及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她們都是不願意變法，何況袁世凱再以嚴重的「宮廷改變」的消息告她，其對於「維新運動」的仇視，真似火上加油了！歷史上有名的「戊戌政變」便在此種情況之下舉行了，那慷慨激昂的譚嗣同等所謂「六君子」，從此便作了變法運動的殉葬者。

這次變法運動雖然是沒有完成，可是，牠却留給我們很多的教訓：牠本身雖不是個資產階級的出身，然而對於後來的中國殖民地式的資產階級，確有很光榮的勞績，他替中國的資產階級在思想上開闢了前進的道路，告訴了中國未來的資產階級發展的途徑。但是，他的缺點更多，如一種政治上的改革，不僅僅以適合於中國民族的需要，同時更應當注意將這種需要與擴大的羣衆結合起來；至於革命的熱忱與鬥爭的勇氣，那是不成問題的要重視，不過，個人的英勇是不克奏效，而需要與羣衆同一步調；拉狄克說：「鬥爭不在乎以流血愈多爲目的，流血不應是個人的，不是離開羣衆的，這犧牲流血的人是要與人民羣衆聯結起來的。」又說：「我們如果站在廣大羣衆利益立場上，是沒有一滴血是空空流掉的！」

我們看在康有爲提出變法的意見以後，對於中國的國民經濟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影響？

## 第二節　交通網的新建設

我們論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產業革命的影響與推動，那麼，首先便要涉及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之大規模的空前的交通網的建設；嚴格的說起來，如果沒有偌大的交通網的建設，中國的資本主義不僅不能發展，甚之於他的形成與否都成問題呢？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整個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完

全是尋找市場，主要的中心，當然是要求租界。因此，關於商埠的開放，便如雨後春筍一般的出現：

| 商埠名稱 | 開放年份 | 商埠名稱 | 開放年份 |
| --- | --- | --- | --- |
| 天津 | 咸豐十一年 | 南京 | 光緒二十五年 |
| 秦皇島 | 光緒二十七年 | 蘇州 | 光緒二十二年 |
| 北平 | 光緒二十九年 | 杭州 | 光緒二十二年 |
| 煙台 | 同治元年 | 寧波 | 光緒二十三年 |
| 蕪湖 | 光緒三年 | 溫州 | 光緒三年 |
| 安慶 | 光緒二十八年 | 福州 | 道光二十四年 |
| 上海 | 道光二十三年 | 廈門 | 道光二十四年 |
| 鎮江 | 咸豐十一年 | 九江 | 同治元年 |
| 漢口 | 同治元年 | 滿洲里 | 光緒三十三年 |
| 沙市 | 光緒二十二年 | 愛琿 | 宣統元年 |

| 宜昌 | 光緒三年 | 齊齊哈爾 | 光緒三十一年 |
|---|---|---|---|
| 長沙 | 光緒二十九年 | 海拉爾 | 光緒三十一年 |
| 萬縣 | — | 三姓 | 宣統元年 |
| 重慶 | — | 琿春 | 宣統二年 |
| 汕頭 | 咸豐十年 | 吉林 | 光緒三十一年 |
| 瓊州 | 咸豐九年 | 長春 | — |
| 廣州 | 道光二十三年 | 哈爾濱 | 宣統元年 |
| 三水 | 光緒二十三年 | 寧古塔 | — |
| 江門 | 光緒二十三年 | 局子街 | — |
| 北海 | 光緒三年 | 頭道溝 | — |
| 惠州 | — | 白草溝 | — |
| 桂林 | — | 綏芬河 | 光緒三十四年 |
| 龍州 | 光緒十五年 | 龍井村 | 宣統二年 |

| 梧州 | 光緒二十三年 | 牛莊 | 咸豐十年 |
|---|---|---|---|
| 蒙自 | 光緒十六年 | 安東 | 光緒三十三年 |
| 思茅 | 光緒二十三年 | 奉天 | — |
| 河口 | 光緒二十一年 | 大東溝 | 光緒三十三年 |
| 騰越 | 光緒二十八年 | 鳳凰城 | — |

當然，在上表中間，也有一些商埠是二十世紀初期所開闢，不過，就大部份言，屬於十九世紀的是占多數。在這種情況之下，很顯然的，如果這些商埠不與交通網聯繫起來，那麼，國際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影響，在經濟方面說，還不能深入五臟六腑。帝國主義者根據此種認識，故不得不積極的來發展中國的交通事業，因為交通是工商業的命脈，牠更便利於那些強盜式的資本家投機，同時，每個帝國主義者都想做中國實際上的主人，交通當然是唯一的政治上軍事上權力集中的利器。

關於交通網的建設，在當時因航空事業尚未普遍，祇可分作兩種形式：航海線與鐵路線。先就航海線來說，當時帝國主義的經營與中國的領海權已經喪失得令人可驚；如自庫頁島之喪失而鄂霍次克海之領海權亦隨之喪失，吉林沿海一帶之割於俄羅斯，朝鮮改隸日本，所有日本海面之領海權亦復

喪失殆盡！其他如緬甸，隸屬於英國，而孟加拉之領海權放棄，旅順大連之先租與俄，膠州租與日，威海衛的租借於英，所有渤海沿岸都發現帝國主義者的足跡。幷且，各國商船，這時候可以很自由的航行長江及東海沿岸一帶，其航海線的廣闊及其經營的野心，眞是令人咋舌！然航海線在交通方面還不能作爲唯一的主要利器，因爲鐵路才是資本主義唯一的毒龍！

關於鐵路在中國的史略和其利權喪失的經過，我們可以約略言之：在十九世紀末期，中國之所以建築鐵路者，幷非出於中國政府之本意，完全受帝國主義者的威脅和催促；帝國主義要銷售他的商品於中國內地，除了航海的運輸而外，不得不借重這一利器了。故爾於一八六三年由英美商人建議敷設由上海至蘇州之間的鐵道，可是這個建議遭受地方政府嚴厲的拒絕；然而富於百折不撓精神的基督教民族，他們幷不因此而對於鐵路事業有所灰心，他們仍然和烏龜一樣的按步就班的向前走去，曾幾何時，又組成了吳淞鐵道公司，由囊橐充實的怡和洋行承辦一切材料，這個毒龍（火車）竟於一八六八年二月十四日開駛與中國人民見面了！一種進步的事業，必然的引起了落後人們的反對，中國最初期的鐵路，亦復同此命運；許多的守舊臣僚與夫低級心理的羣衆，都認爲這個怪物不但破壞了中國的風水，甚而至於這驚動了土地龍神。因此，在這鐵道建好以後，那成羣結隊的農民都暴動起來，要求政府拆毀牠；政府對牠本來就有幾分不滿，再加上羣衆要求，於是便有所藉口了，結果，以二十八萬兩

的代價贖回這條輕便鐵道，并將所有的鐵軌和車頭加以懲罰而充軍到臺灣去。

這便是中國鐵路史上紀元的一頁，相隔二十年以後，帝國主義者又從事於鐵道的工作了；如一八八七年所完成的北京至唐山的一條輕便鐵道，牠便是中國鐵路的眞正代表者。在中法戰爭爆發的時候，中國政府因為軍事上便利起見，才相當的注視鐵道的重要，而將開平公司改為中國鐵路公司，又復在帝國主義指揮監督之下，向英國滙豐銀行籌借大批款項，以從事發展鐵道的工作。在甲午戰爭之後，俄國人逼迫日本讓出遼東半島，同時那經過黑龍江之西伯利亞的鐵道權亦為俄國所掠取。自此以後，帝國主義爭奪中國鐵路建築權之程度幾乎是與日俱增，如一八九五年中法協定中很明白的規定法國人有在中國境內建築鐵路之職權，英國深恐自己的利益為其他列強侵犯，所以特別的提出五條鐵路之專利權：

(一)天津鎮江線；

(二)山西河南線；

(三)九龍廣東線；

(四)浦口信陽線；

(五)上海杭州線；

在另一方面，後起的國家對於鐵路建築權及營業的獲得，也是急起直追。如德國之獲得膠濟路的建築權，比利時於一千九百年獲得粵漢鐵路之營業權，美國之對於京漢路的投資等等，彼此都是互相排斥。自一八九五至一九零五年的十年間，關於鐵路權之四分五裂的情形，有如下表：

| 國別 | 自由經營享有建築權者 | | | | | |
|---|---|---|---|---|---|---|
| | | | 單獨 | | 共同 | |
| | 哩數 | 投資額 | 哩數 | 借款額 | 哩數 | 借款額 |
| 英 | 三 | 五〇〇 | 二•八七四 | 二六•七〇〇 | 二•六四六 | 一七•六〇〇 |
| 俄 | 一•〇七七 | 六六二•〇〇〇 | 一•〇七七 | 六六二•〇〇〇 | — | — |
| 法 | 三四六 | 七•〇四〇 | 三四六 | 七•〇四〇 | — | — |
| 俄法比 | — | — | 三〇•七一〇 | 四七〇•二四〇 | — | — |
| 德 | 二八六 | 三•〇〇〇 | 一•二四七 | 八•[illegible]四〇 | 一[illegible]•〇〇〇 | 六•〇〇〇 |
| 日本 | 六九五 | 二二•四〇〇 | 一•九五二 | 一四•六[illegible]七 | — | — |
| 總計 | 二•四二六 | 八九•一四〇 | 二一•二〇六 | 一六九•八五七 | 三•〇二五 | 二三七•〇〇〇 |

并且，當時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鐵道的投資，好似發狂一般的踴躍，如幾個主要的鐵路，可以說完全在帝國主義的手中，其投資的總額，如下：

| 名稱 | 所屬國 | 距離 | 借款額（鎊） | 備考 |
|---|---|---|---|---|
| 津浦 | 英德 | 六八六 | 八・〇〇〇・〇〇〇 | |
| 川粵漢 | 英美德法 | 一・二〇〇 | 六・〇〇〇・〇〇〇 | |
| 廣九 | 英 | 八九 | 一・五〇〇・〇〇〇 | 本線有三二哩通過英租界九龍歸英經營 |
| 滬杭 | 英 | 二〇五 | 一・五〇〇・〇〇〇 | 雖爲我國所有仍受借款條約支配 |
| 京漢 | 日英法 | 八二七 | 五・〇〇〇・〇〇〇 | 本線本爲比國代造後以借款關係歸於三國 |
| 吉長 | 日本 | 七九 | 二一・五〇〇 | 日本繼承俄國之權利 |
| 新奉 | 日本 | 三七 | 三二・〇〇〇 | 初爲借日款建築後由京奉路借款償還 |
| 合計 | | 三〇二三 | 二二・〇四五・五〇〇 | |

然而滿淸政府對於鐵路的管理，却是漠不關心，於光緒三十二年始正式成立郵傳部，以前關於鐵路一切行政，概歸商部通藝司管理；當郵傳部接管由商部移交鐵路宗卷的時候，據現在南京政府鐵道

部長——孫科在青年會的報告，「舊卷僅十六宗，新卷一百零二宗」，其工作之簡單，眞是令人難於想像。

有一位俄國的著作家——卡多洛維赤，他寫了一本外資與中國鐵道的作品，在這一本東西裏面，我們看出外資在中國鐵路事業中的實際權威：

「第一，外國資本家根據鐵道的條約，獲得巨大的利潤。這些利潤主要的來路，就是中國實收借款數較名義借款額爲少，——通常如借一百元，實收僅九十元，利息不按九十元計算，却按一百元計算，并且每年利息還有担保。此外建築鐵道的資本團，取得代購建築鐵道的一切材料權，這樣一來，則借款的銀行不僅獲得利益，并且又在購買材料中又賺錢不少。我們知道，銀行團與外國工廠發生聯繫訂購商品時，雖然商品價格須取得中國監督官之同意，但銀行家照例稍爲賄賂中國官吏後，於是價格便可遠超過於歐洲買入的實價以上了。」

「第二，鐵路實際上落在外國人的手裏，然而中政府經常委任督辦職員，但實際管理者不是那些督辦，而是外國工程師。一般的重要職員如會計及管理工程師等等，均屬於外人；及技術上之人員亦多數屬於外人。最後，更特別的就是當政府不付給利息的時候，鐵路就爲建築人所有了。這就是說，若是在中國政府無力償付利息的時候，就拿這條鐵路的財產來抵帳。僅僅是到後來，中國政府才變動

付息的方法，用一定的國家的收入（普通用關稅的收入，因是關稅便歸外人管理了）來担保。中國政府之所以如此的企圖，原因就是準備遇着不能按時付息的時候，鐵路不會變爲建築公司的私有財產。……」（見中國革命運動史二〇三——四頁）

很顯然的，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鐵道事業所採取的毒辣的手段與狡猾的政策，可算是無所不用其極，他認爲在中國的統治可以長治久安；彷彿中國從此就衰弱下去，和果實一樣的自然凋謝了！然而事與願違，中國不但沒有如他們那樣的想像簡單，并且從此以後，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又發生了一種最前進的新的力量。

關於這種情形，拉狄克說得很對，他說：

「當歐洲資本家建築了鐵路的時候，他們并沒有念及這將要造成中國工業發展的動力。他們只是那樣想；「我們建築了許多鐵路在中國，我們將要藉鐵路來售西歐的工業品，而從中國我們將要搾取許多鄉村經濟的出產品。」若是我們讀到當時帝國主義的大煽動的文字，那麽，就可以隨時遇到這種議論。嘗如當機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向德國工人們宣傳不要反對資本主義侵略殖民地的企圖的時候，他們說德國的人民在六千萬以上——而德國的鄉村經濟不能供養這些人民；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德國工人向中國輸入工業品而同時藉此利用中國鄉村經濟的生產品，或者是德國輸出人口移殖到外國

去。」

「他們幷沒有計算到中國將因此自己的工業得到了發展幷且將造成近代的階級，下了革命的種籽，而這個革命運動的參加者，不但是飢餓而無領導的農民羣衆，同時却種下了領導農民的工人階級了。」（同上書二〇八頁）

綜之，交通的開拓與鐵道的發展，對於中國產業的向前推進，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然而在什麼條件之下帝國主義推進中國的工業，在什麼條件之下，牠又故意的妨害中國工業的發展？爲什麼自十八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忽然停滯起來而止步不前——不能進到工業革命的階段？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明確的解答。

## 第三節　帝國主義的刺激與中國產業革命的萌芽

帝國主義在中國既然不斷的開拓了交通利器，又復激劇的改良生產工具，不成問題的，牠這種行動在主觀上幷不是爲中國作想，恰恰相反，牠是爲在中國搾取更豐厚的利潤。基於此種條件，爲要發展牠的資本起見，不得不在開始建築鐵道的時候，注意於重工業的建立；帝國主義建立重工業，他必須於鐵道線附近去尋覓各種礦坑，因此，關於中國自然礦藏便成爲帝國主義猛烈以求的標的。其實，

帝國主義者未免過分的誇大了中國礦藏的富源，根據他們的估計，中國的煤鐵可以供給全世界之用，而尤以鐵的出產更多，同時，有一部份人又估計中國的煤有德國百分之七十九，英國百分之三十三，美國百分之二十五，但是這種估計是不甚可靠。因爲礦脈散處各省，如果不以科學方法去調查和試驗，而僅憑少數人頭腦的測斷，其無重大的意義已顯然可見，同樣的，說中國再經三百年以後就會沒有煤的供給，也是屬於無稽之談！

其主要的鑛藏——特別是煤礦的開發，在帝國主義直接及指導經營之下，其發展有如下表：

| 國別 | 所在地 | 煤礦名稱 |
| --- | --- | --- |
| 中英 | 直隸 | 開灤礦務局 |
| 日本 | 奉天 | 撫順煤田 |
| 中日 | 奉天 | 本溪湖煤鐵公司 |
| 中日 | 山東 | 淄川煤田（魯大） |
| 中英 | 河南 | 焦作煤田（福公司） |

據一些比較確切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中國煤的產量，在一千九百年僅爲六百萬噸，迨至一九一

一年，他的生產額已增至一千三百萬噸，於短促的十年中，其生產額竟增加了一倍，其前途之方興未艾，眞是鼓勵我們革命青年對於中國產業前途之樂觀。

除掉了重工業以外，關於輕工業——紡織工業（卽纖維工業）之經營，帝國主義者亦復不遺餘力；僅就日本在華經營的紡織業，其發展之突飛猛進，已經令人可驚了。如下表所列，便是一個顯明的例：

| 年次 | 工場數 | 錠數 | 紡織機數 |
|---|---|---|---|
| 一八九五年 | 一 | 二〇・三九二 | 三七六 |
| 一九〇〇年 | 二 | 四五・八七二 | 八八六 |
| 一九一一年 | 四 | 七八・三六六 | 八八六 |

在這很簡單的表裏面，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帝國主義在中國關於輕工業——紡織工業的發展，是每十年增加一次；此種惹人注目的數目字，實在是刺激了中國未來的資產階級，故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客觀上便種下了殖民地資產階級的種籽，這個殖民地資產階級的胎兒，於他的歷史過程中而呱呱墮地了。

我們追溯中國產業革命之經過，不能不首先涉及中國的軍用工業。中國軍用工業的興起，完全是針對着客觀環境的需要，自鴉片戰爭以來，滿清政府的處境，不僅是內患頻仍，并且又是外侮迭至；如中日戰爭，義和團事變，可算是每一次都是喪師失地，辱國求和。當然，人非木石，對於此景此情，不無感嘆，而滿清政府受羣衆的鞭撻與帝國主義的欺侮，不禁發憤圖強；在最初，滿清政府及其臣僚們，認爲帝國主義之所以強橫的由來，無非是依據於兵精砲銳，然而，這些都是中國可以辦到的事情，而沒有什麼特殊的困難。故大規模的設廠製造軍用工業，另一方面爲養成軍事工業專門人材起見，更派遣了大批的青年學生去到其他先進國家實習，企圖以這種方式來自強中國，可惜，不幸得很，這願望是不能實現的。

至於滿清政府爲什麼不能實現這個目的呢？并不是由於他主觀上的怠工，而是帝國主義者對他有許多的障礙，其主要點如技術人員及軍用工業的機械，都仰給於帝國主義；當然，歐洲的資產階級也不會這樣的蠢，將自己的秘密的精良的軍用機器賣給中國，而使中國人用以反對他。故而中國所購來的機器都是不適合於近代的新的需要的東西，因此更談不上什麼成績。甚之同時在另一方面，從事於此種事業的經營的人們，可以說是分百之九十五是那些落後的腐敗的官僚，他們固然是缺乏新的機械管理的常識，而搜刮和中飽的本領，則是異常的高明，因爲這些官僚們都認此種事業爲優差美缺也。

經驗教訓了他們，那黃毛碧眼的「洋鬼子」之所以強盛，除了兵精械利而外，關於工商業的重視與發展，的確是他們強盛的基礎，滿清政府及其進步的臣僚們，基於此種認識，故對於發憤圖強的途徑，不得不有所改變；因此，我們從下列的一些事實中間，可以充分的看出了當時經濟變動的遺跡：

「(1)一八八二年，李鴻章奏請在上海試辦機器織布局。

(2)一八八三年，上海商人祝大椿於上海設立金源五金機器廠(資本金十萬元)。

(3)一八八六年，張之洞於廣東發起創辦繅絲局。

(4)一八八七年，張之洞奏請於廣東設立機鑄制錢局及銀元局。

(5)一八八七年，李鴻章於天津機製局購機鑄制錢，定名「寶津局」又於保定設廠。

(6)一八八八年，貴州省鎮遠府青谿縣設立官商合辦之製鐵廠。

(7)一八八九年，張之洞在廣東奏設織布局及製鐵廠，向英國定購熔鑛爐二具。

(8)一八九〇年，上海設立官商合辦之上海紡織新局(即現在之恆豐紗廠新局)。

又張之洞將前年在廣東所訂購之織布機械及鎔鑛爐，移調武漢，設漢陽鐵政局(即今之漢陽鐵廠)。

又於漢陽設立槍砲廠(即今之兵工廠)。

（9）一八九一年，上海道台唐松岩於上海設立官民合辦之紡紗局。

（10）一八九三年，張之洞於武昌設立織布紡紗製蔴繅絲四局，後改名湖北織布官局（今由楚興公司租辦）。

李鴻章發起建設之上海機器洋布局，於前年竣工時被毀於火。

（11）一八九四年，盛宣懷由李鴻章奏派募集民間股本，重辦洋布局，因股少改設華盛紗廠（即今之三新紡織廠）。』（以上見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第六十一——六十二頁）

但是，上面所列舉各點，不過是僅指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而言，自此以後，中國產業的發展更是一日千里。現在我們祇就幾樁重要的產業來說吧：第一，於一八九八年所完成的萍鄉煤礦鐵路，這是由中國的資本家所完成的事業。其他如廣東人民以四千萬元買回在美國手裏的粵漢鐵路預備線的權利，幷且於一九一〇年完成了廣東境內一百英里的鐵道線。第二，在紡織業方面，中國又有長足的進展；如一九〇五年在上海所設立的振華紗廠，在無錫所辦的振新紗廠，在常熟的裕泰紗廠，在寧波的和豐紗廠等等；一九〇七年更設有濟泰（太倉崇明），大生第二（南通），九成（上海）等廠；而一九〇八年復有利用（江陰），同昌等紗廠的創設。第三，其他的一般工業均有極猛烈的萌芽與發展。第四，中國政府這時候也轉變了施政方針，即是說對於中國本國的工商業有所獎勵；『設立商部，訂定商

律，殖佈公司註册章程，發表奬給商勳章程，新器製造奬勵章程，工商科進士稱號章程，考驗遊學章程，華商辦理實業爵賞章程等等。……又於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設立商品陳列所，於天津設立工藝總局，工業學堂，考工廠，實習工廠；於北京設立高等實業學堂，於工藝局附屬工廠設置十二科，其後，宣統二年，又於南京開過南洋勸業博覽會。」（同上書七二頁）

我們如果將這些所有的事實羅列起來，那麼，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便無待我們再去說明了。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眞是出於帝國主義者意料之外，牠——帝國主義者以爲強姦這個處女（中國）是沒有什麼問題，不知竟因此而惹下了滔天大禍，卽是說這個處女（中國）自牠強姦以後，忽然珠胎暗結，不久便誕生了孿生的胎兒；這兩個胎兒說也奇怪，他們不但不報答報他父親的所謂恩典，甚之，還要與他父親算一算強姦母親的舊賬。不過這兩位胎兒雖然是情同手足，然而其仇恨亦復不共戴天，在某些地方特別表現得明顯，如在共同聲討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中，那位從右邊來的大阿哥便首先變節，他爲保持自己的利益，可以犧牲了民族的仇恨，幷甘心受帝國主義的豢養而摧殘自己的弟兄；當然，站在左邊的小弟弟，他以解放全世界人類爲他奮鬬的目標，故而，歷史已經替安排好了未來的王位。

我們很冷靜的去分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生活的作用，那麼，他在最初期是有推進中國產業的

實義，誰否認了這一點，他們就不會懂得歷史發展之辯證的範疇。極乎明顯的，他的推進的作用，是在於將中國與世界之疎遠的關係聯系起來，而使國際與中國更趨於密切，如組織中國的鐵道，使國際與中國的關係由天涯變作比鄰，而造成世界經濟與中國國民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外國的資本來開發中國，使中國鄉村過剩的勞動力與工業生產結合起來，這種工業生產就造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也就是破壞了鄉村中舊式經濟的基礎。

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的作用，就在於此。

但是，另一方面，一種新的剝削民衆的方式，亦隨之而產生，他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他把愛情的面帕扯碎，什麼俠義的熱忱，兒女的深情，在這社會內面，的確是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他那種無廉恥的，赤裸裸的，極殘酷的剝削，使人民的生活格外痛苦，也可以說除了革命以外實是無路可走！

此種威脅，對於帝國主義者有很深刻的影響，他感覺得如果再不遏制中國經濟的發展，那麼，不但是列強在華的利益不能保障，如一切的特權將因中國經濟發展而動搖，失掉了控制中國的作用；並且，如果殖民地的經濟離開了帝國主義的束縛，其影響所及，勢必更加促使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而猛烈的震撼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此種條件之下，實在是再也不願意發展中國的經濟

了，他障礙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式，首先便是停止貸款，如果不能澈底的保證他的利益的話，那麼，對於中國的工業他是拒絕投資；另一方面，他又緊緊的握住中國工業發展的喉嚨——關稅權。現在任何一個商人，他都明白關稅自主是中國工商業的命脈所繫，因爲非此是不能促進中國的發展，那值百抽五的稅則之客觀的意義便是幫助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反之，中國如再不採取保護稅則的制度，則中國的工商業也是永遠的不能跳出帝國主義者掌握之中！

我們綜括起來說，帝國主義者他在某些地方是推動了中國某一部門產業之向前發展，然而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之下，他又故意的障礙了某一部門產業之發展，就現在的情勢而論，帝國主義是障礙了中國整個的國民經濟，妨害了中國全民族的利益，甚之，對於中國經濟他還起了一些解體的作用；嚴格的說起來，帝國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之唯一的正面的敵人！

至於中國經濟發展史的回溯，他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早熟，遠在耶穌紀元以前，中國已經有很完整的商業資本的存在，其文化所被，眞是馭四夷而服萬國；然而爲什麼自十八世紀以來，他的進展忽然停滯而不能過渡到產業革命的階段呢？關於此點，爲歷來的中西洋學者爭執得異常劇烈，其實，這些爭執都是沒有找着問題的中心。譬如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韋伯爾與俄國的赤色教授瓦耳加他們都認爲中國經濟之所以不發展之癥結，完全由於中國沒有自然科學的發展，但是，他倆不了解資本主義

發展之全部形態，如某些地方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然後方有自然科學的需要，方有自然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有一部份人們的意見，認爲中國之所以沒有資本主義，原因由於中國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去強迫農民到工廠裏去作工，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資本主義並不是中央集權的結果，而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必須建築於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啊！

最奇怪的，莫過於朱新繁先生，他在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中，關於中國產業落後的原因的分析，盡量的發揮了一些東方式的不知所云和莫明其妙的觀點。我們爲表現他的具體觀念起見，特摘引其原文如下：

「……爲什麼這樣一個地廣人衆，物產豐富的中國，產業反而落後？——當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到登峯造極的時候，地大物博的中國，經濟的發展還很落後而停滯在封建的農業經濟的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最先需要經過「原始的蓄積」這一個階段。原始蓄積是創造下面兩個必要條件的過程；第一，需要大量資本的存在；第二，需要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而且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勞動階級的存在。……中國雖然地大物博，可是這兩個條件都是缺乏。第一，中國雖然地大物博，可是沒有集中的大量資本。」

「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是以小農經濟爲其基礎。小農經濟的特質，是自給自足，沒有大量財富

的剩餘。在農業社會裏，土地就是唯一的財富，所以即是最大的富翁，也不過因爲他的土地多——幾千年來的習慣，以土地的多寡，爲計算財富的標準。在西歐資本主義勢力沒有侵入中國以前，在小農經濟的範疇之下，要集中大量的資本，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中國產業落後的第一個原因。」

「因爲地大物博，所以能夠自足自給；因爲能夠自足自給，所以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產業之落後，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誰都知道中國歷史上是重農輕商的。例如……像這一類的重農的話，眞是不勝枚舉。實際上幾千年來的習慣，都是重農輕商；這個觀念一直到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後，才逐漸改變。至於所以重農輕商的原因，是因爲中國物產豐富，在一個地方，往往有具備各種的產物。農民就本地可以得到生活的必要品，毋待商人的販賣。幾千年來重農輕商的結果，使一般的觀念，都集中在土地，而忽略了經營，所以大量的資本，更難集中——這就是中國沒有大量資本集中的最大的原因。」

「至於關於第二個條件，中國也是缺乏的。中國人口雖然很多，可是因中國物產豐富，農民都能夠自足自給，沒有到都市去出賣勞動力的必要——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階級，都是受了生活的驅使，才集中於都市，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如果不受生活的驅迫，換句話說，如果非有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事實存在，決沒有近代勞動階級的存在。中國感受到失業問題的壓迫，感覺非出賣勞動

力不能生存的人數太多的困難，還是近年的事——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的事。在資本主義勢力沒有侵入以前，農民都可以自足自給，沒有這些現象發生的。中國之產業所以落後其原因就是如此！」（見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第五十七——六十三頁）

然而，朱新繁之不可原恕的錯誤也「就是如此」！

第一，朱新繁及其門徒他們主要的錯誤就是在於沒有研究中國全部歷史發展的過程，故而鬧出許多的笑話：一則說「經濟的發展還很落後而停滯在封建的農業經濟的階段」，再則說「中國雖然地大物博，可是沒有集中的大量資本」。並且，他還舉出了許多歷史上似是而非的什麼重農的論調，為要保證他的虛僞的已經破產的理論起見，他便捏造了許多的事實去切合自己的觀點；如他說：「中國物產豐富，在一個地方，往往具備有各種的產物，農民就本地可以得到生活的必須品，毋待商人的販賣。」這簡直是當面說謊！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很久以前已經離開了封建經濟的領域，這是歷史上的事實，毋待我們在此地重複中述，就是和帝國主義接觸的初期，那中外貿易的水準，還是中國站在有利的地位，我們看下面的一些數目字，便可以答覆朱新繁們的胡說：

| 年份 | 輸入總額（海關兩） | 輸出總額（海關兩） | 貿易總額（海關兩） | 入超或出超（海關兩） |
|---|---|---|---|---|

| | | | | | |
|---|---|---|---|---|---|
| 一八七二 | 六七·三一七·〇四九 | 七五·二八八·一二九 | 一四二·六〇五·一七四 | 出超 | 七·九七一·〇七六 |
| 一八七三 | 六六·三三七·二〇九 | 六九·四五一·二七七 | 一三六·〇八八·四八六 | 出超 | 二·八一四·〇六八 |
| 一八七四 | 六四·三六〇·八六四 | 六六·七一二·八六八 | 一三一·〇七三·七三二 | 出超 | 二·三五二·〇〇四 |
| 一八七五 | 六七·八〇三·二四七 | 六八·九一二·九二九 | 一三六·七一六·一七六 | 出超 | 一·一〇九·六八二 |
| 一八七六 | 七〇·二六九·五七四 | 八〇·八五〇·五一二 | 一五一·一二〇·〇八六 | 出超 | 一〇·五八〇·九三八 |

（註）此表係根據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歷年輸出入貿易價值統計表改製的。

問題的解答，很顯然的是側重在中國爲什麼不能發明蒸汽機？嚴格的說起來，自蒸汽機的發明，才有科學的產業革命。蒸汽機的發明，決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決不是依賴於某一位天才的聰明頭腦，而是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的產物；英國之所以能夠首先發明蒸汽機的，他是具備了這些特定的歷史條件，走出了手工工廠的領域，而闖進產業革命的王國。第一，地理的原因，英國是個近海洋的國家，他是依靠海上商業及搶掠殖民地爲生的，他爲的適應客觀的需要，主要的是征服自然（指海面）的困難。第二，殖民地的掠取，當英國手工工業發展到極盛的時候，他已經深入和統治了東印度。

反之，當中國在蒙古民族（即元朝）統治的時候，那時可算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全盛時期，當時中

國的商人足跡遍於太平洋波斯灣及裏海各地，但是自元朝統治被農民暴動推翻以後，牟罕穆德之佔領印度和波斯，而亞細亞的市場亦從此瓦解，中國的商業資本於此僅限於一隅，不復在全亞洲大陸上表現其作用了。同時，關於海外通商，亦復是異常困難，那廣大無邊的太平洋，中國人因缺乏冒險的精神，不敢冒波濤之險而一睹彼岸之究竟，於是乎中國的商業資本祇有沿河流一帶尋找其出路。自此以後，中國的商業大部份是限於國內的供給，而與世界市場的關係，在某種形式之下，亦復蕭疎起來了！我們歸納起來說，自十八紀以來，中國的商業資本之範圍太狹，同時又沒有殖民地的獲得，另一方面，在他停頓的時期，國際資本主義已經抬頭了，他一抬頭即克服了中國。

關於此種具體的理論鬥爭，我們很希望未來的事變能夠將牠的陣容展開，要每個中國的革命青年都來參加論戰，以便從政治思想上肅清一切反動的雲霧！

## 第四節　官僚資本及舊式工業的蛻化與民族工業之形成

根據上面所列舉的統計，我們可以確信中國產業在帝國主義推動之下，已經是迅速的萌芽與猛烈的發展了。至於這種發展的過程與趨勢若何？亦復成爲現在社會人們爭論的焦點；當然，一種含有嚴重的政治意義的論戰，我們爲忠於中國革命起見，勢難緘默不言！因此，關於此種經濟發展的形態與

前途——即是說由工業革命的萌芽到殖民地式工業革命之完成；其中間所經歷的過程與夫所發生的現象，仍然需要我們再作一個比較簡明的說明。

第一，當中國經濟過渡到近代的殖民地式的工業革命的時候，官僚資本曾參與其間；最明顯的，莫過於官督民業的時代，那些進步的聰明的官僚，他們爲模倣和排斥帝國主義經濟起見，曾不惜麼次擲腰以興辦中國的工業。『銅山東崩，洛鐘西應！』一班富裕的商人，看見那些有名的官僚也從事於中國的工業，因此，他們也和狗搶骨頭一樣的參加於中國工業的振新。同時，那介於外國資本家和中國商人中間的掮客——買辦，他懂得許多工業上的秘密，這時候也想嘗一嘗殖民地式產業革命之果的滋味。在此種綜錯複雜的條件之下，他們彼此竟互相結合起來而對於中國經濟的前途便有所企圖了；當然，他們的願望完全是以獲得利潤爲目的，彷彿和俗說『見錢眼開』的一樣，那裏談得上顧全中國整個民族的利益呢？

我們且舉幾個官僚資本家的代表來說吧：例如盛宣懷和後起的梁士詒，他們在最初對於中國幾個工業的發展，很客觀的說，是不無微勞；然而其罪惡却又掩蓋了他的勞績，因爲他們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賄買，早已把民族的利益置諸腦後了。他們不僅與帝國主義『眉目傳情』而暗通聲氣的出賣了中國民族的利益，甚之，還更無恥的赤裸裸的倒在帝國主義的懷裏任全世界資產階級們『真夠銷魂』！

歷史的進行，牠決不是毫無意義的過去，牠將留許多的影響與人們。此種影響之表示於社會生活中間的，在南中國以及資本主義比較發展的地方，使豪紳地主的本質都變更了；許多許多的地主豪紳，他們爲賺錢的動機所驅使，往往賣掉了自己土地一部份，將所得來的代價轉投於工業方面，不是與人家合股開廠，便是自己經營輕便的工業而使自己蛻變成爲工業資產階級。

這種現象，在過去幾幾乎爲人們所忽視，其實，就中國整個經濟發展的內容而論，他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中的中軸；自一九二七年以來，著者曾在中國經濟中心區——江浙兩省沿鐵路一帶從事於此項工作的調查，根據調查所得，現在有很多的工業資本家都是豪紳地主的出身。由地主豪紳蛻變而爲工業資本家的事實，在其他先進國家可算是罕見的事情，然而在中國却甚普遍，這一點可稱爲東方式的殖民地的經濟上的特殊點吧！

第二，由於舊式的手工工業蛻化而成爲民族工業的，在中國亦復是異常普遍的現象；這些大批的手工業者，他的數目因爲無精確的統計，我們固不得而知，不過就過去的遺跡和現在的殘留來觀察，那麼，其變遷的痕跡便明白的顯示出來：任憑那些倔強的人們怎樣的歌頌中國的手工業的繁榮，與夫過分的形容中國手工業的特點，可是這些都不能掩蓋着牠的衰頹與蛻化的事實。很顯然的，自帝國主義機器輸入以來，中國過去的手工業，便遭受了一個空前的厄運；牠不僅是摧殘了小的家庭工業，如

那種小的手播的紡織機的沒落，以及其他許多工業之同此命運，便是那些規模粗具的手工作坊，亦復是打得夠落花流水！此種情形，反映於一般社會生活中間的，首先是那些小手工工廠及作坊的主人，他們爲要維持自己的命運與發展其前途起見，在生產組織方面不得不有所改變以趨向改良產業的道路；姑無論此種改變生產組織的動機是否出於主觀上的自願，然而非此則不能切合於客觀的需要。幷且處在這種特殊的產業革命交流的過程中，稍一不慎，那經濟變動的浪濤，會使他們淹沒而遭遇破產和倒閉的危險！

其次，便是舊式工業組織的潰敗，那種帶着很濃厚的中世紀的形態的徒弟制度，不但是不能增加這些舊式工業的生產量，反之，因過分的勞動和沒有勞動代價的結果，使這些佈滿全國的青年勞動者——徒弟，在生活上和思想上起了很大的變化。第一，他們那種定期的徒刑式的生活，是不願意繼續忍受下去，但是因爲條約的束縛使他不能自由行動，於是乎便採取一種消極的反抗——怠工。第二，有許多的新式工業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這些近代式的產業之在中國是需大批的工錢勞動者，經營近代企業的人們，有許多是從歐洲的資產階級那裏學會了新式的科學的工廠管理方法，工銀的水準是超出於手工工廠之上，同時，設備亦比較舊式工廠爲優；因此，有許多的舊式的工錢勞動者和破產失業的事業，在這些條件誘惑之下，紛紛的離開了那舊式工業的領域，而促成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總之，中國的民族工業，牠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他是受到各種因素所影響的產物，而官僚資本及舊式工業的蛻變，與牠的形成和發展實有深切的聯繫！

在地主官僚們的意思，以爲搖身一變蛻化而爲資產階級，可以獲得更豐厚的利潤，當然是心滿意足，彷彿和羽化而登仙的一般。但是，事情絕對不會這樣的安靜和樂觀，他們在躊躇滿志之餘，其對面已經站着了一大羣的敵人——饑寒交迫的奴隸！

## 第五節　銀行資本

隨着工業資本發展而發展的銀行資本，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牠已經在社會生活中起了作用。我們如果檢查銀行資本在中國發展的史蹟，那麼，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牠已與中國的民族工業聯繫起來，并且還站在支配的地位。中國在二十世紀以前，向無所謂銀行，關於金融市場的調劑，完全依賴於舊式的『錢莊』或者是『銀號』；這些『錢莊』與『銀號』他們雖然是發行了什麼兌現的紙幣和鈔票，然而各省的情形不一，手續亦甚麻煩。故於中國資產階級開始形成的時期——一九〇五年（即光緒三十年），滿清政府的戶部，曾奏請試辦『戶部銀行』，以爲處理中國金融市場紊亂的樞紐；當時戶部曾擬定試辦銀行章程三十二條，其主要的內容，即在於說明推行幣制及統一全國的貨

幣，遂可以說是中國銀行的起源。

逮至一九〇九年（即光緒三十四年），滿清政府變更了行政的系統，將戶部改爲度支部；而戶部銀行亦因此改爲「大清銀行」。當時滿清政府對於大清銀行的性質復加以明白的確定：認爲牠即是中央銀行，牠有通用國幣，發行紙幣，管理官款出入，担任緊要公債之特權。同時關於大清銀行之資本方面，更加以大量的補充，除原有之戶部銀行四百萬資本而外，又重新再添六百萬兩的股本，合成資本總額一千萬兩（等於現在一千五百萬元——農註）。國股於一九〇九年底繳齊，而商股遲至宣統二年始全數繳定；故爾關於股東方面，該行有新股與舊股之分，自此大規模的中央銀行建立以後，而各省的分行，亦如雨後春筍似的先後設立。

當時這個大清銀行的營業是異常的發達，僅就新舊股東所分的紅利而論，往往超出於官息數倍以上，而股票市場的價格，因此亦增至一倍有奇。

銀行事業的發展，給東南幼稚的資產階級以極強烈的暗示，故於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以盛宣懷爲代表，用郵傳部奏請的方式，要求設立「交通銀行」。從這一個銀行的計劃與目的當中，我們可以很顯明的看出來牠染遍了東南幼稚資產階級的色彩；他的計劃是用中國資本來經營輪船，鐵路，電報，郵政的事業，幷且還企圖管理上述四局的存款。在他的奏定章程三十八條中，屢次的說明這是商業銀行

的性質，至於銀行基金則規定爲一千五百萬元，政府方面担任百分之四十，其餘的百分之六十則歸商人分担。這個銀行還有一種特別的營業，在他的奏章第五條內，明白的規定出於京漢路贖路時，總司一切存款匯款以及支付佛郎馬克等事。交通銀行雖然是採取商業銀行的辦法，但其實質實兼國家銀行與殖邊銀行而有之，誠然，顧名思義，我們便不難了解牠的內容了。

有一位近代的俄國著作家，他關於交通銀行曾有如下的描寫：『……這個銀行還在清時所創設的。其創辦的原因，爲中國資產階級反對國際帝國主義所採取的建設鐵道計劃而起，其動機尤在徵集債款以便贖取爲比利時與法國的資本家及俄國的官僚們所佔據的京漢鐵路。中國爲抵制帝國主義之喧賓奪主統治中國的鐵道起見，特創立一財政機關，其任務爲便於管理鐵路，郵政，電報，航業等等的財政事宜。銀行基本金規定一千萬兩，即一千五百萬元。……一部份資本屬於政府，其他一部份則屬於中國資產階級。……』

『近年以來，交通銀行經受許多變更，其目的在使銀行接近市場，擴大營業，超出與中國交通事業密切相關的範圍以外。現時此銀行之十分之七的股款落入中國資產階級的手中，屬於政府的不過十分之三而已！』（見李麥麥編中國經濟第一八二——八三頁）

與交通銀行同時發展的，還有兩個銀行：即上海的『四明銀行』和『浙江興業銀行』。根據民國

十六年和十七年的報告，這兩個銀行資本的總額，竟達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於此可見自一九〇〇年以來中國銀行事業發展的一斑了！

此外，中國還有許多的地方銀行，其活動的範圍雖僅限於一省，而與省銀行無異，然而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實屬是勢不可侮！茲將一九〇〇年以後至一九一一年之各省地方銀行及其資本總額，製如下表：

| 省別 | 銀行名稱 | 創設時間 | 資本額 | 附考 |
|---|---|---|---|---|
| 廣東 | 廣東官銀錢局 | 一九〇四年 | — | — |
| 奉天 | 奉天官銀號 | 一九〇五年 | 六百萬兩 | 地方政府所經營 |
| 熱河 | 熱河官銀號 | 一九〇六年 | — | |
| 黑龍江 | 黑龍江官銀局 | 一九〇六年 | — | 由地方政府經營 |
| 廣西 | 貴州官錢局 | 一九〇八年 | 四百萬兩 | — |
| 湖北 | 鄂省官銀錢局 | 一九〇八年 | 八萬兩 | 專用官票以補制錢之不足 |
| 河南 | 豫泉官銀錢局 | 一九〇八年 | 十一萬兩 | — |

| 吉林 | 吉林官銀錢號 | 一九〇九年 | — | 由官帖局與官錢局合併改組而成 |
|---|---|---|---|---|
| 浙江 | 浙江銀行 | 一九〇九年 | 五十萬二千兩 | 官股三十萬商股二十萬二千兩 |
| 直隸 | 直隸省銀行 | 一九一〇年 | 一百零二萬四千七百元 | 係由天津官銀號改組 |
| 福建 | 福建銀行 | 一九一一年 | — | 由福建銀號所改組 |
| 四川 | 四川銀行 | 一九一一年 | — | 僅以二百元為開辦費并無基金 |

（註）此表係根據於中國近代發展史二〇五——八頁改製的。

我們根據上面所列論的事實和統計，關於中國的銀行資本遠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他已經形成和發展，并且還在着支配中國的工業資本了，這並不是什麼理論上的爭執，而是事實的表現。然而那大名鼎鼎的李達先生，他在說明中國『銀行資本之形成』的時候，却將事實的面目模糊了！他說：『所以國內分散的資本，不能向着工業所要的大企業方面投資，而只能用來做小規模的地方的商業投資，或者吸收地方的官僚資本做投機事業，買賣政府公債等等，總不外於商業的性質！』（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第一百六十頁）

很顯然的，這是李達先生的胡說。我們看上面的交通銀行的發展以及對於幾個主要的產業的投

資，便可正面的答覆了李達先生。同樣的，他認爲銀行之買賣政府的公債，也是「商業(？)的性質」，我們如果依照這個理論推論下去，那麽，帝國主義者之銀行托辣斯的買賣公債的投機，也就是所謂「商業的性質」了!?在另一方面，他又錯誤重演，以爲「新式銀行資本，是適應着近代的都市生活的需要才發生的，但不能週轉於全國的大市場……」(同上書一七五頁)。全國的幾個重要市場，當然是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銀行資本果眞不能在這幾個「全國的大市場」「週轉」嗎？爲什麽原因呢？我想一定是銀行資本的觸矢遇着了像李達先生這樣的一塊有力的盾牌了。

這些爭論，我想從此暫爲結束，反正未來的事變的發展，牠會替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現在，迫在目前的任務，便是需要我們繼續的去說明殖民地式產業革命之對於農村經濟影響如何？

## 第六節　殖民地產業革命與農村經濟

本來在世界上論何一個先進的國家，他本身經過了產業革命以後，那麽首要的任務便是解放農民和廢除農村經濟中的封建剝削；因爲這種行動幷不是與資產階級的利益衝突，幷且，恰恰相反，完全是適合於資產階級的利益。全世界資產階級解放農民的目的，爲的是獲得他的商品購買者的增加，換句話說，他們要從地主手裏去奪取農民的血汗，甚之，要全部的奪過來；例如在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

級對於農民的解放，產業革命後的英國對於農民生活的改良，這些都是充分的表現出產資階級對於農民之改良的影響。

但是，我們再囘過頭來看一看中國的情形怎樣？

第一，中國的產業革命與歐洲的產業革命有很嚴重的區別，和歐洲的產業革命甚之有根本的不同。歐洲——特別是英國，他的產業革命的趨勢是一種內在的自發的過程，而中國則反是，中國的產業革命是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形成的。其最顯明的鴻溝：一個是壓迫人的擁有殖民地的國家，一個是被壓迫的殖民地的的國家。故中國殖民地的產業革命的特點，他幷不是完全由於手工作坊——卽手工業的進化而改變，說得確切些，他幷不是由蒸汽機的發明所致，而是爲蒸汽機征服的結果。他的特點主要的由於一部份進步的官僚和商業資產階級的蛻變，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們把那大批的積蓄的資本移殖一部份投之於工業，此種投資的動機，一方面固然爲的是反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獲取更豐厚的利潤却是主要的原因。

此種殖民地資產階級的特質，因爲他的形成及其發展之紆迴曲折的關係，我們不能用某種術語來描寫，祇好舉一個通俗的例來形容牠：中國資產階級彷彿和一個生理不健全的人一樣，他雖然達到成人的年齡，可是從表面上看去，仍如十二三歲的小孩，幷且身材短小，發音很低，面黃肌瘦，萎靡不

振，而各部器官亦復發育不全：不是耳聾，便是眼花，我們關於這種『小老人』的原因如果引用皇漢醫學上的名辭來說：便是『先天不足』！

我想，這個關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譬語，如果以冷靜的客觀的頭腦去思索，大概不致於失當罷！

第二，殖民地式的資產階級與地主的關係如何？這也是對於中國經濟性質爭論的一點。事實的教訓是，在很久以前，中國的地主已經與商業資產階級以及官僚結成了『三角戀愛』式的不解之緣了；歷史告訴我們說：中國的商人，他們往往用一部份的資本投之於土地方面，幷在鄉間建築起很精緻的別館，以便於農業收穫時期或者是嚴寒酷暑的時候，來此休憩，幷可以獲得佃農們許多恭維的名辭——『老爺』『太爺』的頭銜。至於地主之投資於商業，那更是數見不鮮的事情，以地主的尊嚴爲什麼而要冒『市儈』的惡名而不躊躇呢？打開牕子說亮話：賺錢的魔鬼在誘惑他。著者過去從事於農民問題調查工作時，曾經遇着一位地主兼商人的朋友，我很不客氣的問他：爲什麼要從事於商業的經營？他當時答覆了很多。第一：年歲荒歉，水旱頻仍，以致收穫減少，得不到很大的利息；第二：土匪蜂起，盜賊如毛，鄉居不僅夜難安枕，甚之，還有槍刼，抬架（即綁票）以至生命危險；第三，從事商業可以得着『活動』錢用，比較農業方面以季候（指收穫期）收入便當得多。這三點當然是比較可靠的原因，不過，他的佃農更有一點新的帶滑稽性的補充：『大爹爹到城裏去做生意的原因，除了上述的三點而外，鄉

位與大爹爹相好（即姘頭）的王大姑娘之離不開，也是一個附帶的原因！」

我們再來看一看官僚們對於商人與地主之間的關係。關於官僚與商業資產階級有關聯的部份，在上面已經說及，現在似乎沒有再行論述的必要了；至於官僚與地主之間的聯系，也可以說這是中國變態社會的一環。自十九世紀以來，主要的在太平天國的農民大暴動以後，那些鎮壓革命的功臣——如左宗棠，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及其走卒，他們爲報復農民暴動的仇恨起見，曾規定兩種方式：搜刮農民的土地與『到民間去』（即是住在鄉間練團勇以鎮壓農民）。這兩種路線我們所看到的，是異常清楚，且舉李鴻章來說吧：李鴻章在他的故鄉——安徽合肥，大批的搜刮農民的土地，因此有人送他一副楹聯：『作完天下事，買盡合肥田！』這雖然未免有些過分的形容，然而我們從農民中間所聽到的什麼：『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怨聲，便可以相信土地之集中於官僚手裏決不是無因之談了。所謂『到民間去』的意義，便是官僚在農村中間買了很多的土地，建築起很精緻而廣大的房屋，僱傭了許多農村流氓無產者以保衛這些財產；在所謂『解甲歸田』或者是『致仕歸來』的美名之下，那『林泉之樂』的名辭，便象徵着中國農村中的大地主。

於此，可見中國的資產階級與地主，實有密切的不可分離的聯繫。

因此，我們堅決的認定，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不但不能幫助農民反對那一切中世紀的封建殘留

的剝削，甚之，他還與這些削剝者一鼻孔出氣，而沒有幫助農民的可能。拉狄克說：『中國資產階級是利於剝削農民的階級，因此，是非封建的，而係資本主義寄生階級的性質，結果他反對解放農民的民族革命運動。』

這意見是有苦的直理！

中國資產階級的前途，祗有兩條路可以走：不是推翻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和澈底的解決土地問題，便是回過頭來加緊的壓迫農民以保持自己的生存。

出路兩條，中國殖民地式的資產階級的前途，究竟是向著那一條路走呢？根據過去的事變的發展，請讀者們自己去體會吧！

# 第七章　一九一一年革命中之孫中山的農民運動

## 第一節　接受歷史上的教訓——革命

在二十世紀初期之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於近世史上總算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吧？這次革命據列寧的估價說：『四萬萬落後的亞細亞的人民已經……覺醒到政治上的活動，占全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已經從睡夢的狀態中囘復到光明的鬬爭運動了。』誠然，這次革命是義和團運動以後的帶近代性的第一次的政治革命，牠的胎胚，萌芽，發展與長成，都是經過一個特定的歷史過程；然而組織，領導，指揮此次革命的唯一的領袖，無疑的，是那名播中外的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先生，他生在那南中國的廣東——太平天國暴動的發源地，我們從：『文之先人，躬耕數代。』的八字中間，很顯明的，便可以看出他是貧苦農家的出身；他曾在小學畢業之後，入香港英國學校研究醫學。但其時適值『國事蜩螗，中原鼎沸』之秋，當然，那青年的，印象最深的，前進的，積極的孫中山先生，研究科學是不能滿足他的志願；他迴顧當時的環境，瞻念國家的前途，不禁

「聞雞起舞」而有所企圖了！

在最初，孫中山先生對於醫療中國痼疾的對策，以為還可以由政府自身逐漸改良，還可以由政府的力量來解決民生國本的問題，所以他在中日戰爭的時候，曾上書於李鴻章要求解決這些問題。故其於上李鴻章的意見書中，首先便介紹自己的經歷；他說：

「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文，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

他在說明了自己的所長以後，更進一步的去敍述政府的現狀：

「……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聞國家奮求強富之術，日異月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并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人西人之所持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復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

但是，孫先生認爲這些現象仍是非常的不夠，并且是不能解决問題；故而他自己提出正面的意見：

「竊文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國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四者，惟圖船堅砲壘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所謂人能盡其財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夫人不能生而知之，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憤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致力焉。又各級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曉喩之，有器以窺測之……。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他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程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講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抑鬱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體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

矣！……」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后稷之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爲民牧者，以爲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爲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

怎樣建設農村經濟呢？孫先生認爲祇有採取先進國家的成規：

「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有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法理，則能反磽土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此農家之地理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動物學植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農家之格物學也；蠹食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爲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飢饉之

發矣！……」

「所謂物能盡其利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如化學精，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爲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爲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爲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爲無用，今可煉爲藥品，煉爲顏料，又煑沙以作玻璃，化土以取礬精，煉石以爲田料，……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冲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氣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事也。至於火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傾刻萬里，此其用爲如何哉！……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

其次，孫中山先生他又說到保護工商業與取消苛捐雜稅的必要：

「所謂貨物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路之載運也。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力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卹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而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

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到地風波，荊天棘地，商賈爲之裹足，負販從而怨磋，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定，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爲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孫中山綜結此四點而說：「比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治，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豈能匹者!?」但是在他這樣的自負的綜結以後，馬上又顧慮到另一方面，而加以補充；他說：

「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他又舉例來說：「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唇爲之焦，舌爲之敝，苦心勞思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關津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尚如此其難，其他可知矣!?」

最後，孫中山曾要求李鴻章採納他的意見，幷以柔和的態度希望李鴻章分配他的工作：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以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才爲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費鉅款而不惜，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爲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爲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爲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端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駑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概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

孫中山唯恐李鴻章不採納其意見與分配其工作，於是更進一步的用帶煽動性的辭句去警告他由此所發生的危險！他很嚴重的說：

「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疑有脫句——農註）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離之區，難免流亡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

……」（見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六頁至十七頁）

李鴻章對於孫中山的意見，在口頭上雖然是加以贊許，但是他幷沒有個明白的觀念去接受孫中山的主張，同時對於孫中山的工作分配，亦復是表面敷衍，僅僅給他以空白的農桑會籌款的護照而搪塞其要求！這樣的待遇，不僅是使孫中山先生以難堪，卽令常人亦復不能忍受，況且當時孫中山先生所提出來的意見，是適合於中國整個民族的需要呢！

事實教訓了孫中山先生，凡是一種進步的主張，暫時是不容易爲落後人們所接受的，何況政治上的改革，以及關於民生國本的一些根本問題的處理，必須經過一個長時期的奮鬬的過程。因此，孫中山先生過去所期望的由滿清政府內部進行和實現自己的主張，現在已成爲泡影而不復可能了！加之，康梁變法的失敗，給他以很深刻的感想：無論如何，要在滿清政府內部的範圍中去實現自己的新的理想，簡直是同與虎謀皮一樣的困難！

基於這些苦的經驗與教訓，孫中山先生便確定了他的革命的人生觀。他認爲一種政治上的革命，祇有與統治階級站在敵對的地位，祇有依靠不斷的鬬爭，祇有需要不斷的流血，才能實現；至於那些避免流血的怯懦被動與妥協行爲，是不能將革命推前一步的。他幷且懂得，如果沒有羣衆的基礎，自己的主張得不到羣衆的擁護，以及不能與羣衆發生很好的聯繫而打成一片，則革命之成功與否？仍成

問題。這一點是爲過去一切的革命者所忽視，而孫中山之革命，便首先側重於這個地方！

怎樣的去與羣衆發生聯繫呢？究竟以那些羣衆爲基礎呢？要答覆這些問題，祗有迫得孫中山去組織政黨和開始注意到農民運動了！

## 第二節 黨的組成

孫中山先生根據歷史上的教訓及應付當前的事變，在綜錯複雜的環境中，不得不從事於政黨組織的工作了。誰都知道，創造一個革命的政黨，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必定要經過一比較長期的艱難困苦的過程；此種困難的情形，孫中山自己曾說：

「……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於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者，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淸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遠湮，幾於數典忘祖，然與之言，猶較縉紳爲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着手。」

異常顯明的，孫中山之革命主張，在初期能獲得人們贊同的，祗親友數人而已，至於那一大羣的智識份子所謂士大夫的人們，方汲汲於功名利祿的不遑，他們的目光都集中於地位和財帛；那裏有暇觀察到社會改革的眞理呢？因此，這時期祗有使孫中山於所謂下流社會中尋找其同伴，特別是那些農

民——會黨的份子，對於孫中山思想的灌輸，反容易使他們起內心的共鳴。

誠然，當時農村中間的祕密組織——會黨，的確是佈滿了全中國，其潛勢力之雄厚，使滿清政府聞而寒心；但是其名目繁多，組織複雜，故不易收集體統一鬥爭之功效。例如浙江一省，在處州則有王金寶組織之「雙龍會」，在衢州則有劉家福組織之「九龍會」，浦江則有杜亦勇組織之「千八會」，嚴州則有濮振聲組織之「白布會」，紹興則有竺紹康組織之「平洋黨」，嵊縣則有裘文高組織之「烏帶黨」，他若「金錢黨」，「祖宗教」，「百子會」，「白旗會」，「紅旗會」，「黑旗會」，「八旗會」等等名稱，僅就浙江一省之會黨而論，名稱已如此複雜，其他各省，可想而知！

這些各自分立不相隸屬的祕密的農民小組織——會黨，的確是佈滿了全中國；茲舉幾個重要的祕密結社——會黨，列如下表，就可以窺測到牠們復雜情形的一斑：

| 所在地 | 名稱 | 正龍頭 | 副龍頭 |
|---|---|---|---|
| 湖南 | 金龍山 | 楊鴻鈞 | —— |
| 甘肅 | 虎形山 | 楊鴻鈞 | —— |
| 湖南 | 泰華山 | 蕭松山 | —— |
| 山海關 | 寶華山 | 蕭松山 | —— |

| | | | |
|---|---|---|---|
| 湖南 | 錦華山 | 劉傳福 | —— |
| 湖南 | 楚金山 | 陳堯 | —— |
| 湖南 | 金鳳山 | 胡佐臣 | —— |
| 湖南 | 天臺山 | 胡雲 | —— |
| 甘肅 | 西涼山 | 賀桂林 | —— |
| 四川 | 峨嵋山 | 顏鼎章 | —— |
| 廣東 | 天寶山 | 蕭朝舉 | —— |
| 江蘇 | 東梁山 | 李雲龍 | —— |
| 浙江 | 終南山 | 何步鴻 | —— |
| 浙江 | 飛虎山 | 劉家福 | —— |
| 浙江 | 萬雲山 | 王金寶 | —— |

孫中山對於這樣廣大羣衆組織的會黨，當然認爲是他革命的唯一基礎，故他的工作方向亦集於此。他在廣州博濟學校讀書的時候，同學中有鄭士良（弼臣）其人者，曾投身會黨而與江湖之士結納，孫中山便經過了他的路線而與這些農民的秘密組織——會黨發生聯繫。孫中山和這些秘密會黨見

面以後，他曾經提出了兩種意見：

第一，必須變更這些組織的性質，充實牠以政治革命的內容，他認為過去農村中間的小組織，其奮鬪的政綱，無非是「反清復明」，但是「反清」則可，而「復明」已經是做了時代的尾巴；同時，他更在思想上指出單純的「仇洋」與「排外」，結果會獲得很不好的影響，因為「洋教」的跋扈，完全為滿清政府所招致，故祗有舉行「大漢民族」的政治革命以推倒滿清政府。

第二，他認為應該立即將那些不相隸屬的小組織聯合起來，集中起來，以收指揮統一的效率。

於是，有陶成章，沈英，張恭等建議於杭州開一各省頭目聯歡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有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的代表，結果，是圓滿的，親密的團結起來了！這次會議的名字叫做「龍華大會」，我們從那傳誦一時的大會閉幕的宣言中間，便可以看出孫中山指導此次會議的精神；宣言是用白話文寫的，原文很長，因此，我們祗好將他的重要點介紹出來，以供讀者的參考；該宣言劈頭一段就說：

「怎樣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有人問我革命就是造反，這句話如今是行得通的了。但這革命兩字，古人有得說過麼？我答應道有的。易經上面，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就是這兩字的出典。又有人問我，革命既是順人應天，為什麼中國古老話兒，又把造反叫做大逆不道呢？我答應

道，列位：這大逆不道四個字，并不是我古時倉頡聖人造字的時候，就把來作造反二字注脚用的，要曉得這是後代做了皇帝的人，自己一屁股坐了金交椅，恐怕別個學他的樣，就同着開國君師，文武百官，造出四個字來，硬派做造反的罪名；又用着粟米芝蔴大的官職，又冷又臭，將要腐爛快的猪羊肉，騙騙那些不識羞恥認強盜作祖宗略識幾個字的人，他說道，咄！你們聽着，把大逆不道四個字，做了那造反的注脚！……」

這一段解釋『革命』『造反』『大逆不道』，雖然是語焉不詳，並且還帶上了很濃厚的東方式的色彩，然而對於統治階級之嬉笑怒駡與玩世不恭的態度，却給羣衆以很好的印象。他們爲的要興奮那久已爲滿清政府麻痺的羣衆意識，以及打破農民羣衆的恐怖觀念起見，不得不從歷史上去說明這個問題；因爲高深的理論，一時是不容易爲人們了解，而淺近的歷史事實，却可以給羣衆以很強烈的暗示：

「列位請看那秦始皇，吞滅了六國，統一天下，說起他的兵力，眞比着後代的皇帝強得多了；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着天下的兵器，都拿來一把火燒毀掉了，這個心思狠不狠呢？那曉得他還沒有死，韓國有個張良，拿着一個千斤重的鐵錐，在博浪沙中，等他出來的時候，要打死他，雖然打他不着，到處搜了十日，連影兒也搜不着半個！後來百姓曉得皇帝的本領，不過如此，陳涉一把鋤頭，

劉邦三尺寶劍，便都等不到始皇的肉冷，就都起來了！那陳涉雖然沒有做到皇帝，然中國平民頭一個造反的就是他，而且一個種田帮工的人，生前做到楚王，……也就可以心滿意足了。……」

他們除了說明這些有興趣的歷史而外，於是更進一步的去指出農民們本身所受的迫切的痛苦，他說：

「近來又想出新鮮法子，要想奪我們的各省田地，凡是好的，都想歸給他們，那狗屁的上諭，反說是滿漢平等，時價估買。阿喲，你們這班雜種的滿洲人，北邊近京的田地，二百年前，已被你們圈佔去了，難道我們南邊的幾畝荒田，你不肯捨免了麼!?……」

最後，他們更指出了民族革命的必要，以及在這個革命過程中要反對一切的敵人，以走上勝利的道路：

「直到出了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天王，本來我們漢人，可以再見天日，却被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混帳王八羔子猪狗不吃的東西，練着漢兵，反幫韃子，殺我漢人！咳！這也是滿洲氣數未盡，我們再該多吃幾十年的苦，若像今日的人心，個個都曉得韃子是應該滅的，就再出幾個曾，左，李也不相干了！……」（見中國祕密社會史第一百十七頁——二十一頁）

在這個大會閉幕以後，他們又曾決議了會規十條，現在我們僅就其第一條宗旨看來，很顯明的充

分的表現了一種進步的農民的要求，該宗旨說：「……報我們兄弟家祖上的大仇，并現在種種殘暴虐待我們的新仇，趕去了滿洲的韃子。……并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的財產，也不准富豪們霸佔，使得我們四萬萬同胞，并四萬萬同胞的子孫，不生出貧富的階級，大家安安穩穩享福有飯吃呢！」（見同上書第一百二十四頁）

孫中山既積極的指導了這些散處全國的秘密會黨的統一，他更感覺到正式的政黨組成的必要；他根據於這種感覺，曾「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當時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各派代表到香港會議，計到會者：哥老會代表七人，三合會頭目二人，興中會領袖三人，結果合併於興中會。」（中國國民黨史稿二十五頁）由此，興中會便龐大起來而成為中國近代的政黨胚胎。

很多的人們認為興中會就是中國第一次的帶科學性的政黨，其實，這種意見顯然是錯誤的觀察！第一，凡是一個政黨，雖然他的組成的份子是參差不齊，綜錯複雜，然而在政治上他總是要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換句話說，政黨是建築於階級基礎上面的，第二，凡是一個政黨，牠總須具備一個固定的主義，而依據此主義的目標去團結黨員以及和一切敵人作政治上的爭鬥；第三，政黨必須具有那適合於人民需要而號召羣衆的政綱；第四，政黨必須具有維持全黨組織的紀律，否則便是一盤散沙的小團體了。

這四個條件，便是政黨與小團體區別的要素，假使缺乏了一個條件，那麽，牠便不能成為政黨了。我們再來看一看興中會究竟是不是個政黨？很明白的，我們從興中會之類似綱領式的宣言中間，實在是嗅不着政黨的氣味：茲為便於讀者諸君參考起見，特將該宣言全部錄下：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憤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然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　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方今強鄰環伺，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厦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於他族，用特集志士以　中，協賢豪而共濟，仰諸同志，盍自勉旃！（見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二頁）

這宣言裏面有沒有具備了政黨的條件，我想讀者諸君一定是可以明瞭的。不過，人們還懷疑着這是興中會的宣言，至於牠的章程一定是綱舉目張的。因此，逼得我們祇有對於興中會十條章程再作一極簡單的介紹：

「1.會名宜正也。……

2.本旨宜明也。……

3.志向宜定也。……

4.人員宜得也。……

5.交友宜擇也。……

6.支會宜廣也。……

7.人材宜集也。……

8.疑項宜籌也。……

9.公所宜設也。……

10變通宜善也。……」（同上書）

任憑那些視覺敏銳的朋友，在這十條章程中終難於看出他政黨的痕跡。

雖然，興中會不是一個完整的政黨，但是，他可以說是中國政黨的胎胚，在興中會的最後一階段，如某些行動上已帶着很濃厚的政黨的顏色，如加入興中會的手續須讀誓詞，并且還規定了一些祕密的口號，如什麼「何處來？」「南方來！」「何處去？」「北方去！」「貴友爲誰？」「陸皓東，史堅如二人！」所有這些，都是準備爲後來的中國同盟會——中國近代的第一個政黨，開闢了很順利

的道路。

中國同盟會牠繼承了過去的基礎，重新決定政治上的面目，決定了主義，決定了政綱，決定了紀律。此種組織上的成份，在未蛻變爲同盟會以前，據孫中山自己說：「迄於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長江之會黨及兩廣福建之會黨始合併於興中會，會員稍稍衆，然士林中人，爲數猶寥寥焉！」於此，可見革命運動之艱難了！

爲什麼我們肯定中國同盟會爲規模具備的政黨呢？首先我們看從興中會轉變到中國同盟會的過程中間，許多革命的青年，特別是南中國和長江流域一帶的青年學生，他們中間的大部份是在國外留學，先進國家的一切建設，給這些留學外國的青年以強烈的刺激。同時，自中日戰爭以後，中國在國際的地位亦復是一落千丈，而成爲帝國主義俎上之肉，任憑列強自由的宰割！這些青年，對於祖國淪亡的危險，是異常的悲恨，因此更加促成他們民族意識的發展和革命的要求；孫中山他是受過新式敎育的人，他知道這班青年之思想的純潔與行動的激烈，大可以作革命的槓桿，於是乎設法與他們取得經常的聯繫，吸收這些青年加入自己的革命的組織，而政黨的基礎遂由此而奠定了。

其次，關於革命理論方面，他那時候在思想上已經建立了一個三民主義的體系，根據此種主義作他奮鬥的目標。其在政綱方面，復規定如下四點：

1. 驅除韃虜。……

2. 恢復中華。……

3. 建立民國。……

4. 平均地權。……

的確，在這個政綱的週圍，是團結了廣大的羣衆，因爲這些都是羣衆的要求；至於這政綱的施行的次序，他曾與人民相約分爲三期：第一期爲軍法（卽軍政）之治，他認爲在革命開始爆發的時候，是需要以武力來掩護人民的利益，一切的措施皆以軍事部勒的方式；第二期則爲約法（卽訓政）之治，給人民以自治的機會，但是須受革命政府的「訓政」的指導；第三期便爲憲法（卽憲政）之治，將政權交還人民。他認爲中國人民智識的落後，文化水平的低下，非經過三年的「軍政」與六年的「訓政」以後是不能夠自動的起來管理國家的！

除掉了此種大規模的詳細的政綱而外，關於組織方面不僅是有集中的紀律，并且還有詳細而嚴密的分工，此分工的情形，除黨魁（卽總理）由孫中山自任，「總理外設三部，（一）執行部；（二）評議部；（三）司法部；卽下分部爲六：曰庶務，曰內務，曰外務，曰書記，曰經理，曰會計……」

中國同盟會之所以能夠指導一九一一年革命，完全由於牠是一個規模較大的政黨，牠那種前仆後

繼不惜牲犧的精神，對於辛亥革命誠然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孫中山意智的堅定與農民羣衆之不斷的流血，實替這次革命開闢了一條平坦的途徑！

## 第三節　農民暴動

歷史上每一次的解放人民的革命，牠都是相當的憑藉於暴力，即是說以武力來推翻舊的統治而建立新的革命政權。孫中山他自從上書李鴻章失望以後，即感覺得要中國政治之澈底的改革，斷不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期望所能實現；他在此種認識之下，故先後着手於政黨的組織——與中會和中國同盟會的組織，同時他更注意於農民羣衆的聯繫，關於這些情形，我們在上面已經簡單的說及，此地似乎無再復述之必要，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孫中山怎樣的指導了中國的農民暴動？

我們要研究孫中山對於農民暴動的指導，不能不遠溯於一八九五年（即光緒二十一年）的第一次的廣州暴動了，其時適當中日戰爭以後，中國遭受了悲慘的失敗，割地求和，賠款辱國，所有這些事實匯合起來，實是促成孫中山領導廣州暴動的動因。他分析當時的政局，認爲統治階級異常的動搖；并且是很難穩定；另一方面，他又估量到兩廣反動統治的力量，他看到統治階級在戰敗之後，遣散了大批的軍隊，所剩下來的留守隊伍，對於他們的長官表示異常的不滿；這時候適逢其會的廣州又發生

了一種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鬥爭：統治階級的軍隊的因搶刼居民財物而引起市民的圍捕，將爲首的士兵拘捕於會館之中，然而統率這些士兵的長官，他們不但不承認訓練士兵的不善，甚之，反責備商人的違法，而猛攻會館，將彼四士兵一律釋放，并將會館搶掠一空！

因此，便有許多的市民集議反對，以代表千人訴於統治機關——巡撫衙門，結果不僅市民要求之目的未達，統治階級竟老羞成怒斥此種行爲爲犯上作亂的舉動，而下領袖代表於獄中。善於利用鬥爭機會的孫中山，當然，此種事實是他最好的煽動的材料，他根據於這些客觀環境的估計，便立下了暴動奪取廣州的總方針。

當時孫中山担任了極重要的組織暴動的工作，他在暴動技術與軍事準備方面有很詳細的計劃，他將農民與會黨羣衆編作兩軍，從汕頭及西江兩路進攻廣州；在反動的軍隊中，他們又取得了相當的聯絡，例如水師防營的羣衆便是暗通聲氣；而散處廣東各縣的土匪，亦與此次暴動發生很好的聯繫，至於軍械的準備亦是異常的充分。其暴動的旗幟爲「青天白日」，而口號則爲「除暴安良」！在孫中山的意思，認爲準備充分，不難一舉佔領廣州而與滿清政府成爲割據的對峙的局面，殊不知內部同志的叛變，將所有的暴動計劃悉數告之於反動的廣州政府，致使這次暴動未及舉行便爲統治階級垂手壓平了！

統治階級在壓平這次勢將爆發的暴動後，不僅是對於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加以辱罵，同樣的要玩一套什麽「購拿餘黨」「撫輯流亡」的魔術！我們看在此次事變後統治階級對於孫中山是怎樣的辱罵？

「懸賞購匪欽命廣東提刑按察使兼管全省驛傳事務加三級記錄十次張為懸賞購匪事：照得土匪孫文，糾結夥黨，暗運軍火，約期在省城滋事一案，當經拿獲匪犯陸皓東等多名審辦，惟尚有首要名匪孫文等，在逃未獲，亟應懸賞緝拿，合行出示曉喻，為此示諭闔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如能拿獲後開賞格有名匪犯解案，一經訊明定奪，即如數給與花紅銀兩，銀封存庫，犯到即給，慎勿懷疑觀望，至此外案內被誘匪徒，准其改過自新，免予深究。如能拿獲後開首要各犯解案，仍一律給賞，各宜凜遵勿違，特示！

計開：

孫文即逸仙，香山縣東鄉翠微人，額角不寬，年約二十九歲：花紅銀一千元。

夏亞伯，新會縣人，肥矮面黃微瘦，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一百元。

李亞舉，香山縣隆都鄉藍下村人，身高眼大，髮多黑，年約五十三歲，花紅銀二百元。

李芝南，南海縣佛山人，年約三四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楊衢雲，香山縣人，本籍福建，右手共缺三指，年約三十九歲，花紅銀一百元。

劉秉章，清遠縣人，身高，年約三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朱浩清，清遠縣人，年約二十七八，花紅銀二百元。

陳少白即夔石，新會縣外海人，年約二十七八，花紅銀一百元。

王質甫，江西人，身中面白，年約三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湯亞才，花縣人，身高微麻，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三百元。

吳子才，潮州人，身高額窄，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莫亨，順德人，身矮，年約二十五六歲，花紅銀一百元。

陳澳州，南海縣西樵鄉人，身胖微麻，年約三十二三歲，花紅銀二百元。

侯艾泉，香山縣隆都邨人，身高瘦，髮禿，年約五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魏友琴，歸善縣南眞村人，面圓有鬚，年約三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黃麗彬，清遠縣人，矮瘦，年約三十四五歲，花紅銀一百元。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示」（見中國祕密社會史第一百四十一頁——四十三頁）

同時，南海和番禺兩縣又出了一些緝捕流亡的告示：

「現有黨匪，名曰孫文，結有匪黨，曰楊衢雲。起義謀叛，擾亂省城，分遣黨羽，到處誘人！借口招勇，煽惑愚民；每人每月，十塊洋錢，鄉愚貪利，應募紛紛！數日之前，聽得風聲，嚴密查訪，派撥防營，果獲要犯，朱邱陸陳！經衆指證，供出反情：紅帶爲記，口號分明，鎗械旗幟，搜出爲憑。謀反叛逆，律有明刑，甘心從賊，厥罪維均，嚴拿重辦，決不從輕。城廂內外，兵勇如林，搜捕亂黨，決不饒人；惟彼鄉愚，想充勇丁，不知禍害，貪利忘身！一時迷惑，概予施恩，丟去紅帶，急早逃奔。回歸鄉里，安分偸生，免遭擒獲，身首兩分！特此告示，剴切簡明，去逆效順，其各凜遵！」（見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五百九十頁至——九十一頁）

「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這是我們中國歷史上數見不鮮的事情，孫中山此時是與過去的一切革命者遭受同一的命運而受統治階級嚴厲的壓迫。本來歷史上每次的革命運動，或者是在新的失敗以後，或者是在羣衆鬥爭的浪濤之前，統治階級爲要挽救自己的垂危的生命起見，總是瘋狂的向着革命運動猛噬，而竭力的掙扎；最可惡的，更是那班歌功頌德的臣僚，與夫舐痔拍馬的走卒，他們爲迎合統治階級的歡心起見，不惜奴顏婢膝曲意逢迎他的主人！其對於革命，不是咀咒她爲「流寇」「土匪」的行動，便辱罵其爲「暴徒」「痞棍」的集團！在他們的意思，認爲自這樣的口誅筆伐以後，彷彿「妖魔鬼怪」便從此絕跡於中國了。

曾幾何時，一旦叱咤風雲，局勢驟變，像這類沒出息的東西，感於權位的失墜與生命的危險，馬上又「琵琶別抱，另送秋波」了！關於此種情形，我們從孫中山一生革命經過的史蹟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來，當孫中山開始從事於革命運動的時候，祇獲得三個眞正的同情者，人們咸目之爲「四大寇」，事情也不過隔了三四十年，那「國父」和「總理」的聲浪，又震聾了我們的耳鼓，很顯然的，這是政權問題，并不是什麼「人情之澆漓」!?

這次暴動雖然是沒有實現與成功，但是，他給孫中山以很多的教訓。五年來在歐洲流浪的生活，對於孫中山在智識上有很大的幫助，使他學習了許多先進國家政治鬥爭的戰術與策略，故於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爆發的時候，他認爲是有機可乘，因而對於農民暴動便舊事重提了。

此次有名的惠州暴動的策略的決定，是在孫中山的嚴密佈置與充分估量之下舉行的。他看到滿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中，受到了帝國主義之嚴重的攻擊，已經是很疲乏的樣子而失掉統馭民衆的作用，此時不妨乘機崛起來試一試革命的身手。另一方面，全國那些重要的農民祕密組織——會黨之合併於興中會，在戰鬥的力量上，不啻加了一枝生力軍。同時，菲律濱獨立運動的失敗，願以大批的軍火幫助孫中山爲中國革命之用，而日本的臺灣總督——兒玉亦復乘此投機，他曾約孫中山晤商中國革命的策略與任務，在不妨礙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條件之下，這位臺灣總督——兒玉，他表示願意贊助

中國的革命。

孫中山以爲既然取得了國際的聯絡，更有會黨羣衆的響應，在多事之秋的時候，主觀力量與客觀環境的配合，是可以佈置一次大規模的暴動，但是因爲香港政府的監視，孫中山是不能登岸親自指揮，於是祇好將指導暴動的責任委之於富有鬥爭經驗的鄭士良，要他根據預定的計劃去指揮。

惠州的農民暴動便從此開始了。

因此，鄭士良對於此次的農民暴動，事先曾有極詳細的佈置，將所有聯繫的農民與會黨羣衆，全部的集合於三州田的山中；并把有已經訓練的農軍六百，因糧食缺乏而寄食於同志之家中。但是，這佈置復引起附近居民的駭異，而將事實擴大宣傳：不是說三州田有人馬數萬，便是說革命黨將要奪取廣東；這種宣傳使統治階級異常的可怖，牠們以爲不論其是否爲「杯弓蛇影」，總宜派兵鎮壓爲先。故先後由兩廣總督派遣了很多的軍隊，分數路包圍這勢將發動的革命力量，可是羣衆的革命的火焰，已由潛熾而燃燒起來，他們不待統治階級之來犯，爲先發制人起見，對於反動的軍隊突然的作一種游擊式的迎頭的襲擊；第一次的游擊戰爭便得着相當的勝利，以很少數的八十名游擊隊伍居然能殺敵四十餘人，并獲得反動武裝很多！

經過此次小的勝利後，在平山龍岡兩處影響了千餘農民前來參加暴動，他們因爲沒有新式的軍

械：大部份以梭標戈矛作衝鋒陷陣的武裝。暴動在新的勝利的局面之下，又繼續向前進展，在佛子拗一戰，復給統治階級以巨創而獲得很大的勝利：『奪洋槍七百餘支，子彈五萬發，馬十二頭。』這種勝利品的獲得，很顯然的，於客觀方面鼓勵了農民羣衆鬥爭的勇氣，所以不僅每日請纓革命之農民來往如市，甚之，每經一個村落，農民咸簞食壺漿以迎解放人民之義師。當時暴動的目的地，是在直趨廈門，因爲如果佔據了這個海口，暴動的隊伍可以得着菲律濱三百萬發子彈的接濟，甚至依據此海口爲基礎，逐漸擴大暴動的影響。

這次暴動的隊伍，在崩岡圩又與政府軍隊作了一次最後的慘酷的肉搏，殺得政府的軍隊鼠竄而逃，而農民隊伍的聲勢大振；迴溯他們在開始暴動的時候，不過數百人而已，現在在暴動旗幟下面團結的，竟達一萬多人，眞是出於統治階級的意料之外了。但是，子彈不足，而中心的目標又集中於廈門，故對於軍事行動上不得不有所顧慮而不敢戀戰了。

暴動仍在進展的階段，忽然中途遭受了一種意外的厄運，那成爲暴動農民雲霓之望的外援與接濟，現在已經連根斬斷了；他們在白沙地方得着日本人山田良政從香港送來孫中山的失望命令，該命令說：『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卽至廈門，恐無接濟，軍中之事，仰司令自決進行。』（中國國民黨史稿五九六頁）暴動委員會接得這命令以後，感於前途茫茫，於是便將農民隊伍解散，而歷史上有名

的惠州暴動便從此終結了。

滿清政府，對於此次的農民暴動，牠是異常的重視，牠認爲這次暴動與尋常的土匪騷擾不同，牠是含有嚴重的政治意義，我們從兩廣總督——德壽的奏摺中間，便可以顯明的看出來：

「……奴才訪聞歸善縣屬三州田地方，有孫康逆黨勾結土匪起事，並在外洋私運軍火至隱僻海港，轉入內地。當以逆黨主謀意圖大舉，實非尋常土匪可比，且查三州田地方，山林深密，路經迂迴，南抵新安，緊倡九龍租界，西北與東莞縣接壤，北通府縣二城，均可竄出東莞，直達省會，東與海豐毗連，亦係會匪出沒之處，非多派營勇，面面顧到，難期迅速撲滅！」

另一方面，牠認爲參加此暴動的不僅不是純粹的土匪，并且其大部份多係農民，所以牠說什麼「惠州各屬，本多匪鄉，散則爲民，聚則爲匪；此次當會匪猖獗之時，竟敢樹旗助逆，尤爲狂悖！」但是，牠怎樣處置呢？祇好是採取嚴厲的白色恐怖以鎮壓農民：「督率營勇，分赴各鄉，按村清查，如有當時助匪之犯，擒獲嚴辦，無留餘孽！」

但是，這種對農民殘酷的恐怖手段，實際的作用祇是鎮壓一時，并不能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然所此種恐怖政策不僅影響到農民鬥爭的情緒，甚之，牠還影響到當時祕密政黨的策略呢!?

## 第四節　策略的轉變與辛亥革命

在惠州暴動失敗以後，其影響所及，竟動搖了當時的革命隊伍的內部，使牠在政治戰鬭的策略上又發生了一些新的變更。此種變更的傾向很顯然的有兩個路線：第一個路線表示於羣衆方面的，一部份激烈的左傾的幼稚的黨員，他們於新的失敗以後，羣衆情緒的消沉，社會方面的壓迫，感覺得革命的再起，其前途是異常的渺茫，而排在目前的壓迫又復不能忍受；於是乎於徘徊失望之餘，為那種英雄觀念所強迫，將死去了的情緒又重新鼓起舞來！

怎麼辦呢？

『幹！幹！幹！手槍與炸彈！』

這種傾向，完全是代表青年的左傾的智識份子的心理，他們以爲暗殺的手段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他們在主觀上，認爲此種暗殺不但可以答覆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甚之，還可以給那班意識痲痺了的人們以極強烈的刺激；在恐怖暗殺的局面之下，由此可以『鼓動風潮』而『造成時勢』。在此種認識之下，如先後有史堅如炸壽德，萬福華鎗擊王子春，吳樾謀炸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卽所謂五大臣也。其他如劉思復（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農註）之圖炸李準，徐錫麟之槍斃恩銘，

熊成基之謀殺載洵，汪精衞之謀炸攝政王（載灃），溫生才之鎗擊孚琦等等，可見暗殺運動之風行於世了。

爲什麼要採取暗殺的手段呢？很顯然的，是以左傾的行動來掩蓋着對於革命運動的消極！例如在汪精衞謀炸攝政王的事件當中，其動機固然在某些地方要答覆革命敵人的反宣傳：「革命黨首領驅人於死，而己高樓華屋安享！」而表示個人的英勇，然而「感時傷事」及「憂讒畏謗」，同樣的，也是促成暗殺的動因。當辛亥革命前二年，革命的形勢還是異常的消沉，新的革命的象徵還是沒有見到，於此，更使汪精衞堅其暗殺與拚命的志念；他在留別同志的書中，曾經是這樣的說：

「……弟不敏，先同志而死，不獲共嘗將來之艱難，此誠所深自愧恧者，望諸同志於已死者，勿寬其責備，而於生者，則務爲團結，以厚結其力。惟相信而後能相愛，惟相愛而後相助，毋惑於讒言，毋被離間於羣小，毋以形跡偶疎，而聯其感情，毋以行事過祕，而疑其心術；蓋此四者，往往使團結爲之疎懈，凡諸黨派，所不能免，而祕密性質之革命黨，則尤不能免！……」（見中國國民黨史稿七百二十頁至二十一頁）

當時，關於此種暗殺的策略，在祕密的政黨裏面是一個路線，與此路線同時幷立的，還有上層的外交策略。此上層的外交路線的形成與內容，其原因是非常的複雜，我們要說明此路線之歷史的淵

源，不得不回溯於孫中山第一次革命失敗的外遊了。

當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因政治上的壓迫而亡命於日本，於此期間，孫中山便結識了很多日本在野政黨的人物，如菅原傳，曾根俊虎，宮崎彌藏，宮崎寅藏，平山周，犬養毅等，這些日本在野黨，在當時是願意幫助中國的革命，如果中國革命的勝利，那麼日本在不無微勞的掩護之下，於中國可以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故而日本的在野政黨不僅於輿論方面贊助中國的革命，甚之，還派遣許多長於政治軍事指導的人材，實行參與其間。另一方面，自從倫敦使館被囚脫險以後，對於英國政府實是銘感五內，如果英國不給他以幫助，那麼，孫中山早已由待罪之囚而流血都門了，故而他在義和團事變中曾致書於港督，要求在英國的幫助之下來完成中國的革命；如該書的重要點說：

「……深知貴國素敦友誼，保中爲心，且商務教堂遍於內地，故某等不嫌越分，呈請助力，以襄厥成，願借殊勳，改造中國，則內無反側，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華人已也。……」（同上書三十三頁）

在惠州暴動失敗以後，孫中山更深切感覺得外交問題的重要了；因爲如果日本不積極的改變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菲律濱的軍火如取得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意而在廈門登岸，則暴動的前途尙不至於如此的晴淡了。他懲於這些教訓，對於革命運動的策略，不得不相當的轉變，即是說企圖於折衝樽俎之

間，獲得相等於衝鋒陷陣的效果；他非常清楚的看出了當時帝國主義內部之間的矛盾，故而想利這些矛盾來實現自己的企圖。

此路線的確定與辛亥革命的實現，實有密切的不可分離的聯繫，我們看根據此路線所發表的對外宣言是怎樣的發揮外交政策的精神，茲為參考便利起見，特將對外宣言全文錄下：

「中華國民軍革命驅除異族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友邦各國，益敦睦誼，以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民之福祉。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宣言如下：

1. 所有中國與前此各國所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2. 債款外債，照舊担任，仍由各省洋關，如數攤還；
3. 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
4. 保護外國居留軍政府占領之域內人民財產；
5. 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及與各國所借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6. 外人有加助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
7. 外人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以戰爭用之物品者，一概收獲沒收。」（同上書六三至——六四頁）

同時，孫文主義的信徒，對於此也不加以否認，他們說：「先生在美聞耗，遂決意致力外交，以絕清廷之援力，首至英國停止清庭向四國銀行借款二萬萬元，復請制止日本援助清廷與取消放逐令！……得英國政府許可，乃由法東歸。」（見孫中山與中國第十頁）

誠然，這兩種路線對於辛亥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有相當的幫助，如在暗殺路線下面所引起的黃花崗的壯舉，對於社會各階級是有很大的刺激，而外交政策之活潑的運用，於很短的時間獲得列強主要國家對於革命的承認。然而利之所在，弊亦隨之，那廣大的羣衆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爲「暗殺」「兵變」與夫「招兵買馬」的行動所代替，而忽視了羣衆的政治教育與政治鬥爭，這是一個主要的缺憾！

我們看辛亥革命究竟解決了一些什麽問題？

## 第五節　一九一一年革命是不是解決了土地問題？

辛亥革命的實現，我們如果從歷史方面去觀察，則其所以實現的原因，便不難於了解。第一，國際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的加深，使孫中山折衝於樽俎之間獲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們看武昌起義的時候，在領事團的會議席上，革命軍方面顯然的是獲得了主要列強國家的承認，故而有那種破天荒的對

殖民地國內戰爭之嚴守中立的佈告：

「爲佈告嚴守中立事，現値中國政府與中國國民軍互起戰爭，查國際公法，無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戰，爲該國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並應嚴守中立，不得藏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輔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本領事等，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准攜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藏匿軍械及炸藥等事，此係本領事等遵守公法敦結交誼上應盡之天職，爲此剴切佈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輔助本領事等遵守達其目的，則本領事等幸甚，中國幸甚！」（見中國國民黨史稿八百零八頁）

這佈告在表面上是輕描淡寫的「嚴守中立」，而實際的作用實是左袒革命。他們爲什麼要向革命軍頻送秋波呢？非常顯明的，這次革命是沒有侵犯和動搖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雖然，列強當中有某些國家是極不願意於革命軍方面的勝利，然而爲領事團的共同行動所束縛，惟有悻悻而已！例如當時的德國，對於此種行動是異常的憤恨，我們於德國駐華公使致德國政府報告的公文中，其明爭暗鬭的情形，看得是異常的清楚；該報告說：

「……英國之勢力範圍，係集中於揚子江及中國南方一帶，實首先直接受着革命影響。當袁世凱一月中旬來此之時，中國帝室軍隊雖在漢口漢陽獲得勝利，而英國方面對於援助北京政府之舉，卻

不久即行放棄。上海英國商人之壓迫與深恐商業受損之殷憂，終佔優勢，蓋彼輩對於開來之南軍，甚欲好意聯絡故也。〔英國如果〕援助〔北京〕是否能令北京方面利用軍事勝利機會，竟將佔據上海陷失南京之危加以化除，固然不能斷定。但此種援助之舉，却不能促使局面大爲變動，〔則可斷言〕。蓋十九信條之中，業已表示充分順從維新人士之望，故也。在實際上，北京方面所從事討論者，亦不是維持滿洲朝代問題，乃是變更帝制國體問題。英國政策乃係由上海方面決定者，既已鼓吹和平，則〔當然〕成爲和平。英國之調停，首使長江戰事歸於停止，倘若袁世凱之雙料角色，一旦被人指責，則袁氏勢當立即察知，所演滿洲一角，現在業已失敗；於是只好能替滿洲救得多少，便救多少。……英國政策之所以贊成共和徒黨者，據余所知，……彼似已相信，反對清室運動，業已不可遏止，不如乘此機會，將腐敗不堪阻礙進步之滿黨掃除。日本利益分布中國全境，〔尤其是〕台灣對岸，滿洲方面，以及長江重要口岸之商業，自中國亂事開始以來，舉謂日本必將起而干涉，〔在實際上〕日本某某方面人士曾經力主干涉，亦復似有其事；日本商業因〔中國〕亂事之影響，所受損失極爲重大，日本以中國鄰邦亞洲強國之資格，爲生存關係所指命，〔不得不〕在此行將組成之中國新邦內面穩樹一種重要勢力，因此，日本倘若長持〔袖手〕靜待態度，則反是令人驚異，不解其故。大約英國方面曾加以一種溫和的壓迫；而單獨行動一事，日本又以其財力薄弱之故，自感力量不足。惟日本是否終聽

此種擴張穩固亞洲大陸勢力之機會，白白放過，却是一個很大疑問。……但在此處日本却與歐洲列強，連英國一併在內，以及北美方面，發生利害衝突。此外更加以日本在此素爲英國在華商業中心之長江流域一帶，勢將成爲英國最大勁敵。據最近長江方面消息，日本努力設法貸與革命政府款項，用中國某項長江商艦以及某項鐵路爲抵押，以謀日本商業地位之穩固。惟日本在華大陸勢力之發展，不僅使英國在華商業勢力大受影響，幷且使英國亞洲政治地位陷於危險，此處實爲英日兩國利害相反之根芽，或者竟被此次中國亂事使其大爲明白顯露。此次亂事幷將使英國對華政策之改定，多從歐洲方面着眼，或者竟使英國感到對德甚有接近之必要。惟英日同盟在中國新邦之特殊勢力，一日存在，則其餘列強，勢將因爲利害聯帶關係之故，迫結一種共同戰線。」（見王光祈譯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第三十六——八頁）

在這種祕密外交的公文中，關於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之緊張與夫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的第一次的強盜式的國際戰爭之原因，我們是很容易理解的。

第二，軍事運動與羣衆運動幷不是平衡的發展，於羣衆運動消沉的時候，由兵變已經佔領了武漢，其他各地雖然是不斷的響應，然而其動力完全建築於少數黨員的肩上。孫中山雖由海外歸來，但國內的形勢與他的主張恰有許多的不便，首先是經濟問題絞殺了這位臨時總統。當時革命政府曾企

圖將漢冶萍煤鐵公司抵押於日本，以得着相當的建設經費，第因參議院的反對而中止；其次，許多的新興的軍事領袖以功名利祿的目的已達，都主張與北方議和；最後革命政黨內部的腐化與分裂，那些中堅黨員在長期的祕密生活的壓迫之下，一旦得着公開的機會，彼此都汲汲於功名利祿而右傾起來。

處於此種情況之下的孫中山，這時竟一籌莫展，祇好將臨時總統的地位以謙遜的方式而讓與袁世凱，而一九一一年革命的最後一階段亦從此結束。

這次革命是不是解決了中國的土地問題呢？我們所看到的，恰恰相反，不僅沒有摧毀那中世紀的封建的遺留，將農民從飢寒交迫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甚至還維護這些封建殘餘而加緊的剝削農民。我們看了那優待清帝遜位及優待滿清皇室的條件，可算是中國革命史上永遠洗不去的汚點，如什麼清帝遜位之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而對於滿清廢帝「原有之私產」還要加以「特別保護」。其皇族私產當然是要屬於「一律保護」之例，甚之，「王公世爵」還是「概仍其舊」呢！

這些異常刺目之優待滿清政府的文字，我們是用不着駭怪的，因為在此次革命進展的過程中，革命的主角充分的表示了牠的革命要求的限度；不過我們從另一方面却獲得了很可寶貴的教訓，牠告訴我們在以後革命運動中要怎樣的做。

「殷鑑不遠，覆車當戒！」

## 第六節　孫中山與農民

辛亥革命雖然是沒有解決土地問題，以至於到現在農民生活的痛苦依然，並且其勢日趨於惡化；然而孫中山在主觀上他總是企圖解決這個問題的。

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他於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講演中，首先便側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故而他在那標題叫做耕者有其田的演詞中，盡量的發揮他對於農民運動與土地問題的觀點。我們爲使讀者諸君全部的明瞭孫中山對於農民運動及土地問題的概念起見，特將這一篇講演詞一字不遺的附錄於下，以供讀者諸君的參考：

「學生諸君：你們這次畢業，到各鄉去聯絡農民，這是我們國民黨做農民運動所辦的第一件事。我們從前做革命事業，農民參加進來很少，就是因爲他們智識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團結大事，所以對於國家很冷淡，不來管國事。你們畢業之後，到各鄉間去聯絡農民，首先便要一般農民知道對於國家有什麼責任，農民所仰望於國家有什麼利益。這個革命政府，是想要做成一個人民爲主體的國家，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中之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來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

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就是大家的責任，大家能夠担負這個責任，聯絡一般農民，都是同政府一致運動，不顧成敗利鈍來做國家的大事。這便是我們的基礎可以鞏固，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

諸君在這裏學了幾個月，知道我們革命是要根據於三民主義，大家到各鄉去宣傳，便要把三民主義宣傳到一般農民都覺悟；農民在中國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數，所以農民就是中國的一個極大的階級，要這個極大的階級都能夠覺悟，都能夠明白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才是澈底；如果這個極大的階級不能覺悟，未能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我們的革命，在一時成功了，也不能說是澈底。大家到鄉村去宣傳，有什麼方法可以講明白三民主義，令一般農民能覺悟呢？要一般農民都容易覺悟，便先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農民才注意。如果一開口就講國家大事，無知識的農民怎樣能夠起感覺呢？先要講農民本身有什麼利益，國家有什麼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對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農民，又有什麼利益，然後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大家都知道中國社會上的人，分成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比較起來，最辛苦的是農民，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担負國家義務最重的也是農民。在農民自己想起來，以爲受這種辛苦，盡這種義務，這是分內應該有的事，是天經地義子子孫孫不能改變的。祖宗業農，受了這種辛苦，子孫也應該承繼來受這種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

樣。這種思想，是從前的舊思想，我們現在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就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打破這種思想，就是要一般農民不要從前的舊思想，要有國家的新思想，有了國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脫離舊痛苦。要一般農民有新思想，都能夠自己來救自己的痛苦，還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現在許多人都說中國農業社會，和俄國不同，從前俄國有大地主和農奴，地主和農奴的財產，過於不平均；現在中國沒有大地主，祇有小地主和一般農民，這般小地主和農奴的財產，同俄國地主和農奴的情形比較起來，還算是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這是講得過去的，但是切實調查起來，用中國現在的情形，和俄國從前的情形比較來說：是中國的農民享幸福些呢？還是俄國的農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國的小地主專制些呀，還是俄國的大地主專制些呢？依我看起來，從前俄國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幾百萬方里，大些大地主對於許多農奴，自然不能精神貫注，因為精神貫注不到，待遇農奴，自然是很寬大。我們中國這些小地主，總是孳孳為利，收起租來，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計算，隨時隨地，都是要刻薄。農民所受的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確，還是等到你們再去調查，就是我個人的心理比較，從前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要少，現在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要厲害得多!!!

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土，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祇對於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我們現

在革命；要做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澈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澈底的革命！中國的人民，本來是分着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民，除農民工人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做效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的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我們此時實行三民主義，如果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給農民，受地的農民，固然得到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損失；但是受損失的地主，現在都是稍爲明白事體的人，對於國家大事，都很有覺悟，而一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農民便不能抵抗。我們要免去現在的衝突，要農民將來能夠抵抗，大家此時便要去對農民宣傳，把農民的痛苦講得清楚，讓一般農民都知道。農民祇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覺悟，農民有了覺悟，自然來向政府求救，解除他們的痛苦。好像我們近來在香山舉行農民運動，要解除農民的痛苦，便有許多農民向政府說：政府既是要解除我們的痛苦，爲什麼政府反向我們加沙田捐呢？這豈不是加重我們的痛苦嗎？像這個樣子，我們農民的痛苦，究竟要怎樣才可以救呢？如果遇到這種問話，便不容易答覆。

再者現在這個革命政府，有很多的軍隊，我們要維持目前這樣多的軍餉，便不能不多抽稅。這種

稅源都是從窮人來的，富人所受的負担很少，如果不講明白，農民還不知道。若是現在講明白了，農民都知道很痛苦，他們一定來要求免去這種痛苦，所以你們在宣傳的時候，一定生出許多情形，是自相矛盾的。對於這種矛盾，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呢？就是要農民全體都有覺悟。如果全體農民都能覺悟，便有方法可以解決。譬如廣州一府的農民，能夠全體覺悟起來，便可以聯絡成一個團體，廣州的農民都可以聯絡起來，便可以解除廣州府農民的痛苦。推到廣州全省農民的情形，也是一樣。所以當宣傳的時候，有了以前所講的矛盾，發生了這種衝突，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法，便是先勸農民結團體；農民是多數，地主是少數，實在的權力，還是在農民的手內。如果由一省的農民，推到全國的農民，都能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農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辦法，政府便可以靠農民做基礎。對於地主要解決農民問題，便可以照地價去抽重稅，如果地主不納稅，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拏來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納稅到私人，要納稅到公家，像這樣的辦法，馬上就拏來實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動力。所以此時大家去宣傳，一定要很謹慎，祇能夠說農民的痛苦，教他們聯絡的方法，先自一鄉一縣聯起，然後再聯到一府一省，以至於全國。當聯絡的時候，還是要農民自己去出力，不過要怎樣出力的方法，就要你們指導，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

作。

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這種勞苦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了。現在農民勞動的結果，在農民自己祇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農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像這樣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從前沒有工夫，做發現這種不公平的宣傳，這回的宣傳是第一次，諸君去實行宣傳的人，居心要誠懇，服務要勤勞，要眞爲農民謀幸福，要在最快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都聯絡起來，同政府合作，才有辦法。此時農民沒有聯絡之先，便要暫時忍耐，將來才可以享幸福；要農民將來可以享幸福，便要望諸君趕快去宣傳聯絡，農民都聯絡了之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成功。」

以上便是孫中山先生對於農民運動與土地問題理論的菁萃，附錄以備讀者諸君研究的資料，至其觀點如何，我想，我們用不着在此地加以褒貶，好在讀者諸君自己是可以體會得到的。

不過，自辛亥革命以後，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是異常激劇，大有一日千里之勢！關於此種崩潰的原因，現狀，特點，及其趨勢，實爲研究今後農民運動與農民問題之焦點，因此，我們不得不在下一章中加以論及了。



# 第八章　中國農村經濟的崩壞

## 第一節　怎樣的去把握中國農村經濟？

自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沒有解決土地問題以後，北方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袁世凱，在帝國主義大批的借款的幫助之下，在以金錢腐化同盟會的軍事領袖的條件之下，竟戰勝了孫中山；並迫得他不得不辭去臨時總統的職務而將政權交給於反革命渠魁的袁世凱。此種轉變，很明顯的表示出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就東南的資產階級來說吧，牠雖然對於袁世凱之軍事獨裁以及後來復辟運動——所謂「洪憲」的舉動表示不能忍受的樣子，然而唯一依賴於武力擁護的政府，必然的要壓倒人民的不滿意。何況這一時期，又處在世界大戰的前夜，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於殖民地的中國的侵略，更無所不用其極了；當孫中山拋棄政權的第二天，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高機關——「銀行團」便批准了袁世凱二萬萬五千萬盧布的大借款，這鉅大的貸款是以「鹽餘」担保的，從此以後，中國不僅在公共收入方面遭受了意外的損失，甚之，還影響到中國社會的各方面。

在帝國主義與袁世凱統治之下的中國，關於孫中山的改良中國農村經濟的土地政綱，必然的會遇到牠們無情的排斥，因此，一九一一年以前孫中山的改革農村經濟的計劃，於辛亥革命後反『烟消雲散』了！從此次革命中間，我們可以明白的看出：歷史的舊賬牠固然是沒有算清，甚而至於在這些賬目之外，還堆積了一些新的債務。

中國農村經濟之劇烈的崩壞，便是新的債務之一種。

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的崩壞問題，我們在以上各章中，已經簡單的說及，但是自一九一一年以來迄於現代，農村經濟崩壞的現狀以及因此而影響到農民生活的具體形態，仍需要我們再作極其詳細的說明。因牠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有密切不可分離的聯繫，我們如果不在此地對牠有個明白的概念，那麼，關於那偉大的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農民革命行動，便會使人們感不到歷史的興趣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一般人們現在都大聲疾呼：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但是關於農村自然經濟的定義以及破產的原因與夫崩壞的程度如何？他們便不能加以正確的決定；換句話說，他們對於這些問題都以含義模糊的辭句來代替客觀的具體的分析。

我們怎樣的去把握現代中國農村經濟的崩壞呢？

第一，關於封建的農村自然經濟的定義問題，需要我們詳細的考察。不管現代人們怎樣的對於牠「聚訟紛紜」而企圖作某種的肯定，但是那些肯定總是徒勞無功啊！這在很久以前，科學的社會主義創造者之一——恩格思，他對於農村自然經濟的定義便立下了一個簡明的公式。他說：

「在中古時代的社會中，生產主要是爲滿足生產者個人及其家庭的需要；有主奴關係的地方，譬如在鄉村，生產兼爲滿足地主諸侯的需要。但這裏是沒有交換的；因此生產品不帶有商品的形式。…………」（見恩格思著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中譯本宗教哲學社會主義一二二頁）

同時，烏里雅諾夫對於此公式又復加以具體的補充，他在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權主義一文中曾說：

「封建制度是建築在自然經濟與農業風俗統治的形式上，在某種形式上，使農民附屬於土地，即爲中國封建制度剝削農民的源泉。所有的封建諸侯與君主，都是這種剝削制度之政治表現。而君主是爲此種政治制度的一個首領。」（見中譯本民族革命論六四頁）

這兩位唯物論的大師，他倆替我們立下了確定農村自然經濟的公式，這的確是給我們分析農村經濟以最有力的武器，我們將利用此武器而奠定關於自然經濟的認識，首先在思想上肅清一切反動的雲霧，使人們了解這一個明白的概念。

第二，關於農村自然經濟崩壞的原因，亦復是遭受了人們的謬解與隱瞞，我們在未說明正面的意見以前，不得不先來介紹那大名鼎鼎的李達教授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原因』之幾個爲事實所鞭撻的觀點。

李達教授認爲農村經濟破產的原因主要的有下列三點：

A.帝國主義的侵略；

B.封建政治的剝削；

C.土豪地主的剝削；

他在說明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農村濟經破壞的關係中，雖然是正確的前提，然而他偏得出錯誤的結論。他說：

『中國本是一個農業國，在海禁未開以前，人民的生活資料，大都取之於土地以自給，但自帝國主義侵入以後，這自給的農業經濟就漸被破壞，農民的痛苦也日見增加……！』（見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三九——四〇頁）

不錯！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農民的痛苦是日見增加，這誠然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在一九〇〇年那有名的義和團的暴動，便證明中國窮鄉僻壤的農民對於帝國主義的侵入與他們所受的痛苦的

聯繫，已經是家喻戶曉了；雖然，他們的行動帶了不少的盲目排外的成份，但幷不因此而減少了牠反帝國主義鬬爭的價值，這一點，我想李達先生也會首肯吧!?不過，中國是不是一個『農業國家』（即重農主義的國家）?是不是在海禁未開以前『人民的生活資料，大都取之於土地以自給』?是不是自帝國主義侵入以後，這自給的農業經濟就漸被破壞呢?

所有這些問題，的確值得我們的研究!

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在當時社會的母體內，就誕生了破壞農村經濟的商業資本，牠——商業資本發展到了元朝可以說是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而造成了大規模的國際市場，在商業征服的條件之下幷獲得了許多亞洲殖民地。關於農業國家的觀點，我想如果以唯物史觀的眼光去細心觀察中國歷史的人們，一定會有所憬悟而反對自己。至於『在海禁未開以前，人民的生活資料，大都取之於土地以自給』，根據李達先生『農業國』的觀點，實是必然的邏輯；其實，這種邏輯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不僅在十八世紀以前，人民生活資料之源泉沒有簡單的依賴於土地自給的事實，甚之，於耶穌誕生的時候，中國的農村經濟已經不能從市場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

其次，便是什麼『封建政治的剝削』!?

李達先生說：『封建政治的剝削，古來也是有的，但決沒有像最近幾十年這樣厲害……!』（見

同書四四頁）以此種意見觀察，則現在是更加封建了！我們并不否認現在農村中的剝削關係，還保持了許多封建殘留的形式，然而牠僅僅是資本主義的附庸；至於李先生所想像的『封建階級』這一古董，牠很早就爲歷史送到『博物院』去了，現在誰企圖將牠從『博物院』再搬到現代舞台，那不過表示他自己想和歷史開玩笑能了！

李先生爲切合自己觀點起見，不能不羅列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實以表示大學教授的淵博，於是乎『銀行票幣的倒賬』與『軍閥戰爭』都是屬於封建政治剝削的一欄了，他以爲銀行的票幣倒賬完全由於軍閥的籌款，而軍閥實是封建的象徵；殊不知在一九一四——一七年第一次世界戰爭以前，中國是沒有軍閥的存在，『軍閥』是國際帝國主義分贓戰爭對中國影響的後果。『軍閥』是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形成的，牠一方面代表某一帝國主義國家的勢力，另一方面，因中國幅員的廣袤，牠又代表該地土著的資產階級；軍閥制度的存在，很明顯的表示出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加深，而軍閥戰爭，更顯示出某一帝國主義國家要想在中國獲得更多的利潤，因而排斥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而企圖在自己的支配之下來統治中國。當然，我們這裏并不是說：不斷的軍閥戰爭，就表示統治階級不斷的崩壞，也不是說帝國主義可以利用其他的方式而消滅軍閥戰爭；須知這些問題牠固然要根據國際的形勢來決定，而國內具體的歷史的環境也會給他以影響；我們不能在此地像李達先生一樣，預先畫好了一個圈子，

使自己站在內面去毀軍閥戰爭，因爲這種行爲實在是等於爲自己的思想路線立下了一道牆壁，當心啊！牠會碰碎我們的頭顱！

最後，他在說明土豪地主到剝削農民的過程中，竟異想天開的發明了一種所謂『紳士階級』，構成這一階級的分子是社會上那種成份呢？據李達先生說他是『農村中間的大戶』。像這樣含義模糊『囫圇吞棗』似的辭句——『農村中間的大戶』，究竟是指富農呢？還是指地主呢？他是沒有說明，我們以爲『紳士階級』這一名詞，不僅在社會科學術語的詞典中尋不到，就是在理論與實際方面都沒有這個東西！

現在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原因，我們可以提出一種帶發軔性的意見以供留心農村經濟人們的探討。國際土地問題專家——考茨基，他曾經告訴我們說：『現代的農業經營中發現出兩個主要的事實：一是土地私有權，一是農產的商品性。』這兩個事實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很早以前就表示出來了，在秦朝統治的時候，不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即土地私有權的確立），同時大部分的農產亦帶有商品的性質。我們把握着這一問題的關鍵，便可以從經濟方面了解農村經濟崩壞的原因及其趨向了；很明顯的，當國際帝國主義未和中國見面以前，商業資本在中國已經是長足的發展了，關於此種發展對於農業的意義，考茨基對牠有以下的估量：

。

『經營現代的農業，不可沒有貨幣，或可以說，不可沒有資本；因爲在現代的生產方法底下，不論多少貨幣，只要不是作爲個人消費之用的，都可以而且往往會變成資本，變成可以產生剩餘價值的資本！』（見考茨基著宗華譯近代農村經濟的趨向第一頁）

因此，現代農村經濟崩壞的主要原因，幷不是由於什麼『封建政治的剝削』，恰恰與李達先生所說的相反，而是資本主義（指近三十年）發展的後果；我們看有名的馬克斯主義經濟學者——考茨基怎樣在反覆的說明這個問題：

『我們决不能把資本主義的地租和那過去的封建地主所加在農民身上的負担混淆起來。後者在整個中世紀的時代原本多少與地主所執行的那些重要職能相適應的；這些職能後來就由國家來代替，因此農民就必須對國家納稅。當時的地主必須注意裁判上的組織，供養警卒，代表他的農奴對外的利益，用武力來保護他們，替他們在軍事上服務。可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土地所有者，却是什麼都不管。地租如果是差額的，那就是由競爭所產生；如果是絕對的，就是由壟斷所產生。不論在第一種和第二種場合中，地租是歸於土地所有者，幷非任何社會機能的結果，而惟一的是土地私有權的結果。』（見同上書四十四——四十一頁）

同時，他又說：『土地私有權因爲地租的增長，而成爲使勞動階級貧窮的最大的泉源！』

於此，我們從農村經濟崩壞的過程中，很充分的看出了牠的趨勢：土地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裏；此稱土地集中並不是一件全無意義的事情，牠對於未來的革命以及農村經濟實含有決定的意義，因此，考茨基對牠更作如下的診斷：

『土地所有權（在租佃經營中）的集中程度愈高，或者抵押（在自田經營中）之集中於少數人手裏愈厲害 則形成消滅的條件亦愈早！』（同上書五八頁）

我們根據這些原則的觀點去把握現代中國農村經濟，在理論的決鬥場中，誠然是展開了我們的陣容，對於目前中國農村經濟與土地問題，我們將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武器來作進一步的分析，我想在這一工作中間，必然不可避免的要遇到許多理論上的敵人！

但是，我們爲忠於眞理起見，對於現代中國農村經濟的祕密將要盡情的暴露，不管官樣文章的統計怎樣的隱瞞與統治階級的學者怎樣的欺騙，而農村中的階級結構總是擺在羣衆的面前。

## 第二節 土地分配的形態與農業人口之階級結構

在正確的土地統計材料缺乏的今日，我們要研究中國的耕地面積究竟若干？分配在各省的狀況如何？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爲依據現在人間的材料——過去北京農商部的統計，誠然是等於

「問道於盲」！牠那種充滿了虛僞的官僚精神的統計，拜不是根據於實際的調査，而恰恰相反，完全是官塲敷衍的結果。關於這一點，不僅是蘇聯的赤色教授——馬札亞爾在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一書的第一章中，加以嚴厲的糾正，同時，任曙君在他最近出版的中國經濟研究緒論第六章中，對於那些胡亂抄襲不正確統計的朋友，更加以無情的批判。我們對於全國土地面積之正確材料的獲得，祗好期諸異日，不過雖然在這些官樣文章的統計裏面，有時候也相當的洩漏了一些關於中國土地分配形勢的祕密；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土地分配的情形，便有如下表：

| 所有土地的數量 | 戶口數量 | 百分比 |
| --- | --- | --- |
| 十畝以下 | 一七、八〇五、一二五 | 三六・一% |
| 十畝以上 | 一三、二四八、四七四 | 二六・九% |
| 三十畝以上 | 一〇、一二二、二一四 | 二〇・五% |
| 五十畝以上 | 五、三四八、三一四 | 一〇・八% |
| 一百畝以上 | 二、八三五、四六四 | 五・七% |
| 合計 | 四九、三五九、五九一 | 一〇〇% |

從這個統計裏面，我們可以看出來的：貧農在人口數量的百分比上，他是佔着多數；但同時在廣東省的統計上，那十畝以下的戶口數目，又推翻了上列的統計，牠那種階級分化的情形，從乾燥的數目字表示得異常明顯：

| 耕地面積 | 戶口數量 | 百分比 |
|---|---|---|
| 十畝以下 | 二、〇八三、二五二 | 五三・〇% |
| 十畝以上 | 九六二、一〇七 | 二四・五% |
| 三十畝以上 | 五三三、二二一 | 一四・一% |
| 五十畝以上 | 二四三、〇四〇 | 六・二% |
| 一百畝以上 | 八三、五八七 | 二・二% |
| 合計 | 三、九二六、二〇七 | 一〇〇% |

在這裏，人們一定會非難，說這是廣東一省的統計，廣東是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地方，牠是不能代表中國整個農村土地分配的傾向，然而武漢時代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調查，總會答覆這一責問吧：

| 農民類別 | 畝數標準額 | 人數 | 佔有數 |
|---|---|---|---|
| 貧農 | 一畝至十畝 | 四四% | 六% |
| 中農 | 十畝至三十畝 | 二四% | 一三% |
| 富農 | 三十畝至五十畝 | 一六% | 一七% |
| 小地主 | 五十畝至一百畝 | 九% | 一九% |
| 大地主 | 一百畝以上 | 五% | 四三% |

地主——大小地主，在農村人口總數中，祇佔百之十五，而其佔有的土地，竟達百分之六十二，關於農村中階級分化，這總算是一幅最好的諷刺畫圖了！

我們從這許多土地分配的統計中，很清楚的看出了土地集中於少數人手裏的趨勢，而中小農民却是一天天的破產；牠們爲與生活的命運奮鬥起見，不得不作過度的勞動，此種情形，誠如考茨基所說的一樣：「他的這種很小的農業經營，無論怎樣的不合理，無論怎樣的無利益，可是他還是要緊緊的握着，正如他的妻子對他可憐的家庭經營不肯放手一樣。這種……經營化了浩大的勞動力，而所換得的結果却是無限量的貧窮！」（見宗華譯近代農村經濟的趨向第六十六頁）因此，在耕地的人口密度

方面，中國要佔遠東的第一位，據華洋義賑會對於浙江，江蘇，安徽，山東，直隸二百四十個農村的調查，每一平方英里所生活的人數，發現了下列令人驚異的數目字：

| 省別 | 縣別 | 鄉村數目 | 人口數目 | 耕地面積 | 每平方里所生活的人數 |
| --- | --- | --- | --- | --- | --- |
| 浙江 | 鄞縣 | 一 | 二八六 | 一、一三六・四 | 二、二七〇 |
| | | 四 | —— | 二、九七一・六 | 四、六〇五 |
| | | 一 | —— | 四七四 | 六、八八〇 |
| 江蘇 | 宜興 | 五 | 二、〇八四 | 四、一二〇 | 一、七七〇 |
| | 江陰 | 一七 | 三、四一四 | 五、九〇〇 | 二、〇五〇 |
| | 吳江 | 二〇 | 一、三七二 | 四、九三一 | 九八〇 |
| 安徽 | 壽州 | 一二 | 三、四七八 | 二八、八四三 | 二九〇 |
| 山東 | 昌化 | 二 | 五、八五九 | 一一、八六七 | 三、〇〇〇（註） |
| 直隸 | 遵化 | 一八 | 九、〇八五 | 二〇、〇七三 | 二、〇一〇 |
| | 定縣 | 二四 | 六、一七七 | 二四、三六九 | 九一五 |

| 邯鄲 | 一八 | 四、三三六 | 二五、五〇六 | 六九〇 |
|---|---|---|---|---|
| 磁縣 | 一〇 | 三、三六三 | 二二、〇六〇 | 六五〇 |
| 南樂 | 五 | 三、〇二四 | 七、五三〇 | 一、四五〇 |

（註）這個數目字很可疑，因為他的畝的單位不正確，假使照一般的面積來計算：山東每個地方的密度是平方英里可生活一八〇〇人。（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二九頁）

由土地關係的變動所反映於農村社會結構的變動，是異常的迅速和明顯，我們祗就佃農與雇農數量的增加，便可領略到變動的意味。首先我們就佃農來說吧，各地的情形雖有不同，要之，他在農村人口的數量上實含有重要的意義，很多的朋友都說中國是自耕農式的小農經濟，他們如果看到下列數目字，或許會感覺得自己的錯誤吧：

| 所在地 | 百分數 |
|---|---|
| 海門 | 五〇% |
| 長沙 | 六〇% |
| 湘潭 | 六〇% |

| | |
|---|---|
| 武進 | 四六% |
| 靖江 | 九五% |
| 松江 | 六〇% |
| 合肥 | 七〇% |

（註）此表根據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六號農民狀況專號改製的。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地方，佃農的數量更佔絕對大多數，僅就廣東江蘇兩個經濟中心的省份而論，其百分比的調查有如下表：

| 廣東 | | 江蘇 | |
|---|---|---|---|
| 1. 廣州及其鄰近 | 九六・四% | 1. 崐山 | 九二・〇% |
| 2. 河南 | 九四・九% | 2. 南通 | 八七・〇% |
| 3. 中部五縣 | 八五・〇% | 3. 蘇常道 | 七八・〇% |
| 4. 廣大調查諸縣 | 八五・〇% | 4. 滬海道 | 七〇・二% |
| 5. 廣大調查七縣 | 七〇・〇% | 5. 儀徵江陰吳江 | 六七・四% |

| | | | |
|---|---|---|---|
| 6. 東江十二縣 | 六五・〇% | 6. 鎮江 | 五五・〇% |
| 7. 全省 | 七〇・〇% | 7. 金陵道 | 四九・一% |

其次，我們再來介紹農村中間一些雇農成份。關於這一種『農業工人』的數量，向來是為人們所忽視，現在我們將牠羅列起來，一定會刺激人們的眼睛：

| 省別 | 縣別 | 佔全體農民百分數 |
|---|---|---|
| 湖南 | 寶慶 | 二〇% |
| | 靖縣 | 二五% |
| | 東安 | 一五% |
| 江蘇 | 海門 | 八% |
| | 宜興 | 五六% |
| | 武進 | 一二% |
| | 句容 | 一九% |
| | 靖江 | 一二% |

| 浙江 | 松江 | 一〇% |
| --- | --- | --- |
| | 鄞縣 | 五〇% |
| | 義烏 | 二〇% |
| | 衢州 | 一五% |
| 廣東 | 五華 | 一〇% |
| 安徽 | 合肥 | 一二% |
| 湖南 | 長沙 | 三〇% |
| | 湘潭 | 三〇% |

（註）此表係根據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十六號農民狀況調查專號及李麥麥編譯中國經濟其發展其現狀及其危機二書改製的。

根據上述的材料，我們確信農村中間階級結構的變動是鐵一般的事實，誰反對這一事實，他就表示與真理絕緣！此種變動的發展究竟是朝着什麼方向呢？在這裏新思潮派的理論中心——吳黎平，企圖披上馬克斯的外衣而爲資本主義哭窮；他在中國土地問題一文中，曾經說出了像夢囈一樣的讕語：

『（一）在成立租佃關係時，佃農事實上并無自由決定之可能（這是吳黎平的當面說謊——農）。一切決斷之權，操之於地主，在承攬約中，甚之規定佃戶須永遠服從地主指揮。地主可以任意壓迫驅逐佃戶，佃戶不得隨意更易土地。這證明中國大部份租佃關係，帶着強迫的性質！（二）極大部份租佃關係，帶着極濃厚的農奴制的氣味（強迫佃農暇特爲地主服役，規定佃戶終身須受地主指揮），雖然表面上并沒有刻着律條，說佃農一定要羈絆於土地之上，但事實上，絕大部份佃農（在滬海道，即上海附近區域，甚之說百分之九十）是終身作佃戶（在許多地方，如湖南甚之公然受佃約的束縛），這指示大部份佃農實際上是被地主權力（政治的及經濟的）羈縛於土地之上。（三）這種租佃關係的主持者，很多是富商（商業資本）或者甚之爲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所操縱。但是這種資本家或股份公司對於佃農的關係，絲毫沒有變更，而且他們比較平常的地主還要刻薄和厲害！』（見新思潮第五期：中國土地問題第十六頁）

依據吳黎平的意見，我們可以得着三個結論：（1）租佃關係是『農奴制』的關係，是現在農村中階級對立的主要內容；（2）農村階級結構的變動，是帶着更反動的性質，是倒轉歷史的車輪：（3）資本主義式的股份公司，對於農村階級結構，是『絲毫沒有變更』的作用與意義。這樣的提出問題，當然會得到極不光榮的反響。

第一，租佃關係，在某些地方仍保持了一種殘餘的農奴制的形式，於整個的農村經濟中是很微末的事實，然而我們並不能因此即說中國租佃關係是農奴制的關係。他們將貨幣交租這一最重要的現象不去把握，而死死的守着什麼「穀產交租」，然而在商品經濟的社會內面，農產品本身也是商品形式之一種，如果是「農奴制」的租佃關係，那麼地主對於土地的願望即與此有所不同了。在這裏吳黎平一定要和我們辯論：「我所分析的是中國」，其實：「在任何古老的國家中，土地所有者都形成了一種壟斷；土地所有者如果得不到他的土地的租金，他便能夠阻止耕種。在那些地方，每塊土地所有者都能取得租金，就是那些不能產出差額地租的最壞土地的所有者亦想享有租金！」（見考茨基著宗華譯：近代農村經濟的趨向第三十五頁）

第二，以開倒車的眼光去觀察農村中階級結構的變動的方向，他那粗劣的玻璃眼鏡，竟害得他雙目失明，於是乎祇好瞎說什麼「在滬海道，即上海附近區域」農村中「百分之九十」的農民「是終身作佃農」？我想吳黎平雖然是因為帶了玻璃眼鏡的關係以致雙目失明，然而耳朵絕不會聾吧，資本主義這一怪物已經向農村中叫來八十萬產業工人於上海，在「上海附近區域」的無錫常州之數十萬的工人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麼？不是的！他們都是過去「終身作佃戶」的朋友？

那無錫常州一帶之「響徹雲霄」的工廠汽笛現在這樣的叫着：

吳黎平呀！你想像的『終身作佃戶』的朋友已到我這裏來了！

吳黎平呀！我已替你的朋友（佃戶）改變了他們的本質！

第三，『資本主義式的股份公司』牠在農村中間確實是改變了階級結構，牠雖然意智殘酷，創造了新的剝削方式，使農民生活更加痛苦，有時候牠爲的要增加其生產量起見，間或一試其含有強迫意味的身手，然而牠在整個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實有進步的意義；否則，未來的革命的農業的建設是很困難的事情。我們能不能拋棄了現成的人間的材料而轉求於自己的腦殼呢!?

據說：新思潮派是以馬克斯主義的旗幟相標榜，請看馬克斯怎樣的在嘲笑他們：

『這派社會主義，把近世生產狀況中許多矛盾的地方分析得非常精密。它把經濟學者所僞造的辯解駁斥得非常明顯，它把機器和分工所產出的惡結果，像資本和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生產過度和恐慌等事，論證得非常有力，它把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必然零落，無產者的悲慘，生產界的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國家間相互角逐的產業鬥爭，舊道德家庭關係舊國粹的崩潰，都明白的指示出來了。但是這一派的社會主義，它的積極的目的是想把生產交換的舊方法和舊的財產關係，舊的社會狀況恢復轉去；不然，就是想把近代的生產及交換方法，裝到舊的財產關係的殼子（實在是已被新方法破壞了，或是將要破裂的殼子）裏去，這兩樣都是復古的，空想的。……但是到了歷史強悶的事

實早已把他自欺的醉夢打消時，這派社會主義也就到了悲慘的末日！」（共產黨宣言）

中國農村階級結構的變動究竟向着什麼地方呢？

## 第三節　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

中國農村中階級結構變動的趨勢，很明顯的是針對着歷史進化的方向，即是說在農村經濟中間，商業性的農業獲得了充分發展的機會。關於這一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不僅沒有引起社會人們廣大的注意，甚之，就是我們政治上的戰友對牠也沒有加以考查；其實，我們假使放棄了這一重要現象而不去把握，那麼，我們將會受事實的揶揄。然而從什麼地方去考察呢？根據唯物史觀的定律，生產方式是一個主要的標誌。根據這一觀點，因此，我們可以介紹一些農業機器進口的數目字於讀者之前：

| 年份 | 進口額（單位千兩） |
| --- | --- |
| 一九二五 | 一六一 |
| 一九二六 | 五一二 |
| 一九二七 | 六六六 |

一九二八　　七四三

一九二九　　一・四〇七

從這五年來逐漸增長的海關農業機器進口報告的數目字中，異常明顯的表示出資本主義關係在農村中間之長足的發展；當然，我們還要并不否認，此種發展尚未達到完全推翻舊的生產技術的程度，但是，牠在農村經濟的作用，是不容人們抹煞的。

現在，我們除了描寫農業機器進口而外，再進一步來研究農村工業化的具體形態。關於農村工業化的關係之表示於產業方面的，首先便是蠶絲。

遠在數千年以前，中國的蠶絲已著名於世界，在十九世紀初期，世界蠶絲市場完全為中國所獨占，迄於現在，國際蠶絲市場因發生對手方的角逐，主要的是與日本及法義等國競爭，於是乎中國資產階級便竭蹶圖存以謀絲業的發展。在適應國際市場的條件之下，育蠶工業在農村經濟方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在江蘇的：武進，無錫，江陰，震澤，宜興，溧陽，金壇，鎮江，南京，通州，丹陽，如皋，泰興；浙江的：杭縣，安吉，餘姚，昌化，富陽，嘉善，武康，上虞，嘉興，蕭山，新城，海寧，嵊縣，諸暨，餘杭，崇德，吳興，南潯，湖州，硤石等縣，許多的農村，農民們寧願放棄了灌溉田禾的任務，而從事於育蠶的工作。故而沿京滬與滬杭路的兩旁，桑林櫛比，幾幾乎遮沒了田

禾：，他若廣東，四川，湖北，河南，山東，安徽，湖南，廣西等省，養蠶在農村中間也是很普遍的事情。關於全國之絲的產額，究竟每年生產若干？因向無確實的統計，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就日本農商務省技師明石宏的推定，關於中國蠶繭產額有如下表：

| 省別 | 產量 | 備註 |
|---|---|---|
| 浙江 | 八七六、七六六担 | (一)機器繅絲用　一七八、三二九担 |
| | | (二)白經絲用　二〇八、七一七担 |
| | | (三)出口白絲用　三一、〇一八担 |
| | | (四)地方消費白絲用　三五八、七〇二担 |
| 江蘇 | 二六六、七四九担 | 繭行售出　七一、一三〇担 |
| 安徽 | 三〇、〇〇〇担 | |
| 湖北 | 一〇〇、〇〇〇担 | 漢水上游產繭三百萬斤黃州一帶二百萬斤其他各處五百萬斤合計一千萬斤 |
| 湖南 | 一六、〇〇〇担 | 上海日人實業協會之推定 |
| 四川 | 六四〇、〇〇〇担 | 英國總領事的調查 |

| 山東 | 七〇、〇〇〇担 | 就主要產地之產額推定 | |
|---|---|---|---|
| 廣東 | 七六八、三〇〇担 | (一)本省機器繅絲用 | 五三七、八一〇担 |
| | | (二)各地消費用 | 二三〇、四九〇担 |
| 廣西 | 一二、〇〇〇担 | | |

這一統計，有幾個可疑的地方：第一，爲什麼江蘇省比四川要一少倍多？第二，整個的統計數目，似失之過少？因中國人口衆多，奢侈的程度很高，而絲之國內市場的銷售額，一定爲數甚鉅；然我們於此表中間對於牠在中國農村經濟中的重要性，可以窺見一斑了。

其次，是茶葉在農村經濟中的作用。

茶葉，中國對外貿易上向佔重要部門，這在很久以前之滿清咸同之間，關於十數省區產茶區域所製之紅，綠，青，白四種茶品，每年出口約四百萬石，總計所值達六千萬有奇。在一九一五年僅就兩湖出口而論，其價值亦有一千五百萬元；惟因「我國茶農對於種植知識，大多未曾具備，栽培既不周密，管理更爲疏忽；而對於剪枝施肥灌溉採摘諸端，均未加以深刻之研究，任其葉老枝枯，不施以人

工之補助，以致生產日形減縮，品質日漸退化！……」（見工商部工商公報第十七期近年華茶由漢出口暨貿易狀況調查報告一文）故近年來在國際市場方面不免稍受挫折，加以因政治關係與蘇聯絕交，更失掉了一個重要的國際市場。然而僅就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由漢口海關所出口的華茶貿易統計來看，牠在農村經濟中的作用，仍是未可忽視；玆將貿易統計表列如下

| 年份 | 茶別 | 售出箱數 |
| --- | --- | --- |
| 一九二七 | 九江茶（祁門） | 八一、五八三箱 |
| 一九二七 | （甯州） | 一八、六五九箱 |
| 一九二七 | 漢口茶 | 一七五、六五二箱 |
| 一九二八 | （祁門） | 一〇三、二八五箱 |
| 一九二八 | （甯州） | 八三、〇〇〇箱 |
| 一九二八 | 漢口茶 | 二四六、三五六箱 |

雖然，上表不過指出對外輸出數目字之增加，而關於茶的類別及輸出總值尚未提及，玆再錄一九二八年全年由武漢出口茶葉統計如下：

| 種類 | 担數 | 值關平銀 |
| --- | --- | --- |
| 工夫紅茶 | 一一〇、一六八 | 三、九三六、五七七兩 |
| 其他紅茶 | 八、一四九 | 三八〇、八七五 |
| 熙春綠茶 | 一一 | 四六二 |
| 雨前綠茶 | 一三 | 一、〇八七 |
| 其他綠茶 | 一、三〇三 | 四一、三四九 |
| 紅磚茶 | 一四九、七五〇 | 七、九〇四、八六一 |
| 綠磚茶 | 二五三、〇六五 | 三、七六三、〇七七 |
| 毛茶 | 八六、七〇四 | 一、四三二、一七四 |
| 花燻茶 | 一 | 四〇 |
| 茶末 | 八五七 | 六、三一六 |
| 茶梗 | 七、六〇三 | 四一、八一六 |
| 木梗茶 | 四、九〇一 | 五六、九九九 |
| 帽盒茶 | 一、三二六 | 八、六一九 |

| 小京磚茶 | 四〇六 | 九、〇三三 |
|---|---|---|

根據上列統計，我們不僅可以看出茶爲商業性的重要農產品之一，同時在對外出口貿易上亦復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很明顯的，這些對外輸出的數目字，都是成千成萬茶農血汗所造成的，茶商於這中間剝削了他們的剩餘價值而使自己肥胖起來。

成爲商業性農業第三環的農產品便是鹽。

本來鹽爲一種礦質的結晶，從其形式方面觀察，應當屬之於手工工業，然而事實上參加鹽之製造工作的社會成份，百分之九十九都係沿海的農民。這一類特殊的農民，散佈在中國沿海各省，其數量實有數千百萬之衆，他們因爲處於特殊的地域——鹵質地帶，在未開墾以前，其土地既不宜於種植稻麥，即雜糧也很難生長，特殊的歷史環境逼得這一類的農民祇有引海水製鹽以爲活。中國的製鹽業，在數千年以前已經是規模具備，現在廣大的鹽民也就是繼承他們歷史上的事業；鹽業雖分作海鹽，井鹽，池鹽三類，而海鹽的數量在社會生活中實有最大的影響。

關於海鹽的製造，有兩種形式：即煮鹽與晒鹽，在江蘇的鹽城與阜甯二縣，煮鹽是主要的形式，而其他各省，間有煮鹽與曬鹽的形式同時存在；就其工作的性質而言，從事於煮鹽的農民爲之「灶民」，而其總稱則仍爲「鹽民」。至於這大羣鹽民生活的痛苦，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著者前曾一度

作實地的調查（指江蘇江北沿海各縣），才發現農村中間還有這種非人生活的祕密。

第一，在新式的鹽墾公司未有成立以前，關於海濱淤塞地佔有的方式——是「插草爲標」，因地近海濱，人口稀少，對於淤塞的土地可以隨便的「占有」，而以確定自己的土地所有權很少碰到競爭者（指三十年以前江蘇江北鹽阜一帶）那一望無際的蘆葦，可以供煎鹽之用。雖然，他們還是要受鹽商的剝削！自鹽墾公司成立以後，那班寡廉鮮恥見利忘義的資本家，嗅着這是大利所在的祕密，於是乎便和狗爭骨頭的一樣，而成羣結隊的跑到農村中來。他們利用政治的經濟的力量，在整頓鹽務的美名之下，將沿海邊的土地都集中到自己的手裏；例如江蘇鹽城縣的太和公司，於股東之中，居然有三個總統七個督軍的名字。

第二，新式的鹽墾公司成立以後，爲鬥爭威嚇而採取的鎮壓政策（註：在鹽城當太和公司成立之初，強奪農民灶田，拆毀和禁止農民私灶，曾引起數萬農民之竭力的反抗與流血的鬥爭，但是因缺乏組織，這運動不久便爲政府軍隊壓平了），眞是毒辣異常：牠首先改變沿海鹽民的農村組織，解散了過去的村莊，而強迫農民實行散居制度的組織；如鹽城東海邊一帶，每隔半里之遙，才看見那一丈長八尺寬的丁字式的茅屋，屋裏面皆住有大小三四個面目黧黑的待罪的囚徒（這名辭是我起的，祇有牠才能確當的形容鹽民生活）！其實，他們是遇着了資本主義的大盜！

第三，勞動的結果，對於自己禽獸式的生活，還是時虞不濟；譬如江蘇江南沿海的鹽民，晒鹽要從鹽廟（或鹽場知事）裏去領取執照，每晒百斤鹽賣給鹽廟時，經過大秤只能算六——七十斤，每斤賣十七文或十八文，每天所得合計僅千餘文；如係租來的鹽板，還要出一半租金！同樣的，在東海灌雲一帶，還有一種鹽工，他們在鹽公司裏面作工，分五班場晒鹽，每人每月所得，僅僅是壞高粱數斗。灌雲鹽工，係分裏中外三種：裏灘月給高粱六斗，每晒鹽一担，給錢百文；中灘五斗，每晒鹽一担給錢六十或七十文；外灘四斗，每晒鹽一担給錢四十或五十文，據調查所得，像從事這樣工作的農民，最少有七萬至八萬的數量。

他們（指鹽民）間或賣一點「小貨」與私鹽販子，如果爲公司的鷹犬——公司衞隊及緝私營的士兵查到了，除了把鹽販毒打一頓將鹽沒收而外，還要將鹽販與鹽民共同拘到公司預設的土牢裏面，要他們飽嘗「鐵窗風味」！這還算不得什麼稀罕，最痛恨的，將鹽販與鹽民拘留以後，更罰其作笨重的苦工（如開河掘溝打包推車等工作），而每天祇給兩餐稀薄的粪粥——「猪食」與他們充飢。如果有人爲他們說情取保，那麼，首先的條件，每人補償公司方面三角大洋一天的伙食！

關於鹽民生活痛苦的情形，我們是不欲在此地多所列論，好在下面的一些數目字就中可以顯示他

們的血汗：

| 省別 | 產地 | 每年產額 |
| --- | --- | --- |
| 河北 | 天津豐財 | 二、五九〇、九八五担 |
| | 甯台蘆台 | 三、五一七、五八四 |
| | 灤縣石牌 | 九〇九、五二六 |
| 江蘇 | 南通呂四 | 八一、一五六 |
| | 南通餘中 | 九六、〇七四 |
| | 如皋豐掘 | 二一四、六六三 |
| | 東台拼角 | 二五一、七七六 |
| | 東台東河 | 三四二、六七〇 |
| | 東台安梁 | 三七一、九九〇 |
| | 東台丁溪 | 三四〇、〇〇〇 |
| | 東台草堰 | 三九二、一四〇 |
| | 鹽城伍佑 | 三六六、六五〇 |

| | |
|---|---|
| 鹽城新興 | 三一九、六三一 |
| 阜寧廟灣 | 一〇五、八六七 |
| 灌雲中正 | 七、九三四、五六四 |
| 灌雲臨興 | 六二四、四六八 |
| 灌雲濟南 | 八八三、七二一 |
| 灌雲板浦 | 一、五三五、五一五 |
| 奉賢青村 | 五、〇〇〇 |
| 奉賢袁浦 | 九九、二二一 |
| 金山兩浦 | 七、七五七 |
| 崇　明 | 未詳 |
| 南匯下沙 | 未詳 |
| 遼甯 | |
| 興城興綏 | 三一六、五九三 |
| 北　鎮 | 三七三、六七八 |
| 盤　山 | 六六五、七一四 |

| | | |
|---|---|---|
| | 復　縣 | 一、九四二、八七五 |
| | 莊河莊安 | 四一八、八四二 |
| | 營口營蓋、 | 二、一六八、一九三 |
| | 錦縣錦西 | 七六六、七〇六 |
| 山東 | 廣饒王官 | 三、〇八〇、一〇二 |
| | 日照詩維 | 七八、一一八 |
| | 掖縣西繇 | 二六〇、九〇〇 |
| | 卽墨石河 | 九八、八〇〇 |
| | 昌邑富國 | 一三一、九五〇 |
| | 霑化永利 | 一五一、六九八 |
| 福建 | 福　清 | 一一、六六七 |
| | 福清江陰 | 八二一、三三三 |
| | 思明浯州 | 一〇〇、〇〇〇 |
| | 莆　田 | 二〇〇、〇〇〇 |

| | |
|---|---|
| 蒲田下利 | 一、〇〇〇、〇〇〇 |
| 蒲田前江 | 九六六、六六七 |
| 晉江潯美 | 三九〇、〇〇〇 |
| 南安蓮河 | 六〇〇、〇〇〇 |
| 惠　安 | 五三六、六六七 |
| 同安祥豐 | 一六三、三三三 |
| 漳浦浦南 | 四六六、六六七 |
| 詔　安 | 一、三〇〇、〇〇〇 |
| 浙江 | |
| 海甯黃灣 | 九二、四九七 |
| 平湖蘆瀝 | 一四、三二一 |
| 鹽海鮑郡 | 二六、五一九 |
| 上虞金山 | 一二〇、〇〇〇 |
| 紹興三江 | 一六三、八一七 |
| 紹興東江 | 七二一、二二七 |

| | |
|---|---|
| 紹興曹娥 | 四九、二八〇 |
| 餘　姚 | 二五九、〇〇〇 |
| 蕭山錢清 | 一一、〇〇〇 |
| 鄞縣大嵩 | 九、〇〇〇 |
| 慈谿鳴鶴 | 一六、五五八 |
| 鎮海穿長 | 一〇、五〇四 |
| 鎮海清泉 | 一九、三七六 |
| 象山玉泉 | 六七、七九〇 |
| 定海岱山 | 六八六、〇四五 |
| 溫嶺黃岩 | 一三、八一三 |
| 臨海長亭 | 三〇、七九〇 |
| 臨海杜瀆 | 一一、二六五 |
| 永　嘉 | 五、九四六 |
| 樂清長林 | 一〇五、〇〇〇 |

| | |
|---|---|
| 瑞安雙穗 | 一五八、六五七 |
| 杭縣仁和 | 四六、四六六 |
| 海甯許村 | 六五、二四〇 |
| **廣東** | |
| 海牛墩白 | 九六八、〇〇〇 |
| 惠陽淡水 | 一五六、〇〇〇 |
| 惠陽碧甲 | 三二二、一〇〇 |
| 陸豐小漪 | 七〇、〇〇〇 |
| 陸豐石橋 | 七二、八〇〇 |
| 海豐海甲 | 二六、〇〇〇 |
| 饒平東界 | 八三、四〇〇 |
| 饒平海山 | 八七、四〇〇 |
| 潮陽龍井 | 六五、八三二 |
| 潮陽河西 | 一八、五七八 |
| 潮陽招收 | 五、二〇〇 |

| | |
|---|---|
| 惠來 | 三七、二二〇 |
| 台山上川 | 九、〇〇〇 |
| 陽江雙恩 | 四三、二〇〇 |
| 電白電茂 | 六五、三〇二 |
| 電白博茂 | 八六、二八七 |
| 烏石 | 未詳 |
| 合浦白石 | 三七、〇〇〇 |

（註）上表係從工商公報第十四期中國工業品原料誌略第六頁至九頁引來。

我們在上引的諸大的數目字中間，對於鹽在農村經濟中的作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中國經濟中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除了絲，茶，鹽象徵而外，近年來棉田面積之逐漸增加也是一個主要的象徵。據華商紗廠聯合會的報告，主要的產棉省分爲江蘇，河北，安徽，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十一省，於一九三〇年最後的統計，總計全國棉田面積爲三千七百五十九萬三千零十二畝，共產皮棉八百八十萬零九千五百六十七担，其數目之可驚，不禁令人聳肩咋舌！茲將五年來全國棉田與產額逐漸增加的趨勢，列如下表：

| 年別 | 棉田面積（單位畝） | 產額（單位担） |
|---|---|---|
| 一九二六年 | 二七、三四九、七二七 | 六、二四三、五八五 |
| 一九二七年 | 二七、六一〇、二七六 | 六、七二二、一〇八 |
| 一九二八年 | 三一、九一六、三一三 | 八、八三九、二七四 |
| 一九二九年 | 三三、八一一、二五五 | 七、五八六、九五八 |
| 一九三〇年 | 三七、五九三、〇一二 | 八、八〇九、五六七 |

（註）上引統計，見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申報。

很明顯的，全國棉田及其產額逐年增長的原因，主要的由於許多墾牧公司與公私農場努力的結果。僅就江蘇來說吧，在農場方面的有金陵大學農場，中央大學農場，胡氏農場，天德農場，鎮江潤澤農場等，他們對於棉種的研究與植棉的宣傳，都是不遺餘力；而江蘇的墾牧公司在沿海一帶更實際的執行這一工作，凡沿海邊所開墾的土地都是種植棉花。從南通呂四起至阜甯陳家港止，南北長七百里，東西寬約百里，共約二千萬畝，均爲未來之棉區；因此，一九二九年江蘇省政府曾議發行公債二千五百萬元與各墾牧公司聯合整理；據其統計，如將墾牧公司整理以後並推廣徐淮海及甯鎮各區之植棉，那麼，在江蘇可以立卽增加五百萬畝棉田。

由此，我們可以看得出：在農村經濟與土地關係過程中，資本主義是表示了很大的力量！他若烟葉與大豆的種植，亦是表示農村經濟之適應市場以及受市場支配的深刻，在東北尤其是滿洲一帶，大豆占對外貿易的第一位；在江蘇的北部與夫山東的濰縣河南的信陽，常見數十里相望都是煙田，僅就民國六年江蘇全省所產的烟葉，已經達八七、〇六二、三一九斤！

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在農村中間究竟有些什麼影響呢？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是：工業原料品的種植，排擠了食粮，因此，在許多著名的產米區域都鬧着「米荒」，而「洋米」的進口，更是一帆風順了。關於「洋米」輸入各省的比較情形，我們可以介紹一些數目字於讀者諸君之前：

| 年次／進口數量（担）／省別 | 民國元年至十年（一九一二—二一） | | | 民國十一年至十七年（一九二二—二八） | | |
|---|---|---|---|---|---|---|
| | 合計 | 平均 | % | 合計 | 平均 | % |
| 廣東 | 五三、〇五三、九三六 | 五、三〇五、三九四 | 八二 | 一七、七七五、七七七 | 二、二一〇、五三九 | 六五 |
| 東三省 | 四、一〇三、八一〇 | 四一〇、三八一 | 六 | 一、一六七、二四〇 | 二三六、七四九 | 一 |
| 福建 | 三、九七四、八五三 | 三九七、四八五 | 六 | 一五、八九五、四一七 | 八四三、二〇三 | 五 |

| | | | | | | |
|---|---|---|---|---|---|---|
| 直隸 | 二、二七三、八四六 | 二二七、三八五 | 四 | 八、〇八八、九五五 | 一、一五五、五六五 | 七 |
| 山東 | 八四三、九五四 | 八四、三九五 | 一 | 一・七八二、三〇八 | 二五四、六一五 | 一 |
| 雲南 | 三九八、〇三三 | 三九、八〇三 | 一 | 九八五、六八一 | 一四〇、八一三 | 一 |
| 廣西 | 一四五、九二七 | 一四、五九三 | — | 二三九、〇七五 | 三四、一五四 | — |
| 浙江 | 三二〇、二三四 | 三二、〇二三 | 一 | 六、七四八、七九七 | 九六四、一一四 | 六 |
| 江蘇 | 五九、八〇〇 | 五、九八〇 | — | 一四、二四三、九七〇 | 二、〇三四、七一〇 | 三 |
| 湖南 | 三七 | 四 | — | 五、二三一 | 七四七 | — |
| 湖北 | — | — | — | 二、一六五、三一三 | 三〇九、三三〇 | 二 |
| 安徽 | — | — | — | 七、〇二八 | 一、〇一二 | — |
| 四川 | — | | — | 二、九九五 | 四二八 | — |
| 江西 | — | — | — | 一四八 | 二 | — |
| 共計 | 六五、一七三、四二九 | 六、五七、二四三 | 100 | 一一九、五三四、九八三 | 一七、〇七四、九九八 | 100 |

（註）此表係引自中國經濟研究緒論第一九六頁

在資本主義發展愈快的地方，其消耗洋米的百分比亦愈高，這裏是很顯明的證明了農村生產已經不是簡單的生產米麥而更進一步的生產工業原料了。但是，張心一先生對於這一點却不願加以懂理，而諉之於「外國糧食的價格低」與「外國糧食的品質好」（見統計月報第一卷第九期第六頁）？可是，我們根據上面的分析，已經證明了事情決不是這樣的簡單，資本主義關係在農村中間的作用，的確是站在領導的地位，誰否認這一點，他就無法去了解農村中間綜錯複雜的現象。至於這一重要意義究竟在那裏呢？請看馬克斯的說明吧：

「擁抱着農業和工業的幼稚未發達的形態的原始家族的紐帶，已完全被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切斷了；但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同時又創造出用那互相對立而完成的農業和工業做基礎的，兩者的新而較高的綜合和給合之物質的前提條件！」

烏里亞諾夫對於馬克斯所說的「物質的前提條件」更加以辯證法的發揮與補充；他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曾說：「資本主義在農業人口以很高度的程度擴大了並尖銳化了一些矛盾，沒有這些矛盾這個生產方法便不能存在。但是，雖然如此，依照其歷史意義，農業資本主義在俄國還是個很大的進步力量！……資本主義打斷了農業的階級性，把土地變成了商品，農夫的產品拿去出賣，開始以地方市場，後來以民族市場，最後便以國際市場惹引社會的注意，這樣子，以前被封鎖的農夫

對於一切外界的關係都徹底地打破了。農夫不知不覺得到破產的恐嚇之下，以其社會關係的全部在其本國中，在一切外國中和國際市場發生了聯繫。」

列寧他認為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歷史上的意義是非常重大，所以他說：「農業資本主義首先撕破了我們農村經濟千百年來的停滯，給其技術之改變與社會勞動生產力之發展以很大的推動。在這種關係上幾十年的資本主義的「突進」比起過去全部歷史數世紀或十數世紀還要多。腐敗的自然經濟之簡純性被商業性農業的五花八門代替了；原始的農業器具讓步與改良的器具及機器；舊的耕作制度的刻板性被新的耕作方法代替了，這一切改變的過程都與上述的農業專門化的現象有密切的關係！」

故而他的結論說：

「這樣子，（我們再重複一次）我們指出了俄國（中國也是一樣的——農）資本主義之進步的歷史作用，我們并沒有忘記了此種經濟制度之歷史過渡性，沒有忘記了他所具有的深刻的社會矛盾。反之，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過，只有那些不滿意於資本主義之衝破的民粹派才會皮毛的估量這些矛盾，才會抹煞了農民分化，才會忽略了我們農業中機器應用之資本主義性，只有他們才會以「農業經營」「做生活」等話來掩遮農村經濟僱傭工人階級之形成！」（以上見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譯本第三百

五十頁——五六頁）

關於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在全部歷史進程的意義上，烏里亞諾夫已經爲我們做了結論。不過，殖民地式的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是五花八門；牠在農村中間那種綜錯複雜的形態，誠如列甯所說：「……中世紀古老的殘餘，他們還繼續重壓在農民肩上；如農民社會的門閥閉關性，連環保甲，農民土地負稅之過高……」等等，但在這裏，中國的民粹派一定會斷章取義借着這些話來反對我們上面的分析。其實，列甯彷彿是和預先看見這現象的一樣，他惟恐人們對於他的意見的曲解，所以他馬上又說：「這一切陳老的東西并絲毫不能阻止農民的分化」！甚之，他還說這一現象的存在是「并沒有絲毫的改變」「農村資產階級對農村無產階級的關係」！（同上書三六三頁）

這種「中世紀古老的殘餘」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

## 第四節　苛捐雜稅與高利貸的剝削

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因其受着歷史的特定的條件之限制，不僅不能徹底的掃除那農村中間封建的殘留關係，甚之，此種封建的殘留的關係，自從退居於經濟的附屬地位以後，牠與別種的經濟成份尤其是資本主義的成份，實行「和平共居」！

第一，我們就田賦之增加來說明農民對於土地負担的繁重。根據陳翰笙先生的研究，田賦逐年增加的事實是異常的明顯，茲從他那中國農民担負的租稅一文中，介紹一些數目字於下：

田賦正稅的公開稅率表（丁漕附稅均不在內）：

| 省別 | 縣別 | 民國元年稅率每畝平均洋 | 民國十七年 | 稅率增加百分數 |
| --- | --- | --- | --- | --- |
| 直隸 | 昌黎 | 〇·〇一五 | 〇·〇二三 | 五三·三 |
| 山東 | 萊州 | 〇·〇七二 | 〇·一〇六 | 四七·二 |
| 江蘇 | 江甯 | 〇·一五〇 | 〇·二〇五 | 三六·六 |
| 浙江 | 嘉善 | 〇·二四七 | 〇·二九七 | 二〇·二 |

至於每畝田賦的總計，可以下列三表為例：

A.浙江嘉善（一九二八年）：

| 稅別 | 額數 |
| --- | --- |
| 1正稅 | 〇·二九七〇二七〇〇元 |
| 2漕折 | 〇·二七三九〇〇〇〇元 |
| 3省附稅 | 〇·〇七四四〇四五〇元 |

| | |
|---|---|
| 4縣附稅 | 〇・二三八四〇四七三元 |
| 5徵收費 | 〇・〇三七三一四九三元 |
| 6軍事特捐 | 〇・二四八〇一五〇〇元 |
| 7省路附稅 | 〇・〇五七〇九二七〇元 |
| 8教育附稅 | 〇・〇五七〇九二七〇元 |
| 合計每畝共 | 一・二八三二五一五六元（作一元三角） |

B.江蘇江甯（一九二八年）：

| 稅別 | 額數 |
|---|---|
| 1正稅 | 〇・二〇五〇〇元 |
| 2漕折 | 〇・五〇〇〇元 |
| 3省附稅 | 〇・一六五〇〇元 |
| 4縣附稅 | 〇・一四三〇〇元 |
| 5徵收費 | 〇・〇六八一二元 |
| 6軍事特捐 | 〇・〇三五〇〇元 |

| | |
|---|---|
| 7 農民銀行基金 | ○・二○○○○元 |
| 8 縣路附稅 | ○・○五○○○元 |
| 合計每畝共 | 一・三六六一二元（作一元三角七分） |

C. 山東萊陽（一九二七年）：

| 稅別 | 額數 |
|---|---|
| 1 正額 | 一・八○○元 |
| 2 省縣附稅 | ○・四○○元 |
| 3 省教育附捐 | ○・○五○元 |
| 4 河工附捐 | ○・二二○元 |
| 5 河工特捐 | ○・六六○元 |
| 6 軍事附捐 | 二・○○○元 |
| 7 汽車路附捐 | ○・五五○元 |
| 8 縣教育附捐 | ○・○九九元 |
| 9 賑濟附捐 | 一・○○○元 |

10 警察捐　〇・三三〇元

11 清鄉捐　〇・〇五〇元

12 地方公款　〇・一五〇元

13 徵收捐　〇・〇六〇元

合計每兩共　七・三六九元（作七元四角）

可是一九二七年山東萊陽的農民對於田賦竟繳納了四次：

| 時期 | 每兩合銀洋 | 每畝合銀洋 |
|---|---|---|
| 二月 | 七元四角 | 三角七分 |
| 五月 | 八元六角 | 四角三分 |
| 九月 | 拾　元 | 五角三分 |
| 十二月 | 十二元 | 六角 |

依照上表所列，每畝土地的担負須一元九角九分，而其他的捐稅與印花稅等尚不在內。至於其他各省田賦正稅的繳納，我們因無精確的統計，其數目究竟若干？我們無從知悉，不過，就我們所想像得到的是：『到處揚梅一樣花！』

甚之，地方政府對於這些偌大的田賦加在農民身上猶認爲農民們還有喘息的機會，於是乎更想出「預徵」的辦法來澈底的壓死農民！關於各省預徵田賦的情形，據調查統計有如下表：

| 省別 | 縣別 | 徵收時期 | 田賦年份 | 預徵年數 |
|---|---|---|---|---|
| 河南 | | 民國九年秋 | 民國十年 | 一 |
| 河南 | | 民國十七年春 | 民國二十一年 | 四 |
| 山西 | | 民國十七年春 | 民國十八年 | 一 |
| 山東 | | 民國十六年春 | 民國十七年 | 一 |
| 山東 | 德州 | 民國十六年秋 | 民國十九年 | 三 |
| 陝西 | 渭南 | 民國十四年秋 | 民國十六年 | 二 |
| 廣東 | 嘉應 | 民國十四年秋 | 民國十七年 | 三 |
| 廣東 | 海豐 | 民國十四年秋 | 民國十九年 | 五 |
| 直隸 | 南宮 | 民國十六年秋 | 民國二十一年 | 五 |
| 福建 | 漳州 | 民國十四年秋 | 民國十九年 | 五 |
| 福建 | 汀州 | 民國十五年秋 | 民國二十年 | 五 |

| | | | | |
|---|---|---|---|---|
| 福建 | 興化 | 民國十五年秋 | 民國二十二年 | 七 |
| 湖南 | 郴縣 | 民國十三年春 | 民國十九年 | 六 |
| 四川 | 鄴縣 | 民國十六年春 | 民國二十八年 | 一二 |
| 四川 | 梓縣 | 民國十五年春 | 民國四十六年 | 三一 |

四川的梓縣，關於預徵田賦竟達三十一年之多，實是駭人聽聞的事情！除了田賦的增加與預徵而外，我們再來看一看各省的苛捐雜稅的情形。

第二，中國各省的苛捐雜稅，的確是名目繁多，不勝枚舉，現在我們僅就各省與農民有切膚之痛的雜捐來分別加以介紹：

1廣東省　據民國十五年廣東省第二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調查及決議所取締的如：「汕頭市郊有猪隻捐，女子出閣捐，牛隻捐，鷄母捐，番薯捐，青菜捐，丁口捐之征收；普寧有猪厘捐，糖寮捐，祠堂捐，戲厘捐，嫁女捐，糖沫捐，牛頭捐　擺擡捐；中山有游擊隊費，聯團費，民團費，沙費，沙骨費，沙夫費，果木費，鴨埠費，瘋人口粮費，舊式農會費，中小學附加費；新會有游擊隊費，碉樓費，聯關保安隊費，船卡費（內分上中下三卡），聯航保安隊費，團警教練所附加費；惠陽有屠牛捐，屠猪捐，花生捐，生油捐，穀捐，米薯捐，鹽斤捐，梅菜捐，荳舖捐，米麥捐，生菜捐，糖出口

捐，杉木排捐，房捐，蠶繭捐，駁艇捐，黃豆捐；吳川有蒜頭捐，蒜串捐，蔴捐，殼捐；番禺沙河一帶有過路捐；寶安有人頭捐；韶關有羅捐」等征收。

2察哈爾　據一九二七年察哈爾農民部的報告，關於苛捐雜稅又有如下的形式：車牌捐，警察教育自治捐，畦捐（不分土地多少，每家洋五角），草捐（每畝五角），兵差捐（每畝一角），學堂捐（每畝一角），木柴捐（每畝二分），安門捐（每家五角），門牌捐（每戶五分），雜差捐（每畝自一角起，至一元止），買賣牲畜捐（每頭五角至六角）。

3河北省　魚捐，曉市攤捐，畝捐，花生捐，肉捐等。

4奉天省　畝捐，車捐，船捐，鋪捐，漁捐，橋捐，渡捐，獸捐，青苗捐，菜園捐，車頭捐。

5黑龍江　斗秤捐，五厘捐，學警粮捐，大犂捐，柴炭捐。

6山東省　棗捐，斗捐等。

7河南省　瓜子捐，豬捐，羊捐，柿餅捐，廟捐等。

8山西省　斗捐，車捐，粮捐，騾馬捐，差徭捐，地畝攤捐，渡口捐，橋梁捐等。

9江蘇省　豬捐，牛捐，草捐，雞捐，鴨捐，漁捐，風車捐，牛車捐，船捐，河工捐，塘工捐，積穀捐，築灞捐等。

10安徽省　米捐，房捐，木捐等。

11江西省　船捐，車捐，枋板捐，窖戶捐，漁捐，白泥捐，路捐，橋捐等。

12福建省　紙捐，柴捐，磚瓦捐，契尾捐，魚捐，羊捐，油捐，碗捐，官渡捐等。

13浙江省　房警捐，漁團損，糧捐等。

14湖北省　輪渡捐，竹木捐、夫役捐，學捐，船捐。

15湖南省　船捐，茶捐，車捐，牛捐，豬捐，保衛團捐。

16陝西省　油捐，警捐，斗捐，炭捐，貨捐，秤捐，魚捐等。

17新疆省　草捐，斗秤捐，礬山捐，炭山捐，山價捐，地灘捐，磨房捐，皮張捐。

18貴州省　木損，紙捐，攤捐，鴨捐，米捐，穀捐，牛捐等名稱。

綜觀以上各省苛捐的繁雜，彷彿和密佈在天空的星一般，其對於農民殘酷的剝削，決非一班人們料想所及；關於此種剝削程度的加深，根據一九二八年在江蘇北部幾個縣份實際調查所得，茲舉一件悲慘的事實，即可以告訴我們中國廣大的農民在這制度之下作那種殘不忍聞的輾轉哀鳴！

這悲慘的事情，便是普遍於全國的「保衛團」捐。

所謂「保衛團」是農村組織軍事化的一環，「保衛」誰的利益呢？是不是保護全體的農民呢？事

實告訴我們恰恰相反，牠不僅不能『保護』廣大的貧苦農民的利益，甚之，在組織上利用農村中失業的游民無產階級，於『防禦土匪』保護全體農民利益的美名之下，而建立了地主富農的鄉村政權。凡是有一畝土地的農民，每年即須出捐洋一角，農民如果於繳款的時候，稍事遲疑，那麼，便要飽嘗那無情的搶托的滋味！從農民身上壓榨來的金錢，除了很小的部份用之於團丁身上（有些地方團丁是從佃農中徵調來的，是沒有報酬的），其大部份都拿去作購買槍彈與建築砲樓（在地主的家裏）的基金。

由此，可見苛捐雜稅實是農民頸間的一條絞繩!!!

復此，我們再來研究高利借貸資本在農村中間的實際作用。中國高利借貸的形式，各省雖間有不同，而其眞實的內容，則完全與上面所說的一樣：

『我們要了解高利借貸對於農民的剝削，須得過一過德國的農村生活；我們要從實際生活中認識高利借貸者，他們剝削的程度，幾視農民爲其附屬品了。高利借貸者彷彿和牆角結網的蜘蛛一樣，使飛動不愼的蠅類，橫遭殺生之禍！中世紀的農奴未必受過那負債纍纍的農民的痛苦，經常相迫的恐慌，把他們所有的心力完全消盡了！』（見恩格斯著農民問題中譯本第十六頁）

在這裏，人們一定會提出這樣的疑問：上面所引的是德國的事情，中國的情形或許兩樣吧？其

實，中國高利借貸的剝削，因資本主義發展遲緩的關係，更帶着東方式的殘酷的顏色。關於此問題，就是帝國主義僞善的裝飾品——華洋賑災委員會，對於中國高利貸的利率也曾有如下的統計：

| 省別 | 高等 | 低等 | 中等 |
| --- | --- | --- | --- |
| 浙江 | 六〇—七〇％<br>有時—一〇〇％ | 一二％ | 二四——三六％ |
| 江蘇 | 二四％ | 一二％ | 一八％ |
| 山東 | 六〇％ | 一八％ | 三六％ |
| 直隸 | 三六％ | 一二％ | 二四％ |

（註）此表係從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四二五頁引來。

但是，這個統計距離具體的實際情形尚遠，牠對於中國農民不過是表示「貓哭老鼠」的一齣滑稽戲劇罷了。現在我們可以舉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地方——廣東與江蘇二省的高利貸的利率來看，才可以明白的看出農村中間殘酷象徵！

A.廣東省：

1借穀債　此制度甚行於川江，曲江，仁化，惠州，河源，遂溪，海陸豐，佛山等處，借洋

一元，於收穫時還穀四斗至五斗（約洋三元）；而廣州市郊，其利息更以月增遞：如一月一元，三月三元五角，四月四元，五月五元，六月六元，而照洋計算以穀抵償。

2按借　在英德，遂溪，羅定，海陸豐，德慶等縣，均有此制：母銀一元，月利一角，或借九角而契約寫作一元，而月利仍以一角計算，或每日抽利一分；或借百元半年還利四十元，或母銀一兩，月息五分。其抵押之物爲田園房屋及猪牛等之動產與不動產，而羅定更有以妻兒作抵押品於債主，如在債主家中懷孕者則其子歸債主，借債者得以母銀贖回其妻，如過期不能贖回則斷送其妻！

3借銀　借母銀每兩月利三分至五分，或一元三天利息一分五釐，則一月爲一錢五分，以三個月四個月或半年爲限期，至期不還即轉利爲母一次，而美其名曰：『複利債』！

4出十入九　借洋一元，交九角，每月利息一角。

5五市錢　借洋百元，月利七十五元。（瓊崖）

6九出十三歸　借洋一元，交九角，一月後還一元三角！

7圍仔利　借洋一元，十天結利一角，一年爲限；至年終將母利共起來做『租仔』，每十元利納穀一石。

8 賣青苗穀　借母銀一元，每半年還利一元。

9 私押利　借毋銀一元，月利一元五角。

10 借十交六　即借洋十元祇六交元與借債者，而仍書十元借據，月利三分五分以至十分。

11 借十交八　即借洋十元交八元，月利同上。

12 乾利　即借母洋一元，月利五角。

13 濕利　母銀一元，年利還穀二斗。

14 投錢　母銀十元，年利有九元至十一元者。

15 遁橋利　借銀一元，一天利息一角，五天為期，過期倍計，轉利為母！

（註）上列利率見廣東第二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關於高利貸問題的決議案。

B. 江蘇省：

| 種類 | 利率 | 狀況 |
| --- | --- | --- |
| 1 借錢還錢 | 利率百分之三〇——三五——六〇——七〇——八〇——一〇〇不等。 | |
| 2 粒米頭 | 四五月每米一石，秋收後還一石半。 | |
| 3 作稻洋 | 四五月借洋三元五角秋收後還稻一石。 | |

4死頭活尾　借錢時將本利算清，契約上只寫還錢時日，末署立永遠賣絕田人某○○，到期不還，債主過糧　收租，田地永爲債主所有。

5三道蓬　借時寫借票一張，賣契一張，　單一張，契上只寫明本利合數，如到期不還，債主將借票廢除，過糧，收租。

6百哥洋　借洋一元，隔日利錢一角，一天不還，利上加利。

7鴿子地　借錢押地，以每畝收入作息，年久不能還清，土地爲債主所有。

8聽漲不聽掉　青黃不接時，借穀議定谷價，收穫後本息還穀外，還要補足穀價。

9青麥賬　二月借麥，四月加倍還。

10典當舖　日利二分至三分以上。

11貨品賒貸　農民於春夏間向商店購買貨物，作成谷或麥若干斗，經收穫後，按借款時穀價還錢。

(註)見C.P.江蘇省委一九二九年對全省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第十九頁——二十一頁。

我們看完了上列廣東和江蘇二省高利貸的具體形態，便確信那描寫農民生活的詩歌：——

「三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

剜却心頭肉！」

牠實含有深刻的意味。

一般的說來，中國高利貸資本的特點，遠在數千年前，小農經濟已經倚賴於市場，在農村中間高利貸資本之所以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一方面固然由於中國之特定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條件所決定，而另一方天災，死亡及嫁娶等種種原因，也是促成農民和飛蛾一樣而投入於高利貸者的火坑！當多數的貧苦農民於饑荒難堪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明明白白知道高利貸者的陷阱，但是，「現死不如欠死」——祇有「飲鴆」才可以「止渴」，所以也不去計較什麼利率的高低了。

從前有人說：「黃河是中國的禍水」，「當鋪（即高利貸）是中國的罪人」！這兩句話，用在這裏的確是非常的確當！

馬克斯曾經說過：

「高利貸與賦稅制度在各處都會置他（指貧苦農民——農）於死地。資本之應用到土地購買上使這資本離開了土地之耕植。生產手段之無限的破碎，及生產者自己之孤立，人力之無限的使用，生產

條件之漸進的惡化及生產手段之騰貴——這都是小私財產逃不脫的法規。對於這種生產方法，豐收之年都是災難！』（資本論第三卷三百四十一——四二頁）

中國高利貸與賦稅制度，其給與農村經濟與農民生活的影響實是非常深刻，那一大羣破產農民的生活，誠然如馬克斯所說的一樣：『豐收之年都是災難』啊！

此種經濟的矛盾必然不可避免的會反映到農村社會方面，我們再來看一看農村中的階級矛盾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

## 第五節　農村中的階級矛盾——租佃形式與雇傭勞動

在目前的中國，那農村中間的租佃關係與雇傭勞動的問題，已經緊張到異乎尋常的程度；因此逼得一般人們無論是統治階級或者是革命的政黨，對於這些問題不僅是要加以注意，并且還把牠列入議事日程之中。然而那許多抽象的探討，是敵不過實際的分析，例如關於租佃形式與性質一問題，博學如馬扎亞爾還作了以下的錯誤：

『租佃關係之半封建性質便可由自然品地租的統治來說明，貨幣地租只是不久以前才開始發明，而且他的進步是很慢的。現在貨幣地租只能在技術文明的區域以內存在。在產米區域——那裏米佔有

耕塲的最大部份——很少看到貨幣地租。而先期繳納的貨幣地租尤屬罕見。此種租佃形式的關係同樣在東南諸省我們是找得到的。」（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三一三——一四頁）

我們很仔細的咀嚼馬札亞爾這一段意味深長的話，那麽，可以找出他一個很嚴重的錯誤：他說租佃關係之半封建性質是由「自然品」的地租的統治來說明，所謂「自然品」地租的統治，他在經濟上的意義是指「自足自給」的形態，然而這裏所說的「自然品」的內容恰恰相反，而是商品生產的另一種形式；即是說地主剝削佃農的穀產交租，并不是簡單的爲滿足一家的直接消費，而其大部是爲適應市塲。如果不是這樣，那麽，地主從佃農身上剝削來的成千成萬石穀產，便會和「太倉紅粟」一樣而「腐不可食」，因爲地主們一生一世也消費不了這許多的穀產，甚之，用「食糧堆砌成地主的墳墓」也消費不完（這是一個佃農的話——農）！於此種原則的錯誤分析之下，馬札亞爾更以道聽途說的辭句來發揮他與事實相反的意見：如什麽「在產米區域很少看到貨幣地租」（？）什麽「先期繳納的貨幣地租尤屬罕見」，江蘇和浙江兩省總算是「產米區域」吧？是不是有貨幣交租呢？事實告訴我們說：「有」！是不是「很少看到」呢？事實告訴我們說：「經常的看到」！「先期繳納的貨幣地租」是不是「罕見」呢？不，佃農告訴我們說：「常常遇頭」！總之，此種貨幣繳租的現象，在馬扎亞爾想像的「東南諸省」誠然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可是我們長生在中國的小朋友，却是「得來全不費工

夫」，因爲這些現象在我們的「東南諸省」的確是「俯拾卽是」啊！

很明顯的，他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分析之所以錯誤的原因，完全由於所謂「亞洲式」的生產方法障礙了他的眼睛。我們看他怎樣的企圖將中國的租佃關係與「亞洲式」的生產方法聯繫起來？他說：

「所謂半封建的，以及在經濟關係上之半奴隷的，非歐洲式的，不文明的，非近代資本主義的，而是亞洲的那種租佃關係的形式，在中國（同樣在日本，在高麗等處）最爲普遍，而在此種形式中還結合了只有在自然品地租的情形下才能發生的蒙蔽，欺騙之一切形式。如果在美國的條件之下，佃奴制不會走向半封建的租佃關係，那麼，在中國的條件之下，他便創造出完全亞洲式的，完全奴隷的關係。」（見同書三〇七頁）

其實，關於日本與高麗等處之租佃形式是不是「亞洲式」的奴隷的關係？自有事實在着證明，我們有暇當爲專文討論；至於中國目前之租佃關係馬扎亞爾肯定他爲「完全的奴隷關係」這未免過分的誇張了牠的經濟作用吧!?我們知道：中國農村中間特別是在租佃關係上之所以仍舊保存着一些封建的殘骸與農奴制的遺跡，這幷不是中國不願走美國式的道路，而恰恰相反，自十六世紀以來，牠的經濟的發展受着許多經濟的歷史的地理的條件之影響而停滯不前，當牠企圖要走美國式的道路的時候，那

強盜式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已經使牠彈動不得！祇有從帝國主義的壓迫與殖民地資產階級之不能解除農民痛苦的觀點上去考察那農村中間所存在的奇形怪狀的租佃關係，才可以把握眞實的意義。

中國的租佃關係及租佃方式究竟怎樣的複雜呢？

我們於此地決不能以抽象的詞句來答覆這個問題。因爲各地的情形不同，所以牠的形態也是異常複雜，一般的說來，眞正的租佃關係的建立，幷不是如馬扎亞爾所說什麼『……通行的是非書面契約的租佃，而僅是一種口頭協定的基礎之上』，相反，的租佃關係的建立，大部份是採取契約的方式。其契約的內容與式樣，在浙江有如下的方式：

字札

立扎字八　　　今札過
宅邊民田　　畝　分坐落……………地方
憑中斷定札銀大洋　　元　角　分正每年租穀　　斤（對子秤）分作早
晚兩季交淸如有拖欠願於札銀內扣除抵補幷聽宅邊收起另札不敢霸種恐口無憑
立此爲照
泥基　片泥井　口樹　株

（此半由地主保存）

中人　押

民國　年　日　日　立札字　押

合同……字……第……號

執據

立執據　今有田　畝　分坐落……………地方

憑中札與　耕種當得過札銀大洋　元　角正每年須交租穀　斤

分作早晚兩季交淸如有拖欠當扣除其札銀以彌補之恐口無憑立此爲照

民國　年　月　日立

（此半由佃農保存）

（註）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十六號一三三頁。

同樣的，關於租佃關係之契約的形式，我們在湖北也可以見到：

「立稞字人某某某今因與某某某商議情願請憑稞保人某某某等在內作證稞到某某老板名下水陸田一份坐落某處當憑稞保出備上莊錢若干串言明每年完稞谷若干石（卽陸田租）旱稞錢若干串若有天旱蟲蝗驗田取稞日後下莊之時稞淸莊還（卽佃農之莊錢）陸田消糞不得異言恐口無憑特立此稞字爲據

稞保人某某某

某某某

民國　年陰　月　日某某某親筆立」

（註）見同上書一四〇——四一頁。

在江蘇，此種契約租佃關係的情式，於農村中間是異常的普遍，而專門介紹租佃關係的所謂「中人」（即專營介紹田地房產之典質買賣者），也是租佃關係之主角。我們於各種租佃契約中間所看到的共同點之一：「預納租金」是非常普遍的形式；當然，在表面上，那所謂「札銀」「上莊」「押種」「下脚」等等名稱不過是佃農們以貨幣向地主承佃土地的担保，但其實質實是變象的「預付租金」！如地主收了這些承佃土地的保證金以後，據調查所得是很少的發還；此種藉口部份扣除或者是全部沒收的理由（實際上是蠻不講理——農）：不是說「田拖薄了」（指佃農土地施肥工作的不好——農），便是說「圩弄壞了」（指佃農竊取淤土而削弱了河堤的作用——農），而要佃農賠償巨大的損失，甚之，還借口於農具的損壞（如風車牛車的損壞）更逼迫佃農出修理農具的津貼！至於年歲荒歉更是地主對扣佃農之絕好機會，他「只要錢到門」，是「不管佃農死人不死人」！農村中間有一句很普遍的俗語：「燒餅入了貓子口」（即是拿不出的意思——農）我想拿這句話來象徵中國租佃形

式中的保證金的關係，眞是再確當沒有了！我們再重複的說一句：「燒餅入了貓子口」！

這種變象的「預繳租金」的「押租」額，每畝究竟若干？各地的情形實有不同，僅就江蘇省說，已有如下四種：

| 每畝額數 | 所在地 |
| --- | --- |
| 二元 | 南京特區，金壇，六合，寶應等縣。 |
| 四至五元 | 丹徒，宜興，武進，江都，泰興，高淳，溧陽，淮安，江寧，海門等縣。 |
| 六元 | 崑山，奉賢，崇明等縣。 |
| 十元 | 常熟，江陰，松江等縣。 |

(註) 見江蘇省農民協會田租調查報告。

至若租佃方式可以分作如下三種：

A.包租制(即鐵租制)；

B.分租制(即活租制)；

C.議租制(墾殖區域)；

包租制約分二類：一類爲穀產交租，當佃田時言明每畝完納米穀若干，於收穫時即照數完納；此

中最殘酷者，莫過於江蘇通州，崇明，海門一帶的所謂「包三担」了！凡每一佃農向地主佃田「一千步」（註：通州崇明海門一帶的田地係以步計算，每五尺爲步，每二百五十步爲一畝，一千步等於四畝——農），每年必須向地主們交：棉花一担，麥一担，黃豆一担，如到交租時期遇某項規定農產物缺少時，卽必須按照市價折合貨幣若干交還於地主！

第二類爲貨幣交租，其表現於江蘇方面的形式，有如下各種形態：

| 每畝租額 | 所在地 |
| --- | --- |
| 五至七元 | 江甯宿遷 |
| 一至七元 | 丹徒奉賢 |
| 二至八元 | 南京特別區如臯 |
| 三至七元 | 泰興 |
| 一至六元 | 丹陽 |
| 四至七元 | 高淳 |
| 三元 | 溧陽 |
| 四元 | 灌雲 |

十四元　江陰

九（預繳）元　武進（短期租二三年爲限）

六（預繳）元　武進（長期租十年爲限）

此種以契約規定之貨幣交租的包租制，不論每歲荒歉與否，均須照額繳納。

其次，就是分租制度：

分租的成數約有下列數種：

1 業七佃三；

2 業六佃四；

3 對分；

4 混種（地主出肥料種子，佃戶出人工，分租時業六佃四。）；

5 提種均分（分租時先將種子提外，其餘業田均分。）；

6 自賣租（自己賣田，賣給別人，但仍由自己耕種而交納一定租額，并仍可備價贖回。此種賣地交法，在江蘇南部（江陰）名叫「包租地」，在江蘇北部（鹽城）又叫做（「連楖頭帶柄」！）。

第三，便是那殘酷無倫的議租制度：

議租制度就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僅僅表現於江蘇沿海一帶的墾植區域；這一制度的內容，於租佃關係的剝削形式上可算是達到了登峯造極的成績。該制度的內容是：許多墾植公司他們對於佃戶的收租，并不是一以定的貨幣租額或農產品收穫的多寡來決定，而是專憑公司裏面的憑空估定；每於收穫將屆的時候，那許多墾植公司中担任估租的專員，便和黑夜的「耗子」（老鼠）一樣而到處活動——「議租」！我們在說明議租制的過程中，附帶的要將沿海墾植區農村組織介紹一下，否則，我們對於牠便會和一個初吃橄欖的人一樣，而不能深刻的感覺到牠的剝削的滋味！沿海農村組織是非常的簡單，因土地都集中在公司的手裏，而公司更用最新式的「彭浦機」抽水灌溉，其規模與形式實等於資本主義之集體的農場；牠除了僱傭了成百成千的農業工人而外，更招致大批的佃農。將整塊的土地，劃分為無數的小塊（每塊二十五畝——農），在每一（二十五畝）小塊的土地上，預留三畝作為佃農的住宅與作場，公司裏供給每一個佃農石磙一條；至於沿耕地的週圍的水道與溝渠，公司裏已預先為牠佈置得非常適宜，我們真感謝資本主義他為我們創造了這樣很完整的新式農村，但是引起人們悲憤的也在這裏。固然，佃種牠的土地同樣的要繳押租，而那種議租的剝削實是佃農的敵人！例如甲乙二戶，同為墾植公司之佃農，每戶同樣的承佃二十五畝，甲戶因土地經常的施肥以及在這小塊

土地上化費了巨量的勞動力，以致生產數量超過乙戶十分之三或十分之五：即甲戶二十五畝土地生產二十五担棉花（假定），乙戶生產十五担或十三担，而議租的時候，乙戶須以甲戶的生產標準出租，照業六佃四的慣例作穀產交租，甲戶出棉花十五担，而乙戶則罄其所有亦不過十五担而已！此種制度，雖然牠的意智非常殘忍，但牠主要的意義，是要以這種方式懲戒佃農的自覺的不自覺的怠工，而提高其生產量的增加。

概括言之，佃租方式約如以上三種，然佃農對於每畝所担負的地租究竟達何種程度呢？各省的情形，雖間有不同，但根據江蘇省農民協會二十九縣的調查，其大概的情形，我們可以見到的有如下表：

| 縣份／租額 | 每畝最高額 | 每畝最低額 | 每畝平均額 |
|---|---|---|---|
| 1 江甯 | 一一·一〇元 | 七·二元 | 九·一五元 |
| 2 海門 | 六·一二 | 五·五 | 五·八一 |
| 3 無錫 | 一六·八〇 | 八·〇 | 一二·四〇 |
| 4 宜興 | 八·二五 | 一〇·八 | 九·五二 |

| | | | |
|---|---|---|---|
| 5 丹徒 | 三·三三 | 二·〇六 | 二·六九 |
| 6 句容 | 九·八九 | 七·七二 | 八·八〇 |
| 7 南京特區 | 六·八三 | 二·七五 | 四·四九 |
| 8 江都 | 一五·四九 | 一〇·三九 | 一二·四九 |
| 9 泰興 | 一五·六三 | 七·七八 | 一一·七〇 |
| 10 丹陽 | 六·〇〇 | 四·〇〇 | 七·五〇 |
| 11 金壇 | 一六·六八 | 五·八〇 | 一一·二四 |
| 12 六合 | 一一·四六 | 六·六〇 | 九·〇三 |
| 13 武進 | 一七·七三 | 七·三二 | 一二·五二 |
| 14 高淳 | 七·八三 | 四·四八 | 六·一五 |
| 15 松江 | 一三·二二 | 八·四七 | 一〇·八〇 |
| 16 如皋 | 五·四〇 | 二·〇〇 | 三·七〇 |

| | | | |
|---|---|---|---|
| 17 江陰 | 一〇・四〇 | 五・三六 | 七・八八 |
| 18 宿遷 | 七・〇六 | 二・五二 | 四・七九 |
| 19 溧陽 | 三・一〇 | 一・六〇 | 二・三五 |
| 10 靖江 | 一三・七九 | 八・八八 | 一一・八三 |
| 21 淮安 | 一二・八八 | 六・四〇 | 九・六〇 |
| 22 鹽城 | 一一・八〇 | 〇・五〇 | 五・三四 |
| 23 寶應 | 一三・〇〇 | 九・三〇 | 一一・四〇 |
| 24 淮陰 | 一三・七五 | 一・一二 | 七・四三 |
| 25 崇明 | 七・二六 | 六・二七 | 六・七九 |
| 26 奉賢 | 七・五〇 | 四・二〇 | 六・五〇 |
| 27 崑山 | 一二・〇〇 | 三・〇〇 | 七・〇〇 |
| 28 灌雲 | 四・〇〇 | 一・〇〇 | 二・五〇 |

| | | | |
|---|---|---|---|
| 29常熟 | 一〇·〇〇 | 六·〇〇 | 八·〇〇 |
| 總平均數 | 九·六八 | 四·九七 | 七·二三 |

上表所列的租額，係以穀產與貨幣混合計算，從其總平均的數目中看出：每畝土地使佃農所出的地租竟達七元二角三分之多！租額的奇重，勢必引起佃農生活的惡化，如果他們不去從事於副業，甚之，連禽獸式的生活都不能夠維持呢！茲就江蘇宜興來說吧：有五口之家的佃農耕地二畝，其每年生產與消費有如下表：

A.收入：

作物　五四元（以每畝產稻四石麥一石稻價每石五元麥價每石七元計算）

畜類　一六元（家畜家禽類）

副產　二十元（農業製造及蔬菜絲繭類）

其他　十　元（其他營業或兼作傭工）

合計　一百元

B.支出：

忙時傭工　一五元　（照現在工價每元三工計）

肥料種子　一八元　（八糞荳粕草木灰種子爲稻麥雜粮）

修　　築　六元　（農閑補修田舍農具）

農　　具　五元　（購置鋤鍬犂耙等物）

納　　租　十六元

雜　　用　二十二元

合　　計　八十二元

以五口之家的佃農，承佃兩畝土地，其收支相抵僅餘十八元，區區十八元是不是能夠維持五口之家的一年生活呢？很顯然的這是農村中間一幅悲慘的畫圖！如果再將這副產之二十元扣除，那麽，辛苦了一年還要貼上兩塊大洋！萬一再遇着水旱的災害，必然的會影響收入的減少，這時候其生活的痛苦，更是令人不堪設想！甚之，在一九二九豐收的江蘇南通，那佃耕千步地（即四畝）的佃農，其收入與支出衡比，同樣的仍是過着痛苦的生活：

A. 收入：

上熟麥二担　（二十四兩秤）　合十二元

下熟棉一担（二十四兩秤）　合十八元

副業（推小車織布等）　合二十元

附種　三元

合計　五十三元

B.支出：

肥料種子等　十元

完租　十八元（最多二十四元）

預租息金　九元（三十元起碼利率三分計算）

合計　最低限度支出三十七元，兩抵淨收十六元

這十六元能維持一年的生活嗎？不夠！不夠！

廣大的佃農，他們生活痛苦的情形，眞是一言難盡，那「穀上場，無飯裝」的呼聲，已普遍於中國的農村了！他們在農村中間的社會地位，是異常的惡劣，不僅一切公開的政治上的自由無從享受，并且在地主，高利貸者，農業資本主義及富農的統治之下，時常還有「槍斃」，「砍頭」，「坐牢」，「下獄」的危險！例如在江蘇的北部——淮安，地主們爲預防農民的欠租起見，曾聯合組織一種特殊

的收租機關——「逼租局」（即地主聯合會的意思——農），如遇佃農欠租，地主祇須化兩塊錢的手續費就可以隨心所欲的把佃農看管起來！他如吳江等縣，又有一種「押佃所」的組織，業主預先向縣署領得空白長單（即一種變象的拘票），可以不經行政的訴訟的手續隨便的拘捕佃農！

如果遇着頑強的佃農　他如果不聽地主的傳喚，或者是拒絕了額外的服役，那麼，在地主的怒髮衝冠之餘，他便會有生命的危險。鄉村政權在他們的手裏，可以隨便的以什麼「土匪」，「勾結土匪」，「拒捕」的罪名來槍殺佃農！還有一件事也時常聯繫到佃農生命的危險：即是佃農家裏不能有姿容秀麗的婦女，如果有的話，趕快的送給地主們取樂，不然，地主老爺的大駕會光臨茅蓬小舍之中，來實行「公妻」的工作，他們如果反抗，那無情槍彈便會和聯珠一般掃射出來！

俗語說：「物極必反」，像這樣的縱政治上經濟上各方面去壓迫佃農，不但是撕破了舊社會的所謂「仁義道德」的面帕，其結果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引起激烈的反抗鬥爭！

紅日東昇，雞啼鵲噪，那沈沈酣睡着的佃農已經醒轉來了！

農村中間的階級矛盾，除了表現於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租佃關係而外，而於農業雇傭勞動者——雇農問題上更顯示其緊張的程度！什麼是雇農呢？他的定義是：在農村中間沒有絲毫的資本與生產工具——如小塊的土地以及其他的一切農具，而另一方面生活資料的獲得僅僅依靠着簡單的出賣勞動力，

像這一類的農民便叫着雇農。他們與佃農中間有一個嚴重的差別，卽是說他們雖與佃農同樣的失掉了土地，然而佃農們還有一些破舊的生產工具，就經濟生活的意義而論，那儘着「一雙手」而「養活口」的雇農，其生活之痛苦，實尤甚於佃農！因一般佃農承租地主的土地，生活性質比較固定，就一般形勢而論，租佃關係的解決，最低限度爲一年；而雇農長期受雇於雇主的事實，爲數甚少，普通的現象是一年爲期，於解雇以後而失業的雇農，一部份仍受雇於富農及資本主義式墾植公司，而另一部份則構成軍閥們雇傭軍隊以及民團土匪的基礎。至於走向都市充當苦力而造成產業後備軍的事實更是異常的普遍，結果是障礙了城市無產階級工資的上騰，而造成中外資本家絕對的剩餘價值的積累。此種現象幷不是單純的祇是影響於都市的工人生活，同時，對於整個中國殖民地式的農村經濟亦是不無影響，首先是：賤價的勞動力，阻礙了科學的發達！

一般雇農工資的水準是異常的低下，如果與城市工人的工資指數比較起來，其距離的程度實相離甚遠。茲將江蘇武進來說，雇農每年工資，最高額亦不過三十元，其統計有如下表：

| 雇農名稱 | 工資 | 計算標準 |
| --- | --- | --- |
| 夥計頭（大夥計） | 自二十二元至三十元 | 一年 |
| 夥計 | 自十二元至二十四元 | 一年 |

| 小夥計 | 自零至十八元 | 一年 |
| --- | --- | --- |
| 忙工 | 二角 | 一日 |

然這不過是指武進一縣的統計，當然不能概括其他各地；不過根據江蘇省農業調查錄，於四十八縣的調查中，所謂「大夥計」的每年的工資亦以二十五元至三十元為最普遍的現象；這四十八縣之農業工人的工資，並不是一致的形式，其高低的趨勢如下：

| 工資額 | 所佔縣數 |
| --- | --- |
| 十元至十五元 | 一 |
| 十五元至二十元 | 九 |
| 二十元以上至二十五元 | 十二 |
| 二十五元以上至三十元 | 十五 |
| 三十元以上至三十五元 | 六 |
| 三十五元以上至四十元 | 四 |
| 四十元以上 | 一 |

以上的統計，雖然是比較正確，然而根據實際的調查，在江蘇農業工人的收入數目，恰與上表又

有些不同。

| 性別 | 每日工資 | 每月工資 | 每年工資 |
| --- | --- | --- | --- |
| 男傭工 | 一角五分三 | 三元五角九 | 二十七元〇九 |
| 女傭工 | 一角三分六 | 二元〇五 | 十五元角九 |

總之，上列各表雖間有出入，要之，雇農工資水準的低下，則是一個共同的事實。雇農在農村中間的地位是異常的卑下，他和地主以及其他各階層的農民衡比，實是處於最下層的地位，由經濟關係所織成的非常綜錯複雜的人的關係有如下圖：

地主

自耕農

富農

佃農

富裕佃農

雇農

地主壓迫雇農有時候是經過佃農的路線，而富農却是直接的剝削雇農，由此，我們確信在農村中間最痛苦的成份莫過於雇農了！他們沒有特殊的技能及普通工業工人之工作的常識，因此，他們雖然的不斷的更換雇主，然確比較長期的停滯在磨石似的富農壓榨之下，成爲富農發展的一根主要柱石！

至於雇農的種類，更是名目繁多，除了上述的長工（以年計算），短工（以月計算），散工（以日計算）而外，更有青年的農業工人——童雇工（即牧童，俗稱放牛小兒、又名小夥計——農）；此種童雇工的生活是異常的痛苦，他們於混吃半飽飯食而外，那種牛馬似的勞動是得不到任何報酬的。他們每天在上午五點鐘的時候，即須起身（俗稱起五更，又名起雞叫——以雞啼爲標準），拿着一條光滑的木棍上面裝着彎形鐵鏟名叫「糞勺」的東西，肩着那種柳製的「糞斗」，走向曠野的場合去尋找人和獸的排洩物——拾糞！白天裏成天是「放牛」和「趕車」，晚餐以後，還要從事於「鍘草」和「製繩」的工作，其每日平均勞動時間總在十八小時以上，此種童雇工我們在農村中間是時常見到，他們那面黃飢瘦憔悴不堪的容顏，便是他們過分勞動的象徵！

其次，便是女雇工。

女雇工除了在地主富農家裏擔任一種娘姨式的工作而外，農業的勞動她們也來參加，不僅是於收

穫期間作「割稻」「拔麥」的工作，甚之，「插秧」「灌漑」她們都是勇敢向前；她們工作積極與緊張，并不因生理關係而遜於男子，反之，那「誰知英雄是女流」的詩句，不啻爲她們寫照。這些從事於農業勞動的女同胞，她們主活的痛苦幷不亞於男子，同樣的每天要作很長時間的勞動；有一位打油詩人描寫江蘇揚州王孫公子對於女僱農的憎厭詩說：

「三更摟抱黃泥腿，

一枕同眠黑炭頭！」

「黃泥腿」與「黑炭頭」當然在王孫公子的眼中看起來，是及不上「舞腿」和「燙髮」，不過，我們要了解她們是被剝削的結果。

中國廣大的雇農，對於他們自己所受的痛苦，是不是甘受如飫而械默不言呢？不！不！他們那反抗的呼聲已和暴風雨一般的逼來，那有名的從他們自己嘴裏唱出來的十月長工的歌謠，已經成爲催促他們敵人走進墳墓的葬曲：

「正月好唱正月工，吃過年飯拜祖宗；有錢大哥去吃酒，無錢大哥抄長工。二月又唱二月工，老板叫我去上工，來家對我妻子說，洗洗漿漿去上工。三月又唱三月工，手拿麻簾下南冲，遇到毛針椤我腿，四蹄又哭二條紅。四月又唱四月工，手拿搖車下南冲，高田無水低田到，低田

無水罵我小長工。五月又唱五月工，挑擔秧把下南冲，秧把打得不接蹤，八八罵我小長工。六月又唱六月工，手拿烏頭下南冲，稻稞熱壞我的小長工。七月又唱七月工，南邊旱稻巳灣弓，十二把鐮刀齊鋸手，鈍刀鋸壞我的小長工。八月又唱八月工，稻籮挑米碓窩舂，老板吃的好白米，長工吃的蝦子紅。九月又唱九月工，菊花釀酒滿缸紅，老板喝得醺醺醉，那有半杯到長工。十月又唱十月工，十月初一起南風，拿條板櫈攔門坐，「老板老板來算工」，「算工不算工，還在我家過一冬！」「放你爸屁，畣你媽屄」，受你家一年罪，還要受你家兩年罪：同你家貓來又無冤來又無仇，不曉得吃了多少臭魚頭！同你家來又無冤來又無仇，不曉得吃了多少光骨頭！」（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六號一四七——四八八頁）

由經濟的矛盾所反映於社會上的階級矛盾的加深，其結果必然的會引起政治上的革命，而革命便成爲一切矛盾的總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曾發生過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即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運動，於此次革命中農民的作用如何？結果怎樣？

這些都是留心於農民問題的人們所願意要了解的。

歷史的序幕展開了！

朋友們！看啊！

# 第九章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與農民

## 第一節 中國農民運動的先驅

偉大的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現在雖然是過去，可是牠在中國歷史上實有深刻的意義與不可磨滅的價值。關於這一革命之全部的經驗與教訓以及一切政黨在革命過程中所表現的眞正面目，我們將以專文論及，因而不便在此地來加以探討，所以本章研究的對象僅僅限於這次革命與農民運動的聯繫！

自辛亥革命以來，廣大的破產的農民感於土地問題之延不解決以致生活日趨於痛苦，曾爆發了不少次的自發的鬥爭與騷動，如白狼等之流竄數省，便是其中最大的騷動之一；但是，這種表演就其範疇而論，絕對談不上什麽農民運動，因爲他們既沒有固定的革命目標，更缺乏指導農民鬥爭的團體，而組織復是一盤散沙，於統治階級嚴厲的鎮壓之下，他們祇有悲慘的失敗而已！

一九二一年廣東的海豐所生長的農民運動，才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農民運動的先驅。創造與

領導這次農民運動的人物——彭湃，他是個高等的智識份子——日本留學生，他曾經做過海豐的教育局長，因紀念「五一」節而被陳炯明開除工作，他於被開除工作之餘，於思想上和陳炯明的家鄉報——陸安日刊搏戰，并與李春濤等出了幾期赤心週刊，而自命為工農羣衆的喉舌；但是，他感覺得「背後絕無半個工農，街上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也絕不知道我們做什麼把戲」！於是乎便改弦易轍，「乃放棄陸安日刊無謂的筆戰而下決心到農村去做實際運動」。然而彭湃的家庭在海豐不僅是富商，并且還是數一數二的大地主，所以他週圍的親戚朋友對他這種行動是深致不滿，就是與他接近的朋友，也是婉轉的諷刺：「農民散漫極了，不但毫無結合之可能，而且無智識，不易宣傳，徒費精神罷了！」但是這位農民運動的創造者，他的意志并不因家庭的厭惡與親朋的譏諷而有所沮喪，恰恰相反，這些遭遇祇有更加鼓勵他的精神而從事於歷史的事業。

他在開始從事於實際的農民運動工作中，當然要發生許多滑稽的材料：如服裝面貌的不同，談話的斯文；可是這些困難是很容易克服的，不上半個月的時間，居然獲得五個很好的農民同志。以後海豐的農民運動之所以能夠發展與壯大，完全基於以下一些瑣碎的經濟的政治的鬥爭的領導：第一，他們很敏捷的，很迅速的處理了農村中間那些瑣碎的事務，如和平的解決了農民與農民相互間的糾紛，客觀上是啓發了農民必要團結的觀念以及對於農會的好感；第二，經濟鬥爭的領導，如領導貧苦佃農

向地主要求減租，并採取「罷佃罷耕」的方式，使地主們讓步；第三，農村中間經濟鬥爭的激烈，必然不可避免的要走上政治鬥爭，在農民與地主之政治衝突的決鬥場中，農民又得着相當的勝利。根據於以上三個原因，由彭湃所領導的海豐農民運動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如在組織上，由海豐縣而擴大成為廣東省農會，當時担任省農會執委共有十二人，其姓名成份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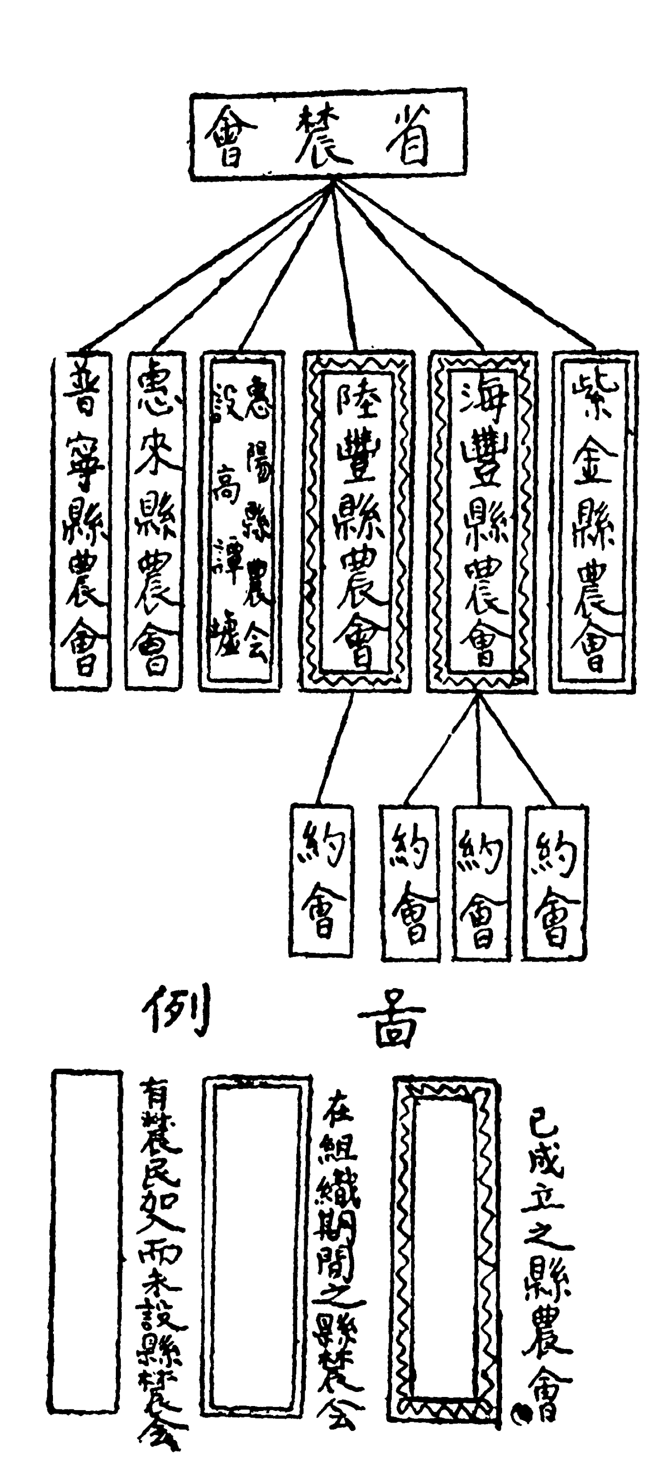
| 姓名 | 社會成份 | 担任工作 |
|---|---|---|
| 彭湃 | 智識份子 | 執行委員長 |
| 馬煥新 | 智識份子 | 執行委員 |
| 林甦 | 智識份子 | 執行委員 |
| 余創之 | 智識份子 | 執行委員 |
| 李勞工 | 智識份子 | 執行委員 |
| 彭漢垣 | 智識份子 | 執行委員 |
| 楊其珊 | 農民 | 執行委員 |
| 藍鏡清 | 農民 | 執行委員 |
| 黃正當 | 農民 | 執行委員 |

張嫣安　　農民　　執行委員

萬維新　　農民　　執行委員

萬清咊　　農民　　執行委員

省農會雖然成立，但內容非常空虛，除海豐陸豐（省農會即設海豐──農）以外，各縣組織還是散漫得很，茲將當時之省農會組織系統圖表如下：



省農會的成立，在他指導之下的縣農會雖然是僅有六縣，但在數量方面參加農會的已有十三萬四千八之多：

| 縣別 | 戶口數 | 人數（以戶為單位每戶五人） |
| --- | --- | --- |
| 海豐 | 一二〇〇〇 | 六〇〇〇〇 |
| 陸豐 | 七〇〇〇 | 三五〇〇〇 |
| 惠陽 | 四〇〇〇 | 二〇〇〇〇 |
| 紫金 | 三〇〇〇 | 一五〇〇〇 |
| 惠來 | 三〇〇 | 一五〇〇 |
| 普甯 | 五〇〇 | 二五〇〇 |
| 合共 | 二六八〇〇 | 一三四〇〇〇 |

關於此種農會會員的成份是異常的複雜，據一九二三年的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百分比有如下表：

會員成分表（凡農民如自耕農佃農……等以戶為單位加入農會其餘皆以個人為單位）

| | |
| --- | --- |
| 自耕農 | 百分之二十 |
| 半自耕農 | 百分之三十 |

| | |
|---|---|
| 佃農 | 百分之四十 |
| 僱農 | 百分之十 |
| 學生 | 三十餘人 |
| 小學教員 | 十餘人 |
| 工人（半農工小工業） | 五百餘人（鹽町工人理髮工人染工） |
| 小商人 | 三十人 |
| 失業者 | 三百餘人 |
| 自耕農幷小地主 | 十人 |
| 鄉紳半教員 | 十餘人 |
| 陳炯明護弁 | 三人 |
| 巫者 | 一人 |
| 船夫 | 四百餘人 |
| 基督徒（農民） | 五十人（自入會後叛教者甚多如萬清味者係一長老會之長老自入會後已反教了） |

（註）以上各種統計均引自彭湃著海豐農民運動。

這一時期可算是中國農民運動之發軔時期，尤其是彭湃個人他在最近中國農民運動史上實盡了先驅的作用；但是在這一過程中間，我們還可以看出牠許多嚴重的缺點：例如有許多農民鬥爭的勝利大部份是憑藉彭湃個人的社會地位以及政治力量的幫助——陳炯明之「貓哭老鼠」式的贊助。當然，陳炯明的贊助，幷非出於他自己的本意，而是農民本身團結的結果！

很顯然的，中國農民運動之發源於廣東，幷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實因廣東與帝國主義接觸最早，而農村經濟的崩壞與破產比較其他省份尖銳，故而爆發成爲整個中國革命運動之一環。於此運動爆發未久，在廣東方面給孫中山以很大的影響，影響他更迫切的去注意於農民問題！

## 第二節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農民運動政策的確定

一九二四年在孫逸仙領導之下的國民黨的改組，牠不僅在中國革命史上有嚴重的意義，同樣的在中國農民運動的歷史上，也有特殊的價值；第一，這次改組是在世界革命的影響——尤其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之下舉行的，所以他有國際的意義。第二，在決定改組後卽「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蘇聯，牠與蘇聯結成共同的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企圖求得殖民地革命之澈底的勝利。第三，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復規定工農運動的策略，征取羣衆作政府的後盾。我們看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哀悼列甯的演詞，便可以與上面分析改組之三點意義互相參照；他說：「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却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眞是世界革命史上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原故，實全由其首領列甯先生個人之奮鬬，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故其爲人由革命觀察點看起來，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之模範。彼今已逝世，我們對之有何種感想和何種教訓，我覺得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大家應該把黨的基礎鞏固起來，成爲一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此次大會之目的，也是在此。」（見中國國民黨史稿五五三頁）孫中山對於農民運動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於改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上曾有以下的估量：

「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卽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卽爲農夫工人自身而奮鬥也！」（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同時，國民政府於此原則之下，更具體的表示對於農民運動的態度，牠說：「本政府根據農民目前所受之痛苦，認為應督促一般農民之自覺，引導其團體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為全國國民一大聯合之奮鬥！」（國民政府對農民運動第一次宣言）牠——國民政府唯恐軍人官吏對於農民運動的誤解，以及受豪紳地主們的蒙蔽，於是乎更不厭求詳的再作第二次的宣告：「……於此更有應為服務於政府之軍人官吏告者，農民協會之性質為完全獨立之法定機關，乃根據政府對農民運動第一次宣言，及中央黨部頒發之章程而設，近日反對者故作謠言，謂為實行共產，實為中傷政府之一種手段，自應厲行禁絕。幷須在各該轄屬地方，善為解釋，毋使妖言惑衆，妨害本黨政治施行，如有不遵奉黨綱，保衞農民利益者，政府即應褫奪官職永不敍用！」（國民政府第二次對農民運動宣言）

像這樣堅決的農民運動政策的決定，的確是充實了國民黨的政治內容，牠將站在這個基礎之上去和敵人搏戰，故而對於農民運動復有極深刻的規定，那簡短的農民運動之八條綱領，實是以後農民運動發展之保障。例如當中第一條說：「農民欲達到解除上述種種之壓迫，應即時組織農民協會。此種農民協會之性質，為不受任何拘束完全獨立之團體。」最有政治意義的，便是第七條的規定：「農民協會對於橫暴官吏，有請求罷免之特權！」

很明顯的，國民黨的改組以及農民運動策略的確定，對於中國農民運動史上，不是一件全然沒有

意義的事情，牠統一了全國的農民運動，使那些不相隸屬的農民，在一個總的目標——「國民革命」的目標之下去奮鬬。另一方面又有很明確的農民政綱，去號召廣大的農民爲這政府建築起花鋼石似的基礎；在一九二五年以前，中國的農民運動，僅僅限於廣東一隅，幷且還是繼承着彭湃過去所創造的基礎。

一般的說來，中國農民運動可分爲幾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地方主義的時期，以彭湃的海陸豐農民運動爲代表；第二時期，由海陸豐農民運動發展至於第一次廣東省農民協會，然這運動還處在萌芽的階段；第三時期，便是國民黨改組後至「五卅運動」以前，這一時期可算是和平發展的時期，從表面上看去好像是「風平浪靜」，其實，潛伏着的小的鬬爭仍是隨時隨地的爆發。過了這個階段，便是狂風暴雨的時期，那偉大的一九二五年的上海所發生的「五卅運動」，便是狂風暴雨的最高標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之同時緊張，這誠然是一個偉壯的奇觀！

## 第三節　五卅運動對於中國農民運動的領導

在距離義和團暴動後的二十六年——一九二五年，中國又爆發了一次反帝國主義的偉大的革命運動——五卅運動。這運動幷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牠的確是積累了國際和國內的一切政治經濟的危機，

而形成一個總的匯合。中國在這二十六年中，經濟上因受帝國主義的影響，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那些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一部份已吸進了工廠及種種資本主義的新式企業，發現了中國的產業工人——無產階級。中國的資本主義——尤其是在歐戰之後，得到了一種相當的發展，因而使從前的買辦階級漸漸的蛻化而成爲工業的資產階級。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表現的，中國國內的軍閥，他與帝國主義間的關係，同樣的和滿清政府一般的喪失了獨立性，他們的存在與統治，已經不能不完全倚賴於帝國主義，而做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直接工具！處於此種環境之下的中國人民，其解放要求當然是一天一天的迫切起來，那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運動受着客觀條件的推動，也是一天天的普遍起來。可是這種運動中最主要的原動力，自那些大人先生去追求他們的好夢以後，現在却祇有新興階級去承之了！

自「五四」運動以來，反帝國主義的鬪爭，差不多完全跟着中國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而發展，最早從一九二一年起，京漢路的罷工，唐山罷工，安源鑛工罷工，海員罷工，上海浦東煙廠的罷工之後，國內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便有了長足的進步。此後，上海絲廠及南洋煙廠的罷工（一九二四年），以及一般的勞動民衆覺悟到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實行經濟的政治的階級鬥爭的演習。一九二五年，上海的工人階級繼續着這種鬪爭，也可以說是匯合了過去一切的鬥爭，於是乎便有日本紗廠的大

罷工。帝國主義者知道了這種新勢力和義和團不同，却是非常的可怕，便企圖以高壓的屠殺政策去撲滅牠，可是紗廠工人顧正紅的殺死，不惟不能壓迫工人階級的興起，反之，祇有更加激起了民衆尤其是工人階級與青年學生的憤怒，而「五卅」南京路的屠殺，遂使逐漸聚積着的革命力量大大的爆發，而反帝國主義運動由此普遍了全國各地，幷且深入到窮鄉僻壤中去！

五卅運動雖是義和團運動的繼續，不過「五卅」運動的方法，組織，策略完全與義和團不同了。第一，五卅運動中的工人階級，有極顯明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剝削的觀念，絕對不是什麽盲目的排外，他們的要求是很具體的：反對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的屠殺和租界制度，反對領事裁判權，要求撤退駐防中國的外國海陸軍，要求中國一般民衆的政治自由權，特別是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這些很顯然的幷不是反對一切「西洋文化」，更沒有保存中國所謂國粹（仁義道德五行符咒等）的痕跡！第二，工人階級爲自己的階級利益來奮鬥，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反對中國軍閥的壓迫和拍賣民族的利益，反對民族革命運動中的同盟者的妥協與軟化。他們知道民族解放運動的目標，是在於求得大多數勞動民衆的徹底的自由與解放，在大多民衆勝利之後，才能談得上民族的國家的獨立和自由；如果這種運動拋棄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拋棄了中國大多數勞苦羣衆的切身的利益，還有什麽民族利益的可言!?第三，中國工人階級知道自己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責任，

所以他們想具體的提出階級的和民族的政治經濟的要求。他們一般的口號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退駐華外國海陸軍，關稅自主，這些要求是中國民族利益最基本的要求。第四，中國工人階級明白中國革命之國際意義，故而這種革命運動對於國際帝國主義是一種有力的打擊；列強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無產階級和各國的被壓迫民族，不僅眞誠的同情於中國的革命運動，并且還予以有力的幫助。

因此，這次運動他們決不去盲目的反對一切外國人，而祇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他們努力於國際間的宣傳工作，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中國工人階級深切的明瞭：帝國主義統治的推翻與中國民族的解放，祇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幫助之下才有可能，而保證中國革命之徹底的勝利，祇有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消滅。第五，五卅運動中的中國工人階級，有很嚴密的組織與極偉大的團體，絕不是宗教式的結合；許多落後的人們，他們往往罵「五卅運動」爲「暴徒」，或者說牠是某一「政黨陰謀」的產品，其實，這些話都是一些夢囈！

事情是極乎明顯的，五卅運動與義和團的區別；正在於五卅運動中有工人階級做指導者，而義和團沒有；五卅運動中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做骨幹，能督促小資產階級的分化與前進，而義和團沒有；在五卅運動中有極鮮明的政治的經濟的鬥爭綱領，立足於這一鬥爭綱領之上，可以團結廣大的被壓迫人民，而義和團沒有；五卅運動中有國際無產階級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聯絡，牠有世界革命的

前途，而義和團運動是沒有的！

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反帝國主義歷史上的特點，牠超過過去一切歷史上革命鬥爭的紀錄！

在這樣大革命的浪濤中間，毫無疑義的會推動中國的農民運動；例如在長江流域及中國的北部，自五卅慘案發生以後，那從事反帝國主義的青年，除了在都市鄉鎮活動而外，他們往往跑到窮鄉僻壤的農村中去宣傳。他們向農民們解釋五卅慘案發生的原因，幷且還說明農民生活的破產與帝國主義侵略的關係。這現象在農民運動有基礎的地方——廣東，因省港罷工的直接影響，更有長足的進展；如廣東省農民協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所說：

「……「五卅」慘案開幕，中國所有大商口岸，無不是遍地鮮血淋漓，演出帝國主義屠殺我國同胞的慘劇。急進的兄弟們——無產階級的工友們，和一切反帝國主義的民衆們，從帝國主義的血刀之下，惡戰苦鬥；上海二十萬餘工人之大罷工，省港二十萬罷工工友奮鬥十餘月，滿腳牛屎的我們，與省港罷工的兄弟，通力合作，封鎖香港；農村中爲「五卅」慘案反帝國主義而武裝示威者總在五十萬人以上（點是我加的——農）；幷在農村中破獲了許多土豪劣紳地主奸商買辦工賊農賊盜運仇貨，接濟香港之反革命行爲。鎮壓農村中一般反革命勢力之潛滋暗長，截斷了帝國主義和內地一切反革命派的聯合戰線！」（見犂頭旬報第九十期合刊第九——十頁）

上面所引的一節話，雖然是寥寥數語。但其中最重要的語句如：「農村中爲「五卅」慘案反帝國主義而武裝示威者總在五十萬人以上」！已經說明了在「五卅」鬥爭中廣東農民運動受着很大推動的事實。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牠已經給農民運動以新方向，把過去不相聯繫的農民鬥爭聯結起來，組成了一種偉大的革命力量！所以我們有權利可以說「五卅」運動是中國農民運動之歷史上空前的領導！

此種農民運動的方向究竟針對着何處呢？首先便是幫助廣東的國民政府！

## 第四節　農民運動對於國民政府北伐的幫助

國民革命北伐軍的進展，牠與中國農民運動有密切的聯繫；無論從政治影響上或軍事行動上，國民政府以及北伐軍之受農民的幫助，實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叛黨叛國的楊劉（即楊希閔劉鎮寰——農），公然做了英帝國主義的走狗，謀顛覆國民政府，壓迫廣東的革命民衆，反叛起來了。急進的兄弟們——廣東的工友——廣九廣三粵漢三鐵路工友，於戰機危迫的一瞬間，罷起工來，斷絕了敵人的交通。海陸豐一帶的農友，北江清遠花縣一帶的農友，南路東莞寶安一帶的農友，統一在省農民協會的指揮之下，一致起來；或武裝來省預備參戰，或出農軍截斷滇桂軍逃竄之後路，或收繳廣三路

線滇軍槍械，或為黨軍偵探，運輸，嚮導，皆不惜犧牲性命，站在革命的聯合戰線上，一鼓而盪平楊劉。這一次的犧牲，使我們最滿意的就是：國民政府的革命基礎多得了一些鞏固。」（見犂頭旬報第九十期合刊第十頁）

於此，可見當時的農民運動怎樣的忠實的擁護國民政府了。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所舉行的廣東省農民協會第二屆全體執行委員第一次擴大會議的宣言上面更說明農民們為什麼要去擁護國民政府？牠說：「……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決定扶助農工的政策，從此廣東的農民得到這一個助力，各縣的農民都關不住了，紛紛的起來組織為自己利益奮鬥的機關——農民協會。到現在站在犂頭旂底下的農民協會有七十縣，會員已達八十萬。在兩年艱難困苦的奮鬥當中，我們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出發韶關；我們曾牽制商團之叛變；我們曾擁護孫中山先生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我們曾參加東江之役，在後方担任運輸，在前方担任嚮導；我們曾派各縣農軍或堵截劉楊竄兵，或任間牒偵探。皆不惜犧牲性命擁護國民政府！為什麼？因為國民政府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故；因為危害國民政府的敵人，亦必危害我們故；因為要保全我們已經得到之自由與利益故！」（見犂頭週報第十五期第三——四頁）

我們看了上述的事實，關於農民運動對於國民政府與北伐軍的幫助，已經是鐵一般的證明了，因

此，那些反對農民運動說農民運動是「流氓土匪」，是「痞子」運動的人們，他們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並且，國民政府自身對於此種幫助牠是幷不否認，我們看牠對於農民運動第三次宣言是怎樣的反覆在說明農民運動對於政府的幫助；現在我們一字不改的將該宣言介紹於下，以供人們的參考：

「兩年前國民政府曾向農民作第一次宣言，不久又曾有第二次之宣言，今國民政府更以誠懇之態度，對農民作第三次之宣言：

當總理在生之時，國民黨及革命政府，已提出其重要的目的，在領導中國全體民衆，尤其是農民羣衆之參加革命，以推翻帝國主義及軍閥，致中國於自由平等；蓋深知我國欲求弭內訌，禦外侮，剷除一切之敵人，非與我受痛苦被壓迫之民衆聯合不可也。以是之故，革命政府曾於第一次宣言中，勉勵農民，使擴大其力量；革命政府欲使農民改善其生活狀況，於是與以組織各級農會及武裝自衞之權。自第一次大會宣言後，農民組織頗有進步，然政府施行此種政策，結果非使農民階級獨享其利，實使全國民衆溥受其益，而尤以革命政府所得之援助爲多。自農民組織團體以後，對於政府社會有絕大之援助，其重要者：即反對一般反動及貪利之軍閥是也。東江之役，政府討陳令下，各縣農會紛紛起而援助東征軍，或斷絕陳逆與香港之交通，或阻礙其黨羽之行動，故政府能於最短期間，肅清逆黨；在南路戰事中所得農民之援助，亦不亞於東江楊劉之役，各縣農民復一致崛起，援助政府討

平陳逆；廖部長（卽廖仲凱——農）被刺後，各縣農民及其他階級民衆，紛紛通電，誓爲廖部長復仇，打倒一切反革命份子；東莞及寶安農軍更以實力協助革命軍隊，驅逐鄭潤琦及林樹巍之反革命勢力！

農民之援助政府略如上述，試觀廣東之能實行統一：及國民革命軍之基礎之日臻鞏固，亦可知其收効之宏偉矣。農民之參加國民革命，不僅此也；彼等幷嘗竭力援助吾人反帝國主義之鬥爭，擁護香港罷工，卽其明證。蓋農民對於香港罷工，除召集各種會議，予罷工工人以精神上之援助外，幷實行參預對香港帝國主義者經濟絕交之行動也。

因農民實行參加國民解放運動，遂成爲革命主要勢力之一。且農民曾在反對軍閥鬥爭中，屢顯其能，且曾屢次爲此種鬥爭而犧牲其性命，此足爲其有政治覺悟，及願效忠於國民政府之表示。農民與政府既能如此密切合作，則政府政策之適當，可得一完滿之新證明；而吾人國民革命之畢竟成功，與孫總理之主義之終當實現，亦可獲一保證矣。然農民雖曾盡力於國民政府之偉大的援助，幷不惜犧牲爲吾國自由及獨立奮鬥，而彼等所受之痛苦與艱難，則一仍如故，未嘗稍減。

農民除受盡由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殘酷地主與其他壓迫階級之經濟壓迫，所生之痛苦外，生活程度之高漲，高額之田租，反動軍閥及帝國主義者構成之戰事；復時降災禍於農民之家庭，而農民苦

況，遂不堪問矣！現今廣東之勢力日漸擴張，此種情形，對於農民之担負，亦有絕大關係焉！

農人以政府之協助，獲得組織農民協會最徹之權利，於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對於農民協會仇視甚深，有勢不兩立之概：除鄧楊劉諸叛逆，雖經討滅，而反動官僚及小軍閥，遍佈全省，每思乘隙而動，以恢復其既失之地位，利用土匪殺戮農民，欲以消滅農會之組織，以致各處土匪圍攻鄉村，時有所聞；鄉民缺乏自衛能力，往往爲匪所害；反動派等不但欲破壞農民之組織，以減少國民政府之勢力，且直欲根本打破人民與政府之合作，故政府特於此第三次宣言中，明白表示政府自始至終，實行以往之宣言，盡力保護農民之利益，協助其組織之發展。

於此次宣言之中，國民政府敢決然再告於民衆曰：國民政府當永遠領導人民與人民之公敵奮鬥，務求革命成功而後已；迨國民革命成功，國民政府勢力擴張之後，國民政府當竭力爲農民改良其經濟狀況，當遵先總理之遺囑，設法解決土地問題，務使農民能自由使用土地；同時政府當援助人民奮鬥，務使能減低借貸之利率，及免除不合法之盤剝，政府復當援助農民反對貪官污吏參加鄉村統治權，以改善農民之政治狀況。國家之貧富，視乎農民之貧富而定，故一切不平等之事件影響於農民者，當清除之。農民亦當繼續奮鬥援助政府，肅清內外敵人；此時政府當聯合各階級，如：農民，工人，商民及智識界，共同奮鬥，以期得到最後之成功！」（見中國農民第九期一——四頁）

農民運動在北伐過程中的重要性及其對於國民政府的幫助，我們從此宣言中很清楚的看出來；但是，農民運動的進展，必然的會遇着許多反動的阻力！

## 第五節　農民運動的深入與階級矛盾的展開

「道高一尺，魔高千丈！」這雖是一句很普遍的俗話，然而以牠來比擬中國的農民運動，却是苦的眞理！

本來一種進步的歷史動力的革命運動，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那已經爲歷史送向墳墓的人們之頑強的反抗與掙扎，這是社會進化的公律，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經常的現象；中國的農民革命運動，同樣的是中國歷史動力之一，故而牠每前進一步，卽遇到許多的阻力。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僅沒有調和的餘地，恰恰相反，而是一場慘酷的撕殺！血戰的結果，自然有勝利與失敗，不過，如果指導農民運動的政黨在主觀策略上犯了錯誤，那麼，就是表面上一時的勝利局面，也會被頑強的反動力量推翻得乾乾淨淨！中國農民運動之發展的形勢如何？已經有歷史的事實替牠證明了。現在我們所要說明的僅僅是指出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浪濤中農民運動之幾個矛盾的事實與教訓罷了！

在這一階段中，農民運動中所發生的矛盾是一種三角式的形態，但是最後的結果却形成了兩個營

量。

農民與地主豪紳的衝突，是農民運動之階級矛盾的第一環。

關於地主豪紳與農民運動之直接的衝突，在廣東方面是繼續不斷的爆發，其摧殘農民協會之情形如下：

A.香山縣

1.小黃埔　小黃埔自成立農民協會以來，對於地主豪紳的鬥爭農會當然積極的領導，於是乎便因此而遭忌於土豪劣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被當地劣紳陳思敬陳華翰糾合反動份子持槍襲擊，將農會所有物件洗刧一空！

2.大岡鄉　該地農會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爲地主豪紳勾結商團圍攻，擊斃農會會員三名，并捕去農會負責人數名，將農會會所搗毀一空。

B.東莞縣

1.懷德鄉　該鄉農會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爲該鄉團正鄧遠昌副團正鄧修國糾合團丁三十餘人攻入，將孫中山肖像與黨旗農旗撕毀，并拘去會員二人。

2.涌頭鄉　被聯團強迫農民繳納聯團費，捕去農會會員二人。

C.番禺縣

鐘村鄉　鐘村特別農民協會，爲該村商團鎗去會員二人，囚禁於商會。

D.廣甯縣

最有意義的便是廣寧縣的鬥爭：這一鬥爭的起因是由於佃農的減租運動，而其結果却走上武裝衝突的前途！在減租運動過程中，豪紳地主曾一致的團結起來反抗農民運動，而以什麼「亂世無王，強奴反主，大禍壓眉，武力反抗！」（見嚮導週報一百十二期今年五一之廣東農民運動一文）的口號相號召，一面幷標貼「不承認減租，從農會者自誤！」的長紅告白。當地主們集會的時候，每人都磨拳擦掌大呼：「有田主無農會！有農會必攻破！」的口號；他們一方面以懸賞的辦法，分化幷對付農民協會：「如有臨時勇敢帮打加入農會之佃農者，願將所耕半造之租谷豁免，若被打死，恤安家費六百元，傷者包醫全愈。」（見同上）而另一方面更異想天開的發出一種類似宣言的有趣的囈語：

「蓋聞八政詳於洪範，食貨爲尙，四計陳自豳風，耕稼最重；故佃人勤勞操作，資粒食以育家人，業主仰望西成，仰升斗以供國課，此田產所關特重也。近有無恥之徒，恆心頓喪；左抽右剝，常好燕食之心，結黨合羣，每肆鯨吞之計；有此流風日熾，甚於天災之流行，竇弊叢生，慘於雀符之洗刼。獨不思噬人膏脂已非豪傑，奪人財產豈是英雄？且不視乎董卓榮膺恩相尙遭王允所誅，公瑾計取

荆州何喪巴丘之地？大抵凡事付諸天命，豈諸人力圖謀。嗣後無論諸款抽捐租穀，各業主概不承認，各佃人切勿混交，倘有違抗，乃爲自誤，願各佃共愼之！專此預聞！」（見同上）

可是，結果農民在政治力量的帮助之下，終於戰勝了反動的地主豪紳，使他們屈伏在農民的面前！

至於軍隊與地方政府（卽縣長）對於農民運動的嫉視，更是整個農民運動中的矛盾第二環。這班不法軍官與貪官汚吏的縣長，他們感覺到農民運動的興起及農民協會的存在，與他們勾結豪紳剝削農民行動有許多的妨礙，怎麽辦呢？祇有揑造一些謠言以中傷農民協會！因此，在廣東統一以後，開始北伐的時候，這般謠言鬧得滿城風雨：第一個罪名便說「農民協會是土匪」！第二個罪名便說「農民協會干涉行政與司法獨立」！第三個罪名說「農民協會主張自治是反對官治與法治」！第四個罪名是「農民協會是反對國民政府的反革命派」！其實，這是四件摧殘農民運動的法寶！怎樣的利用這四件法寶以執行反農民運動的工作呢？以下便是他們的成績：

「1.三水縣長楊宗炯，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借名剿匪，摧殘欖崗鄉農民協會，鎗殺黨員三人；八月九日捉去農會籌備員關定華，刼去八百餘元；八月七日拘捕上橫冲農會會員八人，因無罪名，出告示招人告發。又以各鄉每丁出兩毫的苛例來勒派公債票，派游擊隊在西南拉夫勒索，以散兵

成立之民團爲縣署游擊。

2.花縣縣長汪濤勾結陳烱明餘孽，專招土匪辦民團，與經政府查辦有案之江俠菴朋比爲奸，誣農會及黨部均爲土匪機關，嗾使民團截擊農會，挑撥地方惡感！

3.五華農民與逆黨劉志陸奮鬥最力，因此去年陳逆重入東江時，農會會員被殺者二十餘人，被槍殺者百餘人，屋宇被燒，財物損失，流離失所者不可計數，大寃至今未雪。而縣長胡諄現反誣農會勾結劉逆造反，電請第一軍派兵剿辦！農會召集開會，胡縣長便說是擾亂北伐後方，實是有意玷汚北伐！

4.中山縣長許義不分皂白，說農會干涉行政，縱容游擊隊長歐亮華勾結民團壓迫農會；又編匪首吳義和蘇十九爲游擊隊長，包運仇貨，搶殺農民！

5.軍隊到中山剿匪，未有剿匪，倒先把大南下鄉農會職員梁來鴻幷會員二人槍斃，不守風紀！中央黨部農民部特派員李華炤梁偉民二同志査究此事，竟被該團扣留侮辱。扣留第九區二分部常務員陳華等數人，農民自衞軍領路剿匪，結果反被留人繳械！

6.第五軍第十五師在順德龍眼裕涌黃麻涌馬崗各鄉，以剿匪爲名，專摧殘農會，拘捕會員，搜刼財物，迫辦民團。不准農會往保被押會員，遞解出省後，無法可以治罪，軍部軍法處長兼番禺聯鄉

團長張端甫又必轉解司法，經過司法再次行查，然後釋放，極盡留難摧殘之能事！

7. 廣甯匪禍蔓延全縣，農民自衞軍支持數月，傷亡枕籍；籲請政府派兵，政府初令第三軍獨立營進剿，再令第五軍周定寬團赴援，然軍隊開到廣甯後，還沒有動，似乎很相安！

8. 東江潮梅一帶，派銷公債，完全由縣署劣紳團局土豪包辦，按畝或按丁分派，且多陋規，富有千萬與貧無立錐的都一樣担負。貧農無法繳納，便要坐牢！農會替農民說話，又是止阻公債！」（見犂頭週報第十五期第六——七頁）

上面所引的一些現象爲什麼發生的呢？完全由於農民運動的深入，使階級的矛盾更加尖銳起來！許多的人（當時共產黨中央委員兼總書記陳獨秀就是其中的一個——農）認爲此種現象的發生由於農民運動的「過火」！「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可是「馬兒不吃草」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啊！這時期的農民運動雖然受到很多的阻礙，但是他在全國範圍內仍是公開的半公開祕密的進行着！

## 第六節　各省農民運動概況

關於各省農民運動的發展狀況與組織情形，依據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央農民部的報告與一九二七年

四月湖南農民運動調査的材料，這一階段（一九二五——二七年）可算是達到了歷史上空前的成績；中國農民雖然在本身上有許多的弱點，如：地方觀念的濃厚，文化水平的低下，自信力薄弱，宗族觀念等等。但是這些弱點并不是什麼『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絕症』，而革命的大風暴對於這些現象是尅服了不少，牠將那些不能集中『一盤散沙』似的農民，竟組織成爲嚴整的有紀律的革命的戰鬥隊伍！

此種農民隊伍作戰的步驟與組織力量，各省間有不同，玆特分述如下：

1.廣東省：

中國農民運動最早的發源地，無可否認的是資本主義發展最先和最深入的廣東了，牠聚積過去歷史上許許多多的教訓，如太平天國的失敗與辛亥革命之未能向前進展，以及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等等；另一方面，農村中所積聚之各種的經濟矛盾，復使農民運動有發展基礎。加之在農民運動抬頭的時期，又適逢其會的得着政治勢力的幫助，故而於組織上樹全國農民運動的楷模，僅就一九二六年五月廣東省農民協會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的統計，其組織數量有如下表：

| 路別 | 縣數 | 區數 | 鄉數 | 會員人數 |
| --- | --- | --- | --- | --- |
| 中路 | 一三 | 四〇 | 八七六 | 一〇一二九八 |
| 惠州 | 五 | 一六 | 三二四 | 二八二九七 |
| 潮梅 | 一二 | 六二 | 一八七二 | 三五二三六七 |
| 南路 | 九 | 一三 | 一四四 | 一〇〇九三 |
| 瓊崖 | 六 |  | 八三 | 八八六四 |
| 西江 | 一一 | 三六 | 七〇六 | 一一一三〇六 |
| 北江 | 五 | 一〇 | 二一一 | 一五四〇二 |
| 共計 | 六六 | 一七七 | 四一一六 | 六二六四五七 |

在廣東省農民協會指導之下的農民，有六十二萬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之多，這總算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力量吧！

2.廣西省：

廣西的農民運動，很明顯的，是爲廣東的農民鬥爭的影響所喚起來的。其主要的原因，由於廣西

與廣東有地理上的接壤的關係，所以影響較早；當廣西省黨部尙未組織以前，而懷集，蒼梧等縣，已經有農民協會的組織。雖然這些組織在開始形成的時候，幷不十分的健全和強大！然而被壓迫的農民們，他們總是爲本身利益而鬥爭，他們幷不受任何的狹隘範圍所限制；因此，有很多的縣份都爆發了反豪紳地主的劇烈的鬭爭。

一九二六年三月，成立了廣西省黨部的農民部，以農民部的力量來指導廣西省的農民運動；可是當時農民運動的方式，是採用了由上而下的委派制度，因此之故，不能吸收更廣大的農民羣衆。就廣西全省言，有農民協會的地方亦屬寥寥無幾：

A.南甯市郊農民協會；

B.懷集縣農民協會；

C.蒼梧縣農民協會；

以上兩縣一市的組織，共包括鄉農民協會三十四處，有組織之農民約八千餘人。

3.四川省：

四川的農民運動可以分作兩個時期：第一時期，由一九二六年三月至十月；第二時期，由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在第一時期以前，農民鬭爭縱然是繼續不斷的存在，不過沒有爆發成爲廣大

的農民革命能了！并且，在綦江，營山，南川等縣，農民們為適應客觀環境的需要，已經組織起自己的組織——農民協會的組織。迨至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後，四川成立了臨時省農民部，其工作方式偏於線索的尋找以及關係的建立，至於真正的領導農民羣衆的鬬爭，尚待諸未來的努力。在此期內，有組織的農民羣衆，僅有綦江，南川，營山，順慶，宜賓，酆都，合川，巴縣，江北等地而已。第二時期是農民運動幹部的產生；這批農民運動的幹部，都是廣州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的學生。他們在革命的廣州，吸收了許多鬬爭的經驗，所以回到四川的時候，便相當的領導了農民們的實際鬬爭！

并且，在鬬爭當中，建立了很多農民鬬爭的基礎——農民協會的組織。所有這些組織的數量，據中央農民部的報告如下：

| 縣名 | 區會 | 鄉會 | 會員人數 |
|---|---|---|---|
| 營山 | 二十二區 | 四十八鄉 | 五、〇〇〇 |
| 巴縣 | | 三鄉 | 三九〇 |
| 綦江 | | 五鄉 | 一、〇五〇 |
| 宜賓 | | 三鄉 | 七三〇 |
| 慶符 | | 一鄉 | 一二〇 |

| | | |
|---|---|---|
| 高縣 | 一鄉 | 三〇〇 |
| 江北 | 一鄉 | 四五〇 |
| 南川 | 六區 | 一、三四八 |
| 珙縣 | 一鄉 | |
| 南充 | | 四〇〇 |
| 總計 | 共二十八區 | 一三、四七八八 |

4.湖南省：

湖南農民就組織的階段來說，可分爲兩個時期：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九月，爲第一時期。在此期間，農民運動的方式仍是採取『祕密的』甚至『半公開』的方式，有組織的農民羣衆，雖然有三四十萬，可是這些羣衆，還沒有參加什麼鬭爭；同時，他們的工作，僅僅爲北伐軍担任嚮導，偵探和挑夫的任務，所以軍官們都誇贊他們爲很好的馴羊！

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爲第二時期，也可以叫着農民革命的時期！在這很短的四個月的期間，農民協會的會員，激增到二百萬；在農民協會直接指導之下的羣衆，竟增加到一千萬之多（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上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羣衆有一千萬——農）！在湖南全體農

民中，幾幾乎組織了一半！

農民們既有了廣大的組織，他們便開始行動起來，此種行動的激烈和深刻，便造成了一個空前的農村革命！

湖南的農民們，他們革命的目標，是土豪劣紳和地主，以及農村中各種封建的殘骸——宗法思想和制度以及貪官污吏，他們的槍口同樣的也對着這些東西瞄準！這一農民革命的形勢，簡直是和疾風暴雨一般，眞有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的氣概。結果，是將豪紳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而過去那班豪紳地主的體面與威風，亦復摧殘殆盡！當時的情形，眞是達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的程度了！

過去有許多咒罵農民運動爲『痞子運動』或『惰農運動』的豪紳們，這時候也紛紛的要求加入農民協會；雖然，他們的加入農民協會，並不是由於自己的信仰，恰恰相反，而是爲革命形勢所威嚇的結果。但是當時的湖南的農民們，眞是『說得出做得到』，他們往往捉住了土豪劣紳，並不經過什麽『法律的手續』，就自己審判起來；如土豪劣紳時常遭受『戴高帽子』『遊鄉』的厄運。因此，便有很多的人們就感覺得這種運動的『過火』而發生『糟得很』的議論！誠然，當小劣紳說：『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會！』而農民的回答是：『嘻！誰要你的臭錢！』要『把你入另册』呢！（註：前清

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種；好人入正册，盜匪等壞人入另册。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入另册」的話去威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敵人！）

湖南農民鬬爭的尖銳，於此可見一斑了！

鬬爭的緊張，農民組織也得到空前的發展。其全省農民組織的情形，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統計，實有驚人的成績，茲特附錄如下：

| 縣別 | 區鄉會員成份 | | | | | | | | | | | 會員數量 |
|---|---|---|---|---|---|---|---|---|---|---|---|---|
| | 區協數 | 鄉協數 | 雇農 | 佃農 | 半自耕農 | 自耕農 | 手工業者 | 小學教師 | 小商人 | 婦女 | 其他 | |
| 湘鄉 | 四四 | 四九八 | 一六、四〇〇 | 九一、五〇〇 | 四一、〇〇〇 | 一三、一〇〇 | 二八、〇〇〇 | 五四〇 | | | | 一九〇、五〇〇 |
| 湘陰 | | 六七一 | 一〇、八五七 | 八七、五三〇 | 五二、六三五 | 一四、七九三 | 一三、三一四 | 一五一 | 六三四 | 五七 | 四〇〇 | 一七六、〇〇〇 |
| 瀏陽 | 二 | 五六八 | | | | | | | | | | 一三九·一九〇 |
| 湘潭 | 七一七 | 四五〇 | 三七、〇〇〇 | 五四、一〇〇 | 一三 四〇〇 | 八、四六〇 | 七、四〇〇 | 一、一〇〇 | | | | 一三〇、四六〇 |
| 衡陽 | 三三 | 二四四 | 三七、二五八 | 三七、七二五 | 七、五三三 | 五、六二八 | 六、一三五 | 二、二五六 | | | 一五七九 | 八八、三三三 |
| 長沙 | 一三 | 六四〇 | 一七 五二九 | 三五、二四八 | 九、一三二 | 五、三八一 | 四、九一五 | 一、四二五 | 一、四六三 | 六三四 | | 六六、四二五 |

| | | | | | | | | | | | | |
|---|---|---|---|---|---|---|---|---|---|---|---|---|
| 化 | 一五 | 一三〇 | | | | | | | | | | 六三、二〇〇 |
| 醴陵 | 一五 | 三三三 | 六、四七六 | 三五、四六〇 | 六、九二〇 | 三、九五八 | 三、六四三 | 二三〇 | 六〇二 | 一九五 | 六八三 | 五八、四七八 |
| 寧鄉 | 一八 | 四〇〇 | 五、〇〇〇 | 三〇、〇〇〇 | 一〇、〇〇〇 | 四、〇〇〇 | 八、四〇〇 | 六〇〇 | | | | 五八、〇〇〇 |
| 郴縣 | 一四 | 六九六 | 一六 七三五 | 二、八九八 | 二、一二四 | 二、〇五〇 | 五、七三二 | 一二八 | 一〇〇 | 一六 | | 五七、二六三 |
| 衡山 | 一三 | 二〇二 | 二、六二三 | 一六、九九三 | 二、七六五 | 二、一七四 | 三、三二八 | | | | 一、一三三 | 三〇、〇一六 |
| 近郊區 | | 一九六 | 九、五〇九 | 一〇、六四六 | 三、五六三 | 二、八九三 | 一、七九四 | 三三三 | 五八二 | 一五六 | | 二九、四七五 |
| 臨武 | 六 | 三三 | 二、一八三 | 一〇、一四二 | 四、一四六 | 二、二四一 | 九三一 | 二五四 | | | | 二〇、〇〇〇 |
| 攸縣 | | 二九 | | | | | | | | | | 一八、四〇〇 |
| 益陽 | 七 | 六七 | 一、五六八 | 五、〇一七 | 六、五八六 | 一、五八六 | 七八四 | 三三 | 一二六 | | | 一五、六八〇 |
| 華容 | 〇六 | 四九 | 二、〇〇〇 | 六、五九五 | 二、四五三 | 一、八八七 | 五〇二 | 一、二一六 | | | | 一四、六五三 |
| 宜章 | 一〇 | 一八五 | 一、四二八 | 八、九三六 | 一、六三七 | 一、一八三 | 八〇二 | 八七 | | | | 一四、一八三 |
| 耒陽 | 九 | 一四九 | 一、一四五 | 六、八六五 | 二、六八四 | 二、八四四 | 三四二 | 六六 | | | | 一三、九四六 |

| | | | | | | | | | | | |
|---|---|---|---|---|---|---|---|---|---|---|---|
| 臨醴 | 六 | 四九 | 二、〇〇〇 | 三、〇〇〇 | 二、四〇〇 | 四、〇〇〇 | 二〇〇 | 六〇 | | | 一一、六六〇 |
| 茶陵 | 四 | 一二四 | 五〇〇 | 七、〇〇〇 | 二、五〇〇 | 一、〇〇〇 | 二〇 | 六〇 | | | 一一、二六〇 |
| 永興 | 一六 | 一〇七 | 一、二〇〇 | 二、八〇〇 | 四、〇二〇 | 二、二〇〇 | 二〇〇 | 三〇 | | | 一〇、四五〇 |
| 平江 | 一七 | 一六三 | 一、〇二三 | 四、二三八 | 一、七八二 | 一、六二三 | 一、〇九二 | 二四 | 八五 | 四 | 四三 | 一〇、一五二 |
| 新寧 | 九 | 一二五 | 一、七二三 | 六、五三三 | 八五八 | 三七五 | 一八四 | 七四 | | | 五、七四六 |
| 常德 | 三 | 五九 | 八九〇 | 二、八〇〇 | 二、〇八〇 | 三五〇〇 | 三二〇 | 六五 | | | 九、五四五 |
| 寶慶 | 七 | 一三六 | 一、四三八 | 三、三六七 | 一、四八二 | 一、七四四 | 七七二 | | | | 九、三七七 |
| 武岡 | 八 | 四〇 | 一、八〇〇 | 四、五〇〇 | 九〇〇 | 九〇〇 | 九〇〇 | 九〇〇 | | | 九、〇〇〇 |
| 汝城 | 六 | 四六 | 四〇六 | 四、一九五 | 二、六五七 | 一、二二八 | 四一 | 三八 | | | 八、八六五 |
| 漢壽 | | 六九 | 一、一一五 | 三、二七六 | 一、〇四七 | 一、一七八 | 二二八 | 三三 | 六一 | 七八 | | 七、二三六 |
| 南漢 | 六 | 四九 | 一、三八四 | 四、〇六四 | 九〇七 | 四〇六 | 六九 | 八九 | 四五 | | 三六 | 七、〇〇〇 |
| 株萍路 | | 二 | 九九七 | 三、一五二 | 七三三 | 五三九 | 六八七 | 五〇 | 二九七 | 一〇 | | 六、四六四 |

| | | | | | | | | | | | | |
|---|---|---|---|---|---|---|---|---|---|---|---|---|
| 新化 | 六 | | 一、五二六 | 三、二四六 | 四九七 | 四三四 | 四七三 | 二〇三 | | | | 六、三七七 |
| 桂陽 | 四 | 五三 | 四四五 | 二七四 | 一、六七三 | 一、五三五 | 四〇三 | 二四 | | | | 六、二四三 |
| 祁陽 | 一五 | 七〇 | | | | | | | | | | 六、〇〇〇 |
| 酃縣 | 一三 | 四八 | 一、三一三 | 一、九一七 | 一、九一七 | 四九三 | 五四六 | 二一八 | 三八三 | | | 五、四六八 |
| 資興 | 五 | 七九 | 二、一四八 | 一、一一三 | 一、一一三 | 三四一 | 六九〇 | 一三 | | | | 五、三三四 |
| 桂東 | 七 | 九五 | 八一六 | 一、一五六 | 一、一五六 | 一、五〇七 | 九四 | 六三 | 二〇四 | 二九七 | 二五 | 五、一九三 |
| 新田 | 八 | 四七 | 四五六 | 二、九二 | 二、九二七 | 四八八 | 二九九 | 二五 | | | | 五、一五〇 |
| 常甯 | | 十八 | 四八六 | 二、二七八 | 二、二七八 | 五三〇 | 九六 | 一三 | | 三四 | 一七八 | 四、五四〇 |
| 慈利 | 二 | 四八 | 二六三 | 一、五〇〇 | 六〇一 | 一、八〇六 | 二二六 | 四〇 | | | | 四、四九〇 |
| 臨湘 | 七 | 九五 | 六二四 | 九九五 | 八四七 | 一、一九五 | 四七 | 三一 | 一〇五 | 一五二 | 八二 | 四、〇七一 |
| 桃源 | 七 | 三五 | | | | | | | | | | 四、〇〇〇 |
| 沅江 | 三 | 一九 | 二四二 | 一、一七四 | 五二〇 | 一、六一五 | 二四三 | 四六 | | | | 三、八二九 |

| | | | | | | | | | | | | |
|---|---|---|---|---|---|---|---|---|---|---|---|---|
| 藍山 | 四 | 五二 | 七六五 | 一、四九九 | 六〇四 | 三八五 | 四一 | 二一 | | | 三五 | 五、一五〇 |
| 澧縣 | 四 | 一〇 | 五九七 | 一、〇三三 | 三八九 | 二四九 | 二一五 | 六六 | | | | 二、五四九 |
| 嘉禾 | 三 | 二七 | 二九五 | 五九八 | 五八八 | 八五〇 | 八九 | 三三 | | | | 二、四三三 |
| 安鄉 | 六 | 一三 | 二八〇 | 七六〇 | 六八〇 | 四四〇 | 一三〇 | 一八 | | | | 二、二九八 |
| 永明 | 五 | 三二 | 五八 | 五二三 | 一、一五〇 | 四二〇 | 二 | 二 | | | | 二、一八二 |
| 岳陽 | 七 | 四七 | 一三六 | 八三〇 | 四一〇 | 五五八 | 六五 | 二 | | | | 二、〇二〇 |
| 敍浦 | 二 | 一二 | 五四〇 | 七一五 | 三三一 | 二〇四 | 一〇八 | 七 | | | | 一、九七五 |
| 道縣 | 一三 | 三九 | 一三六 | 五四〇 | 二八二 | 四〇三 | 五六 | 一八 | | | | 一、四三五 |
| 瀘溪 | 三 | 一七 | 一〇二 | 三五〇 | 五二〇 | 二四〇 | 八三 | 一五 | | | | 一、三二六 |
| 綏甯 | 四 | 一五 | 一二一 | 三一四 | 三三二 | 二九七 | 一三 | 三四 | | | | 一、一二一 |
| 甯遠 | 八 | 一三 | 八六 | 四八〇 | 一〇五 | 一五九 | 四二 | 二〇 | | | | 八二九 |
| 城步 | 一 | 八 | 一三〇 | 一九五 | 三七二 | 一〇一 | 七四 | 三三 | 一四 | | | 八八九 |

| | | | | | | | | | | | | |
|---|---|---|---|---|---|---|---|---|---|---|---|---|
| 零陵 | 四 | 一五 | 二三 | 一三三 | 一六七 | 二五二 | 八 | 二六 | 二九 | | 五九 | 六九七 |
| 麻陽 | | 九 | 一三〇 | 三四八 | 三六 | 一九 | 四 | 三 | 二 | 二 | 四八 | 六三〇 |
| 芷江 | | 四 | | 一一八 | 一六 | 七三 | | 七 | | | | 三七四 |
| 總計 | 四六 | 一六〇 | 八六七 | | | | | | | | | 一、三六〇、七二七 |

（註）此表係引自毛澤東著湖南農民革命（一）一書。

5.湖北省：

湖北有組織的農民運動，開始於一九二五年七月。雖然，在有組織的農民運動以前，已經爆發了不少次的農民自發的鬬爭；如民國十四年，湖北遭受了空前的旱災，當時被災的區域竟有六十九縣之多。所有這些被災的飢民，他們爲生活所驅使，不得不向鄉村中間的富有者作劇烈的鬬爭——「吃大戶」的運動；因此，那班地主豪紳與富農都遷避一空，飢民無從得食，祇好以樹皮草根與觀音土爲維持生命的原料！這種環境，對於湖北農民運動有很大的客觀上的幫助，是未來的湖北農民革命的伏流！據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央農民部的調查，其組織情形如下：

| 縣名 | 區會 | 鄉會 | 會員人數 |
|---|---|---|---|

| | | | |
|---|---|---|---|
| 黃梅 | 二區 | 五鄉 | 八百人 |
| 漢川 | 二區 | 七鄉 | 一千三百人 |
| 棗陽 | 二區 | | 四百七十人 |
| 黃坡 | 一區 | | 一百三十人 |
| 蒲圻 | 一區 | 四鄉 | 二百四十人 |
| 天門 | | 二鄉 | 一百人 |
| 應城 | 一區 | 一鄉 | 二百三十人 |
| 當陽 | 二區 | 二鄉 | 三百人 |
| 黃崗 | 二區 | 四鄉 | 五百六十人 |
| 合計 | 三十三區 | 二十五鄉 | 四千一百二十人 |

6.江西省：

江西的農民，在民國十五年遭受了很大的水災，這水災直接影響的結果，使農民生活更加痛苦，而陷於破產和窮困的悲慘境遇中。他們爲防禦水災而奮鬭，爲生活而奮鬭，曾舉行過廣大的悲壯的政治示威！在這次示威當中，他們曾以暴力的手段，燒毀土豪劣紳的房屋，以爲壓迫農民者的烱戒！不

過，有組織的農民運動，在江西是於一九二六年四月開始的，僅僅六個月的時間，已獲得如下的成績：

| 縣名 | 區會 | 鄉會 | 會員人數 |
|---|---|---|---|
| 永修 | 六區 | 三〇鄉 | 一、二一六 |
| 都昌 | 五區 | 三一鄉 | 一、二〇〇 |
| 吉安 | 四區 | 二四鄉 | 一、〇八四 |
| 九江 | 三區 | 一二鄉 | 六六二 |
| 萬安 | 二區 | 一〇鄉 | 六五四 |
| 弋陽 | 三區 | 一〇鄉 | 四二七 |
| 星子 | 四區 | 七鄉 | 六七三 |
| 吉水 | | 二鄉 | 二八〇 |
| 德安 | | 一鄉 | 四〇 |
| 新建 | | 一鄉 | 四〇 |
| 總計 | 二八區 | 一二八鄉 | 六、二七六八 |

7.安徽省：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安徽的農民運動并無成績之可言，其原因并不是由於農民的「不革命」與「腐化」，而是在主觀上缺乏獨立的農民組織的領導。因此，農民運動有組織的地方，僅宿縣，壽縣，六安三縣而已！

8.福建省：

一九二五年九月，福建即開始有組織之農民運動，可是截至一九二六年十月，這種運動尙無多大進展；有組織的地方，僅僅是限於與廣東相鄰的詔安，永定等縣，相當的起一些領導羣衆鬥爭的作用。

9.山東省：

山東農民的生活，與東南數省比較起來是最爲痛苦，這些貧苦的農民，連年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層層的壓迫之下，的確是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一大羣破產的山東農民，除了一部份移徙關外而外，大部份跑去當軍閥的砲灰，或者是流入於土匪隊伍之中！

關於山東農民組織的情形，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山東省黨部農民部的報告，有萬城，淄川，廣饒，壽光，陵縣，歷城，高密，濟寧，桓台，濰縣，郯縣，長淸，益都等十三縣農民協會的建立，其會員

人數有如下表：

| 縣名 | 鄉會 | 會員人數 |
|---|---|---|
| 禹城 | 一鄉 | 二四〇 |
| 齊河 | 一鄉 | 九〇 |
| 淄川 | 一鄉 | 二四 |
| 廣饒 | 三鄉 | 五〇 |
| 壽光 | 一鄉 | 二二 |
| 歷城 | 二鄉 | 二〇 |
| 桓台 | 一鄉 | |
| 益都 | 二鄉 | 四五 |
| 諸城 | 二鄉 | |
| 合計 | 一四鄉 | 四九一 |

10. 河南省：

一九二五年八月，河南開始有組織的農民運動；迄至一九二六年四月，當中經過八個月期間的工

作，已經組成了四個縣農民協會，二百餘個村農民協會，而農民運動已經有可驚的長足的發展！吸收會員人數約二十七萬，而加入農民自衛軍者亦有十萬餘人！爲什麼在河南有這樣廣大羣衆來參加農民協會呢？似乎有說明之必要：因爲河南在文化上是比較落後，在經濟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像廣東那樣迅速，同時農民們又時遭受水旱天災的侵犯，以及軍閥戰爭之殘酷的蹂躪，這些原因，經過了一個相當時期的孕育，領導農民革命的政黨又沒有積極的起領導作用，因此，很自然的會誕生一個原始的迷信的但有廣大羣衆參加的組織——『紅槍會』的組織。這種的組織很能夠迎合一部份落後人們的心理。那所謂『元始天尊』『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這些奇怪妄誕的神話，正適合於農民的胃口！

河南各級農民協會的組織，大多數由紅槍會蛻化而成立的！至於這些農民協會的所在地與組織數量，爲便於參考起見，特介紹如下：

| 縣名 | 縣會 | 區會 | 鄉會 | 會員人數 |
|---|---|---|---|---|
| 信陽 | 已成立 | 五區 | 二六鄉 | 二八、五〇〇 |
| 許昌 | 已成立 | 四區 | 五八鄉 | 四八、〇〇〇 |
| 滎陽 | 已成立 | 三區 | 一七鄉 | 一三、〇〇〇 |

| | | | | |
|---|---|---|---|---|
| 杞縣 | 已成立 | 七區 | 三八鄉 | 四八、五〇〇 |
| 睢縣 | | 一區 | 九鄉 | 一六、〇〇〇 |
| 修武 | | 二區 | 二六鄉 | 一九、〇〇〇 |
| 安陽 | | 三區 | 二一鄉 | 二五、〇〇〇 |
| 汲縣 | | 一區 | 六鄉 | 一五、〇〇〇 |
| 郾城 | | 一區 | 六鄉 | 一五、〇〇〇 |
| 長葛 | | 三區 | 三一鄉 | 一七、五〇〇 |
| 密縣 | | 二區 | 二九村 | 一二、〇〇〇 |
| 合計 | 四 | 三十二區 | 三二八鄉 二九村 | 二四五、五〇〇 |

11.直隸省：

直隸省的農民運動，開始於一九二六年。當時如邱縣，獲鹿，玉田，文安，無極等縣，均有激烈的農民鬥爭以充實這運動的內容，依據一九二六年中央農民部的報告，其組織情形有如下表：

| 縣名 | 區會 | 鄉會 | 會員人數 |
|---|---|---|---|
| 順義 | 三區 | 一八鄉 | 八〇〇 |

| 縣 | 區 | 鄉 | 人數 |
|---|---|---|---|
| 宛平 | | 三鄉 | 一九〇 |
| 樂亭 | 三區 | | 一五〇 |
| 玉田 | | | 五〇〇 |
| 饒陽 | | | 一五〇 |
| 蠡縣 | | | 五三二 |
| 清宛 | | | 五〇 |
| 總計 | 六區 | 二一鄉 | 一、八七二八 |

12.山西省：

關於山西農民運動的情形，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以前，尚未有長足的進展，不過當時農民協會還可以領導羣衆經常不斷的作經濟的與政治的鬥爭。茲將該省農運的組織狀況與鬥爭情形分述如下：

A.組織狀況：

1.趙城：　三千餘人；

2.臨汾：　四十餘村，人數未詳；

3.靜樂：　一千五百餘人；

4. 翼城：五百餘人；

5. 離石：二千餘人；

6. 滎河：人數未詳；

7. 霍州：五百餘人；

8. 定襄：人數未詳；

9. 太谷：人數未詳；

10. 祁縣：人數未詳；

11. 洪洞：五十餘人；

12. 淳縣：六村，人數未詳；

B. 鬥爭情形：

(一)經濟的：

A. 趙城：有一個很大的票號驟然倒閉，農民們從艱難困苦的生活當中積聚少數金錢——票幣，自該票號倒後，這些金錢都變成不兌換的紙幣。同時，趙城縣長又和該幣號勾結，實際上是企圖以這種手段來達到他們欺騙農民金錢的目的；可是農民們自經過革命政黨的指導，以數萬廣大羣衆的力量對

縣政府作一種示威的包圍，結果是得着相當的勝利。

B.臨汾：因反抗煤稅，發動了廣大農民羣衆的參加，結果獲得完全的勝利。

C.文水：發動全縣農民起來反抗屠宰稅的鬥爭！

（二）政治的：

A.洪洞：在選舉村長的運動中，農民協會號召了全縣農民參加這一運動，并在這一運動當中無情的揭破土豪劣紳包辦選舉的假面具，選出了農民運動的戰士，但是結果爲統治階級所壓平。

B.夏縣：爲打破土豪劣紳包辦村長選舉起見，山西省農民部曾發動農民羣衆積極的參加村長選舉的鬥爭，并提出在選舉運動中革命要求的綱領，以肅清農民羣衆對於虛僞的民主主義的幻想！

13.熱河省：

熱河的農民運動，開始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已經有很大的發展；此種發展的原因，一方面固然由於客觀環境有利於農民運動的興起，而農民運動戰士的努力，也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其各地農民協會組織的情形如下：

1.赤峯　——縣農民協會——委員——　二八

沙水坡　區農民協會　會員　一二七八

水地　村農民協會　會員　四三人
安春營子　鄉農民協會　會員　九六人
三家　村農民協會　會員　六二人
馬架　村農民協會　會員　八五人
三川道大屯　鄉農民協會　會員　二五二人
老西店　村農民協會　會員　二二人
哈拉包頭　鄉農民協會　一一七人

2.平泉——縣農民協會——委員——三人

小城子　區農民協會　會員　二一二人
牛頭溝門　區農民協會　會員　一八四人
七家　村農民協會　會員　六二人
橋頭灣子　村農民協會　會員　三八人
旺業甸　鄉農民協會　會員　一一九人
呵奇馬溝　村農民協會　會員　四一人

| | | | |
|---|---|---|---|
| 樓子甸二道營子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七二八 |
| 上下十家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六八八 |
| 王安池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一八 |
| 長泉溝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〇八八 |
| 房身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四一八 |
| 西橋頭土城 | 區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八三八 |
| 3. 建平 | ——縣農民協會—— | 委員—— | 三八 |
| 黑水鎮 | 區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一三八 |
| 哈爾道口 | 區農民協會 | 會員 | 三六九八 |
| 唐神樹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〇五八 |
| 申官營子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八二八 |
| 達成營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三三八 |
| 臥佛寺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〇九八 |
| 建成營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八三八 |

| | | | |
|---|---|---|---|
| 錦降公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七一人 |
| 剛柎剛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三人 |
| 海山高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七人 |
| 西湖樹台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四一人 |
| 4.朝陽 | ——縣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人 |
| 大廟 | 區農民協會 | 會員 | 九八人 |
| 清溝梁底 | 區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二九人 |
| 張家窩舖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七一人 |
| 韓家村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八六人 |
| 朝陽寺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〇一人 |
| 桃古圖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六二人 |
| 布魯親營子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三三人 |
| 5.凌源 | ——縣農民協會—— | 委員—— | 三人 |
| 北宮三十家子 | 區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四四人 |

| | | | |
|---|---|---|---|
| 哈八氣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八六人 |
| 拉嘛洞溝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七二人 |
| 平房子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二三人 |
| 小孤山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九三人 |
| 八家子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三一人 |
| 東大梁底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八人 |
| 梁家林子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三五人 |
| 熱水塘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九人 |
| 萬八店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三一人 |
| 6. 圍場 | ——縣農民協會—— | 委員—— | 三人 |
| 錐子山 | 區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四三人 |
| 九畝地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四四人 |
| 松樹梁底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五七人 |
| 賈家地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三八人 |

| 地名 | 組織 | 職別 | 人數 |
| --- | --- | --- | --- |
| 小潘家地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五人 |
| 7. 隆化 | ——縣農民協會—— | 委員—— | 三人 |
| 一百家子 | 區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六〇人 |
| 韓家營子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六九人 |
| 黃抓村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五人 |
| 鶯窩溝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三七人 |
| 老公地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二人 |
| 8. 豐寧 | ——縣農民協會—— | 委員 | 二人 |
| 蘇武廟 | 區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三三人 |
| 大亮樹 | 鄉農民協會 | 會員 | 九一人 |
| 溫泉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九人 |
| 大坎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一人 |
| 樊家狀子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三二人 |
| 9. 灤平 | ——縣農民協會—— | 委員—— | 二人 |

| | | | |
|---|---|---|---|
| 虎口哈 | 區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〇五人 |
| 布爾諾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八人 |
| 三道梁子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三〇人 |
| 紅不拉渚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二二人 |
| 常山玉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一八人 |
| 三義口 | 村農民協會 | 會員 | 三九人 |

14.察哈爾：

察哈爾的農民運動，雖開始於一九二六年，但截至一九二七年二月止，尚無很大的收穫，關於農民運動有組織的地方，僅如下數處而已！

A.張家口近郊：區農民協會會員一百五十餘人。

B.萬全縣：西區農民協會會員一百餘人。

C.張北縣：村農民協會會員五十餘人。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這一階段中，各省農民運動實況大致如此，自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後，中國的農民運動因整個的革命形勢與政治環境的轉變，將變成另一種形式！

# 第十章 一九二七年以來的農民騷動與中國共產黨的盲動政策

## 第一節 形成盲動主義之中國社會的前提

「沙皇帝制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夫反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頹廢，分裂，解體，叛變，與夫風月的詞章代替了政治的地位。唯心論的哲學趨向加厲了；神秘玄學，成爲掩飾反革命情緒的工具了。但同時亦即因這種大失敗，正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正眞的最有效的教訓：給以歷史辯證法的教訓，給以領導政治鬥爭的理解，能力，與藝術的教訓。患難中正可以結識知交。戰敗的軍隊正可以學得許多很好的經驗。」（左派幼稚病）

自一九二七年七月以來，因整個的革命形勢與政治局面的轉變，其影響於中國農民運動實是異常的深刻，最顯明的便是全國各地——尤其是中國南部所爆發之繼續不已的農民騷動。此種農民騷動的

動因，一方面固然由於目前社會內部所蘊蓄的經濟矛盾，而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盲動策略也是助長此種農民騷動的發展！我們如果很單純的認為農民騷動之由於經濟矛盾而忽視了共產黨領導的作用，這顯然的是不合事實的幻想，同樣的，認為農民暴動之簡單的由於「共黨的作祟」，也是一種極不科學的武斷！須知道中國四五年來的農民騷動，是共產國際與中國社會之特殊的混合產品！關於中國社會之特殊的經濟結構，我們在以上各章中已經詳細的說及，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共產國際盲動主義（盲動主義是機會主義之左的極端——農）政策在中國形成的社會前提。

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盲動政策形成的社會前提呢？

第一，整個中國無產階級的幼稚。中國歷史舞台上已經發現了無產階級，這並不是什麼馬克斯主義的教義問題，而是歷史的事實。但是，問題却在這裏！馬克斯對於階級發展的過程認為有兩個階段：僅僅是生產動力的階段，謂之「自在之階級」；如果這個階段牠已經能夠自覺是一種社會力量，而且能以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與其他階級相對抗，那便謂之「自為之階級」。他在哲學之貧困一書中曾說：

「經濟關係先將一羣人民變成工人。資本的統治造成這羣人（工人）的共同地位和共同利益。這樣，這羣人與資本相對待已經成了一個階級（工人階級還祇是生產之動力，還祇是「自在之階級」——

著者），——但是，還不是自己爲自己的階級。在鬥爭之中，羣衆找着自己，建立成自己爲自己的階級。要使工人羣衆所擁護的利益，才成爲階級的利益呢。』（自斯徒夸夫著：無產階級鬥爭之戰術與策略十五頁引來）

中國的無產階級，因國際和國內的事變，縮短了階級鬥爭的距離，即是說由『自在之階級』進至『自爲之階級』的階段的過渡是非常短促，使幼稚的無產階級很早的闖上了政治舞台；并當其剛跨進政治舞台大門的時候，便遇着中國巨大的事變——五卅運動！

第二，無產階級基礎薄弱。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綱領上雖然是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然而在組織基礎上，無產階級的成份還是非常的脆弱；據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小資產階級的成份竟佔百分之七十五。小資產階級的成份可算是佔黨內絕對大多數。故其結果，因組織上無產階級基礎的薄弱，那些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意識與傾向，必然的會反映於黨的政策方面，在革命過程中犯了很大的罪惡！

第三，缺乏政治教育。過去的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提高了一班黨員的政治水平，并且，恰恰相反，而使黨員成了一種『受命唯謹』的基督徒；譬如一些所謂領袖的幹部，他們大多數從莫斯科回來，除了瞻仰赤都一些革命偉人（如斯大林）的豐采與僅僅學會幾個生吞活剝的政治名詞而外，至於

怎樣的將革命的理論應用到中國實際問題方面去，那是他們最不願意考慮的事情。因此，不能與行動配合的革命理論，羣衆還是莫明其妙！過去有很多的朋友們說中國缺乏一個列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列寧與十個列寧的問題，而是怎樣的去提高一般羣衆的政治教育！固然，「理論是行動的指南」，而「不是教條」！然而烏里亞諾夫很早就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

第四，游民無產階級的意識的反映。一般人們都知道游民無產階級的意識，在社會意識上是不正確的；此種意識之具體表現，有三種形式：

A.報復觀念：革命是歷史動力，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現象，牠的目標是在利用人間的基礎去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絕不是簡單的報服。報服觀念是農民的劣根性——尤其是游民無產階級的劣根性。

B.拚命主義：革命與拚命之間，似乎有個很是遙遠的萬里長城隔着一樣；革命他一方固然要去觀察客觀的環境，同時對於主觀力量的審查也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換一句話說，革命是有整個的戰術與策略；而拚命則反是，牠企圖以一時的感情衝動的一己之勇去戰勝不可能的困難。

C.燒殺傾向：無條件的燒殺，牠僅僅是盡了毀滅物質的基礎與肉體消滅的作用，其對於革命將造成無窮的罪惡！

第五，小資產階級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斯大林，布哈林的門徒，他們多半是

小資產階級的出身，他們不認識革命是歷史的任務，而把牠當作一種兒戲的勾當！其實，一種革命的帶鋒芒的運動，不僅是依靠人們傳播牠的種子，同時，還要去觀察廣大的收穫。這種過程彷彿和農民們播種穀物一樣，當穀子剛被播種下土的時候，牠是被泥水淹沒而發生一種辯證式的質量的變化，即令是秧苗滋長的時期還不能說牠是已經達到了收穫的階段。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他們因爲帶着顏色眼鏡的關係；見着秧苗的滋長，便誤會爲穀子之已經成熟，在這種情勢之下，於是乎他們便手舞足蹈的集中一切的力量來從事於刈稻的工作工。可是，樂極生悲，歷史彷彿又和他們開了一次玩笑似的而令其大失所望：原來所收穫的幷不是什麼穀子，而是那尙未結穗的秧苗！

第六，盧布系統。中國共產黨的盲動主義與盧布系統實有密切的不可分離的有機的聯繫，牠使盲動政策的執行更加得着一重保障。本來一種大規模的革命運動，是需要物質上的幫助，如少數革命職業家生活的維持以及大規模的宣傳用費，不能不仰賴於資本主義社會唯一的法寶——金錢，因此，在某種條件之下，金錢對於革命運動幷不是什麼罪惡，而是必需的東西。但是，這裏幷不是說要一般人，都來「穿革命，吃革命，酒色革命」（這是一個工人的話——農），換言之，即是金錢的消費適當與否。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對於這點，他們始終是不願意了解，却「慷慨解囊」而大開其慈善之門，故而在生活上善成了一種津貼黨員的習慣，更加助長了盲動的火焰！例如當決定暴動策略的時

候，有些農民幹部提出了：「暴動失敗以後怎樣辦？」而領袖們的囘答不是「生活由黨維持！」便是「派到莫斯科去學習！」

此種雇傭革命的現象，在中國革命史上誠然是最大的汚點啊！

第七，委派制度與命令主義。這雖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內部組織問題，但牠的確與盲動主義有很大的淵源。因為委派制度在組織上是由上而下的系統，牠根本就與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的精神背道而馳；并於這一制度之下發生了「官僚化」（說錯了！紅色官僚！——農）的傾向與現象；那些為要嘗一嘗「紅色官僚」滋味的人們，他們情願去受盲動政策的鞭撻！至於命令主義，更是輔助委派制度與執行盲動政策的最好法寶！如果羣衆對於暴動懷疑，那麼，中國斯大林主義者，便要抬出「國際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以及「省委的命令」相威嚇。唉！命令主義「眞是張天師的靈符」，可惜，牠不能驅除摧殘人民的惡魔！

## 第二節　『八七會議』與農民暴動

盲動主義在中國既然有牠的客觀的社會基礎，而共產國際在主觀上又犯了很大的罪惡，於是乎那已經死去了盲動主義的理論，現在又為斯大林布哈林輩從博物館中搜羅出來并經過瞿秋白的手翻譯到

中國，而獲得「發榮滋長」的機會！此種盲動主義的理論，并不是簡單的由於對於革命形勢估量的錯誤，說得確切一點牠實是對於馬克斯主義之無情的修改啊！盲動主義理論的發揮與農民暴動的開始，其主要點完全立足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的精神之上。在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中，關於盲動主義的理論可算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也可以說，該決議案是這一階段中關於農民運動策略之一切盲動理論的泉源！「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無怪乎瞿秋白們與高采烈了！

該決議劈頭就說：

「農民的革命運動，在國民政府的境域內有廣大的發展，現在却遇見暫時的失敗！」

從此種詞句裏面，牠已經是埋伏了盲動的邏輯！因爲斯大林的門徒——乖巧的孩子（說錯了！是革命的前輩！）瞿秋白們，認爲農民運動的消沉是「暫時的失敗」，爲報答斯大林的知遇之恩起見，不得不在中國決定「馬上暴動」去救他那已經破產的路線——即「暫時的失敗」的厄運。因此，該決議又繼續的說：「雖農民革命運動有暫時的失敗與紊亂，但在最近期間，不僅客觀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這種重新高漲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組織之搗毀，農村中白色恐佈之盛行，隨之而經濟壓迫之增加等等；都只是加緊農村中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必然的準備着新的革命爆發，比前

次的規模和力量更要超越！」從這些字裏行間很明顯的看出：上面所說的「暫時的失敗」不過是附帶的詞句，而主要的重心却側重於「但在最近期間，不僅客觀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這種重新高漲是不可避免的」方面；在此地瞿秋白們似乎是又否認了「暫時的失敗」而隱隱約約的漏洩了「革命高潮」的春光！

從什麼地方去肯定革命形勢之「重新高漲」呢？是不是從階級力量的對比去說明革命形勢之「新的提高」呢？不！他們舍正路而弗由，却從什麼「農村中白色恐怖之盛行」，「經濟壓迫之增加」去尋找中國革命之「重新高漲」，其實，在這兩種原因的範疇裏面，任憑中國斯大林的門徒「踏破鐵鞋」也是找不到自己的前途！因爲這兩種現象不僅不能以牠象徵革命之「重新高漲」與「新的提高」，恰恰相反，牠是革命「重新低落」和「新的失敗」之必然的後果啊！

以上一段話雖然是半推半就的洩漏了「革命高潮」的春光，但還限於眉目傳情的狀態；可是，接着中國斯大林主義者竟赤裸裸的抱着盲動之魔去跳舞！如該決議更說：「因之，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境域中準備農民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鬥爭劇烈的關鍵！」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農民總暴動」的政策終於爲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叫喊出

來了，那些「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以及「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鬥爭劇烈的關鍵」等等字眼，其作用不過是遮面的琵琶罷了！

至於怎樣的執行這一「全國農民總暴動」的政策呢？該決議案最後更告訴我們說：「中國共產黨及共產主義青年團應當在極短期間調最積極的，堅強的革命性穩定的有鬥爭經驗的同志，盡量分配到各主要省份做農民暴動的組織者！」

「笑話年年有，不及今年多！」看啊！好一幕滑稽的戲劇！原來農民暴動不是依據於經濟鬥爭的基礎，不是依據於政治環境的展開，不是依據於農民的日常鬥爭的匯合，不是依據於階級力量的對比，而是僅僅靠幾個「有鬥爭經驗的同志」去「組織」，這不是海外奇談嗎？

其實，這種行動，馬克斯在很久以前就批評過了，他說：

「……他們是民權擁護者，他們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因此，在鬥爭的前晚，他們是無須分析各階級的利益狀況的。他們尤其是不需要估一估量自己的手段，他們（以為）只須給（人民）一個信號，那時人民就把所有的力量與壓迫者火拼了。假使他們的利益，誰也不發生興趣，那他們的力量就等於零，這時不是歸咎於多事的詭辯家，……就歸咎於軍隊的過火和盲目，說他們不能看出民主主義目的所在地的幸福，執行者的錯誤就把一切的事情弄糟了，或歸咎於不測的變故，以致好事多磨折了。」

（引自恩格斯著農民問題中譯本二四——五頁）

自「八七」會議決定了「農民總暴動」的策略以後，於是乎便照例在各省傳達了這一暴動的命令，而過去許多從事於革命運動的青年，因城市的政治環境迥非昔比，更紛紛走到農村中來，以尋找自己的前途。因此，在各省便如法泡製的產生了或大或小的農民暴動，其最大的如廣州暴動（當然，牠雖然是盲動主義的產品，然而在歷史上牠仍有嚴重的意義）。中國斯大林主義者，說牠是『退兵時的一戰』，但是除了教導團士兵與罷工工人參加外，關於農民——尤其是廣州市近郊的農民，對於暴動反袖手旁觀。他若江蘇的宜興，江陰，無錫，淮安，奉賢等縣的暴動，均於很短期間爲國民黨軍隊所壓平！當時關於暴動的概念是非常的模糊，我曾經記得有人（彷彿是已死的何孟雄）說過：『燒掉地主一個草堆也叫做爆動』！這眞是荒天下之大唐！并且，對於暴動之宣傳與鼓動，在主觀上亦作了很多的罪惡：不是說海陸豐蘇維埃（?）怎樣的鞏固與發展，便是說兩湖農民總暴動已經起來！不是說江陰無錫農民暴動之空前的發展，便是說農民暴動已經佔領了蔣介石的家鄉——奉化。諸如此類的彼此互相吹噓，互相誇大，其實這些都是不值錢的安慰，都是不能解決問題！

此種盲動策略，歷史已經注定了他的失敗！但是，當失敗之餘，那些狡辯的領袖們，又重復發揮斯大林的胡謅哲學，而很輕倩的將失敗的原因諉之於帝國主義勢力的強大以及什麼『農民不會用槍』

（瞿秋白對六次大會的報告所說的話——農）！

一個人從高處的斜板上滑溜下來：眞是何等的輕便啊！然而事情絕不會無聲無嗅的過去，我們看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怎樣的責難這些問題：

『自八七會議以後，中央估量客觀形勢，認爲革命雖遭三次失敗，仍在高潮的階段。』然而估量高潮，并不是簡純的由於中共中央的負責，實際上中共中央不過是個簡單的斯大林的傳聲機罷了，因爲他是根據於國際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才作成如下的結論：『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客觀上的可能，當立即準備和組織武裝暴動！』江蘇省委對於此種暴動的佈置，認爲異常不滿，牠說：『中央政治報告指出武漢工人在嚴重的失敗之後，脫離黨的領導，目前沒有直接的革命形勢……然而雖然如此……中央肯定的說，一般狀況……自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方面看來，是有利於暴動。在城市已無舉行暴動之可能，於是將武裝鬥爭移到鄉村之間，鄉村成爲暴動的中心，城市成爲輔助的力量。』此種暴動政策的影響如何呢？他不但沒有滿足斯大林的奢望，并且恰恰相反，而發生千奇百怪的現象。如江蘇省委說：

『一個區委同志的聲明書，很有意義，他說：現在工作很困難，中央主張十分主觀，中央攻擊省委說省委不好，省委轉而攻擊下級機關說區委不好，區委則攻擊地方工作同志不好，而同志則怪群衆

不革命！」

沒有像這樣一篇文章把斯大林主義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所犯的罪惡描寫得維妙維肖，這是中國斯大林的門徒們自己嘴裏說出來的話，并不是別人的造謠與誣篾。怎麼辦呢？改絃易轍嗎？不！政治的錯誤，是難於改正的！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第三節　六次大會後之盲動精神

當盲動主義在中國爲事實教訓以後，斯大林們不得不以滑頭的命令宣佈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爲非法，以遮掩其政治的羞顏，在這一路線之下的例行公事，首先便是改組中國的黨以及審查其過去的一切工作。雖然，那付了巨大代價的中國革命的教訓，却遭斯大林們隱瞞了，他們指鹿爲馬似的舉出了一些粗淺的似是而非的不關重要的事實，以江湖術士的行經加以「斬鬼式」（中國社會裏往往有一種江湖術士，他們爲欺騙一般愚民起見，時常幹那斬鬼的工作，法以桃木刻成人形或黃紙上畫一些莫明其妙的符，對之喃喃咀咒後，再以刀斬爲兩段，便宣稱鬼已殺死——農）的咒罵，他們認爲盲動之魔經過這番咒罵以後，將永遠絕跡於中國，殊不知在這錯誤尚未完全糾正以前，而新的錯誤——新的盲

動路線又產生出來！如布哈林於中國C.P.六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說：

「……是一種革命潮流在兩個浪潮中間的情形。一方面是一個波浪和失敗的末了，但接着就是新的高漲，我們現在正是在這新波浪開始的前面，在新高漲的足下，或許在這裏接近這個新高漲的足下，大概是這樣。……」（見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第八十二頁）

這裏，很顯然的布哈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形勢，是儘量的發揮他的煩瑣哲學的觀點，并以什麼浪濤來比擬革命，因而他說：「一方面是一個波浪失敗的末了，但接着就是新的高漲！」這與「八七」會議盲動精神有什麼分別呢？一點也沒有！所謂分別的便是辭句的不同罷了！

那仰承斯大林，布哈林鼻息的瞿秋白與李立三，對於這些老調的彈唱，當然是極盡其手揮目送的能事，如他們於一九二八年回國的時候，關於現階段形勢的報告，首先便說自前已經是「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時期！」（見六次大會後的政治工作第二頁）俗語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潮來怎麼辦呢？勢必要李立三們找一些東西去配合：「……游擊戰爭必須領導，已成立蘇維埃（？）區域必須擴大與與鞏固，并在這些區域中擴大紅軍的組織！」（同上書）經過了很短時間自然配合以後，李立三們又宣佈革命形勢之成熟的復興，企圖再玩一玩暴動的把戲；當然，李立三們之所以宣佈革命形勢成熟復興的原因，自然有牠一貫的立場，而斯大林第三「時期」的「哲學」與莫洛脫夫的報告——

共產國際與新的革命浪濤實是李立三們唯一的理論庫藏。他們對於國際革命革命形勢的估量是非常有趣，如說什麼：「每一次罷工都帶着政治的，卽綜的階級性質，……工人階級已經恢復了以前時期中嚴重的創傷！」（見共產國際與新的革命浪濤油印本第五頁）其實這種觀察，顯然是極不科學的武斷！

聰明的莫洛脫夫，他不僅對於國際的形勢企圖作以上的估量，同樣的，爲充實其「第三時期」哲學內容起見，不得不將中國放在裏面做一做配角；他說：「現時在中國正常時發生革命的騷動；城市和鄉村中的勢力，的確是在發展着。」（同上書）在李立三們和莫洛脫夫的互相唱和之中，盲動主義的色素與傾向，更是一天天的濃厚和發展，而共產國際對於中國農民運動策略的指導，也是一天天獎勵此種盲動的神精！如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共產黨書說：「鞏固幷擴大游擊戰爭，尤其是在滿洲，以及朱毛的區域裏。堅決的反對黨內對於農民鬥爭，以及游擊戰爭估量不足的傾向。多分的要注意士兵裏的工作，最大限度的武裝工農隊伍，解除軍閥的武裝，奪取交通的用具。軍閥所拋棄的區域裏，要取得幷且鞏固自己的力量。凡是農民羣衆革命鬥爭生長和擴大的地方，都要去創造蘇維埃區域，現在已經有的蘇維埃區域裏，應當積極的實行沒收地主的土地，武裝農民，建立蘇維埃；要使廣東，福建，湖南，湖北的工農紅軍零碎行動互相配合，全中國的農民羣衆鬥爭，

都要積極化！應當去領導鄉村裏反對國民黨地主軍閥的日常衝突，而使之深入，黨在紅槍會等類的組織中，工作更要有變更。」

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接得這封信以後，便眉飛色舞的於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三日通過一個決議，這個決議案更加充分的發揮東方式的盲動精神：

「在全國危機與革命新浪潮中，國際指出兩個中國式的特點：一個是軍閥戰爭的繼續，客觀上是在日益削弱反動統治的政權，引導工農羣衆走上反抗運動的道路；另一個是農民戰爭的發展，北方自發的囘民暴動，蒙古的民族革命運動的興起，紅槍會大刀會等類的武裝鬥爭與南方各省的農民土地革命游擊戰爭相呼應着，而成爲革命浪潮中一個主要的支流！」

同時，李立三們更用人工的方式來製造高潮。他說：

「……在經濟政治的恐慌日益嚴重，廣大羣衆日益破產飢餓死亡沒有出路，這樣革命客觀條件日益成熟的時候，再加以統治階級改良欺騙日益破產和羣衆鬥爭已在發展的條件，那麼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有爆發革命高潮的可能！」（見紅旗九十四期立三著論革命高潮一文）很顯然的，李立三說：「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有爆發革命高潮的可能！」這些話是他自己預先預備好了的辭句，他企圖以這些理論的根據去解釋那所謂革命高潮!?什麼是革命高潮的標誌呢？李立三竟異想天開的說中國「有

兩個政權的對立」!?這種「兩個政權對立」的事實李立三告訴說：

「在全國革命鬥爭急激發展當中，全國的政治形勢已經有了極大的不同，極顯明的表現出兩個政治制度與兩個政權的組織……但事實上革命鬥爭急激的發展過程中，已經逐漸壯大了與他對立的工農兵蘇維埃，已經在南方各省區中建立起來，已經包括了二千萬以上的人口，五百萬以上有組織的武裝農民，十萬人的正式紅軍。全國蘇維埃區域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更確定了他的正式的政權，法令，軍隊與政權的組織。因此現在中國已經不只是一個國民黨的政權，而同時是有了蘇維埃的政權。……」（紅旗一百〇八期）

這一個所謂蘇維埃的政權，在什麼地方呢？在經濟不重要的區域，在叢山峻嶺之間，在農村荒僻之區，並且，牠還常常的在旅行着，牠是真正的革命政權嗎？不是的，不過是中國斯大林主義的精神上的安慰品罷了！

但是，這些革命的英雄們，却又興高采烈的吹噓什麼「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政權的首先勝利」！這種勝利是可能的嗎？他們對於這個問題却加以肯定的答覆：

「在產業落後的中國，一般的說來，倘沒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國的產業的經濟中心，而且在幾個與帝國主義通商的商業經濟中心支配之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漢，大連），造成政治上軍閥

割據的局面。因此，全國的統治階級，動搖與崩潰的形勢是一樣，動搖崩潰的程度卻有差別。所以在全國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首先勝利（在目前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見紅旗一二一期）

同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更通過一個中國問題議決案，於主觀上越發鼓動中國C.P.的盲動精神；如該議決案開頭即說：「中國革命運動的新的高漲，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共產國際不僅認為中國革命運動的新的高漲，幷且牠還指示中共中央要這樣的做：

「對於中國工農蘇維埃政府的問題，黨應當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區域建立起真正的紅軍——完全服從共產黨的指導而能夠做這一政府的支柱的軍隊——然後這個政府才能夠有相當的力量和意義。因此，必須集中注意去組織幷且鞏固紅軍，以便在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佔領一個或者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見國際路線第七——八頁）

中國C.P.於這種指示之下，積極的從事於佈置「佔領一個或者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的工作了。在某種特殊的條件之下，中國C.P.是以軍事的力量攻陷了長沙。

如果從表面上看去，此種轉變彷彿是證明了中國斯大林主義者政治路線的正確了；因此，他們便舉行大規模的「慶祝紅軍佔領長沙」的工作。當時李立三的傳聲筒——向忠發說：「佔領長沙的意義

是非常偉大的。他表示着整個的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已經到了更高的一個階段，已經首先在湖南一省內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將奪取武漢與成立全國蘇維埃政府的任務，提到了中國革命民衆前面，成爲今天的第一個議事日程！」長沙佔領後會發生什麼影響呢？向忠發告訴我們說：「佔領長沙是整個中國革命的發展，因此，他必然會掀起廣大的勞苦羣衆之更激烈的鬪爭，促進全國革命高潮之迅速的到來！」（見紅旗一二五期忠發署名的慶祝紅軍佔領長沙一文）

事情彷彿是如願以償。讓這些革命的英雄們氣焰萬丈慶祝他們的「寧馨兒」（即所謂湖南省蘇維埃政權——農）吧！可是「九朝風」（即嬰兒產後九天死的病名——農）的病魔終於將這個呱呱墮地的嬰兒摧殘了！叱吒風雲雷霆色變的長沙，現在仍變爲烟霧籠罩的舊態，這未免使英雄們難堪而氣餒啊！許多乘專車到這裏看潮的朋友（如魯迅田漢諸先生），現在也頹喪萬分的「徬徨」着。

朋友們！別要懊惱！錢塘江的水尚未乾涸，「潮」是終於會來的。

關於這班英雄們錯誤的行動，烏里亞諾夫很早就告訴我們說：「……這種革命派類似無政府主義，或很多地方自無政府主義剽竊而來。它在根本上，一切主要點上，全背棄了無產階級堅毅的階級鬪爭之條件與需要。理論上，馬克斯主義者認定（并且經全歐革命與夫革命運動經驗之證實）小有產者（這種社會成份，在歐洲很多國家內，有極廣大的羣衆代表）在資本主義下常受壓迫，且時常激烈的

迅速的陷於悲慘生活和破產。他們容易轉到極端的革命性，但却不能表現堅忍，組織，紀律，剛毅的性質。受了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刺激而「狂放」起來的小資產者，是一種社會現象，他和無政府主義一樣，同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固有物。這種革命性之動搖不定，華而不實，容易走入屈伏，恢心，空想之迷途，甚至更被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潮流，「瘋狂」似的引誘着，——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眞理。革命的政黨，如果只是抽象的在理論上承認這些眞理，那仍舊不能免去過去所常犯的錯誤的，這些錯誤，可以出乎意外的在一種新形式下，新外形下，在多少有點新奇的情況下，時常發現出來。」（左派幼稚病第十八頁）

安居於莫斯科的斯大林，自中國的事變不斷打擊他的腦殼以後，於萬分無奈之餘，為維持自己的威信起見，不得已祇好犧牲李立三們的政治地位，以轉變羣衆的視線！

從此，李立三便成為斯大林主義在中國的殉葬物！

## 第四節　什麽叫做「立三路線與國際路線的對立」？

「窮則變，變則通！」

這雖然是中國的兩句俗話，可是對於斯大林却是成為挽救政治生命的祕訣！當所謂「紅軍」退出

長沙的不久以後，斯大林及其夥伴，認爲中國的軒然大波已經逝去，怎麼辦呢？祇有在李立三身上尋找出路，於是乎對於盲動主義，照例的在形式上再作番咀咒。最奇怪的，也是最可恥的莫過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的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的那封降妖捉怪似的信，牠很輕倩的造出了一個「立三路線與國際路線對立」的名辭！這一名辭比那些政治警察的力量高明十倍，牠毫不費力的在羣衆當中將李立三的政治偶像打得粉粉碎碎！當然，斯大林狡猾的面孔，也同時暴露。

現在，我們將該信當中最重要的幾段內容介紹出來，并分別的加以批判：

「……因爲在中國革命現在這樣重要的歷史時機，國際執委和中國政治局幾個同志，這是一方面。立三同志和其他幾個政治局同志，這是另一方面。這兩方面之間，發生了嚴重的不同意。……因爲必須明白的了解：——問題不是什麼不同意，或者是估量時機和了解策略任務上的次要的不同意見。必須完全明白的了解：——這裏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有了兩條原則上不同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見國際路線第七七——八頁）

好一個紅色的刀筆吏，第一段就輕輕的說出與李立三的不同意，并且說這是「原則上的不同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這段文字的佈置，彷彿是爲李立三預先排好了一個刑床，并將他架在上面，然後再慢慢的鞭韃。牠說：

「立三同志并不是從對於客觀狀態的分析出發的，并不是從對於鬥爭力量對比的分析出發的——這種分析，對於每一個馬克斯列甯主義者，都是必要的責任。因此，他所做的錯誤，并不是個別的錯誤，他造出了許多錯誤觀念的整個系統，立下反對馬克斯列甯主義的方針。這個方針，脫離了具體的事實，脫離了羣衆。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發展之中，引導到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然而這個方針，雖然用「左傾」的空談遮蓋着消極，實質上亦是機會主義（說錯了！你們的信徒！——農）……從這種非馬克斯列甯主義的方針，就發生了一種理論，說中國已經有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并且這樣的革命形勢在全世界範圍之內也已經成熟了。武漢，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哈爾濱，廣州，香港，大連——武裝暴動，對於長沙，南昌，武漢——用紅軍進攻，并且提議把蒙古平民共和國實行蘇維埃化，加入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請蒙古軍隊開進中國，動員蘇聯的紅軍出征滿洲，對日本宣戰，以至世界大戰——這就是立三同志的觀念！……」

喂！我的「粗暴而不忠實」（列甯語）的朋友——斯大林！當心啊！李立三雖然給你打得「皮破肉綻」，可是你自己同樣的也「體無完膚」了！你們昨天不是還在得意忘形的大拉其「世界革命第三時期」的胡琴嗎？關於全世界革命運動的估量，你們不是說什麼「每一次罷工帶着政治的……即綜的階級性質」嗎？你們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不是要中國「鞏固并擴大游擊戰爭

嗎」？不是說「要解除軍閥的武裝」嗎？不是說要「武裝農民，建立蘇維埃」嗎？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你們不是曾經通過一個中國問題議決案嗎？在這個決議案內你們不是說：「中國革命的新的高漲，已經成爲無可爭辯的事實」嗎？你們不是說：「要在最有保障的區域（即蘇維埃區域——農）建立起眞正的紅軍」嗎？你們不是說：「要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佔領一個或者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嗎？

這些都是你們自己嘴裏說出來的話，現在墨瀋未乾，言猶在耳，爲什麼你們對於自己以前的行徑又要加以認否呢？爲什麼現在又將這這些錯誤統統諉之於「立三路線與國際路線的對立」呢？這種行爲眞是「粗暴而不忠實」啊！

我們眞不禁爲立三呼寃！

立三老友啊！你快點到莫斯科去「擊鼓鳴寃」吧！

同時，斯大林們關於中國蘇維埃與紅軍（？）問題，又有如下的說明，其對於蘇維埃部份說：

「每一個共產主義者，都應當清醒的估計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力量和弱點。要知道蘇維埃政府在中國還沒有，即便說有，也只是在傳單裏，只是在紙上，而不是實現的政權——已經是暴動起的羣衆的組織者和指導者的實現政權。」（見國際路線第八十二頁）

你們已前在各種決議案裏，在莫斯科的眞理報上不是大吹大擂的在喊什麼「鞏固中國蘇維埃政權」嗎？現在爲什麼又說牠是「沒有」了呢？牠是不是得了「小兒痨」的絕症夭亡了呢？以前如果有人否認中國有「蘇維埃」的話，那麼，你們不是說他是「反革命」的夥伴，起碼也要賜他一個「取消派」的罪名！現在你們又承認牠「只是在傳單裏，只是在紙上，而不是實現的政權」。你們自己豈不是又變成「反革命」與「取消派」嗎？對於這些解釋無從的謎，我們只好引用馬克斯一句話來回答牠：

「到了歷史上強固的事實，早已把它的自欺的醉夢打消時，這派社會主義也就到了悲慘的末日！」（見馬克斯主義的基礎第一一五頁）

其次，便是「所謂紅軍」問題。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的信說：

「我們不來講對於革命武力的神奇古怪的過分估量了——立三同志是有過這種過分估量的（他說五百萬工人，三千萬農民，每個城市都有赤衛隊，少年先鋒也有五百萬人等等）。然而必須指出來：立三同志完全不明白眞正的工農紅軍，有工人幹部指揮着的，有強固的黨的骨幹的，現在還沒有（點是我加的——農）！」

奇怪啊！過去斯大林們所宣傳的「紅軍」到那裏去了呢？其來也「迅雷」，其去也「疾風」！依

照斯大林的說法，中國的所謂『紅軍』眞是和『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一樣了。在不久以前，第三國際駐中國的代表——米夫，曾在紅旗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叫做中國革命的大風暴，其主要的內容卽是獎勵那些所謂『紅軍』；現在斯大林們忽然宣佈中國的『紅軍』『沒有』了，牠究竟到什麽地方去了呢？想必是爲米夫先生的革命的大風暴捲跑了?!以前有人懷疑此種所謂『紅軍』，從斯大林起，一直至他的徒子徒孫都是在口頭上，文上字，給懷疑所謂『紅軍』的人們一頓『王婆駡雞』似的毒咒，說『這是公開的反革命的陰謀』！『這是取消派的胡說』！然而一剎那間，舉凡他們以前駡人的話，都變成了自己咒駡自己！那些什麽『反革命的陰謀』『取消派的胡說』等等贈人的禮物，現在爲事實先生原封不動的『璧還』了，這未免太開玩笑了罷!?

斯大林在咒駡了李立三以後，是不是改變了自己的策略路線呢？沒有！沒有！一點也沒有！他不過是在口頭上兜一個圈子，而其主要的精神還是在迴護着牠過去的錯誤，并立足於牠的錯誤觀點上，儘量的繼續的發揮他的盲動路線：

『立刻團結鍛鍊出眞正的工農紅軍，卽使最初這種紅軍只有四萬五千到五萬人；牠的社會成份應當是工農的，主要的幹部應當是工人的，要有堅強的共產黨的骨幹領導着，要有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指揮者，要有鐵的紀律！』

本來，在理論上，過去沒有紅軍，現在要鍛鍊出眞正的紅軍，這是說得通的。然而你們在上面不是說這種行動是李立三的「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嗎？現在又作何種解釋呢？其實，我這種反問未免多事，因爲斯大林們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是要這樣子做：

「同時，必須開展暫時還不是蘇維埃區域的鄉村之中的農民運動，發展游擊戰爭，用農民的騷動像一個箍一樣的去圍繞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城市**！」

在這一封信當中，斯大林們之思想的前後矛盾，可算是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牠一方面批評李立三們「對於長沙，南昌，武漢——用紅軍進攻」的策略爲「機會主義」，然而他自己又說要「立刻團結鍛鍊眞正的紅軍」，要「發展游擊戰爭」，要「用農民的騷動像一個箍的一樣去圍繞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城市！」這裏又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呢？所不同的不過是說法罷了！

這裏很顯明的是斯大林們躲避羣衆鞭撻而以立三開刀的把戲，那裏有什麼政治原則的不同？那裏有什麼路線的改變呢?!

我們很客觀的說，李立三對於斯大林主義路線的執行，的確是竭盡「忠臣孝子」之能事，他的一切的工作佈置，完全是根據於斯大林的指示，在斯大林畫好了的圈子之內，他是一步未出範圍；現在第三國際對他棄如敝屣而加以無情的咒駡，無怪乎他要發「佔領武漢之後，再去和共產國際說話就不

同了」（見國際路線第九十頁）的牢騷！

極乎明顯的，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的信裏面是沒有絲毫馬克斯列甯主義的氣味，立三老友啊！請你看一看馬克斯列甯怎樣的在下面說明這些問題。

## 第五節　馬克斯列甯主義呢？還是斯大林盲動主義呢？

斯大林及其徒子徒孫，他們在日常行動上，在一切的決議案裏都是口口聲聲的高喊馬克斯列甯主義，而實際上他們對於馬克斯列甯主義不僅沒有忠實的遵守，并且還加以無情的修改！非常明顯的，在暴動問題上，他們是絲毫沒有了解馬克斯列甯對於武裝暴動的概念，而其所發揮的完全是斯大林「第三時期」的「哲學」；然而叛徒們對於這一點却是矢口否認，現在我們祇好將馬克斯列甯對於武裝暴動的概念介紹，看看誰是「真假李逵」？

「暴動和戰爭一樣，是一種藝術！」（馬克斯）

在這句話裏，是包涵了很明顯的真理！偉大的世界革命的導師——列甯，他根據馬克斯對於暴動的概念，於一九一七年關於武裝暴動及暴動勝利的條件，曾經立下了一個模範的公式。他說：

「如果要使暴動獲得完全勝利，那末決不可以靠着一種祕密的結合，或是一個政黨，而必須依靠

在一個先進的階級之上，這是第一點。暴動必須依靠着全體民衆革命力量之高漲，這是第二點。暴動必須在革命高漲到極點的轉變時期，爆發起來，這就是說，必須在民衆的先鋒隊的活動力量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敵人中間和那種軟弱猶疑的革命的友軍中間，發生最厲害的動搖的那個時候，暴動才可以爆發起來，這是第三點。這三個條件，馬克斯主義對於暴動問題的立場，和勃蘭基(註)主義，大不相同。」（見列甯著十月革命文選馬克斯主義與暴動一文中譯本第一二七頁）

(註)勃蘭基是十九世紀後半期法國的革命家，他的主義的特點是：希望以一小羣勇敢的革命者的暴動而奪取政權，不了解經濟鬥爭和羣衆的無產階級組織意義等等。

這一個公式已經把勝利的暴動的必需的條件加以很具體的和一般的說明了。然而列甯彷彿預先見到斯大林對他意見要加以修改似的，所以，他同時更指出在某種環境與某種條件之下，是不能決定暴動的政策：

「軍事變亂是勃蘭基主義，假若牠不由一定的階級的政黨來舉行，假若牠的舉行不會估計到一般的政局形勢——特別是國際環境，假若沒有事實證明這個政黨能得民衆大多數的同情，假若革命事變的發展還未曾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妥協的自頓的心理加以事實的反駁，假若暴動的口號還未普遍與流行，假若先進的工人還不相信羣衆無出路的境遇，假若工人還不相信他們能得鄉村的援助，假若國家

的經濟狀况還有用和平的國會的方法來解決危險的和平愿望……。」（見列甯著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策略）

并且，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列甯在其所著第二國際的崩壞的小册子上面，他把這個關於武裝暴動的問題更寫得詳細。他說：

「沒有革命的形勢，革命是不可能的；同時，也并非所有的革命形勢都引起革命；這對於馬克斯主義者是毫無疑義的。一般說來，革命形勢到底有什麼特徵呢？假若我們指出下列的主要特徵，或許不會有錯誤的：一，統治階級在原有的形式之下沒有維持自己統治的可能；這樣或那樣「上層的」危機（統治階級的政治危機），引起被壓迫階級的不滿意和憤怒。通常革命的到來，僅是「下層不愿」忍受舊式的統治還不夠，同時，還要「上層不能」按照舊式的統治而生存。二，被壓迫階級的窮困與需要的劇烈逈非尋常可比。三，因爲上述原因，使那些在「和平時代」安然不受掠奪，在多事之秋被一般的恐慌環境和「上層階級」的本身把他們捲入渦漩的羣衆的積極性格外提高，而獨立的去進行歷史的事變。」

「按照一般通例，沒有這些不僅不依各種派別政黨的意志爲轉移的，并也不依各階級的主觀意志爲轉移的客觀的變動，革命是不可能的。」

馬克斯，列甯關於暴動問題所指示的話，是何等的精密而詳細，是何等的重要而深刻，他們不僅是指出了暴動的必要條件，幷且，對於怎樣的去估量革命形勢也給人們以正確的回答。

但是，我們在這幷不是重複樸列哈諾夫的老調：「不要拿武器呀！」恰恰相反，每個革命者都應當「把刀槍當作議事日程」！祇有這樣才能促進歷史的前進。

恩格斯說：「……暴力在歷史上還有另一作用，就是革命的作用：據馬克斯之意見，當一個舊社會懷孕着一個新社會胎胞的時候，暴力便是這個新社會的產婆；那種暴力是社會運動所藉以破壞腐舊死殭的政治形體，和從這種舊的死殭的政治形體中開掘出自己的道路之一種工具和方法……。」（見恩格斯著反對杜林引自國家與革命中譯本三二頁）

然而這些指示與教訓，却被機會主義——斯大林派糟蹋得乾乾淨淨。列甯說：「按照一般通例，沒有這些不僅不依各種派別政黨的意志爲轉移的，幷也不依各階級的主觀意志爲轉移的客觀的變動，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國斯大林派的英雄們對於這些却悍然不顧，過去把中國勢將乾涸了的河流，認爲是軒然大波，幷且是繼續不斷高漲的大波！他們「在多少有點新奇的情況之下」於是乎更叫什麼「日益逼近的革命高潮」!?殊不知列甯常常對他們說：「沒有革命的情勢，革命是不可能的，同時，也幷非所有的革命形勢都引起革命」！英雄們對於這些話不但沒有了解，幷且也不願意去了解！

他們不但『很固執的以背對着二十世紀，面對着十八世紀』的生活着，并且還創造和復活機會主義體系的理論。

正像夢囈一般的理論！

## 第六節　所謂『紅軍』到那裏去？

所謂『紅軍』問題，現在已經是鬧得滿城風雨了。無論是統治階級或者是革命政黨，均應該對牠有個明確的概念，否則，我們便無法了解目前嚴重的社會問題。所謂『紅軍』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是不是簡單的從斯大林派——機會主義者的決議案裏產生的呢？不是的！斯大林及其門徒縱然有修改馬克斯列甯學說的本領，然而他絕不能用單純的人工來製造所謂『紅軍』。這些所謂『紅軍』，牠是中國社會的特殊產物，他是從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當中產生來的；特別明顯的，如農村中人口過剩以及土地佔有形勢中廣大的農民處於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國資本主義之畸形的發展，并因帝國主義的障礙，致城市方面不能吸收那廣大的破產農民。像這樣一大羣破產失業的農民，卽是沒有人去領導他們，他們也會騷動起來，何况乎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再以什麼『土地政綱』去煽動他們，去組織他們呢？因此，牠的形成，是在許多複雜的經濟的政治的條件之下决定的，并不是什麼從天上掉下來

的東西。

誠然，對於所謂『紅軍』的分析，在目前的確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如陳獨秀說：『所謂「紅軍」的區域之擴大固然是事實，「土匪」猖獗遍滿了全中國更是事實，而且幷不是新的事實！』（見陳獨秀著所謂『紅軍』問題無產者第二期三三頁）很顯然的，陳獨秀認為所謂『紅軍』簡直就是『土匪』。另一方面，他又說：『若在農村中長期的作游擊戰爭便是中國的老把戲：「流寇」而已！』（同上）他以為所謂『紅軍』不過是簡單的『土匪』與『流寇』而已，幷沒有其他的意義！因此，他更說：『這樣巨大數量的游民無產階級，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統治階級內部有了紛爭動搖時，他們便要大規模的騷動一次，從赤眉黃巾到白狼老洋人都是這種把戲！』依據於此種推論與分析，則不僅目前所爆發的所謂『紅軍』是『土匪』與『流寇』，即便是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也都是『土匪』與『流寇』的『老把戲』了。

『成則為王，敗則為寇！』

『尊王衞道』的陳獨秀先生啊！你縱然因年齡的關係，不能『投筆從戎』以肅清你所認為的『所謂紅軍』，然而你還可以抱着你那妙齡的愛人到床上去『勦匪』『滅寇』以消遣你胸中的積憤！

像這樣的去說明所謂『紅軍』問題，祗是表示政治上的短視！我們看那親身參與『勦匪』戎幕的

楊杏佛先生，最近在他著的赤禍與中國之成亡一文中，根據他親身的經驗，把陳獨秀的分析打得體無完膚；他說：『不知今日之紅軍，挾第三國際與蘇俄之後盾，有嚴密之黨政軍組織，……皆有計劃，……悉成學說；絕非歷代之流寇，與最近之軍閥，所可同日而語！』（見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申報第三張）

目前的所謂『紅軍』問題，他是要根據於中國農民問題的解決而解決。然而中國農民問題恰與一八四八年法國農民問題有一個很顯然的鴻溝：一八四八年法蘭西的農民是反革命派選擧的後援隊伍，而二十世紀中國的農民，却成爲革命的動力之一；一八四八年法蘭西的農民，他們『兢兢然唯和平是望，醉心於農民天子拿破崙之傳說，結果，就形成了法之第二帝國！』（見恩格斯著農民問題中譯本三四頁）而二十世紀的中國農民，他們是沒有這個前途的。當然，現在的所謂『紅軍』，并不是真正的紅軍，而是一些農民的騷動隊伍。

此種所謂『紅軍』區域的內部情形怎樣呢？就我們所搜集的珍貴材料當中看來，是充滿了千奇百怪的腐化精神：

『過去的黨，各級組織非常鬆懈，甚至主要負責人，將黨置於腦後，三四個月不參加小組會和各種會議，并且許多工人同志拿介紹信來找他，他說你們暫留手中何必心慌；沒有什麼關係的，并且將

士兵同志鮮血換來的布疋等項，隨便分給十餘個愛人……。」（見中共中央出版的黨的建設第四期加緊改造蘇維埃區域內我們黨的組織一文）這是關於湘鄂西紅軍區域內部情況之地方報告，其腐化的情形，眞是達到聞所未聞的程度。該報告同時說：「尤其是監利的同志，如果要把他由甲鄉調到乙鄉，那麼他馬上會害起病來，頂好的都要請十天或半日的假，回去看老婆，會愛人，并且有許多覺得工作太做好了，上級就會調動，於是消極，怠慢起來，總而言之，地域觀念，家庭觀念，愛人觀念打不掉。」這是什麼「紅軍」呢？這豈不是充滿了農民意識嗎!?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在赤區裏做些什麼事情呢？據該報告說：「赤區的同志，大多數腐化，官僚化和右傾了，他們覺得政權已經取得，沒有什麼事做，整天裏只是找愛人，打牛火（即白晝宣淫的意思。——農），……」這些話是多麼刺耳啊！

因此，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是異常的惡劣：

「……所以羣衆只認定共產黨比國民黨稍好一點，并且有許多地方的羣衆覺得無論是什麼黨，我們不管，姓東來，是姓東的百姓，姓西來，是姓西的百姓的態度！」

「蘇維埃政府負責同志多不能解決羣衆實際要求，同時富農佔三分之二，委員大多數官僚化，以致羣衆不信仰蘇維埃，并有呼委員爲老爺者！」（見同上書三——四頁）

這種現象，我們可以說是農民騷動中的共同特性；并且中國斯大林主義者自己也承認：「這些現

象，不僅是鄂西蘇維埃區域內是如此，即在過去現在的贛西南也有同樣的現象！」

問題很明顯的是：根據上述的各點，所謂「紅軍」他雖然是沒有單獨的前途，但是斬草除根也是根本談不上的事情，因爲牠有社會的基礎，牠有經濟政治的酵母，縱然在某種情勢之下，以巨大的軍事力量暫時的屈伏了牠，但其結果是；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否則，解決所謂「紅軍」的辦法：祇有澈底的解決土地問題。這批所謂「紅軍」到那裏去呢？不是中途變質和「上山」「下湖」，便是在一種新的領導之下，隨着整個農民問題的解決以走向歷史的程前！

我們帶着歷史的望遠鏡看吧！

所謂「紅軍」到那裏去？

# 第十一章　農民運動中幾個重要問題

## 第一節　土匪問題

目前中國農民運動的面前，排着很多的嚴重問題：那些瑣碎的我們在姑舍而弗論，茲就其中的犖犖大者來加以研究吧！

土匪問題便是其中的一個。

關於土匪問題，不僅是一般社會人們對於牠要街談巷議，就是那些政府機關和革命的政黨，也將此種嚴重的社會現象置於議事日程之中了。誠然，有些朋友說：土匪幷不是中國的特產，在其他許多先進國家也往往有土匪騷動的事實；可是牠眞有中國這樣的廣泛，普遍，長期與特殊麼？事實告訴我們說：沒有！沒有！絕對的沒有！

這些土匪是不是『死有餘辜』的『天生賤骨』呢？我們假使這樣的認定，非但是等於『坐井觀天』看不清事實的眞象，幷且也是永遠不會了解此種所謂『盜賊成性』的怪物！

這一大羣在中國各地擾亂所謂社會秩序與地方安寧的土匪是從那裏來的呢？是不是如那班蹲伏在餞囊面前的記者先生們所說的什麼『飛將軍從天而降』呢？其實，這些話不過是無聊的拉談而已。中國這一大羣所謂『死有餘辜』的土匪，牠是中國農村人口過剩所現成的特殊現象的一環，這些現象有牠長期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根源：中國經濟的發展過去長期的停滯在商業資本的過程，沒有很快的完成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當中國走向資本主義之路的時候，已經遇着帝國主義澈底的統治了中國，致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於畸形的條件之下，而成爲一種特殊的殖民地資本主義。此種經濟影響的結果，一方面固然使中國不能產生一個斯托里賓（註：斯托里賓是俄皇時代的一個土地改良的大臣，他頒佈了許多土地改良的命令，將大地主的土地分一些與佃農幷改良佃農的生活狀況——農）以實現土地改良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工業資本在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之畸形的發展，都市的資本主義的新式企業，不能吸收更廣大的破產的農民；這是形成目前中國土匪的第一個原因。帝國主義之多角式的侵略，造成了廣大農民的破產，這些破產的農民，他們既不甘於『坐以待斃』，那麼勢必至於『挺而走險』，這是第二個原因。高利貸資本的剝削，以及地主豪紳貪官汚吏的聯合壓榨，逼得農民們無路可走，祇有幹那個『頭在頸子上轉』的『土匪』勾當，這是第三個原因。長期的軍閥混戰，破壞了農村的組織，在戰事區域破產的農民以及戰敗的潰兵，因無法可以生活而流入於匪羣，這是第四個原因。

人禍之餘，繼着便是接踵而來的水旱天災，使廣大的農民，遭受了巨大的浩刼，這是第五個原因。

以上五點，都是形成中國土匪的主要原因，祗有那些閉着眼睛不看事實的人們，他們對於上述的諸原因才會加以否認。至於構成這一大羣土匪的主要成份，大多數是爲脫離生產過程的農村游民無產階級，他們爲生活所驅使，因而那種侵犯私有財產制度的行爲便成爲他們唯一的職業。

雖然，土匪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也曾起過不少的作用，如其與軍閥制度的聯繫，便是最好的證明。當然，軍閥制度的形成，帝國主義者實盡了主要的作用，但是廣大的土匪層與軍閥制度的構成亦不無關聯。例如中國的各派軍閥，他們雖是代表某一帝國主義以及某一地方的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而構成軍閥們雇傭隊伍之基礎却大半是些搶掠爲生的土匪與失業破產的農民，甚之，有許多的軍閥都是從土匪當中生長起來的；如過去關外王的鬍帥以及張宗昌等等軍閥，都是土匪當中最猛悍的頭目。他們與土匪之間的差別，便是一個政權的問題。當他們沒有抓到政權與帶着軍閥的冠冕以前，他們都是或大或小的土匪首領，在農村中間他們還往往扯着「替天行道，殺富濟貧」的大旗以號召農民入夥，并且還相當的顧到「弟兄們」的利益，迨至被統治階級「宣撫」而「招安」以後，那麽，這些領袖們立刻即扯碎了過去蒙在臉上的什麽「替天行道，殺富濟貧」的面帕，而背叛羣衆的利益，喊出什麽「勦匪」的口號以屠殺那過去患難與共的弟兄。

像這樣的事實，真是數見不鮮：如招集流亡揭竿而起之割據地方的土匪頭目，在某種政治環境之下，馬上可以變成一個或大或小的軍閥；這種或大或小的軍閥，在某種特殊的條件之下遭受打擊而崩壞以後，其下層羣衆——士兵又會轉變而爲土匪！由此，我們認爲土匪之澈底的消滅和肅清，在現階段的目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祗有軍閥制度之澈底鏟除和社會制度的變革，才能解決土匪問題。

在現階段的目前，既然是不能消滅這一大羣遍於全國的以侵犯私有制度爲職業的土匪，那麼，在農民運動中，他便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了。土匪是不是農民的朋友呢？此問題的具體解答，也就是確定在農民運動中對於土匪的態度。在農民運動發源地的廣東，關於土匪與農民運動之間的相互關係，有很多的經驗告訴我們說：

「如惠陽一帶土匪，勾結奸商，包運仇貨，焚刼農村，四貼賞格：能捕農會會員者，每名賞百元；能捕農會辦事人者，每名賞三百元；能捕罷工糾察隊者，每名賞五百元；這是完全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的土匪。又如陸豐五華陳逆餘孽羅一東梁作梅溫伯舟等，勾結地主劣紳土豪，組織武裝千餘人，駐紮陸豐之劍門坑及五華一帶，專以殘殺農民爲唯一之目的。幷與香港陳逆炯明互通聲氣，……其餘如北江西江及中路南路之土匪，霸佔河道，勒收行水，擄人勒贖，洗刼農村者，不一而足，……」（見犂頭旬報第九十期合刊第三十三頁）

這是廣東農民運動中土匪的作用！

此種在地主豪紳指揮利用之下的土匪，於一九二六年，曾先後慘殺了廣東農民運動的戰鬥員——黃超凡，李民智等以盡忠於豪紳地主！

在江蘇，土匪對於農民運動的憎惡，以及受地主豪紳的利用的程度，亦不亞於廣東；他們與農民之間固然有一些宗法的，血統的，以及很模糊的階級的淵源，但是一般的說來，所謂給予農民利益的領袖，充其量不過盡了一些「殺富濟貧」的作用！他們不但因武裝力量的薄弱（當然，大股匪是例外）而不能搶劫更大的地主（例如江蘇阜甯縣二集鎮左姓一家有槍二百餘枝以自衛），甚之，有時還受地主豪紳的利用，而為地主豪紳「保方」（即保這一地方地主豪紳的利益担保其不為土匪搶劫的意思——農），幷騷擾中小農民！因此，在江蘇北部的土匪，大多數因其本身武裝力量的脆弱，不敢刼掠有槍甚之槍多的地主，祇好回過頭來侵害中小農民；其搶劫的目標幷不是固定的限於金錢，即是普通穀物都要，不但牛，豬，羊，雞於搶刼時是不能幸免，即是貧農們種的一些蔬菜瓜果等類也要光顧！在搶刼時候的附帶的工作，便是姦淫婦女與任意燒殺，以槍口向天空掃射，也是他們日常工作的一種。因此，農村中一般貧農，在思想上雖不反對他們——土匪們侵犯私有制度如奪刼富戶財物的行動，可是土匪的動作如果直接危害到他們自己（即貧農）的利益，同樣的他們要和土匪做劇烈的鬥爭！

於土匪問題中，還有一件事情值得我們注意的，即是土匪當中的領袖問題。在江蘇方面，土匪領袖的成份，多半是一些退伍的下級軍官，他們領袖資格的取得，完全是憑藉一些特殊的軍事技術與鄉口關係。最有意義的，便是有很大的地主也往往來做土匪的首領，這些大地主的土匪首領，一方面固然由於他有雄厚的資本能夠購買大批的新式的武器，而鄉口中的關係和鄉口中的地位（註：鄉口中的地位高的即是靑紅幫當中的所謂老太爺——農）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有一位大地主而兼土匪首領的孫秀章，他在江蘇灌縣擁有三四千畝的土地，大可以養尊處優了，爲什麼又要參加土匪隊伍的工作呢？這對於地主階級豈不是階級的背叛嗎？這豈不是奇怪嗎？不！絲毫也不奇怪，他參加土匪隊伍的動機，一方面認爲這是成爲小軍閥的捷徑，而對於自己利益的保護，也是他參加土匪工作的主要點；他絕不代表『下層』土匪的利益去和統治階級對抗與拚命，反之，坐地分贓以剝削『下層』的小的土匪的血汗！例如土匪首領供給土匪羣衆手槍一支在『劈把』（即分贓的暗語——農）的時候，一支手槍須算一份，一支駁殼須抽兩份，一支步槍須作三份，而實際上參加搶掠的土匪羣衆，所得到的實是非常的微末！

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一書中曾說：

『游民無產階級——一切階級中破落份子的渣滓堆。……這是同盟中最不良的同盟者，牠是絕對

唯金錢是圖的隊伍；每個工人領袖，如用此種游民無產階級爲衛士或助力，只此便證明他是革命運動的叛徒！」

這雖然是指德國的游民無產階級而言，但同樣的可以比擬於中國農村游民無產階級。中國農村中游民無產階級的土匪，他們對於農民運動的關係，既如上述這樣的惡化，而其階級背景又是這樣的複雜，這更可以證明恩格斯分析的正確了！

像這樣廣大的中國土匪到那裏去呢？

最好，我們先來審查他們生活方式的特點，然後再來推測他們的前途。依據於一般的現象，第一，他們在思想上不信任羣衆的力量，而崇拜其所謂萬能的盒子砲；他們覺得解決性慾，解決經濟都是盒子砲的功績，牠比什麽主義都高明；第二，他們在生活上最鄙視刻苦耐勞長期奮鬥的勸告，而祇圖「大杯酒」「大塊肉」的奢華，他們的人生觀是「晚上脫掉鞋，不知明早來不來」？因此，他們是盡量的享樂；第三，他們在組織上既無系統，同時又沒有紀律，而僅憑習慣相同感情一致而結合，故而不僅是帶有流動性質，并且是一盤散沙；第四，他們彼此之間，祇顧私人的利益，沒有互助的精神，因此，時常發生分贓不平的鬥爭，以及什麽「骯槽」式（即內訌時以槍擊斃某些人的名辭——農）的火併！

根據這四點看來，他們的前途，眞是非常的暗澹，尤其是他們的領袖已經成爲農民運動的敵人！那些離開生產過程很久而專門以土匪爲唯一職業的人，他們腦殼裏的意識祇想：『升官發財』以及娶幾個『姨太太』，這便是他們最終的目的；不過，那種還留在生產領域的半農半匪，他們還有改變土匪本質的可能。當然，農民鬥爭的激烈，可以引起土匪下層羣衆的革命化，這幷不是什麼理想，而是事實上可能的事情；但是此種革命化最低限度的條件，就是要除去土匪隊伍中一切思想上的鐐銬！

每個從事於農民運動的革命者，千萬別要忽略了恩格斯告訴我們的話：『這是同盟中最不良的同盟者』，否則，他就是『革命運動的叛徒』！

## 第二節　會黨問題

中國農村——尤其是北方的農村當中，有一種偉大力量的農民組識，這種組織的總的名稱，便是那名播中外的『紅槍會』。當然，這一紅槍會組織的名詞，他充分的象徵了農民原始的，迷信的意識，然而，問題也正從這裏發生。這些很奇特的原始的落後的農民行動，牠是不是由於某一些好事者從中煽動呢？不是的！恰恰相反，而是農民生活痛苦的反映。那一大羣受着層層壓榨的農民，他們在生活上誠然是遭受了許多意外的痛苦和『牲口式』的磨難，而到處碰壁找不着自己的出路，其對於統

治階級的壓迫，又無法避免，但對於現社會的仇恨卻是耿耿於心！加之，封神榜西遊記這類灌輸迷信思想的書籍，在落後的農村中間，實握思想上最高的權威，許多農民們自接受所謂神仙的觀點以後，於生活痛苦之餘，往往運用頑固的腦神經，作虛無縹渺的幻想，幻想冥冥中的神仙來解放他們。因此，那所謂「玉皇大帝」與「太上老君」便成為他們心目中最高尚的公正無私的偶像，牠們不僅不會偏袒那班所謂惡人的統治階級，甚至於神靈還會憑藉在他們身上而調動「天兵天將」去誅伐那些壓迫人民的惡人！

紅槍會思想上的路線便是這樣展開的。

至於紅槍會的組織情形，據一九二六年山東省黨部農民運動的報告說：

「查紅槍會之組織，內中派別亦極複雜，有紅門，玄門，黃門，金鐘罩等名稱。紅門稱為紅槍會，黃門稱為黃沙會，玄門稱為大刀會；紅槍會以紅纓槍為武器，大刀會不持槍而持刀，均腰帶紅兜肚，喝符念咒，自稱能避刀槍，子彈不能入身。故打仗時勇猛無匹，遇有死傷，則謂心不誠所致。入會須認師傅，認師之後，雖在嚴冬，亦必赤膊跪禱，香盡一柱方能穿衣，并用涼水喝符四五道，此非年幼好勇之徒，不能為之。入會之後，每晚用磚將渾身上下遍砸一過，謂之排磚，俟排磚不覺痛苦，其筋骨肉即較前堅固，再行用刀渾身上下徐徐砍斫，俟刀砍不知痛，一砍一條白線，排刀即算成功。

此兩層功夫，約百日可成；在此期內，不准近女色，不准貪財，犯此訓條，則法術不靈，神明不佑。……」（見中國農民第九期山東省農民運動實況一文）

關於紅槍會組織的情形，山東省的報告是這樣的說，可是在河南方面紅槍會的組織內容與以上所述又有些不同了。有一位從事於紅槍會實際運動的吳炳若先生，在他所著的淮河流域的農民狀況一文裏面，曾有如下的描寫：

「去秋我因黨部的命令，實際到紅槍會裏邊去組織「農民自衛軍」與「農民協會」，當然與他們更接近一層，當時我就懷着一種好奇心要偵探他們的究竟，所以當我與他們很親熱了的時候，我總是故意說些挑撥叫他讓我試驗的言語。然而他們總是不肯，他們的理由是「我們無事不能把神們請來」。因此，我的不相信他們的心也因而愈切，所以也愈想試驗他們。最後我得着機會了，就是他們有一個會首一日向我說：「你看拉火場的不看？」當時我不懂他的這名辭。他於是又向我解釋道：「這拉火場就是一個學（設紅槍會教練場的地方，他們叫「莊紅學」）的學生成了功，用槍打着試試。」這我立刻便要求去看。火場是設在一塊約四五畝地來大的空地上。空地的一面擺着一個香案，香案前豎着八根大鎗（土鎗，俗呼為「白龍槍」），一把鬼頭利刀，空地的四週放着四個方桌，老師磕了十六個頭後（學生也陪着），即時就伏下身子，彷彿和尚伏在他的神前祈禱一樣。這名叫「請神」。許久的時

間，香火（香是一把點着燒的）中忽然發生一個小的炸聲，如燈花爆時的聲音一樣。他又磕了十六個頭，站起身來說：「神降臨了。」於是立時大家都脫了衣服，跑到空地中站立着，伸拳舒腰儼如久靜的兵士臨陣時的光景。於是「老師」向大家說：「你們那個近來作的有虧心的事的，近三天以內有不潔淨的，趕快說，不然馬上槍聲一響就後悔遲了。」他說一遍，再說一遍，很鎮靜的很慎重的，見沒有了答聲，他又在旁邊叫了八個老「學生」，每人給與一包炸藥，兩根鐵釘，一把鐵槍子，一個香火。他在炸藥，鐵釘，槍子上用食指劃了些不知什麼，同時嘴中也不知說了些什麼。劃罷，他們立時都跑去拿一隻土槍。這裏，他立刻叫我避開半里路遠近的距離，伏在一個土坎下窺看。那兒，我很清楚的看見，他一再將那慎重的話說了幾遍，又在他們（赤身站在空地中間的人）面前劃了些不知什麼，立刻把手一揮，那八根土槍一齊轟然的響了，如霹靂然。還沒有等到那槍煙散開，我立刻跑到那火場中去察看，老師手舉着明晃晃的大刀，兇狠的將他的學生一個個抓來照準肚腹重重砍了三刀，然而也不見絲毫損傷。他砍能我接過刀看時，刀口稍微也有些傷損；但此時我還疑那刀是假的，我拿過來在地下鏟鏟草根，的確是很鋒利的。我又將那炸藥和槍子各抓一把回來用鳥槍打東西試驗，也的確是毫無可疑的！」（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六號五三頁）

在這裏，對於紅槍會的組織作用，顯然與山東省黨部的報告有迥然的不同，吳炳若先生認為符咒

有靈可以抵抗一切的槍砲，於是乎他儘量的發揮其『東方式』的論調；他說：『所以我覺着這實在是今日科學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若只根據自己所有的科學來搖搖頭，恐怕事實是不能承認！』

其實，就我們所知道的許多紅槍會的姊妹團體，如所謂什麼『黃鎗會』，『花籃會』，『孝衣會』，『哥弟會』，『黑鎗會』，『白槍會』，『小刀會』等等組織，尤其是我親身測驗過的『小刀會』的符咒的作用，完全與吳炳若先生所說的相反，而證明科學的裁判是絕對正確。我曾經記得，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天，在江蘇鹽城與寶應毗連的一個鄉村，從事於農民運動；在那裏『小刀會』的勢力是籠罩了農村，爲發展農民運動的工作，因此，勢所必然的要與『小刀會』在思想上發生鬥爭。有一位『小刀會』『鋪堂子』（即傳道受徒的名詞——農）的『老師』，他在農民羣衆面前自詡其符咒怎樣能夠抵抗槍炮，并且他自己還說可以以其身軀供人們實際試驗，我也和吳炳若先生一樣，爲好奇心所驅使，拔出了那捍衞我自己生命的利器——盒子砲而躍躍欲試，在未瞄準以前，我再三的向那位『老師』詰問是不是可以當此一擊而不要後悔呢？他要旁觀的羣衆證明，如有死傷完全是咎由自取，與開槍人無涉！當時我也很審慎的唯恐犧牲了他的性命，故擇其不重要的部份瞄擊；砰拍兩槍的結果，那位不可一世的老師，已經倒臥於血泊之中而折斷了一條腿！不過，鎗擊後的暫時，創口是不覺得怎樣的疼痛，因此，他猶能扶着傷腿向人叢中抱頭鼠竄而去！一幕滑稽劇從此閉幕，而該地小刀會

在農民羣衆中的信仰也是掃地無餘了！

這是事實，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

我想關於中國會黨中符咒作用，用不着在此地多多討論，好在這是一個事實問題，自然有事實在着證明。不過我們所要研究的，這大羣散佈於中國農村中間的會黨羣衆，不管牠在思想上是怎樣的崇拜五行符咒，在行動上是怎樣的英勇，然而牠在政治上經濟上總是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中國的會黨究竟是代表那一個階級呢？在未提出我們的正面意見以前，先來介紹一些關於紅鎗會階級面貌的文件：

「距開封百里之杞縣，有一紅鎗會首領名婁百循，能號召附近三四縣三十餘萬紅槍會。初鄂軍謀驅國民軍時，吳佩孚曾遣人結婁以擾國軍內部，并委婁及其部下以師旅長之職，且許驅走國軍後豁免杞縣各農村繁捐雜稅。婁幫助鄂軍驅走國軍後，既不得官做，且亦未見免捐稅（因杞縣係豫省最富之地，有金杞縣銀太康之諺，豫省當此財政破產之時，鄂軍如何能將此肥肉放棄），乃下令號召各村抗納一切捐稅。……河南各地紅槍會之組織微有不同，其組織之動機皆出於農民對土匪潰兵之自衞心理，且同有槍彈不入之迷信，惟在豫西一帶之紅槍會，則大多爲潰兵土匪與當地劣紳勾結魚肉鄉農之結合，戰時則與軍隊勾結獵官。……」（見嚮導週報一百五十八期蕭湘著河南紅槍會被吳佩孚軍隊

屠殺之慘狀一文）

於此，我們可以看出紅槍會是什麼東西了。這裏一定會有許多的朋友，感覺得我此種言論的過火，他們認爲紅槍會也有不少的革命作用；此種革命作用革到什麼程度呢？據所謂革命的河南紅槍總會，在他的告民衆書中說：

「自前年吳佩孚到河南，是因爲他答應三年不徵糧，免除苛捐雜稅。現在他們到了河南後，不但不免糧免稅，倒比從前更壞十倍！想起從前手提大刀（帮吳佩孚的忙）上火線去拚命，只是爲他來了好安身度日，那知現在他來了，對咱們的禍害，比老陝（註：老陝指陝軍，因從前河南駐軍多陝籍）還厲害，這個捐，那個稅，今天要，明天催，把糧食都變賣了，把衣服當光了，還不夠繳他媽的糧。你看他軍隊比土匪還利害，他看着各地的大小股匪橫行，他也不管！……」（見犍十月刊第五期紅槍會之研究一文）

在這裏除掉了反抗苛捐雜稅兵匪騷擾外，再也沒有其他的革命作用了！任何一個嗅覺敏銳的人，從此種告民衆書裏面也嗅不到關聯於貧苦農民的利益，恰恰相反，牠是充滿了地主與富農的要求！

很顯然的，這些會黨牠們的口號都是千遍一律的什麼「保衛地方」與「捍禦土匪」，而地主富農實是這組織的中心骨幹，他們是組織上和思想上的實際領導者，他們往往利用這些組織起反革命的作

用！例如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北伐軍在信陽與紅槍會發生了很大的衝突，這個衝突并不是什麽偶然的宣傳不愼的結果，相反的，而是革命運動中必然的現象；這衝突的原因，固然由於紅槍會的首領受了北洋軍閥的賄買，但同時却包含了地主富農們極濃厚的反對農民運動的色彩！一九二八年，在江蘇又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會黨暴動，於阜甯，鹽城，漣水，泗陽，淮陰，淮安，寶應等縣，參加暴動的刀會羣衆，都打起了所謂「國號大梁」的旗幟——即復辟的旗幟，而進行一種復辟的「保小主」的陰謀！這些暴動羣衆的目標，幷不是在於解放自己，而是想替所謂「小主」効勞！不過他們總是在一種「官逼民反」的口號之下鼓動起來的，而宿遷的刀會暴動便把這個口號喊得異常響亮！

在山東方面，許多會黨復爲失敗的軍閥所利用，如：

「……魯南道會，則以無極道爲最有勢力；該道於最近五年內，始風行於魯省西南，據云係嘉祥人李光炎所創，李自稱總方丈衆文師，爲道中之魁首，佯言焚符呑下，可避免一切刀槍炮火，始爲防匪，繼爲潰軍！……因此魯南民羣對該道甚有信仰，相率加入。年來即小刀會，白旗會，紅槍會等，亦多有改爲無極道者。最近張宗昌在魯東活動，特聯絡魯南無極道以爲響應，派員以四萬元運動李光炎及道長王傳仁等，着先組織無極大同盟軍，由各分會聯絡，委李光炎爲同盟總會長，王傳仁爲總會都督，王承德任總指揮，淸貢生馬玉文爲參謀衆文牘，符號用黃色，普通無極道友，悉用藍色，由張

宗昌接濟其軍用品及款項，并有日本浪人，暗中擘劃，馴至土劣借道入教者，各地皆是。其目標為仇視黨學及政府，在滕縣，曲阜，魚台，濟甯，嶧縣等地活動極力，於本年（即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曾先後在各地舉行暴動，圍攻濟甯等縣，聲勢頗大，官兵多不敢攖其鋒！……」（見民意第七期紀宿遷的民變一文）

根據以上各省的材料，會黨往往受封建遺孽以及軍閥的利用。然而為什麼他們喊出「官逼民反」的口號呢？這的確有解答之必要。中國一般農民的觀念，往往為舊思想方式所籠罩，因此，農村中的普遍現象是：把脊背對着未來，而將面孔望着過去；他們感覺得現在的生活程度比從前高昂不知幾多倍數，他們認為在光緒年間食米祇賣幾千錢一担，而現在却漲到幾十千錢一担，加之連年的軍閥戰爭與水旱災荒，使他們生活更加痛苦！他們沒有澈底的認識痛苦的由來，而祇是說這些現象的發生，都是由於推翻了大清皇帝的後果；并且，他們對於孫中山還是非常不滿，說他是推翻皇帝的罪人！他們并認為如果『皇帝登殿』馬上就可以使『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了，而一切的不良現象都可以免除了！目前的政治局面，對他們有強烈的刺激，因此，他們大有『緬懷往昔，不禁感慨系焉』的神情！怎麼辦呢？還是燒香禱告『玉皇大帝』吧，要他催促皇帝的降臨！許多的遺老與豪紳，便利用農村中此種年老農民的落後心理，來進行自己的陰謀——復辟與做官的陰謀！

據說，指揮各地刀會與紅槍會的總機關，就是過去那所謂參禪悟道的「同善社」（註：這是江蘇阜寧東坎鎮刀會總段長——首領蒯某告訴我的——農）。他們工作的方式，是以少數金錢去收買一批游民，要他們穿上「八卦式」的袍子，而裝着道貌岸然的模樣。這批穿「八卦式」的袍子的人們，是借着符咒治病的名義，往來於中國的窮鄉僻壤，乘機蠱惑農民做創造復辟工作的基礎，并吹噓自己的符咒萬能，而槍砲子彈遇着了他的符咒就會失掉了作用！

關於會黨的階級性，我們可以總結起來說，不管什麽小刀會與紅槍會組織儀式是怎樣的不同，然而牠總是代表地主富農的利益，他們總是站在領導的地位，而中農在這裏面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雖然，這些組織裏面有很廣大的破產的貧農充實了牠的內容，可是無論如何，斷不會有了貧苦農民的充實而改變了這些組織的階級性！

由一大羣農民所構成的會黨的組織，在某一階段中牠也曾表示了鬥爭的勇氣，但是在另一方面，牠也顯示過反革命的作用；於農民運動中對於這些會黨究竟應當採取怎樣的態度呢？問題的解答，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爲會黨既然是羣衆的組織，應當是無條件的參加，以擴大這種組織而變成羣衆革命的基礎。

第二種意見，認爲會黨是一種迷信的組織，假使參加了這種組織，等於承認迷信；幷且不僅僅是承認迷信，同時在政治上也障礙了羣衆的前進。因此，參加這個組織的罪惡，實等於拉羣衆向後倒退。

其實，這兩種意見都是犯了錯誤，都是犯了「極左」和「極右」的錯誤！第一種意見之無條件的參加刀會，其結果會葬送了自己的政治面目；第二種的意見，也完全遺棄了羣衆的觀點，同樣的，在客觀上是幫助和延長了地主豪紳們對破產農民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統治。

我們以爲這種會黨的組織，每個革命者應當參加進去以吸收更廣大的羣衆，和揭破土豪劣紳的欺騙；不過每個革命者的目的，都應當注意到怎樣破壞這個組織，分化這個組織，改變這個組織，而不是在維持這個組織、鞏固這個組織，擴大這個組織。幷且同時在思想上要無情的批評符咒的妄誕，和即時的提出貧苦農民單獨要求的綱領，以樹立政治影響！

至於這些會黨的前途，依照一般情勢的觀察，他們的出路祇有兩條：

第一，就歷史的教訓來看，就其組織的階級性來看，土豪劣紳往往拿牠做反革命的工具，做抵禦革命的盾牌！

第二，牠爲狂風暴雨似的大革命的震撼，因此而改變了牠的組織形式以及思想上的傾向，成爲革

命的附屬助力；但這裏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依照當時農民運動的程度和鬥爭形勢來决定！

## 第三節　富農問題

凡是從事於農民運動的人，都感覺到富農問題是目前農民運動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誠然，這個問題是規定農民運動中一般路線和策略，假使不了解這一問題的眞實意義，那麼，在農民運動中會失却了方向而走上錯誤的道路！

現在關於富農問題的爭論，可算是囂塵日上，有很熱烈的爭辯，但是，這些爭論，都偏於抽象的討論，而忽視其內容的考察。因此，爲求得對於富農問題之澈底的了解，考察富農的內容，的確是一件必須的工作了。什麼叫做富農？對於此問題的回答，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有一部份人，認爲凡是有『餘錢剩米』的農民就叫做富農；另一部份人，則以爲小地主就是富農。誠然，第一種意見，不僅是近於苛刻，同時也未免過分的抽象；而第二種意見，更是根本淆混了富農和地主的界限，須知地主與富農中間是有很大的區別呢！

這種區別的淺近眞理，就是：地主是專門以剝削佃農的地租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同時，爲維持其尊嚴起見，他們自己是不直接參加農業勞動的。富農生活方式則一反此種範疇；牠除了佔有相當數量

的土地以外，還兼營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當然地主們也有時經營商業與高利借貸），牠的特點除了雇傭勞動以外，有時候他們自己還直接參加農業勞動！要之，以上兩種的回答，都是沒有找着問題的關鍵，是同樣的沒有認清楚富農的面貌！

我以爲富農應該作如下的定義：

凡是佔有相當數量的土地，或佃耕地主們一部份土地的農民，他因此雇傭失業和破產的農民從事於農業上的勞動，并且自己還直接參加農業上的勞動，而另一方面又以經營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方式榨取貧苦農民的血汗，屬於這一階層的農民，便叫做富農。

我覺得這個定義，或許沒有多大的錯誤吧！

但是，這一階層的農民，其經濟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不是由於他們「天生的好八字」呢？事實告訴我們未見得的如此的順利吧。關於富農的如何形成，我們是不能很呆板的說牠是直接剝削僱傭勞動的結果，因爲這樣的肯定，是抹煞了農村中間複雜的歷史過程。形成富農的條件當然是異常的複雜，其主要的大致爲以下幾種：

第一，農村中階級的分化，將全體農民劃成許多不同的層次，在總的方面說來，是形成了兩個營壘，一個是農村人口當中佔少數的壓迫的營壘，一個是由絕對大多數破產失業農民所構成的被壓迫的

營壘。富農們於這兩個營壘中間牠採取了雇傭勞動的形式，吸取貧苦農民剩餘價值以自肥。

第二，高利貸資本之殘酷無倫的削剝，吸取貧苦農民的血汗，牠好比結網的蜘蛛一樣，使那些乘動不慎的蠅類（貧苦農民），往往有殺身之禍！我們看高利貸資本在農村中間迅速的流通，巨大利潤的榨取，能使人們於很短期間積累起較大的財富。

第三，商業的兼營，如於農村中間開行設號，作城市商品經濟的介紹者，而資本主義亦因他們的介紹，更獲得充分的控制鄉村經濟的機會。甚至往往於穀物登場的時候，這些散佈在農村中間的行號，預先以賤價定購農民的生產品，迫至青黃不接的當兒，又囤積居奇，以博取較大的利潤。

第四，無情的水旱天災，近幾年來，籠罩了整個的中國農村，那些因天災而遭受破產之禍的農民，幾幾乎遍地皆是，縱然有一些慈善家們的賑濟，然而杯水車薪，實無濟於事；這些破產的農民，受着天災的震撼以及生活窮困的鞭撻，於無可奈何的環境中，祇好把土地以賤價讓給富農！因此，目前農村中許多破產農民的土地，都讓渡到富農的手裏。

以上我們所指出來的四個原因，都是富農形成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目前對於富農問題的爭論，還是異常的激烈；如果就國際方面而論，如蘇聯的內部因此起了尖銳的理論鬥爭，并且因這個問題（當然，這裏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問題，如英俄委員會問題，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國革命

問題，帝國主義問題等等）而分裂成三個派別：即左派的托洛茨基，中派的斯大林，右派的布哈林等。他們理論的交叉點是：左派絕對反對富農；右派擁護富農利益到底；中派在與右派聯合打擊左派的時候，是聯合富農，及至右派勢力之不斷膨漲，『特爾米多』（註：是一七九三年八月七日法國大革命失敗，其領袖羅伯斯庇爾上斷頭台的名詞，這名詞是象徵革命政權的顛覆與反革命派之徹底勝利——農）的危險之時常警告，而中派不得不與右派決裂以反對富農。

同樣的，關於富農問題的爭執，在中國方面，也形成了兩個總的不同的意見：

A. 聯合富農：

在聯合富農的陣線裏，又可分做兩翼：第一，屬於右翼的，他們認爲中國目前的社會，仍是封建社會，因此，農民還是一個整個的階級；在這一個整個的階級內面，無所謂貧與富的分化，更無所謂階級鬥爭。換句話說，此種理論的出發點，就是根本否認中國有富農的存在。第二，屬於左翼的，他們認爲目前的中國社會是一種混合的半封建的性質，幷且，封建關係還是站在優越的地位；從這個觀點出發，很自然的會得出『聯合全體農民』的結論。因此，他們便認爲『中國農村封建殘餘，及因這種殘餘而存在的全部上層建築物，若督軍，若省長，若張宗昌一流的軍閥等等，都是產生且擴大現在中國革命的基礎，……唯其是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物是中國壓迫的根本形式！』

（見中國革命與反對派）要之，這一部份人，他們雖不承認農民是一階級，但是爲的是要造成反封建的聯合戰線——即農民聯合戰線，所以要竭力的吸引富農參加革命的鬥爭！同時，他們又竭力防範(?)富農們在農民協會中領導。

B.反對富農：

在反對富農的意見當中，又有兩個不同的立場：

A.右派：他們雖然認爲階級鬥爭是農民運動中對富農的基本概念；可是，同時他們又覺得中國的富農又有些例外，因他們認爲：「中國鄉村生產方式是資產階級的，而剝削方式是封建的。」並且還認爲中國富農是地主性的，是與俄國不同，所以他們說：「俄國民權革命是聯合全體農民，因爲俄國富農無封建式的剝削及地主的前途，……我們因富農兼多地主性，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一定要反動！」（見教育週刊第四期）這些話的內容，是非常明顯的：認爲中國的富農是兼地主性，他們的前途是地主的前途，因此反對富農，也就是反對地主，也就是反對封建，換一句話說，反對富農即是反對封建！！

B.左派：關於富農的分析，他們完全與上述相反，他們認爲農村中階級的分化，形成了兩個新的營壘，而富農們所立脚的營壘是不起革命的作用，因牠是新的農村資產階級，是農村資本主義關係

的代理人。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烏里亞諾夫就特別注意到農村中的階分化，即注意到富農的反動與壓農的作用，他在從平民主義到馬克斯主義的論文中批評社會革命黨說：「他們說勞動農民時，閉着眼睛不看這好久就已經指明過的，研究過的，規定過的，敍述過的，反覆說明過的事實；在我們俄國，資產階級的農民，在這些勞動農民當中，已無可辯駁的佔着優勝，富有的農民，無可否認的有權可以稱為勞動者（指富農自己直接參加勞動），然而不能就算是工錢的苦力，並且現在就已佔有鄉村生產力之大半。」

另一方面，烏里亞諾夫又說：「在私有財產的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土地與勞動者間的，布爾喬亞與普羅列搭利亞的範圍廣大的鬥爭場裏，富農會反對勞動者階級，做私有財產所有者的幫手！」（見農民與革命中譯本第四十八頁）

這裏，一定有人懷疑這是一九〇五年的說話，現在的中國，當然不能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相提並論，並且中國農民運動中富農反動與否？反動到了什麼程度？還沒有一個確實的回答！

我覺得解釋這個問題，如單純的乞靈於理論，不若去徵引一些事實。遠在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在農民運動中間富農的面貌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

「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裏聽得是：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坐飛機回廣東去了；吳佩孚重

復佔領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爲這是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拿了農會的册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

「請你進農民協會！」

富農的回答是：

「農民協會麼？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作了幾十年田，沒看見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

「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說。……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都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脚，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的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見毛澤東著湖南農民革命第十一——二頁）

根據這些事變的教訓，我們深切的感覺得，在整個的農民運動當中，應該將富農除外，無論他怎樣的表示積極與勇敢，實際上不過是試探軍情的慣技！

當然，我們覺得富農問題之徹底的解決，並不是依靠某一政黨的決議案，或者是某一種政治力

量，而是要依據於整個的經濟力量對富農的克服。恩格斯他曾告訴過我們解決富農問題的方案，他說：

「對於強制的沒收，或許可以忽視；經濟發達的結果，這種更加頑固的頭腦，也可以使其近於理性。」（引自河西太一郎著農業問題之理論中譯本五十三頁）

讓那些英雄們單純的揮他的「鐵腕」吧！

而被打擊的人們，昨天還是他們的朋友！

# 第十二章　結論

綜觀以上各章的研究，關於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發展的形式，我們可以得着如下的幾個概念：

第一，中國社會發展的形式，在原始生活的階段中的確是充滿了許多神話，然而并不因此就推翻社會進化的範疇，反之，祗有應用唯物史觀的公式，才能說明中國社會的面貌。因此，在古代社會方面，對於三皇五帝以及什麼堯舜的傳說，於地質學未有新的發現的材料證明以前，祗好代之以原始共產社會以及氏族共產社會的名辭；當然，在這一階段裏，階級社會尙在萌芽的過程中，所以也沒有什麼農民戰爭。生產工具不斷的發明，社會的外形是不斷的改變，生產工具之由石器時代的繼續向前演進，而社會發展的形式也由氏族共產社會的階段踏進封建社會大門；商朝便是這社會過渡的標誌！關於這一點，最近在河南省殷墟當中掘出來的材料，牠可以替我們充分的證明。然而商朝社會并不是什麼「原始共產社會」，恰恰相反，而是中國封建初期的統治；但是，這個統治不久便爲周民族所代替，將封建社會的組織更加擴張。爲什麼周民族能夠推翻了商朝的統治？是不是姜太公的萬能或者如郭沫若先生所說的什麼「奴隸制的革命」呢？其實，這些話都是有點近於奇蹟！

伴着生產工具發明而發展的西周社會，因鐵器的應用與深耕制的普遍應用於農業生產，致使農業經濟有上昇的趨勢，其對於生產技術落後的殷民族的攻擊，實是摧枯拉朽；如果從這一點上去觀察其轉變的相互關係，當然是沒有什麼神奇！由西周以後至東周以前，這一階段中，實是中國封建社會登峯造極的時代，自春秋戰國以來，此種社會的本身，也就開始衰弱，於純封建的母體裏面已經孕育了商業資本的胎兒；商業資本經過封建社會之長時期的孕育，在牠特定的階段內，衝破了舊的軀殼而誕生下來。秦始皇就是商業資本的胎兒，牠不但沒有集封建的大成，而且還代表了一種新的階級的力量——商業資本的力量，走上了歷史舞台！

商業資本的發展，就其在全部歷史中的作用而論，當然有進步的意義，然而在另一方面，牠又能使農民窮困，而產生中國的農民戰爭。其原因由於貨幣在交換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牠引導土地關係走向商品的道路。從貨幣關係支配社會生活中心及土地買賣的條件下面，必然不可避免的要產生土地集中與農民破產的現象，這現象也就是社會的裂痕！在這社會裂痕當中，那些破產的農民爲要求土地而鬬爭的革命浪濤，又顚覆了所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的秦朝統治！無可否認的，當廣大破產農民爲要求土地而進行革命戰爭的時候，那些爲歷史勢將送進博物院的封建官僚——如項羽等，又乘機崛起，企圖掠取農民革命的果實！但結果，劉邦以折衷的手腕完成了歷史事變！

在漢朝，王莽的變法，他是走的改良的道路，他企圖遏止農民的暴動而施行一種由上而下的改良，但是當時的生產力——特別是正在發揚滋長的商業資本，這種運動幷不能從牠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那煊赫一時的所謂「王田制」的運動，結果祇有走向滅亡的死谷！晉魏六朝時的所謂「南朝金粉」，實際上就是描寫商業資本的繁盛，而隋朝的統一以及運河的開闢，更充分的證明牠是代表商人的利益，而南北朝經濟的溝通，客觀上更證明這一個政權所代表的是什麼？唐，宋政權的階級性，不僅在國內市場中在政治形態上我們可以看出牠是代表商人與地主的政權，那大規模的國際貿易與許多國際貿易港的開闢，同樣的於客觀上說明了這兩個朝代的政權階級性。

至於元朝，商業資本的發展，可算是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全亞洲的財富，都握在蒙古人的手裏。但是在土地問題方面，同樣不能挽救農民破產的厄運，因此，又爆了一次好廣大的帶全國性的農民戰爭；在農民戰爭之最後決鬥爭場裏，朱元璋是獨吞了農民革命的果實。這一點的經濟意義是：朱元璋佔領了江，浙，皖三省，在經濟上找着了他所代表的中心——即東南商業資產階級，牠憑藉他們的帮助，所以能夠很快的完成明代的統治。明朝的政權雖然是從農民暴動的大潮中湧現出來，可是牠因代表商人地主利益與農民分離以後，農民問題仍是沒有得着解決，在張獻忠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暴動面前，在鋤頭鐮刀的叛亂聲中，結果，又葬送了這個政權。雖然，在中國地主官僚與滿洲貴

族相互勾結的條件之下，又克服了農民大暴動而建立滿清的統治。

滿洲民族其固有的政治形態，雖然是個封建的國家，可是當牠入關的時候，正值中國商業資本之高度發展的時候，牠為便於統治中國的勞苦農民，當然要適應着這種發展的趨勢；所以牠一方穿上中國式的商業資本的『背心』，而另一方仍舊披着滿洲封建『外套』！自帝國主義侵入——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英國的炮火；一方面打落了滿清皇帝的威靈，而別一方面，因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使中國農民生活更趨勢痛苦！那霹靂一聲的『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不僅使滿洲政府手足無措，并且給帝國主義也有很大的威嚇，於是，在帝國主義與滿清政府的聯合進攻中，少年的革命公社也從此夭亡！帝國主義者在壓平太平天國的革命後，在中國一般社會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牠推動中國生產力之向前發展，開始組織現代式的工業，如建築鐵路，開闢煤礦與鐵礦，以及創設銀行等等；并在農村中間作了很大的破壞工作。

農村經濟解體了，農民暴動也隨之而起。義和團的事變便是給帝國主義一個直接的回答。八國聯軍之強盜式的刼掠，實是帝國主義以武力開放中國的頂點，這時期滿清政府已經徹底的投降在帝國主義的面前，而東交民巷在實際上已經做了中國的主人！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雖然是意智殘酷，然其在中國歷史全部進程中的作用，雖時間短促，但其突飛猛進，實為過去數十世紀所不及。於帝國主義

推動之下，生產力之繼續向前進展，一方面產生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但同時又誕生了新興的勞動階級。舊社會制度成爲新的生產力之桎梏時，必然不可避免的要爆發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就是這樣條件之下舉行的；當時革命所標榜的主要口號是：

「自由！平等！博愛！」

完全染遍了進步的「德謨克拉西」的顏色！

但是，在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民主的任務是未曾得着解決，而蘊藏在這社會裏面的矛盾，經過了一個特定的歷史過程（即羣衆情緒之下降與上升的過程），便爆發成爲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在這一革命過程中，各種政黨的面貌表現得淋漓盡致，並因此使民主的任務，一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完成！

第二，農民戰爭之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是：從陳涉吳廣開始揭開農民暴動之歷史序幕起，繼續不斷的每一個朝代都爆發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我們可以說一部二十四史都是農民戰爭流血的歷史！雖然，這些農民戰爭每個時代都是有每個時代的特點，絕不是什麼歷史上千貫的老把戲；譬如赤眉的暴動，就與陳涉吳廣不同，所謂「赤眉」實是帶有組織性的標誌；而「黃巾」的農民暴動比赤眉的範圍更加廣泛，且含有比較嚴密的組織意味，我們從那「三十六萬同日而起」的字句中，就可以想像到他

們的組織觀念！至若唐代的黃巢；他有極鮮明的奪取政權的政治目標，宋代之李順王小波的農業均產主義的宣傳，他們決不是什麼簡單的流寇土匪；而是農民政治鬥爭的隊伍，縱然是比較原始的。元朝農民暴動，如朱元璋們有民族革命的大旗；而明末的李自成與張獻忠們，不僅有土地革命的宣傳，幷且還有弔民伐罪的行動。

在滿清政府統治底下的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更與前代的農民戰爭不同，而佔中國農民暴動史上重要的一頁，牠將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同時幷舉，甚之，在政治上還揭起國際主義的大旗，凡農民革命所佔領的地方，都徹底的實行土地革命，但是，在當時社會生產力尙未高度發展的條件之下，沒有新興階級作他們的領導，結果，祇有在帝國主義與滿清政府聯合進攻中夭亡了！義和團雖然是農民們迷信的暴動，幷且爲滿清政府所利用，然幷不因此而抹煞了反帝國主義的價值，甚至相反的而成爲農民戰爭中反帝國主義的先鋒！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農民——尤其是會黨的暴動，對於這一革命不無多少幫助；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農民運動在這一革命進程中，實起了很大的作用。農民革命之繼續不斷的向前進展，而每一個時代都有牠的新的內容，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牠給我們一個共同的總的教訓是：農民戰爭是沒有單獨的前途，牠不是爲統治階級打得個落花流水，而還受悲慘的失敗而外，便是爲統

治階級的左翼份子所利用以達到他們維護本階級利益的目的，縱然在某種形勢之下，農民們拿着了政權，但在商業資本之影響之下，牠必然要墮落到腐化的深淵，而與農民分離成爲另一階級壓迫農民的工具。

第三，在農業人口佔多數的中國，在殖民地式的中國，其農民運動的趨勢，當然與一八四八年法蘭西農民運動有所不同，該時代法蘭西的農民是「醉心於農民天子拿破崙的傳說」，是反革命派議會選舉的柱石。目前中國的農民運動，形勢完全是兩樣，牠是革命運動中的助力；任何一個階級如果要取得政治上的勝利，而得不到農民的贊助，那麼，他們所宣傳的政治歌唱，實等於自己的葬曲！

但是，我們這裏并不是說農民有單獨的前途，根據歷史的展望，牠祗有在一種新的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而走上歷史的前途！